

毛澤東選集

東北書店發行

1948

毛澤東選集

出版者

發行者

印刷者

東北書店

東北書店

東北鐵路印刷廠

1948.5.哈.初. 1—20000

目次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一一五
-----------------	-----

卷一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九一五〇
-----------------	-------

一 農村革命

二 革命先鋒

三 農民與農民協會

興國調查·····	五一一〇
-----------	------

一 八個家庭的觀察

二 本區舊有土地關係

三 鬭爭中的各階級

四 現在土地分配狀況

五 土地稅

六 蘇維埃

七 農村軍事化

長岡鄉調查……………一九一三一

- 一 政治區劃及戶口
- 二 代表會議
- 三 此次選舉
- 四 鄉蘇下的委員會
- 五 地方部隊
- 六 群眾生活
- 七 勞動力的調劑與耕牛問題
- 八 公債的推銷
- 九 合作社運動
- 一〇 文化運動
- 一一 衛生運動
- 一二 社會救濟
- 一三 婦女
- 一四 兒童
- 一五 工人
- 一六 貧農團
- 一七 宣傳隊
- 一八 突擊隊
- 一九 革命競賽

才溪鄉調查……………一三一—一七二

一	行政區劃	
二	代表會議	
三	此次選舉	
四	鄉蘇下的委員會	
五	擴大紅軍	
六	經濟生活	
七	經濟公債	
八	文化教育	
『農村調查』序言二		一七三—一七五

卷二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一七九—一八二
戰爭與戰略問題……………	一八三—一九四
一 中國特點與革命戰爭	
二 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史	
三 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	
四 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五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	



六 注意研究軍事問題

『共產黨人』發刊詞……………一九三一年一月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一月

第一章 中國社會

第一節 中華民族

第二節 古代的封建社會

第三節 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第二章 中國革命

第一節 百年來的革命運動

第二節 中國革命的對象

第三節 中國革命的任務

第四節 中國革命的動力

第五節 中國革命的性質

第六節 中國革命的前途

第七節 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與中國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論……………一九三一年一月

一 中國向何處去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五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六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七	駁資產階級專政	
八	駁「左」傾空談主義	
九	駁頑固派	
一〇	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	
一一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一二	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一三	四個時期	
一四	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	
一五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二五——二六
----------	--------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二六——二八
--------------	--------

論聯合政府	二八——三五
-------	--------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二	國際形勢與國內形勢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

中國問題的關鍵

走着曲折道路的歷史

人民戰爭

兩個戰場

中國解放區

國民黨統治區

比較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內戰危險

談判

兩個前途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我們的一般綱領

我們的具體綱領

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廢止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

人民的自由

人民的統一

人民的軍隊

土地

工業

文化、教育、知識份子

少數民族

外交

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

中國淪陷區的任務

中國解放區的任務

五 全黨團結起來，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卷三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三五一—三六五

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爲民主與自由而鬥爭

我們的領導責任

爲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三七一—三七五

一 和平問題

二 民主問題

三 革命前途問題

四 幹部問題

五 黨內民主問題

六 大會的團結與全黨的團結

七 爲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鬭爭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三七一—三八五

一 兩種方針

二 兩套辦法

三 兩個前途

四 結論

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三六七—三九六

兩黨統一戰線的成立

兩黨統一戰線成立的影響

什麼是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

爲實行三民主義與十大綱領而鬭爭

與英國記者貝特蘭之談話三九七—四〇九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形勢與任務四二一—四三〇

一 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

二

〔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在黨內是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
在全國是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

關於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

關於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

階級投降主義與民族投降主義的關係

與合衆社記者的談話四二一—四四四

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	四五一—四六
用國法制裁反動份子	四二九—四三三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	四三五—四三八

- 一 戰爭的新階段
- 二 戰爭的原因
- 三 戰爭的目的
- 四 戰爭的性質
- 五 戰爭第一階段的特點
- 六 我們在戰爭第一階段中的革命政策
- 七 英法蘇談判的破裂與戰爭第二階段的開始
- 八 戰爭第二階段的特點
- 九 我們在戰爭第二階段的革命政策
- 一〇 戰爭的前途

與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的談話	四四九—四五三
蘇聯利益與人類利益的一致	四五五—四六三
第一個問題 蘇聯對於制止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蘇聯對於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 蘇聯進兵波蘭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 蘇聯援助中國的問題	
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	四六五—四七四

- 一 日本要把中國變爲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汪精衛跪倒於日本之前
- 二 力爭時局好轉反對悲觀失望
- 三 強調團結進步趕跑日本帝國主義
- 四 共產黨的十大任務

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四七五—四八二
在延安慶祝十月革命節幹部晚會上的講話	四八三—四八五
與中外記者團談話	四八七—四九二
一九四五年的任務	四九三—五〇一
答路透社記者十二項問題	五〇三—五〇五
爲美國對華軍事援助法案的聲明	五〇七—五〇八

卷 四

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第一部份第二節	五二一—五二三
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	五二五—五四三
一 關於中央來信	
二 邊界割據及八月失敗	
三 九月至今的邊界割據	
四 現在的問題	

乙 土地問題

丙 蘇維埃問題

丁 邊界黨的現狀

戊 革命性質問題

己 劃據地區問題

庚 交通及其他

✓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五四—五八

一 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

二 黨的組織問題

三 黨內教育問題

四 紅軍宣傳工作問題

五 士兵政治訓練問題

六 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

七 廢止肉刑問題

八 優待傷兵問題

九 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五八—六四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二)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三)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四)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一)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二)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三) 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第四章 圍剿與反圍剿

第五章 戰略防禦

(一) 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

(二) 反圍剿的準備

(三) 戰略退却

(四) 戰略反攻

(五) 反攻開始問題

(六) 集中兵力問題

(七) 運動戰

(八) 速決戰

(九) 殲滅戰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六四一—六五

一 爲什麼提起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二 那末爲什麼不將抗日戰爭的一般戰略問題中的東西用之於游擊戰爭呢？

三 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四 抗日游擊戰爭的具體戰略問題共有六個

五 第一個問題——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六 第二個問題——與正規戰爭相配合

七 第三個問題——建立根據地

八 第四個問題——游擊戰爭的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

九 第五個問題——向運動戰發展

一〇 第六個問題——指揮關係

論持久戰……………六七—七四

問題的提起

問題的根據

駁亡國論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

爲什麼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犬牙交錯的戰爭

爲永久和平而戰

能動性在戰爭中

戰爭與政治

抗戰的政治動員

戰爭的目的

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消耗戰，殲滅戰

乘敵之隙之可能性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兵民是勝利之本

結論

卷五

✓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七五—八八

一 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

二 關於發展農業

三 關於發展畜牧業

四 關於發展手工業

五 關於發展合作社

六	關於發展鹽業	
七	關於發展自給工業	
八	關於發展軍隊的生產事業	
九	關於發展機關學校的生產事業	
一〇	關於糧食工作	
✓	論合作社	八八九—八九一
	組織起來	八九三—八九九
	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九〇一—九〇六

卷六

	反對自由主義	九〇九—九一二
✓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九三—九三〇
一	問題的性質	
二	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三	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範作用	
四	團結全民族與反對民族陣線中的奸細	
五	擴大共產黨與防止奸細混入	
六	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黨的獨立性	
七	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來幹	

八	幹部政策	
九	黨的紀律	
一〇	黨的民主	
一一	我們黨已經從兩條戰線鬥爭中鞏固與壯大起來	
一二	當前的兩條戰線鬥爭	
一三	學習	
一四	團結全黨到團結全民族	
	改造我們的學習	九三一—九三八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九三九—九五四
	反對黨八股	九五五—九六八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九六九—九九五
	文教統一戰線方針	九九七—九九九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

(一)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還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戰爭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即已在幾個戰場上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而從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間，人民解放軍即已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破壞了蔣介石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企圖徹底破壞解放區的反革命計劃。現在，戰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區裡進行，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裡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裡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

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裡，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佔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鬭爭的歐洲與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一）

從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的一天起，我們就說，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够打敗他。我們必須打敗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一個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反對中國民族獨立與中國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戰爭。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民族的統一與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然而恰在這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地結束以後，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代替德國與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地位，組成反動陣營，反對蘇聯，反對歐洲各新民主國家，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反對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在這種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在這種時候，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

途就將被斷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進行了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反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與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够打敗的。當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暴風雨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當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匪幫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爭的時候，蔣介石匪幫認為，只須三個月至六個月，就可以打敗人民解放軍。他們認為他們有正規軍二百萬，非正規軍一百餘萬，後方軍事機關及部隊一百餘萬，共有軍事力量四百餘萬人；他們已經利用時間完成了進攻的準備；他們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們擁有三萬萬以上的人口；他們接收了日本侵華軍隊一百萬人的全部裝備；他們取得了美國政府在軍事上與財政上的鉅大援助。他們又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已經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數量上與裝備上遠不及國民黨軍隊；中國解放區還只有一萬萬多一點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區的反動封建勢力還沒有被肅清，土地改革還不普遍與不徹底，人民解放軍的後方還不是鞏固的。在這些基礎上，蔣介石匪幫就不顧中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最後地撕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簽訂的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及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了冒險的戰爭。那時我們說，我們敵人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佔着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十八個月戰爭的經驗，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論斷。

(三)

十七個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爲止，十二月尙未計入）作戰，共殲滅了蔣介石正規軍及非正規軍一百六十九萬人，其中被打死打傷的六十四萬人，被俘擄的一百零五萬人。這樣，就使我軍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保存了解放區的基本區域，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我們所以能够如此，在軍事方面來說，是因爲執行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我們的軍事原則是：（一）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爲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爲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須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軍能够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爲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之把握。（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與連續作戰（即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及城市。（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及城市則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備而

又爲環境所許可之據點及城市，則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之據點及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與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儘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時間。以上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的方法。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軍在和內外敵人長期作戰中鍛鍊出來，並完全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的。蔣介石匪幫及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經多次召集他的將校受訓，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及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則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並替蔣介石直接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這是因爲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及瓦解敵軍等項目標的基礎上，建立起人民解放軍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當着我們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並轉移軍力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而主動地放棄許多城市的時候，我們的敵人是興高采烈的。他們認爲這就是他們的勝利和我們的失敗。他們被一時的所謂勝利衝昏了頭腦。張家口被佔領的第二天，蔣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動的國民大會，似乎他的反動統治從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們將中國變爲美國殖民地的狂妄計劃，從此可以毫無阻礙地實現了。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及其美國主子的腔調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是一切內外敵人都被他們的悲觀情緒所統治的時候。他們唉聲嘆氣，大叫危機，一點歡樂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十八個月中，蔣介石的前線高級指揮官，大部分因爲戰敗被撤換。這裡有鄭州的劉峙，徐州的薛岳，蘇北的吳奇偉，魯南的湯恩伯，豫北的王仲廉，瀋陽的杜聿明、熊式輝，北平的孫

連仲等人。負指揮全部作戰責任的蔣介石的參謀總長陳誠，亦被取消此種指揮職權，降為東北一個戰場的指揮官。而在蔣介石自己代替陳誠擔任全局指揮的期間，却發生了蔣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這樣一個局面。蔣介石反動集團及其美國主子，現在應當感覺到他們自己的錯誤了。他們將日本投降以後一個長時間內，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願望，力爭和平反對內戰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與力量薄弱的表現。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力量，過低估計了革命力量，冒險地發動戰爭，因而落在他們自己佈置的陷阱裡。我們敵人的戰略打算是徹底地輸了。

(四)

現在，比較十八個月以前，人民解放軍的後方也鞏固得多了。這是由於我黨堅決地站在農民方面實行改革土地的結果。在抗日戰爭時期，為着和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及團結當時尚能反對日本的人們起見，我黨主動地由抗日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後，農民迫切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改變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改變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我黨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出的指示，就是表現這種改變。一九四七年九月，我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並立即在各地普遍實行。這個步驟，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針，而且對於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徹底性（地主得到較農民為多的土地財產，富農的土地財產原則上不動）作了明確的改正。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在消滅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則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這是消滅封建制度的最徹底的方法，這是完全適合於中國廣大農民群眾的要求的。為着堅決地澈

底地進行土地改革，鄉村中不但必須組織包括僱農貧農中農在內的最廣泛群眾性的農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而且必須首先組織包括貧農僱農群眾的貧農團及其選出的委員會，以爲執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機關，而貧農團則應當成爲一切農村鬭爭的領導骨幹。我們的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及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地主富農應得的土地及財產，不能超過農民群眾。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複。地主富農在鄉村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說，大約只佔百分之八左右（以戶爲單位計算），而他們佔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況，則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因此，我們土地改革所反對的對象，人數甚少，而鄉村中能够參加與應當參加土地改革統一戰線的人數（戶數），則有大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樣多。這裡必須注意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農與僱農的要求，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務。第二，必須堅決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只要我們掌握了這兩條基本原則，我們的土地改革任務就一定能够勝利地完成。舊式富農按照平分原則所多餘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財產之所以應當拿出來分配，是因爲中國的富農一般地帶着很重的封建與半封建剝削的性質，富農大都兼收地租及放高利貸，其僱傭勞動的條件亦是半封建的。還因爲他們所佔的土地數量很大質量很好，如不平分則不能滿足貧僱農的要求。但是按照土地法大綱的規定，對待富農與對待地主一般地應當有所區別。土地改革中，中農表現贊成平分，這是因爲平分並不損害中農。在平分時，中農中一部分土地不變動，一部分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農有少數多餘的土地，他們也願意拿出來平分，這是因爲在平分後土地稅的負擔他們也減輕了。雖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時，仍須注意中農的意見，如果中農不同意，則應向中農讓步。在沒收分配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時應當注意某些中農的需要。在劃分階級成份時，必須注意不要把本來是中農成份

的人，錯誤地將他們劃到富農圈子裡去。在農會委員會中，在政府中，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工作。在土地稅及支援戰爭的負擔上，採取公平合理的原則。這些，就是我黨在執行鞏固地聯合中農這一戰略任務時所必須採取的具體政策。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
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够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條件。

(五)

爲了堅決地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鞏固人民解放軍的後方，必須整編黨的隊伍。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這種成效，主要的是在於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的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在這點上我們黨是比抗日以前的幾個歷史時期，大進一步了。但是，在黨的地方組織方面，特別是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方面所存在的成份不純與作風不純的問題，則沒有獲得解決。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時間內，我們黨的組織，由幾萬黨員，發展到了二百七十萬黨員，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這使我們的黨成了一個空前強大的黨。這使我們有可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並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領導了一萬萬以上人口的解放區與二百萬人民解放軍。但是缺點也就跟着來了。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及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中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與民衆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群衆，使土地改革不能徹底。這種嚴重情況，就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整編黨的隊伍的任務。這個任務如果不解決，我們在農村中就不能前進。黨的全國土地會議徹底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並規定了適當的步驟與方法。這些步驟與方法，現在正和平分土地一

道在各地堅決實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黨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澈底揭發各地組織內的離開黨的路線的錯誤思想與嚴重現象。全黨同志必須明白，解決這個黨內不純的問題，整編黨的隊伍，使黨能够和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完全站在一個方向，並領導他們前進，是解決土地問題與支援長期戰爭的一個決定性的環節。

(六)

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爲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鉅大資本，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及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官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被這些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們

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繫，或者聯繫較少，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到達的地方，對於這些階級，必須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散佈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當着他們的反動傾向尚能影響群眾時，我們應當向着接受他們影響的群眾進行揭露工作，打擊他們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使群眾從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但是，政治上的打擊與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如果混同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裡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指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業資本家。此外還有不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廣大的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對於這些小工商業者，不待說是應當堅決保護的。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手裡有着從官僚資產階級接收過來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鉅大的國家資本，又有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雖則在一個頗長時間內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但是在將來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在這些條件下，這種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其存在及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對於土地革命後農村中必然發生的新的富農經濟，也是如此。對於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份採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爲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所謂勞動者福利爲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種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群衆的利益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中國土地法大綱上有一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裡所說的工商業者，就是指的一切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及一切小的與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總起來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一）國家經濟，這是領導的成份；（二）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三）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及小的與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的追隨着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七）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其中說：『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從表面上看來，現在時期，比較抗日時期，我們的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似乎是縮小了。但在實際上，只是在現在時期，只是在蔣介石出賣民族利益給美國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之後，只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罪惡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之後，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才是真正的擴大了。在抗日時期，蔣介石及國民黨在中國人民中還沒有完全喪失威信，他們還有許多欺騙作用。現在不同了，他們的一切欺騙都被他們自己的行爲所揭穿，他們已經沒有什麼群衆，

他們已經完全孤立了。和國民黨相反，中國共產黨不但在解放區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在國民黨統治區，在國民黨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如果說，在一九四六年，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還有一部分人懷着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想法，那麼，在現在，這種想法已經破產了。由於我黨採取了澈底的土地政策，使我黨獲得了比較抗日時期廣大得多的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的壓迫及我黨堅決保護群眾利益的正確方針，我黨獲得了蔣介石統治區域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廣大群眾的同情。這些群眾，因為挨餓，因為政治上受壓迫，因為蔣介石的反人民的內戰奪取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們就不斷的掀起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鬭爭，他們的基本口號是反飢餓，反壓迫，反內戰及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而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時期，乃至日本投降後一個時期，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因此我們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統一戰線，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廣大，也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鞏固。這件事，不但與我們的土地政策及城市政策相聯繫，而且與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與蔣介石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中國革命已經進入新的高潮時期這一總的政治形勢，密切的聯繫着。現在人們看到了蔣介石統治的滅亡已經不可避免，因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身上，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達到高潮的時期，我黨領導機關的投降主義分子，自願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反對了和這種投降主義思想相類似的思想，即是對於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讓

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鬭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與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我黨對於這樣一種軟弱無能的腐朽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思想，進行了堅決的鬭爭，堅決地執行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治路線，堅決地擴大了解放區與人民解放軍；這樣，就不但保證了我黨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時期能够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且保證了我黨在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戰爭的時候，能够順利地不受損失地轉變到用人民革命戰爭反對蔣介石反革命戰爭的軌道上，並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些歷史教訓，全黨同志都要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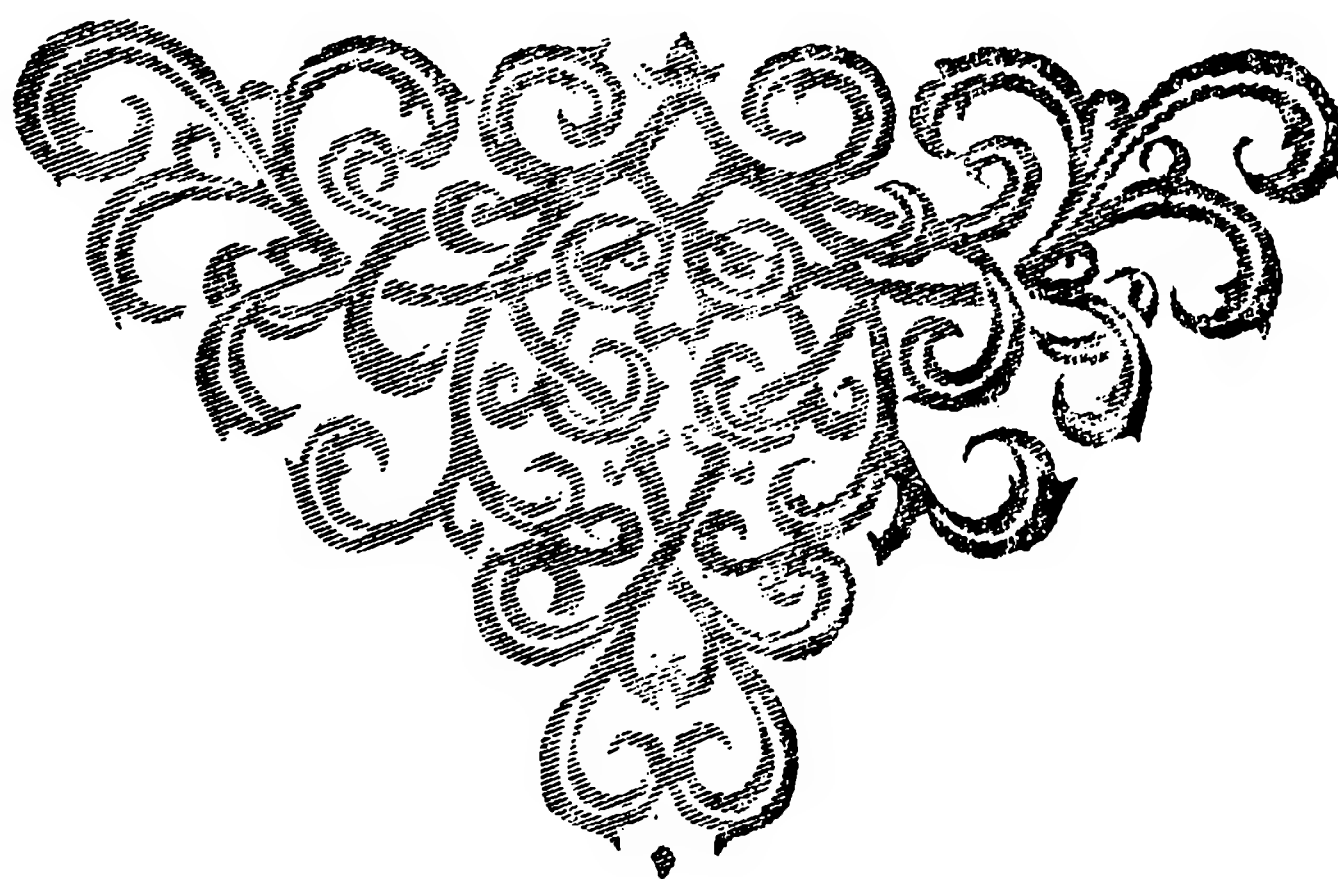
(八)

蔣介石反動集團在一九四六年發動全國規模的反人民的國內戰爭的時候，他們之所以敢於冒險，不但依靠他們自己的優勢的軍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們認為是異常強大的、舉世無敵的、手裡拿着原子彈的美國帝國主義，一方面，能够像流水一樣地供給他們以軍事上與財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的設想所謂『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這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依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全世界各國反動勢力的共同特點。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予世界資本主義的打擊的嚴重性，各國反動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與喪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強大，使得各國反動派除了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就感到毫無出路。但是，在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美國帝國主義，是否真如蔣介石及各國反動派所設想的那麼強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樣的從美國接濟蔣介石及各國反動派呢？並不如此。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

增強起來的經濟力量，遇着了不穩定的日趨縮小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這種市場的進一步縮小，就要引起經濟危機的爆發。美國的戰爭景氣，僅僅是一時的現象。它的強大，只是表面的與暫時的。危機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脅美國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就是坐在這座火山上。這種情況，迫使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劃，像野獸一樣，向歐、亞兩洲及其他地方亂竄，集合各國的反動勢力，那些被人民唾棄的渣滓，組成帝國主義及反民主的陣營，反對以蘇聯爲首的一切民主勢力，準備戰爭，企圖在將來，在遙遠的時間內，有一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敗民主力量。這是一個狂妄的計劃。全世界民主勢力必須打敗這個計劃，也完全能够打敗它。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優勢是在我們方面，不是在敵人方面。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業已形成。沒有危機的、向上發展的、受到全世界廣大人民群眾愛護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的力量，現在就已經超過了被危機嚴重威脅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廣大人民群眾反對的帝國主義的美國。歐洲各新民主國家，正在鞏固其內部，並互相團結起來。以法意爲首的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力量，正在發展。美國內部，存在着日趨強大的人民民主勢力。拉丁美洲的人民，並不是順從美國帝國主義的奴隸。整個亞洲，興起了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切力量，正在團結起來，並正在向前發展。歐洲九個國家的共產黨，業已組成了情報局，發表了號召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奴役計劃的檄文。這篇檄文，振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們的鬥爭方向，鞏固了他們的勝利信心。全世界反動派，在這篇檄文面前驚慌失措。東方各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也應當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及各國內部反動派的壓迫，以東方十萬萬以上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爲奮鬥的目標。我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我們應當在自己內部肅清一切軟弱無能的思想。一切過高估計敵人力量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和全世界民主力

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之不能發生，推翻一切反動派的壓迫，奪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我們清醒地知道，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還會有種種障礙、種種困難，我們應當準備對付一切內外敵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與掙扎。但是，只要我們能够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礙與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

一 卷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 農村革命

一 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爲不少。許多農運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全中國無論何省都有；所以，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爲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

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的命運將強迫你迅速的選擇罷了。茲將我的考察和我的意見，逐段寫出，作為革命同志的參考。

二 組織起來

湖南農運，就湘中、湘南已發達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為第一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趙為公開時期。此時期農會會員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指揮的群眾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鬭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指揮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上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計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到了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指揮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三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是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裏放個屁也是靈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嚇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字上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農會

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的過日子，摒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裏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下的人，現在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四 糟得很與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譁。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及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罷，受了那斑滿城風雨的『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個打翻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

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

五 『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群人滾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所以唐孟藩先

生也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群眾，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去。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面與前一派不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

二 革命先鋒

一 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乃痞子運動，乃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

下，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運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爲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立足地位，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頭上了。他們用繩子綑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壠）。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二 革命先鋒或革命元勳

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與『好得很』是一例，『痞子』與『革命先鋒』又是一例。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主要工作，但這種革命大業，革命主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念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有錢餘，有穀剩的，叫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脚，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爲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

的回答：『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爲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担鋤頭，浩浩蕩蕩的出隊示威，富農心裏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都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的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

『把你們入另冊！』

『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

在這樣的形勢與威嚇之下，富農才慢慢的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爲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中農呢？（沒有餘錢剩米，也不欠賬，每年保得衣食住的，叫中農）中農的態度是游移的，他們想到革命與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爲這全決於天意；

『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莫性急啦！』中農這樣回答。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雖比富農略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種游移的態度。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只有一種人，就是貧農。從秘密時期起，一直到公開時期，都是他們在那裏奮鬥，組織也是他們在那裏組織，革命也是他們在那裏革命。只有他們與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的向土豪劣紳營壘打擊，一切破壞的工作都只有他們做得出。他們對着富農中農說：

『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爲什麼還遲疑？』

富農和中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

『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是農村中生活落伍或半落伍的，他們中間之一些，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本，完全失去生活根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或爲非作歹做盜賊的，都是『赤貧』，佔七十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佔七十分之五十。（貧農數目，他縣或沒有長沙這多，但相差當不大遠）。這個貧農大群衆，乃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特別是赤貧部份），因爲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協（即鄉協）的委員長、委員，

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協職員，赤貧階級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級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份子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與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無意中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燄。只要看拘捕了農協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口號，同時尤要注意不做出幫助土豪劣紳（雖然是無意的）打擊貧農階級的領袖。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但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匪患潛踪。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他『少數不良份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的罵『痞子』。對於這些『少數不良份子』，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他們的群眾宣傳，對他們本人訓練，去把農會的紀律辦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失貧農階級的信仰，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三 農民與農民協會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兩段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爲，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農民所做事很多，我們須得把他們所有行動過細檢查一遍，看他們所作所爲是否如外間所傳通通要不得。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統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指揮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一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之下

這是農民所做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那一隻『角暗裏』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起來了一大部份，尚有一小部份沒有起來，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起來的一小部份，大部份尚未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農民還全未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爲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數中約一百萬都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勢力大盛時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運正大發展，截至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只登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群眾至少滿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乃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爲前後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正在農協指揮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茲將去年十一月湖南各縣農會會員統計列下：

十五年十一月份各縣農協會員數量比較表

縣別	區協數	鄉協數	會 員 成 份									會員數量
			僱農	佃農	半自耕農	自耕農	手工業者	小學教師	小商人	婦女	其他	
湘鄉	四	四九八	一六、四〇〇	九一、五〇〇	四一、〇〇〇	一三、一〇〇	二八、〇〇〇	五四〇			一九〇、五〇〇	
湘陰		六七	一五、八五七	八七、九五〇	五二、六三五	一四、七九三	一二、五二四	一五一	六三四	五七	一七六、〇〇〇	
瀏陽	二	五六八									一三九、一九〇	
湘潭	一七	四五〇	三七、〇〇〇	五四、一〇〇	一一、四〇〇	八、四六〇	七、四〇〇	一、一〇〇			一三〇、四六〇	
衡陽	一三	二四四	二七、三五八	三七、七三五	七、五三二	五、六八八	六、一三五	二、二五六		一、五七九	八八、二三三	
長沙	二二	六四〇	一七、五五九	二五、九四八	九、一三二	五、三八一	四、九一五	一、四二五	一、四六三	六四三	六六、四五五	
安化	一五	二二〇									六二、三〇〇	
醴陵	一五	三三三	六、七四六	三五、四六〇	六、九二〇	三、九九八	三、六四三	二二〇	六〇二	一九五	五八、四七六	
寧鄉	一八	四〇〇	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八、四〇〇	六〇〇			五八、〇〇〇	
郴縣	一四	六九六	一九、七五五	二六、八九八	二、二二四	二、五五〇	五、七三一	一一八	一〇〇	一六	五七、二六二	
衡山	一三	二〇三	三、六三三	一六、九九三	二、九六五	二、一七四	三、三八				三〇、〇一六	
近郊區		一六九	九、五〇九	一〇、六四六	三、五六三	二、八九三	一、七九四	三三二	五八二	一五六	二九、四七五	

汝城	武岡	寶慶	常德	新寧	平江	永興	茶陵	臨醴	耒陽	宜章	華容	益陽	攸縣	臨武
六	八	七	三	九	一七	一六	四	六	九	一〇	六	七		六
四六	四〇	一三六	五九	二五	一六二	一〇七	二四	四九	一四九	一八五	四九	六七	二元	三三
四〇六	一、八〇〇	一、四三八	八九〇	一、七三三	一、〇三三	一、一〇〇	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一、一四五	一、四三八	二、〇〇〇	一、五八八		二、一八三
四、一九五	四、五〇〇	二、三六七	二、八〇〇	六、五三三	四、二九八	二、八〇〇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六、八六五	八、九三六	六、五九五	五、〇二七		一〇、一四三
二、九五七	九〇〇	一、四八一	二、〇八〇	八五八	一、七八一	四、〇一〇	二、五〇〇	二、四〇〇	二、六八四	一、六三七	二、四三三	六、五八六		四、一四六
一、二三八	九〇〇	一、七四四	三、五〇〇	三七五	一、六二二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八四四	一、二八三	一、八八七	一、五八六		二、三四一
四二	九〇〇	七七	三〇	一八四	一、〇三三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三四二	八〇二	五〇二	七八四		九三三
三八	九〇〇		六五	七四	二二四	三〇	六〇	六〇	六六	八七	一二六	三三		二五四
					八五							二六		
					四									
					四三									
八、八六五	九、〇〇〇	九、三七七	九、五四五	九、七四六	一〇、一五二	一〇、四五〇	一一、二六〇	一一、六六〇	一二、九四六	一四、一八三	一四、六五二	一五、六八〇	一八、四〇〇	二〇、〇〇〇

沅	桃	臨	慈	常	新	桂	資	郵	祕	桂	新	株	南	漢
江	源	湘	利	寧	田	東	興	縣	陽	陽	化	萍 路	縣	壽
三	七	七	二		八	七	五	一三	一五	四	六		六	
一九	三五	九五	四八	七八	四七	九五	七九	四八	七〇	五三		二	四九	六九
二四		六四	二六三	四八六	四五六	八一六	二、一四八	一、三三二		四四五	一、五二六	九九七	一、三八四	一、二二五
一、一七四		九九五	一、五五〇	二、三七八	二、九二七	一、一五六	一、一二三	一、九一七		二七四	三、二四六	三、一五二	四、〇六四	三、二七六
五二〇		八四七	六〇一	八二三	九五五	一、〇三三	八九一	六〇一		一、六七三	四九七	七三二	九〇七	一、〇四七
一、六二五		一、一九五	一、八〇六	五三六	四八八	一、五〇七	三四一	四九二		一、五五五	四三四	五三九	四〇六	一、三七八
二四三		四七	二三六	九六	二九九	九四	六九九	五四六		四〇二	四七二	六八七	六九	二三八
四六		三一	四〇	二	二五	六二	一二二	二二八		二四	二〇二	五〇	八九	三三
		一〇五				二〇四		三八二				二九七	四五	六一
		一五三		三四		二九七						一〇		七
		八一		一七八		二五							三六	
三、八三九	四、〇〇〇	四、〇七七	四、四九六	四、五四九	五、一五〇	五、一九三	五、三四	五、四六八	六、〇〇〇	六、二四三	六、三七七	六、四六四	七、〇〇〇	七、三六

芷	麻	零	城	甯	綏	瀘	道	潑	岳	永	安	嘉	澧	藍
江	陽	陵	步	遠	寧	溪	縣	浦	陽	明	鄉	禾	縣	山
		四	一	八	四	三	一三	二	七	五	六	三	四	四
四	九	一五	八	一三	一五	一七	三九	一一	四七	三一	一三	二七	一六	五一
	一三〇	二三	一三〇	八六	一二	一〇二	一三六	五四〇	一三六	五八	二八〇	二五九	五九七	七六五
一一八	三四八	一三三	一九五	四八〇	三三四	三五〇	五四〇	七七五	八三〇	五三	七六〇	五九八	一、〇三三	一、四九九
七六	三六	一六七	三七二	一〇五	三三二	五〇	二八二	三三十一	四一〇	一、一五〇	六八〇	五八八	三八九	六〇四
七三	一九	二五二	一〇二	一五九	二九七	二四〇	四〇三	二〇四	五五八	四〇	四四〇	八五〇	二四九	三八五
	四	八	七四	四二	一三	八二	五六	一〇八	六五	二二	一三〇	八九	二二五	四二
七	三	二八	一三	二〇	三四	一二	一八	七	二	二	一八	三二	六六	二二
	二二	二九	一四											
	二二													
	四八	五八												三五
二七四	六三〇	六九七	八八九	八九二	一一一一	一、三〇六	一、四三五	一、九六五	二、〇一〇	二、一八二	二、二九八	二、四五一	二、五四九	三、三五〇

總

計

四二六八七

一、三六七、七五

二 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即是在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爭鬭。這個爭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爭鬭，這個爭鬭不勝利，一切經濟爭鬭，如減租、減息、資本、土地……等等，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份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爭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與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爭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一）清算 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賬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無數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土豪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戰。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佈土豪劣紳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打下去。

（二）罰款 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行為，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

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三)捐款 向爲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資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爲輕。有些地主爲免禍計，自動的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四)小質問 有破壞農會言語行動而罪較輕的，則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語行動了事。

(五)大示威 統率大衆向與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家裏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穀，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還有率領一萬五千群衆向六個劣紳家裏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的。

(六)戴高帽子遊鄉 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着，前後簇擁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戰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最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但結果農民議決今日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爲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七)關進縣監獄 這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下，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裏關人與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八)驅逐 這是土豪劣紳之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便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運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

等跑到上海，次等跑到漢口，三等跑到長沙，四等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爲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雖已是第四等了，但耳目更多，發覺甚易。湘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會歸咎於農民驅逐濶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於鄉里之一斑。

（九）槍斃 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乃農民與各界民衆共同做的。如寧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乃農民與各界督促政府槍斃的。如湘潭之晏容秋，乃農民與各界強迫縣長直接槍斃的。寧鄉之劉昭，乃農民直接打死的。如醴陵之彭志蕃，益陽之周天爵、曹雲等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審判後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一個二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湘潭銀田寺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二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個，活埋四個。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花子開張』，這兩個叫花子便各自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白色農村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一二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三 經濟上打擊地主

（一）不准穀米出境、不准高抬穀價、不准囤穀居奇 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上爭鬭上一件大

事。在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穀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穀價，與囤穀居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果然穀米阻得水洩不通，穀價也大減了，囤積居奇的絕跡，此事曾引起地主富農商人以至政府的大不滿，但這是佔百分之七十的貧農廣大群眾所爲，在他們目前的利益上他們認爲應該如此，這件事的政治的經濟的解釋還在後面再說。

(二)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 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小弱時代，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一到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都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尙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下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宣傳，地主們亦都在問減租辦法，斷無反抗的可能了。至於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三)不准退佃 去年七八月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及至十月以後便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都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因自耕，退佃可以准許，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尙無一致解決辦法。

(四)減息 安化已普遍的減了息，其他縣亦都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賬的事，此是農村一大問題，詳細當待後段論列。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賬。舊賬不僅減息，連老本都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四 推翻鄉村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治——打倒都團

舊式的都團鄉政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所佔領，它管

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有獨立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徵收如畝捐等，有獨立的司法如自由逮捕監禁審問處罰等。這樣的鄉政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里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鼻子裏『哼』一聲，農民都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普遍的地主階級威風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都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的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五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武裝，中路較少，西路南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於此數。農運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過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份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份站在中立地位，但仍屬傾向於投降，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份則站在和農會對敵地位，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正在加以打擊，均可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爲『挨戶團常備隊』，而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乃建設農民武裝的一部份，在目前雖然

有一些還正在鬭爭中，但湘中湘南各縣是已經不成問題了，只有湘西還有些問題。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運各縣，梭鏢便迅速的普及。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爲『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乃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戰的一種新起的『東西』。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東西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他，以爲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六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在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佔的縣，無論什麼人去做知事，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麼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都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運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不敢捱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時，縣知事與土豪劣紳是勾結的。農民的權力漲至與地主權力平行時，縣知事取了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是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的。上頭所說『農民說話飛靈』，乃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 凡事取決於縣長與革命民衆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名之

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列席的人，縣長以外，爲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及縣學生聯合會、國民黨縣黨部的代表。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衆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是絲毫沒有問題的。現在的縣政府形式與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乃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新靠山，才開始巴結民衆團體，才變成上述的局面。

（二）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要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與『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兩件事，尤以後一件爲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認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民會裏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稟帖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放在那裏空虛着。

（三）警備隊警察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裏人怕城裏人，現在城裏人怕鄉裏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警察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七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

（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的陰間系統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爲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支配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神權、族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乃束縛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爲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治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着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營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沉潭』『活埋』等肉刑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的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着農運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佔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的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攤神）遊香。浚口伏波嶺廟內許多菩薩，因爲辦區黨部地址不够，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所以當地的道士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與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與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說：『莫造孽』！原來無論何地，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與婦女，青年與壯年農民都是不信的。農民協會是青年與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弱一點，因爲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性的方面也比

較的有自由，農村中三角及多角關係，在貧農階級幾乎是普遍的。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着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的搖動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制度，都隨着農民權力之昇漲而動搖。惟在已往以至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都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這種進攻，現在倒底還在『開始』，要完全的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鬭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鬭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鬭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與片面的貞操觀念之破壞，乃是政治鬭爭經濟鬭爭勝利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生硬的勉強的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呢，那必被土豪劣紳借爲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的口號專來破壞農運，湖南湘鄉、湖北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自己的雙手去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的代庖丟菩薩。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丟，祖宗牌子要農民自己打碎，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摧毀。

我在鄉裏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台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麼？』

『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裏農會工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

出的麼？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

『神明麼？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紳麼？那這「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千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會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的農民都笑起來，我料想在他們的一笑中間，神和菩薩都跑光了。

八 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一定不能罷。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去，復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出到他們的嘴巴。假如有一群孩子在那裏玩罷，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着另一個小孩子鼓眼瞪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葉開鑫，一會一個打敗了，一個跟了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固然街上的小孩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孫中山先生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中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的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樣的人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

劣紳！曉得三民主義麼？」

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警察欺負，現在農民可找了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警察打罵菜園農民時，菜園農民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警察沒得話說。湘潭一個區農民協會，爲了一件事與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

『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的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廣大的政治宣傳影響，及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三次大的群眾運動，在這些運動裏，有農會的地方普遍的舉行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所以效力很大。今後的注意，就是要在各種機會裏，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使它的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

九 農民諸禁

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嚴禁和限制起來。最禁的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 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担麻雀。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沒有。

賭 從前的『賭店』，現在自己在那裏大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 非常之禁得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遲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於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裏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桿『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諷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各縣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衝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爲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裏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 一種淫褻的小戲，許多地方都禁止演唱。

轎子 好多縣都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禁止坐轎子已成風，只有做農運的人可坐，否則呼打。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他們總想打，惟農會禁止他們。做農運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潤人省了錢，而轎工無事做要失業，豈不是害了你們自己！』農民們想清了，答曰：『不錯呀！』他們於是想出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 普遍禁止用穀米煮酒熬糖，所以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一文賺，只好不煮了。

豬 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爲牠吃去穀米。

鷄鴨 湘鄉禁喂鷄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鷄三個，福田鋪地方只准喂鷄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爲鴨比鷄更無用，牠不僅吃掉穀，而且搓死禾。

吃酒席 豐盛酒席普遍的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鷄魚豬。筍子、海帶、

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面；二都有鐵家灣討媳婦，用的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把蛋糕席攪得糜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 這是南方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一種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際的力量去禁止，城裏人總是要吃牛肉，故城裏人總是要殺牛。農會起來後，實際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裏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商。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縣城亦無人敢殺。一個農民他有頭牛從高地跌下來脫了脚成了廢牛，不敢殺，問過農會，得允許，才敢殺。株州商會冒失殺一頭牛，農民一天湧上街問罪，結果商會罰錢而外，加上放爆竹賠禮。

游民生活 如打春，讚土地，打蓮花鬧，醴陵議案禁止。各縣有議決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惡，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兩壇廟，素聚流民，誰也不服，農會起來後，都悄悄走了。同地湖堤團農會，捉了三個流氓挑上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多得很，如醴陵禁攤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頂——瑞籤。湘鄉的穀水地方水烟都禁了；二都禁放鞭炮與三眼鏡，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尊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是對於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着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

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的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受商人剝削非常厲害，不得不消極的自衛。這是奸商剝削的原故，並非農民有拒絕工業品，實行東方文化主義。農民的經濟自衛，有勢必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販賣，共同生產，並須政府與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便不必以阻穀為維持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唯一方法了。

一〇·清匪

從堯舜禹湯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那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黑夜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有些地方雖然還有些小偷，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那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踪。二是農民禁阻穀米，穀米價值極廉，去春每穀一担價六元的，去冬價只二元，貧農可以用較少的錢買較多的穀，民食問題不如從前之嚴重。三是會黨一概加入農民協會，在農民協會裏頭公開的逞英雄吐怨氣，於是『山堂香水』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够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禁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都同情於農會。他們的議論是：

『農民協會麼？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子好處！』對於禁牌賭、鴉片與禁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一一 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繁重負擔，質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於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却因農民運動之興起，土豪劣紳之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這也要算農民協會功績之一。

一二 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完全是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乃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未受文化的國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就是農民，農村裏剝削階級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却努力在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在學校讀書時，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是『愚民可惡』。民十四在鄉下住了半年，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極對。鄉村小學校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而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故農民寧歡迎私塾（所謂『漢學』），不歡迎學校。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却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一個鄉農民協會有夜學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夜學，以為這樣的學校才真正是他們

自己的。夜學經費的來源，就是提取地方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閒公閒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彼此不免發生衝突，結果總是各得若干，有些地方農民或者要完全得了。農運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自然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所學校在鄉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一三 合夥鋪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的確確是農民的需要。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的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曾爲鹽組織合作社的非常之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多不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運的同志，總是殷勤的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合作的名詞在農民太不通俗，或可以譯之爲合夥鋪。

一四 修道路塘壩

這也是農會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道路非常之壞，因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來，所以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

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却並非慈善事業，乃出於強迫，但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却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他乾旱，餓死佃農，他却只知收租，不知其他。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的發命令強迫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却很和氣的對地主說道：

『好！你們不修，你們出穀吧！斗穀一工！』地主爲斗穀一工割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皆農民在農會指揮之下做出來的，請讀者們數一數那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諸位先生之意，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爲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嶽峙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說喚起民衆，民衆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與葉公好龍有什麼兩樣？

附註：本文原版還沒有找到，這裏印的第三章是最近輯轉抄錄得來的，可能有錯誤之處，待將來找得原本時，再加校正。

興國調查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〇年九月，紅軍第一方面軍從打長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開吉安，進到袁水流域，興國送了許多農民來當紅軍，我趁此機會做了一個興國第十區即永豐區的調查。找了傅濟庭、李昌英、溫奉章、陳偵山、鍾得五、黃大春、陳北平、雷漢香八個人開調查會。調查的時間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開會的地點，是新喻縣之羅坊，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永豐區位於興國贛縣萬安三縣的交界，分爲四個鄉，舊淩源區爲第一鄉，洞江區爲第二鄉，山坑區爲第三鄉，江團區爲第四鄉，以第二鄉之永豐圩爲本區政治經濟中心。人口分佈：第一鄉三千，第二鄉八百，第三鄉三千，第四鄉二千，總共八千八百。這一區界在興、贛、萬之交，明白了這一區，贛萬二縣也就相差不了，整個贛南土地鬭爭的情況也都相差不了。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裏面想像的東西，和看了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着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這次調查，一般說來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

些。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其實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中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鬭爭中的表現，這是我在尋郎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這個調查的缺點，是沒有調查兒童和婦女狀況，沒有調查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沒有調查土地分配後農業生產的狀況，也沒有調查文化狀況。這些本來是要調查的，因為敵人對羅坊進攻了，紅軍決定誘敵深入的方針，我們的調查會只得結束。下面的材料是這樣得來的：由我提出調查的綱領，逐一發問並加討論，一切結論，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們八個同志的同意，然後寫下來的。有些並未做出結論，僅敘述了他們的答話。我們的調查會是活潑有趣的，每天開兩次甚至三次，有時開至很夜深，他們也並不覺得疲倦，應該深深感謝這些同志們。他們有幾個是共產黨員，但多數不是黨員。

一 八個家庭的觀察

一 傅濟庭

第十區第一鄉人，開小屠坊，沒有本錢。五個人吃飯。有二十三石穀田，要交出三石租，留二十石。五人每人要吃七石，共要卅五石，不足十五石，靠屠坊生意補足。每殺一個豬，能賺一元三角左右（現在沒有大豬殺了，每個豬只能賺五角左右）。五個人是：父親（八十歲），妻子（煮飯、養豬、弄柴火、洗補衣裳，不能耕田），兒子（五歲），女兒（一歲）和自己（三十九歲，耕田兼殺豬）。

除自己的田以外，又同人家租入五石穀田，每年要請一個月的零工幫忙作田，母親五年前死了，死的時候用了小洋一百多元，除兄弟出的以外，自己借了小洋五十元債，利上加利，今年已是百五十元了。二十三石穀田中有十七石是自己的，六石是『退脚田』，乃白鷺（贛縣屬，離十區一鄉十里）鍾姓的公田。六石每石押去小洋六元，共三十六元，另外每年交租三石（十分之五）。

去年三月革命失敗，跑往均村山裏，幫人修山，九月紅軍到興國，回家，靖衛狗鑽山走了，沒有分田。今年二月（陽曆三月），紅軍打贛州，二月分田，沒有分進來，但三石租不要出了，百五十元債不要還了。同時押金三十六元也沒有收回。二月起在村政府當了三個月土地科長，幫人家分田。四月起當赤衛隊中隊長，有梭鏢無槍，當了三個月，六月十五日，帶隊打興國縣的靖衛狗一次。六月起，赤衛隊改編為紅軍預備隊，當排長，一個多月，當連長。這時第一鄉編了二個連。八月打七坊，帶隊去打，打勝了。這次（陽曆十月）出發新喻當營長。脫離生產不得，肉賬又沒有收好還與別人，要回家去，不願當紅軍。

讀過六年書，勉強看得報清。

二 李昌英

十區一鄉彭屋洞人。

六個人，自己四十八歲，耕田。妻也四十八歲，心氣痛，只能煮飯，洗衫衣，供豬子。兒子二十歲，耕田，很笨不會算計。媳婦二十歲，每天弄柴燒，不能耕田。女兒十二歲，今年六月嫁出去了，嫁到四十里的吳娃。第二個兒子三歲，今年四月死了，現在只有四個人吃飯。

自己有三十石穀田，借老弟李昌芬田二十石穀，李昌芬因田不好不够開銷往泰和羅坑作田去了。李昌芬的二十石穀田水打得到，只能收十三石穀，要量九石租。李昌芬欠了千二百毛債，九石租，就代昌芬還了利。自己的三十石穀田，因是山田礮易崩壞，實際只能收十七石，連昌芬田的實收數四石，共二十一石，均冰穀（毛穀），七折成燥穀十五石，年好也只十七石罷了。六個人每年要吃四十石穀。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幫助，年收番薯三十石左右。喂一只豬，喂到十二月，賣給人家，買油鹽回來吃。平時不能吃肉，只有清明（四毛），蒔田（十五毛），端午（三毛），吃新（十毛），七月半（二三毛），中秋（二三毛），割禾（二十毛），重陽（二三毛），過年（三十毛）才買肉吃。吃新要買十毛錢肉，因為要請工種番薯。蒔田，割禾都要請工。一年要請二十個工。父子二人除做自己的事外，還要幫兄弟老二耕二十石穀田，每年要花費八十個工（每一石穀，好田要費三個人工，壞田要費四個人工），因為老二死了，剩下老二嫂，昌英的第二個兒子過繼與她。八十個工沒有工錢，除做自己的事並做老二嫂的事外，再無餘力幫別人做工了。

欠債一千二百毛，欠得義倉上的，每年還利穀七石半（借百六十毛量利穀一石，每石價二十四毛）。每年年終賣豬賣得二十多元，除拿六七元買鹽油外，均拿了折了利穀還與義倉。本村新義倉老義倉各有三十餘石穀，共有七十石穀。

今年三月分田，六個人每人分得七石穀，共四十二石穀，即把昌芬那塊田完全歸了昌英，昌芬欠的那筆賬由昌英還利的，也廢除了，義倉上千二百毛債也廢除了。四十二石穀是瘦田，只能收六成，二十五石穀左右，加上番薯，勉強够吃。

今年八月贛西南來公事，重新分過，抽肥補瘦。他家死了一子，嫁去一女，只有四個人了，每人分得六石一桶（四桶為一石）共得穀二十五石，他的壞田撥出一點給人家，人家的好田撥來一點與

他，這回分田分得勻淨。爲什麼三月每人分得七石，八月只分得六石一桶呢？因爲革命勝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農民這時候回來了十二個人，因爲泰和那邊還沒有革命，聽得興國革了命，有田分，都回來，所以本村每個人的田分少了些。

彭屋洞只有易、李、丘、鄭四姓，共一百三十多人，沒有村政府。

他在鄉政府沒有辦什麼事，他的兒子李全坡在鄉政府經管彭屋洞方面的軍器（梭鏢、鳥槍、刀等）。

打興國，打良口，均他兒子出發，打七坊，打南昌輪到他出發。他願當紅軍，只是要請一個月假，歸去買回一個牛子，才好耕田。因爲他的一隻牛，今年六月二十七跌死了，前年二十三元買進來的，跌死了賣牛肉賣得了十元。六月費去十二元買進來一條牛，七月又跌死了，賣牛肉賣得了八塊錢（還不會收攏），須得再買一隻牛子才好耕田，所以要告一個月假回去一轉，再來當紅軍。

『叨紅軍的恩典』，過去七十塊錢一頭的牛，如今只要二十元買得到了。『叨紅軍的恩典』，百物都便宜了，油過去二十三元一担（一百斤），現在只要十元一担了。穀過去四元一石，現在一元一石（三個銅片一升米）。柴過去二十文一斤，現在八文一斤。肉過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現在三百二十文一斤。只有鹽、布等項大貴特貴，鹽過去三百二十文一斤，現在八百文一斤，布過去白棉布一百四十文一尺，現在三百二十文一尺。

三 溫奉章

十區四鄉（侯逕）人。侯逕有三百多人，有一個鄉政府。

四個人吃飯。

父親五十六歲，脚痛，一點事也不能做了。母親四十六歲，眼睛看不到了，供豬而外，不能做別事。自己二十二歲，耕田，今年三月起當少隊大隊長，七月起在鄉政府當財政委員，十月出發打南昌，代理紅軍後備隊連長。妻十六歲，煮飯，弄柴燒，看牛，不幫耕田。

自己有八石穀退脚田，父親押去多少錢不知道，每年還租二石半（燥穀）。本是八石水穀田，田係好田，能收八石燥穀，四個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少二十石，從地主租來一百二十石穀田，不押錢，要量租。一百二十石均水災田，實只能收九十石水穀（每年收一次），八折成爲七十二石燥穀，要量去五十五石租（租率百分之七十五），剩十七石，吃食不夠。六月至七月收禾，雖然收了禾，還了租去，還了去年的生穀去，隨即沒有食了，八月九月又要生穀。向富農生，生一年，一石還三籬。每年要生十多石穀。去年生的十二石穀，今年『叨紅軍的恩典』，不要還了。欠了六十元債，欠了大地主劉花讓的，每斗塊毫洋量一石穀利息，現在不還了。幸得能收四十石番薯，三石番薯抵一石穀，共可抵十三石穀。

今年三月，四個人共分了三十二石穀田，除自己的八石退脚田外，分進來了二十四石。分法，卽就原耕的一百二十八石（佃人百二十石，自己八石），劃出九十六石與別人，剩下三十二石。劃出去的盡量拿歹田，剩下的都是好田。八月重分，發見他分多了，又太好了，劃出去二石，剩下三十石，又把好田劃出一些，歹田劃些進來。『鄉政府分田很公道』。

過去耕百二十石穀田的時候，自己忙得要死，蒔田割禾種番薯三個時節還要請工，蒔田請六七工，割禾請三十多工，種番薯（早遲兩次）請三十多工，共要請七十多工，蒔田種番薯交伴（我帮你做你帮我做）十多工還不在內。現在只耕三十石穀田，不但不要請工了，也不要交伴了，自己也不如過

去那樣苦做了，比方過去苦三分，現在只苦一分，閑空時間很多，在鄉政府管財政，辦些公事。打興國，打良口，這回打南昌，他都出發。

讀過四年書，標語能認一半，能寫賬。

四 陳偵山

十區二鄉（指閣寺）人。

第二鄉共有八百人，鄉政府設在永豐圩上。

七個人吃飯，三個兄弟，各人一個老婆，老大一個女。老大二十九歲，陳偵山老二，二十四歲，老三十八歲。老大擺油鹽攤子，攤子擺在人家店門口，專賣零油零鹽，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失掉了，『搭便革命』。不要還債，攤子不能再擺，現在二十軍當兵。老二讀過八年書，十九歲以前在自家看牛，十九歲起學看『地』，看了五年『地』。在鄉政府當宣傳員。這次出發，當連政治委員。老三是做篾匠學徒，學了三年，現在二十軍當兵。老大的婦娘煮飯，弄柴火，種菜。老二的婦娘同做上項各事，現在鄉政府當婦女赤衛隊隊長。老三的婦娘才九歲。老大的女二歲。

自有二十石穀田，又租來十石（還租穀五石），老大主持。永豐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賣油鹽一次，圩畢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請八十個工幫做。

欠債一千三百毛，要利穀十石。每年耕田有穀三十石，還去租穀五石，利穀十石，只剩十五石，七個人除老三幫人做篾不在家外，六個人要吃四十二石，不足二十三石，靠了老大做油鹽生意老二看地賺點錢來添補。老三還在學徒期中，不能賺錢。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參加，老大當農會糧食科長，老二當宣傳。幾個婦娘子都贊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債主逼債，逼得她們過不得年，她們聽得抗租、抗捐、抗糧、抗債，心裏喜歡，故此贊成老大老二革命。老三是個老實人，人家說怎樣他就怎樣，這時他沒有參加革命。四月革命失敗，靖衛狗來，老大跑往均村幫人修山，老二跑到泰和的冠朝，在那裏看地，賺了七八十塊錢。去年十二月，紅軍又佔興國，老大老二回家，又幹革命。革命失敗時，被靖衛狗燒去六間房子。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石穀外，還分進來二十九石，共計四十九石，每人得七石。婦娘子看見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債也不要還了，心裏不勝歡喜，老二的婦娘子便高興的去鄉政府當婦女赤衛隊長。三月分田盡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勻，扯去一半好田，扯來一半歹田，還是每人七石。婦人仍是喜歡的，因為婦娘子自己在政府辦事，經常說別人應該好歹扯勻，所以在扯勻自己的田時，她也是贊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離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滿嫂三個女子，都沒有耕種能力，所以鄉政府派人為他家耕田。派鄉中勞力多的去耕，先耕陳家的，後耕自己的，耕得很好。派去耕田的人吃陳家的飯。七個人有四個人吃外邊的飯，這四個人的每人七石穀便餘了下來，拿了發賣，得了錢買油、買鹽、買布。

五 鍾得五

十區三鄉（山坑）人。

家裏有十一個人。自己二十八歲，讀過七年書，在白鷺（離山坑三十里）王姓雜貨店裏當先生

（管賬），年薪小洋六十元。連當學徒到當先生共計做了十三年，去年三月紅軍到白鷺，跟着回家，在家居住。母親五十七歲，老了，帶小孩子。哥哥老八，三十一歲，耕田。老八嫂三十二歲，煮飯、弄柴火、洗衣服，不耕田。兩個姪兒，一個九歲，讀書。一個三歲。妻二十八歲，煮飯、弄柴火、供豬子。兩個兒子，一個七歲，讀書。一個兩歲。大姪討了一個老婆，九歲，帶小孩子。一個侄女，兩歲。以上共十一個人，只有老八能耕田，他自己能做生意，其餘均缺乏生產能力。

自己只有三十石穀田，租別人三十六石，共六十六石。租的田還六成租，還去二十一石六斗，折錢與他，留下穀子。每年能收四十多石番薯。十一個人要吃七十七石，養雞、供豬、煮酒、請工、待人客等項，每年要吃二十石左右，共需一百石左右，收支相抵，不足二十多石。全家每年鹽錢布錢工錢糴穀錢及一切應酬用項共要百五六十元，內中鹽錢要二十多元至三十元，布錢要三十多元，糴穀二十五六石每石三元左右共七十多元，此外要應酬費二十多元。這一百五六十元的來源，從白鷺商店付回薪水六十元，紅利二十元，種雜糧如豆子等項出十多元，供豬除自己吃肉之外能餘十多元，賣松樹柴火每年出十多元，共約百二十元，每年須欠債三四十元。他家前共欠債二百多元。

從前有四十六石穀田，十年前賣去七石（價每石十元），前年又賣去九石（每石十二元），故只剩三十石了。老八耕田，力還不够，每年要請零工一百二十多個，每工二百四十文，每年要出工錢二十八串。

今年二月（陽曆三月）革命成功，每人分得五石半穀田，十一個人共得六十石零一籬（內自己的三十石）。因為本鄉這次分田好歹沒有扯勻，現在又要重新分過，目前還未分好。本鄉人多田少，每人分五石半，不够食。他家過去每年須食穀百石左右，雜用百五六十元，分田結果得穀六十石零一籬，比革命前之六十六石少六石。但二十一石租穀不要還了（折錢六十多元），二百多元債的利息四

十元（二分息）也不要還了，則是好處。不好處是白鷺王姓的店倒，他無事做，每年少了八十元（薪水六十元，紅利二十元）的收入。兩樣相比，革命前比革命後差不多。但革命後，雜用減少了許多。蒸酒，爲了請工，雖然還要，但可減少一些。布因省穿，也減少了。吃穀不够，雖還要糴入，但穀價大減，七毛錢可以買一石。應酬亦相當減少了。所以從前要百五六十元雜費，現在大概減少一半，八十元一年就够了（興國的錢均以毫洋計）。

三月分田，『以原耕爲標準抽多補少』。以村爲單位，本村人多田少，故只做到原耕不動，並沒有抽多補少。目前再分，從別村抽些過來，大概每人能得七石穀，若能這樣，食穀就差不多了。

五月，他在鄉政府土地科負分配山林的責任（四個分山委員之一），把第三鄉的山林都分配了，法由鄉代表會議決，他便去各村分別開群眾大會，實行在各村分山。分山多的分田少，分田多的分山少。分田不分山的有，分山不分田的沒有，分山的總是分了一點田。五月當赤衛隊後備隊中隊長。六月當獨立團的宣傳員。此次出發新喻，又是當宣傳員。第七第八次攻吉安他都去了。

願到紅軍當宣傳員。

六 黃大春

十區一鄉茶干村人。

本村有三百九十多人。

四個人吃飯。自己三十六歲，同人家做爆竹。母親五十四歲，病了九年，做不得事。妻三十一歲，砍柴火挑到白鷺市上去賣（茶干去白鷺十里），賣了錢來買米煮，又要煮飯，又要種菜，又要洗

衣服，非常之苦。老弟三十二歲，做篾匠，去年三月去二團當紅軍，一去無音信。

家有五石穀田，自己耕了，沒有租別人的田。

他幫人家做爆竹，由人家請做零工，一毛四分錢一工，如天天做每月能得四元。老二做篾，一毛子一工，食黃煙，做衣服，沒有什麼錢多餘。

革命之後，爆竹沒有做了，老二也不做篾，當兵去了。

從前靠做爆竹，靠老婆砍柴賣，年頭做到年尾，弄不得飽飯吃。分了田，吃便够了。欠了陳姓富農的債四十元，把五石穀田作抵押。這個富農非常之惡，革命中被群眾打死了。去年三月組織秘密農會，茶干村農會，有五六十人，他在農會當交通。去年十一月當赤衛隊隊長，今年四月當土地幹事，六月當紅軍預備隊排長，八月當預備隊連長，這回帶隊下新喻。

三月分田，每人只有六石半，都是歹的。又因為原耕下了種，原耕得去六成，新戶只得四成。七月（陽曆八月）重新分配，每人分得七石，又分來了一半好田。

他是爆竹工人，失了業，老二是篾工，改當紅軍，故都分了田。別的在業工人，也都分了田，且與農民同數量，這是因為工人雖在業，但業不安定，常怕失業，故要求分田。又因工人分田自己不能耕，要請人耕，故須與他人同數量。農民開頭只答應工人分半田，工人說分半田就要加工價，農民才說『我們准許分全田，你們不要加工價』。

工人分了田，沒有牛，要從親房朋友借牛，沒有犁耙，也要借，所以感覺困難。未曾讀過書，只會寫賬。

七 陳北平

十區三鄉（山坑）人。

十一個人。三兄弟，每人一個老婆，兩個姪子，一父一母，一個祖母。老大三十八歲，做泥水匠。老二三十一歲，耕田。老三卽陳北平，二十四歲，讀過六年半書，在高小讀過一年半，在鄉教小學五年。父親六十五歲，母親六十二歲。三兄弟的老婆在家煮飯、砍柴、種菜、洗衣服，不耕田。姪子一個兩歲，一個三歲。祖母九十一歲。

自有三十二石穀田，租人家二十石，還十石租。十一個人有兩個吃別人的，小的老的吃得少一些，因此每年六十石穀就够食，收入只有四十二石，不足約二十石。此外還有雜用，蒸酒啊、匠工啊、油鹽布疋雜貨啊、婚喪季節送禮啊等等，每年要用百二十元左右。靠了老大能入工資五十元左右，老三教書薪水五十元左右，山裏棕、柴、竹、木等項出得二十元左右，每年牛婆生一牛子，能出二十元左右，共約百四十元左右，以供雜用及補食穀之不够。

欠債八十元毫洋。

去年祖母、母親、大嫂、兩個姪兒都死了。剩下三兄弟，老二、老三各一老婆，加上老大的岳母，現在六個人吃飯。

三月分田照九個人分（那時有新生兒子一人，新生姪子一人，新討大嫂一人，但今年下半年便都死了），每人五石半，共五十石零五斗，自己有三十二石，分進來十八石五斗，都是歹田，目前重分，業已調查清楚，還不會實行分配。

地主富農倒，不造房子了，老大失業，改了耕田。新辦鄉村人民學校，老三還有書教，照政府工作人一樣，每天一毛子伙食費，沒有薪水。老三（陳北平）三月在常備隊當政治委員，四月在鄉政府當宣傳員，五月在鄉政府當文化科長，六月在鄉政府當秘書，閏六月回家教書，九月下新喻當預備軍第二連政治委員。

打王塘，打浪村，老大老二都去了。

八 雷漢香

十區第三鄉（山坑）人。

五個人吃飯，三兄弟，一個母親，一個大嫂。老大四十三歲，一分幫人做僱農，二分自己耕田。老二三十九歲，二分僱農，一分自耕。雷漢香是老三，二十五歲，泥水匠學徒二年，回家做僱農。母親七十歲。大嫂三十四歲，煮飯，弄柴火，種菜。

自有七石半穀田，租公堂四十四石穀田。公堂田還租六成。欠債千二百毛，二分息，借了同鄉富農雷祖榮的。

老大老二替別人做零工。在家做事的時候，老大三分之二，老二不過三分之一，老三差不多全部時間替別人做零工。老大當家。

自己的七石半穀田，年成不好，只能收六石。公堂的四十四石只能收七成，計三十石，收成雖減，租不能減，仍要交四十四石的六成租，計二十六石。作一場田，只剩四石穀吃。連同自業的六石，共不過十石，食穀差得很多，又要還二百四十毛利錢，使得一家困苦不堪。

補足生活之法，第一是靠老大老二尤其是老三幫人做工賺點錢回家。老三每年幫人做二百二十工左右，老大每年幫人做三四十工，老二幫人做百七八十工，合計幫人做四百二三十工。這些工中，平時每工二百文，割禾摘木子每工五百文，共計每年工錢約四十元左右。第二靠種番薯，每年出得四十多石，抵得十多石穀。第三靠『番稻』，即晚禾，每年出得十多石穀，這是不要還租的。種番稻就不能種雜糧。第四靠供豬子，每年供得兩個，每個可出二十多元，共四十多元，除掉自己吃一半，可剩二十多元。

照上面的計算，共可收入三十多石穀子，六十多塊現錢。支出方面，只有三個人的吃食（三兄弟約有兩個吃人家的飯，只有一個吃自家的飯，加上兩個女子，共三人），和二十四元的利息，相抵有餘，用作油鹽雜費，應該不至很苦。為什麼他家還是很苦呢（簡直沒有什麼好東西吃，長日吃番薯絲拌飯，穿也沒有好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們三兄弟都好賭，特別是老二總是賭輸。第二個原因是老大嫂好吃懶做，在家開得天翻地覆，弄得三兄弟都懶得做工，豬子也被她打死了。第三，一連死了兩條牛，一個吃硝水吃死，一個跌死，家運不濟，大背其時。有這三個原因，所以他家總是苦。

三月分田，每人分得六石半穀，共三十二石半。即從原耕五十一石半中（自己七石半，租人十四石），抽出十九石給別人，其餘歸自己。不過抽出去的十九石，都是山邊瘠瘦每年只能出一道的歹田，留下來的都是每年可出兩道的好田。

要重新分配，調查好了，尙未實行。

三月分田抽出去的十九石，因為這田彼時即歸新戶耕種，故十九石穀，都歸新戶得。別家分田抽出部份的收穫，原耕六成，新戶四成，乃是本屆田禾新戶完全不理，施肥下力仍託原耕，所以收穫時新戶願以六成歸之原耕，原耕願以四成歸之新戶，好像原耕對新戶完租四成一樣。

老大在本鄉赤衛隊當兵，打七坊打王塘都出發過。老二當赤衛隊班長。老三開頭在赤衛隊當兵，後當排長，這回出發新喻當連長。

二 本區舊有土地關係

一 田地分配

照興國第十區，即永豐圩一帶的土地情形來說，舊有田地的分配如下：

地主	百分之四十
公堂	百分之十（爲地主富農所共有）
富農	百分之三十
中農	百分之十五
貧農	百分之五

二 人口成份

興國第十區人口成份大略如下：

地主	百分之一
富農	百分之五
中農	百分之二十
貧農	百分之六十
僱農	百分之一
手工工人	百分之七
小商人	百分之三
游民	百分之二

依上所述，真正的剝削階級（地主富農），人數不過百分之六，他們的土地却佔百分之八十，其中富農佔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許多在富農掌握中，若不平分富農的土地，多數人民土地不足的問題便難解決。中農人口佔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佔百分之十五，平分土地中農是需要的，因為他們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對於他們是增加不是減少土地，那些說平分要損及中農是不對的。

此處人口成份的分析，是以家為單位，不是以個人為單位。僱農百分之一是指完全的僱農，那些貧農兼僱農的雖為數不少，不在此例。小商人百分之三是指完全的小商，那些半農半商的不在此例。游民百分之二是指完全失業靠賭錢做土匪等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業的不在此例。

為什麼地主人口只佔百分之一？因為本區佔有土地的地主，多住在鄰縣之白鷺區、田村區及本縣之縣城的原故。若把他們算進來，大概地主階級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或三。

三 剝削狀況

第一種 地租剝削

一鄉（淩源里）二鄉（永豐圩）四鄉（侯逕）地租均是百分之五十，三鄉（山坑）大部份百分之六十，小部份百分之五十。因爲一、二、四鄉有水災，又有旱災，收成常不好，故租較低；第三鄉沒有水旱災，故租較高。

爲什麼一、二、四鄉有水旱災，第三鄉沒有水旱災呢？因爲一、二、四鄉是塍田，那一帶的山都是走沙山，沒有樹木，山中沙子被水沖入河中，河高於田，一年高過一年，河堤一決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災。第三鄉多是山田，田高於河，雖田畝很小，却雨不怕水，晴不怕旱。

走沙山是沒有法子種樹的。

本區的田年種一次，種番稻的不足百分之五。少數番稻及雜糧不收租。

第二種 高利剝削

（二）錢利：分爲兩個階段。民十六以前要三分利（百元年利三十元）。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借到的，有田有山有屋作抵才可借到。民十六後『世界起變化』，把錢出借的就很少了。

在本區居住的純粹地主極少，地主多住在贛縣的白鷺、田村一帶，不過土地在本區。富農是多的。因此本區貧農向地主借錢的完全沒有，向富農借錢的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則向公堂借。中

農不要借錢，僱農不能借錢，要借錢而又有抵押品能借錢的，只有貧農；另一方面把錢出借的主要是富農，因此土地革命中貧農與富農的決鬥，無疑要劇烈的。富農也有時向地主借錢，幾百元千把元一借，利較輕，一分五到一分八。富農這樣成羣的借了來，再幾十元一注的借與農民，收得抵押品，搾取高利息。這樣，富農就做了地主剝削貧農的中間人，因此富農和地主的利益是分不開的。

公堂，本區多數把持在劣紳手裡。這種劣紳，大半家裡有些田，但不够食，所以不是富農也不是地主，他是劣紳。因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從中剝削。一鄉、二鄉及四鄉的公堂，劣紳管的佔十分之六，富農管的佔十分之四。第三鄉，民國以前，劣紳管的最多，因為那時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國以後，富農管的最多，與一、二、四鄉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農管，十分之四是劣紳管。貧農從公堂借錢時，利比從富農借稍輕，富農利二分四，公堂利二分。公堂借錢一樣要抵押。公堂索債比富農還厲害，期滿利錢不清，牽牛趕豬，下田割禾，都做得出。借富農的，到期利錢不清，同他講明，利上加利，下年一同還他，或由他將抵押的田出租與別人耕種，收得租子抵償利息。富農目的只在圖利，所以期限有時還能通融。

錢利中有一種最挖苦的，就是月子利，這是流氓借了去做賭博用的，一月為期，一元還二元，但不常有。

(二) 穀利：借穀叫做『生穀』，富農的，利很重，公堂義倉的，利較輕。富農借穀與貧農，不論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借的，或是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借的，七月割禾還與他時，都要百分之五十的利，就是一石穀還三籬。十一月借，七月還，沒有一年；一月二月借，七月還，只有半年；三月借，七月還，僅四個月，為什麼要這樣重的利息（比錢利重得百分之三十）呢？因為冬春兩季，穀價大貴，較之秋天貴一倍，秋天每石一元半的，冬春常是三元，因此，富農要將穀價所失，加在利息上面。他還

只願意賣穀，不願借穀，因為利息即使高到百分之五十，還不如冬春把穀出賣來得有利。貧農向富農借穀，要有好大的人情，才辦得到。富農一百石穀，賣的九十多石，借的不上十石。茶干（第一鄉）的富農陳鳳鳴，貧農黃大春同他借穀（民九年四月），他不肯借，同他借錢轉而同他買穀，他就肯借。貧農借錢，由富農借出的佔百分之八十，公堂義倉借出的佔百分之二十，地主直接借出的沒有。貧農借穀，由公堂義倉借出的佔百分之九十，由富農借出的佔百分之十。由此看來，富農是完全的剝削主義，公堂義倉，確實還有些周濟之意。

公堂亦大部是剝削主義，公堂穀子第一鄉出賣的百分之八十，出借的百分之二十。第二、三、四鄉都是出賣，幾乎沒有出借的。惟獨義倉的穀子，是全部出借，沒有出賣的。本區義倉，各鄉都有。第一鄉（人口三千）有四個義倉，八百石穀。第二鄉（人口八百）有五個義倉，五百石穀。第三鄉（人口三千）有六個義倉，四百石穀。這三個鄉共有二十個義倉，一千七百石穀，幾乎每村有一個義倉。只有第四鄉（人口二千）僅一個義倉，一百石穀。本區貧民度荒月，全靠義倉借點穀食，靠富農借穀是無望的。義倉借穀利息百分之三十，雖較富農借穀為輕，但要抵押是很嚴格的，鐵器（犁耙）、錫器、銀器、棉被、帳子、衣服等，均可作抵，總要一樣。只有第一鄉之洋坊村義倉借穀，不要抵押品，只要找鄰戶寫張『頂票』，担保本利照還。義倉的穀是由地主、富農、中農捐集的，他們捐集穀子起個義倉，荒時暴月接濟貧民，是和緩貧民暴動的一個改良欺騙政策，不明白的却在那裡頌他們的恩德。義倉的穀，除地主、富農、中農不能借也不要借外，貧農、僱農、工人、游民，都可以借，只要有抵押，或能寫『頂票』。

『生穀』厲害，『檢新穀錢』更厲害。二、三、四、五等月，貧農沒飯吃了，向富農檢新穀錢，當時穀價三元一石的，一元五毛一石檢了新穀錢，七、八月間交穀，這時穀價總是二元左右。拿這時

候市價說，並不算怎樣厲害，問題就在貧農把穀子廉價交出去了，明年春夏之間，望着富農拿了賣貴價，三元一石，富農一元五買進來，三元賣出去，利息百分之百，比之利息百分之五十的『生穀』，不更厲害麼？

(三) 豬利：本區沒有。

(四) 牛利：各鄉都有，但不多。富農把牛婆借給貧農，貧農喂養此牛拿了耕田，每年出利穀一石半（三籬）給富農。生了牛子，貧農富農各佔一半。一、二、四鄉富農十家中有三家把牛出借，叫做『稅牛』，第三鄉十家富農中只有一家有牛出稅。牛也會病死、跌死，所以這種牛利是不見得很穩當的，富農不很努力放這種利。又怕貧農喂養不好，把牛弄瘦，又怕貧農把牛勞動過度，又怕盜賊偷去，所以貧農向富農稅牛，要是很有人情的才能稅到手。

(五) 油利：貧農有油山的，五、六月間，無米煮了，向富農借錢買穀吃飯，把新油出賣，五、六月間油價每担（百斤）二十五元的，作十二元出賣，少的只作十元，九月交油，不得短少。即是六月同富農借十二元錢，九月要還一担油與他。九月油價普通總是十七八元一担，高的要賣二十元，低的也有十五元。假如六月借十二元，九月油價是十八元，其中六元即算四個月的利錢，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利率。假如九月油價是二十元，利息就是八元，百分之七十的利率。富農九月收了油，藏起來，等到明年四月至八月油漲的時候，運下江口，運下贛州府，起碼賣得二十五、六元一担，價頂高時賣四十元一担的也有。前年六月，第一鄉農民到白鷺買油，一元錢（十毛）只買得一斤十二兩，這雖是買零油，但若集合起來，要五十七元才能買一担油。去年六月一元錢買二斤半，也是四十元一担。若照此利計算，貧農今年六月從富農得十二元賣去一担新油，到第二年六月就要損失二十八元之多，簡直是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利。這種油利不但重，而且很穩當，九月起到十二月都是貧農打油時候，富農不

怕貧農『走空』的，就放心讓貧農把油送到家裡來，怕貧農『走空』的，自己到貧農家裡守着打油，親自取回。

油利就是這一種形式，從貧農方面說來，叫做『檢新油錢』，從富農方面說來，叫做『放新油錢』。富農把油出借的事（不是放新油錢）非常之少，但也間或有。今年十二月貧農向富農借一石油，賣得二十元，明年油價貴時，還油一石，或照市價折成錢還去，不要利息，這等於貧農爲富農收藏這一石油，所以不算惡利，要與富農有人情的，明年靠得住有還，才能借到手。貧農借這種油，或爲死了父母，或爲討妻子，或爲其他緊急用途，向有知交的富農借錢，富農說我沒有錢，只有油（或者說只有穀），就是這樣借了油來，發賣得錢，以濟急用。明年油貴時節，借主要油，債主就從市上買了油去還他。借主要錢，就照當時市價折了錢去還他。這種借油法，叫做『扯油』。

不論前一種『檢新油錢』，或後一種『扯油』，都是不多有的，只在有油山的地方才有。在有油山的地方，如興國第十一區（均村一帶），那一帶的貧農耕油山的多（貧農自有油山很少，多是向地主富農租的）。百家耕油山的貧農，檢新油錢的佔二十家。均村一帶的富農，對油利剝削得很厲害。在那一帶地方，貧農向富農『扯油』的，百家之中，不過一二家。

（六）當利：分大當小押兩種。大當，本區沒有，田村、白鷺才有，月利五分，當一百文，月利五文，當一千文，月利五十，當一元，月利五分，都拿小洋計算，十個月爲期，到期不贖，延一個月死當。月利百分之五，即年利百分之六十，這種剝削非常厲害。貧農、僱農、工人、游民四種人中，進當舖的很多。這四種人，一百家中，有六十家進當舖。抵押品：鐵器、錫器、銀器、蚊帳、被窩、衣服，都要。本區跑到白鷺去當東西的，非常之多，佔貧苦群眾百分之六十。白鷺開當舖的是興國縣城人，十一個月死當，當舖老闆把抵押品運到興國城去拍賣。抵押品值三元，當得一元五，但當舖老

開的目的是利息，不在拍賣抵押品。

小押本區各鄉都有，富農幹的，不開門面，也不經常做，只是貧苦工農苦得很時，拿了東西跑到富農家裡，求押點錢，間或有之。貧苦工農一百家中，有十家當小押的。為什麼當大當的多，當小押的少呢？因為這種幹法名譽太壞，並且本鄉本地人太熟了，抵押品雖拿了來，貧民總想求情多當幾文，富農也不便苦爭，因此富農多不十分肯幹這件事。小押的利息與大當同，但日子很短，由富農講，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期不贖，作為死當。

這次到調查會的八個人中，陳北平、鍾得五、傅濟庭、陳偵山四家不曾當過東西，溫奉章、雷漢香、黃大春、李昌英四家都當過。溫奉章每年要當一次，四五月間當了糴米煮，去年還當過一次。去年四月，把鐵耙一架，酒壺兩把，當到白鷺恒興當舖，當了小洋兩元四角，拿了回來糴穀子一石。十二月贖了回來。雷漢香家也是年年要當，老大老二當的不說，單說老三雷漢香，去年正月當過一回，單長褂一件當一元，鋤頭兩把當六毛，未曾贖回。六月又當過一回，一把泥刀，當三毛，一個『洋頭子』，當五毛（都是老三做泥水匠的用器），也不會贖回。李昌英去年以前沒有當過，去年二月起革命，去游擊大隊工作，白匪來，跑往白鷺，婦娘子在家沒有飯吃，當了棉襖一件，得錢一元二毛。革命再起，未曾贖回。黃大春去年以前未曾當過，去年五月，爆竹不銷了，無人請作爆竹，沒有飯吃，當了棉被一床，得錢一元五毛，當給本村富農鍾塊子，今年七月全縣革命，白鷺紅色游擊隊到本村，貧民起暴動，捉了鍾塊子到白鷺殺死，棉被取回。這個鍾塊子的父親好，肯周濟貧民，故群眾不曾殺他。鍾塊子在唐江開爆竹店，學會一手打，打得幾十個人開，把他殺掉，人人稱快。他的田平了，又罰了他家三回款，罰了好幾百元。

（七）鹽利：很厲害，因為興國的鹽，都是從廣東來的，貧農兼做鹽生意的頗多，本區百家貧

農，有十家兼去挑鹽。沒有本錢，向富農借，收買鷄子，挑往嘉應州（廣東梅縣），一担鷄去，一担鹽回，借洋一元，還鹽一斤做利。時間不過二十天或一個月，一斤鹽價一毛二三，即一個月間，借本一元，要還一毛二三的利。民十六以後，革命的一天多一天，一般利息減下來，減到二分四，鹽利也沒有了。

第三種 稅捐剝削

本區除錢糧以外，對於農民沒有什麼直接的稅捐。

三石穀田爲一石『秧租』，完糧四分四釐（銀子）。完糧，每銀一兩，完大洋三元六角。四分四釐升大洋一角五分八釐四毫，這是一石秧租田的糧價。一石秧租田，就是現時三石普通田，所以現時普通一石穀田要還糧大洋五分二釐八毫。本區去年穀價每石小洋三元，折銅元六串。每大洋一元折銅元二串八百，大洋五分二釐八毫，折銅元錢一百四十八文，能買穀二升半弱，這即是說，興國現時一石穀田，每年要完糧二升半。但本區一石穀田，實際只能打七斗穀（收七成），這樣就是七斗穀中要完糧二升半，約完去百分之三·五。

本區除錢糧外雖無別的直接稅捐剝削，但本區去廣東做鹽生意的却要受沿途各種稅捐剝削。中農或貧農做鹽生意的，從本鄉收買鷄子七十斤，三毛二分錢一斤。一担挑到嘉應州，講銀子，從前每斤價銀三錢零，有時高到四錢一斤。今年價高，每斤高到四錢八。每銀七錢四分升大洋一元，銀四錢八，升大洋六角五，升小洋九毛一，除去本錢三毛二，每斤鷄子能賺小洋五毛九。七十斤鷄子能賺小洋四十一元三。爲什麼今年嘉應州的鷄價特別高呢？因爲革命，贛南各縣的鷄子去的少了，所以價錢大貴起來。

四十一元三毛賺項中，要除去沿途的開支。第一是工錢，往年十天可到嘉應州，如今紅色區域與白色區域相間，許多地方要繞路，至少要十五天，每天工錢二毛五，十五天共三元七毛五。第二是吃伙食、吃黃煙、吃茶水、穿草鞋，每天至少要四毛五，十五天共要六元七毛五。第三是雞食穀，七十斤雞每天吃穀子三毛，十五天共要四元五。第四是釐金，從興國到門嶺不抽捐，到門嶺要過釐金，每担雞大洋一元（升小洋一元四），門嶺過去不抽。第五，還要加上在本區收雞子的用費每一担雞要費三天，工錢、伙食、買雞籠，共費二元。以上五項開支，共要十九元四毛。四十一元三毛，除去十九元四毛，每担雞實賺二十一元九毛。

一担雞去，一担鹽回。今年嘉應州買鹽，大洋一元買十八斤。過去嘉應州鹽每大洋一元只能買十四斤，去年還是這樣，今年因革命發展，鹽銷停滯，所以便宜了。挑一担，八十斤，價錢大洋四元五，升小洋六元三。鹽挑回興國，今年五六月間鹽缺萬分，因此價漲，小洋一元，只買得二斤半，照這時市價，八十斤鹽，賣得小洋卅二元，除去本錢六元三，賺得小洋二十五元七。

但二十五元七賺項中，要除去沿途開支。第一是工錢，十五天，三元七角五分。第二是吃伙食、吃黃煙、吃茶水、穿草鞋，六元七毛五。第三是釐金，吉潭、門嶺、白埠、釣魚潭、會昌、花橋六處，門嶺要過釐，其餘五處要驗票。過釐，從前每担鹽六七毛，如今要大洋一元，五處驗票，每處小洋二毛，合共要大洋二元（折小洋二元八毛）。以上三項開支，共計十三元三毛。二十五元七，除去十三元三，實餘十二元四。

一担雞去，賺二十一元九，一担鹽回，賺十二元四，共賺三十四元三。時間一個月。過去雞鹽兩項生意，賺錢賺不到現在這樣多，但比較靠得住，不要繞路，時間只要二十天可往返。現在賺錢較多，但路上不安靖，民團靖衛團時常搜搶客人身上的錢（賣掉雞子的錢只以一小部份買鹽，大部帶在

身上），雖不要鹽，但時時要捉雞吃，僅不至於殺人。雖然如此，去做生意的人並不減少。

五六月鹽貴，每元二斤半，現在（十月）鹽便宜些了，每元三斤十二兩，這是因為江口、大湖江兩處打開，贛州可以來鹽了。比之未革命時，依然是很貴的，未革命時每元六斤四兩，比現在（十月）差不多便宜一倍，比今年五六月差不多便宜兩倍。

三 鬭爭中的各階級

一 地主

第一鄉地主均在興國城及白鷺，不在本鄉，租要送到興國城白鷺去。在本鄉有田在白鷺住家的大地主有四至五家，每家收租千多石，有在白鷺開店的，有在南昌、贛州幹事的。在興國城的有一家，收租千石，在城內開恒春號洋貨店，在贛州也有店。

第二鄉有三家地主，每家收三百多租，均在本鄉住。劉月林，三百租，自己不耕。革命中殺了他家兩個人，月林之子老大、老三，都是靖衛團分團總。革命後還有十人吃飯，分了田，服從政府。杜喜猷，自耕二百穀，收三百租，二十多人。杜喜猷，四十歲，去年二月參加革命，今年二月紅軍來，首先自動拿出契來燒，田都平了。杜在政府辦事，當宣傳。謝文林，三十個人，自耕五百穀，收一百租，與杜喜猷是親戚，自願燒契分田，現在鄉政府當財政科長。他家六兄弟，五人耕田，還請四個長

工，在本鄉第一發財。他家無一人識字，很老實（謝文林其實是個大富農）。

第三鄉有兩家地主。曾錫群，分爲五家，共收一千多租，自己不耕。五家共二十多人。著名大地主，反革命。男子都跑了，留下女人小孩五六個，每人也分了田。屋燒了。他家的人未曾殺到，他同姓替他當走狗的殺了兩個。謝遠香，四百多租，自己不耕，二十多人，反革命，跑了，不曾殺到人。

第四鄉、王潤蘭，大地主，四百租，又自耕二百穀。油山很多，均自耕。反革命，靖衛團總，殺了許多工農，燒了許多工農的屋，跑了。劉家洪，三百穀，自耕一百，出租二百。五個人，反革命，與王潤蘭、曾梅喜共起靖衛團。劉家洪和他的兒子均被殺。曾梅喜，收一百租，自耕百多穀，是個富農，五個人，靖衛團副團總，殺死工農多人。貧農高老狗被他殺死，『魂魄在他家吵鬧，曾梅喜和他的父親均被鬼纏死了』。謝傳珍，六百租，自己不耕。五六個人。謝傳珍被第三區捉去交區政府看押，尙未殺，家財抄了。

二 富 農

第一鄉共十二家，其中七家反革命。七家中有兩家殺掉了家長，其餘五家壯丁都跑掉了。跑的家中均被抄，鍋子都有被抄的。殺了家長的兩家沒有抄。七家女人、老人、小孩均未跑，分了田，女人有些與別人結婚了。被殺的一家劉能昌，他的兒子劉述堯，二十多歲，參加革命，出發新喻當班長。一家叫陳鳳鳴，屋燒了。十二家中有五家不反革命，捐了款子，平了田，進了赤衛隊，做革命工作也努力。其中徐昌函，四百穀田，大部自己耕，小部出租，十多個人，還有很多錢放利，被游擊隊罰了七百元，家裏未被抄，穀子未分掉，田分掉了。徐昌函二十六歲，去年二、三月即參加革命，今年三

月起做少年先鋒隊指導員，後到贛西南政府做工作（不知做什麼工作），八月回鄉在區政府又做少年先鋒隊指導員，被人咬他是A B團，押起來了。凌月波，四百穀田，均自己耕，十二個人，兒子凌雷漢，是個『畢業生』，在村政府當秘書，罰了他百多元，依然當秘書，有人咬他是A B團，押到區政府兩個多月，許他自首，放了。謝忠節，二百多穀，大部自耕，一部出租，八個人，最近鄉政府把他捉了，要罰他錢，還未放。以上十二家富農中，七家是積極反革命，五家雖表面參加革命，却有兩家是圖謀反動的A B團，剩下三家，一家也被捉了。

第二鄉有富農九家，陳先爲、梅嘉生、楊祖蓮、謝鍾玉、謝文林、陳袞偉、王正科、鄒相春、謝良慈。陳先爲二百穀，自耕百二十石，出租八十石，有錢放債，十多個人，剝削很厲害，反革命。陳先爲跑了，三個兒都殺死了，抄了家。梅嘉生其實是小地主，百多穀，均出租，有錢放債，做布生意，反革命，當靖衛團的指揮。梅嘉生和他的母親，又一個長工，均被游擊隊殺死，家抄了。楊祖蓮，百多穀，自耕出租各一半，反革命，A B團的暗殺隊長，七月區政府把他殺了。謝鍾玉，也是小地主，均出租，有錢放債。反革命，A B團團總。平素是個劣紳，八月十六日區政府把他殺了。謝文林，六百穀，自耕五百，出租一百，三十個人，六兄弟，五個耕田，還請長工，本鄉第一財富，是個大富農，與杜喜猷是親戚。自願焚契分田。全家三十多人，均不識字，頗老實，現在鄉政府當財政科長。陳袞偉，二百穀，自耕出租各半，有錢出借。二十個人，參加革命。八月被人咬爲A B團，區政府把他捉起了。王正科，二百穀，自耕多，出租少，反革命，當靖衛團，今年五月被殺。鄒相春，百六十石穀，出租一百，自耕六十，七個人，參加革命。他的兒子鄒麗東，當區政府文化部長，還忠實。謝良慈，四十石穀，均出租，在永豐圩開雜貨店，起頭參加革命，在第二鄉鄉政府當財政，侵吞八十多元，撤了他的職，罰他出百五十元。有一天開民衆大會，他就着人家的現成筆墨，連寫兩個反

動標語，『鞏固蘇維埃政權定要A B團改組派』，『拿下贛州吉安定要A B團改組派』，捉了拷問，供出當A B團秘書，八月十七日把他殺了。以上九家富農（中有三家小地主，一家小商人），七家反革命，只有二家是革命的。

第三鄉，九家富農，謝九璋、毛世楫、雷永霞、陳鳳鳴、姜滔書、邱福田、邱世禮、邱質葵、謝益星。謝九璋，四百多穀，自耕二百多，出租二百。八個人。放高利。反革命，鄉下稱霸王，當土棍。革命起來，全家跑了。毛世楫，二百多穀，均自耕，放債，早前二十三個人，現在分爲四家。孫子毛章平，二十二歲，中學生，A B團團總，捉起了。雷永霞，二百多穀，自耕五十石，出租百多石，有錢放債，早前走了，鄉政府捐了他二百多元，他回了家，鄉政府叫他去紅軍學校，沒有考進，鄉政府又叫他進了興國縣的教導隊。年二十一歲，高小畢業。陳鳳鳴，百多穀，均自耕，七個人，無錢放債，因爲他的兒子在贛州讀書要用錢。反革命，A B團的秘書，殺了，抄了家。姜滔書，百多穀，均自耕，有錢放債，十個人，參加革命，捐了他百二十元。邱福田，百多穀，自己耕，稍有一點錢放債，五個人，反革命，自己跑了，妻子跟了別人。邱世禮，百三十石穀，自耕四十石，出租九十石，吃大煙，無錢放債，反革命，本人跑了，他的妻鄉政府叫她嫁別人，房子做了鄉政府辦公地。邱質葵，百五十石穀，自己耕，有錢放債，六個人，參加革命，兒子編入赤衛隊，捐了他六十元。謝益星，二百穀，自耕出租各半，有錢放債，十二個人，A B團，捉起了，他的第四個兒子跑了，還有三個兒子在家。以上第三鄉九家富農，六家反革命，只有三家尚未反革命。

第四鄉，劉家洪、曾梅喜兩家富農，均是反革命（見前地主節）。

本區四個鄉，第一鄉十二家富農，九家反革命，第二鄉九家富農，七家反革命，第三鄉九家富農，六家反革命，第四鄉兩家富農，均反革命。四鄉共計三十二家富農，二十四家反革命，餘八家現

雖尙未反革命，也不知將來怎麼樣。

富農的田是很好的，和地主的田、公堂的田一樣的好。他們買貧農的田總是要買好的，貧農也不得不把好田賣給他，因為若賣歹田，要幾畝才抵得一畝的價。他放債與貧農要抵押，也要好田，不要歹田，因此好田一天一天集中到了富農的手中。

革命初起，如今年二三月間，富農投機加入革命的頗多，鄉區蘇維埃中富農及其走狗佔去百分之三十的位置。四五月間，舉行反富農宣傳週，把他們打下去。到現在本區只有兩個富農辦事了（一個是謝文林，在第二鄉蘇當財政科長，一個是鄒麗東，在區政府當文化部長）。

三 中 農

中農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第一，中農在土地上不但不受損失，而且多數於平田時是平進了的。本區中農人口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土地只佔百分之十五，故本區中農平田時平進的多。雖然也有平出去的，却是極小部份。

第二，過去討一個老婆要費二百元內外，幾乎等於中農的全部家產，所以中農討親很不容易，爲了討親而欠債的很多。假若一個妻子死了，再討一個就非常之困難。現在婚姻自由，一個錢也不要，這是很大一個利益。

第三，過去中農人家，老人死了，起碼要用五十元、一百元，百多元的也要用。過去中農爲了死爺死娘，負債破產，是常有的。現在迷信習慣破除，死了人埋了就是，一點錢不費。

第四，過去牛貴，跌死一條牛，賣得十元八元牛肉錢，要加上十多元錢，才能買回一條牛。現在

跌死一條牛，雖仍只賣牛肉賣回十元八元，却只要加上三四塊錢就可買回一條牛。

第五，地主富農權力被打倒，禮節廢棄，迷信破除，送情送禮，香紙蠟燭，都不要了，也要節省一點用項。

第六，除上述五項經濟利益外，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重大的利益項。過去，中農在地主富農統治之下，沒有『話事權』，事事聽人家處置，現時，却與貧農僱農一起有了話事權。中農在鄉區兩級蘇維埃中擔負工作的，約佔百分之四十。內中完全不欠債的佔百分之十，稍許欠一點債但家計仍然敷得下去的佔百分之三十。

中農參加革命很勇敢，和貧農一樣『出發』（謂編在自衛軍中，有時要出發作戰），一樣放哨，一樣開會。

本區中農，人口佔百分之二十，土地佔百分之十五。中農的土地雖然要比貧農好些，比富農却差得多。大概中農的土地，好的歹的各佔半數。

四 貧 農

革命後，貧農取得利益如下：

第一，分了田。這是根本利益。

第二，分了山。過去貧農是少有山的。第一、第二兩鄉貧農百家中三十家有山，七十家無山。第三鄉（山坑）近均村，那塊山多，故貧農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三十家無山。那塊的山多是油山。第四鄉貧農百家，五十家有山，五十家無山。各鄉貧農有山的，每家山的數量亦很小。本區的山，一、

二兩鄉因走沙山多，故地主只要田，不要山，富農、中農、貧農各佔山之一部。第一鄉山的分配是：富農百分之四十，中農百分之四十，貧農百分之二十。第二鄉山的分配是：富農百分之五十，中農百分之三十，貧農百分之二十。第三鄉因油山多，山裏有出息，故地主要山，但仍以富農佔的山爲最多。其分配是：地主百分之十五，富農百分之五十，中農百分之二十，貧農百分之十五。前面說第三鄉貧農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但這七十家所佔山的數量不過百分之十五，每家只有一點點。第四鄉山的分配是：地主百分之二十，富農百分之二十，中農百分之五十，貧農百分之十。沒有山或山太少是貧農一大困苦。第一，沒有柴火，或柴火不足，要向人家山上採蘆茅。第二，不能伐了松柴挑到市上去換油鹽，只能挑蘆茅去換油鹽，三担蘆茅才抵得一担松柴。第三，沒有木頭起房子、做用器。第四，沒有油山，或油山不足，就沒有油吃，或油不足吃。現在分了山，且和分田一樣照人口分，每家每人都有山了。雖然各鄉山有多的有少的，因此各鄉人民分山，有分多的有分少的，但即使那個少山的鄉，每個都分了一點山，因此解決了貧農的困難問題。貧農爲了需要，是堅決主張要分山的。爲了生產，亦非分山不可。過去山多人家，因爲人力不足，有些荒了，有些修理不好。人力足的貧農大群衆，因爲無山，便把人力閒置起來。現分了山，貧農大力用到自己的山上，生產便會大大的增多。

第三，革命初起時，分地主及反革命富農的穀子，貧農不要錢挑了穀子吃。白鷺（大地主集中的地方）並按人口平分了，貧農吃到割禾時還吃不完。

第四，革命以前的債一概不還。三月革命初起時，上頭的公事說，商家的賬要還，會賬要還，貧苦工農相互的賬要還。六月十幾（陽七月）贛西南（即指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又來公事，說一切不要還了。本來從三月起，便是一切都不還了，不過不還雖然是事實，而上述三種債要還，却尙是一種道理（尙成一種理論）。六月以後，連道理都推翻了。貧農十分擁護這種辦法。爲什麼貧農主張連那三

種都不還呢？第一，商家的賬，大商家多半跑了（白鷺三十五家商店，十家大的都跑了）。小商家（如白鷺之二十五家小商店）雖多少也有些貨賬在工農手中，但小商家多半欠大商家的賬，欠地主的賬，欠富農的賬，貧苦工農不還小商家的賬，同時小商家也不還地主、富農的賬，兩者比較，小商家還較得利，因為小商家欠大商家和地主、富農的賬，比他放給貧苦工農的賬為數要多些。第二，會賬。爲了討親，爲了還賬，邀定親戚朋友打一個會，這些親戚朋友中不是中農就是富農，取消會賬是無傷的。雖然打會是出於友誼扶助，但起會是貧農，還不起，取消是應該的。即使二會三會是富農接了，取消不還也有理由，因為富農接了會，把錢放利放到別的貧農手中去，貧農現在不還他了。並且他的全部家產，充公的充公，捐款的捐款，已經開空，所以不還也是應該的。至於地主、富農爲剝削貧苦工農而打的會，本區沒有。第三，貧苦工農相互的賬。革命了，『你是貧苦的，我也是貧苦的，我拿什麼還你呢？』這樣就答覆了這個問題。所以一概廢債是最正確的。

第五，吃便宜米。今年正二月，穀價每石四十六毛，三月開始革命，每石二十毛，六月至今（陰九月）每石七毛，以七毛與四十六毛比，便宜六倍半。穀賤，在貧農分了田已經耕種收割以後，自然有相當的不利，但在革命開始尚未收割的數個月間，穀賤於貧農是有利的。

第六，是『由』了老婆（江西農民把婚姻自由的由字變成動詞，使之區別於舊時強迫的買賣的婚姻，普遍通用於全蘇區農民中）。過去討老婆非錢不行，因此許多貧農討老婆不到。即討，不是帶童養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紀。若是討了老婆又死了，再討就非常困難。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困難了。

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錢了，埋了就是。

第八，牛價便宜。沒有牛容易買到，死了牛容易買回。貧農的牛力是很缺乏的，以貧農百家論，本區每家一個牛的只有十五家，兩家共一牛的四十家，三家共一牛的十家，四家共一牛的五家，無牛

的三十家。在這種情形之下，牛價便宜是貧農的利益。

第九，應酬廢棄，迷信破除，兩項的用費也不要了。

第十，沒有煙賭，同時也沒有盜賊，夜不閉戶，也不會失掉東西。

第十一，分了田，家家能供豬，不專爲賣錢供別人吃，自己也可以吃肉了。過去，屠坊中，貧農買肉吃的很少，現在買肉吃的多起來了。

第十二，這是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權。貧農是農村政權的骨幹，成了農村中的指導階級。貧農可以依照牛力多少，分爲五個階層，如上邊第八項所述。

五 僱 農

僱農和貧農一樣分了田，因爲地主、富農倒，雖有人請零工，沒有人請長工了，所以他們堅決要分田。分了田，牛力農具沒有，又很難耕種，此問題現在尙未解決。區鄉政府不把沒收地主、富農的耕牛農具發與僱農，把它出賣了。

傅濟庭的外甥朱大喜是個僱農。家中七個人：四兄弟，父，母，同他的老婆（童養媳帶大的）。他是老大，二十二歲。老二，十九歲。老大在富農鍾姓家中做長工，每年工錢小洋三十九元。老二在人家看牛，每年工錢十元。共收入四十九元，買得十六石多穀，只能供兩個半人的吃食。靠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砍茅草賣，弄點錢吃飯，冬天吃兩餐。欠三十多元債。自己無屋，住地主的山棚，爲地主招呼山，父親原也是僱農，現六十多歲了。

本區僱農每年可抽十五個工，正月過了元宵上工。初一、十五沒有牙祭打。老闆供給被窩，衣服

沒有。有病吃藥，吃自己的。病在三天以內，不扣工錢，三天以外，要扣工錢。工錢零碎支給。天光做到黑，除吃飯、休息時間外，工作至少十點鐘。冬天，晚上剝木子，刨番薯。

僱農沒有老婆的佔百分之九十九，是農村中最苦的一個階級。地主、富農不但人人有老婆，一、二、三個老婆的也有。中農百分之九十有老婆，百分之十沒有。貧農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沒有。手工工人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沒有。游民百分之十有老婆，百分之九十沒有，也比僱農的老婆數多些。只有僱農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無老婆。七月（陽八月）政府下令，男子無老婆的趕快『由』到老婆，女人無老公的趕快『由』到老公，於是『由老婆』『由老公』的事情，就突然增多起來。七月以來，兩個多月時間，中農、貧農從前無老婆的，多數有了老婆，沒有的很少了。僱農比較難於『由』到。女子嫌僱農家中沒有器具用品，又嫌他不常在家中，所以僱農不容易解決老婆問題。第一鄉傅濟庭住的楊坊村，四個僱農（兩家的兩兄弟），只有一個『由』了老婆。本來另一個也可以『由』到，鄉政府的社會保險科長說：他們兩人過去有勾搭，不准登記，因此那個女人『由』別的男子去了，這個僱農依然沒有老婆。第二鄉永豐圩附近，六個僱農，四個『由』了老婆。第四鄉，溫奉章住的侯逕村，只有一個僱農，至今沒有老婆。

分田後，沒有長工了，零工亦十分減少七分，只剩三分。工錢沒有漲，僱農也沒要求漲，『工都沒有做，還話漲的事』！

僱農分田後牛力農具問題。楊坊村的兩家僱農，一家姓陳的，老大、老二都是僱農，老大幫富農陳姓做長工，每年工錢三十三元。老二幫鍾姓富農做長工，工錢四十二元。他們的父親是個佃農，死了，母親帶了他們兩兄弟討米。他們長大了，就做僱農。母親死了，剩下兩兄弟。老大二十九歲，老二二十三歲。有一個屋，有煮飯器具，也無桌凳，過去有的耕田器具也賣掉了。二月分了田，兩兄弟

都回家來，老二『由』了一個老婆。本錢也沒有，老二本來有百多元錢，借給鍾姓貧農，廢債一行，也不能收回了，因為那個貧農沒有法子還。幸得有個叔子是中農，借給他們牛力與農具。三個人共分十六石二斗穀田。二月分田後，即拿來自己耕種，收穫全歸自得。頭禾割了，又耕二道，禾長得很好。如有牛，一個人能耕一百石穀田，他們兩兄弟共只耕得十多石穀，所以有許多工夫空出來，爲人家做零工，挑脚，賺些錢用。

楊坊村又有一家僱農鍾姓，也是兩兄弟，父母死了，叔父（鍾恩江），叔母，叔父的兩個兒子，一個媳婦，兩個孫女，全家共九個人。叔父及兩個兒子都耕田，租別人的，他自己沒有田。欠了債，每年不够生活。他們兩兄弟幫人家做僱農，老大鍾聲坡，四十多歲，在鍾姓富農家做長工。老二鍾聲槐，三十六歲，在鍾姓中農家作長工。二月分了田，即由自己耕種。原有一條母牛，租得鍾龍潭中農的，養了兩個牛子。革命後，鍾龍潭要這個牛子回去。鄉政府對鍾龍潭說：『稅的牛，看各鄉辦法，各鄉都交還，你才能要回，現在不能要回』。因此這頭牛仍在鍾恩江家。兩兄弟分田之後，牛力農具不成問題，因為他們的叔父有。

在這裏要說一說那個中農鍾龍潭的事。鍾龍潭，三十多歲，母親六十歲，老婆二十多歲，三個人吃飯。自有十多石穀田，租人三四十石穀。還租之外，自食有多，拿了出賣。有三條牛出稅，稅在三家貧農家中，每牛每年收租穀一石半，生了牛子各得一半。很有錢放賬。二月平田，三人共分二十四石穀（每人八石），比自有的多了一點，但不能租人田，因此沒有餘穀出賣了，稅出的牛和放出的債都平掉了。他是個很老實的，不反革命，也沒有担負什麼重要工作，在本村紅軍預備隊當伙伕。

革命後僱農在政治上沒有當權。中農貧農總以僱農『不認得字，不會說話，不開通，不熟公事』，辦不得事。本區區鄉政府委員，沒有一個僱農，只有一個當鄉赤衛隊長長的。

六 手工工人

本區手工工人的種類：木匠、泥水匠、縫匠、鐵匠、剃頭匠、篾匠、礮匠、棕匠、石匠、畫匠、錫匠、機匠、銀匠、染匠、槽匠、漆匠、窰匠、紙匠、十八種。以木匠、泥水匠、縫匠、篾匠四種人數較多，剃頭匠、鐵匠、槽匠（打油的）次之。其餘又次之。銅匠、彈匠、鞋匠、皮匠、四種本區沒有。油槽一鄉一個，二鄉二個，三鄉十一個，四鄉十二個。每個油槽有槽匠一人。

工錢：過去每工木匠二毛，泥水二毛，縫衣一毛五，篾匠一毛五。剃頭一、二、四鄉每人每年穀子一斗，三鄉每人每年一毛五，均吃老闆的飯。鐵匠二毛五。槽匠二鄉十個錢打一斤油，三鄉三個錢打一斤油，四鄉打一担油（百斤）抽二斤。一鄉產油少情形不明。三鄉特賤，乃因油多。礮匠，每座礮六毛，三工打一座。棕匠二毛二。石匠四毛半。畫匠以畫計，畫豪紳地主的像，畫神像。錫匠以錫器計。機匠夏布每丈一毛，春布每丈也是一毛（夏布即麻布，春布，八成麻二成棉），本區無織棉布的。銀匠以銀器計。『吃冤枉很大』。染匠不明。漆匠以件數計，窰匠也以件數計。紙匠一毛五（做皮紙，只第三鄉有）。

過去木、泥、縫、篾四匠每年多的做二百工，少的百把工。革命後，泥匠、縫匠做工日子大減，大概一年只能做幾十工了。木、篾二匠僅比過去稍爲少做一點，差不很多。剃頭比過去發達，因爲女子都剪髮了。革命後，錫匠、畫匠、漆匠、紙匠都不見，因爲用不着他們了。（紙匠是做喜爆引線的，喜爆不用，紙匠不要了）。

『上頭的命令』，是手工工人分半田，但手工工人要求分全田。理由是失業的失業，工作減少的

工作減少，並且靠不穩，只有分田才靠得穩。農民說：『上頭命令，你們分半田』。工人說：『分半田就要漲工價』。農民不願工價漲，因為貧農僱農分了田要作農具，須請工，富農中農原來已有農具，無須請工，只有貧農特別需要請工，因此他們不願漲工價。貧農說：『好，你們就分田，不要漲工價』。工人並且說，分田之後，若每年還做得一百工，他們願每年交還兩石穀子與公家都可以。剃頭工不分田。因為剃頭工長日在人家，吃人家的飯。贛縣工人分了田減了工資，木匠、泥匠原二毛，減到一毛五，篾匠原一毛五，減到一毛二。

手工工人有老婆的百分之七十，沒有的百分之三十。革命後，原先沒有的，現在多數『由』到了。因為手工工人熟人多，又有一門手藝，又較聰明，又會說話，又有許多識字的，在這些點上均比僱農強些。

手工工人，區有總工會，鄉有分工會，村有支部，譬如第一鄉之凌源有各業工人共二十多人，合共組織一個支部。

鄉村手工工人，總是兼耕田。以工為專業，完全不耕田的，百人中找不出十個。手工工人百分之八十是欠債的。

七 商人

本區商人的種類：開油鹽雜貨店的，賣米果的（又分幾十種），開茶店的，開酒飯店的，開屠坊的，作豆腐的，開鴉片煙館的。本區不兼耕田專門開小商店的佔全人口百分之三（百家中有三家）。本區四個鄉中，過去只有三家五百元本錢的小商人，均在永豐圩，別鄉沒有。全區小商店：第一

鄉五家，第二鄉三十五家（均在永豐圩），第三鄉六家，第四鄉沒有，共計四十六家。四十六家小商店中：本錢五百元的四家（三家在永豐圩，其中一家是藥店，樟樹人開的，二家是洋貨店，興國城分來的，均不是本區的地主，革命起，均跑了，店沒收，貨給農民；一家在山坑，是本鄉的地主，全家跑了，店封）。四百元的一家（在山坑，雜貨店，兩股合夥，一股韓禮陶，耕田二十石穀，一股韓禮東，耕田六十石穀，革命後，韓禮陶跑了，韓禮東混入革命，做政府土地科長，現被人咬為A B團，押在區政府）。三百元的三家（均在永豐圩，二家雜貨布疋店，興國城人開的，均反革命，跑了，店改開茶館；一家屠坊，兼有六十石穀田，參加革命，繼續開店，當村政府主席，老實人）。一百元的兩家（山坑一家，雜貨兼客棧，沒有田，反革命，人殺了，店倒；西江一家，雜貨店兼打銀器，耕田數十石穀，不反革命，店在開）。五十元的兩家（在第三鄉。竹坑一家藥店，有田二十石穀，不反革命，現仍開；上頸地一家藥店，也有田，反革命，跑了，店倒）。二十元的二十四家（第一鄉四家，兩家在五娘廟，兩家在蕉田江；第二鄉二十家，均在永豐圩）。十元的十家（第二鄉九家，均在永豐圩；第三鄉一家，在騎嶺隘）。以上是以小商店為專業，不兼營別業的。

鄉村中以農為主，商為輔的（八成靠農，二成靠商）很多，約佔全部人家的百分之四十（百家中四十家）。這種人多數是貧農，少數是中農，因為生活不夠，做點肩挑生意補足生活，如到江口，到贛州，到湖口面，挑鹽回，去時多少帶點油，做本錢。挑鷄子到嘉應州（即梅縣）去賣，帶點鹽回的也有許多。

本區商人本錢五十元以上的共十二家，其中九家反革命，三家不反革命。

資本五十元以上的十二家商店中，只有五百元資本的四家僱了店員，其中三家各僱店員一名，一家僱兩名，其他八家均未僱店員。

二十元以下的三十四家，名叫商店，實是貧民，因此他們中間沒有反革命的，店均在開。

本錢二十元及十元的三十四家所謂『商店』中，職業別如下：

客棧九家（第一鄉四家，第二鄉五家，均在永豐圩）

煙館四家

糖果兩家

屠坊四家

米舖四家

木器一家

鐵匠一家

雜貨四家（以上均永豐圩）

茶館五家（四家永豐圩，一家第三鄉）

這回分田，商人本錢五十元以上的，除殺了跑了的不算，未殺未跑但店封閉或倒歇的，均分了田。不反革命店仍在開的，只有三家。一家是永豐圩三百元本錢的屠坊，因為向他寫了二百二十元的捐款，只剩八十元本了，十五個人吃飯，不反革命。他原有六十石穀，此次分田，店主陳少林分一半田，家裏十四個人分全田，因此除原有外，還分進了一些。陳少林的老弟陳少英在三軍（原二團）當連長，所以他家也革命，少林當村政府主席。一家是竹坑五十元本錢的藥店，也是店主分半田，家人分全田。一家是西江一百元本錢的雜貨銀器店，不反革命，鄉政府寫了他的捐（數目不明），分田店主本人分半田，家人分全田。此外那三十四家貧民小店，第一鄉四家客棧，第三鄉一家茶果，因為歷來沒有好多生意，過去生活大部份靠耕田維持，故此次分田，不論店主家人，一概分全份。但永豐圩

的二十九家，過去專做小生意營生，沒有田地，革命後除煙館四家倒閉外，其餘糖果、屠坊、米舖、木器、鐵匠、雜貨、茶館、客棧等二十五家不但依然存在，生意亦較過去沒有減少。雖然如此，他們仍照章分了田，店主分半份，家人分全份。沒有牛力農具，向親戚借用。

總括上述情況看來，本錢五十元以上的商店（其實多數均是小商店），在革命中受了嚴重打擊，是當地過左政策的結果。二十元十元的貧民小販，則在革命中得了很大利益，除了分得田之外，應酬消耗減少，老婆容易討，死了人不費錢財，政治上出了頭，都是與貧農相同的。這種貧民小販是與貧農同階級的，因此他們所得的利益，也與貧農所得利益差不多。

八 游 民

本區游民有下列各種：

（一）賭錢的：全區約五十餘人。第一鄉約十人，第二鄉約二十人，均在永豐圩，第三鄉六人，第四鄉約二十人。過去賭錢的十個有九個吃大煙，現在不吃了。本區五十多個賭錢的人中，沒有一個反革命，聽到打土豪分田地，心裏十分喜歡。過去寒天沒有衣穿，一身稀爛，現在穿得好了。過去有錢時吃魚吃肉，無錢時飯都沒吃，現在雖沒有好東西吃，飯却天天有吃。賭錢的十分之八沒有家室。現在分了田，從親房借牛力農具用。賭錢的平日頗慷慨，因此現在容易借得東西。第一鄉十人中有一個原先在第四鄉政府當財政委員，他平素賭錢賭硬，有信用，革命後當財政委員當得很好。第二鄉二十人中有下述四人在鄉政府辦事：天上人，在區政府當宣傳部長，有房子，無家室，前年參加革命，被靖衛狗把房子燒了。陳滾同，前年即參加革命，在區政府當裁判，後當預備軍第三連連長。楊大

湖，前年即參加革命，今年二月革命當鄉政府主席，當得好，後在區政府辦事。陳少其，前年即參加革命，今年二月當本鄉土地科長。第三鄉六人中之雷永英、有家室，賭錢賣煙，今年二月加入革命，在鄉政府當財政科長，很忠實。

(二) 討飯的：即叫化子。第一鄉四個，第二鄉五個，第三鄉四個，第四鄉四個，共十七個。這完全是沒有出路的，多半是無家室的孤單人。十七人中，只有四人有家室，這四人都是全家討飯。現在分了田，從親房借牛力農具用。革命後沒有辦事的。

(三) 賣水煙的：第二鄉二個，第四鄉一個，共三個。第二鄉的兩個均有老婆有兒子，家裏租了田耕，但本人不務正業，在賭博場中賣水煙。第四鄉的一個沒有家室，也沒有耕田。現均分了田。革命後無辦事的。

(四) 打卦的：只第四鄉一個，無家室，不耕田，專門打卦。分了田。

(五) 挑觀音的：第一鄉一個，分了田。

(六) 道士：第一鄉三個，均有家室，不耕田，做佛事爲業。第二鄉二個，均無家室，不耕田。第三鄉一個，有家室，耕了一些田。共計道士六個，均分了田。第二鄉之曾雲章，是個道士，前年即參加革命，無家室，無田地，今年二月當興贛萬游擊總指揮，『頂有計劃，會辦事，用兵不會敗過』，現編入二十二軍。

(七) 和尚：第四鄉二個，各住一個庵子，收租吃飯。高興圩人，革命後回高興圩去了，在高興圩分了田。

(八) 戲客子：唱木腦壳戲的。第三鄉一個，有家室，耕了田，現在二十軍當兵。第四鄉二個，有家室，耕了田，在村政府辦事。以上三個均分了田。

(九)算命的：第一鄉一個，本人無妻子，但有兄弟。去年即參加革命，今年二月起在鄉政府當宣傳科長。第二鄉二個，一個是瞎子。均有家室，耕了田，本人算命，這回分了田。瞎子陳信波，『有名的算命先生，有個知事請他算命算靈了，給了他十塊錢』。因為他是瞎子，分田多分一倍，分十四石穀。第三鄉四個，均有家室，三個耕了田，一個沒有，本人算命。其中三個都在政府辦事。一個叫曾慶龍，去年二月加入革命，『頂會說話』，今年六月當區政府土地部長，當得好。他原有幾石穀田租給他的叔父，沒有妻子。一個叫丘大陽，今年二月加入革命，沒有田也沒有家室。現在第三鄉政府當裁判，很忠實。一個叫丘伯成，有幾石穀田，有妻子，今年二月參加革命，現在鄉政府當宣傳員。算命的共七個。

以上九種游民，共九十人，一般都是歡迎革命，不但沒有一個反革命的，並且有十個參加區鄉政府的指導工作，一個當了游擊隊的指揮員。這是很可以注意的。

游民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

九種以外，本區沒有別的游民。

四 現在土地分配狀況

一 分田地

第一，分田單位：四鄉均以村爲單位分配。因鄉境大，山嶺多，鄉爲單位去分，隔遠了，不好耕。農民寧願在本村分田少一點，不願離了本村遷往別村。田少山多的村，每人少分點田，多分點山，田多山少的村，每人多分點田，少分點山，『也差不多』。

第二，分田方法：『上頭的命令』，是三天分完。實際上，一鄉，三鄉均七天分完，二鄉，四鄉均八天分完（這樣的時間太短促了）。

一鄉十五個村，二鄉、四鄉均七個村，三鄉八個村。分田的開頭，區政府派宣傳員到各村開民衆大會，先半日通信來，召集民衆。男人都到，女人不到，十歲以下小孩子不到。宣傳員當衆講說焚契分田的好處和辦法。一個宣傳員每天可以召集兩個村的民衆會。那時各村開的民衆會，到會群衆的感覺是：『講就講得好，不曉得章程穩得穩不得』。有的說：『字章（即契約）燒了，債不要還了。分田搭便（托福之意）紅軍，好是好，恐怕靠不住。現在分田，恐怕還要還租』。在民衆大會中，舉出村政府主席一人，秘書一人，財政科長一人，土地科長一人，幹事二人，組織科長一人，宣傳科長一人，糧食科長一人，軍事科長一人，交通一人。第一鄉楊坊村政府，是今年陰曆二月二十五日上午，開民衆大會選舉的。宣傳員往別村去了，民衆（全村男女老少百八十多人，本日到會六七十人）散去吃午飯。下午又來，村政府召集他們開會。村政府主席鍾恩明（是個獨立勞動者，無田，做厨子，作豆腐賣，別處做戲他做米果去賣），這天當大會的主席。議決事項如下：

- （1）向富裕之家寫款子，作村政府用費，財政科負責。
- （2）全村穀子阻止出境，糧食科負責。
- （3）集中全村武器，軍事科負責。
- （4）調查土地，舉行分配，土地科負責。

二十六日起至二十九日，共四天，爲調查土地時間。土地科長傅濟庭（即這次到調查會的一人），率領土地幹事鍾恩生，鍾恩仁（均貧農），會同四個組長（全村分爲四組，每十家爲一組），實行按家看田，某家某處有若干穀田，記上冊子。四天調查完畢，知道共有若干穀田。把全村人口一除，得出每人應得田數。三月初一日再召集民衆大會，當衆逐一報告，某家有田若干，有人若干，全村共有田數，和每人應得田數。當有傅化龍（有二百三十石穀田，均自耕，十個人吃飯，欠債三百多元，請一個看牛工，有一個大水牛。他的田都是歹田，實只能收百四十多石，十個人吃，有一半多餘，還債利並量退腳田（一部份）的租，要去四十多石，剩得三十石左右，是個略有多餘的中農），鍾先惠（七十多石穀田，均自耕，三個人吃飯，過去有錢放債，去年起房子用掉了，每年請半年長工，每年吃穀之外有三十多石剩餘，也是個中農。他有五兄弟，分了家，除他外，一個够食，三個很苦）二人，說調查不公平，報多了他們的田。在場數十個貧農、僱農、工人齊說傅、鍾二人的話講得不對，土地科的調查並沒有錯。在場尙有三家富農，都聽衆處置，不作一聲。大家承認調查結果，當即把某家要『剷出』若干給某家，某家要『剷進』若干從某家取得。要剷出的人家，剷出什麼部份由他自己作主，因此他就把壞的部份交出去。這時因鬭爭尙不深入，得田的人得了壞田，已經是意外歡喜，並不要求好田。這一天的會，就是做的『抽多補少』的工作。分完了，村政府秘書把冊子造出來，也不要張貼。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初一日，七天工夫，把田分完。

分完了『即刻過耕』，或『秋天過耕』，又成了貧農與富農的鬭爭。本區各鄉二月底分田時，已經下種；尙未插秧，正在犁田時候，大多數都即刻過耕了。但亦有一些富農想要再看風色，希望靖衛團回來田分不成，他們就對貧農說：我已下肥了，犁田了，今年不要過耕，讓我耕到收穫時再過耕，收穫了分四成給你。貧農有些接受富農的主張，以爲坐得四成也是好事。有些僱農及工人亦實在無法

馬上接田來耕，因此全區共有約百分之十用『分四成』辦法，沒有即刻過耕。

二 分山林

二月底三月初分了田，五月底才分山。

楊坊村是五月二十七日起始分山，上頭的命令是這時候才到的（注意：上頭命令的作用是什麼的大）。五月二十七日，鄉政府派了一個宣傳員劉大倫（知識份子，工作熱烈，但八月十七日發覺他是A B團的秘書，區政府把他殺了，這一天殺了A B團十一人，像劉大倫這種人恐怕是殺錯了）來本村，又開民衆大會，宣傳分山辦法，新舉出七個土地幹事，決定分山。這天宣傳員又報告了貧民借貸所一件事，議決照辦。

分山比分田更困難，有大山，有小山，有柴火多，有柴火少，有大樹的，有小樹的，有無樹的，因此難分。土地科長和七個土地幹事，一道出發，踏看全村各山，定出個辦法，不照山的面積分，照山的茶子樹分。以一担『桃』（一担茶子，值錢二串，叫做一担桃）為標準，大樹三十根為一担桃，中樹六十根為一担桃，小樹百二十根為一担桃。把全村山地算成桃數，然後按人口平均分配，插牌子為界。本村分四天才分清楚。土地科八個人有權決定分配，『不能由各人講，倘由各人隨便講，那就扯不清』。

第三鄉長窖村，土地科五個人（一個科長四個幹事），村政府發下二元一毛伙食錢，分了三十多天才分清楚，『可見難分』。

山雖分了，樹木只准砍樹枝，不准砍樹身，要砍樹身須經政府批准。

三 分池塘

以村爲單位，按照池塘大小，分組放魚，大塘五家爲一組放，小塘三家爲一組放。一組對於一塘，各家同時同數放魚，打魚時候照數平分。本區池塘的水多是不靠它蔭禾的，因此只有魚的問題，沒有水的問題。魚塘之外，亦有少數山塘靠了塘水蔭禾的。山塘放得魚的，照上法分配。放不得魚的，跟着田走，田歸那個，塘歸那個。

革命前放的魚，歸原放魚人得，不分。今年冬天乾塘，原主捉了魚去，新主才好放魚。

四 分房屋

依理，房屋以分爲好。貧農十多個，人一家只有兩三間房子的不少。一般說來，貧農百分之六十房子不够住，好房子都是富農佔了。貧農紛紛說要分房子，政府就說『上頭無公事』，貧農因此也不敢去住富農的房子。楊坊村開會時，貧農要求分房子，土地科長說：『房子多的應拿出一些給房子少的住』，但未作決議，富農不肯讓，貧農也不敢住（可見『上頭公事』之重要）。

分房子應該以村爲單位，毗連的人家，房多的分與房少的。

本區只有地主、富農、奸商之因反動被殺或被驅逐的，他們的房子如未燒掉（燒掉是不對的），就有了貧農去住，但亦不曾正式的分與誰。未殺未跑的，即使有很多剩餘房子，也不會分。

被燒的反革命地主、富農的房子（游擊隊燒的），一鄉一個，二鄉二個，三鄉五個，四鄉四個，

共十二個。內中三個地主，九個富農。被燒的革命工農的房子（反革命燒的），一鄉沒有，二鄉七個，三鄉八個，四鄉八個，共二十三個。內中農一個，貧農二十個，小商人一個，流氓一個。

五 公田

二月分田，留了公田，各鄉各村都留了。一鄉楊坊村留了十多石穀，茶干村留了三十多石穀，二鄉指閣村留了十一石穀。三鄉長窖村因田少還有十六個人沒有分到田，故不會留，別的村都留了。四鄉侯巡村留了百多石穀田，都是遭水患的。爲什麼要留公田？一是分餘尾數不便分配，所以留了。譬如每人分七石，餘十多石，拿來分，每人分一桶不夠，不好分，就留下作公田。二是作政府用費。三是爲了明年生兒子要田分。八月重分，因上頭有公事要澈底分配，把公田也分了。

其實公田還是不留的好，第一，有生的也有死的，生兒子不怕無田。第二，收土地稅，政府有了錢用，不必靠公田作用費。並且照二月的例，留下來的都是壞田，無大用處。所以不如一概分了，農民多得利益的好。

六 分田數量

各村各村不同。如第一鄉楊坊村，每人分五石六斗（二月分八石，實只能收五石六斗），茶干村每人分八石。第二鄉指閣村每人分七石。第三鄉長窖村，二月八月不同。二月間，本村分田數量有四種，有分七石的，有分六石半的，有分五石半的，有分四石一桶的。以姓爲單位分，因爲田多的姓不

肯分出田來與田少的姓。到了八月，才以村爲單位分，每人分六石。第四鄉侯逕村，二月每人分八石半。八月重分，把壞田名出二石實出一石的只做一石算，外邊又有人回來，每人只分七石半。

興國每年只耕一道，照上述分田數量，老幼扯勻，勉強够食。添上種雜糧，供猪子，油鹽布疋雜用也有了。

本區雜糧的大宗，就是番薯，平均佔全部人口食糧的四成。分別來說，第一鄉較少，因爲土不起番薯，十成中只吃二成。第二鄉和第三鄉就大不相同，平均十成中要吃五成，多的吃到七成，一年到頭都是飯裏夾着番薯絲吃。第四鄉平均吃番薯四成。

五 土地稅

名曰『公益費』，八月初間（陰曆）已經收了。分六石穀田的收百分之一（每人六升），分七石的收百分之一·五（斗半），分八石的收百分之二·五（二斗），分九石的收百分之三·五（三斗一升半）。本區沒有分九石的，故本區公益費的最高額是百分之二·五。第一鄉楊坊村一百八十多人，每人分田八石（照二月分田的數目），照百分之二·五抽收，共收去三十六石四斗。茶干村三百九十七人，每人分田八石，共收去七十九石四斗。第三鄉長窖村每人分田五石半，不收稅（上了六石的才收稅）。全區本年大概能收稅一千石左右。

八月收稅，多數還存在各村，一部份送到鄉政府去了，沒有送到區政府去的。八月收稅時，縣政府的公事，願出穀子的出穀子，願折錢的折錢，折錢以三十文折一斤穀子，當時市價只有二十文，故

農民沒有願出錢的。

初收公益費時，約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贊成，辦事人到他們家裏，他們說：『前頭說抗租抗稅，現又收起稅來了』。收公益費時，上頭的命令來得很緊，限三天將穀子交到鄉政府去，鄉政府召集了各村土地科長開了一個會，第一鄉分爲九個赤衛大隊，每大隊去了一個人，都是土地科長，議決要各村負責人開會，會完即收公益費，未曾開民衆大會。收費時以大隊爲單位，如第八大隊是洋坊、凌源、梨樹三村共合組織的，由大隊長，土地科長，三個中隊長，九個分隊長，分往三個村，挨戶徵收（每個中隊爲一村）。到那一家量完了，稱一稱；九十斤爲一石，由那一家派人送往鄉政府。本大隊共收公益費差不多四百石穀。第一鄉茶干村先兩天發信與各家，要他們送公益費到公倉去。到期各家紛紛挑了穀子送到公倉（即過去的義倉），由本鄉的負責人（五個）領收，不到一天工夫就收齊了，一共收了七十多石穀子。事先說，那一家當天不把公益費送來時，五個負責人當天的伙食費就要那一家出，大家怕出這筆錢，所以很快的送去了。

六 蘇維埃

一 區政府

主席劉紹彪（二鄉人，過去不耕田，學打，略識字，做裁縫，後不做裁縫了，賭錢爲業，前年參加革命，屋被靖衛團燒了，七月後換了主席，他當裁判）。

軍事蕭志春（二鄉人，不耕田，販鷄子走廣東，賭錢，守祠堂，自己沒房子，不大識字，前年參加革命。七月後當區政府主席）。

財政侯禮章（二鄉人，裁縫，識字，七月後當區工會委員長）。

組織劉紹明（二鄉人，醫生，不做別的職業，過去家境好，後來四兄弟分家，他做醫生，欠了債，前年參加革命，屋被靖衛團燒了，七月後當財政）。

宣傳鄒利三（贛縣人，富農，六兄弟，中學畢業，當宣傳科長，七月後去贛縣）。

王振仁（二鄉人，綽號天上人，無業，賭錢吃飯，前年加入革命，房子被靖衛團燒了，七月後仍當宣傳員）。

方功暑（十一區人，是個讀書人，職業不明，屋被靖衛團燒了，七月後回十一區去了）。

蕭志城（二鄉人，賭錢爲業，略識字，前年加入革命，受過靖衛團的打擊，七月後仍在區府，不知做何事）。

陳昉寶（二鄉人，裁縫，兼賭錢，不識字，前年加入革命，八月以A B團嫌疑被押）。

裁判曾禮邦（二鄉人，是個道士，無他業，家境苦，前年加入革命，後做興贛萬游擊總指揮，現編入第二十二軍）。

文化鄒麗東（二鄉人，過去有六百穀，讀書讀掉了，剩百多穀，欠三百多元債，是個破產的大地主，他是大學畢業，去年加入革命，七月改組仍當文化）。

秘書長謝應山（縣城人，讀書人，五十歲了，七月改組仍當秘書長）。

少隊政治委員蕭少文（二鄉人，賭錢爲業，略識字，前年參加革命，七月改組去贛西南）。少隊指導員徐昌函（一鄉人，富農，本身是個『畢業生』，去年游擊隊寫了他的款子，他就參加革命，八月以A B團嫌疑被押）。

黃貫（讀書人，歷史不明，七月改組後行動亦不明）。

陳滾同（二鄉人，父親當土棍，死了，本人是個中農，兼賭錢，不識字，前年參加革命，靖衛團把他的田充公，七月改組仍在區府）。

楊達成（二鄉人，過去做裁縫，後來賭錢爲業，前年加入革命，略識字，七月改組後在第二鄉政府當宣傳）。

婦女劉超英（一鄉人，勞動婦女，不識字，七月改組後去贛西南）。

以上十八個人，賭錢爲業六人（其中兩個原先是裁縫），裁縫兼賭錢一人，純粹裁縫一人，醫生一人，道士一人，破產大地主一人，富農二人，中農一人，不明家世的讀書人三人，不明家世的勞動婦女一人。

以上十八個人中，以劉紹彪、蕭志春、王振仁、謝應山、陳滾同、鄒麗東、曾禮邦七個人最能辦事，最有權。

區政府設在永豐圩。

二月到九月開過二十多次全區民衆大會，全區代表大會開過兩次（各村開民衆大會選舉代表）。全區民衆大會六月前開得少，六月後鬭爭深入，開得很多。四月以後，女人及小孩都參加民衆大會了。

二 鄉政府

舉第一鄉鄉政府爲例：

主席謝金明（貧農兼挑脚，自己有極少的田）

財政鍾國春（中農）

軍事楊延榮（貧農，自己有極少的田）

宣傳謝忠楷（貧農，自己有田，但欠債）

謝忠梅（自己有田，本人耕田，兼上廣東，是個中農）

謝華煥（富農，本人與國縣立小學校畢業）

陳方波（貧農，耕別人田，本人算命）

秘書易永洪（父親剃頭，貧農，本人讀書）

裁判陳玉書（蓮塘人，是個讀了書的）

土地傅濟庭（貧農）

以上十個人中，六個貧農，兩個中農，一個富農，一個外邊來的讀書人。

鄉開的民衆大會比較區開的少得多，不上十次。四月以前婦女小孩都不參加，四月以後便參加了。

鄉的代表大會開過六七次，每鄉每次三四十人，每村一個至兩個代表，接近鄉政府之村有些非代表的人來參加。每回開三四點鐘，到會代表講話的尙多，主席臨時推舉。

三 村政府

二月到五月有村政府，分田時候實在需要村政府，分田完了，村政府可以不要了。並且立起來又沒錢用——即便不要伙食，辦公費多少要一點。革命深入之後，分了田，十家一組編了組，又有了赤衛大隊，不要村政府也可以了。

四 政府人員的弊病

第一、是官僚主義，擺架子，不喜接近群眾。群眾有人走到政府裏去問他們的事情時，政府辦事人歡喜呢，答他們一兩句，不歡喜呢，理也不理，還要說他們『吵亂子』。

第二、是沒收了反動派的東西，不發與貧農，拿了賣錢，向政府裏頭講不起話的買不到手，有情面講得起幾句話的才買得到。並且既然出賣，就是比較有錢的人才能買到，僱農及極窮貧農當然無份。

第三、是調女子到政府辦事。鄉政府總有一個二個女子，區政府總有三個四個女子，女子辦事是好的，但政府的取捨不對，生得不好看，會說話會辦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會說話不會辦事的也要她。鄉政府的人下村開會時，也是一樣，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講話，不漂亮的，話也不和她講。

第四、這是最大的一項，就是強姦民意。政府委員由少數人定了就是，代表大會選舉只是形式。有一次主席說贊成某人的舉手，有些人不舉手，主席就指不舉手的說他是A B團，有一次主席對不舉手的怒目詰問爲什麼不舉手。再有，就是一定要共產黨員才能在政府辦事，不是共產黨員，即使是群

衆領袖，也不能到政府辦事（我向到會人說：這些壞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狀況，原因之一是區政府成份不大好，將來都要改變的，這些壞事是不對的）。

七 農村軍事化

一 赤衛隊

第一鄉九個大隊，第二鄉三個大隊，第三鄉四個大隊，第四鄉四個大隊。編制法：八人至十五人爲一分隊，三分隊爲一中隊，三中隊爲一大隊，本區各鄉通常是八九十個人一個大隊。例如第一鄉的第八大隊，是由洋坊的第一中隊，凌源的第二中隊，梨埧的第三中隊編成的。共有九十多人。

赤衛隊年齡二十三歲以上，五十歲以下。

赤衛隊都是男子。

起初，分爲常備赤衛隊，預備赤衛隊兩種；後來，合而爲一，不分常備預備。

任務：是天天夜夜放哨，村村有哨，每村的總路口必定有個哨蓬。普通時候，白天童團和少隊放哨，章程上規定五個人一天，兩個女童團，兩個男童團，一個查哨的是少隊。少隊要是識字的，要看得清通行證，不論什麼人通過，甲村過乙村都要通行證。夜間放哨則歸赤衛隊，普通四人一夜，二人一班，一班上半夜，一班下半夜。若環境緊張時（如七月七靖衛狗打到均村附近時），白天夜晚都歸

赤衛隊放哨，並且人數特別加多，白天雖仍只四、五人，晚上便要十多人，甚至二十多人。

赤衛隊每大隊設大隊長，要是本鄉最努力而且多少懂得一點軍事的人。政治委員一人，要是本鄉最努力而且看得通公文的。

赤衛隊早先要下操，七月編了紅軍預備隊，便不下操了。

赤衛隊分男赤衛隊，女赤衛隊，例如第一鄉洋坊、凌源、梨樹三村合組的第八大隊，有男赤衛第八大隊與女赤衛第八大隊兩種。女赤隊年齡與男隊相同，但人數較少，因為女子比男子少，又除去孕婦，除去乳母，普通每隊便只有四十人（第二鄉第三大隊）五十人（第一鄉第八大隊，第三鄉第三大隊）。也有少於四十人的，也有多於五十人的。女赤隊平時不擔負放哨。緊急時男赤隊出發（出發戰團叫做『出發』）去了，女赤隊便也擔任放哨。女赤隊也要下操，每月一次，每次兩三點鐘，隊長政治委員都是女子。操時男赤隊派人去教操。男赤隊自六月把精壯份子編入紅軍預備隊後，剩下都是老弱的，每隊有只留十多人的，二十人的，三十人的不等，以後便不下操了。男赤隊每鄉有一個鄉隊長，一個鄉政治委員，兩人不常駐鄉政府，住在他們家裏頭，有事調他去，他們就去。全鄉下操時，他們也要到。各鄉赤衛隊共下過兩次全鄉操。

二 少年先鋒隊

凡有一個赤衛大隊的地方，就有一個少隊，不分男女，年齡十六至二十三歲。有大隊長，政治委員。每大隊分三個中隊，每中隊分三個分隊。惟人數較赤隊少，每隊有二十人的（二鄉指閣），三十人的（三鄉長窖），五六十人的（一鄉洋坊等三村）。二十人三十人的都叫做中隊，五六十人的便叫

做大隊了。六月起，挑選勇敢份子編入紅軍預備隊及區特務營。剩下的少隊仍然要下操，一個月下兩次。只有男赤隊，自從把勇敢精壯份子編入紅軍預備隊後，便不下操了。

少隊自編入紅軍預備隊及區特務營之後，剩下的沒有幾多人了，有的簡直沒有少隊了（如一鄉洋坊等三村，二鄉指閣）。

三 童子團

不分男女，年齡八歲至十五歲。

有一個赤隊及少隊的地方，就有一個勞動童子團。每村一個團長，鄉無團長，區有團長。

童團的工作：第一是放哨，第二是檢查煙賭，第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薩。童團查煙賭打菩薩很厲害，完全不講人情，『真正公事公辦』。開民衆大會，他們定要去。他們的武器主要是木槍，也有幾枝梭標雜在其中。

童團的團員都是在人民學校讀書。人民學校是七月辦起來的，第一鄉五個，第二鄉三個，第三鄉七個，第四鄉一個，共十六個。區政府規定每鄉三個，出三個教員的伙食費，每天大洋一角，每月零用錢大洋二元，共計每月大洋五元。因第一鄉地寬，准辦五個。第三鄉山多，三個不夠，自己加辦四個，共七個，但用費仍只十五元，平均每校分得兩元零一點。人民學校學生少的二十多人，多的到百二十人，普通四十多人。如第一鄉洋坊、凌源、梨樹三村合立的人民學校，八歲至十五歲的兒童有百二十多人，房子住不下，一個教員教不了，因此有許多人尙未讀書，百二十人中有六十人左右在讀。本來三村想辦三個人民學校的，因本村無教員，請外村的又無給養，故不能辦三個。三鄉竹兆安村的

學校，學生只有二十一個人。

平民夜學校村村都有，每校有一教員，村中稍認識文字者充之，不要給養，教員白天在家做自己的事情，夜間去平民夜校上課。洋坊的傅濟庭，長窖的鍾得五，都是教員。學生多少不一。洋坊的有四十人。年齡不定，老的壯的少的都有。多數夜學有女子參加，佔全額三分之一。也有無女子的，如一鄉的茶干村，四鄉的侯逕村都無女子參加平民夜學。童團每個星期下三操，都在人民學校指導之下，『操得很好』。

四 糾察隊

工人組織糾察隊，每鄉一連，一個連長，一個政治委員。第二鄉的糾察隊有百零五個人。第一鄉洋坊、凌源、梨樹、茶石（即茶干）四村一共有一排，二十六個人。

五 紅軍預備隊

從赤隊、少隊兩個組織中挑選精壯勇敢份子組成的。每鄉二連，全區八連。每連人數幾十個到百多個。第一鄉的二連，每連有百零幾人。此次到新喻，第十區的八連人都到了。七月編成預備隊後，打七坊、打浪川、打贛州，及此次出發新喻，都歸預備隊負擔。預備隊出外，鄉村放哨由赤隊、少隊、童團擔負。預備隊回來，又幫同放哨。全區八連人組織一團，有團長，團政治委員，平時沒有營之設置。一鄉是第一、二連，二鄉是第三、四連，三鄉是第五、六連，四鄉是第七、八連，此次出發

新喻編成三營，一、二、三連爲第一營，四、五、六連爲第二營，七、八連爲第三營，有營長，營政治委員。連上有挑伕四人，伙伕八人，傳令兵一人到兩人，勤務兵一人，號兵一人（不會吹號），沒有馬。每連有兩個宣傳員，口講，手寫標語。營部無宣傳員，無副官，無傳令兵。團部有宣傳員三人，副官一人，傳令兵二人。三個營部跟團部住一起，共吃伙食。武器是梭標鳥槍。

六 區特務營

三個連，七月起編的，也是由赤隊、少隊挑選編成。選擇赤隊、少隊中更年青勇敢的份子編入，比預備隊好。有編制，有訓練，但不經常集中，平時仍在家中作自己的工。每月集中下大操三次，時間是初二、十二、二十二。有事調集出發打仗。現在一、三兩連出發打浪川去了，二連在家未動。器械主要是鳥槍，土造來福槍、土造大砲，沒有快槍，略有一點梭標。營部和區政府在一起，有營長，營政治委員。

七 紅軍獨立團

興國全縣一共編過三個獨立團，都送給紅軍了。也是由赤隊、少隊挑選出，成份與特務營一樣好，都是青年，並且是志願兵。

每團人數一千多。團營連都有長，有政治委員，在縣城集中訓練，聽候調遣編入紅軍。一概徒手無武器。

長岡鄉調查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切蘇維埃工作的實際執行都在鄉蘇與市蘇，這是人人了解的，但鄉蘇市蘇應該怎麼樣進行它們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鄉蘇與市蘇的工作，簡直就不能真正領導蘇維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決『一切蘇維埃工作服從革命戰爭的要求』這個問題。現在上級蘇維埃工作人員中我們遇到這樣的情形：發得出很多的命令與決議，却不知道任何一個鄉蘇市蘇工作的實際內容。同志們！這是不行的，這是官僚主義，這是蘇維埃工作的障礙！

我們的任務是提出了，從擴大紅軍到修橋築路的許多計劃也發佈了，問題是怎樣動員群眾去完全的實際的實行這些任務計劃。異常緊張的革命戰爭，要求我們迅速的普遍的解決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裏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於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於更高的任務與計劃。

現在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中發生了敷衍塞責、或者強迫命令的嚴重錯誤，這些蘇維埃同群眾的關係十分不好，大大障礙了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執行。另一方面，無數的下級蘇維埃工作同志，又在

許多地方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很好辦法，他們與群眾打成一片，他們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功。上級蘇維埃人員的一種責任，就在把這些好的經驗收集與整理起來，傳播到廣大區域中去，這樣的工作，現在應該立即在各省各縣實行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

這裏收集的長岡鄉的經驗，限於時間與報告人的材料，僅是他們若干項主要工作的概略的總結。但從這種總結已足引起我們的極大注意，已足使我們鄭重稱讚他們的工作爲『蘇維埃工作的模範』，因爲他們與群眾的關係十分密切，他們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發揚這些經驗，收集更多的經驗，供給一切落後的鄉蘇市蘇以具體的榜樣，使他們的工作提高到先進鄉蘇市蘇的地位，團結千百萬群眾於蘇維埃的周圍，爭取一切蘇維埃工作適合於粉碎敵人圍剿的要求，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 政治區劃及戶口

長岡鄉屬於江西省興國縣之上社區，是從本區榔木鄉劃出來的。

上社區工作的等第：長岡、榔木第一、楊澄第二、合富、秀水、塘石第三、仁田、上社第四。長岡鄉分爲長岡、塘背、新溪、泗網等四村。

戶口：

(一) 全鄉四三七家，一、七八四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三二〇。在鄉一、四六四（短伕及區鄉工作人員在內）。在鄉人口中，中農、貧農一、二八六，工人、僱農、苦力一〇二，地主、富農七六。

(二) 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當紅軍：八〇

一九三三年當紅軍：一三九

在游擊營：七

調縣以上工作：三四

調後方醫院工作：二四

調當長期伙子：三六

共三二〇

(三) 地主富農：

原有地主：二家，五人

原有富農：十一家，七二人

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

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石六斗，沒有查出別的富農地主。

二 代表會議

一 會議情形

議事日程經常是：1 開會；2 報告；3 討論；4 其他；5 散會。拿紙寫好貼起來。每次討論的具

體問題，則只主席自己開在紙上，不貼起來。『報告』：首先主席報告開會理由，講二三十句。接着區蘇的『參加同志』報告（差不多每次都有區蘇的人參加，部員來的多，十次有五六次；部長來的少，十次有二三三次；主席副主席不常來，十次只有一次），內容是政治形勢與工作情形。參加同志沒有說到的，主席與支書補充。『討論』，均是具體問題，例如十一月八日開的一次會議，討論了下列各項：

一、軍事動員。又分爲：（一）擴大紅軍：長岡村代表答應擴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應四人，新溪村代表答應三人，泗網村代表答應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二）優待紅屬：決定要模範耕田隊與勞動互助社一齊動員。（三）歸隊運動：本鄉有七個開小差的，決定要宣傳隊（鄉的，村的）突擊隊（紅軍老婆組織的）進行工作。（四）慰勞紅軍：每村答應毛巾四條，黃麻草鞋與布草鞋，長岡答應一一〇雙，塘背一〇〇雙，新溪九〇雙，泗網一〇〇雙。

二、經濟動員。又分爲：（一）經濟公債：本鄉承認銷五、四五六元，收到了穀子八二二擔，值四、一一〇元，又收到現洋一二七元，共收了四、二三七元，尙差一、二一九元沒有收齊，決定要各代表『拿出精神來』做宣傳，限十一月二十五日收齊。（二）合作社：消費合作社過去只區有，現在鄉組織支社，還只集股一百零幾元，但群眾已承認了三五〇元，決定要各代表進行收集的宣傳，宣傳隊也要出發。（三）節省運動：決定多種蔬菜以備春荒，把穀米節省起來。

三、修整河堤道路。決定限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天內，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長的大路，修六尺寬。修好後再修他路，四尺寬。選舉籌備員五人，於路修好後修那個一丈寬被水冲壞了的河堤。至於那座大木橋，則與榔木鄉合修。

四、『擁護區蘇』。爲了對第三次全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十一月十二日的開會表示全鄉群眾的擁護，

決定贈送紅匾一幅，一尺四寸紅布，寫四個字。十二日復動員全體群眾十分之九整隊去區蘇，要打爆竹（結果群眾去十分之八，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眾自己買了去打的）。

第二項是放在『其他』一項議程內討論的。此次討論的各問題，都是選舉大會中選民的提案交鄉蘇討論者。

二 檢查制度

兩次代表會議之中，一次是討論問題的，另一次是檢查工作的。

每次檢查工作的會議之前，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所屬代表開檢查會，由值日代表以其結果在代表會議上作報告，報告後，討論未曾做到的及做得不好的如何做到及改正。

此辦法開始於榔木鄉，長岡從榔木劃出之後採用這種辦法，後來楊澄鄉也採用了。最近區蘇召集了一個全區工作檢查會議，要各鄉都採用。

三 值日代表

各村代表數：

長岡村：五〇〇多人（分田時人數）十四個代表。

塘背村：四九〇多人，十四個代表。

新溪村：三〇〇多人，十三個代表。

泗網村：四〇〇多人，十四個代表。

各村工作等第：長岡第一，塘背第二，新溪第三，泗網第四。

每村一個『值日代表』，輪流充當，每人每次值十天，九月起實行的。九月前是『代表主任』制，指定一人專任。行了兩年後，以主任制有缺點：責歸一人，餘人不便練習工作，輪流則免此弊。但值日制（實是值旬制）也有缺點：代表弱的不能領導一村。

四 常委會

蘇維埃成立以來即有常委會。

主席、副主席、文書、中共支書、少共支書，共五人。必要時，值日代表參加。

五 代表領導居民

每個代表管居民二十幾人至五十幾人不等，如長岡村的代表李求應，他就是管五十多人的。

每個代表手中有一個居民冊，冊上分爲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隊（可當長伋），女少隊（可當短伋），男兒童，女兒童。男成年中又分爲在赤衛軍的（可當長伋）與不在赤衛軍的（可當短伋），女成年中也分爲在赤衛軍的（可當短伋）與不在赤衛軍的（可優待紅屬）。

六 代表的變動

沒有新劃行政區時的榔木鄉（七村，三〇〇〇人），去年十一月選舉代表七十多人，候補代表十人，共八十多人。其中女代表十六個，男代表六十多個。到今年十一月一日改選時，原選男代表只剩下五個，多數當紅軍去了，少數調動了工作，紅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個。每一代表去時，先天召集所管群眾選舉一人，名曰『代理代表』。

七 代表的政治表現

最好的百分之六十。

中等的百分之三十五。

最差的百分之五（四個）。

這四個最差的是兩男兩女，很笨，又不積極，十次會只到四次，到了也不聽事，更不發言。對群眾態度『粗』，群眾不喜歡這四人。七月把他們改選了。

八 女代表十六個中

最好的八個：尋工作做，又做得好。

中等的六個：不知尋工作做，交給工作就做，做不很好，要人幫助。

最差的兩個：交給工作也不做。

×

×

×

長岡鄉代表會議有許多好的創造，如常委會、值日代表、代表領導居民、檢查制度等，都是別地可學習的。但常委會應改名主席團（大鄉七人小鄉五人）。值日代表應改為代表主任，擇最好的代表一個月或兩個月一任，十天一換太頻繁了。會議討論的問題也很實際，但那個空洞的五條議事日程應取消，為什麼不把那張開列了具體問題的單子貼出來呢？長岡鄉的檢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執行與爭取速度，依靠這種辦法。最壞的代表應早些撤換，八個月後才改選，太遲了。代表調動了工作，即刻補選是對的，但不應稱為『代理代表』。

三 此次選舉

一 選舉委員會

九人：中共支書，中共婦女幹事，僱農支部長，手工支部長，貧農團主任及另一人，大隊長，鄉代表二人。支書為主任。九月組織的。

縣蘇原定九月底選舉，兩次改期，第二次決定十一月初。

二 選舉宣傳

講過去階級未分清楚，現分清了，故要選舉。還講了爲打破圍剿，爲檢閱工作使更進步，故要選舉。

三 選民登記

四村各造冊，由代表負責登記所管居民，交於選舉委員會發榜公佈：有選舉權的一張，十六歲以下無選舉權的一張，地主富農等無選舉權的一張，前二張紅，後一張白，四村及鄉蘇門外各貼這樣的三張。選民冊二月本已造好，但把工人家屬不算作工人成份，上月改正過來，重新公佈。對於『工』『農』選舉代表標準的分別，群眾中有生疑問者，正確了解『工人領導』這個問題的，全鄉不足十分之一。

四 選舉單位

四村每村一選舉單位，另一工人單位。

五 工作報告

分兩天開選民會（十月十九、二十兩天），第一天兩個村，第二天兩個村。主席報告長岡、塘背兩村，分兩天出席的。副主席（支書兼）報告新溪、泗網兩村，也分兩天。

報告分軍事動員、經濟建設、其他工作，共三項。

報告後，選舉候選名單。也曾提出要到會群眾批評鄉蘇工作，但無批評者。

六 候選名單

十月十九日支部幹事會開會，各村都有人到（共到十一人）。按照各村工農人數比例，擬定一張五十五人的名單，恰如應選代表之數。然後提交各村黨的小組會、工會、貧農團去討論，由各小組黨員在工作報告的選民大會上起來提議，通過，省去了選委準備名單的手續。

名單公佈，四村及鄉蘇門外各貼一張。

公佈後三天即選舉。

七 選舉大會

時間：十一月四日。

工人在鄉蘇開會，到了百分之九十，餘是病的未到。農民分四村開會，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上午開會，選民進門畫一『到』字於寫好了自己名字的一張表上（表二十四格，縣蘇印發，寫二十四個選民的名字）。一人守門，門外有小孩子看，也有進來的。地主富農知道沒有份，無來者。

程序：選舉委員報告，鄉蘇主席報告，區蘇參加同志報告，問選民有意見沒有（沒有），依候選名單逐名介紹表決（無否決者），討論提案（有人提議全鄉十六歲到四十五歲無疾病者全體上前線，

多數通過。此外，如十一月八日代表會議所討論的『軍事』『經濟』『堤路』各案，都是此次選舉大會提議的。）

上午十時到齊開會，下午四時散會，『精神很好』。

八 代表成份

五十五個代表中，最積極的三十六個，中等的十九個，最差的尚未發現。各代表中，老代表連選連任佔十分之六（三十多個），新當選的十分之四。

九 選舉後的代表會議

選舉後第二天（十一月五日）上午，第一次代表會議，選舉主席、副主席、文書，選舉出席區大會的代表（十人）。區蘇有三個同志參加這次會。第五天（十一月八日），開第二次會議，討論選舉大會的提案（見前）。

x

x

x

長岡鄉此次選舉的缺點：（一）宣傳沒有指出蘇維埃是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權，是群眾最重要的權利。（二）候選名單人數恰如應選人數，沒有比應選人數增加一倍，因此群眾對於候選名單沒有批評。選舉委員會在組織候選名單問題上沒有起什麼作用，只有黨的活動。（三）工作報告會議上沒有盡力發動群眾對鄉蘇工作的批評。除了這些缺點之外，其餘都是成功的。

四 鄉蘇下的委員會

以下是群眾團體。分村鄉兩級，村五人，主任即爲鄉之委員。鄉五人的多，因村有委員會；但七人、九人、十一人的也有。

一 擴大紅軍委員會

七人，內三人是代表。討論『擴大』『優待』『慰勞』『歡迎』。

慰勞隊（七人，有隊長，內四人是代表，一男三女，其他三人一男二女）挑着花生、豆子、蔬菜、草鞋去醫院，去縣城，有一次去黃陂小布，慰勞紅軍。

二 土地委員會

七人。

九月查田運動時還開了幾次會，爲前月查出的三十六石田加以處理。後來沒有開會了。應改爲農事試驗場管理委員會，場內附設農產品展覽所。

三 土地登記委員會

五人，每村一人，主任常駐。七月組織的，做了兩個月，登記完畢，取消主任的伙食。辦法：到各村問各代表，登記起來。代表不曉得的，便到那家去問。八月不明表格內容，登記不完備，延長一個月，登記好了。

四 山林委員會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種植、保護。種了些樹，山壤，不發達。應種在河旁、路邊、屋邊。私山如砍樹多，要問過山林委員，少則不問，沒有規定尺寸。

五 建設委員會

五人，指揮『水利』『橋樑』兩委員會。

六 水利委員會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

七 橋樑委員會

五人，管橋路之修理。應稱橋路委員會。

八 國有財產委員會

五人，雖有，不了解作什麼工作。

九 倉庫保管委員會

管公債穀及紅軍公田穀之保存。

備荒倉亦歸宅管，將沒收的三十六石田的穀拿來備荒，共十多石。

一〇 沒收委員會

三人，管罰款捐款。

九月起罰地主九元，捐富農二二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餘元，少的十元）。

過去把富農田地、山林、房屋、耕牛、農具一概沒收了，只分了些壞田破屋給他們，沒有分山。

現富農耕牛農具須向人租，富農的現款過去『罰』的也有，現在罰的也有，無所謂捐。現在富農家況比僱農差。

（應該指出：長岡鄉對富農的政策是錯誤的）。

一一 查田委員會

九人，現沒有了。

一二 教育委員會

九人。

一三 衛生委員會

五人，四月組織的。

一四 防空防毒委員會

五人，十月組織的。開了四五次會。

一五 籌備委員會

爲開紀念會而設。

×

×

×

長岡鄉的『村』委員會（許多的委員會在村都有），使蘇維埃連結了更廣大的群眾，這是蘇維埃工作發展到高度時的很好的創造。因爲村有了五人的委員會，鄉的委員會許多也只要五個人就行了。而鄉的每個委員會的五個人，其中四個就是四個村委員會的主任，這樣把工作組成了網，對於鄉代表會議的工作的帮助是極大的。但長岡鄉同志把這些委員會看做如同工會貧農團等一樣的群眾團體，而不知其是蘇維埃組織的一部份，這是不妥當的。其中『建設委員會』可取消。『土地委員會』在興國這種土地鬭爭深入了的地方應改爲農業試驗場委員會。此外應增加『糧食』『戶口』『工農檢察』『赤色戒嚴』等幾個委員會，這些，在中央政府頒佈的『地方蘇維埃組織法』上面，已經規定了。

五 地方部隊

一 編制

1 男赤衛軍一排

二十四歲至四十五歲。此年齡內的男子，全鄉共六十六人，除主席、文書兩人及重病殘廢等未編入的全鄉約二十多人外，全鄉都編入，計四十六人。

排長、副排長各一，班長、副班長各六，旗一面。

2 女赤衛軍一連

年齡同前。此年齡內女子，全鄉共一四六人（超過男子一倍多）。除病殘的二十多人外，一律編入，共一二〇人。連長、副連長、政治指導員各一，排長、副排長各三，班長、副班長各九，均女子，旗一面。

3 少隊一大隊

男女合編。十六至二十三歲的，全鄉男二十一名，女八十名（四倍於男），共一〇一名，除病殘（風脚等）約十五名未編入外，一律編入，共八十六名。

大隊長、副大隊長各一。下分男的一排，女的兩排，各有排長、副排長。

二 訓練

1 排操

村爲單位，每月兩次，赤少分開，男女合操。

教練人：長岡女副連長，塘背女連長。少隊的是一個女子、三個男子。操目：立正，稍息，左右轉，插當子，正步，跑步（女子少），散兵，野外（三四里遠）。

武器：多數梭標，少數木槍。

政治課：先操後講，講者政治指導員。講革命形勢，帝國主義，赤軍任務等，無一定教材，『隨便講一下子』。

時間：下午，大約二時至六時，操二點半，講一點半。
到操：平均能到十分之七。

2 連 操

鄉爲單位，每月十五號一次。

操目：各排操法，看那排好，檢閱排操的成績。

政治課：操完，指導員講政治形勢。

時間：下午四個鐘頭。現冬天天冷，又較閒，改上午。

三 勤 務

1 運輸工作

男子當長伕（四十五歲以上未編入赤衛軍的則當短伕）。

女子當短伕（挑出一部份去城內、高興圩、茶嶺等處），女子還有救護（挑出一部份組織救護排，準備着，無工作）及洗衣（組織洗衣隊，每村挑出十多名，無小孩子累贅的，去簪箕窩的補充師及教導隊，洗了好幾次，去茶嶺洗了兩三次）的勤務。

2 晚上放哨

長岡、塘背、泗網共三個哨所，每夜一班，五人或六人一班，赤少各派幾人，輪流担任，班長或副班長負責。一人站哨，餘人睡覺。問口令（答『老百姓』），講出自己的名字，去何地，做什么事，其實群眾並不知口令），查路條（別鄉過路的），未曾捉到什麼壞人。

3 白天檢查

三個人負一天責任，一個赤軍，一個少隊，一個童團。有人過，一個看路條（童團），一個盤問他（赤軍或少隊），必要時送信。塘背哨所捉到四五個逃兵，送區。『老百姓』捉到一個無路條的（當他走山上小路過時），別縣人，兇得很，疑是偵探，送縣。

4 防空

本鄉防空防毒委員會指導群眾防空，注意下列各事：
飛機來了不要亂跑。

挖飛機洞，可以幾家合挖一個，在做，尚未做好。

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演習野營的回來說：用木炭屑裝巾封鼻。

每村一個號砲所，都設好了，每所兩個專人負責，一人外出必一人在家，準備着放號砲。

一切青年成年的勞動群眾都應組織到赤衛軍與少先隊中去，並且加以好的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一方面保衛地方，一方面準備上前線，這是蘇維埃在國內戰爭中的重要任務。長岡鄉在這一個方面也是成功的。

六 群眾生活

一 今年碰着飢荒

今春蒔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眾缺糧，要向東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遠地方辦米。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個月糧，每人每年需穀五石，月計四斗，全鄉一、五〇〇人的百分之八十爲一、二〇〇人，一個月糧計四八〇石，都從遠地辦來解決了，無餓飯的。

二 明年則不怕

今年春耕雖好，因蟲，秋收不好，只等於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種蔬菜胡豆雪豆與油菜。三，去年秋收後群眾曾把穀子大批賣給商人，每石價僅二

八〇〇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錢用，抓緊些少糶出點是可以的，但沒有注意到。今年開了全縣的會，議定非四元不賣給商人，並應少賣。四，去年秋收後供豬供雞鴨浪費許多，今年供的少了。五，去年一二兩期公債，買兩元須費去二石半穀，今年經濟建設公債，買十元還只須交穀二擔。因此可保證明春不荒。

三 油有多餘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點木子嶺又有些木油。油不少，還有多餘。

四 豆子可以換鹽，但食鹽量大減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勻，去年則幾家全受水害），豆價也好（去年每石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換全鄉食鹽百分之六十。餘百分之四十，可以多餘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換。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須鹽四錢（月十二兩），今年七月減少一半只二錢（月六兩），十一月三錢多一點（月約十兩）。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這是國民黨的罪惡，衝破封鎖才有鹽吃）。

五 吃肉貧農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豬』的人家約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約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豬賣價約值二十元，買

進猪肉約十二元，餘八元。但在暴動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買進猪肉約十元。以階級分：暴前中農買進猪肉約十二元，貧農約六元，工人約四元，現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份人無此數）。過去不說逢圩，即過年過節也吃不到多少肉。現在不說過年過節，每次逢圩大家都要買點肉吃了。

六 鷄鴨多數自己吃，過去則多數賣出

七 生活好起來，柴火少出賣

柴火本地不缺。過去挑柴火去城裏賣的多，現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許多人不需賣它了。

八 衣增一倍

衣服一切算在內，平均每人每年需新製一套單衣褲。中農過去、現在無甚改變。貧農、工人則現在較過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現在製二元衣服，過去則只能製一元。

九 僱農的生活改良了

僱農全鄉約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貧的貧農要好些了，因為分了東西。本鄉地主只二家，沒收

了富農的（十二家）不少，從城市又分了好些來。十分之四則同於貧農。

一〇 中農尚留在原地位

一般說來，中農生活與過去差不多（蘇維埃應該注意中農生活的改良）。

一一 群眾的休息與勞動

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因出外的多，鄉間勞動力減少，群眾的勞動強度還是同於暴前，但勞動的意義不同了。

x

x

x

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於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鬥爭。應該明白：長岡鄉在戰爭動員上的偉大成績，是與他們改良群眾生活的成績不可分離的。

七 勞動力的調劑與耕牛問題

一 模範耕田隊

四村各一隊，共約七十人，紅軍家屬有勞動力者組織之，每隊一個隊長。隊下分小隊，比如長岡村模範隊二十多人。分三小隊，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隊管其附近幾家或十幾家，經常注意使這些人家的生產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時組織的，作用是調劑勞動力。

辦法：勞動互助社幫紅軍家屬耕田（不要工錢），模範隊則幫群眾耕田（要工錢）。比如某個互助社社員正要幫紅屬耕田，而他自己家裏的田又正待耕，模範隊便派人帮他耕，或者代替他幫紅屬耕田，由他出工錢與模範隊員。這樣來調劑勞動力。因此模範隊須與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聯系。

二 勞動互助社

四村每村一個，除紅屬外，凡有勞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鄉社員三百多。

全鄉人口中：

全勞動的百分之十（在全鄉總人口中約佔一五〇人）。

半勞動的百分之二十（約三〇〇人）。

附帶勞動的百分之三十五（約五二五人）。

無勞動的百分之三十（約四五〇人）。

前二項共約四五〇人。大部份加入互助社。

全鄉出外的三二〇人（內二二六人當紅軍，九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幾個人屬於半勞動外，全部都是『全勞動』的，此數對於現留的『全勞動』一五〇人。為百分之六十八對三十二之比。因此，勞動力的有組織的調劑，成為生產上的中心問題，因此群眾熱烈的歡迎勞動互助社。

互助社的工作是優待紅屬，社員互助，與幫助『孤老』，均完全達到目的，紅屬的田一般耕得好。其辦法如下：

優待紅屬：本鄉紅軍家屬，緊時，平均每家每月須幫助約二十五個工，平時，平均每家每月須幫助約十個工。群眾勞力多的多幫助，少的少幫助，無的不幫，女人帶了小孩子的也少幫。大概緊時全家有勞動的，須幫出十三四個工，一個勞動力的須幫出六七個工，半個勞動力的幫一工兩工做輕便工作。應該幫助多而少幫了，則須算給工錢於多幫的。比如緊時甲家每月本應幫紅屬七工但只幫助五工，乙家應幫七工而幫了九工，則甲家應算給兩個工的工錢給乙家。

社員互助：工數對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錢於多做了的。

幫助孤老：只要吃飯，不要工錢。

以村為單位全盤計劃生產，調劑人工。

每個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錢（拿錢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工價：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〇〇文（如打禾），其次六四〇文（如割禾、挑桿），最低三二

○文（如拿禾、點豆）。七月間全社員大會議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價：開頭八百文，緊張時一四〇〇文為最高工價。

減低工資：僱農工會是贊成的，他們因為分了田更欠人工。勞動力多的也不反對，他們因為優待紅屬須幫工多。

互助社委員五人，內主席、組織、宣傳各一，受鄉的秋收秋耕委員會指導。

×

×

×

勞動互助社在農業生產上的偉大作用，長岡鄉明顯的表現出來了。根據於群眾的願意，以村為單位統籌生產，一切地方都可實行，特別在擴大紅軍數多的地方。必要時還可以鄉為單位、甚至區為單位統籌，上杭才溪區就是這樣做的。耕田隊可以合併到勞動互助社，使組織上統一起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動員女子參加生產。長岡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全部青年成年七三三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去了三二〇人，在鄉四一三人，其中男子只八七人，女子竟佔三二六人（一與四之比），因此長岡鄉的生產，絕大部份是依靠女子。長岡鄉提出了『婦女學習犁耙』的口號，女子已是成群的進入生產戰線中，這證明有組織的調劑人工與推動女子參加生產，是不可分離的任務。長岡鄉擴大紅軍如此之多，生產不減少，反增加了，即因為他們把這個問題很好的解決了。

三 犁牛合作社

九月間開始組織的，每村一個，剛才進行，尚未弄好，入社的不多。五個人的委員會。平均百家中，有牛二十五頭，全鄉共有牛百一十頭。

一家二牛的無。

在有牛人家中，一家一牛的佔百分之五十（小牛多，十幾元一頭的）。

二家一牛的，百分之十五。

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百分之三十。

五家以上共一牛的，百分之五（有七家共一牛的，大水牛）。

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五，全鄉四三七家，無牛的約一〇九家。犂牛合作社尙未討論如何解決。辦到了禁止殺牛，牛老牛病應殺的，報告鄉蘇派人去看，准殺才殺，無敢故意弄死者。

×

×

×

在現時的農業技術條件下，耕牛的作用僅僅次於人工。根據瑞金石水鄉（無牛的百分之三十），興國長岡鄉（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鄉（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三處的材料，可以知道農民中完全無牛的，平均要佔百分之二十五，這是一個絕大的問題。解決方法，莫妙於領導群眾組織犂牛合作社，共同集股買牛。辦法是在自願原則下（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每家照分田數每石穀田出穀二升至三升。例如長岡鄉每人分田六石二斗，無牛的一〇九家，平均每家四人，共四三六人，分田共二七〇三石，每石三升得穀八十一石，每石五元得錢四〇五元，以二十元買一牛計，得二十頭，每牛耕田八十石，共可耕田一六〇〇石，對於二七〇三石，已解決了一大半，明年再出兩升即可完全解決。而租牛每年每石穀田即須出牛租五升。這一辦法，是石水鄉群眾提出來的，他們已在實行，我們希望各地都能實行，不但解決貧苦農民一大困難，對於增加農業生產更有大的意義。

八 公債的推銷

公債發行委員會五人，每村另有一個主任。

鄉主席到縣到區開會認銷五〇〇〇元，後又加認四五六元，共五四五六元。

鄉主席回來召集代表會議，由各村代表承認本村的銷數。

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本村群眾開大會，事先各代表及宣傳隊向群眾做個別的宣傳，屆時領導群眾來開會，講明購買公債的意義。當場各代表及各團體的負責人首先認購，群眾跟着認購，席上登記起來。沒有銷完。

各代表及宣傳隊，對那些未買的及買得太少的，按家按戶作宣傳。『今年這樣多』，有些群眾不了解，把去年穀價（買兩元公債要拿出穀子兩石半），今年公債（買十元公債還只要拿出兩石）比給他們聽，把合作社利益（集了股的分兩次紅就過了股金的頭，不會集股的無份）講給他們聽，把敵人封鎖與經濟建設的意義講給他們聽。

再開全村大會。加銷一部，尚未銷完。

再做宣傳。

開第三次全村大會。又加銷一部，仍未銷完，但所餘不多了。

再做宣傳。

開第四次全村大會，全部銷完。

共銷五四五六元，此數對於全鄉一四六四人平均每人買了三元七角多。最多的買了四十五元（一家），買三十元的五六家，二十元的很多。一二元的極少，只十家左右。五角的無。『孤老』等不買的也有十幾家。『群眾完全滿意』。從開始至銷完爲時十五天。

×

×

×

長岡鄉工作的特點，在於能用全力來動員群眾，用極大的耐心去說服群眾，結果能完全實現他們的任務，並且爭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銷公債不過一例。長岡鄉五千餘元公債的推銷，全是在會場認購，全不按家去銷，全是宣傳鼓動，全不強迫攤派，經過四次個別宣傳，四次全村大會，而從開始至銷完共只有十五天。別鄉則有銷數比長岡鄉少至五倍六倍，反在強迫攤派，銷了兩三個月還不能結束者，拿了同長岡鄉對照，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九 合作社運動

起始於一九三一年三次戰爭結束後榔木鄉（長岡鄉那時屬於榔木）的古林村。本村群眾以每股五角爲單位，集了八十多元，開始做生意，有成績。一九三三年一月，改爲榔木鄉合作社，沒有增股，貨比市上便宜，得到群眾歡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塊錢生意，賺了錢。去年九月，區社成立，全區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鄉社歸併於區。

職員：村社時代，社長（李奎應，後任鄉社區社縣社的社長）、採辦（李某，後任鄉社區社縣社的採辦）、會計、營業（王仁森，後任鄉社區社的會計）各一人，吃社內飯，無工錢。改鄉社時，決

定每人月給工錢三元，但三人不受。

貨從茅店直接辦來。

村社鄉社時，社員及紅屬買貨，每千文減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員不減，但照市價實際上便宜些，一串錢貨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十。區社今年十一月改爲鹽布每串錢減二十（因鹽布貴，賺錢少），他貨仍減五十，非社員照市價，此時一百元生意約賺二元。

區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錢賺了六〇〇多元，以百分之五十爲公積金，百分之十爲營業者及管理委員審查委員的獎勵金，百分之十爲文化教育費（爲俱樂部、學校及紅屬兒童買紙筆），百分之三十分紅。爲了增發紅利，鼓勵社員，臨時將教育費取消（以後應該恢復），共分紅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錢。分紅時，清算賬目，懸榜公告。分紅後，增加了許多股本，今年七月時，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紅，每股分五角，實發三角，二角作爲增股。決定改股金單位爲一元，每人不得超過十股。

管理委員會十一人，審查委員會七人。

現定鄉設支社。長岡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開始營業中。

縣總社八月成立，也在開始營業中。

古林村合作社爲全縣合作社首創，又辦得最好，有模範合作社之稱。

本鄉糧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穀子抵交的多（每石五元）。集中在長岡村一個倉裏。還未開始營業，組織了管理委員會。

×

×

×

每個鄉每個區都要學習長岡鄉與上社區的消費合作社！

一〇 文化運動

一小學

列寧小學，四個，每村一個，各有校長、教員。

學生：長岡五五，塘背五三，新溪三三，泗網四六，共一八七，佔全鄉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六十五。餘百分之三十五，不是父母不要他們去，而是他們自己好玩不肯去，學生去『捉』，捉來有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罰餓飯的也有個把——那是『又大又蠻』的，學生之間自己發動鬭爭，『精神很好』。那些頑皮小孩來讀的時間少，不來讀的時間多，父母送他們出門，『他們溜到山上打仗去了』（懲罰的方法有些是不適當的）。

均分甲乙丙三班。

學生年齡，七歲至十三歲。也有十四歲十五歲的，則因生產忙，只讀半天。

遠的帶中飯，近的回家吃。

書紙筆墨，學生自備。

教員盡義務，但勞動互助社帮他耕田，等於一個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教員自己不肯說，代表會議決定優待（鄉蘇常駐人有優待，代表及群眾團體負責人不脫離生產的無優待）。合富、秀水兩鄉，則

由學生抖米（抖，集合之意）給『老師』吃，月抖兩斗米。楊澄鄉又是一個辦法：比如某村有一小學，鄉蘇准許群眾中推出兩個人（要是五十以上不能當長伕的），去開長担（開担即挑担，開長担即經常挑担）做小生意，賺了錢供給『老師』伙食，其數照鄉蘇辦事人例（鄉蘇每日九分，老師也九分），鄉蘇則對此兩人不派一切勤務，由這兩人自願承認。

教員多是『文墨不深的』。

二 夜 學

全鄉九個：長岡三，塘背二，新溪一，泗網三。

學生平均每校約三十二人，九校共約三百。男約百分之三十，女約百分之七十。全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青年成年共四一二人，大多數進了夜學，五十四歲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數來讀的。群眾非常歡迎，說：『夜學頂好』。

各校均分甲乙丙三班。

燈火，少數是自己帶去，四人五人共一盞燈。多數就夜學設備的一盞木油燈，十多二十人共在這盞燈下讀，每月每人出二個或三個片。

書紙筆墨自備。

教材：

甲班，讀報，算術。

乙班，成年讀本。

丙班，兒童讀本。

每校一校長，一教員。校長可不識字，只要熱心，學生沒有來時，『請校長來指示』。校長也來讀書。校長『老同志』多。九個夜學校長，女的佔五個。教員無女子。九個夜學教員，七個是鄉蘇代表，都是盡義務的。

三 識字班

小孩子累贅的，『更多年紀的』，家裏人太少離夜學又遠的，這些人編入識字班。

編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爲一組，舉一組長——稍識幾個字的，組長多屬夜學學生。

教法：隨時，隨地，隨人數，乘涼時，喝茶時，一個人，三個人，五個人。起初，畫地爲字，隨後各立一簿，學寫起來，字從『桌椅板凳豬牛雞鴨』寫起。各人簿子，大約十天由組長收齊，送『夜學老師』看改，『寫得多寫得好』的給以口頭誇獎。字，組長有不曉得寫的，問夜學老師，夜學老師有不曉得的，問日學老師。

用此辦法，過去不識字的，現在都識得四五十個字了，少數能識七八十個。

此辦法今夏開始實行，識字班的組織則去年就有了。

識字牌：每村一塊，釘在路旁屋壁。牌上繪圖寫字，兩天三天一換。一天一換或四天五天一換，間或也有的。每次，少，兩個字，多，三個字，沒有不繪圖的。日學老師負責。此法效大。

四 俱樂部

全鄉俱樂部四個，每村一個。

每個俱樂部下，有『體育』、『牆報』、『晚會』等很多的委員會。

每村一個牆報，放在列寧小學。十篇文章中列小學生約佔八篇，群眾佔兩篇。俱樂部都有新戲。

×

×

×

每個鄉蘇維埃都要學習長岡鄉的文化教育工作！

二 衛生運動

一 辦法

長。

將居民編爲衛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爲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雖規定五天大掃除一次，實際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要督促，『不督促記不到，工夫又多』。

二 工作

(1) 掃除：廳堂睡房，不要放灰糞，前後水溝，去掉污泥，坪場，打掃光潔，公共的水溝坪場，則輪流疏掃。(2) 飯食：還只說到禁吃死東西。(3) 衣服：要洗潔。以上各項，不做的，發動童團恥笑他，特別那些衣服不潔的。文明戲中也唱了衛生運動。

三 成績

四月起，頭一次『蠻好』。隨即懈下去，五六兩月全沒做。鄉蘇發現了，批評了衛生委員會主任，重新召集衛生委員會（鄉衛生委員會外，還有各村的衛生委員會，鄉、村均五人）開會，號召各村競賽。『看那村做得較好』。七月督促實行，四個月來大有成績，比前清潔了一倍。

四 輿論

『紅軍共產黨什麼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員真正顧樂（愛惜的意思）我們！』但也有少數人說：『開窗戶，沒有病死要吹死！』還需要做深入的宣傳。

x

x

x

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

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

一二 社會救濟

互濟會鄉委員會五人（內主任、宣傳、組織）。

村無委員會，有一主任。下分小組。

會員六一一。全鄉只有約二十家沒有加入互濟會，這些多屬『孤老』。月費一片，無不交的。

工作：

一、慰勞紅軍。

二、募捐救濟難民，援助反帝。今年有過二次，一次是七十多個信豐難民到興國城（榔木鄉時），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東北義勇軍，也是榔木鄉（那時人口二、九〇〇，會員約八〇〇），捐了四十多串。捐數五個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數，約佔會員百分之六十。五片的，一串的，各只幾人。

三、鄉裏火燒了房子的，失業工人生病無藥的，募捐救濟。今春一家失火，燒了一間半屋，捐了六串多錢給他。

四、救濟饑荒。今夏榔木鄉有三四個人餓飯（過去乞丐，現還很窮），請求區互濟會發錢發米救濟，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發了三四次。

五、救濟紅軍家屬。紅軍家屬中生病困難的（無餓飯的），今夏一次募了十一串多錢。又四月間，由合作社借出本錢，給群眾中自願的幾個人，拿去辦米，挑往橋頭、江背洞發賣，賺了百多串錢，接濟紅屬中病困者。經手的群眾，除賺食外，一點多的不要。

×

×

×

在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不注意社會救濟工作，許多地方的互濟會只知收月費不知救濟群眾困難的情形下，長岡鄉蘇維埃與互濟會的社會救濟工作，是值得讚揚的。長岡鄉是在最具體最實際的解決了群眾中的每一困難問題。

一三 婦女

女工農婦代表會每村一個主任。由各個村的主任及一個婦女指導員，組成鄉的女工農婦代表會的主席團。全鄉代表四十三人，長岡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網十一。去年十一月開始組織的，今年三月改選一次，九月第三次改選。各村七天一次會，都按期開，每次僅個把人缺席（小孩累贅等原因）。代表分開負責，每個管五家至十家，六七家的最多。

第一次創造時的選舉，是由鄉蘇代表負責，村為單位，召集所有十六歲以上的勞動婦女開會，此次到會者各村平均十分之六。按住所接近，幾家（不等）選一代表。這次各村選的代表數，較現時略少。這時，婦女們還不了解婦女代表會的作用，不十分踴躍，代表選出後，少數亦不大積極，代表會無主席團，只一主任，村則主任亦無。

今年三月，第二次改選。辦法同前，但由婦女主任主持，各村的鄉蘇代表只參加幫助。規定了各婦女代表負責管照的家數。規定鄉組織主席團，村設主任。

九月，第三次選舉。改變辦法，不開全村婦女大會，由各女代表召集所屬各家婦女開會選舉，各村的鄉蘇代表仍然參加幫助。

第一第二兩次選舉會，僅選舉代表，未討論問題。第三次討論了『擴大紅軍』『慰勞紅軍』『優待紅屬』『婦女學習犁耙』『婦女拿銀器買公債』等問題。七天一次的代表會上討論的問題，曾討論到婚姻問題，說『要正確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講口就離婚』。在今年選舉運動時，討論了婦女的候選名單。但其他婦女切身問題，如『婦女病問題』『小孩子問題』『婦女教育問題』等，沒有討論。

本鄉離婚無不自由的。

丈夫罵老婆的少，老婆罵丈夫的反倒多起來了（應該彼此都不罵）。

完全不打小孩子的，現在還沒有，但打的時候少了（應該完全不打）。

小孩子現在也聰明得多了，如父母打罵，過去反口的少，現在多起來了（父母不打罵，小孩子也不會反口）。

約百分之一的婦女，暴後四年半中結過三次婚。秘密戀愛的，暴前約佔百分之五十，暴後減少至百分之十，今年更減少了。一分了田，二離婚結婚自由，三則革命工作忙。

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邊』。髮，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髮的。老婦未剪的約佔女子百分之二十。

群眾中，過去（暴前）相打罵的事，時有發生，講口的更不少。現在，相打絕跡，講口也減少

了。過去講口，無人解釋，即使有人勸解，『心裏總不易散』，現在一講口，便有代表出來解釋，『心裏即刻散了』。現在講口，多是那些年紀較老的同志們，他們開會較少，對革命工作不大明瞭，要他們去優待紅軍家屬，間或講起口來。但明瞭的積極的佔多數（百分之七十），少數不明瞭的，『老婆太』爲多，『她們總是不肯去開會』。

去年以來，『老婆太』敬神（裝香供飯、求神拜佛）的，完全沒有了，但『叫魂』的，每村還有個把兩個。迷信掃除得這樣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兒童團少隊的反迷信宣傳，蘇維埃的節省香燭錢運動，第二。兒童團（特多）少隊的直接干涉（抹掉她們的香燭），第三（應該拿說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雖不敢公開敬神，心裏還是信神，這些人多屬沒有兒子的。

x

x

x

婦女在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力量，在蘇區是明顯的表現出來了。在查田運動等各種群眾鬥爭上，在經濟戰綫上（長岡鄉是主要靠她們），在文化戰綫上（許多女子主持鄉村教育），在軍事動員上（她們的擴大紅軍與慰勞紅軍運動，她們的當短伕），在蘇維埃的組織上（鄉蘇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現她們的英雄姿態與偉大成績。這裏女工農婦代表會的領導與推動，是緊要的關節。女工農婦代表會，首先應該抓緊婦女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跟着這些問題的動員，聯系到一切政治的動員，在這一點上，許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夠的，就是長岡鄉也還缺乏充分注意。每個鄉蘇維埃，都應該把領導女工農婦代表會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一四 兒童

童團委員會，鄉五人，一個書記。村的，一個主任。

七歲至十五歲的入兒童團，百分之八十加入了，未加入的多是七歲（因小）及十五歲的（因入了少隊，本應十六歲才入少隊，但有些『肯長』的加入得早），未加入的，女孩較多。

工作：一、做擴大紅軍與歸隊運動的宣傳（宣傳三四次不去才笑他，本鄉歷來無恥笑隊）。二、競賽着檢狗糞入『肥料所』，割草皮入『肥料屋』。三、交月費一片，慰勞紅軍。四、節省運動——少吃果子，多買公債，五角、一元、二元、三元的都有，買五角的多，百分之六十的兒童買了公債。五、做遊戲，下操，到操場上練習打仗，逢星期日一次，訂立了課目。六、最大多數入了列寧學校。兒童團的紀律嚴得很，有些頑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師，只服兒童團的紀律，罰掃地，罰禁閉，總是『服理服輸』（應該多用說服，少用懲罰）。

過去九歲十歲的小孩，爲地主富農看牛，現在沒有了。過去，兒童不論在家或幫人，每天勞動時間總在十小時以上，同於一個大人，可說全無休息與受教育的時間。現在，每日大部份時間受教育，做遊戲，只早晨約一點半鐘看牛，或做別事。農忙時，則勞動時間較多些——向老師請假，助父母作工。過去，受父母打罵，現在，受打罵的很少了。

一五 工人

木匠：失業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資每日五百五十。

裁縫：大部失業，工資每日四百。

泥水：失業十分之三，工資每日五百五十。

篾匠：失業十分之一，工資每日四百。

理髮：增加十分之一。剃頭的，每人一年出穀八升。

零工：工資平時每天四百（二毛），緊時八百（四毛）。

一六 貧農團

鄉的委員會，三人（主任、宣傳、組織）。村的委員會，五人。今年七月，會員二七一，十一月，增至三八六。

過去，『有事就喚貧農團』，但沒有注意健全其組織。

今年查田運動中（七月），把組織整理了，村設了委員會，發展了會員。

七月前，甚至兩個月不開一次會。七月後，村貧農團五天、十天、或半月開一次會，看工作需

要。鄉的每月一次，討論的問題：『查階級』『會員每人節省一毛二』『發展會員』『健全組織』『發展生產』『罰款捐款』。關於擴大紅軍，優待紅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則只向會員作報告，鄉代表會對這些工作有決議時，提到貧農團會上來『發表』，沒有什麼特別討論（應該討論）。不收月費。

村下分小組。

×

×

×

在一切查田運動沒有深入的地方，貧農團特別重要，鄉蘇維埃要負領導之責。貧農團村應有委員會，應以村為單位開會。鄉為單位的會可減少，長岡鄉的辦法是對的。

一七 宣傳隊

鄉一宣傳中隊，七人，一個隊長。每村一宣傳小隊，大村（長岡，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網）三人，有小隊長。為『擴大紅軍』，『經濟建設』，『紀念節』等做宣傳。

宣傳的方式：一、個別宣傳，此項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眾討論工作時去作宣傳。三、區縣開紀念節大會時向群眾宣傳，也向別鄉別區的『隊伍』做宣傳。

鄉蘇七天召集隊長小隊長共五人開『宣傳會』一次。區蘇召集全區宣傳隊長開會，每月至少兩次，有三次。每次時間至少四點鐘，會畢回家吃飯。

全鄉隊長隊員二十三人，女的佔十分之六。均『較會講的』，不一定要識字。

不更換，調動工作時才補人。專門研究宣傳材料與宣傳方法，『烏嗎（怎樣）能使群眾更了解』。今年二月起組織的。

一八 突擊隊

鄉蘇下五人，一隊長。村則長岡、塘背、新溪有突擊隊，泗網沒有。

紅軍老婆組織的。

那一村工作做不動，別一村的突擊隊去檢查幫助，把別村如何做動的方法告訴他們。鄉的也一樣，看那一村做不動，就去檢查幫助。

比宣傳隊工作少，不顯大作用。

鄉蘇召集她們開了三四次會。

八月起組織的。

×

×

×

宣傳隊與突擊隊的辦法是好的，各鄉都可以組織。

一九 革命競賽

競賽的辦法，從今年春耕運動做起的，比賽『較早』『較好』『無荒田』三項。這次是全區各鄉

競賽，各鄉主席在區蘇開會決定的。本鄉則各村競賽，召集各村值日代表開會訂定。每村由各個代表競賽，值日代表召集各代表開會訂定。沒有要各家訂立競賽（也可訂立）。條約上寫明如下各項：競賽項目的最高標準，某村與某村競賽，獎品的種類及數目（分爲第一等，紅旗；第二等，信紙百張；第三等，信紙五十張），競賽的時間，負責人與公證人。競賽期內，鄉代表會開了檢閱會議，由值日代表報告情形，知道各村做到了什麼程度。會後主席等（即公證人）到各村去巡視，看值日代表的報告是否『打花』（扯謊）。

四月間，另外還有一次競賽，目標是『軍事動員』。分『擴大紅軍』、『慰勞工作』、『優待紅屬』三項（無歸隊運動，因其時無開小差的，五月間加入此項）。

五月二十日，鄉代表會開『春耕』、『軍事』兩項競賽的總結會，新溪奪得紅旗，長岡得信紙百張，塘背得五十，泗網無所得。

七月訂立『軍事』『經濟』兩項競賽，現還未做總結，但已知長岡村最好。

x

x

x

爲了爭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競賽的辦法應該在每個鄉裏實行起來，鄉蘇是競賽的領導者。但鄉蘇也只是『領導者』，因爲每一競賽，主要是群眾的競賽，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間的競賽，因此每一競賽條約的訂立，應召集村爲單位的群眾大會作報告，得到群眾的承認，並把競賽條約張貼出來。在生產問題等項的競賽上，還應召集每個代表領導下的幾十個居民開會作報告，得到他們的承認。一時期內檢查成績的結果，也應該召集這樣的會作報告，來推動工作的前進。一切競賽沒有成績的，都是由於只把競賽條約放在少數人的袋子裏，沒有推動廣大的群眾。每一次競賽，都要作出總結，並且實行給獎。長岡鄉的兩次競賽，對於這些都大體上做到了，所以他們得到了實際的成績。

才溪鄉調查

——一九三三年——

一 行政區劃

中央蘇區有名的上下才溪，屬於福建上杭縣的才溪區。才溪區自新劃行政區後分爲下列八個鄉：上才溪、下才溪、嶺保、同康、增康、文才、太地、下生。

上才溪：五二三家，二、三一八人。

分爲四村：黎屋（人口約六〇〇）、楊下（五〇〇）、中興（五〇〇）、上屋（六〇〇）。鄉蘇常駐人：主席、文書。

因是大鄉，文書常駐，幫助鄉蘇工作。

下才溪：五〇三家，二、六一〇人。

分爲四村：張坑（人口約六〇〇）、下坑（五〇〇）、發坑（八〇〇）、孫屋（七〇〇）。

二 代表會議

一 代表數

上才溪：前五十三個代表。此次選舉，工人家屬算入工人成份，增至七十五個代表（新增二十二，本鄉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個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餘四十是農民代表。全鄉工人一八三人，屬於一六三家，連家屬平均每家以三人計，共四八九人，每十三人舉一代表，故舉代表如上數。

下才溪：前七十三個代表，現在九十一個代表，新增了一十八個代表，也是因為工人家屬的選舉比例提高了。

二 代表團

代表在各村，每村有十多個的，有二十多個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開會選舉一人成為鄉蘇的『代表團』，故代表團是四人。比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團開會解決。每次代表會開會之先，召集代表團開會，預先準備（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會約五天開會一次。此辦法，一九三一年開始

的（代表團應改稱代表主任）。

三 代表與居民的關係

每個代表管轄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爲最多，工人代表管轄少些，農民代表管轄多些。此辦法，一九三二年開始的。

四 代表的政治表現

上才溪五十三個代表中：

最積極的：二十多個。

中等的：二十多個。

最差的：一個。

這個最差的代表，十次會只到三次，忙於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心做，批評了多回，被代表會開除。

下才溪七十三個代表中，沒有最差的。

五 代表的調動與補選

上才溪五十三個代表，去年十一月選舉的。到今年十一月十四日再選舉時，當紅軍的二十七人

（去年十一月一次去的），調動工作的十一人，共去了三十八人，剩下十五人。以村開選民大會補選，去的是工人補選工人，農民補選農民。有候補代表，則以候補代表充任。此補選會是去年十一月開的，後未開過。至今年十月再選舉時，剩下四十二人，因陸續又調動了十一人。

下才溪七十三個代表，今年紅五月，當紅軍的十一人，村爲單位開了一次補選大會。七月又有當紅軍的十五人，又開了一次補選大會，前後調動工作的十八人。以候補代表充任。

六 女代表

去年十月選舉時，上才溪五十三個代表中，女的十六個，佔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個代表中，女的二十一個，也是百分之三十。補選以後，至今年十月選舉時，上才溪五十三個代表中，女的三十三個，差不多佔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個代表中，女的四十三個，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選舉，上才溪七十五個代表中，女的四十三個，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個代表中，女的五十九個，則佔了百分之六十六。

×

×

×

×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與居民發生固定關係的辦法，是蘇維埃組織與領導方面的一大進步，才溪鄉，是同長岡、石水等鄉一樣，收得了很大效果的。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爲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爲若干村，依靠於民衆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衆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衆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地方。長岡、才溪、石水等鄉的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

三 此次選舉

(一) 選舉委員會領導選舉。

(二) 居民選民登記，發榜三張。

(三) 候選名單，下才溪一六〇多人（內應選九一人），一村貼一張，每張均寫一六〇多個名字，群眾在各人名下註意見的很多，註兩個字的，五六個字的，十多個字的，兒童們也在註。註『好』『不好』等字的多。註『同意』或『消極』的也有，有一人名下註着『官僚』二字。受牆報批評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評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顧群眾利益，工作表現消極的。有詩歌。內有三張，批評鄉蘇對紙業問題解決得不好。

(四) 鄉為單位開選民大會，鄉蘇報告工作。

(五) 工人全鄉為一單位，農民村為單位（四個）。

(六) 選舉大會，選民到百分之八十。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辦貨的，女子坐月的，共約百分之二十沒有到。老人撐着棍子到會。

(七) 為着選舉開的會很多：工會，貧農團，婦女會，互濟會與反帝同盟開會員大會，兒童團，少隊部，都開了會，黨團員會先開。有標語，有小冊子。所以今年的選舉宣傳，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數人都了解選舉的意義。

去年，十六歲以下的吵選舉權，以為他們當紅軍的不少，工作也好得多，為什麼沒有選舉權？今

年，他們了解是年齡的理由，不吵了。

宣傳隊到各村宣傳，白天講演，夜間演戲。

(八)選民大會上鼓動買公債。下才溪在會場中一天買了一五〇〇多元，上才溪六三〇元。太地鄉選民大會中，動員了十三個人當紅軍，全鄉赤衛軍模範營兩班中去了一班。

(九)新幹部的當選：

上才溪七十五個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個，有二十一個再當選了，落選的三十二個，新當選的佔五十四個。下才溪九十一個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個，有五十個再當選，落選的二十三個，新當選的四十一個。

×

×

×

上下才溪的選舉是一般成功了的，他們的選舉宣傳，他們的組織候選名單與發動群眾對候選名單的批評，他們的聯系選舉於別項工作，他們的組織工人與女子當選，都充分執行了中央政府的選舉訓令，成爲蘇區選舉運動的模範。在選舉大會上發動選民提案交新選代表討論，這一方面，則沒有什麼表現，這一方面的模範，應該讓給興國的長岡鄉。

四 鄉蘇下的委員會

鄉蘇下有許多的委員會。舉數例於左：

『擁護紅軍』：委員上下才溪均五人。四村各一個委員會，委員也是各五人。

『優待紅軍家屬』：上下才溪均五人，村亦五人。

『查田』：兩鄉均十一人，村無。

『選舉』：兩鄉均七人，村無。

『土地』：上才溪十一人，下才溪七人，村無。

『勞動』：兩鄉均七人。村無委員會，有小組，即勞動合作社的委員會。

『山林』：上才溪七人，下才溪十一人。

『逃兵歸隊』：兩鄉均十二人。

沒有『春耕』、『夏耕』等委員會。只組織『耕田隊』，五人爲一小組，十人爲一班，三十人爲一中隊，百人爲一大隊，上下才溪各有一個大隊。耕田隊主要爲了優待紅軍家屬。

x

x

x

鄉蘇維埃下許多委員會的組織及其領導，成爲鄉蘇工作的重要一部份，在才溪鄉再一次證明了。中央政府已經採納各地的經驗，規定到『地方蘇維埃組織法』裏面，那裏規定鄉的委員會可以組織經常的與臨時的共二十餘個，依照各地工作情況，可以適當的給以增減。『市區』蘇維埃，則須適應城市的特點，組織若干不同於鄉的委員會。這一制度的明確的統一的建立，將使蘇維埃與民衆的關係更加密切，將使一切蘇維埃工作的執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個問題，就是村亦應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員會（各種有廣大會員的民衆團體，同樣應建立他們的村的領導機關）。因爲如果只有鄉的委員會，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廣大居民的鄉，是無法周密地進行工作的。許多村的委員會的建立，即可保證這一點。

五 擴大紅軍

八、九、十，三個月：

上才溪：六十人，動員了兩排模範營。

另歸隊的十一人。還有兩三個因病沒有歸隊。

下才溪：六十五人，模範營一次動員了五十二個人。另一次個別動員去了十三人。

另歸隊的十一人。還有十四人未歸隊。

全區十二個鄉（未劃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動員模範營二七三人。新劃區八個鄉，共尚有未歸隊的五十多人。

全區以上下才溪兩鄉擴大紅軍成績最好。主要原因，是很好的優待了紅軍家屬與慰勞紅軍工作歷來不錯。紅五月以前，八鄉平均每鄉每月可集中布草鞋五〇〇雙，近因封鎖無布，稍減少了。但上下才溪還有如下成績：上才溪，八月五〇〇多雙，九月一〇〇多雙，十月九十多雙。

下才溪，八月三〇〇多雙，九月二八〇雙，十月三〇〇雙，十一月六三〇雙。

這些成績，主要是由於黨團支部動員黨團員領導女工農婦代表會得來的：一、黨團員先開會；二、婦女代表會開會；三、婦女群眾大會。

婦女代表會十天開一次，鄉有主席團五人，內推一指導員，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為村的主任。

婦女代表會討論的問題，凡鄉蘇討論的，她們都討論，除對慰勞紅軍、推銷公債、發展生產等極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問題，也常討論，解釋婚姻條例給婦女聽。

×

×

×

大數量的動員群眾去當紅軍，依靠於：（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傳鼓動、廢除一切強迫辦法；（二）充分的優待紅軍家屬；（三）健全的編制與訓練地方武裝。而優待紅軍家屬，是使群眾歡喜去並且安心留在紅軍部隊的一個根本工作，長岡鄉才溪鄉的經驗，給我們完全證明了。長岡鄉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十六歲至四十五歲）四〇七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三二〇人，佔百分之八十。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十六歲至五十五歲）五五四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四八五人，佔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七五六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五二六人，也佔了百分之七十。這樣大數量的擴大紅軍，如果不從經濟上生產上去澈底解決問題，是決然辦不到的。只有拿經濟上的動員配合着政治上的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熱潮，達到如像長岡鄉才溪鄉一樣的好成績。

六 經濟生活

一 勞動力問題

上才溪：全人口一、三一八人（暴動時）中，男勞動五五四（十六歲到五十五歲，下同），女勞

動五八一，內當紅軍的四一九，調外工作八八（男六六，女二二）。五五四個十六歲至五五歲有勞動力的男子中，共去了當紅軍做工作的四八五（四一九，加六六），留在鄉村的只六十九人，與女勞動五五九人（五八一，減二二）比較，男子僅佔百分之十一。全鄉有紅軍家屬三五八人。

下才溪：全人口二、六一〇人中，男女合計有勞動力的二、二〇七人（男七六五，女四四二）。當紅軍的四四二，調外工作的九八（男九一，女七）。男子有勞動力七六五人中，共去了五三三人當紅軍及做工作，只留二二二人在鄉，與女勞動四三五（四四二減七）比較，男子也只佔百分之三十三。全鄉紅軍家屬三五五家。

因此，耕種主要依靠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約三百人，能蒔田的六〇多人。暴動前此三〇〇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約三十個人能用牛，數年來的努力，得此成績。

同時，『老同志』精神很好，開山開嶺，多是他們，一部份還可蒔田割禾。兒童又參加生產。因此，生產是在發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兒童參加生產外，生產的發展，還依靠於勞動力的互相調劑。一村中，勞動力有餘之家，幫助不足之家；一鄉中，有餘的村，幫助不足的村；一區中，有餘的鄉，幫助不足的鄉；這樣以區為單位調劑勞動，做勞動工。黨團員又做『禮拜六』。因此，生產得着更大的發展。

調劑勞動力的主要方法，是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其任務是幫助紅屬與群眾互助。

幫助紅屬：帶飯包（不帶菜），帶農具，蒔田割禾也是這樣。

群眾互助：議定每天工錢二毛，男女一樣，緊時平時一樣，一九三〇年起就這樣做。工錢，紅屬幫助紅屬，每天一毛半；紅屬幫助群眾，每天二毛；群眾幫助紅屬，不要工錢。

勞動合作社統籌全局，鄉的勞動合作社委員會五人，主任籌劃一鄉，四村每村一個委員，籌劃一

村。要請工的，必經村委員，不能私請，否則混亂了勞動力的調劑。工錢，『僱』『傭』雙方自理，不經委員。

本鄉勞動合作社，一九三一年開始創造的，現在全蘇區實行的『勞動互助社』，就是發源於此的。

委員手裏有個簿子，登記有勞動力的，或缺勞動力的。有人請工，即刻可以分配。間有不知者，問耕田隊的中隊長（每村一個中隊，五人為一小組，兩組十人為一班，三班或四班為一中隊）。中隊長手裏也有個簿子。『贊成將耕田隊與勞動合作社統一起來。』

生產情形：暴動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生產低落約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復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雜糧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則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過了暴前百分之十。暴後全區荒了許多田，去年開發了一小部份。今年大開，開了一三〇〇多石。開山比開田更多，山佔四分之三，田佔四分之一，因田開盡，故進到開山。沒有一片田騰沒有種雜糧，能種番薯的田一概種下番薯了。開山開得女同志『爭』起來，我要開，你也要開，競賽的效力很大。全區糧食，暴前不够甚遠（加以那時做粉乾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則已有餘了。現在全區沒有做粉乾及『果子』的，沒有蒸酒的。

二 消費合作社

全區八鄉有十四個消費合作社。

上才溪兩個：

助。

一個油鹽肉合作社：原股本四元，後增至一八五元，每股五角。

一九三〇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分紅一次。每股分五角。辦事常駐一人，圩日有兩人幫助。

一個布疋合作社：原股本一四四元，後增至二五五元，每股一元。

與前者同時起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分紅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駐二人，圩日幫助者一人。

下才溪三個：

一個布疋合作社：原股本一二〇元，後增至二四〇元，每股一元。一九三〇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分紅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駐二人。

一個油鹽肉合作社：原股本三五元，後增至一五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紅一次，每股分五角。常駐兩人，圩日幫助一人。

一個豆腐糖菓猪子合作社：原股本一二五元，後增至一八〇元，每股五角。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分紅，每股分了五角。辦事常駐三人。

合作社每月查賬兩次（查畢回家吃飯），開社員大會一次（不吃飯）。辦事人，每三個月於開社員大會時改選一次。調動到縣社區社去工作的，年壯當紅軍去了的（以較老的代），不連任的，均即改換。但實際連任的多，換動的少。只紅軍家屬困難的可賒賬，賒一圩的，兩圩的，最多三圩（每圩十天）。還時，米豆等等均可。圩期末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兩期收清。

加入消費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

貨缺時紅屬先買，社員後買，非社員再後買。

貨價，紅屬（有證章）照市價減百分之五，社員不減。別鄉甚至別區的红屬來買亦然，舊縣、南

陽、官莊等區的紅屬，均有來買貨的。

『合作社第一好』——輿論。

賣『外貨』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外，全區絕跡（逐漸削弱至此），只圩日有個把子私人賣鹽的，但土產如豆腐等，私人的還有。

三 糧食合作社

原名糧食調劑局，一九三〇年開始創設，由群眾募集股金。此種募集不是普遍募集，而是向生活較好的人家募集，每股大洋一元，每鄉組織一個調劑局，全區八個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

調劑辦法：每年向群眾買進穀米，比私人買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調劑局只收一斗五升。賣出時，先賣給紅軍家屬，後賣給困難群眾。但群眾是否困難，要經過鄉代表會調查通過。賣出時，也不照當時市價，僅照買進價格略除耗失。例如買進每元一斗五升，賣出則爲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紅軍家屬無錢的，群眾特別困難的，可以借給，割禾後照數歸還，不取利息。每年收穀出穀工作完了，由鄉蘇通知群眾，舉出代表，向調劑局負責人算賬，並發公告。每年秋後收穀子量入穀倉，用鄉蘇長條標封。春夏出穀一次二次不定，群眾需要了，即開倉，由群眾購買。大概每年三月蒔田時與五月青黃不接時，均是出穀時節。

今年二月，改名糧食合作社，但組織如舊。自今年經濟建設運動發起以來，各鄉糧社都擴大了。例如上才溪糧社，原股二一五元，現增二〇三元，共四一八元。下才溪，原股一三七元，現增二〇〇元，共三三七元。調劑局委員五人，主任一人常駐，支領伙食。

今年五月，上村、章文兩鄉（現劃入通賢區）發生飢荒（兩鄉盡是竹山，每人僅分田一石，紙業又失敗了），全區各鄉糧食調劑局合力救濟。當時穀價每元八升，而調劑局借給此鄉的仍照去秋穀價每元一斗八升，秋後照數歸還，全區共借給三十六石。另又募集雜糧（番薯乾等）及錢去救濟。結果無餓肚子的。才溪區其餘各鄉，今年均未患荒，是調劑局調劑之力。

下才溪另有一個『販米合作社』，股本一三〇元，每股五角。專為紅軍路過、行人來往、機關人員及被難群眾買米而設。委員五人均不常駐，圩日有一人辦事半天，平時託付消費合作社辦理。除開支辦米工人的工資、伙食以外，不分紅利。普通群眾來此買米的極少，百人中僅一二人。米價照市。自從群眾集股辦了這個合作社，『紅軍』『難民』等就不要向群眾挨家辦米了。

四 犁牛合作社

全區只上下才溪兩鄉組織了，各有三頭牛。

兩鄉約百分之二的人家無牛，還沒有想出解決的辦法來。

五 日常生活

米：暴動前，貧農僱農平均每年只有三個月吃米飯，其餘九個月均是吃雜糧，青黃不接時要吃『羊蹄子』，更有吃糠的。現在，有了六個月的米飯吃，配合六個月的雜糧，一年就夠了。本地產米本來很少，故還須一半依靠雜糧，現在雜糧的生產也比前多了。以每餐說，暴動前，不能吃飽，現

在能吃飽了。並且自己吃外，還可賣給紅軍，還土地稅，買公債票與兌換油鹽。總之，吃飯改善了百分之一百（三個月米飯與六個月米飯之比）。

肉：暴動前貧農僱農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約一元（大洋），現在爲二元，增加百分之一百。暴動前百家只有六十家養豬，現在百家有九十五家養豬。

衣：暴前平均每人每兩年才能做一套衫褲，暴後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今年情形又改變，因爲封鎖布貴，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復了暴前。暴前一套單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們的衣服貴到如此程度！

鹽：暴動前每人平均每月吃鹽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兩二錢，即暴動前五個人的家庭月吃鹽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國民黨無鹽吃！

油：暴動前平均每人每月吃油（從江西來的木油，本地的豬油）六兩，現在未減少也未加多。但因江西的木油來的少了，群眾吃的多是豬油。

六 物 價

穀——暴動前每担（一〇〇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〇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

豬——暴動前有骨每元兩斤半，現在無骨每元亦兩斤半。

魚——暴動後因封鎖，九江（從武平縣轉）沒有魚苗來，塘是空的，無市。

鷄——前後價同，每斤八毛。

鴨——前後略同，每斤四毛。

雞蛋——前後略同，每毛買三個。

鴨蛋——前後略同，每毛買三個。

豬油——與豬肉價同。

石灰——田裏不用，用了做紙，前後略同，每元買一担（八十斤）。

豆子——暴動前每担（八斗）十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元，今年八元。

煙——暴動前每毛買二兩，現在每毛一兩六錢。

茶葉——前後略同，每元買三斤半。

菜油——暴動前每元三斤半，今春兩斤半，今冬一斤十三兩。

紙——暴動前每球（四十斤）草紙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

元五角，因此無人造紙了。

木——不能出口，無市。紙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敗，可惡的國民黨的封鎖！

木油——暴動前木油每元買三斤半，現在無甚貨來，只得吃豬油了。

鐵——比暴動前貴一倍。

布——棉布暴動前一元買一疋（二丈三尺），一九三二年一元又四毛買一疋，今年二元又兩毛買一疋。

鹽——暴動前每元十斤，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貴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買一斤。十一月每元僅買十四兩。極大的問題要打破封鎖。

洋油——暴動前百分之五十人家點洋油，每元買七斤十四兩，一九三三年每元僅買一斤五兩，因此除機關辦公外，無人點它了，均點『松光』。

柴火——暴動前每斤兩個片，去年三個片，今年五片到九片。

毛洋——前後同，每毛十六片。

現洋——雜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蘇紙同。現只有蘇紙，現洋完全看不見了，又是國民黨搗亂！

七 經濟公債

新劃的才溪區八個鄉，二、一八八家，八、七八二人，承銷公債一三、六〇〇元。現尙餘約一、〇〇〇元沒有銷完。

上才溪鄉五一三家，二、三一八人，銷四、〇〇〇元。

下才溪鄉五〇三家，二、六六〇人，銷四、一四六元。

方法：

- 1 黨團員大會動員。
- 2 各團體各自開會動員。
- 3 鄉蘇代表會議動員。
- 4 村爲單位開群眾大會一次，專門宣傳，不銷。

5 鄉爲單位開群眾大會一次，銷債。兩鄉各銷了一、五〇〇多元。未完。

6 鄉代表推銷委員會（每村三人），宣傳隊（鄉組織的，每村五人），挨戶宣傳。

7 選民大會上，上才溪銷六〇〇多元，下才溪銷一、六〇〇元，至此，上才溪銷了二、〇〇〇多元，尙餘一、〇〇〇多元，下才溪銷了三、〇〇〇多元，尙餘約九〇〇元。

8 嗣後由代表、推銷委員、宣傳隊，按戶鼓動，概銷完了，承認了數目。但公債還沒有完全領到。

完全自動買，沒有強迫。沒有一次會不講經濟建設。因爲縣貿易局建立，有了鹽布買，群眾更加認識經濟公債的重要了。

x

x

x

我們重複的說，只有經濟建設配合了政治動員，才能造成擴大紅軍的更高的熱潮，推動廣大群眾上前線去。才溪鄉在成年青年男子成群的出去當紅軍做工作之後，生產超過了暴動前百分之十。荒田開盡，進到開山。沒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沒有種植，群眾生活的改良到百分之百以上。

勞動合作社（別地稱勞動互助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組織了全鄉群眾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組織性進到了很高的程度，成爲全蘇區第一個光榮的模範。這種經濟戰線上的成績，興奮了整個群眾，使廣大群眾爲了保衛蘇區發展蘇區而手執武器上前線去，全無家庭後顧之憂。在兩鄉全人口四、九二八人中，出去當紅軍做工作的一、〇一八人（上才溪四八五，下才溪五三三）。這一鐵的事實，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機會主義者的瞎說，如像說國內戰爭中經濟建設是不可能的，如像說蘇區群眾生活沒有改良，如像說群眾不願意當紅軍，或者說擴大紅軍便沒有人生產了。我們號召全蘇區幾千百個鄉，一齊學習長岡鄉、才溪鄉、石水鄉，我們鄭重介紹這幾個鄉的光榮成績於

全體工農群眾之前，造成幾千個鄉都如同長岡，才溪，石水，使之成爲爭取全中國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

八 文化教育

上才溪：

日學：四個，共一校長，各一教員。教員伙食，群眾募集款子，每天一角三分計算。學生共一四一人，多六歲至十歲的。十一至十四歲的多進區蘇義務勞動學校（由兒童工作幹部訓練所改）。全鄉一至十五歲兒童六〇〇多人，內六歲至十五歲的三二三人，此數內入日校的一四一人，入區蘇義務學校的三七人，尚有一四六人失學。

夜學：四個，無校長，教員由日學教員兼。學生共一二〇多人，都是女子。每月每校辦公費五角，群眾募集得來的。

識字班：二十四組，每組十人，共二四〇人，每五天由夜學教員發五個新字去認。每組一個組長，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牽累，不能入夜學的，便入識字班。

讀報團：設於俱樂部內，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讀『鬭爭』、『紅中』、『通知』、『階級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聽，多的八九十人。

識字牌：六塊，設置於通路處。

俱樂部：一個，任俱樂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內新劇團佔三十多人。

牆報：四處，每村一處，在日校門外。文章，學生教員做得多，群眾做的不過十分之一。

下才溪：

日學：五個，共一校長，各一教員。教員伙食辦法同上才溪。學生共一五〇多人，入區校的六〇多人，共二一〇多人。

夜校：八個，無校長，教員五個由日校教員兼，三個是另找來的。

平均每校學生約三十。共二四〇人。辦公費每月五角。

俱樂部：一個，工作人員五十多人。

識字班：二十六組，共二六〇人，識字辦法同上才溪。

識字牌：五塊。

牆報：五處。

讀報團：一處，也是每五天逢圩日一次。

『農村調查』序言二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郎調查又遺失了。

現在黨的政策，不是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種材料，一為保存歷史陳跡，一為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的同志，很多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層的生動情況。普遍調查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方法，只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問題的最基礎知識。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與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事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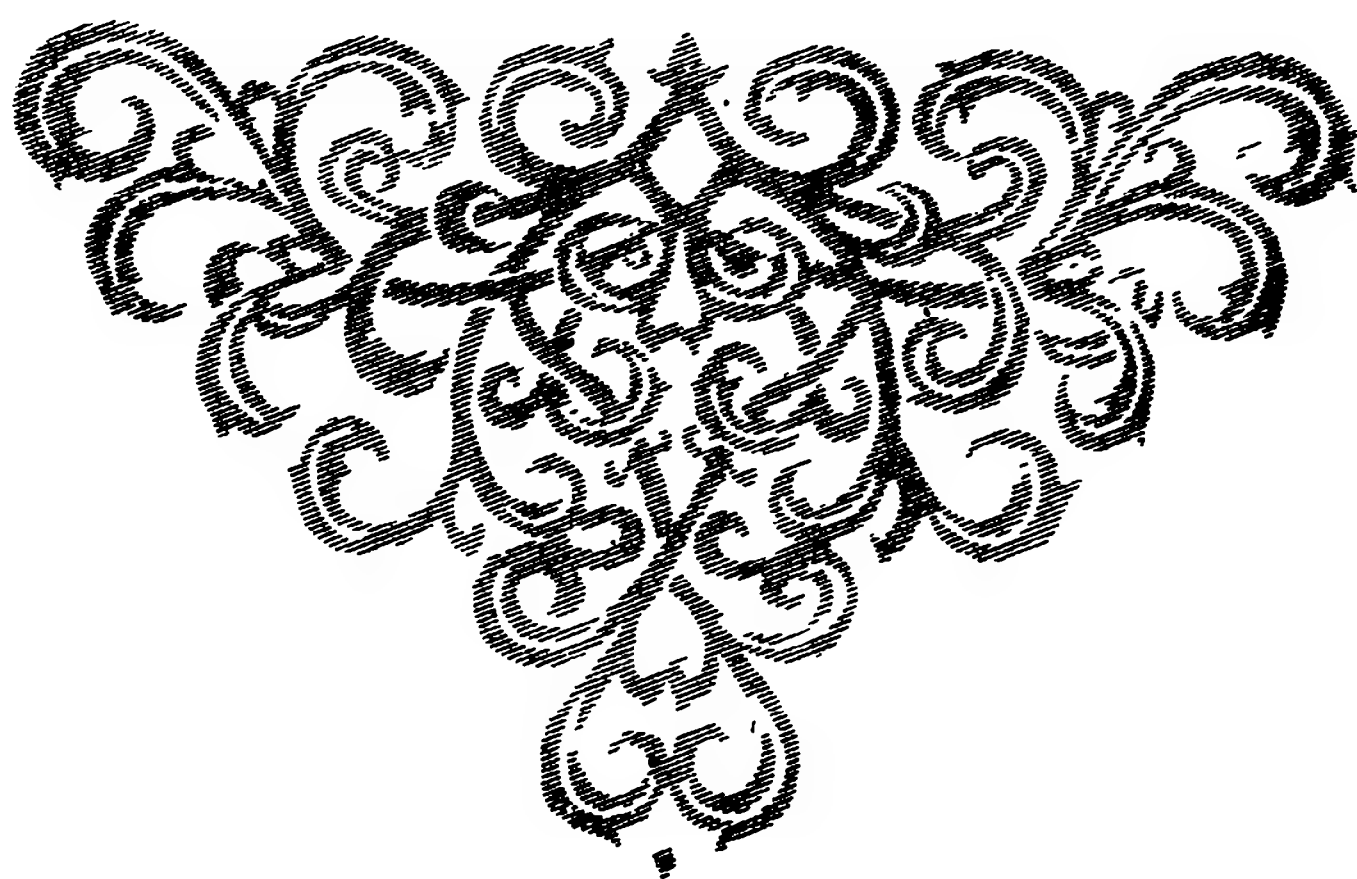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塗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一個，井岡山一個，早失掉了。尋郎調查帶到延安，又不見了。這裏印的，主要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與一個才溪鄉調查，閱者單看這三個，就可知道如何找到材料的方法。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下級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及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郎調查找的是一部份中級幹部，一部份下級幹部，一個窮了的老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長，一個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一個該縣的小獄吏。興國調查與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與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與錢糧師爺，就是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與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黨內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的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能替我們預備完全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工作不可。特殊的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

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爲『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却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摘，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爲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乃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際相聯系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系的實際也只是盲目的實際』。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的必要，是與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與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們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二 卷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六中全會結論之一部——

幫助與讓步應該是積極的，不應該是消極的

爲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須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我們必須鞏固擴大我黨我軍，同時也應贊助友黨友軍的鞏固擴大；人民要求政府滿足自己的政治經濟要求，同時給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於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廠主改良待遇，同時積極作工以利抗日；地主應該減租減息，同時農民應該交租交息，團結對外。這些都是互助的原則方針，是積極的方針，不是消極的片面的方針。互讓也是如此，彼此不挖牆腳，彼此不在對方黨政軍內組織秘密支部，在我們方面，就是不在國民黨及其政府軍隊內組織秘密支部，使國民黨安心，利於合作抗日。『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正是這種情形。沒有紅軍的改編，蘇區的改制，暴動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實現全國抗日戰爭，讓了前者就得了後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爲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列主義所許可的。純消極的讓步是有過的，那就是第二國

際的勞資合作論，把一個階級一個革命都讓掉了。中國前有陳獨秀，後有張國燾，都是投降主義者。我們應該大大地反對投降主義。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份看的，是聯系於總的革命路線而當作不可缺少的一環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

民族鬭爭與階級鬭爭的一致性

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鬭爭服從於民族鬭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的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與統一而犧牲黨派的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應該滿足黨派與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方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在民族鬭爭中，階級鬭爭是以民族鬭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有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鬭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鬭爭的需要（為着抗日）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與獨立性，民族鬭爭與階級鬭爭，一致起來了。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他至今不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少奇同志說的很對，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與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在敵後，只有根據國

民黨已經許可的東西（例如抗戰建國綱領），獨立自主的去做，無法『一切經過』。或者估計國民黨可能許可的，先斬後奏。例如設置行政專員，派兵赴魯之類，先『經過』則行不通。聽說法國黨曾經提出過這個口號，那是因為法國有了各黨共同委員會，而對於共同決定的綱領社會黨方面不照做，依然幹他們自己的，故共產黨有提此口號以限制社會黨之必要，並不是提此口號以束縛自己。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指揮各黨聽他一黨的命令。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他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他，例如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他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比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件。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與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戰爭與戰略問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在六中全會結論之一部——

一 中國特點與革命戰爭

革命的中心任務與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中國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但在同一原則下，就無產階級政黨在各種條件下執行這個原則的表現說來，則基於條件的不同而不一。在資本主義各國，在沒有法西斯與沒有戰爭的時期內，那裏的條件是國家內部沒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基於這些特點，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準備最後推翻資本主義。在那裏，是長期的合法鬥爭，是利用議會講壇，是經濟的與政治的罷工，是組織工會與教育工人。那裏的組織形式是合法的，鬥爭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戰爭的），戰爭對於那裏的共產黨，

是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了，黨的政策是使自己國家敗北。自己所要的戰爭只是準備中的國內戰爭。但是這種戰爭，不到資產階級處於真正無能之時，不到無產階級的大多數有了武裝起義與進行戰爭的決心之時，不到農民群眾已經自願援助無產階級之時，起義與戰爭是不應該舉行的。到了起義與戰爭時，又是首先佔領城市，然後進攻鄉村，而決不能相反。所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曾經這樣做而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證實了的。

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對內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對外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的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暴動與戰爭，也不是先佔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的相反的道路。

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帝國主義沒有武裝進攻之時，或者是援助資產階級，進行反對軍閥（帝國主義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廣東戰爭與北伐戰爭。或者是聯合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進行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同樣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國內戰爭，例如十年的蘇維埃戰爭。在帝國主義舉行武裝進攻時，則是聯合國內一切階層，同時也即是援助資產階級，進行對外的民族戰爭，例如現在的抗戰。

所有這些，表示了中國與資本主義外國的不同。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其他一切，例如民衆組織與民衆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但都是爲着戰爭的。在戰爭爆發以前的一切組織與鬥爭，都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例如五四運動（一九一九）至五卅運動（一九二五）那一時期。在戰爭爆發以後的一切組織與鬥爭，都是直接間接地配合戰爭的，例如北伐戰爭時期，革命軍後方的一切組織與鬥爭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北洋軍

閭區域內的一切組織與鬭爭，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又如蘇維埃戰爭時期，蘇區內部的一切組織與鬭爭都是直接地配合戰爭的，蘇區外部的一切組織與鬭爭都是間接地配合戰爭的。再如現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軍後方的與敵軍佔領地的一切組織與鬭爭，也同樣是直接或間接的配合作用。

『中國革命的特點同時又是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無論是對於北伐戰爭說來，對於十年蘇維埃戰爭說來，對於今天的抗日戰爭說來，都是正確的，因為這些戰爭都是革命戰爭，戰爭反對的對象都是反革命，參加戰爭的主要成份都是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國內戰爭，或者是民族戰爭，或者是共產黨單獨進行的戰爭，或者是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戰爭。當然，這些區別是重要的。這些表示了戰爭主體有廣狹的區別（工農聯合或工農資產階級聯合），戰爭對象有內外的區別（反對國內敵人或反對國外敵人，國內敵人又有反對北洋軍閥或反對國民黨），表示了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中有各個時期的不同內容。然而都是武裝人民反對武裝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與優點。『革命戰爭是中國的特點與優點』，這一論斷，完全適合於中國的情況，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之主要的與差不多開始即是任務，是聯合盡可能多的同盟軍，組織武裝鬭爭，依其情況，反對內部的外部的武裝反革命，為爭取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而鬭爭。離開了武裝鬭爭，就沒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任務。

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黨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鬭爭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不去認真的準備戰爭與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戰術之研究。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的着重於民衆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什麼民衆運動也場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後一個長時期中，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暴動與白區工作上面。根本的轉變，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對三次圍剿勝利之後，這也是得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而轉變的。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許多同志仍舊沒有如同現在我們這樣想。

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認識這一點，對於今後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是有益的。抗日戰爭中全民武裝反抗的具體事實，將教育全黨進一步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每個黨員都要時刻準備武裝上前線。我們這次會議又決定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戰區與敵後，更給了一個明確的方針。這對於有些黨員願做黨的工作，願做民衆運動，而不願研究戰爭與參加戰爭，有些學校沒有注意鼓勵學生上前線的現象，還是一劑對症的良藥。大部份中國領土內黨的工作與民衆運動是直接聯系於武裝鬭爭的，沒有也不能有單獨的孤立的工作或民衆運動。一部份距離戰區較遠的後方（如雲、貴、川）與一部份敵人控制的地區（如平、津、京、滬、），黨的工作與民衆運動也是配合戰爭的，只能也只應服從前線的要求。一句話，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

二 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史

我們來看一看國民黨的歷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於戰爭，是有益處的。

從孫中山在廣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滿的武裝起義。及至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蹟。直至辛亥成功，武裝推翻了滿清。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海軍南下，桂林北伐，與創設黃埔，都是孫中山的戰爭事業。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歷了北伐、內戰與抗日的三時期。過去十年蔣介石是反革命的，但單拿他注重軍事一點來說，他所創造的龐大的中央軍，至

今還是抗戰的主力。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該向之學習。對這點上，孫中山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自承爲學生。

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也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譚延闓是一個聰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幾起幾覆，從來不做單獨的省長，要做督軍兼省長，他後來做了廣東與武漢的國民政府主席，還是兼了第二軍軍長。這些軍閥們也懂得中國的特點。

中國只有一個不要軍隊的政黨，就是進步黨，但他們也懂得必須靠一個軍閥才有官做，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附蔣的是進步黨之一部轉變而成的政學系），就成了他們的靠山。

歷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等，沒有軍隊，因此也鬧不出什麼明堂來。

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沒有直接的軍隊，因爲那裏有選舉制度。中國不同，地主資產階級均靠槍桿子吃飯，地主或資產階級的任何個人，或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統治階級欺騙與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槍桿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爲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戰爭改變一切。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桿子造了一個社會主

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整個世界也要用槍桿子再造過。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三 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史

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與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至二七年，乃至其以後一時期，對此也還認識的不足；但從一九二四參加黃埔開始，已進到了新的階段，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國民黨的廣東戰爭與北伐戰爭，黨已掌握了小小一部份軍隊。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暴動，秋收暴動，與廣州暴動，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認識軍隊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沒有這一時期的紅軍及其戰爭，即是說，假如共產黨採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長期支持的抗日戰爭是不能設想的。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會議與一九三〇年的四中全會，反對了政治上的右的與左的機會主義，使黨大進步了。但沒有着重涉及戰爭與戰略問題，這是當時黨的重心還沒有放在戰爭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黨的中央遷至蘇區以後，情形有了根本的改變，但對於戰爭問題（以及一切主要問題）又犯了原則錯誤，致使蘇維埃戰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則主要的是反對戰爭中的機會主義，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結果。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自信的說，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年的鬥爭中，不但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強的

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戰爭問題。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骨幹，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骨幹。這是無數先烈的熱血澆灌出來的革命之鮮花，不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光榮，而且是世界共產黨與世界人民的光榮。在世界範圍內，還只有蘇聯、中國、西班牙三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三個軍隊，是屬於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國黨都還沒有軍事經驗，所以特別值得寶貴。

爲了勝利地進行今天的抗日戰爭，擴大與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及一切黨領導的游擊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則下，黨應派遣最好的與足夠數量的黨員與幹部上前綫。一切爲了前綫的勝利，組織任務須服從於政治任務。

四 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中黨的軍事戰略的轉變

我們黨的軍事戰略的變化問題，值得着重地研究一番，分爲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兩個過程來說。國內戰爭過程中大體可分爲前後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主要的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與組織上某種程度的集中性與計劃性上面，其他則仍是游擊性的，低級的，不能和外國軍隊一概而論，也和國民黨軍隊有些不同。因此這種正規戰，在某種意義上，是提高了的游擊戰。

抗日戰爭過程中，就我們黨的軍事任務說來，也將大體上分爲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包括戰略防禦與戰略相持兩個階段），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後期（戰略反攻階段），主要的將是正規戰爭。

但抗戰前期的游擊戰爭，和內戰前期的游擊戰爭有許多不同的內容，因為是用正規性的（某種程度上）八路軍去分散執行游擊任務的。抗戰後期的正規戰爭也將不同於內戰後期的『正規戰爭』，這是設想在裝備了新式技術之後，軍隊與作戰起了一個大的變革而說的。這時的軍隊將獲得高度的集中性與組織性，作戰將獲得高度的正規性，大大減少其游擊性，低級的將變到高級的，中國型的將變到世界型的，這將是戰略反攻階段中的事業。

由此看來，國內戰爭與抗日戰爭兩個過程與四個戰略時期之間，共存在着三個戰略的轉變。第一個，國內游擊戰爭與國內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二個，國內正規戰爭與抗日游擊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三個，抗日游擊戰爭與抗日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

三個轉變中，第一個轉變曾發生了很大的困難，這裏的任務，在於一方面反對沉溺於游擊性而不願向正規性轉變的右的地方主義與游擊主義傾向，這是由於幹部對已經變化的敵情與任務估計不足而發生的。這一方面，拿中央蘇區來說，曾經作了艱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漸轉變過來。又一方面，則要反對過分重視正規化的左的全國主義與冒險主義傾向，這是由於一部份領導幹部對敵情與任務估計過分，並且不看實情，機械地搬用外國經驗而發生的。這一方面，在中央蘇區，曾經在三年的長時間內（遵義會議以前）付與了極大的犧牲，然後才從血的教訓中糾正過來，這種糾正就是遵義會議的成績。

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去年秋季（蘆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敵人國民黨（他們對我們仍是懷着敵意的），戰場是大範圍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為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與運動戰，轉變成為游擊軍

(謂其分散使用，不是謂其組織性紀律性)與游擊戰，才能與敵情及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這時可能發生的，一方面是輕敵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這些在國民黨中都是發生了的。國民黨當它從國內戰爭的戰場向民族戰爭的戰場轉變時，主要由於輕敵，同時也存在着一種恐日病(以韓復榘劉峙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應有的損失，經過了半年以上的血的教訓，才逐漸地改正過來。然而我們却相當順利地執行了這個轉變，不但未遭挫敗，反而大大地勝利了，這是由於幹部適時地接受中央的正確指導與靈活地觀察情況而獲得的，雖然曾經在中央與一部份軍事幹部之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堅持發展與勝利，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之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與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至於由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第三個轉變，則屬於戰爭發展的將來，估計那時又將發生新的情況與新的困難，但現在可以不去說它。

五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

在整個抗日戰爭的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就全國來說，抗日戰爭全過程中的三個戰略階段(防禦、相持、反攻)中，首尾兩階段，都是正規戰爭為主，輔之以游擊戰爭。中間階段，由於敵人保守佔領地，我雖準備反

攻但尙不能實行反攻之情況，游擊戰爭將出現爲主要形態，而輔之以正規戰；但這在全戰爭中只是三階段中之一個階段，雖然其時間是最長的。故在全體上說來，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不認識這一情況，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後命運的關鍵，不注意正規軍之建設與正規戰之研究與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這是一方面。

但游擊戰爭是在全戰爭中佔着一個重要戰略地位的。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游擊軍之建設與游擊戰之研究與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個中國變爲敵人後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與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佔，毫無後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反攻力量準備不足，反攻之時沒有呼應，敵之消耗可能取償等等不利情況，都要發生。假如這些情況出現，而不及時地發展廣大與堅持的游擊戰爭去克服它，那要戰勝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擊戰爭雖在戰爭全體上居於輔助地位，但實佔據着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而忽視游擊戰爭，無疑是非常錯誤的。這是又一方面。

游擊戰爭的可能，只要具備大國條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擊戰爭。但游擊戰爭的堅持，却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出現，故古代的游擊戰爭都是失敗的游擊戰爭，只有現在有了共產黨的大國，如內戰時期的蘇聯與中國一類的國家，才有勝利的游擊戰爭。在戰爭問題上，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之分工，就目前及一般的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乃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在共產黨協助之下，國民黨軍隊之一部保存於敵後作游擊戰，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內戰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爲抗戰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重要與必要的了。綜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項：

(一)縮小敵之佔領地；(二)擴大我之根據地；(三)防禦階段，配合正面作戰，拖住敵人；(四)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利於正面整軍；(五)反攻階段，配合正面，恢復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的擴大軍隊；(七)最普遍的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八)最普遍的發展民衆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根據地外，都可組織起來；(九)最普遍的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十)最普遍的發展抗日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的改善人民生活；(十二)最便利於瓦解敵人軍隊；(十三)最普遍最持久的影響全國人心，振奮全國士氣；(十四)最普遍的推動友軍友黨進步；(十五)適合敵強我弱條件，使自己少受損失，多打勝仗；(十六)適合敵小我大的條件，使敵人多受損失，少打勝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的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十八)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

在長期奮鬥中，游擊戰爭不停止於原來的地位，應向高級階段發展，逐漸地變爲正規軍與正規戰爭，這也是沒有疑義的。我們將經過游擊戰爭，積蓄力量，把自己在實力上造成爲粉碎日本帝國主義決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軍事問題

一切問題依靠戰爭解決，中國的存亡繫於戰爭之勝負，因此研究軍事理論，研究戰略戰術，研究政治工作，不可或緩。戰術的研究雖不足，但十年來從事軍事工作的同志們已有很多成績，已有很多根據中國條件而提出的新東西，缺點在於沒有總結起來。戰略問題與戰爭理論問題的研究，至今還只

限於極少數人的工作，並沒有全般的系統化。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其中若干特殊的經驗連蘇聯也沒有，但缺點，也在綜合性與系統性之不足。新軍技術、新軍建設與新軍指揮的研究，還沒有開始。爲了全黨與全國的需要，軍事知識的通俗化，成爲迫切任務。所有這些，今後都應該注意，而戰爭與戰略的理論則是一切的骨幹。從軍事理論的研究，引起興趣，喚起全黨注意於軍事問題的研究，我認爲是必要的。

『共產黨人』發刊詞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爲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時機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中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又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而黨的任務是動員群眾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爲『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將寫些什麼東西呢？它和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呢？

它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我們現在也正在建設

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創作之中。爲了這件事，不是一般黨報所能勝任的，必須有專門的黨報，這就是『共產黨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來，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的黨，也已經是一個群眾性的黨；而且就其領導骨幹說來，就其黨員的某些成份說來，就其總路線說來，就其革命工作說來，也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與布爾塞維克的黨。

那末，還有什麼新的任務呢？現在提出新的任務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很多的新組織，對於他們，還不能說是廣大群眾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塞維克化的。同時，對於老黨員，老組織，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與進一步布爾塞維克化的問題。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內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複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巨得多了。

現在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線；現在是抗日戰爭的時期，我們黨的武裝在前線上配合友軍同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現在是我們黨發展成爲全國黨的時期，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如果把這些情況聯繫起來看，就懂得我們提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一個光榮而又嚴重的任務了。我們現在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呢？我們現在一定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麼辦才能達到目的呢？解決這個問題，是同我們黨的歷史，是同我們黨的十八年鬥爭史，不能分離的。

我們黨的歷史，從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

了。十八年中，黨經歷了許多偉大的鬥爭。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這些偉大鬥爭中，鍛鍊了自己。他們經歷過偉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重的革命失敗。經歷過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又經歷過這種統一戰線遭受分裂，並同資產階級及其同盟者進行嚴重的武裝鬥爭。最近三年，則又處於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時期中。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這樣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聯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還有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這一特點，這一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特點，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沒有的或不相同的。這樣：（一）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追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二）革命形式主要的是武裝鬥爭——就成了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裏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與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作為基本特點，這是因為：第一，這種關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

由於這兩個基本特點，恰是由於這些基本特點，使我們黨的建設過程，我們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處在特殊的情況中。它的失敗與勝利，它的後退與前進，它的縮小與擴大，它的發展與鞏固，

都不能不聯系於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與黨同武裝鬭爭的關係。當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或被迫着分裂統一戰線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步。同樣，當我們黨正確的處理革命武裝鬭爭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正確的處理這個問題時，那末，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也會要後退一步。十八年來，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聯系着，是這樣同黨對於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鬭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不正確處理密切聯系着。這一論斷，很明顯的，已經被十八年黨的歷史所證明了。倒轉來說，黨愈益趨於布爾塞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愈益正確的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愈益正確的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與武裝鬭爭問題。這一論斷，也是很明顯的被十八年來的黨的歷史所證明了。

所以，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鬭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的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就等於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在十八年黨的歷史中，憑藉我們豐富的經驗、失敗與成功、後退與前進、縮小與發展的深刻的與豐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够做出正確的結論來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够正確的處理統一戰線問題，又正確的處理武裝鬭爭問題，又正確的處理黨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鬭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在這裏，讓我們對於這三個法寶，三個問題，分別的大略的說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他階級的統一戰線，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三個不

同的階段中間發展着的，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階段，十年內戰的階段與今天抗日戰爭的階段。三個階段中，證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於中國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够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軍閥的鬭爭的。因此，無產階級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的保持之。（二）又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它就會動搖變節。因此，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變化的。在某一時期有資產階級參加在內，而在另一時期則資產階級並不參加在內。（三）由於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就是在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參加統一戰線並和無產階級一道向共同敵人進行鬭爭的時候，他們也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看做是不利於他們，而要加以限制，而要採取欺騙、誘惑、溶解與打擊等等破壞政策，並即拿這個政策作為他們投降敵人與分裂統一戰線的準備的。（四）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五）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這些規律，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與在十年內戰時期證明了，而且在三年的抗戰中也在證明着。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同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組織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戰線鬭爭。一方面，反對對於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的革命可能性的忽視，把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樣，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保持這個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左傾關門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反對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以及革命的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等看做一樣的東西，忽視他們之間的原則的差別；忽視資產階級不但在極力影響小資產階級與農民，而且還在極力影響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力求消失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而把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實歸於資產階級的一群一黨；而一到革命對於他們一群一黨的私利相

衝突時，他們就實行叛變革命。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方面，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過去陳獨秀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群一黨的私利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二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份，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鬭爭的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份，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鬭爭的中間發展與鍛鍊出來的。這裏所謂聯合，就是統一戰線。所謂鬭爭，就是在聯合時，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鬭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鬭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鬭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鬭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所有這些都是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證明了的。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鬭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他的歷史，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資產階級的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黨雖已開始懂得武裝鬭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徹底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鬭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鬭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十年內戰。我們黨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權的根據地，並且已經能够把武裝鬭爭這個主要鬭爭形式與其他許多的必要的鬭爭形式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起來，就是說，同工人的鬭爭，同農民的鬭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鬭爭，同政權的鬭爭，同經濟戰線上的鬭爭，同奸細戰線上的鬭爭，思想戰線上的鬭爭……等等鬭爭形式，都在全國範圍

內或者直接的或者間接的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鬭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武裝鬭爭史的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够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鬭爭的經驗，能够運用武裝鬭爭形式與其他各種必要的鬭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鬭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麼呢？他就是在落後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鬭爭形式。十八年來，我們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是密切聯繫於這一鬭爭形式的。離開了武裝鬭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份就是武裝鬭爭。十八年來，我們黨是日益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鬭爭這個路線。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鬭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是與游擊戰爭不能分離的，沒有武裝鬭爭，沒有游擊戰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黨的建設的過程，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也同樣是有三個階段的特點的。第一階段是幼年的黨。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與中期，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黨員群眾與黨的幹部的革命積極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獲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勝利。然而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鬭爭與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都不懂得或不豐富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的領導機關中佔統治地位的成份，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中，沒有能够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

受了失敗。在這一階段中，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够使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鞏固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與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的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份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敵人與同盟者都在陰謀暗害我們的黨，但是沒有警覺性。黨內湧出了很多的活動份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幹。黨的手裏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於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而來的，這就是黨的建設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即十年內戰的階段。由於有了第一階段的經驗，由於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的進一步的了解，由於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有了進一步的聯系，就使得我們黨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蘇維埃鬥爭。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是黨能夠緊緊的依靠着農民。黨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雖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份子，黨內不但重新湧出了大批的幹部，而且使這些幹部變成了黨的中心骨幹。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與重大成功。然而，一部份黨員是在這個偉大鬥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於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太缺乏，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因此，就使黨的領導機關的一部份人，沒有能夠在這一整個階段的一切時間中都完全的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黨與革命在一個時間中是遭受過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而在另一個時間中，又遭受過革命戰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與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然而這一切，是在黨的四中全會與黨的遵義會議這兩個

歷史的會議中所先後戰勝了。及至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開會）以後，黨就徹底的走上了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奠定了後來戰勝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這就是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階段。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三年，這三年的鬭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黨憑藉着過去兩個革命階段中的經驗，憑藉着黨的組織力量與武裝力量，憑藉着黨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很高的政治信仰，憑藉着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統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的大黨。黨的武裝力量，也在同日寇的鬭爭中重新壯大起來與進一步堅強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更加擴大了。這些都是偉大的成功。然而，黨是發展了，但有大批的新黨員與很多的新組織並沒有鞏固，他們同老黨員與老組織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區別。他們還沒有很多的革命經驗。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還不懂得或不豐富。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統一的理解，還相距很遠。在過去發展黨的組織中間，雖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大發展黨，但不讓一個壞份子侵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份子與敵人的暗害份子。統一戰線雖然建立了並堅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却時時刻刻在企圖破壞我們的黨，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所指揮的嚴重的磨擦鬭爭在全國進行着，反共之聲遍於各地，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並想以此作為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統一戰線和拉了中國向後倒退的準備。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企圖溶解共產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黨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任務，無疑是克服這種投降、分裂與倒退的危險，盡可能的保持民族統一戰線，保持國共合作，而爭取繼續抗日，繼續團結與繼續進步；同時，準備對付可

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意外的損失。爲達此目的，就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的鬭爭。這種任務的完成，依靠全黨的努力，依靠全體黨員、黨的幹部、黨的各地各級組織，實行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鬭爭。而我們相信，在有了十八年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的有經驗的老黨員、老幹部和帶着新鮮血液富有朝氣的新黨員、新幹部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經歷過風浪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央與地方組織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堅強的武裝力量與進步的人民群眾相互協力之下，這些目的是可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們黨在十八個年頭與三個階段中的主要的經歷與主要的問題。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與武裝鬭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鬭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與武裝鬭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

我們今天要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把黨的建設問題同統一戰線問題、同武裝鬭爭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把黨的建設問題同聯合資產階級又和它作鬭爭的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日游擊戰爭與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就會懂得。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與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的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一章 中國社會

第一節 中華民族

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國家之一，它的領土超過了整個歐洲的面積。在這個廣大領土之上，有廣大的肥田沃地，給我們以衣食之源；有縱橫全國的大小山脈、大小高原、平原，給我們生長了廣大的森林，貯藏了豐富的礦產；有很多的江河湖澤，給我們以舟楫與灌溉之利；有很長的海岸綫，給我們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從很早的古代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殖在這塊廣大土地之上。

205

現在中國的國境：在東北、西北和西境的一部與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接壤。西方的一部和

西南方與印度、不丹、尼泊爾接壤。南方與暹羅、緬甸和安南接壤，並和台灣隣近。東方與日本隣近和朝鮮接壤。這個地理上的國際環境，給予中國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條件和困難條件。有利的是：與蘇聯接壤，與歐美一切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隔離較遠，在其周圍的許多國家中大部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困難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其海、陸、空與中國接近的關係，時刻都在迫害着中國的生存和中國的革命。

我們中國現在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差不多佔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中，十分之九爲漢人。此外，還有回人、蒙人、藏人、滿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許多少數民族，雖開化的程度不同，但他們都有了長久的歷史。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

中華民族的發展（主要是漢族的發展），和世界上別的大民族同樣，曾經經過了若干萬年平等而無階級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而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社會生活轉入階級生活那個時代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直到現在，已有了五千年之久。在中華民族主要是漢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與軍事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還在三千年前，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的應用，也遠在歐人之前。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華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與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以漢族的歷史爲例，證明中國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勢力的統治的，他們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達到推翻與改造這種統治的目的。在漢族的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幾百次的農民暴動，反抗地主貴族的黑暗統治；而每次朝

代的更換，大都是由於農民暴動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對於外來民族的壓迫都是不願意的，都是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的。他們只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與革命領袖，產生了很多的革命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與思想家。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革命傳統和優秀歷史遺產的民族。

第二節 古代的封建社會

中國雖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雖是一個地廣人衆、歷史悠久而又富於革命傳統與優秀遺產的國家；可是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以後，就長期的停頓起來。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由於封建制度的延續，就使得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都長期的陷在發展遲緩甚至停滯的狀態中。三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

中國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個主要特點構成的：

一，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佔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份手工業品。農民交付地主貴族的地租，也主要是地主們自己享用，不是爲了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以至皇帝，他們擁有最大部份的土地，而在農民則很少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並將收穫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七成，奉獻給地主、貴族、皇室們享樂。這種農民實際上還是農奴。

三，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

並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群的國家官吏及爲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

四，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權力，在各地地方分設官職以掌兵、刑、錢、穀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爲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中國歷代的農民，就在這種封建的經濟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壓迫之下，過着貧窮困苦의 奴隸式的生活。農民被束縛於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由於地主階級這種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窮苦和落後，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

而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農民與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與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

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曾經不能不在歷史上掀起無數的農民暴動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黃巾、銅馬，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共不下數百次，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只有這種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進化的真正動力。因爲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方式，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戰爭與農民暴動得不到先進階級先進政黨的領導，如同

現在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够正確領導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與革命後被地主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次農民革命鬥爭停息以後，雖然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

這種情況，直至近百年來，才發生新的變化。

第三節 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國過去三千多年的社會是封建社會，前面已經說明了。那末，中國現在的社會是否還是完全的封建社會呢？不是，中國已經變化了。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經一步一步的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來，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我們就來說明這種變化的過程。

如第二節所述，中國的封建社會繼續了三千多年。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才使這個社會的內部發生了重大的根本的變化。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曾經對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分解的作用。因為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及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與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銷售市場，而大量農民和

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購買市場。

事實上，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與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還在六十年前，就開始有一部份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於新式工業。到了同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到了四十年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便開始了初步的發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時期，由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於中國的壓迫，中國的民族工業，主要是紡織業、麵粉業和絲織業，曾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中，中國的紡織業，由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二個廠，增加到一九二二年的四十四個廠。麵粉業由一九一六年的六十七個廠，增加到一百零七個廠，絲織業增加了六十三個廠。在這一時期中，中國的銀行，也增加了一百零八個。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就是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如果一部份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那末，一部份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前身了。中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作為兩個特殊的社會階級來看，他們是新產生的，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階級，他們從封建社會脫胎而來，構成了新的社會階級。他們是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階級，他們是中國舊社會（即封建社會）產生的雙生子。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與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與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所以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這一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變化，還只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所發生的變化的一個方面，還有與這個變化同時存在而阻礙這個變化的另一個方面，這就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殘餘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與此相反，他們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半殖民地與殖民地。

帝國主義列強爲了這個目的，曾經對中國採用了並且還繼續採用着如同下面所說的那些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文化的一切壓迫手段，使中國一步一步的變成了半殖民地與殖民地：

一，用戰爭打敗了中國之後，帝國主義國家便搶去了中國的許多屬國與一部份領土。日本佔領了朝鮮、台灣、琉球、澎湖群島與旅順，英國佔領了緬甸、不丹、尼泊爾與香港，法國佔領了安南，而慕爾小國如葡萄牙也佔領了我國的澳門。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賠款。這樣就大大打擊了中國這個龐大的封建帝國。

二，帝國主義根據條約有在中國駐紮海軍與陸軍之權，有領事裁判權，並把全中國劃分爲幾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

三，帝國主義根據條約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並把許多通商口岸劃出一部份土地作爲他們直接管理的租界。他們控制了中國的海關與對外貿易，控制了中國的交通事業（海上的、陸上的、空中的與內河的）。因此他們便能够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於帝國主義的需要。

四，帝國主義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一部份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與廉價的勞動力，並以此與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競爭。

五，帝國主義經過借款給中國政府，並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財政。因此他們就不但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

六，帝國主義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爲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便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

七，於買辦階級之外，帝國主義還需要一種更大的社會力量，作為他們統治中國的支柱，這種社會力量就是中國的封建殘餘。他們『首先和以前社會構造的統治階級——封建地主、商業與高利貸資產階級結了聯盟，以進攻佔大多數的民衆。帝國主義到處企圖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是在鄉村）用作反動聯盟生存的基礎』。（共產國際六大會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運動大綱）『帝國主義及其所有財政和軍事力量之在中國，就是擁護且推動那些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物，使它歐化又使它成為守舊的力量』。（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演說）

八，爲了造成中國軍閥混戰與鎮壓中國人民的必要，帝國主義曾經供給中國政府以大量的軍火與大批的軍事顧問。

九，帝國主義在所有上述這些辦法之外，對於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一方面，也不放鬆，這就是他們的文化政策。傳教、辦學校、辦報紙與吸引留學生等，就是這個政策的實施。其目的在於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幹部與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

十，帝國主義用所有上述各種辦法一步一步的把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這種局面，都是帝國主義在多次殘酷戰爭之後所造成的。例如一八四〇年英國的鴉片戰爭，一八五七年英法聯軍的進攻北京，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在這些戰爭之後，中國就淪爲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宰割和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出現了上述半殖民地的局面。而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更使中國一大塊土地淪爲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這些情形，就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新的變化的又一個方面，就是把一個封建的中國變爲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中國的血跡斑斑的圖畫。

由此可以明白，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有其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的一方面，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半封建的社會；但同時，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社會。

將這兩個方面的情形綜合起來說，我們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有如下的幾個特點：

一，封建時代的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是被破壞了；但是，無論在抗戰的中國政府統治區域，無論在日本佔領區域，封建剝削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不但依舊保持着，而且與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佔着顯然的優勢。

二，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展，並在中國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它是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殘餘都有聯系的。尤其是『九一八』以來，民族工業的絕大部份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摧毀，所掠奪，更大大改變了中國的局面。

三，皇帝和貴族的專制主義是被推翻了；但代之而起的不是軍閥官僚的統治，就是地主與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政。在淪陷區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統治。

四，帝國主義不但操縱了中國的財政和經濟的命脈，並且操縱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的力量。在淪陷區，則一切被日本帝國主義所獨佔。

五，由於中國是在許多帝國主義統治或半統治之下，由於中國實際上處於長期的不統一狀態之中，又由於中國的土地廣大，就使得中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極端的不平衡。

六，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雙重壓迫，特別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中國的廣大人

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以至破產，他們過着飢寒交迫與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特殊的貧困與不自由，是世界各民族中所少有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就是這樣。

決定這種情況的，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是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封建殘餘相結合的結果。

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殘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當然還有別的矛盾，例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等）。而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鬭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與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與發展起來的。

第二章 中國革命

第一節 百年來的革命運動

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殘餘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直至現在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人

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不斷的反抗精神。

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鬭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全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全中國。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雖然竭其全力大舉進攻中國，雖然有許多地主與大資產階級份子，例如公開的汪精衛與暗藏的汪精衛之流，已經投降敵人或準備投降敵人，但英勇的中國人民不但奮戰了三年之久，而且必然還要奮戰下去，不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使中國得到完全的解放，是決不會停止的。

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鬭爭，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有了整整一百年的歷史了，從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歷史了。這個革命的過程，現在還未完結，革命的任務還沒有顯著的成就，還要求全國人民，首先是中國共產黨，擔負起堅決奮鬥的責任。

那末，這個革命的對象究竟是誰？這個革命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呢？這個革命的動力是什麼？這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這個革命的前途又是什麼呢？這些就是我們下面要來說明的。

第二節 中國革命的對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節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了：中國現時的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與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

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那末，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或主要敵人，究竟是誰呢？

不是別的，就是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就是外國的資產階級與本國的地主階級。因為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中，壓迫和阻止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主要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他們二者，二者互相勾結以壓迫中國人民，而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的壓迫，因而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凶惡的敵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來，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

中國資產階級本來也是受着帝國主義壓迫的，他們也曾經領導過光榮的革命鬭爭，也曾經在革命中起過主要的或部份的領導作用，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與當前的抗日戰爭。但是，他們曾經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這一個長時期內勾結帝國主義，並與地主階級結成反動同盟，背叛了曾經援助過他們的朋友——共產黨、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其他小資產階級，背叛了中國革命，變成了人民的公敵，造成了革命的失敗。所以當時革命的人民與革命的政黨（共產黨），曾經不得不把資產階級也當作革命對象之一。在抗日戰爭中，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叛變，已經變成漢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經不得不把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資產階級份子當作革命對象之一。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中國革命的敵人不但有強大的帝國主義，而且有很大的半封建勢力，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還有勾結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以與人民為敵的資產階級，因此，那種輕視中國革命敵人力量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就發生了。因為我們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革命

力量就非在長時間內不能聚積與鍛鍊成爲一個足以最後戰勝敵人的力量。因爲敵人對中國革命的鎮壓是異常殘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練與發揮自己的頑強性，不能堅持自己的陣地與奪取敵人的陣地。因此，那種以爲中國革命力量瞬間就可以組成，中國革命鬥爭頃刻就可以勝利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因爲我們的敵人不給中國人民以和平活動的可能，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斯大林說：『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異常正確的規定。因此，那種輕視武裝鬥爭，輕視革命戰爭，輕視游擊戰爭，輕視軍隊工作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革命的特殊根據地問題也就發生了。因爲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佔據着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隊伍不願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奮鬥下去，如果革命隊伍要準備蓄積和鍛鍊自己的力量，並避免與強大敵人在力量不夠時作決定勝負的戰鬪，那就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革命陣地，藉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凶惡敵人，藉以在長期戰鬪中逐漸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在這種情形下面，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農村經濟不完全依賴城市），由於中國土地的廣大（革命勢力有迴旋的餘地），由於中國的反革命營壘內部不統一和充滿着各種矛盾，由於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農民的鬥爭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這樣，就使在一方面，中國革命有在農村區域首先勝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狀態，而使爭取革命全部勝利的事業帶來了長期性和艱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這種特殊根據地上進行的長期革命鬥爭，主要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農民游擊戰爭。因此，忽視以農村區域作革命根據地的觀點，忽視對農民進行艱苦工作的觀點，忽視游擊戰爭的觀點，都是不正確的。

但是着重武裝鬭爭，不是說可以放棄其他形式的鬭爭；相反，沒有武裝鬭爭以外的各種形式的鬭爭相配合，武裝鬭爭就不能勝利。着重農村根據地上的工作，不是說可以放棄城市工作及尚未成爲根據地的其他廣大農村中的工作；相反，沒有城市工作及其他農村工作，革命根據地就處於孤立，革命就會失敗。而且革命的最後目的，是奪取作爲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沒有必要的足够的城市工作，就不能達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爲要使革命在農村與城市都勝利，不破壞敵人鬭爭的主要工具即敵人的軍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瓦解敵軍的工作就成爲極端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敵人長期佔領的反動的黑暗的城市與反動的黑暗的農村中進行共產黨的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不能採取急性病的冒險主義的方針，必須採取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其領導人民對敵鬭爭的策略，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開合法的法律命令及社會習慣所許可的範圍，從有理、有利、有節的觀點出發，一步一步與穩打穩紮的去進行，決不是大喚大叫與橫衝直撞的辦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節 中國革命的任務

既然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是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那末，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任務是什麼呢？

毫無疑義，主要的就是打擊這兩個敵人，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對內推翻封建殘餘壓迫的民主革命，而首先的任務便是打擊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中國革命的兩大任務，是互相關聯的。如果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就不能消滅封建殘餘，因為帝國主義是封建殘餘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如果不肅清封建殘餘，也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因為封建殘餘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所以，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這樣兩個基本任務，是互相分別，又是互相統一的。

中國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務，主要是反對侵入國土的日本帝國主義，而民主革命任務，則是在抗日戰爭中爲了爭取勝利的必要而去完成的，兩個革命任務已經聯系在一起了，那種把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分爲截然對立的兩個革命階段的觀點，已經是不合時宜的了。

第四節 中國革命的動力

根據現階段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對象、中國革命任務的分析與規定，中國革命的動力是什麼呢？

既然中國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所反對的對象主要的是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和內部的半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在推翻這兩個壓迫者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那末，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中，有些什麼階級有些什麼階層可以充當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勢力的力量呢？這就是現階段上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認清這個革命動力問題，才能正確的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策略問題。

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裏，有些什麼階級呢？有地主階級、有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都是上層統治階級。又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有各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這後面三個階級，在今天的最廣大領土

上，還是被統治階級。

所有這些階級，他們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如何，全依他們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地位來決定。所以，社會經濟的性質，不僅規定了革命的對象與任務，又規定了革命的動力。

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中國社會的各階級。

一、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是封建殘餘的代表，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剝削農民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利益的階級。

因此，作為階級來說，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而不是革命的動力。

但是地主階級中，最反動的是大地主階層。至於中小地主，特別是破產與半破產的小地主，則有比較不同的情形。當革命還是反對帝國主義與大地主時，他們往往是能够保守中立或暫時的參加鬭爭的。尤其是從這個階層出身而受過科學教育的知識份子，很多都能够這樣做。

在抗日戰爭中，一部份大地主跟着一部份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日寇變為漢奸了，另一部份大地主跟着另一部份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還留在抗戰營壘內，亦已非常的動搖。但是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尚有抗日的積極性，尚值得團結他們一道抗日。

二、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有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

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爲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家服務並爲他們所豢養的階級，他們和農村中的半封建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在中國革命史上，大資產階級歷來不是中國革命的動力，而是中國革命的對象。

但因爲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各個帝國主義的，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地對立着的時候，在革命主要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之下的買辦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一定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但一到他們的主子起來反對中國革命時，他們也就立即反對革命了。

在抗日戰爭中，親日派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或準備投降了。歐美派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尙留在抗日營壘內，亦是非常動搖着，他們就是一面抗日與一面反共的兩面派人物。我們對於大資產階級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堅決的打倒他們。而對於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則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一方面是聯合他們，因爲他們還在抗日，還應該利用他們一點殘餘的抗日積極性；又一方面是同他們作堅決鬭爭，因爲他們執行破壞團結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沒有鬭爭就會危害抗戰與團結。

民族資產階級是兩重性的階級。

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殘餘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有矛盾。從這一方面說來，他們是革命的動力之一，在中國革命史上，他們也曾經表現過這種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積極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這種情形，特別在民衆革命力量強大

起來的時候，表現得最明顯。

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他們可以成爲革命的一種動力。而在另一時期，就有跟在大資產階級後面，作爲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險。

但是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主要都是中等資產階級，他們雖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跟隨着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對過革命，但是這個階層基本上還沒有掌握過政權，而受當政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時期內，這個階層不但與大資產階級投降派有區別，而且與大資產階級頑固派也有區別，至今仍是我們的較好的同盟者，因此對於這個階層採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各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

其中有知識份子、有城市貧民、有職員、有手工業者與自由職業者、有小商人。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同農民階級，都受帝國主義、封建殘餘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日益走向破產沒落的境地。

因此，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之一，是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小資產階級也只有在不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各種類型的沒有把農民包括在內的小資產階級。

第一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

數十年來，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知識份子群與青年學生群。在這一群人中間，除去一部份接

近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並爲他們服務而反對民衆的知識份子外，一般是受帝國主義封建殘餘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使他們遭受着失業、失學的威脅的，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的有了現代的科學知識，富於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能够起着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顯明的例證。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份子與半知識份子，能够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與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與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份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知識份子在其未與民衆的革命鬭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爲民衆利益服務並使其生活群眾化之時，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革命知識份子雖有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份子都能參加革命到最後勝利的，其中一部份，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時，就往往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竟會變成革命的敵人，陳獨秀、張國燾就是這少數知識份子的代表。知識份子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自大性，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群眾鬭爭中才能洗刷乾淨。

第二是城市貧民。

這個階層中，包括破產了的手工業者、小販，離鄉別井到城市尋找職業而不得的農民，以及大群依靠不定勞動維持生活的苦力。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群眾，他們的地位大體上和貧農的地位相當，是一種半無產階級。他們的地位推動他們起來擁護革命，並使他們容易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他們是很好的革命力量，和貧農一樣，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同盟者。

第三是職員。

工商業機關中的職員，國家機關與文化機關中的廣大月薪生活者，都屬於這一類。他們是依靠出賣精神勞動或技藝而生活的人，是不剝削他人的。他們受失業威脅又非常之大，因此，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這一類人是一個相當廣大的群眾。經濟建設、國家建設與文化建設，是不能離開他們的。

第四是手工業者與自由職業者。

手工業者是獨立生產者，是一個很大的群眾，是現時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擔負者。他們不但遭受外國商品競爭的打擊，而且無力擺脫商業高利貸資本的羅網，所以他們能够站在革命的方面，他們也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他們當中的一部份是僱用少數工人的，另一部份則是不僱工人的。這後一部份人，是更加可靠的同盟者。

自由職業者例如醫生等人，雖是他們在思想意識上常常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但他們是與手工業者屬於同一範疇的，也是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部門，也是受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壓迫的，所以也可以成為革命的力量。

第五是小商人。

他們一般是受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且是一個很大的群眾。這一階層的下層份子，是不剝削別人勞動，而遭受高利貸剝削的，所以他們在革命中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只有那些剝削他人勞動而又同帝國主義買辦階級或封建殘餘有聯繫的上層份子，才是對革命表現動搖態度的人們。

四、農民階級

農民在全國總人口中佔百分之八十，是現時中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擔負者。

農民一般都是小資產階級，但他們的內部是在激烈分化的過程中。

第一是富農。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連地主一起共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稱為農村的資產階級。中國的富農大多帶有半封建性，並與城市資產階級聯系着。但革命政府不應把富農看成與地主無分別的階層，不應過早採取打擊富農經濟的政策，因為富農的生產在一定時期中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是中農。在中國農村人口中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中農一般不剝削別人，在經濟上能夠自給自足（但在年成豐收時能有些許盈餘，有時也利用一點僱傭勞動或放一點小債），而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剝削；除一部份富裕中農外，多是土地不足並沒有政治權利的。中農不但能夠堅決參加反帝革命與土地革命，並且是能夠參加社會主義革命的，因此全部中農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中農是很好的革命動力之一。中農態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後，中農成了農村中的大多數的時候是如此。

第三是貧農。中國的貧農連同僱農在內，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貧農是沒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廣大農村群眾，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軍。中農和貧農都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無產階級也只有同中農、貧農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到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農民這個名稱所包括的內容，主要的也正是指的中農和貧農。

五、無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中，現代產業工人約佔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城市手工業僱傭勞動者約佔千二百萬，此外還有廣大的農村無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有它的許多特出的優點，使它在中國革命中能够成爲領導的力量。

中國無產階級有那些特出的優點呢？

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與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鬭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特別堅決和特別徹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又沒有西歐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但須注意，中國民族改良主義有時容易在一部份工人中發生影響），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爲中國社會裏最有覺悟性的階級。

第三、中國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由於剛從農業破產出身的成份佔大多數）便利於他們同農民結成親密的革命聯盟。

因此，雖然中國無產階級有其不可避免的弱點，例如人數較少（同農民比較），年齡較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比較），文化水準較低（同資產階級比較），然而他們終究成爲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參加與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遠之如辛亥革命，因爲當時還沒有無產階級的自覺的參加，因爲那時還沒有共產黨，所以流產了。近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因爲這時有了無產階級的自覺的參加，因爲這時已經有了共產黨，所以在一個時期內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又因爲資產階級後來背叛了他們同無產階級的聯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綱領，同時也由於那時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還沒有豐富的革命經驗，結果又遭受了失敗。抗戰以來，因爲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所以團結了全民族，發動了與堅持了偉大的抗戰。

中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完全懂得：他們自己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就必須在各種不同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與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

中國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地位，造成了中國農村中與城市中廣大的失業人群。在這個人群中，有許多人被追到沒有任何謀生的正常途徑，不得不找尋所謂不名譽的或不正當的職業過活，這就是乞丐、盜賊、流氓、娼妓與許多迷信職業家的來源。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份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其另一部份則頗有革命性。但是他們缺乏建設性，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就又成為流氓主義與無政府思想的來源。因此，應該善於引導他們，注意組織他們的革命性，而防止他們那種不正當的破壞性。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對於中國革命動力的分析。

第五節 中國革命的性質

我們已經明白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我們又明白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這些都是由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而發生的關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在明白了所有這些之後，那末，我們就可以明白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即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了。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的，不是後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與半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在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動力，有時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及一部份大資產階級的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着帝國主義與封建獨佔。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

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與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它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反動派的革命民主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大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扶助私人的中小企業，並不廢除富農經濟。因此，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爲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各革命階級統一戰線的

革命。中國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否則是不可能的。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與歐美各國歷史上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是造成各革命階級統一戰線的專政。在抗日戰爭中，應該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的『一黨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的『一黨專政』，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幾黨專政』，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於何黨何派，都有參加政權的資格。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與社會主義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國主義與漢奸反動派，而不推翻任何尚能參加反帝反封建的一切資本主義成份。

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同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宣佈的三民主義革命（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因為孫中山在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又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即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孫中山又在其遺囑上提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內政外交的根本原則。所有這些，乃是區別於適應於舊的國際國內環境之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而改造成了適應於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之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就是指的這種三民主義，而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即是孫中山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離開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關於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只是在民主革命政綱上基本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則均不相同，這一問題這裏不來說

宅)。

這樣，就使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論就其鬭爭陣線（統一戰線）來說，就其國家組成來說，均不能忽視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誰要是想撇開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就一定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的命運，一定不能解決中國的任何問題。中國現階段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在內而佔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換言之，即是一個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與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份子之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共和國的澈底完成，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政策領導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節 中國革命的前途

在將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與性質這些基本問題弄清楚了之後，那末，對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關係問題，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與將來階段的關係問題，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為既然現階段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一般的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中國革命現時又是處在二十世紀四十與五十年代的新的國際環境中，即處在社會主義向上高漲、資本主義向下低落的國際環境中，處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中與第二次世界革命的前夜，那末，中國革命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的，也就沒有疑義了。

沒有問題，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既然是爲了變更現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即爲了完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而奮鬥，那末，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爲革命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也是不足爲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當然，不容否認這只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會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麼呢？就是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農民、知識份子與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權。所有這一切，便都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前途，實現社會主義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節 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與中國共產黨

總結本章各節所述，我們可以明白，整個中國革命是包含着兩重任務的，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與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而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並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之時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階段上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的偉大的全部革命任務，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爲

此而奮鬥，絕對不能半途而廢。有些幼稚的共產黨員，以爲我們只有現在階段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沒有將來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或者說，現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應該着重指出，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每個共產黨員須知，整個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包括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過程。民主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則是在於力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的領導中國革命。

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政黨或小資產階級政黨）能够擔負的。而中國共產黨則從自己建黨的一天起，就把這樣的兩重任務放在自己的雙肩之上了，並且已經爲此而艱苦奮鬥了整整十八年。

這樣的任務是非常光榮的，但同時也就是非常艱苦的，沒有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如何建設這樣一個共產黨，乃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

以下，我們就來逐步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問題。

新民主主義論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

一 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爲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爲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文化人與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爲問題了。因此，趁着『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志都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對於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適合我們民族的需要。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決不是『自以爲是』與『好爲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所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的態度與負責的精神，能够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是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

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這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爲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爲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而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與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爲一個政治上自由與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爲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聰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關係及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

予影響於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馬克思說：『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的說明宇宙，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宇宙。』這是有自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解決意識與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深刻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出發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出發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是什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又是什麼？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即自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一百年來，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與舊文化形態。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

族的新政治、新經濟與新文化。

那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與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爲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分爲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他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與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有了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可以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戊戌政變、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改革、一二九運動，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與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爲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爲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爲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原故。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爲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綫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了。

爲什麼呢？因爲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

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份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爲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鬭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之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當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參加領導或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爲激情與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爲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時，其基本性質總是同一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爲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爲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却爲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它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為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還沒有發揮這一理論的意義，以致還只是模糊的認識這個問題。我記得一九二五年蔣介石先生東征陳炯明，到了潮汕發表演說時，也說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這句話。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份』，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軌道上來；第三，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見張仲實譯『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延安『解放社』版第一三〇頁）

從這篇文章以後，關於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份的理論，斯大林曾經多次的發揮了。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

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同志，曾引證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句話。這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鬭爭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鬭爭。』」他引證這句話，意想藉此暗示他所下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的界說之正確。不過，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自那時候起，國際的形勢，已經根本改變了。歐戰和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尚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他就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這個基本點，已不成其為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份，它已經變為全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份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許多深遠著作，那更不用提了。因此，在我們已由於新的歷史環境的原故，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現在，舍米契同志，却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會有什麼意義呢？它僅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時間與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因而違犯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沒有考慮到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是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

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而有能力領導與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與一切革命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份。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最新式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現在更已成了這種世界革命偉大的一部份，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五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爲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但這個新的特點具體表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上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說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份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主要的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一個階級，而有中國無產階級參加進去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與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與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與北伐戰爭時期，即資產階級還沒有當政的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與舊俄帝國的資產階

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有建立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的可能。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與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土地剝削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就不願與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與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而且他們又在一九二七至三六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背叛過自己的革命綱領，反對過當時的革命人民。在抗戰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精衛為代表，又已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新的叛變。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美各先進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歐美各國，特別在法國，當他們還在革命時代，那裏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在中國，其資產階級則連這點徹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更有如上所說的特點罷了。

在中國的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原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而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基本部份。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與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與最新式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是最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這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中。因此，在一切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中的國家形式，唯一的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社會性質來劃分，基本的不外乎這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中，已經沒有民主氣息，一切都已經轉變或即將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與資

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一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醞釀着。將來要成爲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過渡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革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着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的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現在開始的憲政運動，我們希望能挽救這種危險。

這裏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爲之清楚的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份子，不包括漢奸，而是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革命的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十六年來，國民黨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今天這樣國難深重的局面。這是國民黨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禮中改正這個錯誤。

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

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直到鄉民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與指揮革命鬭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的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的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與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與國體不相適應。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與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係，這就是今天『建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

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即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但同時，它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原故。

它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而是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辦不到，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與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

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表現。

七 駁資產階級專政

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共和國，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是

『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孫中山語）的，舍此沒有第二條路走。

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但無如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

依國際環境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环境。因此，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爲此而抱終天之恨。現在是一個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打了進來，它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現在是日本在中國發展它的資本主義，却不是什麼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現在是日本資產階級在中國專政，却不是什麼中國資產階級專政。不錯，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正惟它快要死，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正惟日本帝國主義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的深坑之中，就是說，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國，一定要把中國變爲殖民地，它就斷絕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與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路。

其次，是社會主義不容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與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與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勝利，他們的勝利，就是對於我們的援助。雖然不能說，中國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與英、美、法、德、意各國或其中一二國的革命勝利之

後，但須加上他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反蘇運動的教訓，不是異常明顯的嗎？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與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與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後，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

如果說，由於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與十月革命之後，還有過一個基馬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決不容許有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由於中國的特殊條件（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無產階級的徹底性），中國從來也沒有過土耳其的那種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份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麼基馬爾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馬爾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與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呢？何況所謂基馬爾的土耳其，最後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的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帝國主義反動世界的一部份。處在二十世紀四十與五十年代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變為世界反革命的一部份，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變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

依國內環境說，中國資產階級應該獲得了必要的教訓。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由於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力量，使革命剛剛勝利之際，他們就一脚踢開了這些人民大眾，獨佔革命的果實。並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舉行了十年的『剿共軍』。然而結果又怎麼樣呢？現在是當一個強大敵人深入國土、抗日戰爭已打了兩年之後，難道還想抄襲歐美資產階級已經過時了的老章程嗎？過去

的『剿共十年』並沒有剿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還想再來試一次嗎？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後，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如果有人還想從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經是新的剿共典型，同舊的多少有點區別。但是這種新的剿共事業，不是已經有人捷足先登奮勇擔負起來了嗎？這個人就是汪精衛，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誰要加進他那一夥去，那是行的，但是什麼資產階級專政呀，資本主義社會呀，基馬爾主義呀，現代國家呀，一黨專政呀，一個主義呀等等花腔，豈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嗎？如果不入汪精衛一夥，要入抗日一夥，又想於抗日勝利之後，一脚踢開抗日人民，自己獨佔抗日成果，來一個『一黨專政萬歲』，又豈非近於做夢麼？抗日，抗日，是誰之力？離了工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你就不能走動一步。誰還敢於用腳去踢他們，誰的腳也就要變為粉碎，這又豈非成了常識範圍裏的東西了嗎？但是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我說的是頑固派），二十年來，似乎並沒有得到什麼教訓。不見他們還在那裏高叫什麼『限共』『溶共』『反共』嗎？不見他們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之後，再來一個『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再來一個『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嗎？好傢伙，這樣的『限制』與『處理』下去，不知他們準備置民族命運於何地，也不知他們準備置其自身於何地？我們誠心誠意的奉勸這些先生們，你們也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中國與世界，看一看國內與國外，看一看現在是什麼樣子，不要再重複你們的錯誤了。再錯下去，民族命運固然遭殃，我看你們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辦。這是斷然的，一定的，確實的，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如不覺悟，他們的事情是並不美妙的，他們將得到一個自尋死路的前途。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堅持下去，不是一家獨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業弄個勝利，才是上策，否則一概是下策。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

衷心勸告，『勿謂言之不預也』。

還是中華民國故總統黎元洪先生說過的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們共產黨人對於一切革命的人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是決不排斥他們的，我們將與所有各個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產黨，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統一戰線，那是不行的。中國必須抗戰下去，團結下去，進步下去，誰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八 駁『左』傾空談主義

不走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路，是否就可以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路呢？也不可能。

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的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

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這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以證明什麼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裏面了，共產主義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起勁地反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與陝甘寧邊區。其目的，是想根本消滅任何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性，反對抗日的徹底性，而為投降日寇準備輿論。這種情形，是日本人有計劃地造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武漢後，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着手於政治進攻與經濟引誘。所謂政治進攻，就是在抗日陣線中誘惑動搖份子，分裂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辦實業』。在華中華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五十一，日資佔百分之四十九。在華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四十九，日資佔百分之五十一。日寇並允許將各中國資本家原有產業，發還他們，折合計算，充作資本。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份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份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賊膽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於是打夥兒的開了個會，決議：事先要在文化界輿論界準備一下。計策已定，事不宜遲，於是僱上幾個玄學鬼，再加幾名托洛茨基，搖動筆桿鎗，就亂喚亂叫、亂打亂刺了一頓。於是什麼『一次革命論』呀，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呀，共產黨在中國沒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軍新四軍破壞抗日、游而不擊呀，陝甘寧邊區是封建割據呀，共產黨不聽話、不統一、有陰謀、要搗亂呀，來這麼一套，騙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時機一到，資本家們就很有理由的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黃巴郎賣給敵人。這個叫做偷樑換柱，實行投降之前的思想準備或輿論準備。這班先生們，像煞有介事的提倡『一次革命論』，反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却原來不為別的，專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們，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爲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啣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制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爲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駁頑固派

於是資產階級頑固派就跑出來說：好，你們共產黨既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推到後一個階段去了，你們既然又宣稱：『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就把共產主義暫時收起好了。這種議論，在所謂『一個主義』的標題之下，已經變成了狂妄的叫囂。這種叫囂，其本質就是頑固份子們的資產階級專制主義。但爲了客氣一點，叫它作毫無常識，也是可以的。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與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美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

度，已有一部份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份，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微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後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麼要那樣叫囂與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

誰人不知，作為社會制度或行動綱領，共產黨是有現在綱領與將來綱領，或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之兩部份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份，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因為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產主義，豈非荒謬絕倫之至？在共產黨人，正因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有和自己的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之點，所以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否則就沒有這種可能了。這是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上的統一戰線，孫中山所謂『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這種統一戰線。否認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否認統一戰線。頑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黨主義，否認統一戰線，才造出那些否認共產主義的荒謬說法來。

『一個主義』也不通。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現在封建階級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和尚有佛教主義，基督徒有基督主義，農民有多神主義，近年還有人提倡什麼基馬爾主義、法西斯主義、唯生主義、按勞分配主義，為什麼無產階級不可以有一個共產主義呢？既然是數不清的主義，為什麼見了共產主義就高叫『收

『起』呢？講實在話，『收起』是不行的，還是比賽吧。誰把共產主義比輸了，我們共產黨人自認晦氣。如若不然，那所謂『一個主義』的反民權主義的作風，還是早些『收起』吧！

爲了免除誤會，並使頑固派開開眼界起見，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主義比較起來，有相同的部份，也有不同的部份。

第一，相同的部份。這就是兩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基本政綱。一九二四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之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於這些相同，並由於三民主義見之實行，就有兩個主義兩個黨的統一戰線，忽視這一方面，是錯誤的。

第二，不同部份，則有：（一）民主革命階段上一部份綱領的不相同。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八小時工作制與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一部份。如果它不補足這一部份，並且準備實行起來，那對於民主政綱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說完全相同。（二）兩個階段的不同。共產主義於民主革命階段之外，還有一個社會革命階段，因此於最低綱領之外，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社會革命階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綱領，沒有最高綱領，即沒有作爲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則是民生史觀或唯生論，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共產主義是理論與實踐一致，即有革命徹底性。三民主義除了那些最忠實於革命與真理的人們之外，是理論與實踐不一致的，講的與做的互相矛盾，即沒有革命徹底性。上述這些，都是兩者的不同部份。由於這些不同，共產主義者與三民主義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只看見統

一方面，不看見矛盾方面，無疑是非常錯誤的。

明白了這些之後，就可以明白，資產階級頑固派要求『收起』共產主義，這是什麼意思呢？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制主義，就是毫無常識了。

一〇 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

資產階級頑固派完全不知道歷史的變化，其知識的低能降到零度以下。他們既不知道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新三民主義與舊三民主義的區別。

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與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是基本上相同。但是這種三民主義是什麼三民主義呢？這種三民主義不是任何別的二民主義，乃是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我願頑固派先生們，於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餘，也去翻閱一下這個宣言。原來孫中山先生在這個宣言中說道：『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就可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真正三民主義，其他都是僞三民主義。只有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才是『真釋』，其他一切都是僞釋。這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吧，這篇宣言的通過，我和很多的國民黨員都是親眼看見的。

這篇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

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

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後，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抗日的頭兩年中，因為帝國主義大戰尚未爆發，還可利用英美等國同日本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大戰爆發之後，這種矛盾雖然沒有消滅，但是已經縮小，如果利用得不得當，英美就會要求中國參加反蘇。中國如果依了它們，那就立刻站在帝國主義的反動戰線方面，什麼民族獨立也就完了。社會主義的蘇聯與帝國主義的英美之間的鬥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捲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鬥，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後勝利。如果舍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了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如果照汪精衛從前的話，來一個『夾攻中的奮鬥』，來一個『夾攻中奮鬥』的三民主義，豈不勇矣哉？但可惜連發明人的汪契弟先生也放棄（或『收起』）了這種三民主義，他現在改取了聯帝的三民主義。如果說帝亦有東帝西帝之分，他聯的是東帝，我與之相反，聯他媽一批西帝，東向而擊，又豈不革命矣哉？但無如西帝們要反蘇反共，你聯它，它就要請你北向而擊，你革命也革不成。在所有

這些情形之下，就規定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決不能是同帝國主義聯合反俄的三民主義。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疑麼？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够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幹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麼？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麼？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麼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只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麼『好』呢？却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的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却不歡喜『反』。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齋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齋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的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衆』，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斯大林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

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大家都在山頭上。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爲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他部份，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大城市失陷後，更不止百分之八十了。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份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與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他們，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爲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他們，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爲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並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並不實行『喚起民衆』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的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爲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份的時代產生的。只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佈它『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與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至於舊三民主義，那是中國革命舊時期的產物。那時的俄國是帝國主義的俄國，當然不能有聯俄

政策。那時國內也沒有共產黨，當然不能有聯共政策。那時，工農運動也沒有充分顯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爲人們所注意，當然就沒有聯合工農的政策。因此，民十三（一九二四）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如不把它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能前進。聰明的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得了列寧與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遂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第一次大革命。

舊三民主義在舊時期內是革命的，它反映了舊時期的歷史特點。但如果在新时期內，在新三民主義已經建立之後，還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後，還要反對聯俄；在有了共產黨之後，還要反對聯共；在農工已經覺悟並顯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後，還要反對農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識時務的反動的東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反動，就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結果。語曰：『識時務者爲俊傑』，我願今日的三民主義者記取此語。

如果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那就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什麼基本上相同之點，因爲它是舊時期的，是過時了的。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要反俄反共反農工，那就是反動的三民主義，它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不但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敵人，一切都談不上。這也是三民主義者應該慎重地考慮一番的。

但是無論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基本上完結以前，新三民主義是不會被一切有良心的人們放棄的。放棄它的只是那些汪精衛、李精衛之流。汪精衛、李精衛們儘管起勁的幹什麼反俄反共反農工的偽三民主義，自會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們繼續擁護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如果說，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後，還有許多真三民主義者繼續爲中國革命而奮鬥，那末，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

的今天，這種人無疑將是成千成萬的。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與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漢奸與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份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上面，我們說明了中國政治在新時期中的歷史特點，說明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問題。下面，我們就可以進到文化問題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與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份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與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與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與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類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鬭爭是生死鬭爭。

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與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如我們在第三節中已經提過的話，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佔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

對於封建經濟說來，它是新經濟。和這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與發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作爲覺悟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種革命的政黨，其中主要的是國民黨與共產黨。而在觀念形態上作爲這種新的經濟力量與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並爲他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黨，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這些舊東西是由兩部份合成的，一部份是中國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另一部份是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以後者爲盟主。所有這些，都是壞東西，都是應該徹底破壞的。中國社會的新舊鬭爭，就是人民大眾（各革命階級）的新勢力與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舊勢力之間的鬭爭。這種新舊鬭爭，即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鬭爭。這種鬭爭的時間，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從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說，革命亦有新舊之分，在某一歷史時期是新的東西，在另一歷史時期就變爲舊的了。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爲前八十年與後二十年兩個大段落。這兩大段落中，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歷史性質的特點，即在前八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舊範疇的，而在後二十年，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便屬於新範疇了。舊民主主義——前八十年的特點。新民主主義——後二十年的特點。這種區別，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現這種區別呢？這就是我們要在下面說明的。

一二 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與『五四』以後，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鬭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與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鬭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帶着這種性質。那時的所謂學校，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說基本上，是說那中間還夾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餘毒在內）。以嚴復輸入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亞丹斯密斯的古典經濟學，穆勒的形式邏輯與法國啓蒙學者孟德斯鳩輩的社會論爲代表，加上那時的自然科學，是『五四』以前所謂新學的統治思想。在當時，這種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鬭爭的革命作用，是替舊時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與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與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掩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五四』以後則不然。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世界第一次大戰與十月革命之後，即在民族問題與殖民地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這種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是非常之顯

然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與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着帝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在自然科學領域佔領陣地與進行戰鬥，一般的暫時還讓自然科學爲資產階級的宇宙觀所統治；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在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時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的領域，却引起了極大的革命。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彫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份。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份。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它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却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受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個時期

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在中國，文化革命，和政治上同樣，是統一戰線的。

這種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二十年來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的兩年，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的九年，第四個時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現在的三年。

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時期中以五四運動為主要的標幟。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

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份人的統一戰線革命運動。他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份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份子，而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份子。五四運動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與北伐戰爭。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五四運動的右翼，到了第二時期，他們中間的大部份就與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

第二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五卅運動與北伐戰爭為標幟，繼續了並發展了五四運動時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並且在政治上形成了這個統一戰線，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够『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建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和教育界、學術界、青年界沒有多大聯

系的，因為它沒有提出反帝口號，也沒有提出反封建社會制度與反封建文化的口號。在這以前，是舊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是被人們看成一部份人爲了奪取政府權力，即是說爲了做官，而臨時應用的旗幟，看成純粹政治活動的旗幟。在這以後，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由於國共兩黨的合作，由於兩黨革命黨員的努力，便把這種新三民主義推廣到了全中國，推廣到了一部份教育界、學術界與廣大青年學生之中，這完全是因為把原來的三民主義發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之故，沒有這一發展，三民主義思想的傳播是不可能的。

在這一時期中，這種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國共兩黨與各個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兩個主義結成了統一戰線。以階級論，則是三個階級（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那時，以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爲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與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爲內容的新文學與白話文。在廣東戰爭與北伐戰爭中，曾經在中國軍隊中灌輸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國的軍隊。在千百萬農民群眾中，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煽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鬭爭。由於這些，再由於蘇聯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成功，工人農民幫助資產階級爬上了政權，資產階級就立即結束了這次大革命，轉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時期，是一九二七至三六年的新的革命時期。因為在前一時期的末期，革命營壘中發生了變化，中國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革命營壘中原有的三個階級，這時剩下了兩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革命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所以這時候，中國革命就不得不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而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這個革命。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動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動圍剿：軍事圍剿與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

深入：農村革命深入與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與全世界的反動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與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農人民。從當事者看來，似乎以為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却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促成了全國人民的覺悟。這三者都是積極的結果。而其消極的結果，則是一個強大敵人打進來了，這就是為什麼全國人民至今還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全國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麼？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却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這一時期的鬭爭，在革命方面，是堅持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與新三民主義。在反革命方面，則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斬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斬了他的新三民主義，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的災難。

第四個時期就是現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曲線運動，又來了一次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範圍更放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一切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時期的第一階段，是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有普遍的動員。武漢失陷以後，為第二階段，政治情況發生了許多變化，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投降了敵人，其另一部份也想結束抗戰。文化運動反映這種情況，就表現了葉青、張君勱等人的反動，與言論出版的不自由。

為了克服這種危機，必須同一切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思想進行堅決的鬭爭，不擊破這些反動思

想，抗戰的勝利是無望的。這一鬭爭的前途如何？這是全國人心目中的大問題。然而依據國內國際條件，不論抗戰路程上有多少困難，中國人民總是要勝利的。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後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功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麼？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示了它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的最後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了勝利。這在東方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

一切都是從艱苦鬭爭中鍛鍊出來的。新文化也是這樣，二十年中有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一切好的壞的東西都考驗出來了。

資產階級頑固派，在文化問題上，和他們在政權問題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知道中國新時期的歷史特點，他們不承認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或新三民主義的文化。他們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專制主義，在文化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一部份所謂歐美派的文化人（我說的是一部份），他們曾經實際贊助過政府的文化剿共，現在似乎又在贊助什麼『限共』『溶共』政策。他們不願工農在政治上抬頭，也不願工農在文化上抬頭。資產階級頑固派的這條文化專制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權問題一樣，沒有國內國際的條件。因此，這種文化專制主義，也還是『收起』為妙。

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現在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文化。如果以為現在就是或應該是社會主義的

國民文化，也是不對的。這是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宣傳，當作了當前行動綱領的實踐；把用共產主義的立場與方法去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當作了中國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國民教育與國民文化化的方針。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國民文化必須是反映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我們現在還沒有這種政治經濟，所以還不能有這種國民文化。由於現時的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部份，是它的一個偉大的同盟軍。但是這種一部份，不是以社會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而是以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的。由於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但是這種領導，是領導人民大眾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不是領導他們去作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所以現在新文化的本質還是新民主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列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與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到勝利。但是現時國民文化的基本性質，却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新民主主義的，因爲它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不是無產階級反資本主義的文化。因此，我們既應把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與社會制度的宣傳、與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爲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的共產主義的方法、與作爲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爲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由此可知，現階段上中國新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爲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或新三民主義。

一五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與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與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與互相發展的關係，互相作為世界新文化的一部份。但是決不能與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够。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與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啓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與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與糟粕兩部份，然後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作為自己的營養分，決不能生吞活剝的毫無批判的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的恰當的統一起來，就是說，取得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與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

真理，主張理論與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够與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自然科學思想，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與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可以與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民間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與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因此，對於人民群眾與青年學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衆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幹部的知識與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與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與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官。『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於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這種文化運動與實踐運動，都是群眾的。因此，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文化人與文化思想而不接近民衆，他就是『空軍司令』或『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

敵人。爲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衆，須知民衆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就是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的演詞——

同志們！

今天延安各界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各界代表濟濟一堂，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這個會是爲了什麼的呢？就是爲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

民主的抗日

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辦了，問題只在於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作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辦。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面少了兩件，另一面却多了兩件，多了兩件什麼東西呢？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勢力的壓迫。由於多了這兩件東西，所以中國就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就是

獨立與民主，因此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的壓迫，破壞封建勢力的壓迫。要堅決的徹底的破壞這些東西，而決不能有絲毫留情之處。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末，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這些壞東西，這些狗屎堆，不去破壞，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着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不然，一朵好花插在牛屎上，那是不像樣子的。把獨立與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一定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政治。剛才吳老同志的話，我都是贊成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時了的，歐美式，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不是最新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那種舊式的民主，在外國行過，現在却已經沒落了，不適合時代要求了，變成反動的東西了，這種反動的東西，我們萬萬不能要。中國的頑固派，他們還要這種東西，但他們是要不來的，因為中國人民大家不要這種東西，中國人民不歡迎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專政。中國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國大多數人民作主，資產階級一個階級來包辦政治，是斷乎不許可的。最新式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怎麼樣呢？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各先進國都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但是這種民主，在現在的中國，還行不通，因此我們也只得暫時不要它。到了將來，有了一定條件之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現在，

我們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舊式的民主，又非最新式的民主，而是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目前就要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黎元洪曾經講過一句話，他道：『有飯大家吃』。我想這可以解釋新民主主義；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講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的話。那宣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同志們，我們研究憲政，各種書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這篇宣言，是這篇宣言中的上述幾句話，應該熟讀而牢記之。『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也就是孫中山革命三民主義的憲政。

有促進之必要

我們今天開的這個會，叫做憲政促進會。爲什麼要『促進』呢？如果大家都在進，就用不着促了。我們辛辛苦苦來開會，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有些人，他們不進，躺着不動，不肯進步。他們不但不進，而且要拖尾巴，做封神榜上的申公豹，向後倒退。你叫他進，他就死也不肯進，這些人叫作頑固份子。頑固到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就要開大會，『促』他一番。這個『促』字是那裏來的呢？是誰發明的呢？我昨天在青年憲政促進會上就講過，這不是我發明的，而是一個偉大人物發明的，就是

那位講『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發明的，是孫中山先生發明的。你們看，在他那個遺囑上，不是寫着『最近主張開國民大會，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嗎？同志們，這個『囑』不是普通的『囑』，而是『至囑』。『至囑』者，非常之囑也，豈容隨隨便便，置之不顧？說的是『最短期間』，一不是最長，二不是較長，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國民大會在最短期間實現，就要『促』。孫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張的國民大會至今沒有開，天天鬧訓政，把時間糊裏糊塗的鬧掉了，把一個最短期間，變成了最長期間，還口口聲聲假託孫先生，孫先生在天之靈，真不知怎樣責備這些不肖子孫呢？現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會進的，很多的申公豹在倒退，很多的人民還不覺悟，所以要『促』。

因為不進，就要促。因為進得慢，就要促。於是乎我們就大開促進會。青年憲政促進會呀，婦女憲政促進會呀，工人憲政促進會呀，各學校各機關各部隊的憲政促進會呀。蓬蓬勃勃，辦得很好。今天我們再開一個總促進會，群起而促之，為的是要使憲政快些實行，為的是要快些實行孫先生的遺教。

有人說，他們在各地，你在延安，你要促，他們不聽，有什麼作用呢？有作用的。因為事情在發展，他們不得不聽。我們多開會，多寫文章，多做講演，多打電報，人家不聽也不行。我以為我們延安的許多促進會，有兩個意義：一是研究，二是推動。為什麼要研究呢？他們不進，你就促他，他若問你：為什麼促我呀？這樣，我們就得答覆問題。爲了答覆問題，就得好好研究一下憲政的道理。剛才吳老同志講了許多，這些就是道理。各學校、各機關、各部隊、各界人民，都要研究當前的憲政問題。

我們有了研究，就好推動人家。推動就是『促進』，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會逐漸的動

起來，然後匯合很多小流，成一條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東西都沖洗乾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就出來了。這種推動作用，會是很大的。延安的舉動，不能不影響全中國。

事情不容易

同志們，你以為會一開，電報一打，頑固份子就不得了了嗎？他就向前進步了嗎？他就服從你的命令了嗎？不，他不會那麼容易聽你的。有很多的頑固份子，他們是頑固專門學校畢業的，他們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還是頑固。什麼叫頑固？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樣的人，就叫作頑固份子。要使這樣的頑固份子，來聽你的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也不論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之後，在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佈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則不然。中國是革命尚未成功，國內除我們邊區等地而外，尚無民主政治的事實。中國現在的事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頒佈一種憲法，也必然被封建勢力所阻撓，被頑固份子所障礙，要想順暢實行，是不會有的。所以現在的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這是一個鬭爭，決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279

現在有些歷來反對憲政的人，也在口談憲政了。他們為什麼談憲政呢？因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沒有辦法，只好也來應付一下。而且他們還提高嗓子在叫：『我很久以來就是一貫主張憲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熱鬧。在多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裏一套，手裏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

的頑固份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給你。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佈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大總統，那就更多，第一個是孫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凱取消了。第二個是袁世凱，第三個是黎元洪，第四個是馮國璋，第五個是徐世昌，可謂多矣，但是他們同專制皇帝有何分別呢？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像現在的英法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實際上都是殺人政治。這樣的情形，在南美洲，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國家，都是掛起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却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他們口裏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却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同志們，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從艱苦鬭爭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寫，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頒佈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塗了，事情決不是這麼容易的。

大有希望

這樣講來，豈不是嗚呼哀哉了嗎？事情是這樣困難的，憲政是沒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憲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是有希望，中國一定要變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爲什麼？憲政的困難，就是因

爲頑固份子作怪。但是頑固份子是不能永遠頑固下去的，所以我們還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頑固份子，他們雖然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也頑固，但是不能永遠頑固下去，到了後來，他們就要變了。比方汪精衛，他頑固了許多時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盤上逞頑固，只好跑到日本懷裏去了。比方張國燾，他也頑固了許多時候，我們就開了幾次鬭爭會，七鬭八鬭，他也溜了。頑固份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後來，就要變，變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也有變好了的，也是由於鬭，七鬭八鬭，他認錯了，就變好了。總之頑固派是要起變化的。頑固派，他們總有一套計劃，其計劃是如何損人利己，以及如何裝兩面派之類。但是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同他們的願望相反。他們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的想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斯大林腳，但是，從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蘇德訂立協定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却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到現在，這塊石頭，還繼續在打張伯倫哩。中國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做了三天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等，他們都想鎮壓人民，但結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損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結果都不妙。

現在反共派頑固派，如果他不進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們想借統一的美名，要取消進步的陝甘寧邊區，要取消進步的八路軍、新四軍，要取消進步的共產黨，要取消進步的人民團體。這一套計劃，都是有的。但是我將來結果，決不是頑固取消進步，倒是進步要取消頑固。頑固份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自己進步才行。所以我們常勸那些頑固份子，不要進攻八路軍，不要反共反邊區。如果他一定要的話，那他就應該做好一個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的第一條上寫道：『爲了決心消滅我頑固份子自己起見，我有反共反邊區之任務。』頑固份子的『剿共』經驗，是相當豐富的。如果你現在

又想『剿共』，那也有你的自由。因為你吃了你自己的飯，你又睡足了覺，你要剿，那也隨你的便。不過，也要請你做好一個決議案，這決議案就是：『爲了共產黨太小了，有大大發展之必要，八路軍槍枝太少了，有大大增加之必要，因此我頑固派就有剿共之任務。』這是不可移易的決議，過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決議案行事的，今後如要剿，又得重複這個決議案，因此，我勸他們還是不剿爲妙。因爲全國所要的是抗日、是團結、是進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敗。

總之，凡屬倒退現象，結果都同主持者的原來願望相反，古今中外，沒有例外。

現在的憲政，也是這樣，要是頑固派仍然反對憲政，那結果一定同他們的願望相反。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同他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爲全國人民要這樣，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却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所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眾，不是一手一足所能收效。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很好。會後還要寫文章，拍電報，送到各地去。並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華北、華中、全國各地，到處去開這樣的會。這樣的做下去，做它幾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要亡國滅種。爲了避免亡國滅種，就一定要這樣做。爲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都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困難，却是大有希望的。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位參議員先生，各位同志：今天邊區參議會開幕，是有重大意義的。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三民主義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不能有任何別的目的，只能有這個目的。因為我們的敵人不是國內的，而是國外的，是德意法西斯，是日本帝國主義。現在蘇聯英國美國聯合一致，反對德意法西斯侵略，蘇聯紅軍正在為全人類的命運奮鬥。我們的目的同他們一樣，唯一的在於反對德意日法西斯。日本還在繼續侵略，它要消滅中國的獨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就是要團結全中國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和全國各黨派各階級各民族合作，只要是中國人，只要不是漢奸，都要聯合一致，共同奮鬥。共產黨的這種主張，是始終一致的。中國英勇抗戰已有四年多，這個抗戰是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的，是由國共合作及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的合作來支持的。但是還沒有勝利，還要繼續奮鬥，還要使三民主義見之實行，才能勝利。

為什麼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直到現在還沒有在全中國實現。為什麼不實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當然是一個更好的制度，這個制度在蘇聯早已實行了，但在今天的中

國，還沒有實行的條件。陝甘寧邊區所實行的都是三民主義，任何一個建設，任何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都沒有超過三民主義的原則。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份人謀利益。全國各階級各民族都要有人權、政權、財權，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都要各得其所。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中間階級的利益，如果中間階級不得其所，如果中間階級沒有說話權，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事做，沒有書讀，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及其他各項政策，都是為着團結一切抗日人民的，顧及一切階級，而特別是顧及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的政策，是真正三民主義的政策。在土地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使農民有衣穿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使地主也有衣穿有飯吃。在勞資關係上，我們一方面實行扶助工人的政策，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如此等等，都是為了團結全民，以便合力抗日，合力建國。這樣的政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就是三民主義的政策。既不是所謂一黨專政，也不是外國的舊式民主，而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這是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我們希望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不但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並且在全國也實行起來。

我們實行這種政策是有成績的，是得到全國人民贊成的。但是也有缺點。一部份共產黨員，還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還保有一種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的錯誤思想。他們還不明白共產黨員有義務與黨外人士合作，無權利排斥黨外人士的原則，這就是傾聽群眾意見，要聯系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的原則。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上有一條，規定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

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就是爲了防止這一部份還不明白黨的政策而說的。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應該跟別人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爲是，盛氣凌人，自己是什麼都好，別人是什麼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敵人漢奸以及破壞抗戰與團結的人們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同志們，我們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教育，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爲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辦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於同別人商量問題的態度和作風。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與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幹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敢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够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線的。同時也要請各位黨外同志贊成我們的主張，瞭解共產黨並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强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個叫做內外夾攻，把毛病治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各位參議員先生不惜辛勤，來此開會，我很高興的慶祝這個盛會，慶祝這個盛會的成功。

論聯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同志們！盼望很久的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會了，我代表中央委員會向你們作報告。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的大會討論與決定許多重大問題。然後，我們將向中國人民說明我們的意見。如果他們同意我們的意見，我們就協同他們動手去做。

我們的大會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開會的：中國人民在其對於日本侵略者作了將近八年的堅決的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與自我犧牲之後，出現了這樣的新局面：整個世界上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聖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但是中國現在仍然不團結，日本侵略者仍然在壓迫我們，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在此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毫無疑義，中國急需團結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與統一全

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 and 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後，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範圍的各黨各派與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政府，領導解放後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與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我們認爲只有這樣做，才是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報告，主要地就是討論這些要求。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已成了中國人民及同盟國輿論界十分關心的問題，因此，我的報告，將着重地說明聯合政府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工作，已經克服了很多的困難，獲得了鉅大的成績。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在我黨與人民面前，尚存在着嚴重的困難。目前的時局，要求我黨進一步從事緊急的與更加切實的工作，繼續地克服困難，爲完成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奮鬥。

二 國際形勢與國內形勢

中國人民能不能實現我們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我們認爲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依靠中國人民覺悟、團結與努力的程度來決定。但是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都對中國人民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中國人民如能很好地利用這些條件，積極地堅決地再接再厲地向前奮鬥，戰勝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是毫無疑義的。中國人民應當加倍努力，爲完成自己的神聖任務而奮鬥。

目前的國際形勢是怎樣的呢？

和中國及外國一切反動派的預料相反，英美蘇三大民主國一直是團結的。她們之間，過去存在過，將來還可能發生某些爭議，但是團結終究是統治一切的。這是一個決定一切的條件，克里米亞會議最後地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條件是在世界歷史的重大轉變關節——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產生的。在法西斯侵略戰爭爆發成爲威脅全世界人民的戰爭的時候，實際上幫助法西斯侵略者反對英美蘇團結的反動勢力，從許多主要國家（不是一切國家）的政治舞台上大批地被推落下去，贊成英美蘇團結的反法西斯勢力佔了上風，這個條件就產生了。自從世界上出現了這個條件，世界的面目就改觀了。整個法西斯勢力及其在各國的游魂，必須被消滅。國際間的重大問題，必須以三大國或五大國爲首的協議來解決。各國內部問題，無例外地必須按照民主原則來解決。世界將引向進步，決不是引向反動。這些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新面目。當然應該提起充分的警覺，了解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的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願看見本國人民與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與解放，不願看見英美蘇中法繼續團結領導世界新秩序的世界分裂主義者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誰要是忽視了這些，誰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但是，歷史的總趨向已經確定，不能改變了，世界的新面目已經出現了。

這個新面目，僅僅不利於法西斯和在實際上幫助法西斯的各國反動派（中國的也在內）。對於一切國家的人民及其有組織的民主勢力，則都是福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動力。蘇聯人民創造了強大力量，充當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軍。英、美、中、法四大國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人民的偉大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爲可能。法西斯被打倒以後，各國人民將建設一個鞏固的與持久的和平世界。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將是這種和平的起點。

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這就是目前世界新形勢的規律。

這一新形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在其後的所謂『和平』時代，是大不相同的。在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蘇聯，也沒有現在這樣的英、美、中、法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各國的人民的覺悟程度，自然也就不能有三大國或五大國爲首的現在這樣的世界團結。我們現在是處在完全新的局面之下。現在有的是：覺悟了與團結了並且正在更加覺悟與更加團結的世界人民以及人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就規定了世界歷史車輪所要走向的目標和到此目標所要選取的道路。

法西斯侵略國家被打敗，總的和平局面出現了以後，並不是說就沒有了鬭爭。廣泛地散佈着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一定還要搗亂。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陣營中，存在着反民主勢力，他們仍然要壓迫人民。所以，國際和平實現以後，反法西斯的人民大眾與法西斯殘餘勢力之爭，民主與反民主之爭，仍將充滿世界的大部份地方。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殘餘勢力及反民主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到達這一天，決不是很快與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達這一天。反法西斯戰爭——正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這個戰後人民鬭爭的勝利開闢了道路。也只有這後一種鬭爭勝利了，鞏固的與持久的和平才得了保障。這就是世界人民的光明前途。

由於英美蘇三大民主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團結，最後地打敗法西斯德國的戰爭很快就可結束，紅軍已攻擊柏林，這個希特勒的神經中樞，不日可下。英美法盟軍正在最後地打擊希特勒殘軍。意大利人民發動了起義。這一切，將最後地打敗希特勒。希特勒被打敗以後，將在世界出現這樣的局面：解放歐洲，並立即增強着解放亞洲的可能性，從而使亞洲獲得解放。

英美中三大國團結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事業上。由於中國人民在八年戰爭中的長期艱苦的奮鬥，英國在東方的協同作戰，特別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勝利，使戰爭迫近了日本的大門。日本侵略者已處於極端的不利地位，它的軍心民心已發生了更大的動搖。但是它還有力量的，它正在準備持久的掙扎，

並希望通過中國及同盟國內部的動搖份子謀取妥協的和平。但是一切太平洋國家全體人民的利益，均要求完全消滅日本侵略者。蘇聯已廢除了蘇日中立條約，這件事給了中國人民及太平洋各國人民以極大的興奮。在這種種情況下，我們應該這樣說：到達最後地完全地消滅日本侵略者，還有一段艱難的路程，我們決不可輕敵；但是勝利的把握是更大了，我們一定能勝利。

中國人民從來也沒有遇到過像現在這樣有利的國際條件，這個條件鼓勵中國人民支持了長期的戰爭。

目前中國的國內形勢是怎樣的呢？

中國的長期戰爭，使中國人民付出了並且還將再付出重大的犧牲。但是同時，正是這個戰爭，鍛鍊了並且還將再鍛鍊英勇鬪爭的中國人民。這個戰爭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悟與團結到了這樣的程度：不但在中國古代沒有過，就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鬪爭，也沒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國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強大的民族敵人，而且存在着強大的實際上幫助民族敵人的國內反動勢力，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不但已經有了較之過去任何時候要高的覺悟程度，而且有了強大的中國解放區與日益高漲着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所有這些，就是國內的有利條件。如果說，中國近百年來一切人民鬪爭都遭到了失敗或挫折，而這是因為缺乏國際國內的必要的條件，那末，這一次，就不同了，比較以往歷次，一切必要的條件更具備了，避免失敗與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如果我們能夠團結全國人民，努力奮鬥，並給以適當的指導，我們就會有勝利。

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打敗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的信心，現在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實現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基本要求的時機，已經到來了。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為沒有疑義了。

這些，就是目前國際與國內的一般形勢。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

中國問題的關鍵

談到國內形勢，我們還應對中國抗日戰爭加以具體的分析。

中國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五個最大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中國人民不但在抗日戰爭中起了與還將起極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戰後世界和平上將起極大的作用，在保障東方和平上則將起決定的作用。中國人民在其八年抗日戰爭中，爲了自己的解放，爲了幫助各同盟國的勝利，曾經作了偉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地是屬於中國人民方面的。中國軍隊的廣大官兵，在前線流血戰鬪；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界、產業界，在後方努力工作；海外華僑，輸財助戰；一切抗日政黨，除了那些反人民份子外，均對戰爭有所盡力。總之，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血與汗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奮戰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來，中國反動份子造作謠言，蒙蔽輿論，不使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起作用的真相暴露於世。同時，對於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的各項經驗，也還沒有人作出全面的總結來。因此，我們的大會，應當對此作出適當的總結，藉以教育人民，並爲我黨決定政策的根據。

提到總結經驗，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存在着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能够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條是不但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說來，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

由於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對日作戰的消極政策與對內積極摧殘人民的反動政策，招致了戰爭的失敗，國土的大部淪陷，財政經濟的危機，人民的被壓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團結的被破壞，妨礙了動員與統一一切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進行有效的戰爭，妨礙了中國人民的覺醒與團結。但是，中國人民的覺醒與團結的運動並沒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迫之下曲折地發展着。兩條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與中國人民覺醒與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很久以來，就明顯地在中國存在着。這就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歷史

爲了使大家明瞭何以這個兩條路線問題是一切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必須回溯一下我們抗日戰爭的歷史。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佔領瀋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佔領了，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份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這個英勇的游擊戰爭，曾經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中經許多困難挫折，但是始終沒有被敵人消滅。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

國民黨內的一派愛國份子，又一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率領十九路軍，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進攻熱河、察哈爾，國民黨內的又一派愛國份子，第三次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抗日同盟軍，從事抵抗。但是一切這些抗日戰爭，除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其他民主派別及海外華僑予以援助之外，國民黨政府根據其不抵抗政策，是不給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爾兩次抗日行動，均被國民黨政府一手破壞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也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

那時的國民黨政府爲什麼採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二七年破壞了國共兩黨的合作與中國人民的團結。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及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因而在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佔領了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廣大的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人民解放戰爭。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及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與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與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地向着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與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份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份子繼承下來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東三省以後，中國共產黨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進攻蘇區與紅軍的國民黨軍隊提議：在一、停止進攻；二、給予人民以自由權利；三、武裝人民這樣三個條件之下，訂立停戰協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國民黨當局拒絕了這個提議。

從此以後，一方面，是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越發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發高漲，各種人民愛國組織，在上海及其他許多地方建立起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長江南北各地的紅軍主力，在我黨中央領導之下，經歷了千辛萬苦，移到了西北，並和西北紅軍匯合在一起。就在這兩年，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情況，決定並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線，以團結抗日與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奮鬥目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群眾，在我黨領導之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使此種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份子——東北軍與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與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份子，也不滿意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此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形成了在新形勢下的國內團結，發動了全國的抗日戰爭。在蘆溝橋事變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黨召集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批准了我黨自一九三五年以來的新的政治路線。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

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由於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與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將其政策的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與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可是這個希望是失敗了。就在這兩年，一方面，有比較積極的抗戰；另一方面，政府當局仍舊反對發動廣大民衆參加的人民戰爭，仍舊限制人民自動團結起來進行抗日與民主的活動。一方面，政府對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態度比較過去有了一個改變；另一方面，仍舊不給各黨派以平等地位，並多方限制他們的活動，許多愛國政治犯並沒有釋放。主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仍舊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發動內戰以來的寡頭專制形態，未能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

這一時期內，我們共產黨人就指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兩條路線：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勝利；或者是壓迫人民的片面的戰爭，這樣就會失敗。我們又指出：戰爭將是長期的，必然要遇到許多艱難困苦；但是由於中國人民的努力，最後勝利必歸於中國人民。

人民戰爭

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國紅軍主力，改編爲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留在長江南北各地的中國紅軍游擊部隊，則改編爲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相繼開赴華北華中作戰。內戰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並發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曾經擴大到幾十萬人。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南方各根據地內的殘酷的摧毀、萬里長征的消耗及其他原因，數量減

少到幾萬人。於是有些人看不起這枝軍隊，以為抗日主要依靠國民黨。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鑑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此時數量雖小，質量很高，只有它才能執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線，和那裏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裏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正式軍隊已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與地方系）在數量上還要少幾十萬，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敵偽軍的數量與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鬥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民兵與自衛軍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與其內部統一團結步調一致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參加這個軍隊的一切人們，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着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着正義的人民戰爭，為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存在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團結與外部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與後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均必須是團結的；一切妨害這些團結的現象，均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與處理俘虜的政策。凡屬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後願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敵偽軍人，一概表示歡迎，並給予適當的教育。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與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爲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於按照變化着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於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爲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爲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與保證戰鬪勝利而鬪爭。

在這個宗旨下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並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鬪與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與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份自給之目的，藉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及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有人民自衛軍與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一切青年，壯年，甚至老年的男人與女人，都在自願的民主的與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幹份子，除加入軍隊及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之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它將自己劃分爲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兩部份，前者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後者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與進攻當地敵人的任務上，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日本侵略者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來說都是比較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打擊敵人，發動民衆的抗日鬪爭，藉以配合各個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國解放區，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號召一切抗日人民組織在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

的、文化的及其他職業與工作的團體之中，熱烈地從事援助軍隊的各項工作，例如動員人民參加軍隊，替軍隊運輸糧食，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幫助軍隊解決物質困難。在這方面更重要的，是動員游擊隊、民兵與自衛軍，展開襲擊運動與爆炸運動，偵察敵情，清除奸細，運輸傷兵與保護傷兵，直接幫助了軍隊的作戰。同時，全解放區人民又熱烈地從事政治、經濟、文化、衛生各項建設工作。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動員全體人民從事糧食與日用品的生產，並使一切機關學校，除少數特殊情形者外，一律於工作或學習之暇，從事生產自給，以配合人民與軍隊的生產自給，造成了偉大的生產熱潮，藉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尤為中國解放區的特色。在中國解放區，敵人的摧殘是異常嚴重的。水、旱、蟲災、亦時常發生。但是，解放區民主政府領導全體人民，有組織地克服了與正在克服着各種困難，滅蝗、治水、救災的偉大群眾運動，收到了史無前例的成績，使抗日戰爭能够長期地堅持下去。總之，一切為着前線，一切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與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這就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拚命地反對人民戰爭。

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裝備，它就會更加無敵，能够最後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了。

兩個戰場

中國戰場，一開始就分為兩個戰場：國民黨戰場與解放區戰場。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後，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國民黨戰場的戰略性的進攻，逐漸將其主要軍

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區戰場；同時，針對着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情緒，聲言願意和它謀取妥協的和平，並將賣國賊汪精衛誘出重慶，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實施民族的欺騙政策。從此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對外逐漸轉移到對內。這首先表現在它的軍事政策上，採取了對日作戰的消極政策，保存軍事實力，而把作戰的重担放在解放區戰場上，讓日本人大舉進攻解放區，自己則坐山觀虎鬥。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反動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將抗戰初期給予人民及抗日黨派的某些權利，一概收回。從此時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國民黨政府將一切民主黨派，首先與主要的將中國共產黨，打入地下。在國民黨統治區各個省份的監獄與集中營內，充滿了共產黨人、愛國青年及其他民主戰士。從一九三九年起五年之內，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為止，國民黨政府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國內的團結，造成嚴重的內戰危險。有名的『解散』新四軍及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人的事變，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內。直到現時為止，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軍隊進攻的事件還未停止，並且看不出任何準備停止的徵象。在此種情況下，一切誣譏與謾罵，都從國民黨反動份子的嘴裏噴了出來。什麼『奸黨』、『奸軍』、『奸區』，什麼『破壞抗戰、危害國家』，都是這些反動份子爲着反對中國人民的得意的製造品。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針對着當時的危機，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在這些適合時宜的口號之下，在五年之內，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當時的危機。

在這幾年內，國民黨戰場實際上沒有嚴重的戰爭。日本侵略者的刀鋒，主要地向着解放區戰場。到一九四三年，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及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爲解放區戰場担负着。國民黨戰場

所坦負的，不過日軍的百分之三十六及偽軍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了，國民黨戰場表現出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幾個月內，就將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於敵手。僅在此時，兩個戰場分坦抗敵的比例，才起了一些變化。然而就在我做這個報告的時候，在侵華日軍（滿洲的尙不在內）四十個師團，五十八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的是二十二個半師團，三十二萬人，佔了百分之五十六；國民黨戰場抗擊的，不過十七個半師團，二十六萬人，僅佔百分之四十四。偽軍的分坦則完全無變化。

還應指出，數達八十萬以上的偽軍（包括偽正規軍與偽地方武裝在內），大部份是國民黨將領率部投敵，或由國民黨投敵軍官所組成的。國民黨反動份子事先即供給這些偽軍以所謂『曲線救國』的叛國謬論，事後又在精神上與組織上支持他們，使他們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對中國解放區。此外，則動員大批軍隊封鎖與進攻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解放區，其數量達到了七十九萬七千人之多。這種嚴重情形，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政策下，很多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無法知道。很多人只知道南斯拉夫有一個米海洛維奇，而不知道中國有幾十個米海洛維奇。

中國解放區

中國解放區，現在領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份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在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內，包括了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則包括了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陝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在這些省份中有些是大部份，有些是

小部份，而以延安爲各個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黃河以西的陝甘寧邊區，其人口一百五十萬，不過是十九個解放區中的一個，而且除了浙東、瓊崖兩區之外，按其人口說來，它是一個最小的。有些人不明此種情形，以爲所謂中國解放區，主要就是陝甘寧邊區，這是一個誤會，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造成的。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與進攻之下，在毫無外援之下，能够屹然樹立，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佔區，擴大解放區，成爲民主中國的模型，成爲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重心。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範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範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

國民黨統治區

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實行了消極的抗日政策與反人民的國內政策。這樣，就使得它的軍隊縮小了一半以上，並且大部份幾乎喪失了戰鬥力；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造成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使得它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不但不是極大地減少了，並且變成了動員與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物。

爲什麼在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領導下會產生這種嚴重情況呢？因爲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個極端少數的反動階層，壟斷着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爲却不符合於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國家，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的動員全民的抗日戰爭。這就是他們之所以採取對日作戰的消極政策，對內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之總根源。要問他們爲什麼採取這樣的兩面政策，例如，一面雖在抗日，一面又採取消極的作戰政策，並且還被日本人經常選擇爲誘降的對象；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中國經濟，一面又在實際上扶助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着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於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願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共黨問題爲一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一面又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殘酷地壓迫中國共產黨，把共產黨看成他們的所謂『第一個敵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個敵人』，並且每天都在積極地準備內戰，處心積慮地要消滅共產黨；一面在國民黨內部，他們口頭上宣稱應有『精誠團結』，一面又在實際上鼓勵中央系軍隊欺壓地方系軍隊（所謂『雜牌軍』），鼓勵專制派欺壓民主派，鼓勵各派之間互相對立，以利其獨裁統治；一面在口頭上宣稱要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一面又在實際上拚死命保持那個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國家；一面和蘇聯在形式上保持外交關係，一面又在實際上採取仇視蘇聯的態度；一面依賴英美的援助，一面又反對英美的自由主義；一面同美

國孤立派合唱『先亞後歐論』，藉以延長法西斯德國也就是延長一切法西斯的壽命，延長自己對於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壽命，一面又在國際大家庭裏投機取巧，把自己打扮成爲反法西斯的英雄；要問如此種種的自相矛盾的兩面政策從何而來，就是來自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社會階層這個總根源。

但是國民黨是一個複雜的政黨。它是被這個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反動集團所統治，所領導，但是整個國民黨並不等於這個反動集團。它有許多領袖人物不屬於這個集團，而且被這個集團所打擊、排斥或輕視。它有更多的幹部與黨員群眾及三青團團員群眾並不滿意這個集團的領導，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對它的領導的。這種情形，在被這個反動集團所統治的國民黨的軍隊，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國民黨的經濟機關與國民黨的文化機關中，都是存在着。在這些軍隊及機關裏，包藏着廣大的進步的民主份子。這個反動集團，其中又分爲幾派，互相鬭爭，並不是一個嚴密的統一體。把國民黨看成清一色的反動派，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比較

中國人民從中國解放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獲得了明顯的比較。

難道還不明顯嗎？兩條路線，人民戰爭的路線與反對人民戰爭的消極抗日的路線，其結果：一條是勝利的，即使處在中國解放區這種環境惡劣與毫無外援的地位。另一條是失敗的，即使處在國民黨統治區這種極端有利與取得外國接濟的地位。

國民黨政府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缺乏武器。但是試問：缺乏武器的是國民黨的軍隊呢？還是解放

區的軍隊？中國解放區的軍隊是中國軍隊中武器最缺乏的軍隊，他們只能從敵人手裏奪取及在最惡劣條件下自己製造其武器。

國民黨中央系軍隊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軍隊來要好得多嗎？但是比起戰鬥力來，中央系却多數劣於地方系。

國民黨擁有廣大的人力資源，但是在它的錯誤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補充却極端困難。中國解放區處在被敵人分割與戰鬪頻繁的情況之下，却因適合人民需要的民兵與自衛軍制度之普遍實施，又防止了對於人力資源的濫用與浪費，使人力動員源源不竭。

國民黨擁有糧食豐富的廣大地區，人民每年供給七千萬至一萬萬市担的糧食，但是大部份被經手人員中飽了，致使國民黨的軍隊經常缺乏糧食，士兵餓得面黃肌瘦。中國解放區的主要部份隔在敵後，遭受敵人燒殺搶三光政策的摧殘，其中有些是像陝北這樣貧瘠的區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動手、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很好地解決了糧食問題。

國民黨區域經濟危機極端嚴重，工業大部份破產了，連布疋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從美國運來。中國解放區却能用發展工業的方法，自己解決布疋及其他日用品。

國民黨區域工人、農民、店員、公務人員、知識份子及文化人，生活痛苦，達於極點。中國解放區的全體人民都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做，有書讀，有些地方做到了豐衣足食。

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鬥，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

國民黨區域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國解放區則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怪別人，還是怪自己？怪外國缺乏援助，還是怪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與腐敗無能？這難道還不

明白嗎？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真憑實據地破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與危害了中國人民的國家的，難道不正是國民黨政府嗎？這個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內戰，將刀鋒向着同胞，置一切國防事業於不顧，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東四省。日本人打進本部來了，倉皇應戰，從蘆溝橋退到了貴州省。但是國民黨人却說：『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見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案）。唯一的證據，就是共產黨聯合了各黨各派各界人民創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國解放區。這些國民黨人的邏輯，與中國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相同，無怪乎很多問題都講不通了。

兩個問題：

第一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國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蘆溝橋，又從蘆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與這樣衆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與反人民戰爭的國內政策嗎？

第二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中國解放區戰勝了敵僞軍長期的殘酷的進攻，從民族敵人手裏恢復了這樣廣大的國土，解放了這樣衆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嗎？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國民黨政府還經常以『不服從政令、軍令』責備中國共產黨。但是我們只能這樣說：幸喜中國共產黨人還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普通常識，沒有服從那些實際上是把中國人民艱難困苦地從日本人手裏奪回來的中國解放區再送交日本人的所謂『政令、軍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謂『解散新四軍』與『退至舊黃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謂『解散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四年的所謂『限期取消十個師以外的全部軍隊』，以及在最近談判中提出來的所謂將軍隊及地方政府移交給國民黨，其交換條件是不許成立聯合政府，只許收容幾個共產黨員到國民黨獨裁政府裏去做官，並將此種辦法稱之為國民黨政府的『讓步』等等，幸喜我們沒有服從這些東西，替中國人民保存了一片乾淨土，保存了一枝英勇抗日的軍隊，難道中國人民不應該慶賀這一個『不服從』嗎？難道國民黨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義的政令與失敗主義的軍令，將黑龍江至貴州省的廣大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人，還覺得不夠嗎？除了日本人及反動派歡迎這些『政令、軍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歡迎這些東西嗎？沒有一個不是形式的而是實際的、不是獨裁的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够設想中國人民會允許中國共產黨人，擅自將這個獲得了解放的中國解放區與抗日有功的人民軍隊，交給失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嗎？假如沒有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還有今日嗎？我們民族的前途還能設想嗎？

內戰危險

迄今為止，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着獨裁與內戰的反動方針。有很多跡象表明，他們早已準備，尤其現在正在準備這樣的行動：等候某一個同盟國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驅除日本侵略者到了

某一程度時，他們就要發動內戰。他們並且希望某些同盟國將領們在中國境內執行斯科比將軍在希臘所執行的職務。他們對於斯科比及希臘反動政府的屠殺事業，表示歡呼。他們企圖把中國拋回到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的國內戰爭的大海裏去。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現在正在所謂『召開國民大會』及『政治解決』的煙幕之下，偷偷摸摸地進行其內戰的準備工作。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陰謀，阻止它的準備，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

談判

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爲着防止內戰，中國共產黨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別的同意之後，於一九四四年九月間開會的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立即廢止國民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一項要求。無疑地，這項要求是適合時宜的，幾個月內，獲得了廣大人民的響應。

關於如何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以及實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項問題，我們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曾經有了多次談判，但是我們的一切建議，都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拒絕。不但一黨專政不願廢止，聯合政府不願成立，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務機關，取消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承認解放區，撤退封鎖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等，一項也不願實行。就是這樣，使得中國的政治關係處在非常嚴重的局面之下。

兩個前途

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國際國內實際情況的分析看來，我請大家注意，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着。繼續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上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上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中國仍可能發動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强的老狀態裏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這個可能性，這個前途，依然存在，並不因為國際形勢之好，國內人民覺悟程度之增長及有組織的人民力量之發展，它就似乎沒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份子。這是一方面，這是必須注意與不可不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內外情況的分析看來，使我們更有信心地與更有勇氣地去把握第二個可能性，第二個前途。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與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强的新國家。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份子與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之民族，外國的進步份子，外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清楚地懂得，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還有很大的困難，還有很多的障礙物，還要走很多的迂迴路程。但是我們同樣地懂得，任何困難與障礙物，我們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够克服，而使中國的歷史任務獲得完成。竭盡全力地去反對第一個可能性，爭取第二個可能性，反對第一個前途，爭取第二個前途，是我們和中國人民的偉大任務。國際國內的主要條件，主要方面，是有利於我們與中國人民的。所有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鑒於世界大勢之所趨，中國人心

之所向，毅然改變其錯誤的現行政策，使抗日戰爭獲得勝利，使中國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國早日誕生。須知不論怎樣迂迴曲折，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任務總是要完成的，而且這種時機已經到來了。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願，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誰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上面，我已將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給了一個分析。這樣的一個分析，在我看來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廣大的中國人中間，至今還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情況。在國民黨統治區及在國外，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聞記者考察團及美軍觀察組來到中國解放區以前，那裏的許多人對於解放區幾乎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說：『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的最好辦法，莫如任令人們往來於兩個區域之間，許多誤會就會消失。』可是國民黨政府非常害怕，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聞記者團回去之後，立即將大門堵上，不許一個新聞記者再來解放區。對於國民黨區域的真相，國民黨政府也是同樣的加以封鎖。因此，我感到我們有責任將『兩個區域』的真相儘可能使人們弄清楚。只有在弄清楚中國的全部情況之後，才有可能了解中國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政策何以有這樣的不同，何以有這樣的兩條路線之爭。只有這樣，才會使人們了解，兩黨的爭論，不是如有些人們所說不過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氣用事的爭論，而是關係着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的爭

論。

在目前中國時局的嚴重形勢下，中國人民，中國一切民主黨派及民主份子，一切關心中國時局的外國人民以及許多同盟國的政府，都希望中國的分裂局面重趨於團結，都希望中國能實行民主改革，都願意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於解決當前許多重大問題上所持的政策。我們的黨員對於這些，當然更加關心。

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歷來是明確的，八年戰爭中考驗了這些政策。我們的大會應該對此作出結論，作為今後奮鬥的指針。

下面，我就來說明我黨在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得出的關於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確定的結論。

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着動員與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分為一般性的與具體性的兩部份。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現階段上，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最廣大的成份相一致的。就是說：第一，中國既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國民黨主要

統治集團在其十八年的統治中表現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自由資產階級舊式民主主義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面，自由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與政治上至今還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面，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其他民主份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上，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麼呢？我們主張在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廣大成份的要求的國家制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與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工人與僱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與可能取得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萬萬五千萬人口中佔了三萬萬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與可能取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及其他愛國份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也有其不同的要求，在這一點上，他們之間仍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是虛偽的與錯誤的。但是，這種不同要求，這種矛盾，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不同要求與這種矛盾，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與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不在推翻與廢止這些之後又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民主份子，必須服從這個指示而堅決實行之，並和一切違背與敵對這一指示的任何人們與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鬭爭，藉以保護與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構成，應該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最高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託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問題與政權問題上，包含着聯邦的問題。中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並在這個聯邦基礎上組織聯邦的中央政府。

軍隊及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份，沒有他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與保護人民的，他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與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性

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即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們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都是過慮。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着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破壞着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與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够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够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與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與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而一定要是『爲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爲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性質與社會性質上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國家性質與社會性質，推進到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與社會性質，在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以後，可以建立一個具有這種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國家。實行這個綱領，還沒有把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這不是一個由於什麼人在主觀上想做或不想做這

種推進的問題，而是一個由於在客觀上中國的政治條件與社會條件不許可人們這樣做的問題。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這是確定的與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與最高理想的方向。我們每個人入黨之時，心目中就懸着爲現在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與爲將來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們的無知的與卑劣的敵視、誣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與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與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爲着現時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爲着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爲着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與建立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爲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爲這個目標而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其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與生命，而空談什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那就是無意地，或有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就是一個自覺的與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斯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爲民主主義而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廣大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

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解放與個性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新式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爲什麼不但怕資本主義，反而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發展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與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灣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而說什麼一下發展到社會主義，什麼要將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國自由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反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衆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統治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與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廣大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國家與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與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

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三民主義，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爲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與爲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其基本上（不是在一切上）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在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實現三民主義的最忠誠與最徹底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及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原則上不同的。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與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塞維克，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與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塞維克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聯盟，或黨與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塞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與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

與政權形態。

在這裏，也就同時回答了另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們共產黨人現在主張建立聯合政府，是因為現在還沒有民主選舉制度，爲着團結抗日，一個聯合政府是需要的；但是在將來，在有了民主選舉制度之後，爲什麼不由國民大會中的多數黨組織一黨政府，還要組織聯合政府呢？我們回答說：中國的歷史條件規定了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中國，因爲早就出現了不但代表無產階級，而且按其綱領和實際鬭爭，同時也代表了最廣大的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其他民主份子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新條件，一切情況就改變了。任何政府，如果把共產黨排斥到門外，那是一件好事也做不成的，這就是中國進到了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的基本特點。還是孫中山先生在世時，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在實際上實現了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從而他就做成了一件偉大的革命事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國民黨政府排斥共產黨，並且舉行了殘酷的反共戰爭，這個政府所做的就變成了反革命事業了。八年抗戰，雖然國民黨政府直到今天，因爲有一個日本侵略者站在面前，還沒有向共產黨公開宣佈全面戰爭，還只用局部戰爭、特務鎮壓、封鎖、誣衊、準備內戰及不許組織聯合政府等方法排斥共產黨，但是它已經給自己造成了這樣的形勢：越排斥共產黨，就越走下坡路。如果今後還要排斥下去，那就是準備將下坡路走到底。在中國的條件下，一個政府裏不要共產黨，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不要最廣大的人民。沒有人會懷疑到共產黨人是爲着爭奪官位而要求到政府裏去的，共產黨人如果加入政府，這就意味着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改革。中國將來有了民主選舉制度以後，不論共產黨是國民大會中的多數黨或是少數黨，政府都應該是在一個共同承認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之下從事工作的聯合政府，才有利於更好地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這一點，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在各個時期中應有其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與變化着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時期與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並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有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與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原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與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是適當的，並且是最低限度的。

中國人民要求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與反對人民的親日份子，法西斯主義份子與失敗主義份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製造內戰危機的反動份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與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及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

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與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並將這些軍隊使用於抗日前線上去；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與民選政府；要求鞏固與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縮小淪陷區；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與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制度與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對於退伍軍人的生活與就業，應予幫助；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與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於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自治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濟難民與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復後，廣泛地救濟淪陷區受難的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制政策；要求制止無限制的通貨膨脹與無限制的物價高漲；要求扶植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與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要求取消黨化教育，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及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並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於抗日戰爭與社會事業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實現對於青年與兒童是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並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鬭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

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範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只有這些，才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同盟各國廣大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拿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要求。

這樣的綱領，對於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於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等到收復後才能實施的綱領；對於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並正在繼續實施的綱領。

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着許多戰時戰後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面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他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裏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份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亦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並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並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台灣、澎

湖群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去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此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麼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制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於積極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並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復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依靠國民黨。消滅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聖權利。任何反動份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聖權利，要想壓制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中國人民在其勸說無效之後，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份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廢止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

第二，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爲着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與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八年抗日戰爭中的慘痛經驗，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這一點，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之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麼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了，毫無疑義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紛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却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與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佈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及無黨無派份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佈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爲着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佈討伐令。這是一

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採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性。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的，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本人佔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在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此種情況下，那裏來的國民代表？那裏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着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英雄們如何下台？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造成分崩離析的局面。

我們共產黨人是不想中國走上這個局面的，所以提出解救中國的兩個步驟：第一個，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與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與將來的建國而奮鬥。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他黨派、集團及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只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歷史法則，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及其他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言：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與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只要他們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復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與民主

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他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贊成的。

人民的自由

第三，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的目標，首先地與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國民黨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們不能反對日本侵略者，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動員與統一一一切抗日力量。我們在綱領中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取消特務，取消鎮壓自由的法令，懲辦漢奸、間諜、親日份子、法西斯份子與貪官污吏，釋放政治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圍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承認解放區，廢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的文化的與民衆運動的要求，就是爲着解開套在人民身上的繩索，使人民獲得抗日、團結與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麼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與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之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難道還不清楚麼？

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與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

內，只有解放區是澈底地實現了。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其臨終的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圖。』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衆，而是壓迫民衆，將民衆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與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乾淨。對於認真喚起民衆、認真保護民衆自由權利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及解放區，則稱之爲『奸黨』、『奸軍』、『奸區』。我們希望這種顛倒是非的時代快要過去了，再要延長這種顛倒，中國人民將不能忍耐了。

人民的統

第四，人民的統一。

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爲着防止內戰，爲着建設新中國，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爲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統一。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後是自己從台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十年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嵋山。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共專制統一論，這是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願聽麼？經過了十六年的北洋軍閥統治，又經過了十八年的國民黨獨裁統治，人民有了充分的經驗，有了明亮的眼睛，他們要一個人民大衆的民主的統一，不要獨裁者的專制

的統一。我們共產黨人還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沒有一天不爲此而奮鬥。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推行其反動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發生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機，國民黨人大叫其專制統一論時，我們又說：『非統一於投降而統一於抗戰，非統一於分裂而統一於團結，非統一於倒退而統一於進步，只有這後一種統一才是真統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統一。』又過了六年了，問題還是一樣。

沒有人民的自由，沒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統一麼？有了這些，立刻就統一了。中國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爭聯合政府的運動，就是爭統一的運動。我們在具體綱領中提出了許多爭自由爭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聯合政府的要求，就是爲了這個目的。不廢止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不能實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動員那裏的全體軍民有力地配合同盟國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而且還將發展爲內戰的慘禍，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識了。爲什麼如此衆多的有黨有派無黨無派的民主份子，包括國民黨內的許多民主份子在內，一致要求聯合政府，就是看清楚了時局的危機，非如此不能克服這種危機，不能達到團結對敵與團結建國之目的。

人民的軍隊

第五，人民的軍隊。

中國人民要自由，要統一，要聯合政府，要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沒有一枝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澈底站在人民立場的軍隊，現在還只有一個八路軍、新四軍，還很不够，可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却處心積慮地要破壞與消滅這枝軍隊。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提出

了一個所謂『提示案』，叫共產黨『限期取消』解放區軍隊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談判，又叫共產黨將解放區軍隊全部交給它，然後它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與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並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生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也一概沒有自由。難道是由於他們組織了一枝什麼軍隊，實行了什麼『封建割據』，成立了什麼『奸區』，違反了什麼『政令軍令』，因此才不給自由的麼？否，適得其反，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做。

『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但是什麼國家呢？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國家？還是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國只應該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在這個國家基礎之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中國的一切軍隊均應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政府，藉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對外國侵略者。什麼時候中國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出現了，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將立即交給它。但是一切國民黨的軍隊也必須同時交給它。

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爲着中國的自由與統一，爲着防止內戰，保障國內和平，中國人民必須做一項責無旁貸的工作，這就是將國民黨政府的那些在對日作戰時經常打敗仗的，以反對人民、排斥異己與準備內戰爲目的的軍隊，加以改造，變爲人民的軍隊。國民黨軍隊的士兵與廣大數量的軍官原來是好的，他們對抗日原來是積極的，曾經英勇作戰過。他們也並不願意反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解放區。僅因國民黨統帥機關及腐敗將領違反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所手創的民主傳統，

實行自己的失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領導，反動的政治工作與反動的特務網，迫使這個軍隊站在反對人民的立場上；並使這個軍隊處於嚴重情況之中，內而官兵關係，外而軍民關係，都極端惡化，戰鬥力薄弱，生活痛苦，兵役制度百弊叢生，又不許農村人民武裝起來保鄉衛國。一切這些，均須改革，決不許可再這樣長期繼續下去。這種改革，不但是中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同盟國廣大輿論界的要求，也是國民黨軍隊內部全體士兵與廣大軍官們的要求。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說：『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八路軍、新四軍遵循這個方針，成了『國民之武力』，就是說，成了人民的軍隊，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在北伐戰爭前期，做到了孫先生所說的『第一步』，所以打了勝仗。從北伐後期直至現在，連『第一步』也丟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於『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國民黨軍隊中一切愛國的有良心的軍官們，應該起來恢復孫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軍隊。

在改造舊軍隊的工作中，對於一切可以教育的軍官，應當給予適當的教育，幫助他們學得正確觀點，清除陳舊觀點，為人民的軍隊而繼續服務。

為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鬥，是全國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的責任。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於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贊助改革中國軍隊的事業。八路軍、新四軍對於一切願意團結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對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均應看作自己的友軍，給以適當的協助。

土地

第六，土地問題。

爲着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主張。

爲什麼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一切設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爲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使之獲得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變爲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那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一部份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於他們是有利的。自由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贊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多半和土地聯系着，他們中的許多人又懼怕『耕者有其田』。堅決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因爲他們是代表

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具備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爲農民利益而認真奮鬥，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爲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人，成了農民與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執行了孫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先生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爲減租減息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與農民聯合起來反對日本侵略者。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下去，首先在全國實現減租減息，然後尋找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佈的『二五減租』一類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在中國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曰『奸區』。

在抗戰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階段與民主民生階段的兩階段論，這是錯誤的。

大敵當前，民主民生不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其目的是不願抗日戰爭獲得徹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不自覺地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就不能趕走日本人——這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正論，爲整個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八年抗戰史所證明，也爲法蘭西、意大利、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所證明。在波蘭等國所執行的，不是如我們的減租減息，而是『耕者有其

田』。

在抗日期間，一切服從抗日，減租減息及一切民主改革是爲着抗日的，不是自己孤立起來的。爲着團結一切社會階層反對共同敵人，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適當地交租交息，獎勵地主的資本向工業方面轉移，同時，更使開明紳士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社會工作與政府工作。對於富農，則獎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線裏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藉以組織雄厚的戰鬪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後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

動搖於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與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線。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着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我們究竟在那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嗎？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與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面，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因爲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於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爲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的市場，只有他們能够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原料與吸收最廣大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礎。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萬萬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基礎。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萬萬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說的『主要基礎』，當然不是忽視其他約佔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中國人民中政治上最覺悟與具有領導一切民主運動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後幫助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只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制度，已成為中國解放區的普遍的制度，今後應當盡量推廣。

這裏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悲慘生活的表現。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形式與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是農民群眾為着發展自己的生產力，爭取富裕生活的表現。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其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

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

這裏還要指出一點，就是說，從城市到農村工作的知識份子，不容易了解現時還是分散的落後的個體經濟這種農村特點，在解放區，則還要加上暫時還是被敵人分割的與游擊戰爭的這些特點。因為不了解這些特點，他們就往往不適當地帶着他們在城市裏生活或工作的觀點去觀察農村問題，去處理農村工作，因而脫離農村實際，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這種現象，必須用教育方法加以克服。

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份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之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裏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爲着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重要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鬥。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日本侵略者及重要漢奸份子的土地應該被沒收，並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

工業

第七，工業問題。

爲着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一切依賴外國，自己的財政經濟政策是破壞一切經濟生活的，國民黨統治區內僅有的一點小型工業，也不能不處於大部份破產的狀態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產力都遇着破壞的命運，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如此。

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的中國，不能有工業的中國。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現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統一，人民的軍隊，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與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不可能有真正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人民的福利，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招致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學生們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是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輕重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地位升到工業國地位上去。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們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倍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佔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們的基礎，所謂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是不能鞏固的。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協同全國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各部份產業界，爲上述目標而奮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爲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一九二一年，產生了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使中國的解放鬥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極大的努力與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後消滅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特別是在收復大城市與交通要道的鬥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着極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後，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與貢獻將會是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爲着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與統一而鬥爭，而且是爲着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業近代化而鬥爭。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採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面，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之不同，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制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險，工會的權利等；另一方面，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與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贏利。總之，使勞資雙方共同爲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爲着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於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之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對於中國人民與外國人民都有利的事業，是中國在得到一個鞏固的國內和平與國際和平，得到一個澈底的政治改革與土地改革之後，能够蓬蓬勃勃地發展大規模的輕重工業與近代化的農業。在這個基礎上，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一個政治上倒退與經濟上貧困的中國，則不但對於中國人民非常不利，對於外國人民也是不利的。

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日本侵略者及重要漢奸份子的企業及財產，應當沒收，歸政府處理。

文化、教育、知識份子

第八，文化、教育、知識份子問題。

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了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與教育事業，文化人與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爲着掃除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爲着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與普通文化工作者，以『爲人民服務』『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從事艱鉅的工作。一切這些知識份子，只要是在爲人民服務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與社會的寶貴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地需要知識份子，因而知識份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鬥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鬥爭中，在八年抗日中，廣大革命知識份子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偉大的，在今後的鬥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後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份子幹部，並注意團結與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份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口中掃除文盲，是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與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教育，應當採取適當的但是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對於由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摧殘中國人民的精神與肉體的那種不知衛生的愚昧與疾病疫癘的嚴重情況，應當講求積極的改革與救治辦法，推廣國民衛生事業。

對於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及舊醫生們的態度，是採取適當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中國人民服務。

中國國民文化與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與新教育。

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中國文化運動的借鏡。盲目服從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服從，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在為着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鬭爭的總方針下，共產黨人應當不分階級、信仰與黨派，和一切知識份子很好的團結起來。

少數民族

第九，少數民族問題。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蒙、回、藏、彝（『夷』）、苗、瑤（『搖』）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滿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對於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殺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現在對於

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件以及近幾年對於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就是明證。這是法西斯主義的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與錯誤的民族政策，完全背叛了孫中山先生。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戰爭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一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共產黨人應當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爲實現這個政策而奮鬥。應當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系民衆的領袖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與發展，並成立擁護民衆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多年以來，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解放區對待蒙回兩族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

外交

第十，外交問題。

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里米亞各次國際會議的決議，因爲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於打敗法西斯侵略者與維持世界和平的。

中國共產黨尤其對於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表示熱烈的贊同。克里米亞會議決定：最後地打敗法西斯德國，並消滅法西斯主義及其產生的原因；在歐洲解放區消滅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確立各國的

國內和平，建立各國人民自己所選擇的民主制度；而在建立民主制度的程序方面：『組織臨時政權機關，這種政權機關廣泛地包羅人口中一切民主成份的代表；並保證儘早經過自由選舉，以建立執行人民意志的政府。』克里米亞會議並決定：英美蘇三國團結一致，保持『鞏固的與持久的』世界和平，迅速成立世界和平機構。

我們認為克里米亞的路線，和中國共產黨關於解決東方問題與中國問題的基本方針，是一致的。在消滅日本侵略者與解決中國問題時，下面各點是必須實現的。第一，日本侵略者必須最後地被打敗，並澈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產生的原因，不許中途妥協。第二，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必須被消滅，不許保留絲毫。第三，中國必須建立國內和平，不許再打內戰。第四，國民黨獨裁統治必須廢止；廢止之後，首先代之以廣泛地包羅中國人口中一切民主成份的代表所組成的舉國一致的臨時的聯合政府，這是第一個步驟；然後，在國土收復之後，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建立執行人民意志的正式的聯合政府，這是第二個步驟；這兩個步驟，不許可省掉任何一個。按照克里米亞路線，按照中國國情，我們必須這樣做。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與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和各國建立和鞏固邦交，解決一切戰時戰後的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中國共產黨對於保障戰後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及在克里米亞會議上對此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去出席舊金山會議，藉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

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必須停止對於蘇聯的仇視態度，迅速地改善中蘇邦交。蘇聯是第一個廢除不

平等條約，並與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國家。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親自召集的第一次國民黨代表大會開會時及在其後舉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解放戰爭的國家。在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以後，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人民對於蘇聯政府與蘇聯人民的這些援助，表示感謝。我們認為太平洋問題的最後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

我們認為英美兩大國，特別是美國，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業上所作的偉大努力，以及兩國政府與兩國人民對於中國的同情與援助，是值得感謝的。

但是，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英美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或失去中國人民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份子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佈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與中國訂立平等新約這種以平等地位對待中國人民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是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與外國人民的好意給與，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爲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國家，否則便只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與平等。

我們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爲着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沒有這種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徹底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

我們認為開羅會議給予朝鮮獨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

美國已經允許菲律賓獨立。我們希望英國也能允許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

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對於南洋各國——緬甸、馬來亞、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我們希望英、美、法、荷諸國於幫助當地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以後，能够仿照克里米亞會議對於歐洲解放區所取的態度，給予當地人民以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制度之權利。對於泰國，則仿照對待歐洲法西斯附屬國的方法去處理。

已故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說：『世界已經縮小了。』的確是這樣，對於中國人民曾經感覺是住在十分遙遠地方的美國人民，現在感覺成了近鄰了。中國人民將和美英蘇法各大國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上一切國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建設一個『鞏固的與持久的』世界和平。

關於具體綱領的說明，主要的就是這樣。

再說一遍，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

中國共產黨在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二十四年中，創造了這樣的地位，就是說，不論什麼政黨或社會集團，也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如果採取抹殺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的態度，那是極不妥當的。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的人，企圖孤行己見，敢於抹殺或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但是所得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行不通。這是什麼原故呢？不是別的，就是因為我們的意見，我們的政策，我們在中國現階段上所提出與所實施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與具體綱領，符合於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們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敢於抹殺或不尊重我們，誰就是在實際上抹殺或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難免要失敗。

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

關於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與具體綱領，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說明。無疑地，這些綱領，是要在全中國實行的，整個國際國內的形勢，給中國人民展開了這種期望。但是，目前的情形，不能不使我們在實行時有所區別，這就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在淪陷區、在解放區三種地方互不相同。根據三種地方的不同的情形，產生了不同的任務。這些任務，有些我已經在前面說到了，有些還須在下面加以補充。

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沒有愛國活動的自由，民主運動被認為非法，但是包括許多階層、許多民主黨派與民主份子的積極活動是在發展中。中國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發表了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與成立聯合政權的宣言。社會各界發表同類性質的宣言的，還有許多。國民黨內相當廣大的黨員群眾及許多重要人物，對於他們自己黨的領導機關的政策，日益表示懷疑和不滿，日益感覺他們自己的黨從廣大中國人民孤立起來的危險性，而要求有一種適合時宜的民主的改革。以重慶為中心的工人、農民、公教人員、商人、產業界、文化界、學生界、教育界、婦女界，乃至一部份軍人的民主運動，正在發展。所有這些，預示着一切受壓迫階層的民主運動正在逐漸地向着同一的目標而匯合起來。運動的弱點，在於社會的基層份子還沒有廣泛地參加，非常重要的痛苦不堪的農民、工人、士兵與下層公教人員，還沒有組織起來。運動的另一弱點，是參加運動的民主份子中，尚有許多人對於根據民主原則來轉變時局，還缺乏明確的與堅決的精神。但是國際國內的時局，都迫着一切受壓迫的階層、黨派、社會集團與個人，逐漸地覺悟與團結起來，執行自己的抗日、救國的神聖權利。不管國民黨政府

如何鎮壓，也不能阻止這一運動的發展。

國民黨統治區內被壓迫的一切階層、黨派、集團與個人的民主運動，應當有一個廣大的發展，並把分散的力量逐漸統一起來，爲着實現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而鬥爭。爲此目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解放區，應當給予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人應當繼續執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管什麼人，那怕昨天還是反對我們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對了，就應和他團結起來，爲共同目標而奮鬥。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工作，服從於動員與統一一切力量，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這個總目標。

中國淪陷區的任務

在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號召一切抗日人民，學習法國與意大利的榜樣，將自己組織於各色團體中，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俟時機成熟，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裏應外合地消滅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對於我淪陷區內的兄弟姊妹們的無微不至的摧殘、掠奪、奸淫與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國人的火一樣的憤怒，報仇雪恥的時機快要到來了。淪陷區的人民，在東西戰場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勝利戰爭的鼓舞之下，極大地增高了他們的抗日情緒，他們迫切地需要組織起來，以便盡可能迅速地獲得解放。因此，我們必須將淪陷區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區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須有大批工作人員到淪陷區去工作。必須就淪陷區人民中訓練與提拔大批的積極份子，參加當地的工作。在淪陷區中，東北四省淪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產業中心與屯兵要地，我們應當加緊那裏的地下工作。對於流亡的東北人民，應當加緊團結他們，準備收復失地。

在一切淪陷區，共產黨人應當執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管什麼人，只要是反對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的，就要聯合起來，爲打倒共同敵人而鬭爭。

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偽軍偽警及其他人員提出警告，是必要的：他們應該趕快認識自己的罪惡行爲，及時回頭，幫助同胞反對敵人，藉以贖回自己的罪惡。否則敵人崩潰之日，民族紀律是不會對他們寬容的。

共產黨人及抗日人民應當向一切有群衆的偽組織進行爭取說服工作，使他們站在反對民族敵人的戰線上來。同時，對於那些罪大惡極不願改悔的漢奸份子進行調查工作，以便在國土收復之日，能夠迅速地依法治罪。

對於國民黨內的反動份子組織漢奸反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的背叛民族的罪惡行爲，必須向他們提出警告，叫他們早日悔罪。否則，在國土收復之日，必然要將漢奸與漢奸組織者一體治罪，決不寬饒。

中國解放區的任務

中國人民在中國解放區的偉大鬭爭中，已經將我黨的全部新民主主義的綱領變成了並正在變成被他們所熱烈擁護與堅決執行的綱領，因而收獲了顯著的成績，聚集了鉅大的抗日力量；今後應當從各方面發展與鞏固這種力量。

在目前條件下，中國解放區的軍隊應向一切被敵偽佔領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不論是佔領已久，或是新近佔領的，發動廣泛的進攻，藉以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但是同時應當注意，敵人在目前還是強大的，它一定還要向解放區發動它的進攻，解放區軍民必須隨時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並注意解放區的各項鞏固工作。

應當爭取在一切可能條件下擴大解放區的軍隊、游擊隊、民兵與自衛軍，並加緊進行整訓，增強其戰鬥力，為配合同盟國實行戰略進攻，準備充分的軍事力量。

在解放區，一方面，軍隊應實行擁政愛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應領導人民實行擁軍優抗的工作，使軍民關係獲得更大的改善。

共產黨人在各個解放區的民選的三三制政府，即地方性聯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會工作中，應當繼續過去的方針，和一切抗日民主份子，在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上，不分階級、黨派與信仰，進行很好的合作。

同樣，在軍事工作中，共產黨人應當和一切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抗日民主份子，在解放區軍隊的內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為着消滅日本侵略者與保衛民主中國之偉大目的，而共同建設一個強大的人民軍隊。

為了提高工農勞動群眾在抗日與生產上的積極性，適當的但是堅決的減租減息及改善工人與職員待遇的政策，應當繼續執行。解放區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必須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規模地發展解放區的農業、工業及貿易，改善軍民生活，為堅持長期戰爭與消滅日本侵略者準備必要的物質條件。為此目的，必須實行勞動競賽，獎勵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在城市消滅日本侵略者以後，我們的工作人員，必須迅速學會做城市的經濟工作。

為着提高解放區人民大眾首先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群眾的覺悟程度與培養大批工作幹部，應當發展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事業。解放區的文化工作者與教育工作者在推進他們的工作時，應當根

據目前的農村特點，根據農村人民的需要與自願原則，採用適宜的內容與形式。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愛惜當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均要作長期打算，避免濫用與浪費。這不但是爲着打敗日本人，而且是爲着建設新中國。

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業，必須十分注意從本地人民優秀份子中大批地培養本地的工作幹部。一切從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並適合情況地去幫助本地幹部，愛惜他們，如同愛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那就不能完成農村民主革命這個偉大的任務。

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每到一地，就應立即幫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幹部爲領導的民兵與自衛軍，而且要組織以本地人民的幹部爲領導的地方部隊與地方兵團。然後，就可以產生有本地人領導的主力部隊與主力兵團。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此項任務，就不能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也不能發展人民的軍隊。

當然，一切本地人，應當熱烈地歡迎與幫助從外地去的人員與軍隊，藉以完成共同任務。

關於對待暗藏的民族破壞份子問題，應當提起大家的注意。因爲公開的敵人，公開的民族破壞份子，容易識別，也容易處置。暗藏的敵人，暗藏的民族破壞份子，則不容易識別，也就不容易處置。因此，對於這後一種人，既要採取嚴肅態度，又要採取謹慎態度。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政府法律，政府就給以保護。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或歧視。

最後，我們的大會應向各個解放區人民提議，盡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

議，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抗日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援助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與聯合政府的成立。中國解放區實際上現在已經成了全國廣大人民所賴以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我們有責任不使他們失望。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將給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起一個鉅大的推進作用。

五 全黨團結起來，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鬭爭

同志們，我們的任務是這樣的鉅大，我們的政策是這樣的具體與明確，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工作態度去執行這些政策與實現這些任務呢？

目前國際國內的時局，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面前，顯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這是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依然存在着嚴重的困難條件。誰要是只看見光明一面，不看見困難一面，誰就會不能很好地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鬭爭。

我們的黨和中國人民一道，不論在整個黨的二十四年歷史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爲中國人民創造了鉅大的力量，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很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我們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點。誰要是只看見成績一面，不看見缺點一面，誰也就不會很好地爲實現黨的任務而鬭爭。

中國共產黨自從它在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在其二十四年的歷史中，經歷了三次的偉大鬭爭，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和現在尙未完結的抗日戰爭。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

的理論爲基礎的黨，這是因爲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之下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地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與自我批評的作風。

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鬭爭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只有在它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鬭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變爲中國人民的有用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我們黨的發展與進步，是從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作堅決鬭爭的過程中發展與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以局部經驗誤認爲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黨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奮鬥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黨在思想上極大地鞏固了。我們黨現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絕大多數是在抗日時期入黨的，他們中存在着各種不純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幾年來的整風工作收到了鉅大的成效，使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糾正。今後應當繼續這種工作，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開黨內的思想教育。要使各地各級黨的領導骨幹都懂得，理論與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鬭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爲中國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小集團或自己個人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與向自己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

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適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適合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繫群眾的。凡屬錯誤了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軍閥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麼人有了這類弊病就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我們的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結合於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啓發與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鬭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一概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尚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却反映了一部份落後份子的意見，並將此種落後份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後份子的尾巴。總之，應使每個同志明瞭，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以是否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是否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

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發生灰塵的，也應該打掃與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我們還有什麼錯誤的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點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與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爲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着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或錯誤、缺點，不能犧牲嗎？

同志們，我們的大會閉幕之後，我們就要上戰場去，根據大會的決議，爲着打倒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爲達此目的，我們要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重說一遍，不管什麼階級，什麼政黨，什麼社會集團或個人，只要他是贊成打倒日本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起來。爲達此目的，我們要把我們的黨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與紀律之下，比較過去還要好還要堅強地團結起

來，不論什麼同志，只要他是願意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起來。我們的黨，在北伐戰爭時期，不超過五萬黨員，並且後來大部份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時期，不超過三十萬黨員，後來大部份也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敵人打散。只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採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志更好的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並且在消滅他們之後，把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建設起來。

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及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們，有了三次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我堅決相信，我們是能够完成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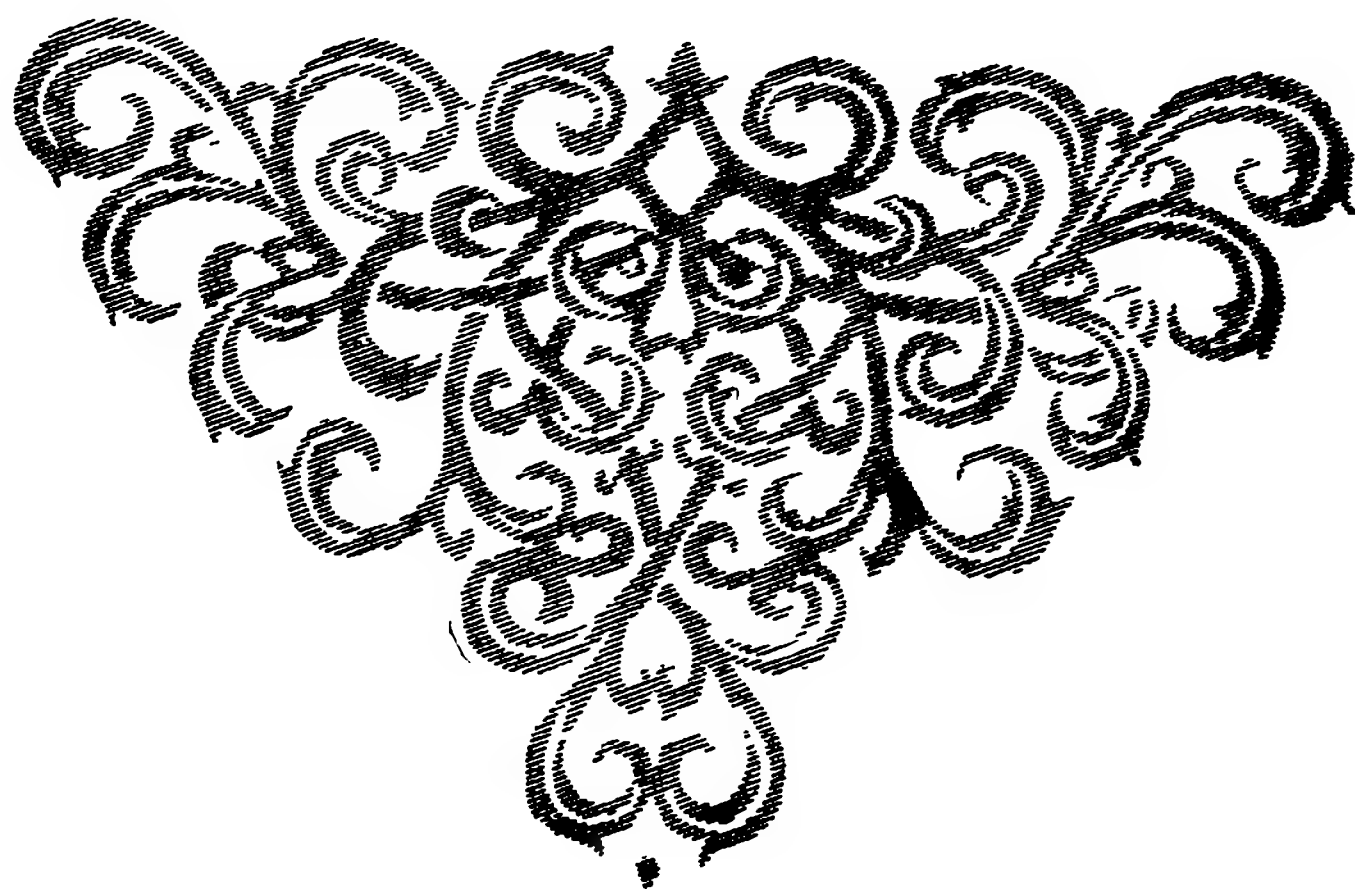
成千成萬的人民的與黨的先烈，爲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打倒日本侵略者！

中國人民解放萬歲！

三 卷



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

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由於中日矛盾成爲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與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革命形勢的新發展階段。

(一) 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鬭爭中——帝國主義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由於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造成了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及民族與民主革命任務不能不由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二) 九一八事變及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使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甲、由一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變成特別突出特別尖銳化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即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和實行着完全殖民地化與獨佔中國的強盜征服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

義與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並且也在社會主義蘇聯與日本之間，則擴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中國與蘇聯應該聯合起來。

乙、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發生了他們的存亡問題，而逐漸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發展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與法國人民陣線有區別的抗日的民族的統一戰線的任務，並指出了這種任務有完成的可能，而且必須完成之。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

丙、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情況與政策。人民是更大規模的起來為救亡而鬪爭。共產黨繼續『九一八』後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蘇區，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與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份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把它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這就是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一九三六年春天開始放棄『反蔣』口號、八月致國民黨書、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及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等我們的主張與積極努力之所由來。

丁、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與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與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與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干其他帝國主義站在他們自己的利益上，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與集團間矛盾的地位，使它變為次

要與服從的東西。但國內階級矛盾與集團矛盾本身的內容依然存在着，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與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之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地解決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與必須解決的矛盾，使之適合於團結抗敵的總任務。這就是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外國和平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三) 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時，宣告結束了。此階段內的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運動，紅軍的進入西北，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與組織工作，上海與青島的反日罷工，英國對日政策趨向比較的強硬，兩廣事變，綏遠戰爭與援綏運動，南京在中日談判中較強硬態度，實際上起了承上啓下作用而成為時局轉變關鍵的西安事變，最後是南京的三中全會。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國與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歷史要求的。這一階段的革命基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消除國內對立，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黨在此階段內提出了正確的動員口號，即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一任務是基本上完成了，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組成上的第一個必要條件。

(四) 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他們內部有親日派與動搖派的存在，沒有表示他們政策的明確與徹底的轉變，沒有具體的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與國民黨內部的變動，使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他們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與抗戰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我們的即全國人民迫切要求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也可以看出來。今後的問題是國民黨政策的徹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及全國人民更大的發展抗日與民主運動，進一步的批評推動與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和平民主抗戰派份子，推動動搖猶豫派份

子，而排除親日派份子，才能達到目的。

(五)目前的階段，即從國民黨三中全會到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之時的階段，是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與後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和平，則後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民主。如果前一階段裏和平的取得，得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則後一階段裏民主的取得，將構成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二個必要條件。在爲着抗日救亡的總目標而努力於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有由於它，保衛祖國的任務才能達到）的時候，必須知道沒有國內和平固然是不行的，沒有國內民主也就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與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實現與取得徹底的勝利以保衛中國與收復失地，也就將成爲不可能。

爲民主與自由而鬭爭

(六)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着，日德意同盟條約的訂立，二十八萬萬元預算的通過，議會的解散，滿洲的增強，都是向着這一目的。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携』與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足證明戰爭前夜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問題

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燃眉的急迫性與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無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東西，必須迅速清除乾淨。

（七）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須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對於它們的準備工作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踏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的是因為內部封建制度的深刻矛盾，因此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八）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之下，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一黨一派一階級的獨裁專制政體，變為各黨各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國民大會選舉與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改變為民主的選舉、與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的鞏固國內和平，消除國內對立，增強國內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會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為隨時能够抵抗日本的進攻並徹底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徹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份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與製定憲法問題上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與憲法運動，嚴厲的批判、推動、與督促當權的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非民主的限制性，採取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而使這運

動的當前目標，放在國民大會與憲法之民主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與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上的某些最低限度之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與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的重要一部，同時也就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獲得真正的堅實的建立之必須條件。

(九)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與對日抗戰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之每一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進行內戰與分裂的運動。當我們現在與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的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任務達到目的。今後爭取民主自由的鬭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及人民落後成份做努力的宣傳鼓動與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與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與堅決的鬭爭，才能達到目的。

(一〇)爲了和平、民主、與抗戰，爲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一)蘇維埃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二)在蘇區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四)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須的與許可的。因爲只有如此，才能在根據於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必須改變的國內兩個政權對立的狀態這一原則之下，得着新的基礎，以便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拿這種讓步去兌換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與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蘇區與紅軍問題上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

黨關係上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與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政權對立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合作爲禦侮救亡而奮鬥。如果說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不是阿Q主義，就是惡意的污蔑。

（一一）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三民主義有它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爲同共產黨合作與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發動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勝利的大革命。又曾經因爲排斥共產黨（清黨運動），實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敗，陷民族國家於危亡的地位。現在則因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的統治下去，全國人民與國民黨中愛國份子，因而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與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的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爲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民主革命的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爲澈底，但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則是基本上不相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爲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一二）我們過去蘇維埃口號是否錯了呢？沒有錯的。資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變爲人民的敵人，革命任務沒有完成而遭受了失敗，則革命的成份便只剩下了無產階

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革命的黨派，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共產黨單獨一個黨派的肩上。僅僅共產黨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保持了革命的傳統，提出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爲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口號之下，它所包括的成份是什麼呢？它是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份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裏的特點，就是因爲資產階級在今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革命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不拒絕他們，而應該極力招致他們，與之恢復鬥爭的聯盟，利於中國革命的轉向前進。爲消除國內的武裝對立，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民主共和國過程中，用立法的手段及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帝國主義，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由暴動沒收方法過渡到新的適當方法上去是必要的。

蘇維埃口號，過去的提出與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一三）爲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與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增強擴大，而不是削弱縮小。民主革命的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集團間的矛盾與鬭爭是無法避免的，但可以而且應該停止其不利於團結抗敵的部份（國內戰爭、黨派對立、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與不利於抗日救亡的經濟條件等等），而保存其有利於團結抗敵的部份（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之改

善等等)

(一四) 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鬭爭的任務之下，紅軍與蘇區的任務是：
 (一) 把紅軍提高到適合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階段。為此目的，紅軍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到超過自己現狀及一切國內軍隊的水平之上，造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模範兵團。
 (二) 蘇區改變為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組成部份，實行新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搗亂份子，造成抗日與民主的模範區。
 (三) 在此區域內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恢復與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
 (四) 以消滅文盲為目的，實行有計劃的文化建設。

我們的領導責任

(一五) 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够參加反帝與反封建制度之中國資產階級（正確點說，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它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會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並且只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與徹底性的充分發揚，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與不徹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經驗，證明了資產階級追隨着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時，革命是如何的推向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無產階級政黨負責）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時，革命又是如

何的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是不宜於重複的。今天說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任務的完成，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就不能有任何成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在今天，資產階級還帶着更多的被動性與保守性，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慷慨接受，就是證據。因此，就更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與義不容辭的。

(一六) 無產階級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階層的政治領導，是怎樣去進行的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與爲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與每一重大事變當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基本的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爲全國行動的總目標與具體方針，沒有這種目標與這種方針，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目標與具體方針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們的先鋒隊——共產黨員，應該提起自己無限的積極性與忠誠，成爲執行這些方針的模範。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得到群眾的愛戴，依靠群眾的多數。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與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密性。共產黨對全國的政治領導，是由實現上述這些主要的條件去進行的。這些條件的增進與創造成功，是保證自己政治領導的基礎，是使革命進入徹底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犧牲的前提。

(一七) 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爲執行兩個政權對立路線的鬭爭方式，組織方式，

與工作方法，應全部轉變到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路線的方面去，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秘密的轉到公開的，單獨的轉到與同盟者合作的。從這樣兩種基本上不相同的東西的中間執行全部工作的轉變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從新去認真學習的。從新訓練幹部，成爲主要的一環。

（一八）關於民主共和國性質與前途的問題，從許多同志中提出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因爲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世界革命前夜）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條件，它雖一般沒有脫離資產階級國家性質；但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應該是一個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因此，它的前途雖仍有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存在着健全轉變到非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是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的。

（一九）向着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同時又向着尾巴主義作鬭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須條件。黨內在民衆運動中，由於中國社會條件的反映，存在着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歷史傳統，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爭取群眾多數的惡劣傾向。肅清這個傾向於每一具體任務的工作中是必要的。我們的口號，是依靠多數與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必然將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口號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爲達到反對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必要的，只有這種理論，才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之途的南針。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鬭爭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關於政治問題的結論——

同志們！對於我的報告——『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經這幾天的討論之後，除了個別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外，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這些不同意見，頗帶重要性，因此我的結論，首先在答覆他們的問題，然後說到一些其他問題。

一 和平問題

我們黨爲國內和平而鬭爭，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了。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說和平已經取得，『爭取和平』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鞏固和平』，並指出這是同『爭取民主』相關聯的——從

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我們的這種意見，按照幾個同志的說法却不能成立，他們的結論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因為他們說：『日本後退了，南京更動搖了，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根據這種估計，當然無所謂新階段與新任務，情況回到舊階段，或者還不如。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對的。

我們說和平取得，並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取得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的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親日派之存在。然而西安事變後和平是事實，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進攻的基本方針，蘇聯及英法之贊助和平，中國人民的逼迫，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方針及取消兩個政權對立的政策，資產階級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等等），不是蔣介石一個人所能決定與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須同多方面勢力作戰，並且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靠攏，才能成功。沒有問題，日本同親日派還在企圖中國的內戰，和平沒有鞏固，正是因為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口號與階段去，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口號與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為什麼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與『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為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為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與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並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鬭爭的各派勢力之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

為什麼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他們不但從根本之點（日本後退，南京更動搖，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上升）出發，而且也從許多局部與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楊虎城出洋等等）出發，並把二者聯貫起來，形成一幅暗淡的畫圖。我們說國民黨已經

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並沒有澈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澈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同人民新的更多與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不少號稱『左傾』的人們，平日痛罵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殺蔣與『打出潼關去』，及至和平剛剛實現又發現蘇州審判等事，就用驚詫的口氣發問道：『爲什麼蔣介石又這樣幹？』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於一個黨派、一個階級、一個民族裏頭的份子。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的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乾淨。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看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十年的污濁洗掉得乾淨。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與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够把內戰獨裁與不抵抗的舊毒去掉乾淨。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鬭爭與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鬭爭與努力。

『他們是一心要破壞我們』。對的，他們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於睡覺。但問題在破壞的方式是否有了改變？我以爲是有了改變的，從戰爭與屠殺政策改變到改良與欺騙政策，從硬的政策改變到軟的政策，從消滅政策改變到爭取政策，從軍事政策改變到政治政策。爲什麼有這種改變？資產階級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產階級找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應從這一點出發。國際上，法蘇世仇變爲盟友，同此道理。我們的任務，亦是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詭計，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及國民黨一切同情抗日份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二 民主問題

『強調民主是錯誤的，僅僅應該強調抗日，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民主運動，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來一個十二月九號才是對的。』

讓我首先發出一點問題：能够在過去階段中（十二月九號到三中全會）說，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嗎？過去強調和平是錯了嗎？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和平運動嗎（西安事變與三中全會正在綏戰結束之後，現在也還沒有綏戰或十二月九號）？誰人不知爲抗日而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前一階段一切直接間接的抗日行動（從十二月九號起到三中全會止）都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階段中心一環，是抗日運動在前一階段中的最本質的東西。

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爲民主即是爲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爲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爲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與民主運動發展的有利條件。

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鬭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大有助於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與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爲是不錯的。

『日本退後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動搖了』，這是一種不知歷史發展規律而發生的不適當的憂愁。日本如因國內革命而根本後退，這是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戰線崩

潰的開始，爲什麼還憂愁？然而暫時還不是，佐藤外交是大戰的準備，大戰在我們面前。英國的動搖政策只能向着無結果，這是英國與侵略國的不同利害決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長期動搖，便變爲全國人民之敵，也爲南京的利益所不許。一時的後退現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因此不能否認新階段，也不能否認民主任務的提出。況且無論什麼情況，民主的口號都能適應，民主對於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餘，這是人人明白的。何況實際情況已經表現，指出新階段與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時局已經前進了，不要把它拉向後退。

『爲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爲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爲它是從獨裁到民主的橋樑；因爲它帶着國防性，因爲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携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不與民主任務及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與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鬭爭與人民生活鬭爭，要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對的，也沒有任何爭論的。但目前階段裏中心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與自由。

三 革命前途問題

有幾個同志發出了這個問題，我的答覆只能是簡單的。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的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爲着社會主義而鬭爭，這是與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今日的努力是朝

着明日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而不在蘇維埃口號下面。從資產階級佔優勢到無產階級佔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着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小資產階級覺悟與組織程度的提高。

無產階級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徹底性的克服，依靠群眾的力量與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

健全的轉變（不流血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着，結果將看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也不是半托洛茨基主義的立三主義。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與急性病。

因為資產階級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樑。

四 幹部問題

擔負着指導偉大的革命任務，要有偉大的黨，要有偉大的領袖與幹部。在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國裏面，進行歷史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般萎靡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與幹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與幹部，但是還不够。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的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數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幹部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並拿出全部忠心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的路線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系到黨員與群眾，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與風頭主義，不要懶惰與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與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與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與數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也就是這些東西。我們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是無疑地需要的。但是還不够，還要作為一種任務，向全黨與全國找尋許多新的幹部與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幹部，好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幹部是決定一切的』。

五 黨內民主問題

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與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的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於民主制。從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從發揮全黨的積極性，創造出大批的幹部與領袖，肅清派別觀念的殘餘，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六 大會的團結與全黨的團結

大會中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經過說明已經歸於一致了，過去中央路線與個別同志領導的退却路線之間的分歧，也已經沒有了，表示了我們的黨已經團結得很堅固的。這種團結是當前民族與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礎，因為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與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實現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任務。

七 爲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鬭爭

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與堅固的團結，唯一的是向着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有待於我們宣傳、鼓動、與組織的工作。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進入和我們的同盟，也還待我們的進一步工作。把黨的方針變爲群眾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一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群眾的努力。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得到千百萬群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全部革命任務就能够迅速的實現。日本帝國主義什麼也不怕我們，但它獨怕我們的這種努力。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 兩種方針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蘆溝橋事變的第二日（七月八日）向全國發表了號召抗戰的宣言。宣言中說：

「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全中國同胞們！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

存亡的宣言。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二十九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實援助二十九軍。並立即開放全國民衆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應戰。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份子及一切日寇偵探，鞏固後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中國寸土！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這就是方針問題。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先生在廬山發表了號召抗戰的談話。這個談話，確定了堅決抗戰的方針，爲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第一次正確的堅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及全國同胞的歡迎。該談話說：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此皆全國國民最要認清的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只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徘徊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讓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樣極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讓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

北方政治文化中心與軍事重地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果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守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爲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該談話舉出解決蘆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

『（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該談話的結論說：

『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與立場。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這就是方針問題。

以上是國共兩黨對蘆溝橋事變的兩個具有絕大歷史意義的政治宣言。這兩個宣言的共同點是：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

這是對付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第一種方針，第一種正確的方針。

但是還有第二種方針的可能。近月來平津之間漢奸親日派份子積極活動，企圖包圍平津當局適應日本帝國主義之要求，動搖堅決抗戰之方針，主張妥協退讓，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

這種妥協退讓的方針，同堅決抗戰的方針是根本矛盾的。這種妥協退讓的方針如不迅速改變，將使平津華北盡喪於敵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絕大的威脅，這是每個人都應十分注意的。

二十九軍全體愛國將士團結起來，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

平津華北全體愛國同胞團結起來，反對妥協退讓，擁護堅決抗戰！

全國愛國同胞團結起來，反對妥協退讓，擁護堅決抗戰！

蔣介石先生及全體愛國的國民黨員，希望他們堅持自己的方針，實踐自己的諾言，反對妥協退讓，執行堅決抗戰，以事實回答同盟社的侮辱。

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擁護蔣委員長號召，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

共產黨人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願同國民黨人及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執行堅決的抗戰。

二 兩套辦法

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之下，須要一整套做法、章程、計劃、政策，才能實現這個方針。這一整套的東西，叫它做辦法。

一些什麼辦法呢？主要有如下各項：

(一) 全國軍隊總動員。動員我們二百幾十萬常備軍，包括海陸空軍在內，包括中央軍、地方軍、紅軍在內，主要的立即出動開到國防線上去，部份的留在後方維持治安。委託忠實於民族利益的

將領爲各方面的指揮員。召集國防會議，決定戰略方針，統一戰鬪意志。改造軍隊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確定游擊戰爭担负戰略任務之一方面，使游擊戰爭同正規戰爭配合起來。肅清軍隊中的漢奸份子。動員一定數量的後備軍，給以訓練，準備上前線。裝備與給養之合理合法的補充計劃。準對着堅決抗戰的總方針，必須作如上各項的軍事計劃。中國軍力實際優於日本軍力，但不實行上述計劃則不能戰勝敵人。以政治條件與物質條件相結合，我們的軍力將無敵於東亞。

（二）全國人民的總動員。開放愛國運動，釋放政治犯，取消違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新聞檢查條例，承認現有愛國團體的合法地位，擴大愛國團體的組織於工農商學各地各界，民衆武裝自衛並配合作戰。一句話，給人民以愛國自由。民力與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是背道而馳。阿比西尼亞的覆轍，前車可鑒。如果堅決抗戰出於真心，他就不能忽略這一條。

（三）改革政治機構。容納各黨各派及人民領袖共同管理國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親日派漢奸份子，使政府與人民相結合。抗日是一件天大的事，少數人斷乎幹不了，勉強幹去，只有貽誤。政府要是真正的國防政府，它就一定要在組織上改成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這樣的政府。國民大會要是真正人民代表的，要是最高權力機關，掌管國家的大政方針，決定抗日救亡的政策計劃。

（四）抗日外交。不能給日本以任何利益與便利，相反，沒收其財產，廢除其債務，肅清其走狗，驅逐其偵探。立即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緊密聯合這個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幫助中國抗日的國家。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並從之取得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援助。主要靠自己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

(五)宣佈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苛捐雜稅的取消，地租的減少，高利貸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及下級軍官生活的改善，小職員生活的改善，災荒的救濟，從這些起碼之點做起。這些新政將使購買力提高，市場繁榮，金融活潑，決不會如一些人所說將使國家財政不得了。這些新政將使抗日力量無限的提高，鞏固政府的基礎。

(六)國防教育。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與教育制度，無急之務及無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帶國防性。禁止漢奸宣傳。

(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放在『有錢出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財產』的原則上，經濟政策放在『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原則上，一切爲了抗日。窮是錯誤辦法產生出來的，新政下面決不會窮。如此廣土衆民的國家而曰財政經濟無辦法，真是沒有道理的話。

(八)最後是『全中國人民、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這一個問題。執行抗戰方針及上述政策，依靠這個聯合陣線。中心關鍵在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政府、軍隊、全國各黨派、全國人民，在這個兩黨親密合作的基礎之上，一致團結起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這個口號，不應該只是講得好聽，還應該做得好看。團結要真正的團結，爾詐我虞是不行的。辦事要大方一點，手筆要伸暢一點，打小算盤，弄小智術，官僚主義，阿Q主義，實際上毫無用處。這些東西，用以對付敵人都行，用以對付同胞簡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歸大道理管着，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思想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就不被人唾罵，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

這一套，爲實現堅決抗戰的辦法，也可名之爲八大綱領。

堅決抗戰的方針，須隨之以這一套辦法，否則方針永不能實現，日本永在侵略中國，中國永無奈

日本何，而且難免做阿比西尼亞。

對堅決抗戰方針有誠意的人，一定要實行這一套辦法。試驗堅決抗戰有誠意與否，看他肯採取並實行這一套辦法與否。

另外還有一套辦法，那就是樣樣與這一套相反。

不是軍隊總動員，而是軍隊不動員，或向後撤。

不是給人民以自由，而是給人民以壓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國防性政府，而是一個官僚買辦豪紳地主的專制政府。

不是抗日外交，而是媚日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舊壓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無力抗日。

不是國防教育，而是亡國奴教育。

不是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而是照舊不變甚至變本加厲無益於己有益於敵的財政經濟政策。

不是築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長城，而是拆毀這個長城，或是陽奉陰違要做不做的講一頓『團結』。

辦法是跟到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這個我們已經有了五年的教訓。方針如果是堅決抵抗主義，那就非實行合乎堅決抵抗方針的一整套辦法不可。非實行這八大政綱不可。

三 兩個前途

前途怎樣呢？這是大家所担心的。

實行第一種方針，採取第一套辦法，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爲沒有疑義了。

實行第二種方針，採取第二種辦法，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奴隸牛馬的前途。這一點還有疑義嗎？我以爲也沒有疑義了。

四 結 論

一定要實行第一種方針，採用第一套辦法，爭取第一個前途。
一定要反對第二種方針，反對第二套辦法，避免第二個前途。

全體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堅決實行第一種方針，採取第一套辦法，爭取第一個前途；堅決反對第二種方針，反對第二套辦法，避免第二個前途。

全國愛國同胞、愛國軍隊、愛國黨派，一致團結起來，堅決實行第一種方針，採取第一套辦法，爭取第一個前途；堅決反對第二種方針，反對第二套辦法，避免第二個前途。

民族革命戰爭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

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兩黨統一戰線的成立

還是在一九三二年，中國共產黨就發表了在三個條件下要求與國民黨中任何願與共產黨蘇維埃及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人們訂立抗日協定的有名的宣言，那是因爲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已經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了，但是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中國共產黨與蘇維埃中央政府號召各黨各派及全國同胞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一九三六年的五月，紅軍由山西回師，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又發表了請求南京政府停止內

戰一致抗日的宣言。同年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送致了一封有名的請求書，請求國民黨實行停戰，並組織兩黨的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年九月，共產黨發佈了在中國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不但是這些宣言、書信與決議，而且實行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的與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然而還是沒有結果。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與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兩軍停止內戰的實現，並取得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統一戰線的一個必要的前提。

本年二月十日，當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中央爲了具體的建立統一戰線，乃以一個系統的具體建議通知該會，這個通知用一個電報發出。在這個電報內，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停止內戰，民主自由，國民大會，迅速準備抗戰，及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項；共產黨亦向國民黨保證取消兩個政權對立，蘇區紅軍改名，實行民主制度，及停止沒收土地等四項。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步驟，因爲如果沒有這一步驟，則兩黨統一戰線的建立勢將推遲。對於迅速準備抗戰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後，兩黨的談判接近了一步，如關於兩黨共同的政治綱領問題，要求開放民衆運動釋放政治犯問題，紅軍蘇區實行改名問題等等，共產黨方面都提出更具體的建議，雖然共同綱領之頒佈，民衆運動之開放，蘇區新制度之承認等等，至今還沒有實現，然而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抗日戰線的戰鬥序列又稱第十八集團軍）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約一個月之後頒佈了。還在七月四日起草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國民黨了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爲宣佈兩黨合作成立的宣言，及當時約定的蔣介石氏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雖遲之又久，未免可惜，也於九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正當前線緊張之際，經過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先後發表了。共產黨的這個宣言與蔣介石氏的這個談話，宣

佈了兩黨統一戰線的成立，對於兩黨聯合救國的偉大事業，建立了必要的基礎。這個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蔣氏談話，承認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很好的。但還沒有拋棄國民黨的自大精神，還沒有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是我們不能滿意的。但不論如何，兩黨的統一戰線是宣告成立了，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這種偉大的政治意義，是全國國民應該認識的。從此以後，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兩黨統一戰線成立的影響

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着決定的作用。由於兩黨在一定綱領上的合作，領導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勝利的大革命，使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民族民權民生革命的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成就，這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創設與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兩黨結成了統一戰線的結果。然而由於一部份人對於革命主義之未能堅持，正當革命走到將次完成之際，破裂了兩黨的統一戰線，招致了中國革命的失敗。自此以後，政權屬於一階級一黨派，不但在國共兩黨之間，而且在政府與人民之間，造成了深刻的裂痕，外患乃得乘機而入，演成了極端慘痛的屈辱史。這是兩黨破裂了統一戰線的結果。現在兩黨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形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時期，儘管還有某些人還不明瞭這個統一戰線的歷史任務及其偉大的前途，還在認為這個統一戰線不過是一個不得已的敷衍的應付的極其臨時的辦法，然而歷史的車

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這個統一戰線將起着決定的作用。新的具體的證據已經表現出來了。第一個證據是還在中國共產黨開始提出統一戰線政策的時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贊同，人心的向背，於此可見。第二個證據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兩黨兩軍實行停戰以後，立即引起了國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團結狀況。雖然這個團結在其程度上對於抗戰的需要說來還是異常之不夠的，特別在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團結問題至今基本上還沒有解決。然而各省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深刻的矛盾，在兩黨停戰的影響下，就立即緩和了很多。第三個證據，這是最為顯著的，就是全國性抗戰的發動。雖然這個抗戰就目前的情況說來，我們是不能滿意的，因為它雖然是全國性的，却還限制於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我們早已指出，這樣的抗戰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雖然如此，但確實已經發動了百年以來未曾有過的全國地域的抗戰，這不是沒有國內和平與兩黨統一戰線所能够做到的。如果說當兩黨統一戰線破裂的時候，日寇可以不費一彈垂手而得東四省，那末，當兩黨統一戰線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經過血戰的代價不能得到中國的土地。據說日寇每天的戰費數目是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元，那末，只要中國能堅持戰爭到一年，日寇的財力就要枯竭了，因為它一年就要用掉七十二萬萬，而況往後將要極大的增加，不能限於這個數目的。第四個證據，就是對國際的影響。全世界工農民衆及共產黨，都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國共合作成立後，這種影響當更增加，特別將影響蘇聯及其民衆積極地援助中國。中蘇已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今後將更進一步，進到兩國更具體地反對日寇的階段。根據上述的這些證明，我們可以判斷，兩黨統一戰線的發展，將使中國走向一個光明偉大的前途，如果拿一句話來說完，那就是民族解放的歷史任務，將於今後兩黨統一戰線的發展中完成之，其結果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被打倒與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起來。

然而這樣偉大的任務，不是停止在現在狀況的統一戰線所能完成的，兩黨的統一戰線還須要發展，因為現在成立的統一戰線，還不是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

什麼是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只限於國共兩個黨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兩個黨僅是這個統一戰線中的一個小部份。兩個黨無疑是這個偉大統一戰線的領導成份，然而他們始終只是一部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是工農學兵一切愛國同胞們的統一戰線。現在的統一戰線事實上還停止在兩個黨的範圍之內，廣大的工人農民兵士小資產階級及其他許多愛國同胞還沒有被喚起，還沒有發動他們的積極性，還沒有組織起來與武裝起來，這是目前最嚴重的情形。它的嚴重性，就是影響到前線不能打勝仗。華北以至江浙前線的嚴重危機，現在已經不能掩飾，也無須掩飾了，問題是怎樣挽救這個危機。挽救危機的唯一道路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即『喚起民衆』四個字。孫先生臨終時的這個遺囑，說他是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必須這樣做，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據什麼理由一定不肯實行這個遺囑？究竟根據什麼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關頭還不下決心實行這個遺囑？誰也明白，『統制』、『鎮壓』，是與『喚起民衆』的原則相違背的。佔領茅坑不痾屎，全國人民急得肚子發脹又沒有茅坑，矛盾的事情莫過於此。單純政府與軍隊抗戰，是決然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還在本年四月間對於這個問題就大聲疾呼的警告過我們當權的兄弟黨了，指出了沒有民衆起來抗戰，就會踏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不但

中國共產黨人，許多各地的先進同胞，以及國民黨許多賢明的黨員，都會指出了這一點，可是統制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其結果就是政府與人民隔離，軍隊與人民隔離，軍隊中指揮員與戰鬥員隔離，統一戰線沒有民衆充實起來，前線危機就無可避免的只會增大不會縮小。

爲什麼統制政策至今沒有改變？因爲今天的統一戰線至今還沒有一個爲兩黨所公認與正式公佈的政治綱領去代替統制政策。現在的一套，還是十年來的一套，從政府機構、軍隊制度、民衆政策，到財政、經濟、教育等等政策，大體上都還是十年來的一套，沒有起變化。起了變化的東西是有的，並且是很大的，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兩黨的內戰停止了，全國的抗戰起來了，這是從西安事變以來中國政局的極大的變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則至今沒有變化，這叫做沒有變化的東西同變化了的東西不相適應。過去的一套僅適用於對外妥協與對內鎮壓革命，現在要用這一套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所以處處不適合，各種弱點都暴露出來，然而不幹抗日戰爭則已，要幹的話，並且已經幹起來了，又已經暴露着嚴重的危機了，還不肯改換一套新的幹法，前途的危險是不堪設想的。抗日需要一個充實的統一戰線，這就要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加入統一戰線中去。抗日需要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這個統一戰線的行動方針，同時也就是這個統一戰線的一種約束，它像一條繩索，把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一切加入統一戰線的團體與人們都緊緊地約束起來，才能說得上堅固的團結。我們反對舊的那一套約束，因爲它不適應於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歡迎建立一套新的約束代替舊的，這就是頒佈共同綱領，建立革命秩序，因爲必須如此，才能適應抗戰。

爲實行三民主義與十大綱領而鬭爭

共同綱領是什麼呢？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共產黨在八月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中國共產黨在公佈國共合作的宣言上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若干的人對於共產黨願意實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覺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諸青來氏，就是提出這種疑問的一個（在上海的某種刊物上），以爲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是不能並存的，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法。共產主義是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與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口號的根本理由。說到三民主義的實行，共產黨還在十年前兩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就已經經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共同決定，而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經過每一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及每一個忠實的國民黨人之手，並在全國實行過了。不幸一九二七年統一戰線破裂，產生了十年來停止實行三民主義的局面。然而在共產黨一方面，十年來所實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是符合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在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澈底的民族主義，人民代表會議的蘇維埃制度也不是別的，就是澈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更無疑是澈底的民生主義。爲什麼共產黨又申明取消蘇維埃停止沒收土地呢？這個理由我們亦早已說明了，不是這種制度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引起了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聯合全民族反對日

本帝國主義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同時在世界環境內爲了反對法西斯危險，也正在建立民主的統一戰線。所以在中國建立民族的與民主的統一戰線，實在是中國今日之必需，我們用以代替蘇維埃口號的民主共和國口號是在這種基礎之上提出的。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孫中山先生曾經提出過的政策，今天的停止實行這個政策，完全是爲了團結更多的人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說中國不要解決土地問題。這種政策改變的客觀原因與時間性，我們曾經毫不含糊的說明了自己的觀點。正因爲中國共產黨根據於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一貫的堅持了並發展了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即三民主義的精神，並沒有任何的不忠實於革命，所以共產黨能於強寇壓境危急存亡之際，及时的提出了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這種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並且不疲倦地實行之。現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反而是國民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在全國範圍內恢復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精神，並表現之於一定的政綱政策之上，而真正不二心的，切實不敷衍的，迅速不推延的實行起來。這在中國共產黨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禱祝之的。爲此需要，共產黨乃在蘆溝橋事變之後，八月十五日的那天，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這個十大綱領，符合於馬克思主義，也符合於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這是現階段中國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初步的綱領，只有實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國，一切和這個綱領相抵觸的東西，如果還要繼續下去，就會要受到歷史的懲罰，這個懲罰的實行就是中華民族的亡國奴境遇。

這個綱領之實行，不得到國民黨同意是不可能的，因爲國民黨現在還是中國最大的統治政黨，它不同意就無法在全國實行。我們相信，賢明的國民黨員及其領袖，會有一天同意這個綱領的。因爲如果不同意的話，三民主義就始終是一句空話，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復，日本帝國主義就不能戰勝，亡國奴境遇就無可避免，真正賢明的國民黨黨員及其領袖是決不能這樣幹的，全國國民也決

不會眼看着盡當亡國奴，而況蔣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談話中已經指出：『余以爲吾人革命信贊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現，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與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這是很對的。現在急務在謀三民主義的實現，放棄個人及小集團的意氣與私見，改變過去的老一套，立即實行符合於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澈底與民更始，這是今天唯一的出路。再要推延，就會悔之無及了。

然而要實行三民主義與十大綱領，需要一個實行的工具，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與改造軍隊的問題，現在的政府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政府，三民主義十大綱領的實行，沒有一個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政府是不可能的。現在軍隊的制度還是老制度，要用這種制度統治下的軍隊去澈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不可能的，現在的軍隊都在前線上執行神聖的抗戰，我們對於所有中國的軍隊，特別在前線抗戰的軍隊，都是致其無限欽敬之誠的。然而軍隊的制度不適宜於執行澈底戰勝日寇的任務，不適宜於順利的執行三民主義與革命綱領，必須加以制度上的改變，然後才能勝任，這在三個月來的抗戰教訓中已經證明了。改變的原則就是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現在軍隊的制度是基本上違反這兩個原則的，將士雖有忠勇的心，但束縛於舊制度無法發揮其積極性，這是應該迅速開始改造的。不是說把仗停下來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變制度，中心任務是改變軍隊的政治精神與政治工作。模範的前例，就是大革命時代的黨軍，那是大體上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軍隊，恢復那種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國應學習西班牙戰爭的教訓，西班牙的政府軍是從極困難的境遇中創造出來的，中國的條件許多優於西班牙，但缺乏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缺乏一個能執行全部革命綱領的統一戰線政府，又缺乏大量新制度的軍隊，中國自己應該補充這些缺點。紅軍在今天對整個抗日戰線，還只能起一部份的作用，還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它的一些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

優點是足供全國友軍之採擇的。這個軍隊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現在的情形，曾經經過許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肅清了封建主義，實行了官兵一致與軍民一致的原則，這一點可以供全國友軍的借鑒。

當權的國民黨同志們，我們同你們在今天一道負着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你們已經同我們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了，這是很好的。你們實行了抗戰政策，這也是很好的。但我們不同意你們繼續其他的老政策。我們的統一戰線應該發展下去，應該把它充實起來，把民衆加進去。應該把它鞏固起來，實行一個共同綱領。應該決心改變政治的制度與軍隊的制度。一個新政府的出現是完全必要的，有了這樣一個政府才能執行革命的綱領，也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着手改造軍隊。我們這個建議是時代的要求，你們黨中也有許多的人感覺到這一層了，現在是實行的時候了。孫中山先生曾經下決心改造了政治制度與軍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上一次大革命的基礎，這個責任今天是落在你們的肩上了。一切忠誠愛國的國民黨同志們當不以我們的建議爲不切需要，我們堅決相信，這個建議是符合於客觀的需要的。這個改造的責任，我們尤其盼望於蔣介石先生。

民族國家已處在存亡絕續的關頭，國共兩黨親密的團結起來呵！全國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在國共兩黨團結的基礎之上親密的團結起來呵！實行一切必要的改革來戰勝一切困難，這是今日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完成了這個任務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要我們努力，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與英國記者貝特蘭之談話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共產黨與抗日戰爭

（貝問）中國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後，有什麼具體表示？

（毛答）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再三向全國警告過，對日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和平解決』的言論，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辭句，都不過是掩蓋其戰爭準備的煙幕彈。我們曾經反復指出，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政策，才能執行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必須實現民主權利，以動員全體民衆加入抗日戰線。對於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證』以爲戰爭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動員民衆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們，我們曾經反復指出了他們的錯誤。戰爭的爆發及其經過，證明我們這些意見的正確。蘆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共產黨即向全國發出宣言，號召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強民族統一戰線。不久我們又發表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政府所應採取的政策。國共合作成立之時，又發表了一個重要的宣言。

這些都證明我們對於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政策來進行戰爭的這種方針，是堅持不懈的。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的口號集中在一點上，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戰爭』。

抗日戰爭的情況與教訓

（貝問） 據你的觀察，戰爭到現在已經產生了一些什麼結果？

（毛答） 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攻城、略地、姦淫、搶劫、焚燒與屠殺，把亡國危險最後加到中國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國大多數人從此得到了深刻的認識，知非進一步團結與實現全民抗戰不能挽救危機，同時也開始促醒了世界各和平國家認識抵抗日本威脅的必要。這些就是已經產生了的結果。

（貝問） 日本的目的你以為是什麼？這些目的已經實現了多少？

（毛答） 日本的計劃，第一步是佔領華北與上海，第二步再佔領其它區域，這就是它的目的。說到日寇實現其計劃的程度，由於中國至今還限制於單純的政府與軍隊的抗戰，使得日寇在短期內取得了冀察綏三省，山西亦在危急中。惟有實行民衆與政府一致的抗戰，才能挽救此危局。

（貝問） 據你的意見，中國的抗戰也有它的成績沒有？如果說到教訓，則教訓在何處？

（毛答） 這個問題我願意和你多談一談。首先來說，成績是有的，而且是偉大的。這表現在：（一）現在的戰爭，是自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來所沒有的，它是真正全國地域參加了的戰爭，這個戰爭的性質是革命的。（二）戰爭把全國分崩離析的局面弄得比較的團結了，國共合作是這個團結的基礎。（三）喚起了國際輿論的同情，國際間過去鄙視中國不抵抗的，現在轉變為尊敬中國的抵抗

了。(四)給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聞日寇資財的消耗是每天二千萬元，人員的消耗尙無統計，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說過去日寇差不多不費一點氣力垂手而得東四省，現在就非經過血戰的代價不能佔領中國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國求償其大欲，但經中國長期抵抗的結果，將使日本帝國主義本身轉變到崩潰的道路。從這一方面說，中國的抗戰不但爲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抗日戰爭的革命性又表現在這一方面。(五)從戰爭取得了教訓，這是用土地與血肉換來的。

說到教訓，那是很大的。幾個月的抗戰中，暴露了中國的許多弱點，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這次參戰的地域雖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份却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着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有些人在說：『現在已經是全面性的戰爭。』這只說明了參戰地域的普遍，從參戰的成份說來則是片面的，因爲還僅屬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沒有人民的抗戰。幾個月來許多土地的喪失，許多軍隊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裏。所以現在的抗戰雖然是革命的，但它的革命性不全，就因爲還不是群眾戰。這也同時是一個團結問題。中國各黨派間雖然較前團結，但還遠遠地沒有達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數還沒有釋放，黨禁並沒有完全開放。至於政府與人民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軍官與士兵之間，關係依然十分惡劣，這裏有的是隔離而不是團結。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戰爭的勝利是無從說起的。此外，軍事上的錯誤，也是喪軍失地的一個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動的仗，軍事術語叫做『單純防禦』，這樣的打法是沒有可能勝利的。要勝利必須政治上軍事上都採取和現時大有區別的政策，這就是我們所得的教訓。

(頁問) 那末，政治上軍事上必須的條件是什麼？

（毛答）政治上說來，第一、須將現政府改造成爲一個人民代表參加的統一戰線政府，這個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這個政府實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許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與武裝抗敵的自由，使戰爭帶着群眾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包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改良工人與下級官兵的待遇，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救濟災民難民，等等在內。政府的財政應該放在合理負擔即有錢出錢的原則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積極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嚴厲的鎮壓漢奸。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漢奸們橫行無忌，在戰線上則援助敵人，在後方則肆行搗亂，並有裝出抗日面貌反稱愛國人民爲漢奸而加以逮捕者。但要真正鎮壓漢奸，只有人民起來與政府合作，才有可能。軍事上說來，亦須實行全般的改革，主要的是戰略戰術上單純防禦的方針，改變爲積極攻擊敵人的方針；舊制度的軍隊，改變爲新制度的軍隊；強迫動員的方法，改變爲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法；不統一的指揮，改變爲統一的指揮；脫離人民的無紀律狀態，改變爲秋毫無犯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紀律；單單正規軍作戰的局面，改變爲發展廣泛的人民游擊戰爭配合正規軍作戰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這些政治軍事條件，都在我們發佈的十大綱領中提出來了。這些政策，都符合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的精神。只有實行這些，戰爭才能勝利。

（貝問）共產黨如何使這個綱領實行起來？

（毛答）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緊張地而又耐心地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爲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鬭爭。因爲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範圍還很狹小，必須把它擴大起來，這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的遺囑，動員社會的下層民眾加進這個統一戰線去。說到統一戰線的鞏固，就是要實行一個共同綱領，用這個綱領來約束各黨各派的行動。我們同意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

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佈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國民黨現在已經部份的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這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民權主義是沒有實行的，民生主義也沒有實行，這樣就使得現在的抗戰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現在戰爭如此緊急，應是國民黨全部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再不實行就要悔之無及了。共產黨的責任，在於大聲疾呼向國民黨及全國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釋與說服，務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孫氏遺囑，全部澈底的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起來，用以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

（貝問）請你告我以八路軍的情形，這是很多人關心的，例如戰略戰術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毛答）紅軍自改為八路軍開赴前線以後，關心它的行動的人確是很多的，我現在向你說明一個大概。

先說戰鬪情況。在戰略上，第八路軍正以山西為中心進行戰爭，如你所知，第八路軍曾經有了多次的勝利，例如平型關的戰鬪，井坪、平魯、寧武的奪回，涇源、廣陵的克復，紫荊關的佔領，截斷大同雁門關間、蔚縣平型關間、朔縣寧武間日軍的三條主要運輸道路，並向雁門關以南日軍之後方攻擊，平型關雁門關的兩次奪回，近日又克復河北的曲陽、唐縣等。進入山西的日本軍隊，現在在戰略上是在第八路軍和其他中國軍隊的四面包圍之中。我們可以斷言，日軍在華北今後將遇到最堅強的抵抗，日軍要在山西橫行，必然將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難。

其次戰略戰術問題。我們採取了其他中國軍隊所沒有採取的行動，八路軍主要的是在敵軍翼側和後方作戰。這種戰法，比較單純的正面防禦大有區別。我們不反對使用一部份兵力於正面，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須使用於側面，採取包圍迂迴戰法，獨立自主的攻擊敵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再則使用若干兵力於敵人後方，其威力特別強大，因為搗亂了敵人的運輸路與根據地。就是在正面作戰的軍隊，也不可用單純防禦（又名專守防禦）的戰法，主要應採取『反突擊』。幾個月來軍事上的失利，作戰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現在第八路軍採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運動戰與游擊戰』。這和我們過去在國內戰爭時採用的戰法，其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區別，拿現時這一階段的情況來講，集中使用兵力之時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時較多，這是為着在廣大地域襲擊敵人翼側和後方之必要而採用的。若在全國軍隊，因其數量廣大，除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進行游擊戰外，主力應經常集中地使用於敵之翼側。軍事上的第一要義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採用『獨立自主的運動戰與游擊戰』，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機械的戰法。如果大量軍隊採用運動戰，而紅軍則用游擊戰以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問題。第八路軍更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東西，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肅清了封建主義，廢除了打罵制度，建立了自覺紀律，實行了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衆紀律，宣傳組織與武裝民衆，減輕民衆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第三、是宣傳敵軍與優待俘虜的原則，在這一工作上，我們的勝利不單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雖目前效力尚未顯著，但將來必定有成效的。此外從第二個原則出發，八路軍的補充不採取強迫人民的方式，而採取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

式，這個辦法較之強迫的辦法收效大得多。

現在河北、察哈爾、綏遠和山西一部份雖已喪失，但我們決不灰心，堅決號召全軍配合一切友軍爲保衛山西恢復失地而血戰到底。第八路軍將和其他中國部隊一致行動，堅持山西的抗戰局面，這對於整個的戰爭，特別對於華北的戰爭，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講到這裏，毛暫停，在一張地圖上指出第八路軍在山西的最近活動地帶，在這些地方第八路軍已經獲得多次的軍事勝利，他解釋第八路軍在敵人的翼側和後方作戰的一般的戰略戰術。）

（貝問） 據你看來，八路軍的這些長處，是否也能適用於其他中國軍隊？

（毛答） 完全能够適用。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有大體上相同於今日第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時代。那時中國共產黨贊助國民黨組織新制度的軍隊，在開始時候不過兩個團，便已團結了許多軍隊在它的周圍，取得第一次戰勝陳炯明的勝利。往後擴大成爲一個軍，影響了更多的軍隊，於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與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與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却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不過是繼承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罷了。大革命時代有了新精神的軍隊，其作戰方法也自然與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動的呆板的機械的作戰，而是主動的活潑的富於攻擊精神的作戰，因此獲得了北伐的勝利，現在的抗日戰場，正需要這樣的軍隊。這樣的軍隊並不一定要幾百萬，有了幾十萬作中心就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抗戰以來全國軍隊的英勇犧牲，是我們十分敬佩的，但需要從血戰中得出一定的教訓。尤其盼望有過英勇戰績有過光榮歷史的主力軍隊，出而領導全軍的改造。西班牙政府軍的改造，可以作爲我們的借鑑。

（貝問）優待俘虜的政策，在日本軍隊的紀律下未必有效罷？例如釋放回去後日方就把他們殺了，日軍全部並不知道你們政策的意義。

（毛答）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越殺得多，就越引起日軍士兵同情於華軍，這種事瞞不了士兵群眾的眼睛。我們的這種政策是堅持的，例如日軍現已公開聲言要對八路軍施放毒氣，即使他們這樣做，我們優待俘虜的政策仍然不變。我們仍然把日本士兵及一切被迫作戰的幹部看得如同自己的兄弟一樣，衷心的同情於他們，一經解除武裝，立即給以優待，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願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貝問）你們對於將被毒氣攻擊一事有所準備沒有？

（毛答）因為物質困難，現時還沒有什麼防禦武器，但我們正從蔣委員長要求援助。朱總司令已準備發表宣言答覆日本華北軍司令部，這個宣言指出，日本法西斯這種滅絕人道的舉動，必然促成它們自己的毀滅。

抗日戰爭中的投降主義

（貝問）據我所知，日本一面進行戰爭，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氣，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毛答）日本帝國主義在達到它的一定步驟後，它將爲着三個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煙幕彈。

這三個目的是：（一）鞏固已得的陣地，以便作爲第二步進攻的戰略出發地；（二）分裂中國的抗日陣線；（三）拆散世界各國援助中國的陣線。現在的空氣，不過是施放和平煙幕彈的開始而已。危險

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份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佈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

（貝問） 據你看，這種危險企圖的前途如何？

（毛答） 前途不外兩種，一是把投降主義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義得勢，陷中國於紛亂，使抗日陣線趨於分裂。

（貝問） 兩種情況中何種可能為多？

（毛答） 中國人民全體是要求抗戰到底的，社會上層份子陣營中如果有一部份在行動上走入投降道路，則其餘堅決部份必起而反對，和人民一道繼續執行抗戰。這種情況下，當然是中國抗日戰線的不幸，但我相信投降主義者是得不到群眾的，最後將為群眾的力量所克服，繼續使戰爭堅持下去，爭取戰爭的勝利。蔣介石先生似乎已經看出了這一點，故他在十月九日發表的談話中及答覆羅斯福宣言的談話中指出了堅持戰爭到底的方針，他說即使打到只剩下一人一槍也還要繼續打。中國共產黨堅決贊助蔣介石先生這種方針，排斥一切動搖份子的投降主義。共產黨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蔣氏談話的精神和我們的口號是相符合的。

（貝問） 請問如何克服投降主義？

（毛答） 言論上指出投降主義的危險，行動上組織人民群眾制止投降運動。投降主義根源於民族失敗主義，即民族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認為中國在打了敗仗之後再也無力抗日。不知失敗正是成功之母，從失敗經驗中取得了深刻的教訓，即是將來勝利的基礎。悲觀主義只看見抗戰中的失敗，不看見抗戰中的成績，尤其不看見失敗中已經包含了勝利的因素，而敵人則在勝利中包含了失敗的因素。向人民群眾指出戰爭的勝利前途，使之明白失敗與困難的暫時性，只要百折不回的奮鬥下去，

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投降主義沒有了群眾的基礎，即無所施其投降伎倆，抗日戰線便能鞏固起來。

民主制度與抗日戰爭

（貝問）共產黨在綱領中提出的『民主』是什麼意思？它和『戰時政府』豈不是互相衝突的？

（毛答）一點也不衝突。共產黨還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就提出了『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口號。這個口號政治上組織上的含義包括如下三點：（一）不是一個階層的國家與政府，而是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階層互相聯盟的國家與政府，其中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在內。（二）政府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與集中兩個似乎相衝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三）政府給與人民以全部必須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組織訓練與武裝自衛之自由。從這三方面看來，與所謂『戰時政府』並沒有任何的衝突，這正是一個利於抗日戰爭的國家制度與政府制度。

（貝問）可是『民主與集中』在名詞上不是矛盾的東西嗎？

（毛答）不但看名詞，而且看實際。民主和集中之間，並沒有不可跳過的深溝，對於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於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

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採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別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採取這個有利的民主集中制。人類政治生活進到當前的時代，已經從歷史總結中得到了這個最好的組織形式，無論平時戰時都以民主集中制為有利，戰時則更能發揮政治與軍事的效力。

（貝問）這和戰時內閣制度不相符合罷？

（毛答）這和歷史上的某些戰時內閣不相符合。

（貝問）難道也有符合的？

（毛答）也有符合的。戰時的政治制度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絕對集中的，由戰爭的性質所決定。歷史上的一切戰爭，依其性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革命的戰爭，一是反革命的戰爭。例如二十幾年前的歐洲大戰，是一個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那時各個帝國主義政府強迫人民為帝國主義的利益作戰，違反人民的利益，這種情形下英國路易喬治一類的政府是需要的。路易喬治壓迫英國人民不許說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話，任何表現這種民意的機關與集會都不許存在，即使仍然有國會，那也是奉令通過戰爭預算的國會，也是一群帝國主義者。戰爭的目的政府與人民不一致，就產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絕對集中主義政府。可是歷史上還有革命的戰爭，例如法國的革命戰爭、俄國的革命戰爭、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戰爭。這一類的戰爭，戰爭的目的政府與人民一致，因此政府不怕人民不贊成戰爭，為的是人民極願意進行這種戰爭，政府的基础建設在人民的自願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懼怕人民，而且必須喚起人民，引導人民發表意見，以便積極的參加戰爭。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人民極端同意的，戰爭的目的政府與人民並無二致，戰爭的進行沒有人民參加又是不能勝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為必要。中國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也是革命的，當時也依靠了民主集中

制取得了勝利。由此看來，可見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時候，政府越民主，戰爭就越好進行。這樣的政府就不應畏懼人民反對戰爭，相反，這個政府所顧慮的，應是人民的不起來，與對於戰爭的冷淡。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則。

（貝問）那末，你們準備經過什麼步驟實現新的政治制度？

（毛答）關鍵在於國共兩黨的合作。

（貝問）爲什麼？

（毛答）十五年來的中國政局，國共兩黨的關係是決定的因素。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兩黨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勝利。一九二七年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十年來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責任不在我們，我們是被迫轉入抵抗國民黨壓迫的方向，我們堅持了解放中國的光榮的旗幟。現在進入第三個階段了，爲了抗日救國，兩黨必須在一定綱領上進行澈底的合作。經過我們不斷的努力，這個合作算是成立了，問題在於雙方承認一個共同綱領，並在這個綱領上行動起來，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這綱領的重要部份。

（貝問）怎樣經過兩黨的合作達到新制度的建立？

（毛答）我們正在提議改造政府機構與軍隊制度。爲應付當前的緊急狀態，我們提議召集臨時國民大會。這個大會的代表，應大體上採用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張，由各抗日黨派、抗日軍隊、抗日民衆團體與實業團體，按照一定比例推選出來。這個大會的職權，應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它決定救國方針，通過憲法大綱，並選舉政府。我們認爲抗戰已到了緊急的轉變關頭，只有迅速召集這種有權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時局危機。這一提議我們正在向國民黨交換意見，希望得到他們的同意。

（貝問） 共產黨不是主張普選制的嗎？

（毛答） 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澈底的表現民意。臨時國民大會是一種過渡方式，因為在緊急情況下不許可從容的選舉，目前也沒有保證選舉出於民意的條件。此時求其能够比較的代表民意，還是依照孫中山先生在世時候的主張，由政黨軍隊與民衆團體各自推出代表的好。這個辦法，當然與普選制有區別，我們一定要達到普選制，這個辦法僅是到普選制去的橋樑，然而它是當前比較最好的辦法。

（貝問） 據你估量，國民黨是否能够同意？

（毛答） 國難至此，國民黨中許多明達之士早已有了這種呼聲，蔣介石先生亦曾聲明要實行民權主義，社會各界人士，抗戰軍隊的將領，亦有多人感到這種必要了。我想國民黨沒有理由拒絕這個提議罷。假如他們同意的話，共產黨將與國民黨走到親密合作的階段，這是一個國利民福的前提。

（貝問） 國民政府不是宣佈了停止國民大會的召集嗎？

（毛答） 那個停止是對的。停止的是國民黨過去準備召集的國民大會，那個大會按國民黨規定是一點權力沒有的，其選舉更根本不合民意，我們及社會各界都不同意這樣的國民大會。我們現在提議的臨時國民大會，同已經停止的，精神根本不同。臨時國民大會開會之後，面目必爲之一新，政府機構的改造，軍隊的改造，與人民的動員，就得着一個必要的前提，抗戰局面的轉機實繫於此。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

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形勢與任務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延安共產黨活動份子大會上的報告提綱——

一 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

(一) 我們贊助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抗戰，即使是片面的抗戰。因為它比不抵抗主義進一步，因為它是帶着革命性的，因為它也是在為着保衛祖國而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是需要保衛祖國的。

(二) 但是我們早就指出(四月的延安活動份子大會，五月的蘇區黨大會，八月的中央決議案)：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

它不是群眾戰。

(三) 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種抗戰，才是群眾戰，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

(四) 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革命戰爭，雖然也帶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不完全，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趨於失敗的，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

(五) 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與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存在着原則分歧的地方。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就不能正確的指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他就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就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與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六) 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全面抗戰，必須執行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必須有一個完全執行這個綱領的政府與軍隊。

(七) 上海太原失陷後的形勢是這樣的：

1 一方面表現：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國民黨陣線已被擊破，日寇正向南京及長江流域進攻。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已表現不能持久。

2 英美法等國政府站在他們自己帝國主義利益上的援助中國，還限制在口頭上的同情，還沒有什麼實力的援助。

3 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國主義。

4 國民黨用以支持片面抗戰的一黨專政及其對民衆的統制政策，還不願意作原則上的改

變。

這些是一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則表現：

- 1 共產黨與八路軍的政治影響極大與極快的擴大，『民族救星』的聲浪在全國傳佈着。共產黨與八路軍決心堅持華北的游擊戰爭，用以捍衛全國，箝制日寇向中原與西北的進攻。
- 2 民衆運動開展了一步。
- 3 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
- 4 國民黨中主張改革現狀的勢力正在增長。
- 5 世界人民反日及援助中國的運動正在發展。
- 6 蘇聯正在準備用實力援助中國。

這些是又一方面的情形。

(八) 因此，目前是處在從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片面抗戰已經無力持久，全面抗戰還沒有來到，一個青黃不接危機嚴重的過渡期。

(九) 在此期間，中國的片面抗戰可能向三個方向發展：

第一個方向，結束片面抗戰，代以全面抗戰。這是國內大多數人的要求，但國民黨還沒有下決心。

第二個方向，結束抗戰，代以投降。這是日寇漢奸親日派的要求，但遭到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反對。

第三個方向，抗戰與投降並存於中國。這將是日寇漢奸親日派無法達到第二個方向，因而實行其破裂抗日陣線政策的結果，他們正在策動這一着，這個危險嚴重地存在。

(一〇) 依目前形勢看來，國內國際不許可投降主義得勢的因素，是佔着優勢。這些因素是：日本滅亡中國的總方針，共產黨與八路軍的存在，中國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內多數黨員的要求，投降對於英美法的損失，蘇聯的存在及其準備援助中國的方針，中國人民對於蘇聯的深切希望（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這些因素好好地組織起來，不但將克服投降與分裂的因素，也將克服停頓於片面抗戰的因素。

(一一) 因此，爭取從片面抗戰轉變到全面抗戰的前途是存在的，這是一切中國共產黨員，一切中國國民黨先進黨員，與一切中國人民的共同的迫切任務。

(一二) 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現在是處在嚴重的危機中。危機存在的時間，也許將延長，但也許將較快的被克服。決定的因素，在中國內部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及基於此合作之國民黨政策的轉變，是工農群眾的力量，在中國外部是蘇聯的援助。

(一三) 國民黨有在其政治上組織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這種可能，這主要的是因為日本的壓迫，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中國人民的要求，國民黨內部新生力量增長。我們的任務是爭取其實現這一改造以便作為改造政府與改造軍隊的基礎。這一改造無疑須得到國民黨中央的同意，我們是站在建議的地位。

(一四) 改造政府。我們提出了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的方針，這也是必要與可能的，這一改造也無疑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並以它為主幹。

(一五) 改造軍隊的方向是建立新軍隊與改造舊軍隊。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內建立二十五萬到三十萬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軍隊，則抗日戰場上必能開始看到轉機。這種新軍隊影響並團結一切舊軍隊，這是抗日戰爭轉入戰略反攻的基礎。這一改造同樣沒有疑義須得到國民黨的同意並以它的軍隊為主

幹。八路軍應在這一改造過程中起着模範作用。八路軍本身也應該擴大。

二 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在黨內是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在全國是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

關於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

（一六）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大革命歸於失敗了，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一七）對於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路線，在蘆溝橋事變以前，黨內主要的危險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這主要的因為國民黨還沒有抗日的緣故。

（一八）在蘆溝橋事變以後，黨內主要的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的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

（一九）還在四月延安活動份子會，又在五月蘇區黨大會，特別在八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洛川會議）時，我們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及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主張的並實行它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及片面抗戰？

(二〇)爲什麼要這樣尖銳的提出問題呢？這是因爲：

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及決議上面污蔑及侮辱共產黨的決議與所謂『停止階級鬭爭』的『理論』，國民黨關於共產黨投降的衷心企圖與到處宣傳，蔣介石企圖統制共產黨，國民黨對於紅軍的限制與削弱政策，國民黨對於蘇區的限制與削弱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革命小資產份子政治上的投降舉動（章乃器爲代表），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均，許多黨員缺乏大革命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份黨員對十年艱苦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紅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共產黨參加政權問題的發生，蘇區中的遷就傾向，等等情況。

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必須尖銳的提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的反對投降主義。

(二一)幾個月以來，主要的是抗戰以來，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組織，同這種已經發生的及可能發生的投降主義傾向作了明確而堅決的鬭爭及必要的防止，並且收到了成績。

在參加政權問題上，中央發出了一個決議案的草案。

在紅軍中，開始向新軍閥主義作鬭爭，這種傾向表現在紅軍改編後某些個別份子不願意嚴格受共產黨的領導，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爲榮耀（以做官爲榮耀）等等問題上面。這個新軍閥主義傾向雖然和表現在打人罵人破壞紀律等現象上面的老的軍閥主義同其根源：把無產階級降低到農民，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同其結果：脫離群眾。然而它是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時期發生的，它特別帶着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及下級政治部改名爲政訓處，現在也提出把它恢復了。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略原則並堅持地執行之，基本

上保證了紅軍作戰上與工作上的勝利。拒絕了國民黨派遣他們的黨員來當紅軍的幹部，堅持了共產黨絕對領導紅軍的原則。在蘇區，同樣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糾正了『議會主義』傾向（當然並不是第二國際的議會主義，這種議會主義在中國黨內是沒有的），堅持了反對土匪敵探及破壞者的鬭爭。

在西安，糾正了兩黨關係上的無原則傾向（遷就傾向），重新開展了群眾鬭爭。

在隴東情況與西安大體相同。

在上海，對『少號召多建議』的章乃器主義給了批評，開始糾正了救亡工作中的遷就傾向。

在南方各游擊區，這是我們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是國民黨在西安事變後還用圍剿政策企圖消滅在蘆溝橋事變後則改用調虎離山政策企圖削弱的力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注意力是集中在：（1）無條件集中傾向（適應國民黨拔去這些支點的要求）的防止；（2）國民黨派人的拒絕；（3）何鳴危險（閩粵邊游擊隊千餘被繳械）的警戒。

在解放報，嚴正批評態度的堅持。

（二二）爲了堅持抗戰及爭取最後勝利，爲了變片面抗戰爲全面抗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必須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任何破裂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是不許可的，左傾關門主義仍然要防止。但同時，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須密切聯系到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線，是在實行一定綱領上面的統一戰線，離開一定綱領的實行就沒有任何的一戰線，就變成無原則的舉動了，這就是投降主義的傾向。因此，『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與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二三）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在於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這是我們的『戰略出

發地』，喪失了這種陣地就一切無從說起了。但主要的目的還在於另一方面，這就是爲了發展陣地，爲了實現『動員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積極的目的。保持陣地與發展陣地是不可分離的。幾個月來，小資產階級的左翼群眾是在我們的影響下更廣大地團結起來了，國民黨營壘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長中，山西的群眾鬪爭是發展了，黨的組織在許多地方也發展了。

（二四）但是必須清楚的懂得，黨在全國的組織力量，一般說起來還在微弱的狀態中，全國的群眾力量也還很薄弱，主要的是全國工農基本群眾還沒有組織起來。所有這些，一方面由於國民黨的抵制與壓迫政策，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們自己的沒有工作或工作不足，這是我黨在現時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最基本的弱點。不克服這個弱點，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但要達到此目的，一定要實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要克服無原則的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

關於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

（二五）上面說的是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它引導無產階級去適合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與不徹底性，不克服此傾向，就不能執行勝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就不能變片面抗戰爲全面抗戰，就不能保衛祖國。

但是還有一種投降主義，這就是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它引導中國去適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使中國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中華民族變爲亡國奴。這個傾向在現時是發生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中。

（二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左翼集團是共產黨率領的群眾，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及小資產階級。

我們的任務，是用一切努力去擴大與鞏固這個集團。這一任務的進步、發展與完成，是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起來的基本條件，是變片面抗戰爲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條件。

（二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央集團是民族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由上海各大報所代表的成份是左傾了，復興社的一部份是開始左傾了，CC團也有一部份在動搖中，抗戰的軍隊是得到了嚴重的教訓，其中某些成份是開始了或準備着改造軍隊，國民黨的報紙也有了某些進步現象，我們的任務，是爭取中央集團的進步與轉變，這一步驟如果不做到，轉變時局是不可能的。

（二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是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一方面戰爭對於他們的破壞，一方面民衆對於他們的威脅，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他們中間許多人已經是漢奸，許多人已經是親日派，許多人是準備作親日派，許多人在動搖中，僅僅個別有特殊情況的份子，是堅決的。他們中間有些人之暫時加入民族統一戰線是被迫着勉強做的。一般說來，他們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裂出去是不遠的前途。目前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中的許多最壞的份子，正在策動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是謠言的製造廠，『共產黨暴動』『八路軍退却』一類的謠言，今後將要與日俱增。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在這鬭爭中擴大與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央集團的進步與轉變。

階級投降主義與民族投降主義的關係

（二九）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

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爲了爭取中華民族與勞動羣衆的解放，爲了使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鬭爭表現得堅決有力，必須反對共產黨內部與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投降傾向，要使這一鬭爭開展於各方面的工作中。

與合衆社記者的談話

——一九三八年二月——

美國合衆社記者王公達先生於二月（一九三八年）間訪延安，與毛澤東同志作了一次談話，此係根據王先生的記錄，經過毛澤東同志審閱，曾在解放週刊發表。

編者

（記者問） 現在有許多人對中國抗戰的前途表示悲觀，先生對此意見如何？

（毛答） 我對此完全是樂觀的，因為中國抗戰的過程必然是先敗後勝、轉弱為強，這已經成了確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戰爭初期，一般形勢是日本強、中國弱，可是今後的形勢必是日本的弱點漸漸暴露出來，中國的力量則漸漸加強起來，日本現在正借錢打仗，除過去半年已經用去二十二萬萬元以外，今年一年的需要據說是四十萬萬元，必定還不止此數，這已經消耗它大量的國力。日本的國際信用降低，公債跌落，它的『速戰速決』計劃已經失敗，試問它那有那許多錢無限長期的打下去？就軍事方面講，日本在中國的戰線已經延長到自杭州以達包頭的數千里的距離，它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所以它的兵力已隨深入與擴大的程度漸漸薄弱。它佔領了長距離的鐵路，便需要軍隊去防守每一個車站。日本已動員三分之一的軍隊來侵略中國了，如果它再要佔領漢口、廣州等地，至少須再動員幾十萬軍隊，那時它的情況將十分困難。因為日本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個，加上日本國內國際的其他許

多大矛盾，它終必走上完全崩潰之途。

（問）先生說中國的力量能够漸漸加強起來嗎？

（答）根據過去七個月作戰的經驗，在軍事上我們若能運用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敵軍處於極困難地位。我的意見，在目前除應以二三十萬精兵組成數個強有力的野戰軍，從運動戰中給敵人前進部隊以殲滅的打擊之外，還應抽調八九萬軍隊組成二三十個基幹的游擊兵團，每個兵團三四千人，派堅決而機動的指揮員領導，加強其政治工作，配置於從杭州到包頭的敵人陣線前面，從這個長陣線的二三十個空隙中間，打到敵人後方去，如能運用得宜，結合民衆，繁殖無數小游擊隊，必能在敵後方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動千百萬民衆，有力地配合野戰軍的運動戰，而使敵軍疲於奔命。至於陣地戰，由於我們技術不足，在目前不應看作主要方式。但我們必須建設國防工業，自製重武器與高武器，同時設法輸入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進行防禦的與攻擊的陣地戰，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說，我們只主張游擊戰，這是亂說的，我們從來就主張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運動戰為主，以其他二者爲輔，在將來要使陣地戰能够有力地配合運動戰，而游擊戰，在它對於戰鬪方式說來，則始終是輔助的，但游擊戰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中，特別在地域廣大的國家，無疑在戰略上佔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們已有國內的統一，更擁有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現在的成績還不够，還應進一步加強起來。所有上述軍事上政治上的加強，都是必須的。只要繼續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強，這就預示着前途的光明。

（問）第八路軍在日人數面包圍之中有被日人驅逐或殲滅的危險嗎？

（答）第八路軍現在共在四個區域中進行廣大的游擊戰。第一個區域是平漢、平綏、正太、同蒲四鐵路中間及其以東以北的地域，這地域擁有堅決反日的一千二百萬民衆，都與軍隊密切結合着，這

是一個極大的抗戰的堡壘。第八路軍在這裏已經立穩了脚跟，雖然敵人正在加緊進攻這個區域，但要驅逐他們是不可能的，殲滅更不可能。八路軍的幾個大的東進支隊已迫近津浦線。第二個區域是平綏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黃河以東的晉西北地帶。第三個區域是平漢、正太、同蒲中間的晉東南、冀西南地帶。第四個區域是晉西南。他們都與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聯系，都隨時猛烈地破壞敵人的後方聯絡線，有了很多大小的勝利，使敵人大減其前進的力量。從這些區域看來，中國失去的不過是幾條鐵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並沒有失掉。這一實例給全國以具體的證明：只要到處採用這種辦法，敵人是無法滅亡中國的。這是將來舉行反攻收復失地的有力基礎之一。

（問）先生覺得此次國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嗎？

（答）我以為是的。在民十七國共分裂的時候，原是違反着共產黨的志願的，共產黨一向不願意和國民黨分裂。過去十年來國共雙方及全國人民都經歷了艱苦的經驗，這種經驗能增強今後的團結。現在及將來合作的目的共同抗日與共同建國，在這個原則之下，只要我們的友黨能有和我們一樣的誠意，加上全國人民的監督，這個合作必然是長久的。

（問）是的，共產黨對時局宣言說過，國共兩黨不但共同抗日，並且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還要共同建國；請問這代表着兩個不同階級的政黨將來怎能合作建立新國家呢？

（答）因為中國是處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則更處在亡國滅種關頭，連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險中。黨派與階級雖不同，這個共同的地位則一，就此決定了兩黨不但能合作抗日，並且能合作建國。但合作是在一定綱領下的合作，是有原則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與貌合，如果離開綱領與原則，必變成苟合與貌合，這是任何有原則的政黨所不許可的。有綱領有原則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間的道義之交，只有這種道義之交，交情才能長久。

（問）什麼是共產黨主張的『民主共和國』？

（答）我們所主張的民主共和國，便是全國所有不願當亡國奴的人民用無限制的普選方法選舉代表組織代議機關這樣一種制度的國家，這種國家就是民權主義的國家，大體上是孫中山先生早已主張了的，中國建國的方針應該向此方向前進。

（問）共產黨對於目前的中央政府滿意嗎？還須召開臨時國民大會嗎？

（答）我們擁護現在的中央政府，因為它堅持抗戰的方針並領導抗戰的行動。但我們希望加以充實和擴大，並在內政上進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加有利於抗戰。我們曾經提出了臨時國民大會這種主張，這也是孫中山先生提倡過的，我們認為有益於團結全國加強抗戰的力量。但究用何種方法更於抗戰有利，我們並無成見，只要真正有利於抗戰，什麼方法都可以採用的。

（問）東三省義勇軍的抗日活動，有中國共產黨前去領導嗎？

（答）中國共產黨和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確有密切關係。例如有名的義勇軍領袖楊靖宇、趙尚志、李紅光等等，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堅決抗日艱苦奮鬥的戰績，是人所共知的。那裏也是民族統一戰線，除共產黨員外，還有其他的派別及各種不同的軍隊與民衆團體，他們已在共同的方針下團結起來了。

（問）先生對於美國一般感想如何？

（答）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蒂，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於中國抗日鬭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不過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而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侵略威脅的國家更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

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抗戰兩週年了，解放報、新華日報、新中華報與八路軍軍政雜誌，要我作一篇紀念文章。我手邊收集了不少材料，擬寫一篇紀念抗戰兩週年的論文，藉以答覆自『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出版以來從某些方面發出的責難、挑戰和質疑，名之曰『再論持久戰』。這裏只能簡略的說一說當前時局的危機問題。

425

中華民族，在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面前，歷來存在的關頭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戰不戰的問題。自九一八到蘆溝橋之間，這個問題爭論得異常嚴重。『戰則存，不戰則亡』——這是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的結論。『戰則亡，不戰則存』——這是一切投降主義者的結論。蘆溝橋抗戰的砲聲，把這個爭論暫時的解決了，它宣告：第一個結論是對的，第二個結論完全錯了。但蘆溝橋的砲聲，為什麼僅僅暫時的解決這個問題而並沒有最後的解決這個問題呢？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由於國際投降主義者的妥協企圖，由於中國抗日陣線中一部份人的動搖性，就把這個問題改變了一點詞句，變為所謂『和戰問題』，而在中國內部就掀起了主戰派與主和派之爭。他們的論點依然一樣，『戰則

存，和則亡』——主戰派的結論。『和則存，戰則亡』——主和派的結論。但是，主戰派，乃是包括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數；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數說來，則僅僅是抗日陣線中的一部份動搖份子。因此，所謂主和派，就不得不進行其欺騙宣傳，而第一就是反共。於是雪片一樣的製造所謂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與不聽指揮，陝甘寧邊區割據與向外擴展，共產黨大發展，與共產黨陰謀推翻政府，乃至蘇聯陰謀侵略中國等等的假消息、假報告、假文件、假決議，用以蒙蔽群眾的眼目，蒙蔽事實的真像，企圖逐漸造成輿論，達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這樣做，因為共產黨是民族團結抗戰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與堅持者，不反對它，就不能破壞國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讓步，認為日本已經不行了，它將改變其根本政策，自動的退出華中、華南甚至華北，中國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勝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於國際的壓力，許多所謂主和派份子，他們不但希望國際各大國出來對日本壓一壓，迫使日本讓步，以便講和，而且還希望各國向中國政府的頭上壓一壓，以便向主戰派說道：『你們看，國際空氣如此，還有什麼可以打下去的？只得和罷！太平洋國際會議是有益於中國的，這不是什麼慕尼黑黑，這是復興中國的步驟。』這一切，就是中國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觀點，整套做法，整套陰謀！這一套，不但汪精衛，更嚴重的就是還有許多的張精衛、李精衛，他們暗藏在抗日陣線內部，與汪精衛更應外合，有些唱雙簧，有些裝紅白臉。

我們共產黨人公開宣稱：我們是始終站在主戰派方面的，我們是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歷次公開宣告的抗戰國策的。我們堅決反對那些所謂主和派。我們僅僅願意與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一道，鞏固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共合作，實行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抗戰到底，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我們堅決斥責那些公開的汪精衛與暗藏

的汪精衛輩製造反共空氣，挑撥國共磨擦，甚至企圖再來挑動一次國共分裂與兩黨內戰的陰謀。我們向他們說：你們這種分裂陰謀的實質，統統不過是你們實行投降的準備步驟，而你們的投降政策與分裂政策統統不過是出賣民族利益，圖謀少數人私利的整個計劃之表現，每個人民都有眼睛，你們的陰謀會被人民揭穿的。我們堅決斥責那些認為太平洋會議並非東方慕尼黑式的無稽之談。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我們堅決斥責那些認為日本帝國主義能夠覺悟，能夠根本讓步的空談。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根本方針是決不會變的，武漢失陷後日本的甜言蜜語，例如放棄其所謂『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轉而承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例如所謂華中、華南撤兵的條件，乃是餌魚上鉤取而烹之的陰險政策，誰要上鉤誰就準備受烹。國際投降主義者引誘中國投降，同樣是他們的陰險政策，他們縱容日本侵略中國，他們坐山觀虎鬥，以待時機一到，就策動所謂太平洋調停會議，藉收漁人之利，如果寄其希望於這些陰謀家，同樣將大上其當。

戰與不戰的問題，如今改成了戰與和的問題，但性質還是一樣，這是一切問題中的第一個大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半年以來，由於日本誘降政策的加緊執行，國際投降主義者的積極活動，主要的還是在中國抗日陣線中一部份人的更加動搖，竟把所謂主和問題鬧得甚囂塵上，這樣就把投降可能造成當前政治形勢中的主要危險，而把反共，即分裂國共合作，分裂抗日團結，當作那班投降派準備投降的重要與首要步驟。在這種情形下，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必須光起眼睛注視那班投降派的活動，必須認識當前形勢中『投降是主要危險，反共即準備投降』這一個確切的事實與主要的特點，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對投降與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同日本帝國主義打了兩個週年的神聖抗戰，是決不容許一部份人去動搖與叛賣的。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締結所公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決不容許一部份人去破壞與分裂的。

戰下去，團結下去，——中國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國必亡。

何去何從，國人速擇。

我們共產黨人是一定要戰下去，團結下去的。

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也是一定要戰下去，團結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陰謀與分裂陰謀即使一時得勢，最後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是團結抗戰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無論他們如何得勢，如何興高采烈，以爲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們的命運最後一定要受到全國人民的制裁的。

反對投降與分裂——這就是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的當前緊急任務。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持抗戰與團結，把投降陰謀與分裂陰謀鎮壓下去呵！

用國法制裁反動份子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在平江慘案諸烈士追悼大會上的講演——

同志們！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們在這裏開追悼大會。爲什麼開這樣大的追悼會？因爲，殺死了革命的同志，殺死了抗日的戰士，這是一件大事。現在應該殺死什麼人？應該殺死漢奸，殺死日本帝國主義。但是現在在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同它打了二年，還沒有分勝負；漢奸殺死的也很少；而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戰士，却被殺死了。什麼人殺死的？軍隊殺死的。軍隊爲什麼殺死了抗日戰士？軍隊是執行命令，有人指使軍隊去殺的。什麼人指使軍隊去殺？一部份反動派在那裏指使。同志們！照理說什麼人要殺抗日戰士？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殺；第二、是汪精衛等漢奸賣國賊要殺。但是現在殺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漢奸佔領的地方，而是在平江這個地方，在我們抗戰的後方，被殺死的是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志涂正坤、羅梓銘等。很明顯的，是那班劊子手反動派聽了日本帝國主義同汪精衛的命令來殺人的。這班反動派，他們恭恭敬敬的執行了日本老爺、汪精衛老爺的命令，把抗日同志殺死了。這樣一件事，是一件大事情，不是一件小事，絕對不是小事。如

果是小事，我們今天就不會開這樣的追悼大會了。這次被殺死的涂、羅等同志，他們是抗日的幹部，他們是新四軍的軍人，他們是共產黨員。這些忠勇的戰士，被那些反動派反共派指使謀害了。這些反動派，他們是準備投降的，所以就按步就班先把最堅決的抗日份子殺死。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

中國現在全國抗日，統統在抗日的目標之下，結成一個大團結。但是在這個大團結裏面，有一部份人是壞蛋，是反動派，是投降派。他們幹什麼呢？就是幹這樣的事：殺抗日份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

但是這樣一件殺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情，有誰出來問呢？自從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殺了人之後，到今天已是八月一日了，我們看見有人出來過問沒有呢？這件事應該誰來過問呢？首先應該是中國的法律出來過問，法官出來過問。比方陝甘寧邊區的高等法院，它管什麼的？它不管別的，專門管對付漢奸，對付破壞法律的人。如果在邊區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的高等法院早就出來問了。但是，平江慘案快兩個月了，法律與法官並沒有出來過問，只有共產黨出來過問這件事情。我們的國家是有法律的，雖然不好，總還不失其為有法律。法律作什麼用？法律是應該保護抗日份子，打擊漢奸，打擊反動派。但是平江慘案，到現在法律還是置若罔聞，這是什麼話？難道法律是死了嗎？難道法律是縱容兇犯的吗？所以，我們現在要以人民的資格出來過問這件事。我們要求全國人民起來，大家注意保護抗日份子，反對漢奸，反對反動派，尊重法律。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不僅是爲了追悼已死的幾個人，而且是爲了一切抗日同志抗日同胞的生命保護權。

全國應該統一，不統一就不能勝利。什麼叫統一？統一就是大家抗日，大家團結，大家進步，要有賞有罰。賞什麼人？抗日的人，團結的人，進步的人應該賞。罰什麼人？漢奸應該罰，反動派應該

罰，開倒車的應該罰。現在統一了沒有呢？沒有。平江慘案就是證據。這件事情，就可以見到：應該統一的沒有統一。我們早就提倡全國要統一：第一個，統一於抗戰。現在涂正坤、羅梓銘等抗日同志不但沒有賞，反被慘殺了，而那些壞蛋，他們反對抗戰，準備投降，實行殺人，却沒有受到處罰，這就是不統一；我們要反對這些壞蛋，反對這些投降份子，捉拿這些殺人兇手。第二，要統一於團結。贊成團結的就應該賞，反對團結的就應該受處罰。但是現在贊成團結，擁護團結的涂正坤、羅梓銘等同志，他們倒受了處罰，被槍斃了。而那些破壞團結的壞份子却還沒有受到一點處罰，這就是不統一，我們要反對。第三，要統一於進步。要全國進步，要落後的人向進步的人看齊，而決不是拉進步的人向後倒退。共產黨中央提出了下列的口號：

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

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

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平江慘案的那些劊子手，他們把進步份子殺了，他們實行開倒車，這種倒退，我們一定要反對。這就是：我們要法律，我們要統一。我們要保護抗日將士、抗日人民的法律，我們要處罰投降份子、破壞份子與反動派的法律。我們要統一，要全國一致的統一於堅持抗戰，不准投降；統一於鞏固團結，不准分裂；統一於力求進步，不准倒退。投降派、分裂派、反動派，那些壞蛋，統統應該受到國法的制裁。

平江慘案，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常重大，雖然這一次被殺死的人只有幾個，地方只在湖南省平江縣一個地方，但是，這是全國的事情，是全國的大事情。同志們，你們想：如果這樣下去，共產黨員今天被殺一個，明天被殺十個，那末百個、千個、萬個，都可以被殺的。愛國志士也是一樣，十個、百

個、千個、萬個的被殺下去，中國就要亡國，日本老爺、汪精衛老爺就大大稱快。抗戰以來被暗殺的共產黨員與愛國志士已經不下幾十幾百，平江慘案不過是最近的一件事。這樣下去，中國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統統被殺。殺抗日的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他們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準備投降，所以先殺抗日軍人，先殺共產黨，先殺愛國志士，如果不加制止，中國會在這些壞蛋手裡滅亡。所以這件事是全國的事，是非常大的事，我們應該到處去講，到處去說，到全國去說，到全國去講。怎樣說法？就是寫信到全國去，打電報去，請求國民政府辦這個案子，嚴辦那些反動派，嚴辦那些兇手，嚴辦那些搗亂份子。

同志們！我們今天不但開個會就完了，延安的同志大家要懂得：近來日本帝國主義的搗亂更加厲害，國際帝國主義反動派幫日本的忙也更加積極，中國內部的漢奸，公開的汪精衛，暗藏的汪精衛，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後倒退，他們想幹一個全國投降，內部分裂，國內打仗。同志們！你們要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反對這種陰謀。

今天延安開這個大會，把大會的電報打出去，發到各地方去，反對這一類事情再發生，反對與這相似的事情發生，一定要執行法律，一定要統一，一定要保護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幹部，抗日的人民。這樣做，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才能勝利（全場鼓掌）；不這樣做，中國就很危險。今天我們一致表示：反對這樣的事，我們要求蔣委員長，要求國民政府林主席，要執行保護革命同志、抗日同志的法律，要全國統一於抗戰，統一於團結，統一於進步。如果法律不靈，再不統一，全國人民就要繼續起來要求，一定要使法律有靈，統一實現，鎮壓壞蛋，鎮壓搗亂份子，鎮壓反動派、投降派，以後不准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全場熱烈鼓掌）

現在國內流行一種秘密辦法，叫做什麼『防制異黨辦法』，其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

國主義的，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什麼是『異黨』？日本法西斯黨是異黨，汪精衛黨是異黨，漢奸是異黨。共產黨、國民黨、一切抗日的黨派，一致團結抗日，這是『異黨』麼？現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動派、頑固派，在抗戰的大團結中間磨擦，鬧分裂，這種行為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全場鼓掌）『防制』，現在要防制什麼人？要防制日本帝國主義，要防制汪精衛，要防制反動派，要防制投降份子。（全場鼓掌）為什麼要防制最抗日最革命最進步的共產黨？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延安的各界表示堅決的反對，堅決的抗議。（全場鼓掌）我們要反對所謂『防制異黨辦法』，一定要反對，這種辦法就是搗亂一切，目無法紀，破壞團結的種種罪惡行為的根源。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爲了這些意思，不是簡單的爲了幾個同志的追悼，而且是爲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爲了這個，就要取消『防制異黨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搗亂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熱烈鼓掌，高呼口號）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在延安幹部大會上講演——

一 戰爭的新階段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早已開始了，已經打了好幾年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的，它首先佔領東四省，然後又於一九三七年大規模侵略中國。意大利帝國主義則於一九三五年侵略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德意兩國聯合侵略西班牙。一九三八年德國佔領奧、捷兩國。在這一時期中，東方與西方，共有五萬萬以上人口捲入了戰爭，而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却沒有參加。因此，我們稱這一時期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一階段。而從現在開始，從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參加戰爭的現在開始，則稱之為第二階段，因為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如果過去還不能稱為世界大戰，它還沒有世界規模，那麼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已是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新階段。

二 戰爭的原因

根據歷史事實與列寧的學說，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極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結束之後，不到二十年工夫，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又爆發了，帝國主義各國又來了一次重分世界的戰爭。這個新的戰爭的開始階段，它的第一階段，是建立在上一次全世界經濟危機之上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過去之後，接着的不是繁榮而是特種的蕭條。一部份帝國主義國家，或者認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分贓過少的國家，如像日本與意大利，或者認為自己在上次戰爭中是損失了贓物的國家，如像德國，就全副武裝跑上了戰爭的舞台，企圖用戰爭來脫離經濟危機，避免資本主義的崩潰。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爆發，並形成了它的第一階段。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二階段，德英法波等國發動了大規模戰爭，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均將直接間接的捲入戰爭，這是建立於新的經濟危機之上的。從一九三七年開始的新的世界經濟危機，這幾年來是浸淫於英法美這些所謂『和平』國家之內的，並且正向德日意發展。在經濟危機之上，又造成了嚴重的政治危機，人民不滿意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專政，不論在早已法西斯化了的國家或現正藉手於戰爭以實行法西斯化的國家，這種政治危機，這種人民不滿，都日益尖銳化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蘇聯又强大到不可侵犯。在這種情勢下，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就認為除了擴大戰爭，除了把片面性的戰爭擴大為全面性的戰爭，除了打壞他們的帝國主義朋友，不能逃脫經濟危機與政治危

機，不能避免自己的死亡。

所有這一切，就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在它臨死前夜的打算。至於這種打算——用重分世界的戰爭來逃脫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避免自己死亡的打算，是一定要造成更大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是一定要加速自己死亡的日子，它們就不能設想了。它們像瘋狗一樣，已經瘋了，被資本主義制度把它們弄得完全瘋了，它們就不得不向它們的敵人，向世界的壁牆，亂撞亂碰，這就是今天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實際生活。一群瘋狗打架——這就是今天的帝國主義戰爭。

三 戰爭的目的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帝國主義的本性是掠奪，帝國主義國家在『和平』時代的政策也無時不是爲了掠奪。但如果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掠奪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阻礙而不能用和平方法衝破這種阻礙時，就使用戰爭方法去衝破這種阻礙，以便繼續其掠奪政策。所以，掠奪——這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的政治目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同樣，是爲了重分世界，就是說，爲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爲了掠奪世界人民，爲了爭奪對世界人民的統治權。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這種目的，過去階段與現在階段，是完全一樣的。除了這種目的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目的沒有呢？還有什麼善良的目的沒有呢？一點也沒有。不論是德意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這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永久和平』，希特勒的『民族自決』，張伯倫的『反對國社主

義』，達拉第的『援助波蘭』，其實都是『掠奪』二字。不過爲了說得好聽起見，爲了欺騙人民起見，命令他們的秘書製造出幾個別緻一點的代名詞罷了。

四 戰爭的性質

戰爭的性質是根據於戰爭的政治目的而定的。一切戰爭分爲兩類，照斯大林同志的說法，戰爭分爲：（一）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二）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同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一樣，是屬於第二類性質的戰爭。因爲這兩次戰爭的目的，都是爲了掠奪，絲毫也沒有其他的目的，絲毫不利於其本國與他國的人民。這就是戰爭的掠奪性，非正義性與帝國主義性。現在戰爭的雙方，爲了欺騙人民，爲了動員輿論，都不顧羞恥地宣稱自己是正義的，而稱對方是非正義的。其實，這只是一種滑稽，一種欺騙。只有民族解放戰爭與人民解放戰爭，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爲了援助這兩種解放運動而戰的戰爭，才是正義的戰爭。這一次，許多人又弄糊塗了，他們以爲德國固然是非正義的，英法却是民主國家反對法西斯國家，波蘭則是民族自衛戰爭，以爲英法波方面總多少帶有一點進步性，這是極端糊塗的見解。這種糊塗，是由於沒有弄清戰爭的目的而來的，也由於沒有弄清戰爭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不同特點而來。

五 戰爭第一階段的特點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第一階段的特點，是在於：（一）就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關係說來，是一部份帝國主義國家，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舉行了瘋狂的侵略戰爭，侵犯各弱小民族的利益，侵犯各民主國的利益，並在各民主國內部，策動法西斯威脅。於是全世界人民都有反對侵略保衛民主的要求，都要求另一部份帝國主義國家，即所謂英美法民主國家，出來干涉侵略戰爭，並允許人民保存一點僅剩的民主。蘇聯則屢次提議願意與各個所謂民主國家建立反侵略統一戰線。如果這些所謂民主國家在當時出來干涉侵略者，如果在當時發生了干涉侵略者的戰爭，例如能與蘇聯一道援助西班牙政府軍制止德意的侵略，援助中國制止日本的侵略，那末這種行動，這種戰爭，就是正義的，就有進步性。可是，這些所謂民主國家，却並不出來干涉，他們採取了『不干涉』政策。他們的目的，在於使侵略國與被侵略國的雙方都在戰爭中消耗起來，然後自己出來干涉，藉收漁人之利。至於英法把奧、捷兩國奉送給德國，這是作為交換條件，就是說，作為交換德國向蘇聯進攻的條件的。英法美想使蘇德兩國衝突起來，借刀殺人，兩敗俱傷，然後他們就好獨霸世界。由於他們的這種『不干涉』政策，在戰爭中，就表現為只有一部份帝國主義國家出面打仗，而另一部份帝國主義國家却『坐山觀虎鬪』，表現為戰爭的片面性，不普遍性，不干涉性。民主國家資產階級政府的反革命的『不干涉』政策，沒有能够被人民力量的逼迫而廢除掉，因而出現了這種片面性，這就是戰爭第一階段的第一個特點。（二）但在這一時期中，除了德意日帝國主義舉行了非正義的掠奪的戰爭，而所謂民主國家却縱

容這種戰爭，這一種情況之外，還有另一種情況，還有民族解放戰爭，這就是阿比西尼亞的抗意戰爭，西班牙共和國的抗德意戰爭，與偉大的中國抗日戰爭，而全世界人民與社會主義的蘇聯都真誠地援助了這種戰爭。這後一種戰爭，乃是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這就是戰爭第一階段的第二個特點。

帝國主義戰爭的片面性與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存在——這就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第一階段的兩個特點。

六 我們在戰爭第一階段中的革命政策

根據戰爭第一階段的特點，這個階段的革命政策，毫無疑義的，是組織被侵略國家的反侵略統一戰線，以抵抗侵略者的進攻；組織各民主國家內人民群眾高漲着的反法西斯鬭爭，以保衛民主；同時還不放棄組織蘇聯與各民主國政府之間制止侵略進一步發展的鬭爭。在這最後的一點上，在組織蘇聯與各民主國政府間的反侵略統一戰線這一點上，就是在慕尼黑之後，由於西班牙失敗與捷克滅亡所引起的，在英法兩國內部廣大人民中甚至資產階級左派份子中的憤怒情緒，還有逼迫張伯倫、達拉第政府放棄不干涉政策而與蘇聯締結反侵略統一戰線之可能，這種可能性，在當時還沒有完全喪失。總之，這一時期內，革命的總任務，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組織到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統一戰線內，用以抵抗三個法西斯國家的瘋狂侵略與各國內部法西斯的襲擊。因此，在當時這個統一戰線，有下列四個可能的組成部份：（甲）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人民統一戰線，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統

一戰線；（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是民族統一戰線，無產階級到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丙）社會主義的蘇聯；（丁）各個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這第四個組成部份，在當時之所以還有可能性，是因為這些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所謂民主政府，同他們本國人民之間，同他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之間，同蘇聯之間，在各法西斯國家的瘋狂侵略之下，在各國內部法西斯勢力威脅之下，以及存在着的反蘇危險之下，是有某種程度的共同利益的。這些成份中主要的力量是蘇聯，如果蘇聯同各個所謂民主國政府能够組成真正有效的統一戰線，配合着各國的人民統一戰線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够制止各個法西斯國家的進一步侵略，延緩大戰爆發的日子的；如果發生戰爭，是能够戰勝各個法西斯國家的。而如果這樣做，那是真正有利於世界人民，有益於侵略者以外的世界各國，而為國際無產階級所贊助的。因此，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締結了蘇法、蘇捷兩個互助條約，最後還進行了英法蘇三國的談判，這種革命政策，是適合於當時國際形勢的，是必要的，是正確的，是只能這樣做而不能有其他做法的。

七 英法蘇談判的破裂與戰爭第二階段的開始

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他們是一面怕法西斯國家侵害他們的利益，一面更怕革命勢力的發展。他們怕蘇聯，怕自己國家的人民解放運動，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因此，他們拒絕了蘇聯參加在內的真正反侵略的統一戰線與真正反侵略的戰爭，而自己單獨組成了反革命的統一戰線，單獨進行了掠奪的強盜戰爭。

英法蘇談判從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進行了四個多月，在蘇聯方面已經盡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終不贊成平等互惠的原則，只要求蘇聯保證他們的安全，而他們却不保證蘇聯的安全，不肯保證小波羅的海諸國，以便開一個缺口讓德國進兵，並且不讓蘇聯軍隊通過波蘭去反對侵略者。英法提議的這樣一種絲毫不適合於革命目的，而僅僅適合於反革命目的的條約，蘇聯當然不願意訂。而蘇聯願意訂立的，根據平等互惠原則，而真正有益於制止侵略者的發展，真正有益於世界和平事業的條約，英法却死也不願意訂。這就是英法蘇談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時間中，德國放棄了反蘇立場，他願意實際上放棄所謂『防共協定』，承認了蘇聯邊疆的不可侵犯，於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就訂立了。英法在與蘇聯談判中的毫無誠意，毫無真正制止侵略的誠意，決心破裂三國談判，不是證明別的，只是證明張伯倫已經決心作戰了。所以大戰的爆發，不但是希特勒要打的，而且是張伯倫要打的，因為如果真要避免戰爭，就一定要蘇聯參加才行。這一點，就是英國的路易喬治，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懂得的。可是一些傻子却至今不懂得，還以為張伯倫的作戰不是事先準備好了的。不懂得張伯倫之所以參加三國談判，僅僅是為着便於動員輿論，便於向民衆說：我們英法政府是仁至義盡了，三國聯合既不成功，就只好向德國開火了。

在這種情形下，九月初旬，德國與英法波三國之間的戰爭就爆發了，於是開始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新階段——第二階段。

八 戰爭第二階段的特点

在現時，在大戰爆發之後，情況已經根本改變了，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的劃分，已經失掉了意義。在現時，按照性質來劃分，只能是：（1）進行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之諸國家，以及實際贊助這種戰爭的諸國家，這是第一類。（2）進行正義的非掠奪的民族解放戰爭與人民解放戰爭，以及援助這種戰爭的國家，這是第二類。現在應從新的情況作新的劃分，拋棄過去的那種劃分法，因為情況已經變化了，各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最後的拒絕與人民妥協，拒絕與蘇聯妥協，並且舉行掠奪戰爭了。現在世界上最反動的國家，已經轉到英國方面，反蘇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經是張伯倫了。

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共產黨員應該懂得，爭取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同蘇聯，同各國人民，同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道，建立統一戰線的時期，已經過去，這種可能現在已經沒有了。而現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蘇聯，同所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戰爭反侵略的統一戰線。現在是少了一個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這一成份之由動搖而最後轉到敵人營壘，變成帝國主義戰爭兩個營壘中的一個營壘，乃是一大大變化。因而新的統一戰線之可能的組成部份，就由四個變為三個了。這種變化，第一、就使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由片面變為全面；第二、就使新的反戰爭反侵略的統一戰線之組織成份由複雜變為單純——這就是戰爭第二階段的兩個特點。

許多同志不去注意情況的變化，不去注意新事變的特點，以為事情還是和過去一樣，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過去階段，拿過去的觀點來看新的事變，遺棄了新事變中所包藏的性質上的變化，因而不自覺的陷入了完全錯誤的境地，陷入了社會民主黨的境地。我希望犯了這種錯誤的同志很快的改變過來，我也相信，只要一經提醒，就能改變過來。

九 我們在戰爭第二階段的革命政策

根據戰爭第二階段的特點，無產階級尤其是共產黨的革命政策，應該是怎樣呢？

我以為應該是下面這樣的：

（一）在各帝國主義交戰國，是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揭穿這種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不管是戰爭的甲方或乙方，把他們看做一樣的強盜，特別反對英國帝國主義這個強盜魁首，喚醒人民不要上帝國主義強盜的當，向人民宣傳變帝國主義戰爭為革命的國內戰爭，建立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民統一戰線。

在各個交戰國內，如果有共產黨議員的地方，都要對於戰爭預算投反對票，如像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德國無產階級的領袖李卜克內西同志在德國議會中所做的英勇堅決的鬭爭那樣，而決不應該投票擁護戰爭，決不應該使自己的面目同社會民主黨混同起來。因為這些國家內的社會民主黨，正在踏襲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的覆轍，在所謂『保衛祖國』（資產階級強盜集團的祖國）的口號之下，無恥地擁護戰爭。日本社會民主黨，即所謂社會大眾黨，早已叛賣了無產階級，擁護了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英法社會民主黨，現在又正在張伯倫、達拉第的威迫利誘之下，叛賣英法無產階級，擁護英法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波蘭社會民主黨則擁護被張伯倫收買的走狗——波蘭資產階級反動政府，叛賣波蘭的民族利益。在波蘭，毫無疑義，是應當動員全民並聯合蘇聯抵抗德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保衛波蘭與解放波蘭民族而戰。但是波蘭法西斯政府則壓制了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拒絕了蘇聯的援

助，甘願帶領波蘭人民充當英法財政資本的砲灰，甘願把波蘭變成國際財政資本反動戰線的一個組成部份。沒有問題，我們同情波蘭人民，但我們決不同情波蘭反動政府，波蘭社會民主黨擁護這樣的政府，同樣是不能容許的。因此，不論在德日意，不論在英法波，凡屬交戰國內的共產黨，只有揭露社會民主黨的這種叛賣性，才能爭取群眾，組織革命統一戰線，準備用革命戰爭打倒反革命戰爭。

(二)在各中立國內，如像在美國，共產黨員應當在人民面前，揭穿資產階級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就是說，名義上中立，實際上贊助戰爭，並圖在戰爭中大發其洋財的那種政策。美國帝國主義在兩年的中日戰爭中，在中立的假面具之下，已經發了一筆洋財，現在它又想在新的戰爭中大發其洋財。我在兩個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談話中，還以為美國資產階級暫時還不至於在國內放棄民主政治，與平時的經濟生活，那知它就在這短短的幾天之內，宣佈了所謂『局部緊急狀態』，這樣一來，它已經在步英法的後塵，一步一步的走向反動化與戰爭化了。共產黨必須反對這種實際上援助帝國主義戰爭的假中立，反對這些國家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對這些國家中的社會民主黨的叛賣行為，反對這些國家捲入戰爭，使戰爭區域不至無限制的擴大。

(三)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是民族統一戰線，或者抵抗侵略者（如在中國），或者反對宗主國（如在印度），用以達到民族獨立之目的。要反對這些國內的民族叛徒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為，才能發展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敵人。在各交戰國的殖民地內，必須反對民族叛徒們擁護宗主國戰爭的叛賣行為，反對動員殖民地人民參加宗主國的戰線，要把參加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痛苦經驗告訴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如果不反對民族叛徒，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希望的。

一〇 戰爭的前途

這次戰爭是持久的戰爭。我很贊同伏羅希洛夫同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他說：『現代的戰爭，將來一定是持久的，綿延不決的，消耗的戰爭。』他又說：『無疑問的，在必不可避免的可避免的總的軍事衝突中，要來一個破天荒的與你死我活的關頭。』他的估計是很對的。這種持久性，是包括帝國主義戰爭與反帝國主義戰爭，包括反革命戰爭與革命戰爭，包括戰爭的繼續與暫時的局部的停頓，包括參戰陣線的改組變化，參戰國家的滅亡與新建這樣種種情況在內的，這樣種種錯綜複雜曲折變化的情況，就組成了戰爭的持久性。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是人類空前的大災難，死亡、疾病、飢餓、失業、失學、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各種悲慘現象將充滿於全世界。在這種情形之下，毫無疑義的，將激起所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被壓迫人民，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組織革命戰爭，其規模將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要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除俄國外，各國都沒有共產黨。現在已經不同了，共產黨已經在幾十個國家內分佈着，並且在政治上組織上強健起來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已經不同了，蘇聯不但存在，而且成了世界上第一等的強國，它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堅決援助人民解放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的，它將在這個戰爭中起其維護人類利益干涉帝國主義的偉大作用。現在世界上已經分得清清楚楚，一切直接間接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資產階級都是反動派，組成反動營壘，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這個大反動營壘裏面兩派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戰爭。這個大反動營壘裏面兩

大反動派的衝突，並不妨礙他們將來會聯合起來反對蘇聯，反對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革命，如果以爲他們會永遠打下去，很容易的就被革命人民推翻，那是幼稚的見解。這是一方面——世界反動戰線方面。另一方面，則有蘇聯，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解放運動，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所有這些，組成革命的戰線，革命的營壘，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動營壘，用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戰爭禍首，推翻資產階級，把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從資本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從帝國主義戰爭中解放出來。這是一個偉大的鬭爭過程，艱難的持久作戰的過程，教育人民，喚醒人民，組織人民，並領導人民向資產階級戰鬥的過程。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走到盡頭了，大變化大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了。現在的時代就是戰爭與革命的新時代，把黑暗世界整個兒的改造爲光明世界的時代，我們是正處在這個時代中。

進行了兩年抗日戰爭的中華民族，是屬於世界革命營壘中的一個組成部份，一個重要的有力的組成部份。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定會在世界改造過程中起其偉大的作用。帝國主義戰爭對於世界對於中國都是不利的，但是蘇聯的存在與發展，全世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人民解放運動的存在與發展，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存在與發展，都是中國的好朋友，都是中國抗戰的可靠的援助者。中國、蘇聯、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應該組成堅固的統一戰線，這是革命的統一戰線，用以對抗反革命的統一戰線。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之間的互相削弱，在這一點上說來，對於各國人民解放運動，對於各國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中國的抗戰，對於蘇聯的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又是一個有利的條件。這樣說來，世界的黑暗是暫時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帝國主義一定會死滅下去，被壓迫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沒有疑義的。中國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只要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加鞏固起來，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

步，反對倒退的口號之下，努力奮鬥，我們的敵人也一定會死滅下去，一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就要出來了。

與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 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的談話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六時在延安——

（記者問） 有幾個問題請教。今天在新中華報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談話，有些問題已經說到了，有些尚請毛先生補充。問題分三部份，就是寫在紙上的，請逐一賜教。

（毛答） 可以根據先生們的問題表，分別來講。

我們先談抗戰問題。先生們提到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的問題。我以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的到來了。就是說，在國際新形勢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難與中國決不妥協的條件之下，可說已經到來了。這裏並不否認敵人還可能有比較大的戰役進攻，例如進攻北海、長沙，甚至進攻西安，都是有可能的。說敵人的大規模戰略進攻與我們的戰略退却在一定條件下基本上已經停止，並不是說一切進攻可能與一切退却可能都沒有了。至於新階段的具體內容，就是準備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這一概念之中。這就是說，中國要在相持階段中準備一切力量，以備將來之反攻。說準備反攻，並不是立即反

攻，條件不夠是不能反攻的。而且這講的是戰略的，不是戰役的。戰役上的部份的反攻，例如對付敵人在晉東南的軍事『掃蕩』，我們把它打退，這樣的戰役反攻不但會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戰略的大舉反攻時期，現在還沒有到，現在是對於這種大舉反攻作積極準備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還要包括打退正面敵人一些可能的戰役進攻。

如果把新階段的任務分別來講，那末，在敵人後方，一定要堅持游擊戰爭，粉碎敵人的『掃蕩』，破壞敵人的經濟侵略。在正面，一定要鞏固軍事防禦，打退敵人可能的戰役進攻。在大後方，主要的是積極改革政治。這許多，都是準備反攻的具體內容。

改革國內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敵人在這個階段，主要的是政治進攻，我們就要特別加強政治抵抗，這就是說，民主政治問題，應當快點解決，才能加強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準備軍事力量。中國抗戰主要的依靠自力更生，如果過去也講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

（記者問） 剛才毛先生說，爲了自力更生達到抗戰勝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現在的環境下，用什麼方法來實現這個制度？

（毛答） 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的劃分，原是孫中山先生說的。但孫先生在最後一年的北上宣言裏，就沒有講三個時期了，那裏講到中國要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可見孫先生的學說，在他自己，早就依據情勢，有了變動。現在在抗戰這種嚴重局面下，要真正避免亡國慘禍，並把敵人打出去，必須快些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民主政治。關於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有些人說：老百姓沒有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在抗戰中間，老百姓進步甚快，加上有領導，有方針，一定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例如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雖然還沒有做得徹底。在那裏，區長、鄉長、

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士紳和有爲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了。這樣的問題，應該提出讓大家討論。

先生們提出的第二部份問題裏，有關於所謂『防制異黨』的問題，就是說，關於各地磨擦的問題，先生們關心這件事是很對的。關於這件事，近來雖然比較好一點，但根本上沒有什麼變化。

（記者問）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過沒有？

（毛答）我們已經提出抗議。

（記者問）用什麼方式提出的？

（毛答）還在七月間，我們黨的代表周恩來同志，已經寫信給蔣委員長。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電報給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要求取消那個秘密流行成爲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謂『防制異黨辦法』。

（記者問）中央政府有無答覆？

（毛答）沒有正式答覆。但聽說這個東西蔣委員長並沒有最後批准，國民黨裏面也有很多人不贊成這種『辦法』。你們知道，共同抗日的軍隊叫做友軍，不叫做『異軍』，那末，共同抗日的黨派也是友黨，而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大家同是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防制』。什麼是異黨？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黨是異黨，因爲它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樣的黨，就應該防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與建設民主共和國。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與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口號只能是這樣提。現在汪精衛有三個口號：反蔣、反共、親日。這是國共兩黨與全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共產黨不是國民黨的敵人，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的敵人，不應該互相

反對，互相『勒制』，而應該互相團結，互相協助。我們的口號一定要同汪精衛有區別，一定要同汪精衛的口號對立起來，而決不能與他相混同。他要反蔣，我們就要擁蔣；他要反共，我們要聯共；他要親日，我們就要抗日。過去國人是這樣做，現在還是要這樣做，將來還是要這樣做。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許多人的文章上常常引用一句古話，這句話還是出於東漢時候，那時漢光武的大將軍朱浮寫了一封信給漁陽太守彭寵，信的上面說：『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仇者所快。』這句話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政治原則，我們千萬不可忘記。

先生們的問題表中還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磨擦的態度。我可以率直的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國古聖人說的『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以禮待人——這就是我們的態度。但我們是站在嚴格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這種事實，大家可以看得到的，用不着我來多講了。

（記者問）華北的磨擦問題怎樣？

（毛答）那裏的張蔭梧、秦啓榮，是兩位磨擦專家。張蔭梧在河北，秦啓榮在山東，簡直是無法無天，同漢奸行爲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有許多鐵的證據，如像張蔭梧給其部下進攻八路軍的命令等，我們已送給蔣委員長了。

（記者問）新四軍方面有無磨擦？

（毛答）也是有的，平江慘案就是驚動全國的大事件。

（記者問）有些人說：統一戰線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統一，邊區政府就應該取消，關於這，先生

以爲如何？

（毛答）各種胡言亂語到處都有，如所謂取消邊區，即是一例。陝甘寧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全國政治上最進步的區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況邊區是蔣委員長早已承認了的，國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過了。中國確實需要統一，但是應該統一於抗戰，統一於團結，統一於進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統一，那中國就會亡國。

（記者問）由於對於統一的了解不同，國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毛答）如果只說到可能性的話，那末團結與分裂兩種可能性都有，看國共兩黨的態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國人民的態度如何來決定。我們共產黨方面，關於合作的方針，早經講過，我們不但希望長期合作，而且努力爭取這種合作。聽說蔣委員長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中也說過，國內問題不能用武力來解決。大敵當前，國共兩黨又都有了過去的經驗，大家一定要長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要給長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證，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徹底避免，這就是堅持抗戰到底與實行民主政治。如果能這樣做，那末，就能繼續團結而避免分裂，這是要靠兩黨與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這樣努力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就是我們黨在今年的『七七宣言』裏提出來的三大政治口號，我們認爲只有這樣做，中國才能避免亡國，而把敵人打出去，除此是沒有第二條路走的。

蘇聯利益與人類利益的一致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八日——

當蘇聯革命二十二週年紀念的時候，中蘇文化協會要我做一篇文章，我想根據我的觀察，說明幾個同蘇聯及中國有關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在中國廣大人民中間議論着，而首先是在各抗日黨派中、抗日軍人中、青年學生中、新聞記者中、文化界中議論着，而似乎還沒有得到確定的結論。我想趁此時機，對這些問題提出一點意見，貢獻給關心歐洲大戰與中蘇關係的人們，作為他們的參考，或者不是無益的。

第一個問題 蘇聯對於制止第二次帝國主義

世界大戰的問題

455

有些人說，蘇聯利於爆發世界大戰，而不要世界和平的繼續，這次大戰的爆發是由於蘇聯不同英法訂立互助條約而同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所促成。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正確的。因為在過去很

長的時期中，蘇聯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這種和平政策就是以蘇聯的利益與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聯系着的。在過去，蘇聯不但爲了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需要和平，需要鞏固蘇聯與世界各國間的和平關係，不使發生反蘇戰爭；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謂民主國家挑撥戰爭的行爲，需要盡量延緩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爆發，以爭取世界範圍內的和平。我們看，多年以來，蘇聯對於世界的和平事業，是盡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國際聯盟，同法國同捷克都訂立了互助協定，竭力想同英國想同一切願意和平的國家訂立保障安全的條約，就是明證。當德、意聯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採取名義上是不干涉政策實際上是不妨礙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時候，蘇聯就積極援助西班牙政府軍反抗德、意，積極反對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當日本侵略中國而英、美、法採取同樣不干涉政策的時候，蘇聯就不但同中國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而且積極援助了中國的抗戰。當英、法兩國犧牲奧國與捷克縱容希特勒侵略的時候，蘇聯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的黑幕，向英、法提議制止侵略的進一步發展。當今年春夏波蘭問題緊張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不管張伯倫、達拉第的如何沒有誠意，蘇聯還是同英、法進行了四個多月的談判，企圖訂立一個英法蘇互助條約，制止大戰的爆發。而無如這一切，都被英、法資產階級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縱容戰爭、挑撥戰爭、擴大戰爭的政策所障礙，而世界和平事業就遭受了最後的挫折，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英、美、法各國資產階級政府，並無誠意制止大戰的爆發，相反，它們是促成了大戰的爆發。因爲它們，只是因爲它們，拒絕同蘇聯妥協，拒絕同蘇聯訂立真正有效的放在平等互惠原則之上的互助條約，這就證明它們只願意戰爭，不願意和平。因爲誰也知道，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拒絕了蘇聯，就是拒絕了和平。這一點，就是英國的路易喬治，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知道的。在這種狀態下，在這個時期中，德國願意放棄反蘇立場，放棄防共協定，承認蘇聯邊疆的不可侵犯，於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就

訂立了。英、美、法一心一意推動德國進攻蘇聯，以便他們坐山觀虎鬪，讓蘇、德兩大民族打得精疲力竭之後，它們就準備出來收拾蘇、德，放在它們的節制之下，這種世界性的絕大陰謀，是被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所擊破了。國人不去注意此種世界性的陰謀，不去注意英國帝國主義的縱容戰爭、挑撥戰爭與促進世界大戰爆發的陰謀，實在是上了這些陰謀家甜蜜宣傳的當。這些陰謀家，在西班牙問題上，在中國問題上，在奧、捷問題上，不但並無絲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是相反的，縱容侵略，挑撥戰爭，使人家作鵝蚌，而自己作漁人，美其名曰不干涉政策，其實則是『坐山觀虎鬪』的政策。世上多少人被張伯倫及其夥伴的甜蜜演說所蒙蔽，而不知道他們笑裏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張伯倫、達拉第決心拒絕蘇聯，決心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之時，才訂立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現在應該覺悟過來。而在蘇聯方面，則是相反的對照。蘇聯不但需要自己的和平，而且需要世界的和平，不但需要制止法西斯國家侵略自己與侵略弱小民族，而且需要制止世界大戰的爆發，制止各個所謂民主國家挑撥戰爭的行爲，至少是延緩大戰爆發的時間。大戰之不幸爆發，完全是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蘇聯與全世界人民共同維持和平事業的努力加以拒絕加以破壞的結果。蘇聯這樣維持世界和平到最後的一刻，這就是蘇聯的利益與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現。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蘇聯對於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

採取何種態度的問題

有些人說：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既然爆發了，蘇聯或者會參加戰爭的一方，就是說，蘇聯紅

軍似乎即將參加德國帝國主義的戰線。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正確的。現在爆發的戰爭，無論在英法方面，或德國方面，都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世界各國的人民，都應該起來反對這種戰爭，都應該揭穿雙方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僅僅有害於世界人民而絲毫不利於世界人民的性質，揭穿社會民主黨擁護帝國主義戰爭背叛無產階級利益的罪惡行爲。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共產黨當權的國家，它對於戰爭的態度必然是鮮明的兩種態度：（1）堅決不參加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對於戰爭的雙方，保守中立，因此，蘇聯紅軍決不會無原則的參加帝國主義戰線。（2）積極援助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國的北伐戰爭，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戰爭，兩年以來，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幾個月以來，援助外蒙的抗日戰爭，以及還必然會援助將來其他國家其他民族中間可能發生的人民解放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還必然會援助有利於保衛蘇聯的戰爭。關於這一點，蘇聯過去二十二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今後的歷史也將繼續證明。有些人把蘇聯根據蘇德商務協定同德國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蘇聯參加德國戰線的行動，這種意見也是不正確的，這是把通商與參戰混爲一談的緣故。不但不能把通商與參戰混爲一談，也不能把通商與援助混爲一談。例如在西班牙戰爭中，蘇聯是同德、意兩國通商的，但世人不說蘇聯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說蘇聯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這是因爲蘇聯確實援助了西班牙的緣故。又如在中日戰爭中，蘇聯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說蘇聯援助日本侵略中國，而說它援助中國反抗日本的侵略，這是因爲蘇聯確實援助了中國的緣故。現在世界大戰的雙方都與蘇聯有通商關係，這種事實，對於雙方都說不到援助，更說不到參戰。除非戰爭的性質有了變化，某一國或某幾國的戰爭經過一定的必要的變化之後，對於蘇聯與世界人民有利的時候，那時才有援助或參戰的可能。否則是沒有這種可能的。至於依據交戰各國對蘇聯的態度是親蘇或反蘇的分別，使蘇聯對它們的

通商不得不多有少，有厚有薄，這是各交戰國自己態度的問題，不是蘇聯的問題。但即使某一國家或某些國家採取了反蘇態度，只要它們還願維持外交關係，訂立通商條約，而不向蘇聯宣戰。例如八月二十二日以前的德國那樣，蘇聯也不會同它們斷絕通商關係的。這種通商關係，不是援助，更不是參戰，這是應該認識清楚的。當然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應該估計到一件可能發生的事實，這就是現在世界形勢正在變化，張伯倫正在企圖組織一個先打敗德國後進攻蘇聯甚或同時進攻的世界反動統一戰線，假如這個反動戰線真正組織成功並實行以蘇聯為敵的話，那時，蘇聯同德國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德國戰爭的性質就變成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那時，蘇聯就有和德國立於同一戰線的可能，就發生援助或參戰的問題。但不到這種時候，是不能這樣提出問題的。這也就是蘇聯的利益與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現，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蘇聯進兵波蘭的問題

國內許多的人，對於這個複雜的問題，弄糊塗了。由於問題的複雜性，使人們的思想弄糊塗了。波蘭問題，應該分為德國方面，英、法方面，波蘭政府方面，波蘭人民方面與蘇聯方面幾個方面來看。在德國方面，它是為了掠奪波蘭人民而進行戰爭的，是爲了擊破英、法帝國主義戰線的一翼而進行戰爭的。這種戰爭的性質，是帝國主義的，是不能同情的，是應當反對的，這是第一。在英、法方面，是把波蘭作為英、法財政資本掠奪的對象之一，是爲了在世界範圍內拒絕德國帝國主義重分他們的贓物而去利用波蘭的，是把波蘭當做自己帝國主義戰線的一翼來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戰爭是帝國的

主義戰爭，英、法所謂援助波蘭不過是同德國爭奪對波蘭的統治權，同樣是不能同情的，是應當反對的，這是第二。在波蘭政府方面，它是一個法西斯政府，是波蘭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它在一千餘萬人口的波蘭民族中，殘酷的剝削工農、壓迫波蘭的民主主義者。它又是大波蘭主義者，因為它在波蘭民族以外的許多少數民族中，即在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一千餘萬人口的非波蘭民族中，施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它本身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在這次戰爭中，波蘭反動政府甘願率領波蘭人民充當英、法財政資本的炮灰，甘願充當國際財政資本反動戰線的一個組成部份。二十年來，波蘭政府一貫的反對蘇聯，在英、法、蘇談判中，堅決拒絕蘇聯軍隊的援助。而這個政府又是一個十分無能的政府，僅僅兩個星期之內，就把波蘭葬送給德國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大軍，不堪一擊，使波蘭人民遭受德國帝國主義的蹂躪。所有這一切，都是波蘭政府的滔天罪惡所造成的，如果我們同情這樣的政府，那是不對的，這是第三。在波蘭人民方面，他們是犧牲者，他們應該起來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壓迫，反對自己的反動資產階級，建立獨立自由的波蘭民主國家。毫無疑義的，我們的同情，應該寄在波蘭人民方面，這是第四。在蘇聯方面，則是完全的正義戰爭。目前擺在蘇聯面前的問題有下面的兩個。第一個問題是：還是讓整個波蘭放在德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面呢？還是讓東部波蘭少數民族得到解放呢？在這個問題上，蘇聯選擇了第二條路。在那白俄羅斯民族與烏克蘭民族居住的一大塊土地，還是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條約』的時候，就被當時的德國帝國主義從幼年的蘇聯手裏強迫割去，而後來又被凡爾賽條約強迫放到波蘭反動政府的統治下面的。蘇聯現在不過是把過去失掉的土地收回來，把被壓迫的白俄羅斯民族與烏克蘭民族解放出來，並使免受德國的壓迫。這幾天的電訊，指明這些少數民族是怎樣的箝食壺漿以迎紅軍，把紅軍看做他們的救星。而在德軍佔領的西部波蘭地方，法軍佔領的西部德國地方，則絲毫也沒有這種消息。這就

是表明，蘇聯的戰爭是正義的、非掠奪的、謀解放的戰爭，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戰爭。而德國的戰爭，英、法的戰爭，則都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壓迫他國民族、壓迫他國人民的戰爭。除此以外，在蘇聯面前，還有第二個問題，這就是張伯倫企圖繼續他的老政策。即是，一方面大舉封鎖德國的西面，壓迫德國的西部；一方面企圖聯合美國，收買意大利；收買日本，收買北歐各國，使它們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國；再一方面，則拿波蘭，甚至還準備拿匈牙利，拿羅馬尼亞，作為禮物，以引誘德國。總之用威迫利誘種種辦法，推動德國放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使之倒轉槍口，進攻蘇聯。這種陰謀，不但現在是存在着，而且將來也還會繼續的。蘇聯大軍之進入波蘭東部，是爲了收復自己國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時也是爲了鞏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擊破張伯倫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從這幾天的消息看來，蘇聯的這一方針，是極大的成功了。這就是蘇聯的利益與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與波蘭反動統治下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體表現。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蘇聯援助中國的問題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之後，大大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加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投降派。中國人民，對於這個協定表示歡迎，是很正確的。但當諾蒙漢停戰協定訂立之後，英美通訊社紛傳日蘇互不侵犯協定行將訂立的消息，中國人民中間就發生一種憂慮，有些人就認為蘇聯或將不援助中國了。這種觀察，我以爲是不正確的。諾蒙漢停戰協定的性質，同過去張高峯停戰協定是一樣

的，就是說，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軍閥承認了蘇蒙邊疆的不可侵犯，這種停戰協定，將使蘇聯增加對於中國援助的可能，而不是減少其援助。至於所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在過去多年之前，是蘇聯要求日本簽訂，而日本始終拒絕。現在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一派，要求蘇聯訂立這種條約，而蘇聯是否願意訂立，須看這個條約是否合乎蘇聯利益與世界人類大多數利益互相一致這一個基本原則而定，具體的說，就是要看這個條約是否不與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相衝突。據我看，根據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根據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蘇聯最高議會上的外交演說，蘇聯是不會變更這個基本原則的。即使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有訂立的可能，蘇聯也決不會在條約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國的行動。蘇聯的利益與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決不會互相衝突，而將是永久互相一致，這一點，我認為絕對沒有疑義。那些有反蘇成見的人，借着諾蒙漢停戰協定的訂立與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傳聞，掀風鼓浪，挑撥中蘇兩大民族間的感情。這種情形，在英、美、法的陰謀家中，在中國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這是一種嚴重的危險，應該澈底揭穿他們的黑幕。中國的外交政策，很明顯的，應該是抗戰的外交政策。這個政策以自立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棄一切可能爭取的外援。而所謂外援，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的情況之下，主要的是在下列的三方面：（一）社會主義的蘇聯；（二）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人民；（三）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只有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所謂外援，即使還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份的與暫時的。當然，這些部份的暫時的外援，也是應該爭取的，但決不能過於依賴，不能看作可靠的援助。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交戰各國，中國應該嚴守中立，不參加任何的一方，那種主張中國應該參加英、法帝國主義戰線的意見，乃是投降派的意見，不利於抗戰，不利於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意見，是應該根本拒絕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第四個問題。

上面的四個問題，是當前國人議論紛紛的問題，國人注意國際問題的研究，注意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戰的關係，注意蘇聯與中國的關係，而其目的是爲了中國抗戰的勝利，這是很好的現象。我現在提出我對於上述各問題的一些基本觀點，是否有當，希望讀者不吝指教，抗戰幸甚，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幸甚。

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衆討汪擁蔣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們延安各界今天在這裏開大會，爲了什麼呢？爲了討汪擁蔣，爲了抗日救國。近來汪精衛同日本訂了條約，把中國賣完了。我們抗日兩年半，打出一個局面來了，敵人就發瘋，勾出汪精衛來賣國。現在的形勢有許多不同了，現在也有了許多新任務，我今天就要講一講這些事情。今天天氣這樣冷，到的人這樣多。我們大家不怕冷，我們要講明白許多事情。

一 日本要把中國變爲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汪精衛跪倒於日本之前

我們共產黨屢次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滅華方針是堅決的，不管日本調換什麼內閣，它的消滅中國獨立把中國變爲殖民地的基本方針是決不會變更的，因爲它如果變更了，日本軍閥資本家政權就要

倒台。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衛，看了這種情形，嚇得發瘋，雙膝跪倒於日本老爺之前，訂立了日汪賣國條約，把中國全部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他還要成立傀儡政府，以與抗日政府相對立。還要成立傀儡軍隊，以與抗日軍隊相對立。他還有一個傀儡國民黨，以與抗日的國民黨相對立。他的政策是親日反蔣反共三大綱領。親日就是跪倒於日本老爺之前，把中國人從頭髮到腳板皮都送給日本大老爺。反蔣近來不大提了，據說改爲『聯蔣』，想拖蔣先生下水。但是蔣先生看得明白，他知道這不過是日本的鬼計，要把抗日戰爭停止，要把國民黨分裂，要把蔣先生打倒。蔣先生是聰明人，他知道這些的。他從前就痛駁了近衛聲明，現在又痛駁了日汪協定，並且號召民衆同日本打到底，勸那些懷抱和平幻想的人趕快回頭。至於反共，那更是日本老爺同汪精衛小子的鬼計中之鬼計。他們知道在中國境內共產黨是抗日最徹底的，而國共合作則是抗日的條件，他們就用全力來分裂國共合作，使兩黨各自孤立起來，並最好是兩黨打起來。於是他們就利用國民黨內部一小部份頑固派，到處放火，在湖南就鬧平江慘案，在河南就鬧確山慘案，在山西就鬧舊軍打新軍，在河北就鬧張蔭梧打八路軍，在山東就鬧秦啓榮打游擊隊，在鄂東就鬧程汝懷殺死六百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就鬧內部的『點線工作』，外部的『封鎖工作』，並且還鬧軍事進攻。此外還會製造千百件情報去蒙蔽蔣先生，逮捕一大批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又僱請玄學鬼張君勱等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僱請託洛茨基派的葉青等做文章大罵共產黨。等等貨色，無非是要破裂統一抗戰的局面，使中國人都當亡國奴。所有這一切，一句話歸總，都是日本人同中國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準備投降派滅亡中國的鬼計。我們今天開大會，就是要反對這個鬼計。就是要揭穿這個鬼計。我們這個會，名曰討汪擁蔣大會，就可知我們的方向是什麼，我們的方向不是別的，就是反對汪精衛賣國投降，擁護蔣先生抗日到底。

二 力爭時局好轉反對悲觀失望

現在我還要多說一點時局的事情。大家明瞭，汪精衛的賣國同頑固派的猖獗，他們兩家裏應外合，把時局鬧得烏烟瘴氣了。國內許多的人，看了這種情形，也就頭腦糊塗起來，以為時局只會逆轉下去，沒有好轉的前途了。這種想法，我以為是完全不對的。我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歷來就指出，亡國同復興，逆轉同好轉，雖然兩種前途同時存在，兩種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國內的條件同國際的條件，則是決定了中國能够復興，時局能够好轉，並不是嗚呼哀哉，再加一團糟的。我在前年六月寫過一本小書，名字叫做『論持久戰』，前年十一月又寫過一本小書，名字叫做『論新階段』，都曾堅決的反對了亡國論同速勝論。關於國民黨，我也堅決的說過，它的多數人是有光明前途的，只有一部份人有黑暗的前途。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中央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些意見，並且是全國大多數人的意見，不是共產黨一黨的意見，只要看全國多數人都歡迎共產黨的主張，就會知道的。但是並不是人人都贊成我們的意見，有些不明大勢的人，他們是不贊成的。當我們出那兩本書的時候，就很有些人懷疑我們這種意見。到了現在也還有許多人懷疑我們的意見。特別因為國民黨頑固派到處挑釁，大鬧什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對於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等等怪事，加上國內和平空氣到處醞釀，就把很多人弄糊塗了。他們不曉得分別少數人同多數人，他們不曉得對付少數壞蛋同對付多數抗日份子應取不同的政策。沒有問題，對於那些喪盡天良的壞蛋，對於那些敢向八路軍新四軍陣線後面打槍的人，對於那些鬧平江慘案、確山慘案的人，對於那些敢於破壞

邊區的人，對於那些敢於攻打進步軍隊進步團體進步人員的人，我們是決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還擊的，是決不能讓步的，否則團結就會破裂，抗日就會失敗，中國就會亡國。因為這類壞蛋，已經喪盡天良，當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時，他們還要開磨擦，鬧慘案，鬧分裂，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是幫助了敵人同汪精衛，實際上是叛變團結抗戰的國策，實際上是做了漢奸的好朋友，或者有些人本來就是暗藏的漢奸。對於這些人，如果不加以懲罰，如果不將敢於進攻抗日進步力量的人加以必要的打擊，那我們就是犯罪惡，就是縱容漢奸國賊，就是不忠實於民族抗戰，就是不忠實於祖國，就是不堅決維護統一戰線，就是放任壞蛋來破裂統一戰線，就是違背黨的政策。但是這種給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以打擊的政策，全是爲了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全是爲了保護抗日統一戰線。因此我們對於那大多數忠心抗日的人，對於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派、非頑固派的人們，對於大多數的國民黨員，是始終表示好意的，是極力團結他們的，是極力尊重他們的，是願意同他們長期合作以便一道兒把國家弄好的。誰人如果不這樣做，誰就不是堅決保護抗日統一戰線，誰就是違背了黨的政策。

這就是我們黨的兩大政策。一方面團結進步勢力，團結一切忠心抗日的人，這是一條政策。一方面反對一切喪盡天良的壞蛋，反對那些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這是一條政策。我們黨的這種政策爲了達到一個目的，這就是力爭時局好轉，以便打勝日本，而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

爲什麼爭取時局好轉以便打勝日本的目的能夠達到呢？我們有許多國內國際的條件。那些條件呢？第一是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存在，誰要造反，誰要投降，我們是首先不答應的，是一定同他奮鬥到底的。第二是國民黨的大多數人，他們也反對降日，主張抗戰，贊同團結與進步。國民黨中除了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便都是這種人。第三是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的抗日進步份子，他們也反對投降

分裂同倒退。以上三項都是國內的條件。第四是日本的滅華方針非常之硬。日本軍閥資本家在中國人民面前擺下了兩條路，叫我們從中揀選一條。這兩條路就是或者亡國，或者解放。此外沒有中間的路。第五是英、美、法同日本之間的矛盾，現在還依然無法解決。歐洲大戰打起來了以後，情形有很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削弱了英法在遠東的地位，因此要想很快召集遠東慕尼黑會議是辦不到的。這一點不免使某些人大失所望。有些人去年上半年還在提倡什麼用九國公約會議解決中國問題，歐戰一起他們也只好改變論調，主張中國問題只能同歐戰一起解決了。美國現在還是坐山觀虎鬪，它還要使日本同中國打一打。現在就開太平洋會議，日本既不來，美國也不願。美國雖然廢止了同日本的通商條約，但是生意還是要做的，即是說供給日本以戰爭資源，讓它好打仗。同時它也還有可能接濟中國一點小小的東西，讓中國好打仗。美國資本家的計劃，我看他們是準備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出來干涉，勒令日本吐出一部份贓物，在『門戶開放』口號之下，同日本均分贓物。因為美國認為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或明年下半年，日本的經濟力就不能支持了。美國資本家的這種如意算盤，同中國歐美派大資產階級（他們同親日派大資產階級有區別）的如意算盤是一致的，他們兩家唱雙簧。所以和平妥協的危險並未消滅，和平的調子現在不過是暫時停唱，將來還是要舊調重彈的。但是，就現在說來，英、美、法同日本之間仍有相當嚴重的矛盾，這也是中國時局可能好轉的一個條件。第六是蘇聯的強大同它的積極援華方針。這是人人明白了的，誰要撇開蘇聯去偷偷摸摸解決歐洲問題，固然是不行，誰要撇開蘇聯去偷偷摸摸解決遠東問題，也是不行的。那些中外妄想家儘管在想撇開蘇聯，甚至準備開什麼反蘇把戲，但這只不過是妄想而已，這也是中國時局可能好轉的一個重要條件。總起來說，國內的三個條件，共產黨國民黨與人民的堅持抗日，國際的三個條件，日本的强硬，英、美、法的情況與蘇聯的援華，這樣許多條件，就使時局有走向好轉的趨勢。我們共產黨與

全國人民的任務，就在於集中一切抗日進步勢力，抵抗一切投降倒退勢力，力爭時局好轉，挽救時局逆轉。這就是我們的根本方針。由此看來，悲觀失望有什麼根據呢？明明白白是沒有根據的。我們決不悲觀失望，我們是樂觀的。我們不怕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我們一定要粉碎他們，我們也一定能够粉碎他們。中華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國決不會亡國。中國的進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暫時的現象。

三 強調團結進步趕跑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今天開會還要向全黨全國表明一種態度，這就是在抗日第一下面，我們要高呼團結也是第一，進步也是第一。有些人強調了抗戰，但不願意強調團結與進步，甚至完全不提團結與進步，這是很不對的。沒有真正的堅強的團結，沒有迅速的、切實的進步，怎能堅持抗日？怎能打倒汪精衛？怎能趕跑日本帝國主義？只是夢想，斷乎不能的。國民黨頑固派（我說的是頑固派）強調統一，但是他們的所謂『統一』乃是一種假統一，不是真統一。乃是一種不合理的統一，不是合理的統一。乃是形式主義的統一，不是實際的統一。爲什麼呢？他們高喚統一，却原來是要取消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同邊區，說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同邊區存在，中國就不統一，他們要把全國一切都化爲國民黨，不但繼續其一黨專政制度，而且還要擴大其一黨專政制度。但是，如果這樣，那還有什麼統一呢？老實說，過去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同邊區真心實意的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今天如果沒

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同邊區真心實意的出來維持抗日大局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傾向，那就會弄得一團糟。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同四十個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却只領到七十三萬塊錢餉。八路軍是六十萬塊錢，新四軍是十三萬塊錢，合共七十三萬塊錢，票子跌價，打個二折半，每人每月不上一塊錢，爲什麼要取消他們呢？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裏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爲什麼要取消它呢？不要臉的人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同志們，不是這樣的，不是取消邊區，而是全國要學邊區；不是取消八路軍、新四軍，而是全國要學八路軍、新四軍；不是取消共產黨，而是全國要學共產黨；不是要進步的向落後的看齊，而是要落後的向進步的看齊。我們共產黨是最主張統一的人，我們發起了統一戰線，我們堅持了統一戰線，我們提出了統一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誰人能够提出這些呢？誰人能够實行這些呢？誰人能够只要五塊錢薪水呢？誰人能够創造這樣的廉潔政治呢？統一統一，投降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於投降；反共派頑固派有一套統一論，要我們統一於分裂，統一於倒退。我們能够信這些道理麼？不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統一，算得真統一麼？算得合理的統一麼？算得實際的統一麼？真是做夢！我們今天開大會，就是要提出我們的統一論。我們的統一論，就是全國人民的統一論，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統一論。這種統一論是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只有進步才能團結，只有團結才能抗戰，只有進步團結抗戰才能統一。這就是我們的統一論，這就是真統一論，這就是合理的統一論，這就是實際的統一論。那種假統一論，不合理的統一論，形式主義的統一論，乃是亡國滅種的統一論，乃是喪盡天良的統一論。他們要把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邊區消滅，要把一切地方抗

日力量消滅，以便統一於一黨一派。這是一種陰謀，這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一黨專制的狗肉，死皮賴臉，亂吹一頓，真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我們今天開大會，就要戳破他們的紙老虎，我們要堅決反對頑固派。

四 共產黨的十大任務

我們要堅決反對頑固派，我們要堅決團結進步派，我們要用這兩方面的政策去達到爭取時局好轉打勝日本強盜的總目的。爲了這個，我們就要做許多工作。不久幾天，共產黨中央開了一個會決定了爭取時局好轉的十大任務，那十大任務呢？我現在向同志們宣讀一下共產黨中央的決議案：

『爲了力爭時局好轉，克服逆轉危險，必須強調抗戰、團結、進步三者不可缺一。並在這個基礎之上堅決執行下列的十大任務：

第一便要普遍擴大反汪反漢奸的宣傳，堅決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陰謀，從思想上政治上打擊投降派與反共派。堅決明確與具體地證明反共是投降派準備投降的反革命步驟。

第二便要猛力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組織進步勢力，同國民黨的大多數親密地合作，用以對抗投降派與反共派。

第三便要廣泛開展憲政運動，力爭民主政治。沒有民主政治，抗日勝利只是幻想。

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勢力的進攻，對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均須在自衛原則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下堅決反抗之，否則任其猖獗，統一戰

線就會破裂，抗日戰爭就要失敗。

第五便要大大發展抗日的民衆運動，團結一切抗日的知識份子，並使知識份子與抗日民衆運動、抗日游擊戰爭相結合，否則就沒有力量打擊投降派、反共派與頑固派。

第六便要認真實行減租、減息、減稅與改良工人生活，給民衆以經濟上的援助，才能發動民衆的抗日積極性，否則是不可能的。

第七便要鞏固與擴大各個抗日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上建設完全民選的沒有任何投降反共份子參加的抗日民主政權。這種政權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權，而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的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民主專政。對一切破壞抗日根據地的陰謀，必須加以堅決的打擊。對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裝抗日政權抗日團體中的漢奸反共份子，必須加以肅清。

第八便要鞏固與擴大進步的軍隊，沒有這種軍隊，中國就會亡國。

第九便要廣泛發展抗日的文化運動，提高抗日人民抗日軍隊與抗日幹部的文化水平與理論水平。沒有抗日文化戰線上的鬭爭以與總的抗日鬭爭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勝利的。

第十便要鞏固共產黨的組織，在無黨和黨弱的地方要發展黨的組織。沒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就不能解決抗日救國的任何重要問題。

如果能堅決的並具體正確的執行上述十大任務，就一定能够強固抗日進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爭取時局好轉，避免時局逆轉，擊破大資產階級份子破壞抗戰與破壞統一戰線的陰謀。』同志們，這就是共產黨中央最近決定的十大任務，你們覺得這十大任務好不好呢？這是對症下藥的十大任務，這是起死回生的十大任務，這是趕跑日本帝國主義的十大任務。這是共產黨決定的十大任務，但是做起來就不能單是共產黨做，還要全國人民做。這不是共產黨一黨的事，這是全國人民

的事。這是一切有良心想救國的人們的事。當然，這個十大任務，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歡喜的，汪精衛是不歡喜的，反共派、頑固派是不歡喜的，他們不歡喜是應該的，我們沒有必要討他們的歡喜，他們不歡喜也就罷了。我們今天開大會，我們要向全國人民各黨各派叫出我們的吼聲，我們要挽救危難中的祖國，我們要創造一個新中國，我們要趕跑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打倒汪精衛，我們要打倒那批反共的『英雄』們，我們要高呼下列的口號：

擁護抗戰到底的國策，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擁護蔣委員長，打倒漢奸汪精衛；

擁護國民政府，打倒汪精衛的偽中央；

擁護國共合作，打倒汪精衛的反共政策，

反共就是汪精衛分裂統一戰線的陰謀，打倒一切反共的漢奸；

加緊全國團結，消滅內部磨擦；

革新內政，開展憲政運動，樹立民主政治，

開放黨禁，允許抗日黨派的合法存在權，

人民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權，

發展民衆運動，實行減租、減息、減稅、改良工人生活；

鞏固抗日根據地，反對漢奸反共派與頑固派的陰謀破壞；

擁護抗日有功的軍隊，充分接濟前線；

發展抗戰文化，保護進步青年，取締漢奸言論；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的報告提綱——

(一) 目前的政治形勢是：(1) 日本帝國主義受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嚴重打擊，已經無力再作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已使敵我形勢處在戰略相持階段中；但仍然堅持其滅亡中國的基本政策，並用破壞抗日統一戰綫、加緊敵後掃蕩、加緊經濟侵略等方法，實行這種基本政策。(2) 英法因歐戰削弱了它們在東方的地位，美國則繼續採取坐山觀虎鬪的政策，因而使東方慕尼黑會議，暫時無召集的可能。(3) 蘇聯的對外政策取得了新的極大勝利，對中國抗戰依然取積極援助政策。(4) 親日派大資產階級早已徹底投降日本，準備傀儡登場。歐美派大資產階級則尚能繼續抗日，但其妥協傾向依然嚴重存在，他們採取兩面政策，一面還要團結各派勢力對付日本；一面却極力摧殘各派勢力，尤其盡力摧殘共產黨與進步勢力，他們是抗日統一戰綫中的頑固派。(5) 中間力量，包括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與地方實力派，因為他們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有矛盾，同時與工農階級亦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進步勢力與頑固勢力之間的中間立場。他們是抗日統一戰綫中的中間派。(6) 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

主政權的根據地，他們在全國工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中的影響是很大的，在中間勢力中亦有相當影響，在抗日戰場上，共產黨抗擊日本的力量，同國民黨比較起來，幾乎佔到了同等的地位。他們是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進步派。

以上就是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在這種形勢下，爭取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中央二月一日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二) 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與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鬭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鬭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鬭爭的目的，以鬭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還多，他們或者認為鬭爭會破裂統一戰線，或者認為鬭爭可以無限制的使用，或者對於中間勢力採取不正確的策略，或者對頑固勢力有錯誤的認識，這些都是必須糾正的。

(三) 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的民衆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份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只有一步一步的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逆轉，阻止投降與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但是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鬭爭過程，不但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作殘酷的鬭爭，而且須同頑固派作殘酷的鬭爭。因為對於發展進步勢力，頑固派是反對的，中間派是懷疑的，如不同頑固派作堅決的鬭爭，並收到確實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頑固派的壓迫，也不能消釋中間派的懷疑，進步勢力就無從發展。

(四)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這是不同的三部份人，但都是目前時局中的中間派。中產階級是指的中等資產階級，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左翼。他們雖然同工人有階級矛盾，不贊成工人的獨立性；但他們在淪陷區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國民黨統治下則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因此他們還要抗日，並要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抗日問題上，他們贊成團結抗戰。在爭取政治權力問題上，他們贊成憲政運動，並企圖利用進步派與頑固派之間的矛盾達其目的。這一階層，我們是必須爭取的。開明紳士是地主階級的左翼，他們的政治態度同中等資產階級大略相同。他們雖然同農民有階級矛盾，但他們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亦有矛盾，他們不贊成頑固派，他們也是想利用我們同頑固派的矛盾達其政治上的目的。這一部份人，我們也決不可忽視，必須採取爭取政策。地方實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實力派及無地盤的雜牌軍兩種力量在內。他們雖然同進步勢力有矛盾，但他們同現在中央政府的損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並想利用我們同頑固派的矛盾達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實力派的領導成份也多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因此他們在抗日戰爭中雖然有時表現進步，但不久仍然反動起來。但又因為他們同中央勢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他們是可能在我們同頑固派鬭爭時採取中立態度的。上述三部份中間勢力，我們的政策都是爭取他們。但這種爭取政策，不但同爭取農民小資產階級有區別，而且對於各部份中間勢力也有區別。對於農民小資產階級，是當作永久同盟者去爭取的。對於中間勢力，則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同盟者。在中間勢力中，關於中產階級及開明紳士，他們可以同我們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們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但不能進步到土地革命。在對頑固派的鬭爭中，有些人還可以參加一定限度的鬭爭，有些則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則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關於地方實力派，則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對頑固派鬭爭時採取暫時的中立立場，他們是不願同我們一道建立民主政權的，因為他們是大地主大資產階

級。中間勢力的態度是容易動搖的，並且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分化，因此對於中間勢力的動搖態度應進行適當的解釋與批評。

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但是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可能。這些條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鬭爭。沒有這些條件，中間勢力就會動搖起來，或竟變為頑固派向我進攻的同盟軍，因為頑固派也正在極力爭取中間派，以便使我們陷於孤立。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鬭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採取十分慎重處理的態度。

（五）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個階層，現在分為降日派與抗日派，以後還要逐漸分化。目前的大資產階級抗日派，是與降日派有區別的。但他們採取兩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張團結抗日，一面又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極端反動政策，作為準備將來投降的步驟。因為他們還願團結抗日，所以我們還有可能爭取他們留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面，這種時間越長久越好。忽視這種爭取政策，忽視同他們合作的政策，認為他們已經是事實上的投降派，已經就要舉行反共戰爭了，這種意見是錯誤的。但又因為他們普遍全國的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反動政策，不實行三民主義這個共同綱領，還堅決反對我們實行這個綱領，堅決反對我們超越他們所許可的範圍，即只讓我們同他們一樣實行單純軍事抗戰，並且企圖同化我們，否則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壓迫。所以我們又必須採取反抗他們這種反動政策的鬭爭策略，同他們作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堅決鬭爭。這就是我們對付頑固派兩面政策的革命的兩面政策，這就是以鬭爭求團結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於他們的反革命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在政治上採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於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採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於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

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範圍，就有可能逼迫他們承認進步勢力的地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而使頑固派陷於孤立。同時，也就有可能爭取還願抗日的頑固派，延長其留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時間，就有可能避免如同過去那樣被圍剿的大內戰。所以，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同頑固派的鬭爭，不但是爲了防禦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並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爲了延長他們抗日的時間，並保持我們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如果沒有鬭爭，進步勢力就會被頑固勢力消滅，統一戰線就不能存在，頑固派對敵投降就沒有阻力，內戰也就會發生了。所以同頑固派鬭爭，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避免大規模內戰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這一真理，已被一切經驗證明了。

但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鬭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鬭爭的防禦性。對於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鬭則已，鬭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鬭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鬭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鬭爭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的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的每天每刻的鬭下去，決不可被勝利衝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鬭爭的暫時性。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之時，我們才又用新的鬭爭對待之。這三個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利』，『有理』，『有節』。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鬭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並使頑固派爾後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

輕易舉行大內戰，這樣就有爭取時局走向好轉的可能。

(六) 國民黨是一個由複雜成份組成的黨，它有頑固派，也有中間派，也有進步派，國民黨並不就等於頑固派。因為國民黨中央頒佈『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並實行動員他們一切力量進行普遍全國的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爲國民黨都是頑固派，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現在的國民黨中，頑固派還站在支配其黨的政策中的地位，但在數量上只佔少數，它的大多數黨員（雖然很多是掛名黨員）並不是頑固派。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力量去團結國民黨的中間派與進步派。

(七) 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與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區別的，也與工農專政相區別。在政權的人員分配上，應該是：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無產階級與貧農；左派進步份子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不左不右的中間份子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中等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只有漢奸與反共份子才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政權。這種人數的大體上規定是必要的，否則就不能保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這種人員分配的政策是我們黨的真實政策，必須認真實行，不能敷衍塞責。這是大體的規定，應依具體情況適當實行，不能機械的求湊數目字。這種規定，在最下級政權中可能須作某種變動，以防豪紳地主把持政權，但基本精神是不能違背的。在抗日統一戰線政權中，對於共產黨員以外的人員，應該不問他們有無黨派關係及屬於何種黨派。在抗日統一戰線政權區域，只要是不反對共產黨並與共產黨合作的黨派，不問他們是國民黨，還是別的黨，應該允許他們有合法存在的權利。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該是凡滿十八歲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

黨派、男女、信仰與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該由人民選舉，然後陳請國民政府加委。其組織形式，應該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該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真正的漢奸反動派，保護抗日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生活，為基本出發點。這種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建立，將給全國以很大的影響，給全國抗日統一戰線政權樹立一個模型，因此應為全黨同志所深刻了解並堅決執行。

(八)在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鬥爭中，知識份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頑固派又正在極力爭取知識份子，因此，爭取一切進步的知識份子於我們黨的影響之下，是一個必要的嚴重的政策。

(九)在宣傳問題上，應該掌握下列的綱領：(1)實行總理遺囑，喚起民衆，一致抗日。(2)實行民族主義，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對內求漢滿蒙回藏各族平等。(3)實行民權主義，人民有抗日救國的絕對自由，民選各級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革命民主政權。(4)實行民生主義，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發展農工商業，改良人民生活。(5)實行蔣委員長指示，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武裝抗日的責任。這是國民黨的綱領，也是國共兩黨的共同綱領。但是除了抗日一點外，現在的國民黨都不能實行，只有共產黨與進步派才能實行。這是已經普及於人民中的最簡單的綱領，但是許多共產黨員還不知利用它作為動員民衆反對頑固派的武器。今後應該隨時把握這五條綱領，用佈告、宣言、傳單、論文、演說、談話等等形式發佈之。這在國民黨區域還是宣傳綱領，但在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地則是行動的綱領。根據這些綱領去做，我們是合法的，頑固派反對我們實行這些綱領，他們就是非法的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國民黨的這些綱領，同我們的綱領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國民黨的思想體系，則和共

產黨的思想體系絕不相同。因此我們所應該執行的，僅僅是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綱領，而決不是國民黨的思想體系。

在延安慶祝十月革命節幹部晚會上的講話

——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

今天延安開會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我們去年開慶祝會時，紅軍還正在爲保衛斯大林格勒而奮鬥。但在一年之中，紅軍的勝利就轉變了戰爭的全局，由伏爾加河打到了德涅泊河，即將到來的冬季攻勢，又將取得更大的勝利。沒有紅軍，戰爭的局面是不能設想的。紅軍的勝利，關係於整個人類的命運，這個真理，早已是明明白白的了。同時，這一年中，英美法聯軍肅清了北非、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的敵人，空軍採取了攻勢，配合了紅軍的作戰。在東方，中國的軍隊與英美的軍隊也打擊了日本法西斯。

一星期前，英美蘇三國在莫斯科所開的會議，勝利地完成了任務，這也是值得大大慶祝的。這次會議解決了許多軍事政治問題，於十一月一日發表了三國聯合公報，簽訂了幾個有歷史重要性的宣言。這次會議所討論與解決的問題中，據聯合公報所說，首先最重要的，是爲着縮短戰爭時間，決定了確切的軍事行動計劃，關於此種行動，已經有所準備。由此，我們可以想到，不久的時間內，我們將看得見第二戰場的實行開闢，從東西兩面夾擊希特勒而打敗它，決定地解決歐洲的問題。歐洲問題

解決，就是折斷了整個法西斯的脊骨與右手，剩下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左手，也就不難打斷了。

莫斯科會議的決議中，有中國參加的四國宣言，在抗戰到底的決心下，全面地規定了保障戰後和平與安全的整個重要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規定四國在戰爭中的合作，將使之在戰爭後也繼續實行，這樣就打破了德日法西斯及各國內部的投降主義者離間英美蘇中的陰謀，四國是更加密切地團結起來了，戰後的和平安全有了保障了。宣言中又規定戰後將組織包括一切大小國家在內而以主權平等為原則的新的國際聯盟，作為保障和平安全的組織形式。我們可以想到，這種新的國際聯盟，將和戰前的老的國際聯盟（雖然在其後期有蘇聯參加在內，但那時不容許蘇聯起重要作用）大不相同，它將是真能保障和平安全的聯合機構。

莫斯科會議決定了對意大利的基本原則與具體政策。其基本原則是：『法西斯主義及其所有惡勢力與其所產生的事物應予完全消滅，而予意大利人民以每一機會，建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政府機構及其他機構』。其具體政策的第一條是：『意大利政府應容納始終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人民團體的代表，使其更加民主化』，第二條是：『意大利人民應完全恢復言論、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與公共集會的自由，意大利人民並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團體』。此外有幾條是關於徹底消滅法西斯殘餘的，有一條是關於建立地方民主政府的。根據這些條文，消滅一切法西斯遺跡與建立有共產黨參加的廣泛的新民主主義意大利的方針是確定了。對意大利宣言的末尾還作了一個聲明，這聲明說：『本決議的內容，決非付諸實行以反對意大利人民最後選擇其政治制度的權利』，這是一個原則性的聲明，這就是說，將來意大利人民選擇民主制度，還是選擇其他更進步的制度，他們是有權利的。莫斯科會議對意大利宣言是一個範例，將來將以此對待一切法西斯國家。這是完全區別於第一次大戰的東西，歷史上凡爾賽的帝國主義精神被掃除了，給了戰敗國人民以自由解放的光明道路，這是蘇聯人民

英美人民及各國人民的偉大國際主義精神的集中表現。

莫斯科會議宣佈了奧地利脫離德國，同時責成奧國人民要爲反希特勒戰爭而努力。這也是一個範例，一切被法西斯吞併的國家或地方，均將獲得解放。

在三國會議上宣佈了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與斯大林委員長三人的宣言，在這個宣言中，規定了徹底懲辦法西斯兇手的原則，一切法西斯劊子手將不能倖免。同時，宣言號召：『目前尙未沾染無辜人民的血跡的人們，切勿和那些兇手們同流合污，蓋三國必將追尋他們至天涯海角，務使歸案法辦』，藉以瓦解法西斯營壘。像這樣的帶着深刻革命意義的宣言，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不能有的。

總之，三國會議的成功，確實是劃時代的，它將深刻地影響到戰爭及戰後的人類生活，人類解放的曙光已經看得見了。那些對中國人民前途及世界人民前途抱悲觀見解的人們，那些抱投降思想，抱無原則妥協思想的人們，已經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了。

我們慶祝蘇聯誕生的二十六周年，我們慶祝蘇聯紅軍的偉大勝利，我們慶祝斯大林元帥的英明領導，我們慶祝莫斯科三國會議的劃時代的成就，我們慶祝中國參加了偉大的四國宣言！我們共產黨人，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我們全國愛國的軍民同胞，應該一齊努力，堅決擁護四國宣言，制止仍然存在投降危險與內戰危險，團結全中國一切愛國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國家，並以這種新國家的資格參加到新的國際合作與國際建設中去，這就是我們的期望。

與中外記者團談話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

毛主席致辭

我十分歡迎各位記者來到延安。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與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個共同基礎上團結起來。

各位到延安時，正遇着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我們表示極大的慶祝。第二戰場的開闢，其影響不僅在歐洲，而且將及於太平洋與中國。中國要前進，世界要前進，我們必須取得最後勝利。

第二戰場的開闢，是經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經過莫斯科、德黑蘭會議發展而來的，在這些會議上決定了從東、西、南三面打擊敵人。第二戰場現在是實現了，三面打擊希特勒的計劃是實現了，我們謹祝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斯大林元帥的健康！

全中國所有抗戰的人們，應該集中目標，努力工作，配合歐洲的決戰，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時機

是很好。

關於中國國內情況，諸位先生是十分關心的，我在這裏必須講幾句。關於國共關係，中國共產黨對此問題的態度，早已見於中共中央歷次文告及其報紙。今乘諸先生來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擁護蔣委員長，堅持國共與全國人民的合作，爲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此種政策始終不變，抗戰前期是如此，抗戰中期是如此，今天還是如此，因爲這是全中國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爲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問題與答覆

問題

斯坦因先生問：毛主席能否談一談，林伯渠先生在重慶談判的情形？

夏南汗神父問：上述問題爲大家所關心，可否儘先答覆？

斯坦因先生問：爲使問題明瞭起見，我請毛主席將一九三六年國共談判情形與今日談判情形作一比較。

愛卜斯坦先生問：第二戰場的開闢是否引起了一個新階段？中共中央對此是否準備發表宣言，以闡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謝爽秋先生問：爲着加強團結，中國共產黨希望於各方面的是什麼？

趙炳痕先生問：爲使問題明瞭起見，我增加問，中國共產黨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其他各黨各派做些什麼？中國共產黨本身又準備做什麼？

毛主席答

諸位的問題可綜合爲三個：

第一個問題，關於國共談判。談判已進行了許久，但是今天還在談判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其他今天還無可奉告。

第二個問題，關於第二戰場。日前解放日報社論已說明是一個新階段，我們不準備再發表宣言。第二戰場的開闢是同盟國戰爭合作的發展，其總的性質，現在與過去比較，是沒有變化的。但是第二戰場開闢有與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種相同的意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兇焰高漲，反法西斯力量被打與退却的時期，賴有蘇聯的進攻結束了過去的階段，開闢了新的階段。接着，北非與太平洋相繼有了進攻。這是同盟國從防禦到進攻的一大轉變。第二戰場開闢，在進攻中又前進了一大步，如果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現在歐洲已進到了決戰階段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新階

段，特別在軍事方面。我已說過，第二戰場開闢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就目前來說，對中國的影響似乎不會很大，你們可以看見，外面情況雖然甚好，但是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關於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爲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爲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的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爲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够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爲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份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學術思想、報紙與藝術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進其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係上與各黨的相互關係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係。在國際關係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的國家，並發生民主的相互關係，我們希望外國及外國朋友以民主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複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我

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議的決議，就是基於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先生們來到邊區已有十幾天，今後還將有若干時日留在邊區。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產黨爲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貫徹着一個民主統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須繼續做。如果有缺點，必須克服這種缺點。我們認爲全中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勝敵，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對於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後，我們所希望於他們的，也是如此。持此觀點來看許多問題，沒有不可以說通與做通的。今天時間已晚，今後還可互相交換意見。我要說的，就是如此。

一九四五年的任務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的演說——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結了，我們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是什麼呢？我們有些什麼工作在明年要特別注意去做呢？整個反法西斯戰爭有很大的勝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實現。我們唯一的任務是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現在美國已打到雷伊泰島，並可能在中國登陸。同時，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東京到新嘉坡的大陸交通線，中國的淪陷區更加擴大了。敵人是否會停止它的進攻呢？我看還不會停止，它還有可能再向我國西南部及西北部進攻。在此期間，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詭計，企圖通過中國的投降主義者，引誘中國政府投降。中國內部的狀態仍然是不團結，國共談判毫無結果，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國反動派人工的分裂着。正面戰場的戰事，節節失敗，國民黨當局仍然固執其為全國人民所不滿意的一黨專政及其失敗主義的政策，拒絕一切有利於抗戰、團結與民主的建議。只有艱難締造的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執行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團結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軍隊，粉碎了一切敵人的進攻，並能發動攻勢，收復了廣大的失地。在此種情形下，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必須使全國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國民黨、共產黨、其他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在民主基礎上召集國事會議，組織聯合政府，才能統一中國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並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國。我們經過林祖涵同志曾經向國民參政會提出了這個問題，後來又向國民黨當局用書面提出了，最近周恩來同志又專爲此事去重慶談判一次，但是依然沒有結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單是談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大聲疾呼，要求國民黨當局改變現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是全國人民的總任務，中國人民不論在大後方，在淪陷區，在解放區，都要爲此目標而奮鬥。只要中國有一個真正實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動員與統一中國一切抗日力量的聯合的中央政府出現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就會很快了。爲了這個目的，大家應該想出許多辦法來。

在大後方，我們必須援助被反動當局壓迫的民主愛國運動，必須動員一切力量抵抗敵人的進攻，必須警惕投降主義者背叛民族投降敵人的陰謀活動。青年們及其他各界，應該有許多人到敵人佔領的地方去打游擊，廣大群眾則應當準備在一切敵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時，解放區則以自己的英勇作戰行動及發動新地區的游擊戰爭，有力地援助大後方。大後方的一切人民，一切愛國黨派，都有責任爲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努力。大後方已經有許多黨派，許多工業家、教授們、學生們，甚至許多國民黨人，贊成聯合政府的主張，認爲這是目前抗日救國的唯一正確道路。但是現在的力量還不够，應該號召廣大的人民起來爲此而奮鬥。

在淪陷區，廣大人民遭受敵人的殘酷壓迫，渴望解放。我們必須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準備在時機成熟時，舉行武裝起義，配合軍隊的進攻，裏應外合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們的兄弟姊妹們。這一任務，現在必須提到和解放區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難都要去

做。在這個工作中，法國共產黨與法國人民有了光榮的榜樣，我們應該學習法國的經驗。在淪陷區人民中，應解釋民主的聯合政府之必要，使他們知道只有這個政府出現了，淪陷區人民的解放就快了，號召他們起來為這個目標而奮鬥。

在解放區，現在已經成了抗日救國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這裡有了六十五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軍隊，有了一百多萬民兵，有了九千萬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們不論在軍事、政治、文化那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麼工作值得特別指出的呢？

我認為，一九四五年，中國解放區應該注意如下各項：

(一) 擴大解放區。無論那一個解放區的附近，或其較遠之處，都還有許多被敵偽佔領，而又守備薄弱的地方，我們的軍隊應該進攻這些地方，消滅敵偽，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我們必須把一切守備薄弱，在我現有條件下能够攻克的淪陷區，全部化為解放區，迫使敵人處於極端狹窄的城市與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們包圍得緊緊的，等到各方面的條件成熟了，就將敵人完全驅逐出去。這種進攻，是完全必要的與可能的，我們的軍隊已經舉行了很多這樣的攻勢，特別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績，明年應該繼續這樣做。在一切新被敵人佔領，尚未建立解放區的地方，例如：河南等處，必須號召人民組織武裝隊伍，反對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區。幾年的經驗證明，組織衆多的經過訓練善於執行軍事政治各方面任務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去襲擊敵偽，組織人民，以配合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應該這樣做。

(二) 敵人的進攻『掃蕩』是不會停止的，我們應該經常警惕，隨時準備用反『掃蕩』粉碎敵人的進攻，沒有這種警惕是不對的。不要以為我們強了，敵人弱了，敵我力量對比形勢現在已經改變

了，須知敵人還是強的，它決不會忘記向我們進攻。我們還是比敵人弱，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並執行正確的軍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變這種形勢。只有到了我們佔優勢的時候，敵人進攻這回事才會成爲不可能了。

(三) 整訓現有的自衛軍與民兵，增強他們的戰鬥力。自衛軍與民兵數目還不够，各地除某些個別地方不可能再擴大者外，均應盡量地擴大。九千萬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應組織在自衛軍中，在不脫離生產原則下，輪流担任保衛家鄉與協助軍隊的任務。從自衛軍中挑選精幹份子組織民兵，或基幹自衛軍，在『戰鬥與生產結合』的原則下，協同軍隊作戰，或者獨立自主的作戰。九千萬人民中，至少應該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萬人當民兵，即是說，比現有民兵數目擴大一倍。有些地方，還沒有十分重視這個工作。在這些地方，民兵的數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訓，質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須改變此種情況。自衛軍與民兵，均必須不違農時，減少誤工，不妨礙生產。在這裏，變工的方法是必要的，戰鬥的民兵組織與生產的變工組織，往往可以互相結合。自衛軍與民兵的領導機關，必須是民主選舉的。只有這樣，自衛軍與民兵才能擴大，也才能提高戰鬥力。民兵的重要戰鬥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運動應使之普及於一切鄉村中。普遍製造各式地雷，並訓練爆炸技術，成爲十分必要。

(四) 整訓正規軍與游擊隊。一九四五年，應將全部軍隊輪番整訓一次。按照新方法進行整訓，舉行群眾性的練兵運動。

(五) 在老區域，補充原有軍隊的消耗數額。在新發展區域，在經濟條件許可下，應該擴大軍隊。不論補充軍隊與擴大軍隊，均以不加重人民財政負擔爲條件，這一點必須謹記，如果違背了這一點，我們就會要失敗的。

(六)軍隊內部的團結，非常之重要。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歷來依靠官兵一致，獲得了光榮的勝利。但是，中國軍閥軍隊的軍閥主義習氣在我們軍隊裏的影響，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隊，這種習氣還是很嚴重。一九四五年，應該進行廣大的工作，將軍隊官兵關係中的一切不良現象，例如：打人、罵人、不關心士兵的給養、疾病及其他困難，對於士兵的錯誤缺點不耐心教育說服，輕易處罰，以及侮辱或槍斃逃兵，等等惡劣習慣及錯誤方針，從根本上去掉。許多部隊，現在還未重視這一工作，由於不明白這一工作是軍隊戰鬥力的極其重要的政治基礎。目前開始的一年整訓計劃，軍事整訓與政治整訓應該並重，並使二者互相結合，整訓開始時，還應着重政治方面，着重於改善官兵關係，增強內部團結，發動幹部與戰士群眾的高度積極性，軍事整訓才易於實施與更有效果。這一工作的實行，應在每一部隊內部舉行擁幹愛兵運動，號召幹部愛護士兵，同時號召士兵擁護幹部，彼此的缺點錯誤，公開講明，迅速糾正，這樣就能達到很好地團結內部之目的。

(七)加強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兩項工作，進一步的改善軍民關係。我們八路軍新四軍和我們解放區人民之間的關係，歷來是好的，因此我們能够戰勝敵人，鞏固與發展解放區。但是，舊軍隊的習氣，同樣會傳染給我們的，軍民關係中的不良現象，例如軍隊態度橫蠻，損害人民利益，紀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時常發生。同時，地方對軍隊幫助不够，優待抗屬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現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們曾經指出了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許多地方還未重視。一九四五年舊曆正月，一切解放區，應普遍舉行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優抗運動，一定要做出顯著成績來。已經有了成績的，必須繼續做，必須檢查此兩項工作的結果。如果我們的全部軍隊，官兵上下團結一致，從政治上鐵一般的鞏固起來了，加上軍事技術與戰術的訓練，又加上人民的擁護，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事業，就有了堅強的保障了。

(八)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根本路線，在解放區，首先表現在各階級各黨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應總結經驗。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務使打通隔閡，去掉誤會，改正相互關係上的不良現象，以便協同進行政府工作與各項社會事業。凡參加人民代表會議（參議會）工作、政府工作與社會工作的一切人員，不問屬何黨派，或無黨無派，應該一律被尊重，應該一律有職有權。

(九)減租，各地均有成績。但是有些地方成績少些，明減暗不減及恩賜觀點，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減得太多，或在減租之後不注意交租等現象。這兩種偏向，都應糾正，減租之後，租約期滿的除在照顧雙方利益原則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種者外，應該重定新約，使農民有地可種。老區域減租未澈底的，應該查租。新區域尚未減租的，應該發動減租。租不減是不對的，減得太過火也是不對的。凡地主因被敵人摧殘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難的，政府應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給以從事農工商業或參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這件事當做政府工作之一，藉以團結他們反對共同敵人。我們現在是在農村中，土地問題的正確解決，是支持長期戰爭的重大關節，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一〇)今年絕大多數地方都進行了生產運動，有了顯著的成績，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份地方還未着手進行，另有一部份地方成績不大，再有一部份地方軍隊方面有成績，人民方面缺乏成績。一九四五年，必須絕無例外地普遍舉行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一切軍隊，於作戰、訓練之外，必須從事生產自給，機關學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許減少或免除生產。必須動員人民，在自願原則下，組織生產互助團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等。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必須用極大精力去幫助人民，組織這種互助團體，以便大規模地恢復生產與發展生產，不但應該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應該使人民逐漸的有盈餘。『耕三餘一』的口號，除被敵人摧殘厲害的地方

外，就是在敵後解放區，也是可能實現的。我們解放區的工業品，必須力求自給，必須爭取於數年內達到全部或大部自給之目的。由公營私營與合作社經營這樣三方面的努力，達到這個目的是可能的。和生產相輔的是節約，必須盡可能地減少浪費。『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確定不移的財政方針。如果我們不去從根本上發展經濟，而去枝枝節節地解決財政問題，就是錯誤的方針。如果我們努力地發展了公私經濟，我們就能支持不論時間多久的戰爭，而使精力不至於枯竭。這一點非常重要，必須使一切工作人員及全體軍民透澈地認識清楚，以便組織他們從事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在公營經濟中，按質分等的個人分紅制度，是在很多部門內可以實行，並應該實行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兩個原則，必須注意不要違背。

(一一)爲着戰勝日本侵略者，於充分注意軍事、政治、經濟之外，還要注意文教工作。我們解放區的知識份子，絕大多數都是好人，他們的缺點甚至錯誤，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們是人民事業的可貴資本，他們應該被重視。他們中有許多人從事軍事、政治、經濟工作，另有許多人從事文化、教育、藝術、衛生工作。所有這些人員，都應該被重視。今年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會議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適用。專制主義者利於人民愚昧，我們則利於人民聰明，我們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漸地離開愚昧狀態與不衛生的狀態。各地政府與黨組織，均應將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裏面。

(一二)從軍隊中，農村中，工廠中及政府等機關中，用群眾民主選舉的方法，選出優秀份子，充當戰鬥英雄、勞動英雄及模範工作者，給與獎勵與教育，經過他們去鼓勵與團結廣大的群眾，這種制度，對於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提高農業及工業的生產力，提高政府機關及一切其他機關的工作能力，數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是極有效果的，各地應該普遍地推廣這一運動。

(一三)爲着戰勝日本侵略者，需要廣大的有能力的幹部。我們現有的幹部，比較從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幹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別是下級與初級幹部，不論是軍隊的或地方的，他們的文化程度，他們對於政策的瞭解程度，以及他們工作技術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則是很低的。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他們忙於工作，領受教育的機會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幹部教育，應該着重於訓練軍隊的（連至班）與地方的（區鄉）下級及初級幹部，在職的用輪訓辦法，不在職的用學校辦法，有計劃地將他們提高一步。

(一四)我們工作作風中的一項極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習慣於獨斷獨行，而不善於啓發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於運用民主作風。當然，這是拿我們解放區的這種作風與那種作風作比較，而不是拿我們解放區與國民黨區域作比較。我們解放區是民主的地方，國民黨那裏是封建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是原則上區別的。但是，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尚未學會運用民主作風，舊社會傳染來的官僚主義作風，依然存在。別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見，提了就不高興。只愛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爲怕碰釘子，受打擊，遭報復，人們不敢大膽提意見。這是一種很不好的作風，這種作風阻塞着我們事業的進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員的進步。我提議各地對此點進行教育，在黨內，在黨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風。不論什麼人，只要不是敵對份子，不是惡意攻擊，允許大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1）知無不言，言無不盡；（2）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沒有『言者無罪』一條，並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效果。自從整風以來，我們的工作作風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稱讚的，這是很光榮的。但是我們仍有嚴重缺點，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風，我們一定要改正這個缺點。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爲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

麼不好的東西捨不得丟掉呢？如果我們改正了這個缺點，那我們就能團結更廣大的人民，我們的事業就能獲得更大的與更快的發展。

（一五）除了上述種種以外，擺在解放區人民面前的極其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想出種種能夠促成聯合政府的辦法來。繼續和國民黨及其他黨派談判是一種辦法，全國人民起來呼籲要求是一種辦法，還可能有其他的辦法。總之，我們一定要多方努力，將這個適合全民族抗戰要求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盡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來。

我們解放區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當然還有許多，但我以為目前特別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項，其他就從略了。各個解放區的情況與工作步驟，在許多點上互不相同，各地應按自己的特點佈置工作，以便適當地完成各項任務。

一九四五年應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更大發展的一年，全國人民都希望我們解放區能夠救中國，我們也有這樣的決心與勇氣，我希望我們解放區的全體軍民一齊努力，不論是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都要團結一致，為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而奮鬥，為組織淪陷區人民而奮鬥，為援助大後方人民而奮鬥，為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奮鬥。

答路透社記者十二項問題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九月二十七日新華日報發表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書面提出十二項問題，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答覆。問題與答覆如下：

（問）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協定的方法避免內戰？

（答）可能。因為這符合於中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於中國當權政黨的利益。目前中國只需要和平建國一項方針，不需要其他方針，因此中國內戰必須堅決避免。

（問）中共準備作何種讓步，以求得協定？

（答）在實現全國和平、民主、團結的條件下，中共準備作重要的讓步，包括縮減解放區的軍隊在內。

（問）中央政府方面須作何種妥協或讓步，才能滿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張見於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這個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與人民軍隊，允許他們參加接受日本投降，嚴懲漢奸偽軍，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隊，保障人民自由權利，

及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問) 你對談判會達到協定甚至只是暫時協定一事，覺得有希望嗎？

(答) 我對談判結果，有充分信心，認為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與互相讓步之下，談判結果將產生一個不止是暫時的而且是足以保證長期和平建設的協定。

(問) 假若談判破裂，國共問題有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決嗎？

(答) 我不相信談判會破裂。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中共都將堅持避免內戰的方針；困難會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問) 中共對中蘇條約的態度如何？

(答) 我們完全同意中蘇條約，並希望它的徹底實現，因為它有利於兩國人民與世界和平，尤其是遠東和平。

(問) 日本投降後，你們所佔領的地區，是否打算繼續佔領下去？

(答) 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與人民軍隊，它的意義只是要求政府實行國民黨所早已允諾的地方自治，藉以保障人民在戰爭中所作的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與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於國民黨創造者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問) 如果聯合政府成立了，你們準備和蔣介石合作到什麼程度呢？

(答) 如果聯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將盡心盡力和蔣主席合作，以建設獨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國，徹底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問) (1) 你的行動和決定，將影響到華北多少共產黨黨員？(2) 他們有多少是武裝起來的？(3) 中共黨員還在些什麼地方活動？

（答）共產黨員的行動方針，決定於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共現在有一百二十餘萬黨員，在它領導下獲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現已遠超過一萬萬。這些人民，按照自願的原則，組織了現在數達一百二十萬以上的軍隊和二百二十萬以上的民兵。他們除分佈於華北各省與西北的陝甘寧邊區外，還分佈於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各省。中共的黨員，則分佈於全國各省。

（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問）在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設方針及恢復方針如何？

（答）除了軍事與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將向政府提議，實行一個經濟及文化建設綱領，這綱領的目的，主要是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獎勵私人企業（除了那些帶壟斷性質的部門應由民主政府國營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歡迎外人投資與發展國際貿易，推廣群眾教育，消滅文盲等等。這一切也都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相符的。

（問）你贊成軍隊國家化、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麼？

（答）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通常所說的『共產黨軍隊』按其實際乃是中國人民在戰爭中自願組織起來，而僅僅服務於保衛祖國的軍隊。這是一種新型的軍隊，與過去中國一切屬於個人的舊式軍隊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質為中國軍隊之真正國家化提供了可貴的經驗，足為中國其他軍隊改進的參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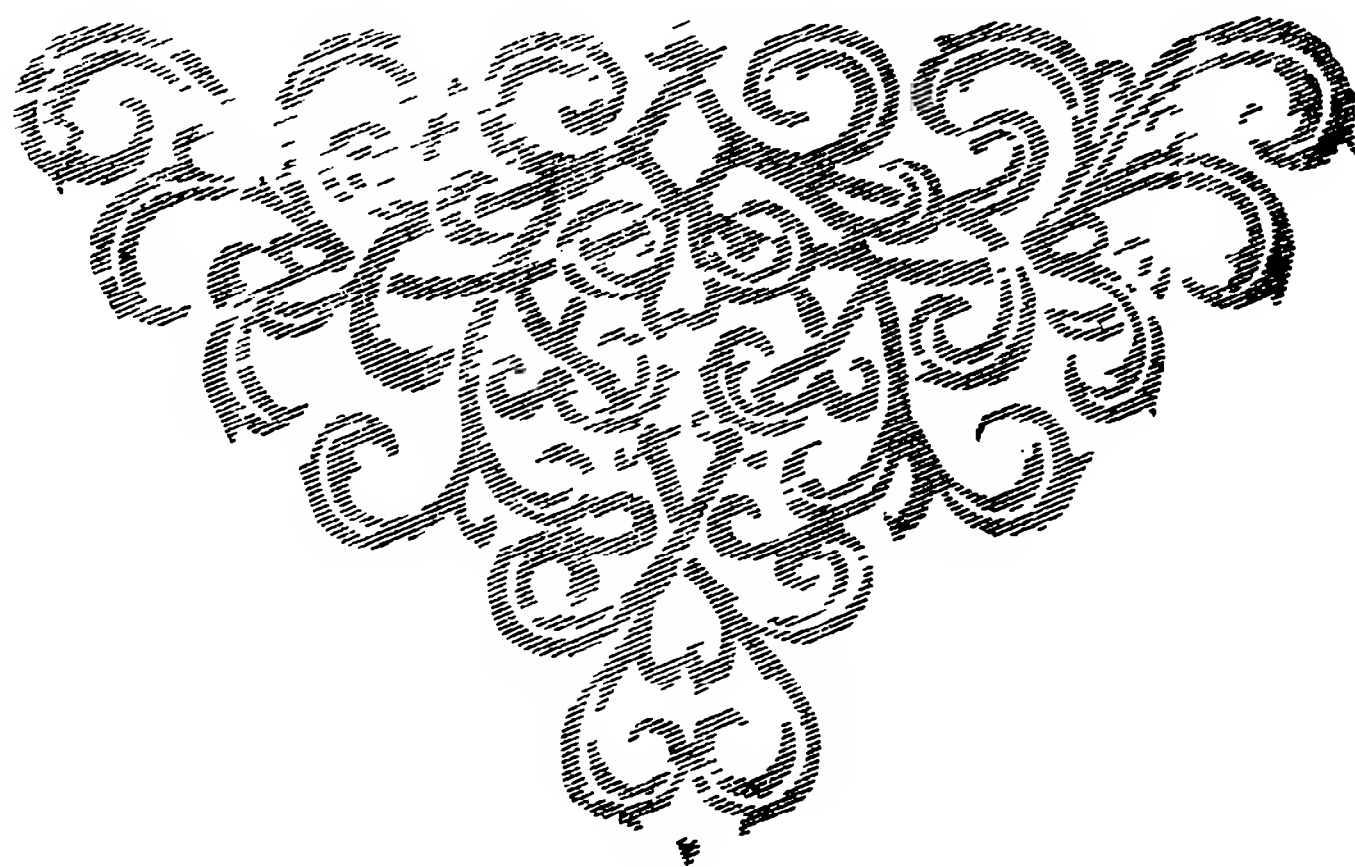
爲美國對華軍事援助法案的聲明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美國國務院本月十四日提出國會審議的繼續對華軍事援助法案，對中國的和平安定與獨立民主有極爲不利的影響，因此，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此項法案。中共此種意見，並爲中國廣大民主人士所支持。在抗日戰爭中，美國對於中國實施軍事援助，並派遣美軍在中國領土協同作戰，其目的是擊敗中美美的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但就在那時，由於美國錯誤的僅僅援助國民黨軍閥，這種援助，也並未有效的加強中國的抵抗，相反的，是被國民黨軍閥用以加強其對於積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解放區的進攻與封鎖。在日本投降以後，美國沒有停止反而極大的加強了對於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各種軍事援助，並在此實際目的下，派遣龐大的軍隊，駐在中國的領土與領海之上；這種行動已經證明是中國大規模內戰爆發與繼續擴大的根本原因。僅僅在美國政府宣佈履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關於中國問題的約束與中國國民黨宣佈停止內戰，並宣佈履行中國政治協商會議關於國家民主化的決議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才曾經不反對美國對於中國的某種軍事援助。但是現在這些前提都已被嚴重的破壞，因此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只是以強

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陷中國於內戰、分裂、混亂、恐怖和貧困；只是使中國不能實現整軍復員和履行其對於聯合國的義務；只是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獨立與領土主權完整；只是破壞中美兩大民族的光榮友誼與中美貿易的發展前途。中國人民今天所急需的，並不是美國的槍砲與美軍的留駐中國領土，相反的，中國人民痛感美國運來中國的軍火已經太多，美國在中國的軍隊已經駐得太多，他們已經造成中國的和平和安定與中國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嚴重巨大的威脅。在此種現實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堅決反對美國政府繼續以出售、租借、贈送或讓渡等方式，將軍火交給中國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堅決反對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團來華，並堅決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與收回一切對華的所謂軍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華的美國軍隊。

四 卷



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

大會決議案第一部份第二節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於寧岡步雲山——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赤色政權長期的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之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在另外一件奇怪現象之上，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國內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他們中間的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的中國最大的特徵。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才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於是發生出赤色政權一小塊或若干小塊在四圍白色政權包

圍的中間。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有些同志在困難與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赤色政權之存在，而發生消極的傾向，這是沒有尋出這樣赤色政權所以發生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原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赤色政權之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第二，中國小塊赤色政權的發生和能够比較長期的存在，決然不在並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如川滇黔及北方各省，而只在前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起來過的地方，如湘粵鄂贛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農民協會的組織和工農階級對城鄉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鬭爭，所以廣州產生過三天的城市蘇維埃政權，而海陸豐、湘東、湘南、湘贛邊界、湖北之黃安等地都有過農民的割據。至於此刻紅軍的發生，也必然只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及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才能分化出來。那些毫未經過政治訓練及毫未接受工農影響的軍隊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時便決然不能分化可以造成紅軍的成份出來。第三，小地方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於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一個條件之下。全國革命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政權之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的要使總政權取得的許多力量中間之一個力量。全國革命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而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停頓，如俄羅斯的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則小塊紅色政權之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形勢是怎樣呢？實在是跟着國內國際資產階級之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政權之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是繼續發展日漸接近總政權之取得的。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的紅軍之存在也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之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觀念，是共產黨和割據地

方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觀念。第五，紅色政權長期的存在並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要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之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之不錯誤。

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廿五日——

湖南省委請轉中央：

一 關於中央來信

中央六月四日來信，經過江西省委吉安縣委，於十二月二日才到井岡山。這封信好得很，糾正了我們許多錯誤，解決了這邊許多爭執的問題。這封信一到，即已發交軍中及地方各級黨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動的部隊集中井岡山，特委委員、軍中及地方的活動份子，共三十餘人（朱德、陳毅、何挺穎、何長工、袁文才、王佐、譚震林、鄧乾元、李却非、陳正人、王佐農、蕭萬俠、劉輝霄、謝春標、劉敵、熊壽祺、楊開明、曹鏢、鄧久廷、毛澤東、宋喬生、彭祐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參加），由特委召集開會，討論中央來信。認為中央來信除一二點（如游擊區域過寬與廢黨代表制）具體事項外，全部原則及政策都切合實際，應依照執行。黨的最高機關亦即組織前委。依照來

信，前委現在江西境內，受江西省委指導，如到湖南境內時，即受湖南省委指導。同時請中央經過兩省委隨時直接指揮。可惜中央來信四個附件中，只翻出了『沒收土地建立蘇維埃』、『國際二月決議』兩件，『軍事工作』、『組織問題』兩件翻不出來，這兩件十分急需，請速告翻譯方法，或另寫一份寄來。

二 邊界割據及八月失敗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赤色政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之存在及發展也是繼續的。在買辦豪紳階級繼續分裂和戰爭的形勢之下，蘇維埃割據之存在及發展，必須具備下列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再，在統治階級政權穩定時期與破裂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的戰略，是不同的。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如兩湖在李唐戰爭時期，廣東在張李戰爭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地區，可以比較擴大，然還須注意中心區域堅實基礎之建立，以準備白色恐怖到來時之有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穩定（比較的）時期，如今年四月以後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定要是逐漸推進的，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群眾工作上（分配土地，建立蘇維埃，組織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中心區域堅實基礎之建立。全國各地許多小塊赤色政權之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弄錯誤。至於主觀上策略之所以錯誤，乃至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穩定時期與破裂時期這

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在統治階級政權穩定時期，軍事上主張分兵冒進，甚且主張只用赤衛隊保衛大塊蘇維埃政權的割據，好像全不知敵人方面除挨戶團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群眾工作方面，全不注意指示中心區域堅實基礎之建立，不顧主觀力量之可能，只圖無限量推廣。如果軍事上主張逐漸推廣政策，在群眾工作上主張集中人力建立中心區域之堅實基礎，以自立於不敗，則謚之曰『保守主義』，這是邊界八月失敗及同時紅軍在湖南失敗的根本原因。

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王、袁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永、蓮、茶、酃四縣農民自衛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群眾革命情緒已經壓服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縣委，酃縣有了特區，蓮花亦開始了黨的組織，與萬安縣委亦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殺戮豪紳發動群眾的游擊暴動，做了很多，而且做得還好。這個時期，土地革命並沒有使之深入。政權機關是『工農兵代表會』及『人民委員會』兩種名字，簡單稱為工農兵政府，沒有蘇維埃的稱呼。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廢除了薪餉制。游擊部隊行動時，組織了行動委員會指揮之。這些簡單的做法，一部份是閉門造車自己做的，一部份是報紙傳來廣東十二月十一日暴動的消息，照着這一廣告做的（如人民委員會）。因為從十一月底起，即與省委斷絕交通，黨的一切主張政策全不知道。中國革命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中央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決議案，直到今年四月朱德同志等由湖南帶來邊界，邊界黨才受到它的影響。這個時候的指揮機關，是秋收暴動時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毛澤東任書記）。前委到三月初，因湘南特委的意見而取消，改組師委（何挺穎為書記），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缺點很大。並因湘南特委的意見，把毛部調往湖南，遂使邊界拋棄者一個月餘。三月底湖南失敗，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乃再開始邊界的割據。

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軍隊，隨便都在八九團以上，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團。然而我們四團不足的兵力，和敵人鬭爭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蘇維埃組織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特委（毛澤東爲書記）和軍委（陳毅爲書記）的政策是：堅決的與敵鬭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失敗的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鬭爭的規模；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各個擊破；割據地區之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爲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之利於鬭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之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中各次的軍事勝利及群眾割據之發展。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使此割據有日益發展之勢。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加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不明瞭當時正是統治階級穩定時候，反採取統治階級破裂的時候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邊界與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與省委派充特委書記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查當時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的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二十九團（宜章農民）逃避欲回家鄉的舉動，結果招致邊界與湘南兩方面的失敗，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

七月中旬，八軍進攻贛邊，無功而返，紅軍大隊進攻酃、茶，變計折赴湘南之際，江西王鈞、金漢鼎部五團，六軍胡文斗部六團，共十一團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團兵在永新（毛澤東指揮），在極大紅色群眾掩護之下，用四方游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兵困在縣城附近三十里內者至二十五天之

久。最後敵已知我虛實，採取猛攻，始失却永新，蓮花、寧岡旋失。這時六軍忽發生內訌，倉皇退去，旋與王鈞戰於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團，亦惶恐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助以群眾的威力，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到吉安、安福、萍鄉，與平瀏啣接起來，乃決然無疑的事。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復疲憊不堪，乃決計留一部份會同袁、王兩部固守井岡山，而令毛澤東率兵一營間道往桂東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向湘南者業已失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乃在桂東得到會合。

當湘敵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小道出擊不值），畏我群眾，倉卒走經蓮花退回茶陵時，贛敵十一團，隔一日又進據永新城。此時紅軍大隊（朱德率領）由寧岡進攻茶、酃，進至酃縣，二部士兵（第二十九團全團）思家情切，欲回湖南，不受約束，另一部則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亦不願轉向永新擊敵，杜修經導揚其燄，軍委亦未能挽救此不利的行動，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之沔渡出發，經資興向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范石生戰於郴州城，先勝後敗，傍晚退出，路向錯亂；二十九團則向宜章方面跑去，一部在樂昌被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莫知所終，當晚收集的不過百槍。幸主力部隊受損失小，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桂東，二十三日毛澤東等從井岡山到，遂議決重回寧岡。乃酃縣吳尚部二團突於是日下午向桂東猛襲，苦戰半日，翌日上午，復戰，我軍損失頗重（敵損失更大），於是退至江西境內。當軍隊由沔渡出向湘南時，原有之軍委取消，組織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陳毅為書記。及失敗退出桂東，取消前委，組織行委指揮之，毛澤東為書記。經崇義、上猶、遂川，九月八日到達井岡山下。此次攻郴失敗原因，共計有六：（1）一部官兵歸家念切，失掉戰鬥力；一部官兵不願往湘南，違反群眾心理。（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與邊界失去聯系，成了孤軍。（4）湘南工農群眾沒有起來，成了單純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戰的意義。當失敗下來之後，營長袁崇全率一步

兵連一炮兵連叛變，後來雖追回此兩連，然陣亡了團長王爾琢，損失的意義亦不小。八月三十日湘軍吳尙部，贛軍王均部，共四團，乘我軍在桂東失敗欲歸來尚未歸來之際，會合猛攻我井岡山。我軍不足一營，憑黃洋界天險（寧岡登井岡山之路）激戰一晝夜，將敵擊退，敵死傷甚大。是役保存了我們最後根據地，且使敵胆爲寒，不敢輕視共軍，爲邊界名戰之一。

軍隊（前委）在湖南時，往返所經，組織了桂東、汝城兩個縣委，連原有之資興、郴州兩縣委，組織一特委指揮之，杜修經爲書記，地點在資興之龍溪十二洞。資興、桂東、汝城三縣，共給了八十枝槍，組織赤衛隊。郴州有四五十枝槍的赤衛隊在瑤嶺。耒陽、永興等縣情形不明。五月間回湘南之農軍三十團、三十三團，早已分散，武裝共三四百，大部被敵繳去，春間紅軍在湘南發動的廣大群眾，完全被敵人壓服下去了。此次紅軍經過資興、汝城、桂東三縣，發動了一部份的地方群眾，組織了蘇維埃，桂東之沙田分配了土地，現在不知作如何狀況。此次組織之湘南特委，因交通阻塞，至今沒有信來。

三 九月至今的邊界割據

今年四月以來，割據地區逐漸推廣。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度擊破贛敵之後，割據地區，計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鄱縣東南部，是爲邊界全盛時代。土地大部份分配了，小部份在分配中。區鄉蘇維埃普遍的建立了，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蘇維埃，並成立了邊界蘇維埃。鄉村普遍組織了梭標爲武器的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組織了快槍的赤衛隊。七月贛敵進攻，八月湘贛兩敵會攻黃洋界，邊界各縣之縣城及平地盡

爲敵據。爲虎作倀的保安隊（用快槍的）、挨戶團（用梭標的）橫行無忌，白色恐怖，佈滿城鄉。黨的組織與政府組織大部份塌台。富農及黨內投機份子則紛紛反水。八月三十日黃洋界一戰，敵知井岡山天險無消滅希望，湘敵始退到酃縣，贛敵即盤據各縣之縣城，及平地各市鎮及鄉村。然敵始終無奈我們何者：寧岡則西北兩區，永新則北鄉天龍一區，西鄉小西江一區，南鄉南年山一區，蓮花則上西一區，遂川則井岡山一區，酃縣則青石岡大院一區。七八兩月，紅軍（約一團）及各縣赤衛隊大小數十戰，雖然失敗，然槍枝損失，總計不過三十枝左右，最後退入各山區內。敵全力進犯，竟以兩省會合軍力攻我井岡山根據地，一戰不利，始廢然而退。八月三十日黃洋界戰勝會剿軍，九月八日我南征部隊歸抵井岡山，於是另開九月以後之局面。

我軍經崇義、上猶、遂川，到井岡山之際，贛西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欺我敗殘，以五營追我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以四營進攻劉士毅，破之於遂川城，繳槍二百五十，俘營長連長各一，排長三四，士兵二百餘，餘部退贛州。我指揮軍隊之行委（毛澤東爲書記）與遂川縣委共同經營遂川的群眾，並籌軍隊之給養，分四路向四鄉游擊，每路組一行委指揮之，東路曾推進到萬安，與萬安縣委取得聯絡。九月二十四日，贛軍李文彬團從太和來，獨立第七師從贛州來，攻我遂川城，我方兵力未集中，只以兩營與戰，雖不支而退，然士氣未傷。九月二十六日軍回井岡山。十月一日，與熊式輝師周混元旅之二十七團一部戰於寧岡，俘營長一，連長一，排長二，士兵百，繳槍百一十枝，餘敵退永新，遂復寧岡全縣。李文彬團以我攻寧岡，從遂川繞道太和永新赴援，遂川只留獨立第七師（兵力最弱），遂川群眾之發動希望甚大，我軍給養問題又很迫切，遂於十月十三日再佔領遂川，獨立七師不戰宵遁。指揮軍隊之遂川行委（朱德爲書記）與遂川縣委共同計劃遂川工作，分五路游擊，分配土地，建立蘇維埃，發展黨的組織，籌借現款。此時駐桂東的八軍第三師閻仲行部有百二十六枝槍投入我軍，

編爲特務營，畢占雲（原向誠傑部編入閻仲行者）爲營長。十一月二日，贛敵第二十一旅（李文彬爲旅長）兩團，獨立第七師一部復來攻我遂川，我軍爲避免硬戰，退出遂川，欲以迅雷之勢進攻敵力較弱之寧岡永新，打破包圍之一面。十一月九日，擊破周旅二十七團於寧岡縣城及龍源口，繳槍百六十枝，斃敵營長一，士兵數十，俘副營長二，連長一，排長一，士兵百以上。翌日侵晨，進攻永新與周旅二十八團及二十七團殘部，戰至下午三時，始將敵擊退，前鋒佔領永新城。不料敵三十五旅自洪天河（吉安永新交界）增援趕到，我軍恐戰不利，遂向寧岡引退，是日敵死傷雖多，然我方亦死傷百以上，爲重回邊境以來最大之戰。此兩役均有赤衛隊、暴動隊參加，惟力量不大。目前邊界環境：贛邊有周渾元之第十四旅、劉士毅之第十五旅，此兩旅已被我擊敗，在整理中；李文彬之第二十一旅、某之第三十五旅，此兩旅是勁敵；湘邊則茶、酃、桂三縣仍然是吳尚部第八軍。目前我赤色政權區域，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份，成一南北狹長之整塊。此外蓮花之上西區，永新之天龍區、萬年山區，則與整塊不甚聯屬，亦爲紅色政權所割據者。敵人企圖則爲包圍此整塊割據，欲以軍事的進攻與經濟之封鎖，消滅此『共匪巢穴』。艱苦激烈的鬭爭，方將與日俱長，必不容我們稍得休息。

四 現在的問題

甲 軍事問題

（一）軍事時代：邊界的鬭爭，幾乎完全成了軍事的鬭爭，因此黨與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

樣應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軍中與地方各級黨部每日議事程序中重要項目，打仗成了日常生活。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那一處沒有武裝，或武裝不夠，或有武裝而應付的策略不對，就立即讓給白色武裝（白軍、保安隊、挨戶團）割據去了。這種鬭爭，一天比一天激烈，所以問題也非常之繁複而且嚴重。

（二）紅軍的來源，約分下列六項：（1）潮汕葉賀舊部；（2）武昌警衛團；（3）瀏平農軍；（4）湘南農軍及水口山工人；（5）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各部的俘虜兵；（6）邊界各縣工農份子。前四項是基幹，但賀葉舊部、警衛團、瀏平農軍，因經過一年多無數次的戰爭，損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過三分之一。即湘南紅軍，在邊界八個月的鬭爭，傷亡數目亦很大。所以前四項，雖然至今因其質量之健全，猶是紅軍第四軍的基礎勢力，但數量上比例，已遠不如後二項了。後二項中又以各軍俘虜為最大數量，設無此一項補充，則四軍兵額大成問題。雖有此一項補充，質量比較不如前項（內中亦有許多很好的），又因槍枝的增加與兵的增加不相稱，槍枝增加了不容易損失，兵有傷、亡、病、逃（打敗仗時略有之）四項隨時可以損失，而邊界農民願意當兵的少，分田實行，大家便耕田去了，現在第四軍的邊界工農份子數量是佔的極少數，故問題仍然很大。湖南省委答應送安遠工人來此，亟盼實行。

（三）成份：一部份是工農份子，一部份是游民無產階級（湖南省委謂完全是游民無產階級非事實），此游民部份，亟須換以工農份子，只是沒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戰爭中，游民份子戰鬥力却特別好，同時傷亡數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現有的游民部份，即另找游民來補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以改變其質量之一法。

（四）性質：大部份是由僱傭軍隊變成的，然一到紅軍即廢除僱傭制，從來沒有什麼餉發，只有

伙食錢與零用錢。紅軍官兵分配土地一事，除邊界各縣在紅軍當兵的，其家屬照例分得外，遠籍官兵分配土地頗難；一因割據地小，又因多山地，各鄉農民分配其本鄉土地還嫌過少，沒有餘出，二因戰鬪之勝負不時，割據地區不固定，昨日是紅色勢力分了田，今日被白色勢力奪去了又要交租予地主，所以不但紅軍中官兵不起自己分得一份的觀念，就是農民中間許多人，仍懷着分田的局面未必就此定了的觀念。這是白色勢力太嚴重，赤白鬪爭太頻繁、太激烈的結果。但紅軍士兵分得田地是一個不易的原則，仍當討論實行之法。

(五) 政治訓練：紅軍的士兵大概都有階級覺悟，分配土地、建立蘇維埃、武裝工農等政治常識大概都有了。他們已知道他們是爲自己及工農階級而作戰。有此原因，所以在這樣苦的生活中，這樣激烈的鬪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其職務是監督官長，代表士兵利益，參加軍隊管理，對內（軍隊內）做政治訓練，對外做民衆運動。士兵委員會健全了，可以不要政治部，工作人員都可以納入士兵委員會機關裏工作，比另設政治部好。此間軍隊今年四月以前都有政治部，因影響不好，方取消。有政治部，使官兵群衆認爲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幾人做的，餘人即以單純打仗爲職務；取消了政治部，人人要打仗，人人還要做政治工作（政治訓練與民衆運動），才把單純的軍事腦筋打破。黨代表制度依經驗所得，認爲還不能廢除。軍、師兩級（此間無師之一級，團直屬軍）黨代表可以廢除。團、營、連三級，特別是連一級，此時不可廢，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連黨代表對全連督促士兵委員會執行政治訓練，指揮民衆運動，在黨內即是支書。事實表現，那一連黨代表較好，那一連就較健全些。現在的下級幹部，因死傷的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若以現稱紅軍，就可以不要黨代表了，實在大謬不然。朱部在湘南曾經取消了黨代表，後來感覺不好，不能維持，到邊界才又恢復過

來。若改稱指導員，則與國民黨指導員相混，俘虜兵大都厭惡他們的指導員，且易一名義，於制度的本質無改，故此間決定不改。黨代表死傷太多，除自辦訓練班外，望中央及兩省委派可充黨代表者至少三十人來。

(六) 軍事訓練：別人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打仗；我們的兵，昨日入伍今日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以此一部份中、下級幹部及許多的士兵，軍事技術太差，作戰的長處，只是一個勇敢，這是很危險的。長期休息訓練，萬不可能，只有設法避免戰爭，求一較長期休息訓練，看可能否。下級官長的造就，現辦了一個百五十人的教導隊，安頓經常的辦下去。望中央及兩省委多派連排長以上軍官來，至少派三十名以上趕來邊界。

(七) 給養問題：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的工農生活好。現在軍中的生活則相反，恐怕什麼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紅軍這樣壞的。因為現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錢（米歸地方供給），時常難乎為繼。『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諺語，表示了他們的苦楚。耐得苦，比第四軍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僅僅發伙食錢，此外一切用費都省掉，每月都需現洋萬元以上。出發全靠打土豪。但一則打過的地方，沒有打了；二則敵人圍得緊緊的，往往非候擊潰敵人之一面，打土豪也不許你打遠；三則敵情之嚴重，單獨一兩營兵簡直不能出去籌款，要籌款須得多兵，問題就不是簡單的了。現在全軍五千人（正式紅軍）以上的冬衣雖得了棉花，還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決。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一樣苦，從軍長到伙伕，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爲了無產階級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麼人。雖然如此，經濟問題始終是很嚴重的。

(八) 傷病兵問題：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及其他原因，病的很多。紅

軍醫院建設在井崗山上，分中藥，西藥兩法診治，藥品及醫生之缺乏，問題很大。九月間有傷兵、病兵二百多。最近永新一戰更加多了。現在院中連看護人共有八百多人。傷病兵不加顧惜，軍心就要動搖。要顧惜得好，設備和給養實在困難萬狀。湘省委久已答應辦藥，却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及兩省委幫助送幾個西醫及一些碘片來。

(九) 軍隊中的民權主義：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戰不息，仍然維持不疲者，黨的作用之外，就是澈底的民權主義之實行。官長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言論之自由，繁縟禮節之廢除，經濟之澈底公開，士兵代表審查決算，伙食由士兵管理，雖每日五分錢，仍能分得點火食尾子作零用（每人每日約分得六七文）。這些辦法，使士兵特別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得前日的營壘中與今日的營壘中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雖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比較不如白軍的好，但精神得到解放，所以尙能相安。同時一個兵，前日替敵軍打仗不如今日替紅軍打仗之勇敢，乃是這種民權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座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熔化，這是一種事實。中國不但工農群眾需要民權主義，軍隊需要民權主義更切。澈底的民權主義之施行於軍隊，將是破壞中國封建的僱傭軍隊之重要政策，因為封建僱傭軍隊中的士兵生活，簡直不是人能忍受的。

(一〇) 軍隊中的黨：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支部建在連上，小組建在班上。四軍之所以艱難百戰而仍不潰散者，『支部建在連上』，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葉挺部猶是每團一個支部，真是豈有此理！現在軍中黨員與非黨員之比，約為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鬥兵中發展黨員數量，以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現連支部缺乏好的書記，故請中央從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動份子中派遣多人來此充當連黨代表。湘南來的工作人，幾乎盡數在軍中做黨的工作（同時做政治工作），八月在湘

南又跑散一些，所以現在更不能調開。紅軍自四月在寧岡開第一次全軍代表大會選舉軍委（軍黨部）後，七個多月中，共開過六次全軍代表大會。第六次會是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開的。這次會是在中央來信之後，對政治、軍事、組織、宣傳各項都有決定，比前五次都進步，選舉了二十三人的軍委，朱德爲書記（照中央指定），對內是軍中黨的最高機關，隸屬於前委。對外即是邊界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軍中黨的規模已粗具；黨員中一部份革命觀點很堅決，大多數仍缺乏好的教育，這是今後要注意的。

（二）地方武裝：分赤衛隊、工農暴動隊兩種。暴動隊以梭標、鳥槍爲武器，鄉爲單位，每鄉一隊，人數如鄉的大小比例，職務是鎮壓反革命，保衛鄉政權，敵人到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暴動隊創始於永新，本來是秘密組織着爲舉行暴動時用的，後來奪取了全縣政權，遂成公開的組織，後來此制度更推行於邊界，仍此名義未改。赤衛隊的武器是五響、九響及單響槍，五響佔大多數。各縣槍數略如下：寧岡百四十枝，永新二百二十枝，蓮花四十三枝，茶陵五十枝，酃縣九十枝，遂川百三十枝，萬安十枝，合計六百八十三枝。內中大部份是紅軍發給的，小部份是自己從敵人手中奪取的。各縣赤衛隊大都經常與豪紳武裝保安隊、挨戶團作戰，因此把握槍枝的能力與作戰的能力都一天一天增加了。邊界各縣，馬日事變以前，農民自衛軍槍枝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寧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六十（王部），共計九百七十枝，馬變以後，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餘一概被豪紳繳去，沒有一點把握的能力，這是以前機會主義黨造成的結果。現在各縣赤衛隊槍枝還很不够，豪紳的武裝多過赤衛隊，所以紅軍必須繼續幫助各縣的槍枝，在不破壞紅軍的條件之下，須盡量的幫助地方武裝，使之日趨於壯大。業經全軍大會規定紅軍用四連制，每連步槍七十五枝（連同特務連、機關槍連、迫擊砲連、團

部、營部合計，每團有步槍一千零七十五枝）。此外作戰增加的槍，則盡量武裝地方工農。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訓練；由紅軍派遠地人去當隊長的事，必須逐漸的減少。朱培德亦在大大的武裝保安隊、挨戶團，邊界各縣的豪紳武裝數量和戰鬥力頗為可觀。因此邊界赤色地方武裝之擴大，是刻不容緩的。

（一二）紅軍及赤衛隊的戰略：除承認所指示的原則（小敵迅速的以主力消滅它，大敵則用群眾戰，不硬打）外，紅軍應以集中為原則，赤衛隊應以分散為原則。當此資產階級政權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軍力來打紅軍，紅軍分兵是最大不利的，以集中為最有利。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是勝利的。中央指示我們的游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軍力估量過大的原故（四軍槍枝湖南省委已知道，另囑袁德生同志面述，此報告不列入）。赤衛隊之戰略，則以分散為有利，現各縣赤衛隊都採取此辦法。

（一三）對於編制：現仍是國民黨的老編制法。中央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既翻不出，太平天國軍制是什麼一回事，無從揣想，請再寫寄以便討論。

（一四）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就是釋放俘虜、醫治敵方傷兵兩事。敵方士兵及營、連、排長俘虜過來，對他們做過一番宣傳後，分別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給川資路費釋放，這種具體的宣傳把敵人『共匪見人就殺』的宣傳，立即打破；於是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稱歎。紅軍士兵們對於所捉俘虜的歡迎與撫慰，真是熱烈到十分，在每回『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亦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亦很大。聰明的敵人（如李文彬）近亦仿效我們的辦法，不殺我們的俘虜，醫治我們的傷兵。不過我們的俘虜或傷兵過敵方之後，再作戰

時，依然把槍拖了回來，這樣的事實有兩回。邊界敵人俘虜紅軍極少，因紅軍在邊界打敗仗次數少。此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亦盡力做了，每到一處，牆壁上寫滿了我們的口號。惟缺乏繪畫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及兩省委送幾個來。

(二五) 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之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里。四週從拿山起經過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龍（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州、草坪、白泥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及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惟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滿萬石，軍糧全靠寧、永、遂三縣輸去。山上要隘，都築了堅固工事。紅軍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其上。現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糧食與現款，最要的是現款），敵人是打不進的。管理防務有防務委員會，王佐為主任。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邊界之九龍，重要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最後根據地，亦築了工事。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赤色割據，山險的軍事根據地是不可少的。因為四圍都是敵人，防禦要向四面防禦，非藉自然的山險以補助人力偶然的不足（如敵人最大最危急時），欲求在資產階級政權穩定的時候，赤色割據之長期存在，是很困難的。

乙 土地問題

(一) 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裏，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

裏。分別來說，贛邊以遂川爲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除萬安情形此間無直接調查外，寧岡、蓮花兩縣土地雖說是自耕農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佔比較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與四十之比。湘邊茶、酃兩縣相差不遠，約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二)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但農村中略分爲三種階級：即大、中地主的豪紳階級，小地主，自耕農的中間階級。此外爲貧農階級。中間階級中，自耕農部份往往與小地主部份利害聯合在一起，自耕農部份在土地總額中佔少數，但與小地主部份之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都差不多。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澈底分配政策；故在赤色政權區域，豪紳階級與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却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懷着陰謀，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造謠恐嚇貧農，延長分田的時間。上級政權把他們壓迫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的被摧殘及革命勝利的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欺騙，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示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待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殺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於是田才實際分下去。但無論那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形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家族組織的農村中，作怪得厲害的，不在大的豪紳，而在中間階級，這是最大問題。

(三)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之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

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寧岡革命農民的房子，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自耕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表示得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九月）、新城、古城、贛市一帶，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共產黨將得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後，才有一些農民慢慢的跑回來。

（四）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爲。當李唐戰爭向湖南發展時，茶陵的小地主向農民求和，有送豬肉給農民過年的（這時紅軍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戰爭結束，就不見有這等事了。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

（五）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赤色割據與白色對抗，成爲兩個敵國，因爲敵人的嚴密封鎖與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過分處理這兩個原因，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疋、藥材三項日常必需品之缺乏與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尙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這個經濟問題，十分嚴重。中國豪紳軍閥之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之赤色割據，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窘迫，割據之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爲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農階級及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疋、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因不是最高潮，鹽已有賣，但極貴；布疋、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最大出產之木材與茶油，仍然運不出去；現金缺乏異常，捉來的土豪若不送錢來便無錢用。所

以問題非常之大。

(六) 土地分配的標準：區域以鄉爲分配單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區，以三、四鄉爲一個單位去分配的亦有，但極少；人的標準，則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現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爲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

(七) 向自耕農讓步問題：尙未詳細討論。自耕農中之富農，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產力爲標準，即人工和資本（農具等）多的多分田。富農覺得平均分與按勞動力分兩種都於他們不利。他們的意思，在人工他們願意多量的努力，此外還要加上資本的力量，他們可以多得收穫。若照普通人一樣分了，蔑視了（閒置了）他們的特別努力和多餘的資本，他們是不願意的。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但此問題，仍當討論，候得結論再行報告。一面請中央及兩省委將蘇俄對待富農辦法（具體辦法，不單是政策大綱），民主革命時代，特別是白色政權中間的蘇維埃政權區域曾採何種辦法，迅速指示我們。至於自耕農土地不沒收問題，邊界割據區域內已經全部沒收了的，當然不再發生。在擴張新地盤時，初期當採取不沒收政策，使自耕農力量能贊助貧農，打擊豪紳。

(八) 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業在抽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政府及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去打土豪。至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丙 蘇維埃問題

(一) 邊界縣、區、鄉各縣蘇維埃：各級蘇維埃是普遍的組織了，但是名不符實。工農群眾乃至

黨員，多數還沒有認識蘇維埃意義。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大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之一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智識份子或投機份子的操縱：這是不懂得什麼叫做蘇維埃，不懂得工農兵代表是固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只是代表會定期會議閉幕時候的一個處理各事機關，這是邊界許多地方對於政權機關的最大的錯誤。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一個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於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符其實的蘇維埃組織，並不是沒有，却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太缺乏對於蘇維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但貪便利，不歡喜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之應用於群眾組織，一定要在革命鬥爭中顯出了他們的效力，使群眾了解這種組織方法最能發動群眾力量，是最利於鬭爭的，方能普遍的真實的建立起來。正在制定詳細的各級蘇維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士兵蘇維埃（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的建立，糾正從前只有經常的士兵委員會而無經常的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二）各級執行委員會：現在民衆普遍知道了各級『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寧岡民衆簡稱爲『埃政府』的（客籍土話我們稱埃，埃政府就是『我們的政府』），別的地方簡稱爲『蘇政府』，其實仍是指委員會，因爲他們尙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爲委員會才是真正權力，這一種不是普遍的。沒有代表大會，或沒有健全的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經濟的濫用與貪污，對白色勢力之畏避，或鬭爭不堅決，就到處發現出來。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亦少開會，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決（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委員中亦用得不得

習慣。

(三) 小資產階級份子把持政府委員會：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及智識份子爭着要幹，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鬭爭中破壞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切實的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是全體，但是在很多的地方發現了的。

(四) 黨與政權機關的關係：雖然沒有黨命令政權機關的事，却亦沒有尊重政權機關獨立的意思。黨在黨員乃至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却差得多。這由於，許多事情爲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的做了，政權機關攔置一邊，這種錯誤在各處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黨團組織有些沒有，有些組織了用得不完滿。以後要實行黨做後台老闆；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是必須透過民衆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干政的錯誤是要避免的。

(五) 最高蘇維埃：『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招牌，在五月間就掛起來了。但成立得很倉卒，極不完備。現定改組邊界蘇維埃及其委員會，爲邊界政權最高機關。

丁 邊界黨的現狀

(一) 與機會主義奮鬥經過：馬日事變前後，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說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所以反革命到來時沒有多少堅決的鬭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個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全部破滅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爲重新建立黨的時期。五月以後爲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到處發現，一部份黨員無鬭爭決心，變成打埋伏主義（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份黨員富有積極性，却又變成唯心的暴動主義，都是小資產

階級意識的結果。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事實訓練與黨內奮鬥，才逐漸減少。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蠢動，亦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種拚一下主義與逃跑主義，往往同時存在於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主張。經過了長期間黨內的奮鬥與客觀事實的教訓（如拚一下得到損傷，逃跑得到失敗），才逐漸的改變過來。

（二）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不但是農業經濟，且還在杵臼時代（山地大概都是用杵臼做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的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就是家族會議。這種情形下的『鬭爭的布爾塞維克黨』之建設，真是難得很。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還是不大懂得的。各縣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亦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之改變，主觀的說道理，至多只能說服幾分，多半要靠白色勢力之非地方主義的壓迫（如兩省會剿等），才可以在鬭爭中利害共同上面，逐漸拋棄他們的地方主義。在許多的客觀教訓之中，地方主義逐漸減少了。

（三）土客籍問題：在邊界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本地人的土籍與數百年前殖民來此的廣東、福建籍，兩者之間發生很大的界限，歷史上仇怨非常之深，簡直成了很激烈的『民族』鬭爭。這種客籍從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以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權。前年及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無不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轉變為反革命，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割據區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與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土籍豪紳的政權，而掌握全縣。去年六月，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於

是繼續戰爭，以至於今。這種界限，在道理上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尤不應引到黨內。然在事實上，因多年歷史的遺留，土籍、客籍間的界限依然還有很大痕跡。如八月邊界失敗，土籍豪紳帶領軍隊重回寧岡，大宣傳客籍將殺死土籍，於是土籍農民大部份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軍隊燒屋搜山。及十月十一月紅軍兩度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着逃走，客籍農民又跑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豬牛衣物。這種痕跡，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意見。處置辦法，對群眾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吸引他們脫離豪紳，安心回家（已有許多回來），一面由縣蘇維埃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牛物退還原主，並出佈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一面消滅發生意見的原因，一面加緊教育，務使趨一於致。

（四）投機份子之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份子乘公開徵求機會侵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乃至區委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份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的事，在許多處發生，白色區域黨的組織因而大半塌台。

（五）洗黨與建設秘密組織：九月以後，厲行洗黨，對成份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全部解散，重新登記。永新登記已完，寧岡亦將次就緒。黨員數量大減，戰鬥力反而增加。黨的組織從前倚仗公開的政權，幾全忘秘密的意義。九月以後，進行全部建設秘密組織的工作。同時多方伸入白色區內，求在敵人營壘中能起作用，各地已開始發見效力。惟城市基礎始終沒有，原因一由城市中敵力較大，二則我們對城市太損害了小資產利益，商業蕭條，手工輟業，以致我們無立足之餘地。現在糾正從前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成效尚不多見。

（六）各級指導機關：支部幹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委，區委上為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之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界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鄱

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是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嚴重的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山地工作，因此將縣改爲特區。攸縣、安源均須越過茶陵，曾經派過人去，無功而返。萬安縣委自一月間曾與當時的前委在遂川城開過一次聯席會之後，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間阻，直至九月紅軍一度游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據萬安縣委來信，該縣有九個區委，原有百二十枝槍喪失殆盡，惟現在靖衛團內有我們的組織，我們的同志拿着一部份槍。紅軍游擊部隊一營到萬安縣城附近而還，城內及其他處約定響應，並未實現。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下，現組織一萬安赤衛隊，有槍十枝。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隣接永新，我們割據如此之久，吉安縣委僅與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我們，真是奇怪得很。桂東之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黨的組織，現屬於以龍溪十二洞爲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爲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二十三人，毛澤東爲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到，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議決關於政治問題及邊界黨的任務、組織問題、宣傳問題、土地問題等各案，選舉第二屆特委十九人（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楷、劉天千、圓盤珠、譚思聰、譚兵、李却非、宋亦岳、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五人爲常委，譚震林（工人）爲書記，陳正人（知識份子）爲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爲常委，朱德爲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於前委。前委之成立是十一月六日，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織之，毛澤東爲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及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

會（即上述紅軍大會所選舉的）。前委成立，管理各縣的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之必要，因為前委有時要行動的。黨內無產階級意識領導問題，非常重要。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可以說完全是農民的黨，若不接受都市無產階級的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糾正從前的錯誤，積極注意各縣縣城及鄉間大市鎮的職工運動外，並使在蘇維埃增加工人代表，黨內工人、貧農及士兵份子多量的實際參加地方黨、軍中黨的各級指導機關，實在有十分必要。此點一年來業有注意，地方黨各級機關，工農份子數量已逐漸增加。紅軍中各級機關士兵份子之參加，情形都比較好。惟須使之更增加其數量，而且要注意其質量，使之担任『實際的領導』，逐漸肅清小資產階級意識，以至於淘汰淨盡。

戊 革命性質問題

（一）我們完全同意國際對中國的決議案。中國現時的階段，確實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之完成，是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特權，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與統一，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城市勢力，消滅鄉村封建關係，完成土地革命，推翻豪紳階級變形政治組織的軍閥制度。必定要在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過程當中，方能造成工人政權的真正基礎，以進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一年轉戰各地的經驗，深感全國革命潮流之日益低落，一方面少數小塊地方建設了赤色政權，一方面全國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權，共產黨乃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冷冷清清的，經過宣傳之後，群眾才慢慢的出來。和敵人打仗，不論那一軍都是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是第六軍，也是一個樣。這不算暴動，這只是打江山，這種打江山的辦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如此，是因為完全沒有了全國的革命高潮，全國受着殘酷的豪紳階級的封建統治，廣大力量的被壓迫階級還沒有發動，所

以變成冷冷清清的打江山。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革命之發動與完成，乃是必經的道路。所以國際決議案是十分正確的。

(二) 對小資產政策：邊界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做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到邊界，說我們燒殺過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對城市中等商人之沒收及鄉村小地主富農之勒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過度的政策，把小資產大部驅到豪紳一邊，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特別在遂川收了比較好的效果，縣城及市鎮上小商人不畏避我們，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爲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爲從來所未有，這一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已改變了。一面對豪紳階級封建剝削之推翻（遂川靖衛團收稅很重，黃埭至草林七十里要過五道稅，無論什麼農產都要抽稅），是農民及小商人全體願意的。

(三) 中央要我們發佈包括小資產利益的政策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定一個整個民權革命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及民族解放，並且規定一單口號，使各地有所遵循。

(四) 以農業爲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軍事運動的主要是在敵軍中，至於紅軍的發展，目前還在其次。

己 割據地區問題

粵邊沿湘贛邊界以至鄂南，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比較起來，以寧

岡爲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實最利於我們的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的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則屯置比較大的軍力於瀏、醴、萍、銅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於湘贛兩省的影響小些，不如中段之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總計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2）黨有相當的基礎。（3）有頗富鬪爭經驗的地方武裝，經過一年多的創造才有現在規模，這是十分難得的；加以紅軍第四軍的補助，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冈山，其他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各處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與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就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湘南特委對此間的政策，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送信來，贊成中段政權計劃。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送信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的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謂這是『絕對正確』的政策。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却主張紅軍向湘東去，亦謂是『絕對正確』的政策，而且亦要我們『毫不猶疑』。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認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乃數天之後，却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了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二十九團乃以省委命令爲藉口，把紅軍拉攻郴州，致邊界與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戰鬪力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於往湘東，在湘鄂贛豪紳階級政權尚未破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八月失敗，且可乘程潛第六軍與王鈞戰於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

軍，席捲吉安、安福，前鋒便可達到萍鄉，而與北段之第五軍取得聯絡。然即在這種時候，亦仍以寧岡爲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游擊部隊。因豪紳間戰爭未起，湘邊萍、茶、攸尙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爲所乘。中央謂往湘東往湘南都很危險；湘東雖未實現，湘南則有經驗：一着失錯，滿盤都輸，邊界湘南與平瀏之第五軍，都因失却聯繫而致失敗，安源亦招挫折。這種艱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得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沒有破裂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尙有十餘團之多。若我們於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藉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之敵，均有辦法。爲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八月的蹂躪，立可重來，雖不能完全消滅我們的赤衛隊，黨及群眾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土匪式的山頭割據可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希望是很大的。爲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永、酃、遂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與之作長期的鬭爭，利用有利的戰術，不戰則止，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群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一點疑義沒有的。雖然有此錯着，紅軍則已捲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鬭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捨此而外，再沒有便宜方法。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惹起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嫉惡，却漸漸引起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乃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讚揚我們的宣傳，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及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的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並且邊界紅

旗子之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意義。所以我們對於『以贛南爲退步』的話，非經濟上到了絕路，非往贛南就無法維持時，決不走此一路。萬不得已時也許要往贛南，但完全是爲經濟計而不是政治的意義；政治意義上我們始終認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之創造與擴大這個政策，是十分必要與十分正確的。

庚 交通及其他

(一) 交通機關的建設極其緊要，茲付二百元（金四兩）交袁、蕭兩同志，即由兩同志負設立機關的完全責任。續需經費由此間担負。地點在萍鄉。吉安方面亦須建設一交通機關，由江西省委負責。

(二) 此信差不多寫完，接到中央來信。由湖南來的一份，多了第四十七號通告（秘密組織問題），軍事工作決議案仍沒有。此外有潤仙同志八月十五日信一件，內說以前派交通送中央的信及通告來，均未到，詩三首亦不見。

(三) 我們已能隨時得到報紙，比之以前二三個月得不到報紙高興多了，惟仍望你們隨時將政治情況分析見告。

(四) 杜修經的錯誤，經八月南征部隊到桂東沙田時開的代表大會議決，請求省委給以處罰，因他是省委代表。

(五) 毛澤東八月寫給省委並轉中央的長信，前委完全同意，仍由袁同志帶上。

(六) 袁德生同志因等候對中央來信的討論及答覆，現在才回省委。

(七) 以後兄處對此間的指示，務請參考我們的報告，切不宜單依據巡視員的片面報告。六月巡

視員杜修經對省委的報告，觀點完全錯誤（如赤衛隊加二百槍足以保衛邊界割據，紅軍當時是保守主義等），省委即依據此等報告決定行動，所以失敗。又兄處以後對於此間軍事行動的指示，千萬不要太硬性。中央來信要我們依環境自加決擇，有回翔餘地，最爲妥當。至於去冬今春的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聽信此間開除了黨籍的犯罪逃兵蘇先駿（團長、後告密捕郭亮者）、何傑（參謀長，後郴州燒殺的負責者）的造謠，更是危險。以後任何不負責任的話，務請勿聽。

（八）楊開明重病，宛希先在此間有重要工作，不能來湘東。

（九）青年團的狀況，由團的特委報告省委，此處不贅。

（一〇）此信寫三份，一份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份由湖南省委轉江西省委，一份由吉安縣委轉交江西省委轉中央，必有一份可以送到。

前敵委員會 書記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 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閩西古田會議——

編者按：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同志寫的中國共產黨建軍與建黨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其立場方法與基本內容至今仍完全適用：這個決議案的第一部份指出當時紅軍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偏向，也即是軍閥主義偏向與小資產階級偏向的各種表現，不但對當時紅軍是根本問題，對今天的八路軍新四軍也是根本問題。我們的軍隊是爲人民而存在的，故當時規定紅軍三大任務爲「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這個文件對紅軍做群眾工作的觀點是十分強調的，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也仍是三大任務，只是「籌款」發展爲「生產」。這個文件關於廢止肉刑（不打人）與軍隊宣傳教育工作的決定，也很值得今天的重視。總之，由於我們的軍隊是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份子爲基礎的，是處於長期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與舊僱傭軍隊及反革命敵人包圍中間的，反革命敵人、漢奸特務、舊軍官、俘虜成份、流氓無產者、舊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其各種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因素，不斷從外部內部侵襲我們，因此要使得我們的軍隊真正以無產階級思想爲領導而成爲完全屬於人民群眾的軍隊，就必須進行經常的反偏向鬥爭，現在我們的

軍隊是人民所擁護的全國最好的軍隊，比一九二九年時是有了極大的進步，但近年在軍隊和黨政關係、軍隊與人民關係、官長與士兵關係、下級與上級關係、軍事幹部與政治工作幹部關係、軍隊與軍隊關係等方面，都還有一些缺點，這些缺點主要地是帶有脫離群眾的軍閥主義偏向，需要我們的軍事工作幹部與政治工作幹部在整風運動與擁政愛民運動中加以深切的檢討與糾正，而這個文件却是處處從群眾出發，處處為人民群眾與士兵群眾而着想的，因此，正是在這一點上供給了一件有力的武器。我們軍隊的政治教育，許多年來沒有宣傳這個文件，在宣傳時又沒有用以展開自我批評，以至重犯了為這個文件所早已解決了的錯誤，這是一個損失。現在中央決定把這個文件規定為軍隊幹部的整風文件與全軍的教材。

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 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

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非常之濃厚，對於黨的正確路線之執行，給了極大的妨礙，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廣大革命鬥爭加於四軍的任務，是決然擔負不來的。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傾向的總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最大部份是建築於農民及其他小資產成份之上；然黨的指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傾向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正確路線的教育，亦是使這些不正確傾向存在和發展的重大原因。大會站在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之上，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的來源、表現，及其糾正方法，號召同志起來徹底的加以肅清。

一 單純軍事觀點

甲 單純軍事觀點的來源：

(一) 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政治的領導，不認識紅軍的任務與白軍的根本不同點。
(二) 僱傭軍隊觀念的殘餘。特別因歷次作戰俘虜兵甚多，此種份子加入紅軍，帶來了濃厚的僱傭軍隊觀念，使單純軍事觀點在下層有了基礎。

(三) 因有以上二個原因，便發生出第三個原因，就是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群眾力量。
(四) 黨對於軍事工作沒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也是形成一部份同志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原因。

乙 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份同志中非常發展，其表現如：

(一) 承認軍事政治二者的對立，不承認軍事只是達到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而承認軍事是政治的領導了。

(二) 以爲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彷彿，只是單純的打仗的。不知道紅軍的任務在意義上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在工作上特別是中國現在的工作，它決不僅是單純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設政權等重大任務。紅軍之打仗，不是爲打仗而打仗，完全是爲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設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政權等目標，就是完全失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三) 因此在組織上把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路線發

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壟斷政權，離開階級地位的危險，如國民黨軍隊所走的道路一樣。

(四) 同時在宣傳上，忽視宣傳隊工作的重要任務，在群眾組織上，忽視士兵會的組織及工農群眾的組織，結果，宣傳與組織工作都成了取消的現象。

(五) 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

(六) 四軍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為基本隊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是紅軍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些的小團體主義。

(七) 有少數同志囿於四軍局部環境，以為除此以外就沒有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鬭爭的觀念非常濃厚，這乃是機會主義的殘餘。

(八) 不顧主客觀條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幹，滿腦筋充滿着唯心的幻想，這又是盲動主義的殘餘。

丙 糾正的方法：

(一) 從教育上提高黨內政治水平，肅清軍事觀點的理論根源。同時還要肅清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殘餘，打破四軍本位主義。

(二) 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特別對俘虜成份的入伍期教育要加緊，同時盡其可能由地方政權機關選派有鬭爭經驗的工農份子，加入紅軍，從組織上削弱以至去掉單純軍事觀點的來源。

(三) 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及群眾政權機關（蘇維埃）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黨及紅軍官兵。

(四) 黨對於軍事工作部份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下再經過群

衆路線去執行。

(五) 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係，紅軍與群衆的關係，士兵會的權能及其與軍事政治機關的關係。

二 極端民主化

甲 紅軍黨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確實減少許多，如黨的決議之比較的能力執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口號之沒有人說了，都是事實。但在實際上這種減少的現象，只是表面的減少罷了，決不是在一般黨員的觀念裏頭根本肅清了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毒根還深中在許多同志的心中，如決議案之執行，種種表示勉強的態度，就是證據之一。

乙 糾正的方法：

第一，是從理論上掃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鬭爭之責任，由此必然走到革命的失敗，同時亦就是幫助了統治階級反革命壽命的延長。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小農生產及城市小資本）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傳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鬭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客觀上實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種，具有這種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糾正而任其發展下去，必然的要走上反革命道路。

第二，是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

- (一) 黨的指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 (二) 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情況，及群眾生活情況，成爲正確指導的社會來源。
- (三) 黨的各級機關決議事情，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便須堅決執行。
- (四) 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及黨員群眾，其方法就是開活動份子會，或支部以至縱隊的黨員大會（須查看環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報告。
- (五) 黨的下級機關及黨員群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澈底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

三 非組織意識

四軍黨內非組織意識，表現在各方面的很多，最顯著的有如下列三種：

甲 非少數服從多數：

如提議被否決，表現非常地嘔氣及不誠意執行黨的決議案，都是這一種的例子。

糾正的方法：

(一) 會議上要使到會人盡量發表意見，明瞭對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下去。一次不能解決，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爲條件），期於得到明晰的結論。

(二) 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意見在黨的第一次會議失敗之後，後一次會議未開之前，必須擁護多數的決議，除在後一次會議得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乙 非組織的批評：

(一) 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但紅軍黨內的批評很多不明白這種意義，而誤用了去攻擊個人，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而且毀壞了黨的組織，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意識的表現。糾正的方法，在於使黨員明白批評的意義，是增加黨的戰鬥力以達到階級鬥爭的勝利，而完全不能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

(二) 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批評，這是因為沒有建設黨的組織的政治意義於一般黨員的觀念之中，因此不懂得黨的組織（會議等）的重要，以為批評在組織內組織外沒有什麼分別的原故。這種結果亦足引導黨走上毀壞的道路。糾正的方法，就是建設黨的組織的政治意義於一般黨員的觀念之內，這樣方能從根本上肅清一切不負責任的給群眾以壞影響的非組織的批評。

丙 一部份黨員特殊化：

藉口事情忙，實際是不願意接近群眾，又怕群眾批評，因此不到支部大會及小組會，到會亦不工作報告，種種異於一般黨員，其結果脫離群眾脫離黨。在此事件上，支部負責人不但糾正這種現象，反有怕了這些特殊黨員的表現。

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第一、紅軍歷來有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黨的機關很少注意軍事工作的討論，因而也沒有督促軍事負責同志，於黨的會議中，經常的提出關於軍事的計劃（如訓練計劃、管理計劃、作戰計劃等）及報告。結果黨的討論離開了軍事，軍事負責同志也忘記了應該受黨指導和對黨作報告，致使紅軍的軍事工作成爲一種黨的機關和一般黨員所不明瞭的特殊部份。這樣，不僅對黨員軍事化這個任務大有妨礙，而且使黨與軍事分離，有成爲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第二、因爲有上述黨的任務上的重大錯誤，致使一部份負軍事責任的同志成爲黨內的特殊部份。同時負其他工作責任的同志，對於支部會議也有許多不愛到會及到會不說話的特殊化了的人。這樣就是使紅軍黨的支部生活

所以成爲現在這樣偏畸的不健全的一個原因。

糾正的方法：第一、黨的各級會議（從支部到前委）均須將軍事工作計劃及報告列於議事日程，加以討論和決定。第二、不論擔負什麼工作的黨員均須出席支部大會及小組會，並做工作報告，不得無故不到。

四 絕對平均主義

甲 紅軍中絕對平均主義，曾經有一時期發展得很厲害，經過許多奮鬥，確實減少了好些，但還有許多渣滓殘存着。如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爲工作需要，而認爲不平等制度；分東西要求極端平均，不願意有特別情形的部份多分去一點；背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只要平均背；分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打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爲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願大家抬不成，不願一個人抬了去。以上這些例子，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絕對平均主義並沒有從群眾的頭腦裏頭根本的去掉，所謂去掉了些，只是部份的或形式的罷了。

乙 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實在是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都是手工業小農經濟的產品，不過一則見之於政治方面，一則見之於物質方面罷了。

丙 糾正的方法：在理論上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時期，物質的分配亦當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決然無所謂絕對平均。在紅軍內物質的分配，應該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餉平均等，因爲這是現時環境中紅軍

鬭爭的需要。但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因為這不是鬭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鬭爭有妨礙的。

五 唯心觀念

甲 唯心觀念，在紅軍黨員中非常之濃厚。其結果對政治分析，對工作指導，對黨的組織，都有非常之大的妨礙。因為政治上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於黨內唯心的批評精神，不要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其結果，往往釀成黨內無原則無意義的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於黨內批評問題，除開唯心的批評精神之外，還有應該要說及的，就是非政治的批評精神。批評的任務，不明白最大的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其次才是指出組織上的錯誤，至於個人生活缺點及小的技術方面，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及組織的錯誤有密切的聯系，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技術的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尋常技術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必然要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最大的危險，紅軍黨內技術的非政治的批評精神，是和唯心的非科學的批評精神一樣，必然要得到（而且已經得到）它的最壞的結果。

乙 糾正的方法：唯一的是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1）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2）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鬭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了實際調查，便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3）黨內批評要肅清唯心的和技術的精神，說話要有證

據，討論工作要注意它的政治意義。

六 個人主義

甲 紅軍黨內表現個人主義的有以下各種：

(一) 報復主義 在黨內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黨外找機會報復他，打罵就是報復的手段，這種例子很多。還有在黨內亦尋報復，你在這次會議說了我，我就在下次會議找岔子報復你，這種例子亦不少。這種報復主義，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不知有階級利益，亦不知有整個黨的生活，只知有自己個人。它的目標不在敵人階級，而在自己隊伍裏別的個人。這是很能削弱組織削弱戰鬥力的一副銷蝕劑。

(二) 小團體主義 表面上是個人主義的放大，骨子裏依然是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它同樣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紅軍中歷來小團體風氣很盛，奮鬥的結果消滅了許多，但殘餘是依然存在的，還須加上奮鬥的努力。

(三) 僱傭觀念 不認識黨和紅軍，都是執行階級任務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不認識自己是鬭爭的主體，而認鬭爭於自己無與，自己是僅僅對紅軍長官或黨部機關負責任，而不是對革命負責任。這種僱傭革命的觀念，在紅軍中頗為發展，這是無條件努力積極活動份子所以不多的原因。僱傭觀念不肅清，積極活動份子便無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終在少數人肩背上，這是於鬭爭大不利的。

(四) 享樂主義 個人主義之見於享樂主義方面的，在紅軍中亦有一個不小的部份。他們經常的希望是隊伍要開向大城市，他們之要到大城市不是爲了工作，而是爲了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就是在

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工作。享樂主義的結果就是只顧個人利益，不顧整個革命，不顧團體行動。

(五)消極怠工 稍不遂意，就消極起來，怠工起來。消極怠工之由來，固然根本上是出於個人主義，由於他沒有真確認識自己的階級任務；但尚有黨及軍中處置事件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不適當的客觀原因。

(六)離隊觀念 紅軍中工作的人要求脫離隊伍調地方工作的與日俱增。其原因亦不完全是主觀的個人主義，尚有(1)紅軍物質生活過差；(2)長期鬭爭，感覺疲勞；(3)處置事件，分配工作，或紀律執行不適當等客觀環境的原因。

乙 個人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農思想一直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到黨內。糾正的方法，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再則處置事件，分配工作，執行紀律要得當。並要設法改善紅軍的物質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時機休息整理，以改善客觀條件。

七 流寇思想

甲 紅軍中流寇思想的來源，在於：(1)紅軍中游民無產階級佔大多數，這是近的原因；

(2)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游民大群眾之存在，這是遠的原因。由於遠近兩個原因，就產生了四軍中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和行動主張。但是黃巢李闖洪秀全式的大規模流寇行動，為帝國主義統治着的中國，特別是進步武器（手榴彈、鋼砲、機關槍等），進步通信方法（軍用電話及無線電）和進步運輸方法（汽車輪船鐵路），已經輸入了的現時代的中國所不許可，因此流寇思想自然不會成為紅軍行動上的最後有力的主張。但是它的影響表現在各方面的仍是很大，如(1)不願堅苦耐勞的幫助群眾建

設政權，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2）擴大紅軍的組織路線，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以至於擴大非地方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軍買馬』『招降納叛』去擴大紅軍的路線；（3）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主義的表現，妨礙革命加於紅軍的巨大任務之執行非常厲害，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鬥爭一個重要目標。

乙 糾正的方法：

- （一）從教育上去變更黨內基於游民成份的不正確思想，以肅清流寇主義。
- （二）現有紅軍基本隊伍及以後新來俘虜兵，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
- （三）引導有鬥爭經驗的工農積極份子加進現有紅軍隊伍，改變它的成份。
- （四）從鬥爭的工農群眾中創造出新的軍隊。

八 盲動主義殘餘

甲 紅軍黨內對盲動主義的鬥爭，已經盡了頗大的努力，但不能說已經充分；因此紅軍中盲動主義的思想和行動雖已經克服了許多，但尚存留着一些殘餘。盲動主義的來源，是由於流氓無產階級意識與小資產階級意識匯合所構成。它的表現如：1 不顧主客觀條件的盲幹；2 城市政策之執行不充分不堅決；3 軍紀鬆懈，特別是打敗仗時；4 不要群眾基礎的燒屋行為，各部隊都還有一部份存在；5 槍斃逃兵制度和肉刑制度，亦有某些成份是出於盲動主義的。

乙 糾正的方法：

(一) 從理論上肅清盲動主義。

(二) 制度上政策上，糾正盲動的行為。

二 黨的組織問題

紅軍黨的組織問題，現在到了非常之嚴重的時期，特別是黨員的質量之差和組織之鬆懈，影響到紅軍的領導與政策之執行非常之大。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特作詳細的分析與決定。同志們應站在大會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黨的組織，務使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才算得到成功。

一 黨的組織路線

甲 黨員發展的路線，以戰鬪兵爲主要對象。同時，對非戰鬪兵如伙子勤務兵等，亦不應忽視。

乙 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在黨員數量過少的部隊，事實上不能每班建立一個小組時，則暫以排爲單位建設小組，而把組員有計劃的分配到各班，但須明白這是過渡方法。

丙 紅軍原有的小組編制法，即幹部份子與一般份子，知識份子與勞動份子的混合編制法，是很對的。但還缺乏有計劃的將各種工作不同能力不同份子很好的混合編制起來，以後此點要多加注意。至於單純地把幹部份子編成小組，那是要不得的。

二 黨的組織鬆懈問題

甲 四軍黨的組織現狀：

(一) 黨員加入太隨便，許多不夠黨員資格的也拉了進來，特別是官長，不要任何條件，一概拉進。因此黨的質量就弄得很差了。

(二) 各級黨部的工作做到了解決問題，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個任務。關於訓練性質的會議，如活動份子大會，書宣組聯席會，委組聯席會，支部大會，縱隊或支隊黨員大會等非常開得少。

(三) 一般的紀律鬆懈。特別在負擔重要工作沒有人代替他的情況，對他所犯錯誤，往往敷衍下去，不執行紀律。對一人如此，對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紀律一般的放鬆了。

(四) 所有官長既都成了黨員，結果所有軍事政治機關的工作人，便很少注意他的社會職業的工作了，都以爲社會職業的工作就是黨的工作，兩者分不開來。如各級軍事工作會議，各級政治工作會議幾乎完全沒有，一切都以爲黨決定了就完事了，黨員在社會職業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簡直不談起了。

(五) 上下級的關係不密切。下級的報告，上級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級會議上級少有派人出席。這固然是因爲上級機關組織不健全，但上級機關工作態度不積極，也是對下級指導缺乏或指導不詳盡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對於指導實際工作，如一個部隊出發游擊的工作指導等，一般的缺乏詳盡。還有某幾個部隊，幾乎連粗略的指導都沒有。

(六) 支部大會及小組會，有許多沒有按時開。

乙 糾正的路線：

(一) 舊的基礎厲行洗除。如政治觀念錯誤，吸食鴉片，發洋財及賭博等，屢戒不改的，不論幹部及非幹部，一律清洗出黨。

(二) 以後新份子入黨條件：

- 1 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包括階級覺悟）；
- 2 忠實；
- 3 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
- 4 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 5 不吃鴉片，不賭博。

以上五個條件完備的人，才能够介紹他入黨。介紹人事先要審查被介紹人是否確實具備上列條件。經過必須的介紹手續。介紹入黨後，要詳細告訴新黨員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黨員應遵守的要點。介紹人對所介紹人應負相當責任。支委要派人對將入黨的人談話，考查是否具備入黨條件。

(三) 各級黨部不單是解決問題和指導實際工作的，他還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務。各種訓練同志的會議，及其他訓練辦法如訓練班、討論會等，都要有計劃的舉行起來。

(四) 嚴格的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

(五) 分清黨員社會職業與黨的工作的性質，每個黨員（除開黨內負了重要或專門任務的人是為革命職業家外），必須擔負一件社會職業，同時即在他的社會職業中擔負黨給他的工作。

(六) 各級黨部的工作態度，應該比較從前更積極起來，下級對上級要有詳盡的報告，上級對於

這些報告要有詳盡的討論和答覆，並盡可能派人出席下級會議，不能藉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時間不夠，來掩護自己的不積極，而把這些工作疏忽起來。

(七) 支委會及支委以上各級黨部，應該有計劃的每月規定支部大會及小組會討論的材料，並規定會期，嚴密的督促開會。

三 怎樣使黨員到會有興趣

甲 黨員到會少興趣的原因：

(一) 不明白會議的意義。支部會議的重要意義第一是解決問題。一切鬭爭的問題，內部的問題，都要在會議上集中討論去解決它。若不到會或到會不積極發表意見，就是他不了解會議的政治意義，就是他對鬭爭沒有興趣，凡是對鬭爭積極的人，他一定是熱心到會，熱心發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會議不僅解決了問題，而且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要考察問題的環境，要參考上級的指示，這樣就發動了同志們的心思才力，由會議的政治化與實際化，同志們每個的頭腦也都政治化實際化了。每個同志都政治化實際化，黨的戰鬥力就強大起來了。這就是會議的教育意義。紅軍黨員因為不明白這些意義，所以成為不愛到會或到會少興趣的第一個原因。

(二) 決議案決議了不執行，或對上級請求事項很久得不到答覆，因此減少討論的興趣。

(三) 負責人事前沒有好的準備。不準備議事日程，對問題的內容及環境不明瞭，問題應怎樣解決也沒有準備一點意見。

(四) 主席輕易停止黨員發言，發言偶出題外，便馬上禁止他，他便挫興不做聲了。如發言有錯

誤，除停止外還譏笑他。

(五)封建式的會場秩序，死板無活氣，到會如坐獄。

乙 糾正的方法：

第一、會議要政治化實際化。第二、要把會議的重大意義時常對同志提醒，尤其是新黨員及工作不積極的黨員。第三、決議不要輕易，一成決議，就要堅決執行。第四、上級機關要勤快答覆下級的問題，不要拖延太長，失了熱氣。第五、負責人事先要準備議事日程，議事日程要具體化；對問題的內容和環境先要調查清楚，並對於怎樣解決先要想一想。第六、主席指導會議要採用很好的技術，要引導群眾的討論潮流奔赴到某一問題；但有重要意義的超出題外的發展，不但不要大殺風景地去遏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這一發展的要點，介紹給大眾，成立新的議題。這樣會議才有生趣，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同時會議也才真正實現了教育的意義。第七、廢止封建的會場秩序。共產黨的會場是要反映無產階級之積極活潑的爽快的精神，把這些做成秩序。

四 紅軍黨內青年組織及其工作

(一)部隊中青年利益與成年利益不能劃分，團沒有特殊的工作對象。又黨的小組以班為單位建設方才有利鬭爭。因此黨的支部裏頭無設立團的小組的必要。

(二)黨員中青年部份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緒，除一般的接受黨的訓練外，還有特別受一種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爭取青年工農群眾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須有專門組織去擔任這種工作。因此，應在支部中劃出年在二十歲以下的青年黨員（有特別情形如擔任黨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會

議。這種會議，除以大隊爲單位經常有計劃的召集開會外，支隊及縱隊亦各應酌定時間，召集開會。

(三) 爲計劃對青年黨員的教育，計劃爭取青年工農群眾的方法，並指導青年工作會議，前委及縱委裏頭各設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員會，支隊委及支委則各設一個青年委員，在各級黨部的指導之下從事工作。

五 政治委員與黨內工作關係

大隊支隊兩級黨部的書記，以不兼政治委員爲原則。但在工作人員缺乏的部隊，仍可暫時兼充。沒有擔任黨的書記責任的政治委員，上級黨部應察看情形，在條件適合的環境之下，得委爲黨的特派員，有指導該級黨的工作的任務。

六 直屬隊最高黨部問題

軍及各縱隊的直屬隊，均組織直屬隊委爲最高黨部，委員人數五人至七人。

七 士兵會黨團問題

大隊士兵會不設黨團，工作由支委指導。縱隊士兵會要設黨團，此黨團受縱委指導。

三 黨內教育問題

一 意義

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爲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爲了鬭爭任務之能够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不提高黨內政治水平，不肅清黨內各種偏向，便決然不能健全並擴大紅軍，更不能担负重大的鬭爭任務。因此，有計劃的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大會規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黨員，黨的指導機關要有更詳細的討論，去執行這一任務。

二 材料

- 一 政治分析；
- 二 上級指導機關的通告討論；
- 三 組織常識；
- 四 紅軍黨內八個錯誤思想的糾正；
- 五 反機會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問題的討論；

六 群衆工作的策略和技術；
 七 游擊區域社會經濟的調查研究；
 八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
 九 社會經濟科學的研究；
 十 革命的目前階段和它的前途問題。
 以上十項，除一部份（如社會經濟科學的研究）事實上限於適用在幹部份子外，其餘都適用於一般黨員。

三 方法

- 一 黨報；
- 二 政治簡報；
- 三 編輯各種教育同志的小冊子；
- 四 訓練班；
- 五 有組織的分配看書；
- 六 對不識字黨員讀書報；
- 七 個別談話；
- 八 批評；
- 九 小組會；

- 一〇 支部會大；
- 一一 支部委組聯席會；
- 一二 縱隊爲單位組長以上活動份子大會；
- 一三 全軍支書以上活動份子大會；
- 一四 縱隊爲單位黨員大會；
- 一五 縱隊爲單位各級書、宣、組聯席會議；
- 一六 全軍支隊以上書、宣、組聯席會議；
- 一七 政治討論會；
- 一八 適當地分配黨員參加實際工作。

四 紅軍宣傳工作問題

一 紅軍宣傳工作的意義

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之實現，才可以達到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就等於幫助統治階級

剝削紅軍的勢力。

二 紅軍宣傳工作的現狀

甲 宣傳內容的缺點：

- (一) 沒有發佈具體的政綱（從前發佈的政綱如四言佈告等，均不具體）；
- (二) 忽略群眾日常鬭爭的宣傳與鼓動；
- (三) 忽略城市貧民之取得；
- (四) 忽略對婦女群眾的宣傳；
- (五) 對青年群眾的宣傳不充分；
- (六) 對流氓無產階級的宣傳不充分；
- (七) 極少破壞地主階級武裝組織（民團靖衛團等）的宣傳；
- (八) 宣傳沒有時間性地方性。

乙 宣傳技術的缺點：

- (一) 宣傳隊不健全。

1 宣傳員由每大隊五個縮小到三個，有些只有一兩個，有些只有一個，有少數部隊連一個都沒有。

2 宣傳員成份太差，俘虜兵也有，伙伕馬伕也有，吃鴉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裝塞進宣傳隊去的也有，當司書當不成器便送入宣傳隊去的也有，因殘廢了別的工作機關不要塞進宣傳

隊去的也有，現在的宣傳隊簡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執行它的任務了。

3 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傳隊（同時也是因為宣傳員成份太差，工作成績少，引起一般人對它的不滿），『閒雜人』『賣假膏藥的』，就是一般人送給宣傳員們的稱號。

4 宣傳隊沒有够用的宣傳費。

5 對宣傳員的訓練沒有計劃，同時對他們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傳隊的工作簡直隨隨便便，做一點不做一點都沒有人理它。

（二）傳單、佈告、宣言等，陳舊不新鮮。同時散發和郵寄都不得法。

（三）壁報出得很少，政治簡報內容太簡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四）革命歌謠簡直沒有。

（五）畫報只出了幾張。

（六）化裝宣傳完全沒有。

（七）含有士兵娛樂和接近工農群眾兩個意義的俱樂部，沒有辦起來。

（八）口頭宣傳，又少又糟。

（九）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現在的紀律比前鬆懈了，因此給了群眾以不好的影響。

（一〇）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談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都是紅軍宣傳工作的一種，現在也做得不充分。

（一一）群眾大會很少開，又開得不好。

（一二）對白軍士兵的宣傳方法不好。

三 糾正的路線

甲 宣傳內容方面：

(一) 發佈一個具體的政綱，名曰紅軍政綱。

(二) 宣傳要切合群眾的鬭爭情緒，除一般的發佈暴動口號外，還要有適合群眾鬭爭情緒向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號，以發動日常鬭爭，去聯系着那些暴動口號。

(三) 城市貧民（中小商人與學生）是民權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相當的力量，忽視了這個力量之爭取，就無異把這個力量送給豪紳資產階級。以後對城市中小商人及學生群眾，要有深入的宣傳工作去取得他們。

(四) 婦女佔人口的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以後對婦女要有切實的口號，做普遍的宣傳。

(五) 勞苦青年群眾佔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鬭爭中他們又是最勇敢最堅決的。因此對取得青年群眾的宣傳，是整個宣傳任務中的一個重要任務。

(六) 中國廣大的游民群眾，若站在革命階級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動階級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從反動階級影響之下奪取游民群眾，是黨的宣傳任務之一。執行宣傳工作時，須注意各部份游民生活與性質之不同，分別的對他們宣傳。

(七) 地主階級武裝組織之破壞及其群眾之爭取，是農村中土地革命勝利條件之一，以後關於對民團靖衛團等團丁群眾的宣傳工作，特別要注意。

(八)到一個地方，要有適合那個地方的宣傳口號和鼓動口號。又有依照不同的時間（如秋收與年關、蔣桂戰爭時期與汪蔣戰爭時期）製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

乙 宣傳技術方面：

(一)宣傳隊問題

1 意義：

紅軍的宣傳隊，是紅軍宣傳工作重要的工具，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個大的部份。因此關於宣傳隊的整理訓練問題，是目前黨要加緊努力的工作之一。這個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從理論上糾正官兵中一般對宣傳工作及宣傳隊輕視的觀點，『閒雜人』『賣假膏藥的』等等奇怪的稱呼，應該從此取消掉。

2 組織：

子 以支隊為單位，軍及縱隊直屬隊均各成一單位，每單位組織一個中隊，隊長隊副各一人，宣傳員十六人，挑佚一人（挑宣傳品），公差二人。每個中隊的宣傳員分為若干分隊（按照大隊或其他部隊與機關的數目，定出分隊的多少），每個分隊有分隊長一人，宣傳員三人。

丑 各支隊宣傳隊，受支隊政治委員指揮。各大隊分開游擊時，每大隊應派去一個宣傳分隊隨同工作，受大隊政治委員指揮。直屬隊宣傳隊，受政治部宣傳科長指揮。全縱隊各宣傳隊，受縱隊政治部宣傳科指揮，全軍宣傳隊，受軍政治部宣傳科指揮。

寅 宣傳隊用費，由政治部發給，須使之够用。

卯 改造宣傳員成份的方法，除請地方政府選派進步份子參加紅軍宣傳隊之外，從各部隊士兵中挑選優秀份子（儘可能不調班長）為宣傳員。政治部應經常的作出訓練宣傳隊的計劃，規定訓練的材

料、方法、時間、教授人等，積極的改進宣傳員的質量。

(二) 傳單、佈告、宣言等宣傳文件，舊的應加以審查，新的應從速起草。

宣傳品分佈的適當有效，應是宣傳隊技術問題的重要一項。郵寄宣傳品從郵件中夾帶宣傳品，或在郵件上印上宣傳鼓動口號，政治工作機關應該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三) 壁報為對群眾宣傳的重要方法之一。軍及縱隊各為一單位辦一壁報，由政治部宣傳科負責，名字均叫做『時事簡報』。內容是：一、國際國內政治消息；二、游擊地區群眾鬭爭情形；三、紅軍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張，一概用大張紙寫，不用油印。每次盡量多寫幾張。政治簡報的編印，應注意下列各項：1 要快；2 內容要豐富一點；3 字要稍大點要清楚點。

(四) 各政治部負責，徵集並編製表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軍政治部編製委員會負督促及調查之責。

(五) 軍政治部宣傳科的藝術股，應該充實起來，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畫報。為了充實軍藝股，應該把全軍繪畫人才集中工作。

(六) 化裝宣傳是一種最具體最有效的宣傳方法，各支隊各直屬隊的宣傳隊均設化裝宣傳股，組織並指揮對群眾的化裝宣傳。

(七) 以大隊為單位在士兵會內建設俱樂部。

(八) 宣傳隊中設口頭宣傳股及文字宣傳股，研究並指揮口頭及文字的宣傳技術。

(九) 嚴格的執行三條紀律。

(一〇) 政治部及宣傳隊，要有計劃有組織的召集各種群眾大會，要預先規定開會秩序、演說人、演說題目及時間。

(一一)對白軍士兵及下級官長的宣傳非常之重要，以後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 宣傳文字要簡短，使他們頃刻間能看完；要精警，使他們一看起來一個印象。

2 除有計劃的在敵人經過道路兩旁多寫切合某現實部隊的標語之外，還要將傳單存儲於沿路黨部及群眾機關手中，候敵軍經過時，巧妙地傳達給他們。

3 從俘虜官兵中及郵件檢查中，調查敵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屬部隊番號，郵寄宣傳品去，或寫信給他們。

4 優待敵方俘虜兵，是對敵軍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優待俘虜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查他們身上的錢和一切物件，過去紅軍士兵搜檢俘虜兵財物的行為，要堅決的廢掉。第二是要以極大的熱情歡迎俘虜兵，使他們感覺到精神上的歡樂，反對給俘虜兵以任何言語上的或行動上的侮辱。第三是給俘虜兵以和老兵一樣的物質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願留的，在經過宣傳之後，發給路費，放他們回去，使他們在白軍中散佈紅軍的影響，反對只貪兵多，把不願留的份子勉強地留下來。以上各項，對於俘虜過來的官長，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適用。

5 醫治敵方傷兵，亦是對敵軍宣傳的極有效方法。對於敵方傷兵的醫治和發錢，要完全和紅軍的傷兵一樣。並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把上好了藥發給了錢的傷兵，送返敵軍。對待敵軍受傷官長亦然。

五 士兵政治訓練問題

一 材料問題

下列各項，應很藝術的編製課本，作對士兵訓練的材料：

- 一 目前政治分析及紅軍之任務與計劃；
- 二 土地革命各方面；
- 三 武裝組織及其戰術；
- 四 三條紀律建設的理由；
- 五 早晚點名口號；
- 六 識字運動；
- 七 怎樣做群眾工作；
- 八 紅軍標語之逐個解釋；
- 九 各種偏向之糾正；
- 一〇 蘇俄紅軍；
- 一一 革命的目前階段和它的前途；
- 一二 紅軍白軍比較；
- 一三 共產黨國民黨比較；

- 一四 革命故事；
- 一五 社會進化故事；
- 一六 衛生；
- 一七 游擊區域的地理及政治經濟常識；
- 一八 革命歌；
- 一九 圖報。

二 方法

甲 上政治課：

(一) 分普通、特別、幹部三班。普通班分兩種形式：一個支隊在一起時，以支隊為單位上課，教授以支隊政治委員為主任，大隊政治委員分擔各課，除戰鬥兵須到課外，傳令兵、勤務兵、長伕、馬伕、伙夫，均須到課。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識。

(二) 特別班以支隊為單位，從各大隊士兵中考選稍識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識者五十名編成。支隊政治委員為主任教授，大隊政治委員分擔各課。特別班之目的，在造成較普通班高一級的政治常識人材，以備將來升當下級幹部之用。

(三) 幹部班以縱隊為單位，軍直屬隊另成一單位，以大隊長、大隊附、中隊長、中隊附、各級軍佐，及其他指定人員編成。目的在提高現有下級幹部的政治水平線，使能領導群眾，以備將來能充當中級幹部。由縱隊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縱隊司令官及其他有適當能力的人擔任教授。

(四) 以支隊爲單位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以支隊各政治委員並軍事長官中能任政治訓練者組織之，以支隊政治委員爲主任。其任務爲討論在一個支隊內關於執行士兵政治訓練的種種問題。

(五) 軍及各縱隊直屬部隊的政治訓練，由軍及各縱隊政治宣傳科負責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執行之。

(六) 教授法：

1 啓發式（廢止注入式）；

2 由近及遠；

3 由淺入深；

4 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

5 說話要明白；

6 說話要有趣味；

7 以姿勢助說話；

8 後次復習前次的概念；

9 要提綱；

10 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乙 早晚點名說話；

(一) 說話時間每次最多不得過半小時；

(二) 材料：

1 報告政治消息；

2 批評日常生活；

3 解釋每週政治口號。

丙 集合講話：

(一) 支隊每星期一次，縱隊每半月一次，全軍不定期。

(二) 每次講話，須要有計劃的由政治工作機關（支隊由政治委員）商同軍事工作機關規定講話內容，指定講話人，並分配講話時間。

(三) 每次講話除任勤務的以外，不准不到。

(四) 每次講話內容及對於群眾的影響，下級政治機關須報告上級政治機關。

丁 個別談話：

(一) 對下列各種人必須和他做個別談話：

1 有偏向的；

2 受了處罰的；

3 傷兵；

4 病兵；

5 新兵；

6 俘虜兵；

7 對工作不安的；

8 思想動搖的。

(二) 談話前，須調查談話對象的心理及環境。

(三) 談話時，須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誠懇的態度和他說話。

(四) 談話後，須記錄談話的要點及其影響。

戊 游藝：

(一) 以大隊為單位，充實士兵會娛樂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種游藝：

1 捉迷藏等；

2 打足球；

3 音樂；

4 武術；

5 花鼓調；

6 舊劇。

(二) 於每個宣傳隊下，設化裝宣傳團。

(三) 游藝設備費由公家支給（大隊的由縱隊政治部批准）。

己 改良待遇：

(一) 堅決廢止肉刑；

(二) 廢止辱罵；

(三) 優待傷病兵；

(四) 恢復每月發草鞋錢大洋四角的制度。

庚 怎樣做新兵及俘虜兵的特別教育：

(一) 把紅軍生活習慣如一、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

不是剝削階級，士兵不是被剝削階級）；二、三大紀律及其理由；三、士兵會的意義和作用；四、紅軍中的經濟制度（經濟的來源，管理經濟的組織，經濟公開主義及士兵審查制度）；五、經濟委員會管理大隊伙食和分伙食尾數；六、廢止肉刑辱罵；七、優待俘虜等項，講給新兵們俘虜們聽。

（二）講述紅軍鬭爭略史。

（三）紅軍的宗旨：1、紅軍與白軍所以不同，此點對俘虜兵要詳細講；2、紅軍與土匪所以不同；3、紅軍三大任務。

（四）講述紅軍組織系統。

（五）普通政治常識。如1、國民黨與共產黨；2、英日美三大帝國主義侵略中國；3、各派軍閥受帝國主義指揮，到處混戰；4、分田；5、蘇維埃；6、赤衛隊等。

六 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

（一）各縱隊政治部負責編製青年識字課本（以商務館小學教材，平民千字課，龍巖文化社教本等作參考）。

（二）每個縱隊內設立青年士兵學校一所，分爲三班至四班，每個支隊一班，直屬隊一班，每班學生不得超過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爲校長，以宣傳科長爲教務主任。每班設一主任教員，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時爲一學期。

（三）由公家出錢置備紙筆墨等用具發給學生。

七 廢止肉刑問題

一 紅軍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隊中凡打人最厲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顯著的例子，如三縱隊第八支隊部某官長愛打人，結果不僅傳令兵伙伙差不多跑完了，軍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隊第二十五大隊，曾經有一時期，來了一個最喜打人的大隊長，群眾送給他的名字叫做鐵匠，結果，士兵感覺沒有出路，充滿了怨恨空氣，這個大隊長調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務支隊第三大隊打人的結果，跑了四個伙、一個特務長、兩個鬪爭好久的班長。其中一個名蕭文成，臨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壓迫才逃跑。四縱隊初成立時，一二三縱隊調去的隊長，一味的蠻打士兵，結果，士兵紛紛逃跑，最後這班官長自己也立不住腳，都不得不離開四縱隊。二縱隊逃兵比任何縱隊多，原因雖不止一個，然二縱隊下級官長的大多數打人的習慣最厲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縱隊曾發現過三次自殺事件（排長一士兵二），這是紅軍最大的污點，意義是非常之嚴重的，這也不能不說是二縱隊打人的風氣特別濃厚的一種結果。現在紅軍中一般士兵的呼聲是：『官長不打士兵，打得要死！』這種群眾的不平和怨憤的表露，實在值得我們嚴重的注意。

二 肉刑的來源和廢止它的理由

封建階級爲了維持它的封建的剝削，不得不用最殘酷的刑罰做工具，以鎮壓被剝削者的反抗和叛亂，這是肉刑所以爲封建時代的產物的理由。經濟的發展，進步到資本主義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義，以發展工農士兵群衆的個性，增強他們的勞動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資本主義發展之條件。因此，凡資產階級的國家，一般的廢止肉刑，在軍隊中亦早就沒有什麼打人的怪事了。至於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的誕生，階級鬭爭的激進，工農階級有推翻統治階級的權力和依於這個權力的剝削，便要發動自己階級的廣大群衆的力量，才能取得鬭爭的勝利。蘇維埃政權，是最進步階級的政權，它的下面，不應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殘餘存在。因此，蘇聯不但紅軍中老早沒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嚴禁肉刑的使用。紅軍第四軍產生於封建制度尚未肅清的中國，它的主要成份，又多是從封建軍閥軍隊裏頭轉變過來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習慣，依然很濃厚的存在於一般長官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習慣和非打不怕的習慣，還是與封建軍閥軍隊裏頭的習慣一樣。雖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長不打士兵的口號和規定士兵會有申訴他們的痛苦的權利，但簡直沒有什麼效力，其結果造成官兵間的懸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長情緒，逃跑的數目日多，軍中充滿了怨恨空氣，甚至發生自殺的事件，這是與紅軍的鬭爭任務完全背馳的現象，如不趕快糾正，危險不可勝言。

三 糾正的方法

一 堅決的廢止肉刑。

二 舉行廢止肉刑運動。這個運動，要從官兵兩方面工作，使『廢止肉刑，方才利於鬭爭』的意義，普及於官兵群眾之中，這樣才能使官長方面，不但不至因廢止肉刑覺得兵帶不住了，而且了解廢止肉刑之後，將要更利於管理與訓練。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廢止肉刑更頑皮了，而且因廢止肉刑，增加了鬭爭的情緒，撤去了官兵的隔閡，將要自覺的接受管理訓練和一般紀律。

三 肉刑廢止之後，因為歷史的習慣的原因，發生一些臨時不良現象是會有的，這應該加緊我們的責任，努力於說服精神和自覺遵守紀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這個違反鬭爭任務的最惡劣的封建制度。決不能藉口有些不良現象，便掩護了它的封建制度打人習慣。凡那些藉口臨時不良現象反對廢止肉刑，或對廢止肉刑運動怠工的，客觀上便是妨礙革命鬭爭的發展，也就是幫助了統治階級。

四 紅軍廢止肉刑的法律程序：（一）修改紅軍懲罰條例；（二）由最高軍政機關會銜發佈廢止肉刑的通令，並頒佈新的紅軍懲罰條例；（三）通令發佈後，一方面由軍政機關召集官長會議，詳細說明廢止肉刑的理由，使全體官長擁護這個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隊中執行起來；（四）一面由士兵會召集士兵代表會議，除擁護這個改革，以後要自覺的遵守紀律外，並要森嚴群眾的紀律制裁，以達到肉刑廢止後的良好收穫。

八 優待傷兵問題

一 傷病兵痛苦的現象及影響

一 全軍各部隊衛生機關不健全，醫官少、藥少，担架設備不充分，辦事人少與不健全，以致有許多傷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療，即大概的初步治療有時都得不到。

二 全軍軍事政治機關對傷病兵注意不充分。如1對於衛生機關的健全，不但沒有盡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簡直不加注意，各種會議對衛生問題討論很少。2官長對於傷病兵沒有盡其可能去隨時安慰他們，如官長替傷病兵送茶水，蓋被窩，隨時慰問等習慣，在紅軍中簡直沒有。官長對傷病兵採一種不理問態度，甚至表示討厭他們的態度。3行軍時，官長以至士兵對在沿途落伍的傷兵，完全不表示一點同情，不但不為他們想法子，反而一味的怒罵，或無情的驅逐他們。

三 重傷重病兵給養和用費不夠，傷兵傷後七八天還沒有衣服換，調養費，病官有，病兵沒有。

四 蛟洋醫院的缺點：（1）無組織狀態；（2）醫官和藥太少；（3）醫官賣私藥；（4）不清潔；（5）禦寒衣被不夠；（6）看護兵太少；（7）飲食惡劣；（8）房子窄；（9）與當地群眾關係不良。以致傷病兵看醫院如牢獄，不願留在後方。

上例各種對傷病兵的待遇不良，便發生下列的影響：（1）使士兵不滿意紅軍，『紅軍好是好，就只不要帶花，不要病』，這種輿論簡直普遍全體士兵以及下級官長之中；（2）士兵和官長不滿意，越發增加官兵間懸隔；（3）士兵及下級官長都怕帶花，因此，減少紅軍戰鬥力；（4）逃兵多；（5）影響工農群眾，減少他們加入紅軍的勇氣。

二 解決的辦法

一 軍政機關對於衛生問題，再不能像從前一樣不注意，以後各種會議，應該充分討論衛生問題。

二 衛生機關的組織應特別使之健全，辦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別地方用不着的人塞進衛生隊去。並要增加辦事人，達到照料完備之目的。醫生少和藥少的問題，要盡可能設法解決。對於醫生，應注意督促他們看病詳細一點，不要馬馬虎虎。

三 官長，特別是和士兵接近的連上官長，應當隨時看視傷病兵，送茶水給他們吃，晚上替他們蓋被窩。他們覺得冷，要替他們想辦法，如向別人借，增加衣服。以上這些照護傷病兵的方法，要定為一種制度，大家實行起來，因為這是最能取得群眾的方法。

四 對行軍時，沿途落伍的傷兵：1 禁止任何人對他們的怒罵或譏笑；2 傷病兵讓路的時候，要好好對他說，不要一把推開他；3 無論那一個部隊或機關，凡有因病因傷落伍下來的，不論是戰鬥兵、非戰鬥兵，均要立即派一個人去照護，他如係重傷重病，並要盡量設法僱夫抬來；4 每次行軍，後衛要耐煩帶上落伍的傷病兵，必需時還要替他們背回槍彈。

五 發給傷病兵零用錢，要酌量傷病的輕重，重傷重病的要求比輕傷輕病的多給一點。調養費一項，對於特別重傷重病的，應該不分官兵佚，酌量發給。

六 傷病兵衣服被窩問題，公家盡力置備外，應該在各部隊官兵中發起募捐，這不僅爲了增加傷兵的零用錢，而且是喚起全軍互助濟難精神的好方法。

七 蛟洋後方醫院許多缺點，應該有計劃去糾正。此外還應該在閩西工農群眾中發起募捐（衣被現款糧食），以密切聯系工農群眾與紅軍。

九 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

（一）在高級地方政權機關沒有建設以前，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

（二）紅軍與群眾的關係：

一、凡有全軍意義的事項，如發佈政綱等，軍事政治兩機關會銜發佈。

二、群眾工作，如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設政權，以及沒收、審判、處罰、募捐、籌款、濟難等事之指揮監督，在地方政權機關沒有建設以前，均屬政治部職權。

三、凡沒有建設政權機關的地方，紅軍政治部即代替當地政權機關，至地方政權機關建設時爲止。凡地方政權機關已經建設的地方，應以使地方政權機關獨立處理一切事情，在群眾中鞏固其信仰爲原則。只有在地方政權機關還不健全，及紅軍與地方有關係的事項，得用地方政權機關與紅軍政治

部會銜的方法處理之。

四、幫助地方武裝之建立與發展，這個責任是政治部的，幫助地方武裝之平時的軍事訓練及戰時的作戰指揮，這個責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需盡可能的經過地方政權機關的路線，極力避免直接處理。

(三) 紅軍裏面用人行政，軍事政治兩個系統，各有獨立的路線，彼此有關係時，如人員等之互相調動，消息之互相傳達時，則用公函平行通報。

(四) 禮節及軍風紀之執行，軍事政治兩個系統，相互間均用階級服從原則，不得藉口系統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揮。

(五) 凡給養、衛生、行軍、作戰、宿營等項，政治系統應接受軍事系統之指揮。凡政治訓練及群眾工作事項，軍事系統應接受政治系統之指揮。但指揮的形式，只能直達對方機關裏頭的從屬機關（總務科或副官處等）。

(六) 凡紅軍籌款的指揮及政治工作用費的決定與支出，均屬於政治部，軍事機關不得干涉（取款手續，政治部直接軍需處）。黨部用費由政治部支給。

(七) 軍事機關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員須副署外，政治部主任無須署名。政治機關一切命令，政治部單獨行使，政治委員無須副署。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九三六年秋——

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爲當時紅軍大學的教本而寫的，目的在總結內戰的經驗。只完成五章，尚有戰略進攻，戰略轉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許多問題，沒有工夫再寫了。四年來只有油印本，茲應軍政雜誌社之請，用鉛印出版，藉供黨內同志們參考。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對於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著者識。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環境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戰爭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與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戰爭——從有階級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之一種最高的鬭爭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同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的戰爭情形與性質之外，有它特殊的情

形與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與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情形與特殊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與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有一種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中國政府或軍事學校頒佈的那些條令去做就得了。它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照抄來用，絲毫不變更其形式與內容，就一定削足適履，要打敗仗。它們的理由是：過去流過血來的東西，爲什麼要不得？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的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及其頒佈的條令去做就得了。它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與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與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它們的理由是：蘇聯是革命戰爭，我們也是革命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爲什麼還有取捨的餘地？不知道我們應該尊重蘇聯的經驗，而且應該比較歷史上的及別國的東西，還要更加尊重些，因爲它們的是最近代革命戰爭的經驗。但尤其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爲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再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就是說：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的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與奪取大城市。它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不能刻板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與性質的差別。從時間條件說，戰爭與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不能呆板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與反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與革命的民族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互相移用。從地域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與民族上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與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

還不止此。一個人指揮戰爭，小兵團的指揮與大兵團的指揮是不相同的，起初會指揮小兵團，後來又會指揮大兵團，這對於他是進步了發展了。一個地方與許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會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戰，後來在許多地方也會作戰，這對於他又是進步了發展了。因敵我雙方技術、組織、戰術、戰略的發展，一個戰爭中各階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級階段會指揮的，到了高級階段也會指揮，這對於他更是進步與發展了。停頓於某一一定兵團、一定地方、一定階段，這叫做沒有進步與沒有發展。有一種人，抱着一技之長與一孔之見，再也沒有進步，這對革命雖則在一地一時有些作用，但沒有大的作用，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戰爭指導者。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

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二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最近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兩類，我們是擁護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的。神聖的戰爭，僅僅屬於革命戰爭一方面，我們是擁護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與神聖的階級革命戰爭的。人類的生活是由三個大時代組成——人類和平生活時代，人類戰爭生活時代，與再一個人類和平生活時代。我們現在是處在第二個與第三個時代的交點，人類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做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最後一次戰爭。我們的戰爭是最後的一次，但毫無疑義又是最大的與最殘酷的一次。最大與最殘酷的反革命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打起革命戰爭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到毀滅。人類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革命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大多數與中國大多數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神聖戰爭，是正義戰，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出於毀滅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樑，是把全地球翻成新世界的燈塔。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於我們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

三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世界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是戰爭的一全局，一獨立的游擊區，一獨立的蘇區，或一大的獨立作戰方面，也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與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

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與戰術學的任務。

向着戰役指揮員及戰術指揮員要求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略上的規律，何以成為必要呢？在於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在於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說戰略勝利決定於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我們曾經給它批駁了。因為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主要與首先的問題，在對於全局與各階段之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來決定。如果全局與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着，而不是某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着。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性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某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就因為這些局部不是對於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某些戰術上或戰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於引起戰爭全局的變壞，就是因為這些失敗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裏說的多數戰役與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

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裏說的『連戰皆捷』與『許多敗仗』都是局部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裏說的『一個敗仗』，與『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全局關照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的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與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與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與最吃力的時節。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說到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不但戰略與戰役的關係如此，戰役與戰術的關係也是如此。師的動作與團營動作的關係，連的動作與排班動作的關係，就是實例。任何一級首長，他的注意重心，應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以其他的問題或動作放在自己注意的第一位。

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作戰時選擇突擊方向與突擊點，要按照當前的敵情地形與自己兵力的情況去規定。在給養豐富的地方注意力放在不要吃得太飽上面，給養不足的地方却在於注意不使餓肚。在白區，可以因為僅僅一個消息的走漏而使爾後的戰鬥失敗。在蘇區，則走漏消息的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戰役，高級指揮員有親自參加之必要，其他則無此必要。一個軍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與規定教育方針。一個民衆大會，主要應注意動員到會與提出口號的恰當。如此等等。總之一個原則，就是注意於那些有關全局的重要關節。

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

能用思想得到的，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戰役戰術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明白那些更高級的東西。戰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係，照顧各個戰役之間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照顧有關全局的（有決定性的）某些部份，照顧全般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後方之間的關係，照顧消耗與補充，作戰與休息，集中與分散，攻擊與防禦，前進與後退，隱蔽與暴露，主攻方面與助攻方面，突擊方面與箝制方面，集中指揮與分散指揮，持久戰與速決戰，陣地戰與運動戰，本軍與友軍，這些兵種與那些兵種，上級與下級，幹部與兵員，老兵與新兵，高級幹部與低級幹部，老幹部與新幹部，蘇區與白區，老蘇區與新蘇區，中心區與邊區，熱天與冷天，勝仗與敗仗，大兵團與小兵團，正規軍與游擊隊，消滅敵人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與鞏固紅軍，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軍事任務與政治任務，過去的任務與現在的任務，現在的任務與將來的任務，那種情況下的任務與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線與非固定戰線，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與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與聯系，都是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練習純熟，都可以指揮如意的。這就是說，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與必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這就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任務，也就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任務。

四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爲什麼組織紅軍？在於使用它戰勝敵人。爲什麼學習戰爭規律，在於使用這些規律於戰爭。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儘管很多人講得

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却有勝負之分，戰爭史同我們的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

那末，關鍵在那裏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這是從古以來就沒有的。我們要求在戰爭過程中，一般地打勝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要達到這一點，有一種法子是要學的，這就是學與用的方法，學的時候使用這種方法，用的時候也使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許多國家頒佈的軍事條令書上，都有『按照情況活用原則』的指示，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時的處置方法。前一種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觀地犯錯誤，後一種是當着指揮員主觀地犯了錯誤，或客觀情況起了非所預料的與不可抗的變化時，告訴我們怎樣去處置。

爲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戰爭或戰鬪的部署與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與客觀的實在情況之間不相融洽，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免這種情形，有比較會辦與比較不會辦之分罷了。事要求比較會辦，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多打勝仗，反面的說，要求比較少打敗仗。這裏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與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融洽起來。

舉戰術的例子來說。攻擊點選在敵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裏正是敵人的薄弱部，突擊因而成功，這叫做主觀與客觀相融洽，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斷、與決心，同敵人及其配置的實在情形相融洽。如果攻擊點選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敵人的釘子上，就叫做不相融洽。攻擊時機的適當，預備隊使用的不遲不早，以及各種戰鬪處置與戰鬪動作都利於我不利於敵，便是整個戰鬪中主觀指揮

與客觀情況通通相融洽。通通相融洽的事，在戰爭或戰鬪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為戰爭或戰鬪的雙方是集團的武裝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原故，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份相一致，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與必要的偵察並對各種偵察材料作聯貫起來的思索。這裏是敵方情況的各種表現，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與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對比着看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對於建設每個戰略戰役或戰鬪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設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所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所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設於必要的偵察與周密的思索敵我情況及其互相關係之上的原故。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前，而且見之於軍事計劃建設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又是一個過程，一個新的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發生重新檢查的問題。如果計劃與情況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份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改變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個戰略行動，或一個戰役與戰鬪行動。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學習的，他摸

熟了自己部隊（指揮員、戰鬪員、武器、給養等等及由他們構成的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部隊（同樣，指揮員、戰鬪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其他戰爭環境（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有把握，比較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戰爭中，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的融洽不融洽問題。這一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與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做一個真正能幹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僅僅善於在紙上談兵或初出茅廬的脚色能够辦得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的總結。這些過去戰爭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着重地學習它，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東西，創設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後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最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中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消滅的，幹革命，幹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與使用不容易，是說學的徹底，使用純熟。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着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

軍事的規律，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對於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

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與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把它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與使用的問題的。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句話，是包括學習與使用兩個階段的意義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戰爭——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鬭爭的最高形式，一切關於它的規律，都爲了爭取勝利而使用。戰爭的勝負，主要的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之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之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許可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着這個舞台，却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即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之上，紅軍的指導者，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與階級的敵人，改變這個不好的世界。這裏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爲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爲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他們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達到彼岸。戰爭指導規律，就是戰爭的游泳術。

以上是我們的方法論。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戰爭

自從一九二五年開始的中國革命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階段，即北伐戰爭階段與蘇維埃戰爭階段；今後則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這三個階段，已經是而且也不能不是被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參加了這個領導。因為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帶買辦性與封建性的大資產階級，雖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這個革命戰爭，然而由於他們的自私自利性與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願意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澈底勝利的道路。中國農民群眾與小資產階級，是願意積極地參加革命戰爭，並願意使戰爭得到澈底勝利的，然而由於他們的小生產性，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份失業群眾則具備着無政府思想。因此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但不能成為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因此，在無產階級政黨已經形成的時代，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在這種時候，任何的革命戰爭如果沒有或違背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那個戰爭是一定失敗或不能進入澈底勝利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社會各階層中，只有無產階級及共產黨，才是比較最沒有狹隘性與自私自利性，比較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接受世界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用之於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够領導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克服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並且還能够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澈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與戰爭走上勝利之路。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的說，是在國際與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與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着革命與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於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同時也由於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放棄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因而失敗了。

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蘇維埃戰爭，是在新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戰爭的敵人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是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聯盟的統治。民族資產階級則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領導戰爭的，惟一的只有共產黨。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權，是使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條件，沒有共產黨這種絕對的領導，是不能設想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的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爲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爲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火線的最前線。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與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做代價，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偉大的歷史成績，使得今天處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有了救亡圖存的前提條件——有了一個爲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的，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爲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過去十五年的艱苦奮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主義與李立三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一，是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蘇維埃戰爭受到嚴重的損失，產生了五次圍剿不能戰勝反而喪失了蘇區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其二，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與紅軍的紀律，使一部份紅軍遭受嚴重的損失；然而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

黨員與指戰員的覺悟，終於也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與戰爭，當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我們的黨與我們的紅軍，却從這些錯誤中鍛鍊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着轟轟烈烈光榮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備着國際革命的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把眼睛望着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到中國革命的完成，也將給東方及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在過去的革命戰爭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與戰爭，已經鍛鍊出來這樣的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了。今後戰爭的新階段上，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與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的與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與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與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戰爭的有害傾向作鬥爭，並且徹底的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與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在這本小冊子中時常提到錯誤方面的意見，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一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不承認、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中國革命戰爭有其特點的人，把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看做

與一般戰爭相同，或與蘇聯內戰相同，因而採用相同的軍事指導路線、甚至一切軍事原則，這，在我們的十年戰爭史中已完全證明其不對了。

在我們的敵人方面，也曾犯過了類似的錯誤。他們不承認同紅軍作戰須要有不同的戰略戰術，他們倚仗其各方面的優勢，輕視我們，固守其老套戰法，這是四次『圍剿』特別是三次『圍剿』以前的情形，其結果就招致了他們歷次的失敗。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柳維垣，後來有戴岳，最後是被蔣介石採納了，這就是廬山軍官訓練團及其五次『圍剿』新軍事原則產生的過程。

然而當着敵人改變其軍事原則使之適合於同紅軍作戰的情況之時，我們隊伍中却出現了回到『老套』，回到一般情況，或者回到異地異國情況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輕視國民黨軍隊，對敵人採用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受了歷史的懲罰。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

二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那末，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呢？

我以爲有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地大物博的國家，而又經過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這個特點，指出中國的革命戰爭有發展與勝利的可能性。當着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

天，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紅軍能否存在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大會，把這個問題更原則地答覆了，全國蘇維埃運動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針。

現在把這個問題分開來看一看：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義與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乎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與停頓在中世紀式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與幾萬萬舊制度下的農民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與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正規軍隊與雜牌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與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與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數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與一國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區別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

中國是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即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革命的民衆。

所以我們說，中國是一個經過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地大物博的國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一個特點。從這個特點出發，不但基本地規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戰略與戰術，而且也基本地規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戰略與戰術。

第二個特點是敵人的強大。

紅軍的敵人國民黨，它是怎樣一個狀況呢？它是奪取了而且相對地穩定了政權的政黨。它得到了

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國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與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却大體相同，武器與物質供給比起紅軍來是特別雄厚，而且其數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同紅軍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它控制了全中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它是全國性的政權。

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二個特點，中國紅軍是處在這樣強大的敵人面前。從這個特點出發，使紅軍的作戰不能不與一般戰爭，蘇聯內戰，北伐戰爭都有許多的不同。

第三個特點是紅軍的弱小。

中國紅軍是產生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從游擊隊開始，不但處在中國的反動時期，而且處在世界上反動國家政治上經濟上相對穩定的時期。

蘇維埃政權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蘇區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同國民黨區域比較是很落後的。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蘇區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真正鞏固的根據地。

紅軍的數量是少的，紅軍的武器是差的，紅軍的糧食被服等物質供給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特點與前一個特點是相反的對比，影響到紅軍的戰略戰術，是在這種相反的對比上發生的。

第四個特點是共產黨領導與土地革命。

這個特點是第一個特點的必然結果。由於這個特點，一方面，就使得中國革命戰爭雖處在中國與世界的反動時期，然而紅軍是能够勝利的，因為它有共產黨的領導與農民的援助。就使得蘇區雖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與龐大的國民黨政權相對立，軍事上給了國民黨的進攻以很大的困難，因為有農民的援助。就使得紅軍雖小却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為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產生為着自己的

利益而戰鬪的，而且指揮員與戰鬪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則與國民黨成了相反的對比。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其軍隊雖多，却不能使士兵群眾及許多小生產者出身的下級幹部自覺地爲國民黨拚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減少了它的戰鬪力。

三 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從這些特點出發，就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從第一個特點與第四個特點出發，就給了中國紅軍以發展與戰勝其敵人的可能性。從第二個特點與第三個特點出發，就給了中國紅軍以不能很快發展與不能很快戰勝其敵人的可能性，即是給了戰略持久戰的可能性，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就有失敗的可能性。

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着，即是說在順利的條件下又有它的困難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十年戰爭史證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這些特點，看不見從這些特點發生的兩方面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勝仗。

很明顯的，正確的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要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却又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與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反對擊

潰戰，承認消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與流氓主義，承認紅軍是蘇維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與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及其根本規律出發而要求正確的解決，或從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及其根本規律出發，而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意義。我們現在要講的戰略問題，就是要就中國革命戰爭的十年血戰史的經驗，好好地說明這些問題。

第四章 圍剿與反圍剿

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形式

十年來，從游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游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蘇維埃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它捕獲，敵人總是跟着紅軍，而且總是把紅軍圍起來。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為止，這種形式也不會變化的。

紅軍的活動，是採取了反圍剿的形式。所謂勝利，主要的是說反圍剿的勝利，這就是戰略與戰役的勝利。反對一次圍剿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團組織而成，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的被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許多戰團的勝利，還不能說戰略上或整個戰役上已經勝利了。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

敵人的圍剿與紅軍的反圍剿，互相採用進攻與防禦這兩種戰團形式，這是同古今中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然而中國內戰的特點，則在二者長期的反復。在一次圍剿中，敵人以進攻反對紅軍的防禦，紅軍以防禦反對敵人的進攻，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一個階段。敵人以防禦反對紅軍的進攻，紅軍以進攻反對敵人的防禦，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二個階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這兩個階段的，而且是長期反復的。

說長期反復，是說戰爭及戰團形式的反復，這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復。敵以進攻對我防禦，我以防禦對敵進攻的第一階段，與敵以防禦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禦的第二階段，是每一圍剿中戰團形式的反復。

至於戰爭與戰團的內容，則不是簡單反復的，而是每次不同的，這也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

這裏的規則，是圍剿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況一次比一次複雜，戰團一次比一次激烈。然而不是沒有起落的，五次圍剿之後，因為紅軍相對地削弱了，根據地的位置移到了西北，也不是處在威脅中國主要敵人的最重要地位了，圍剿的規模、情況與戰團，就比較小些，簡單些，緩和些了。

紅軍的失敗是什麼呢？在戰略上說，只有反圍剿根本沒有成功，才叫做失敗，而且也只能叫做局

部的與暫時的失敗。因為國內戰爭根本的失敗，就是整個紅軍的覆滅，然而這樣的事實在我們是沒有的。蘇區的喪失與紅軍的轉移，這是暫時與局部的失敗，這種事實，我們把它叫做防禦的繼續。而把敵人的追擊叫做進攻的繼續。這就是說，在圍剿與反圍剿的鬥爭中，我們沒有由防禦轉到進攻，反被敵人的進攻打破了我們的防禦，我們的防禦就變成了退却，敵人的進攻就變成了追擊。然而等到紅軍到達一個新地區時，圍剿反復又出現了。所以我們說，紅軍的戰略退却（長征）是紅軍戰略防禦的繼續，敵人的戰略追擊是敵人戰略進攻的繼續。

中國國內戰爭同任何古今中外的戰爭一樣，基本的戰鬥形式只有攻防兩種，中國內戰的特點，是圍剿反圍剿的長期反復，與攻防兩種的長期反復，並且包括着偉大的戰略轉移這一種東西在裏面。

所謂敵人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的戰略失敗，就是他們的圍剿被我們打破，我們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敵人轉到防禦地位，必須重新組織才有再一次的圍剿。敵人沒有如同我們所謂戰略轉移（長征）的那種情形，乃因他們是全國性的統治者，他們比我們特別強大的原故。然而部份的事情是有過的，若干蘇區中的白色據點內被紅軍圍攻的敵人突圍而出，退却到白區裏去重新組織進攻，是發生過的。如果內戰延長，紅軍勝利的範圍更廣大時，這種事情會多起來。但他們的結果不能同紅軍相比，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難保不被消滅的。

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國內戰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復的規律（那時已有井岡山的三次圍剿，福建的兩次圍剿等），命令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暴動，企圖革命迅速勝利，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一九三二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復這一規律。在鄂豫皖則有『偏師』說，承認三次

圍剿失敗後的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是帝國主義親身擔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中央蘇區的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蘇區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東北路線』，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與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五次圍剿是蘇維埃道路與國民黨道路的決戰等等，是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反對四次圍剿，中央蘇區反對五次圍剿鬥爭中錯誤路線的根苗，在敵人嚴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步，給了中國蘇維埃運動以很大的損失。

跟否認圍剿反復的左傾機會主義直接聯系，而說紅軍根本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的一種意見，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革命與革命戰爭是進攻的——這是正確的說法。革命與革命戰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發生到發展，從沒有政權到奪取政權，從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從沒有蘇區到創造蘇區，是一天也不能保守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是應該反對的。

革命與革命戰爭是進攻的，但也是有防禦與後退的——這更是正確的說法。爲了進攻的防禦，爲了前進的後退，爲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爲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軍事運動？

但前一論斷，在政治上說來，是對的，移到軍事上就不對了。從政治上某一種情況說來（革命前進時）是對的，假如移到另一種情況（革命退却時），全部退却例如俄國一九〇六年，中國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國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條約時）也就不對了。只有後一論斷，才是全部正確的真理。一九三二年的左傾機會主義，機械地反對軍事的防禦手段，僅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圍剿反復的形式何時結束？照我的意見，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

之時。如果蘇維埃紅軍一旦改變到比自己的敵人更爲強大時，那末，這個反復就結束了。那時是我們圍剿敵人，敵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政治軍事的條件將不允許敵人採取如同紅軍一樣的反圍剿的地位。那時，圍剿反復這樣形式，即使不說完全結束，但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斷言的。

第五章 戰略防禦

這個題目中，我想說明下列各問題：（一）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二）反圍剿的準備；（三）戰略退却；（四）戰略反攻；（五）反攻開始問題；（六）集中兵力問題；（七）運動戰；（八）速決戰；（九）殲滅戰。

一 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

爲什麼從防禦說起呢？中國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失敗後，革命進到了深刻的階級戰爭，敵人是政權，我們是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鬥，我們的進攻是密切聯系於打破圍剿，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過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所以戰略防禦問題成爲紅軍作戰中最複雜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中，對於戰略防禦問題，常常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輕視敵人，又一種是爲敵人所

嚇倒。

由於輕視敵人而來的結果，我們看見許多游擊隊的失敗，紅軍若干次圍剿之不能打破。

游擊隊初起，領導者對於敵我形勢看得不正確，看見自己在一地方用突然的暴動勝利了，或從白軍中譁變出來了，一時的順利環境，或對嚴重環境看不到，往往輕視敵人。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等），也不了解。因而把行動引向錯誤的道路，精神上解除了防禦的武器，許多游擊隊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為這種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海陸豐的紅軍，因為輕敵而招來了失敗。有一九三二年鄂豫皖的紅軍，在所謂國民黨偏師說之下，使得反對四次圍剿喪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

為敵人嚇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從與前者相反的立場出發，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採取了非必要的退讓政策，精神上同樣解除了防禦的武器，結果或使游擊隊失敗，或使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使蘇區歸於喪失。

關於喪失蘇區最顯著者，是五次圍剿中的中央蘇區，這裏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然而這種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不能不是後來五次圍剿中消極防禦路線的根源。

為敵人嚇倒極端的例子，是退却主義的『張國燾路線』，西路軍在河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與進攻的防禦。據我知道的，任何一本有

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與中外，無論戰略與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史中一種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是應該根本反對的。

後起而且發展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以德日兩國為代表的軍事家中，積極鼓吹戰略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略防禦，這個原則，是根本不合於中國蘇維埃戰爭的，也不合於中國的民族戰爭。他們指出防禦的一個重要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使人心動搖，這是說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於統治階層乃至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對於我們的蘇維埃戰爭與民族戰爭，則是根本相反的。在保衛蘇區與保衛中國的口號下，能够團結最大多數人民萬眾一心的作戰，因為我們是被壓迫與被侵略者。蘇聯內戰也是在防禦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它們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戰爭的進行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就是在十月暴動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戰略的防禦戰，不但有麻痺政治上異己分子的作用，主要的是能够動員落後的人民群眾加入戰爭中來。

馬克思說的暴動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這是說的乘敵不備而突然暴動起來的群眾，應該不讓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統治勢力消滅個徹底，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不是說，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者，當受敵人壓迫時，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的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採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是防禦與進攻的反復應用。對於我們，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後，或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為關鍵在於圍剿之打破。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禦，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

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一次圍剿與又一次圍剿是啣接着的。這兩個階段中，最複雜最重要的階段，是防禦的階段，包含着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

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的就用不着戰略防禦了，那時的方針基本的只是戰略的進攻，這種改變完全依靠於總的敵我力量的變動。防禦到了那時，剩下的是局部的防禦，總的方針就沒有與戰略進攻平行、甚至佔着比較重要地位、如同現在一樣的戰略防禦這種東西了。

二 反圍剿的準備

對於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充分的與必要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與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裏有一個困難問題，也就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此時自己是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禦地位，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難於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與蘇維埃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却，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會因過早準備，變為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或因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

開始準備時機的選擇，成爲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及二者間的關係着眼。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及社會輿論等各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够的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營壘間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自己方面，不可誇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够的估計到過去勝利及於敵人的影響。

但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爲後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爲小，而其利益，則在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

準備階段中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却，政治動員，擴大紅軍，財政糧食，政治異己份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準備退却，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着不利於退却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軍過於疲勞。這是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這時候紅軍的注意力，主要的要放在創造戰場，徵集資材，擴大自己與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戰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的告訴紅軍人員與蘇區人民：關於敵人進攻的必然性與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蘇維埃與人民的嚴重性，同時，敵人的弱點，紅軍與蘇區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願，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與人民全體爲反對圍剿保衛蘇區而鬥爭。除開軍事秘密之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於每一個可能擁護蘇維埃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動員幹部。

擴大紅軍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蘇區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及人口情況；又一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及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糧食問題，不待說對於反對圍剿是有決定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主要的是紅軍，再則蘇區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戰爭中物質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份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於恐懼他們的叛變，而採取過分的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的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的中立，民衆監視他們。只有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份子，才可以採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戰爭勝利的程度，是與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連系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於準備的放鬆，與由嚇倒於敵人進攻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三 戰略退却

戰略退却，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及到不能立即擊破其進攻，爲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它們的主張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對於這種主張，過去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而且直到經過長久歲月，證明這種主張是嚴重地危害着蘇維埃戰爭時，才把它打翻。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汹汹，鬬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往往退讓者打倒其勢汹汹者。

水滸傳上的王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王教頭破綻，一脚踢翻了王教頭。

春秋時候，魯與齊戰，魯君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被他的軍師曹劌阻止了，採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者對强者作戰的有名的實證。今將左丘明敘述那個戰役的文章全部抄在下面：

『春，齊師伐我（魯國），公（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勿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勿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信。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古人鳴鼓進軍）。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追擊）。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克之。』

當時的情況是大國進攻小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於民，敘述了利於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敘述了利於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敘述了追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却同時是說的戰略防禦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因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不勝枚舉，都是強弱不牢，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的。

拿破崙舉三十萬大軍進攻俄國，俄國政府聽從了主張『放棄並燒燬莫斯科京城然後再打』的軍事家的意見，拒絕了『京城怎麼好放棄更怎麼好燒燬』的許多庸俗的軍事家與政治家的意見，陷拿破崙於飢疲困苦、後路被擾亂、軍隊被包圍的絕境，不得不引退，俄軍乘機反攻，拿破崙僅剩五萬人逃去，成了拿破崙一生中空前的大敗仗，也是世界戰史上有名的大敗仗。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歐戰時，法國開始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集中大軍於德法交界。及見德軍不走此路，又倉卒轉移至法比交界。一戰失敗後，才斷然改變方針，大舉向巴黎退却，盡棄北部工業與農業區。然而這個偉大的戰略退却是非常正確的，幹這件事是要有非常的決心與毅力才行的。雖然德國以僅僅一星期的時間，以近百萬的大軍，長驅直迫巴黎郊外，然而德軍却疲勞了，兵力也減損了，軍心也放肆了，戰線也延長了。法軍則縮短了防綫，增加了兵力，激怒了人心。兩軍強弱的對比，因此起了變化。法國於是集中主力於巴黎西北部，包圍德軍右翼，一戰而勝，把稱雄一世的德軍打退到法國北部，不得不改取守勢，給了整個戰爭以決定的影響。這是最近代的一個最有名的大戰。

就是在歐戰中，而且與上述西戰場的作戰同時，還有一個德軍打勝俄軍的戰役，也是鼎鼎有名的大戰，這即是東普魯士戰役。當德軍悉力於西戰場時，俄軍以出於德國意料之外的速度，集中了大軍，乘虛攻入東普魯士，長驅直進，柏林震動。興登堡收集不滿十萬的軍隊，連同西戰場調回的一部份在內，在優劣懸殊的力量對比之下，當俄軍的兩個縱隊分路銳進之時，且進入了困難的地形條件（池沼地帶）之時，集中主力擊破其左路，俘虜九萬餘人，俄軍右路倉惶退却，興登堡以此聲震世界。

上述古代的、中世的、近代的許多例子，證明處於被攻地位以弱敵強的軍隊，在戰爭或戰役的開始階段中，不得不採取戰略防禦方針，等候有利時機轉入反攻。因為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取得勝利，不然則是必敗之道。

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是失敗了，秋收暴動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部隊，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井岡山。第二年五月，南昌暴動失敗後保存

的部隊，經過湘南游擊戰爭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着樸素性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據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線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而且發佈到了全國。後來我們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時，『誘敵深入』的原則被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的是從前的樸素性不見了，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却與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後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

然而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在黨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後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那個包含着嚴重原則錯誤的決議案發佈之後，就向着正確的原則作鬭爭，最後是撤消了這個正確原則，成立了一整套與此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後，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逃跑主義。直到黨的政治局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舉行於貴州的遵義時，才宣告這個錯誤原則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原則的正確性。這是費了很大的代價得來的。

反『游擊主義』者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蘇區，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不同了嗎？並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更好嗎？在白區或在蘇區白區交界去打勝敵人不更好嗎？這裏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蘇維埃國家成立了，我們的紅軍正規化了。我們同蔣介石是國家與國家作戰，大軍與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

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裏產生的，山裏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與此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是『先發制人』，『不打爛罐罐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反對五次圍剿是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集中指揮』，是『短促突擊』，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新原則，就給他以懲辦主義，加之以機會主義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的，這全部的理論都是錯了的。這是機械論，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革命狂熱與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與逃跑主義，是魯莽家與門外漢的理論與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這裏單說戰略退却。中央蘇區叫做『誘敵深入』，四川蘇區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與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於強軍作戰、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採取的原則。歐美日本的軍事家就這樣說：『戰略守勢之作戰，大都先避不利之決戰，使至有利之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却之目的是爲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保存軍力之所以必要，是因爲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之保存。過去却有許多人堅決地反對退却，認爲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禦路線』，我們的歷史業已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及造成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後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却階段中取得下列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有利於我不利於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 (一) 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 (二) 作戰有利的陣地；
- (三) 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 (四) 發現敵人的薄弱部份；
- (五) 使敵人疲勞沮喪；
- (六) 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條件，對於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蘇區條件。並且由於這個條件，使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却到蘇區來，因為蘇區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蘇區中邊區與中心區，也有區別，對於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區為好。所以『退却終點』之選擇，過去中央蘇區一二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最好或較好的地區。由於蘇區這個特點，使紅軍作戰比一般作戰起了很大的變化，是使後來敵人不得不採取堡壘主義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軍隊能够選擇自己所欲之有利陣地，使進攻軍隊不得不就我範圍，這是內線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够，還要求別的條件與之配合，首先是人民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之敵，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過失，或者該路前進之軍比較缺乏戰鬥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却，以就自己所欲之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之陣地，但無優良之人民條件，如果其他條件也還未造成或未發現時，便不

得不向蘇區退却。蘇區中邊區與中心區的分別也大體是如此。

除地方部隊與箝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為原則。然而當着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採取所謂『求心退却』，退却的終點，往往選在蘇區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後部，這是依照情況來決定的。這種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於強軍作戰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往往不知敵之分進各軍，何部最強，何部次強，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却之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數量與強度都超過我軍甚遠，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使之深入蘇區，吃盡蘇區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志氣沮喪，許多弱點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却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得出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使敵軍劣於我軍，而我軍反優於敵軍的事情。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紅軍是一種極端的退却（紅軍集中於蘇區後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滅殺其優勢。

退却以求有利形勢的最後一個要求條件，是造成及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求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乘敵之隙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是一樣的。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之過失，例如孫子

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却的終點，不能限定於某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一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却以求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但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強弱懸殊的內線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發生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却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於我轉入反攻的，據此決定退却終點，如果不同時也於全體形勢有利時，則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後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却終點應該選在蘇區的前部，例如中央蘇區第二第四次圍剿，陝甘第三次圍剿時。有時須在蘇區的中部，例如中區第一次圍剿時。有時則在蘇區的後部，例如中區第三次圍剿。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勢聯系到整個形勢來決定的。中區第五次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却，原因在於對局部形勢與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幹法。形勢是由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與整個形勢的聯系，應從當時敵我雙方所具條件之見於局部者與見於全體者，是否在一定之限度上利於我之開始反攻以爲斷。

退却終點，在蘇區可以大體上分爲前部中部後部三種。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區作戰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區作戰，僅僅指的對付敵軍大規模圍剿，敵我強弱不卒，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主張向蘇區退却，主張誘敵深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造成或發現利於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並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蘇區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須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却終點選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至少是理論上應該承認的，雖然我們過去很少這種經驗。

白區退却終點大體上也可分爲三種：第一是在蘇區前面，第二在蘇區側面，第三在蘇區後面。第一種終點，例如中區第一次圍剿時，如果紅軍沒有內部不統一與地方黨的分裂，即立三路線與A B團兩個困難問題存在，是可以設想在吉安南豐樟樹三點之間集中兵力舉行反攻的。因爲當時從贛撫兩河間前進的敵人軍力，比起紅軍來優勢並不很大（十萬對四萬），人民條件雖不如蘇區，但陣地條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敵分路前進去各個把它擊破的。第二種終點，例如中區第三次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建、黎、泰進，這一路在其力量上又適合於我們打它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興國。第三種終點，同樣例如上述中區第三次圍剿時，假如敵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們也許被迫着退到會、尋、安地區（那裏是白色區域），引敵更向南進，然後紅軍由南而北向蘇區內部打去，這時北面蘇區內部敵之軍力當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這些說明都是假定，沒有經驗，可以作爲特殊的東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則看待。對於我們，當敵舉行大規模圍剿時，一般的原則是誘敵深入，是退却到蘇區作戰，因爲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敵人的進攻的。

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意見，反對戰略退却，理由是退却喪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罐罐』），對外也產生不良影響。在五次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蘇區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五次圍剿，只能分兵抵禦與短促突擊。

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於喪失土地問題，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的喪失是土地，而其取得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

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與休息的喪失是時間，而其取得是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乃是失本生意。五次圍剿的失本正在這一點，不願意喪失一部份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該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份人民家中一時的打爛些蠟燭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永遠的打爛蠟燭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政治影響，就要以永久的不良影響做代價。如果依照俄國『左派共產主義』的意見，始終拒絕對德和約時，今天的蘇聯也就沒有了。

這種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燥病，同時也是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份利益與全體利益相聯結，掀倒一局部一時期的東西死也不放。對的，一切依照當時具體情況看來對於當時的全局與全時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決定意義的一局部與一時間，是應該掀倒不放的，不然我們就變成自流主義或放任主義。退却要有終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這絕不是小生產者的近視病，我們是應該學習布爾塞維克的聰明的。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與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與顯微鏡。

當然，戰略退却是有困難的，退却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却終點的選擇，政治上說服幹部與人民，都是困難問題，而必須給予解決的。

退却開始時機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不但法軍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開始的退却，是時機決擇的恰到好處，成為後來反攻勝利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一個可佩服的英斷。就是我們中央蘇區第一次圍剿時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種時機，即是說如果再遲時，那我們勝利的程度至少是要受到影

響的。退却過早與過遲，當然都有損失。但一般說來，過遲的損失是較之過早爲大的。及時退却，對於到達退却終點以後，整頓隊勢，以逸轉勞地轉入反攻，是給予着極大的影響。中央蘇區的一、二、四次戰爭，都從容不迫地對付了敵人。惟獨第三次戰爭，因爲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爭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們結束二次圍剿，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如何選擇這個時機，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從敵我雙方大勢上去判斷，和前面說過的選擇準備階段的開始時機所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戰略退却，在沒有經驗時，說服幹部與人民的問題是更加困難的問題。當軍事的領導還沒有達到對戰略退却這樣的問題可以而且應該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裏而爲幹部所承認時，困難問題就發生了。由於幹部沒有經驗，對於戰略退却的不相信，在第一次還有第四次圍剿的初期，第五次圍剿的整期，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次圍剿是立三路線的影響，幹部的意見，在沒有被說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進攻。第四次圍剿是軍事冒險主義的影響，幹部的意見是反對準備。第五次圍剿開頭是繼續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後來是變成了保守主義。張國燾主義不相信番人與回人地區不能建立我們的根據地，直待碰壁以後方才相信，也是具體的實例。經驗對於幹部是必須的，失敗確實是成功之母。但虛心接受自己以前的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須，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蘇維埃戰爭吃這種虧是不少的。

由於人民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却之必要，莫過於中區第一次圍剿之時，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及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却。但在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在後來的幾次大圍剿時，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相信，蘇區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够打破圍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與否，密切聯系於幹部，因此主要的與首先的問題，在於說服幹部。

戰略退却全部的作用，在於轉入反攻，戰略退却僅是戰略防禦的第一階段。隨之而來，而且是全戰略的決定關鍵，在於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

四 戰略反攻

戰勝絕對優勢敵人的進攻，依靠於在戰略退却階段中所造成的、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比較敵人開始進攻時起了變化的形勢，而這種形勢是由各種條件造成的，前面已經說過了。

然而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之存在，還沒有使敵人失敗。這種條件與形勢，帶着若干決定勝負的性質，但還不是基本地決定勝負的東西。基本地決定勝負的東西，在於兩軍的決戰。只有決戰，才能基本地、最後地、解決兩軍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這就是戰略反攻階段的全任務。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禦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禦戰的最後階段。所謂積極防禦，主要的就是指的這種帶決戰性的戰略的反攻。

條件與形勢，不僅僅是在戰略退却階段中造成與形成的，反攻階段中繼續地造成與形成着。這時的條件與形勢，不完全和前一階段中的屬於同一形式與同一性質。

可以是屬於同一形式與同一性質的，例如此時敵軍的更加疲勞與減員，不過是前一階段中疲勞與減員的繼續。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條件與形勢出現，例如敵軍打了一個或數個敗仗，此時的條件，所謂有利於我不利於敵者，就不僅敵軍疲勞等等，而是增加了敵軍打敗仗這個新的條件了。形勢也起了新的變化，敵軍調動忙亂，舉措失當，兩軍優劣之勢，也就不同於前了。

假使一個至數個敗仗不是屬於敵軍，而是屬於我軍，那末，條件與形勢的有利與否，也變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說，敵之不利減少，我之不利開始發生，以至擴大起來，這又是完全不同的新於前的東西。

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敗者方面之一種新的努力，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這種新出現的不利於我有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而重新創造出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與形勢去壓迫對方。

勝利者方面的努力與此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勝利，加敵以更大的損害，務增加或發展有利於我的條件與形勢，而務不讓其對方完成其脫出不利與挽回危局的企圖。

所以不論在何方說來，決戰階段的鬭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複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反攻階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問題，速決戰問題，殲滅戰問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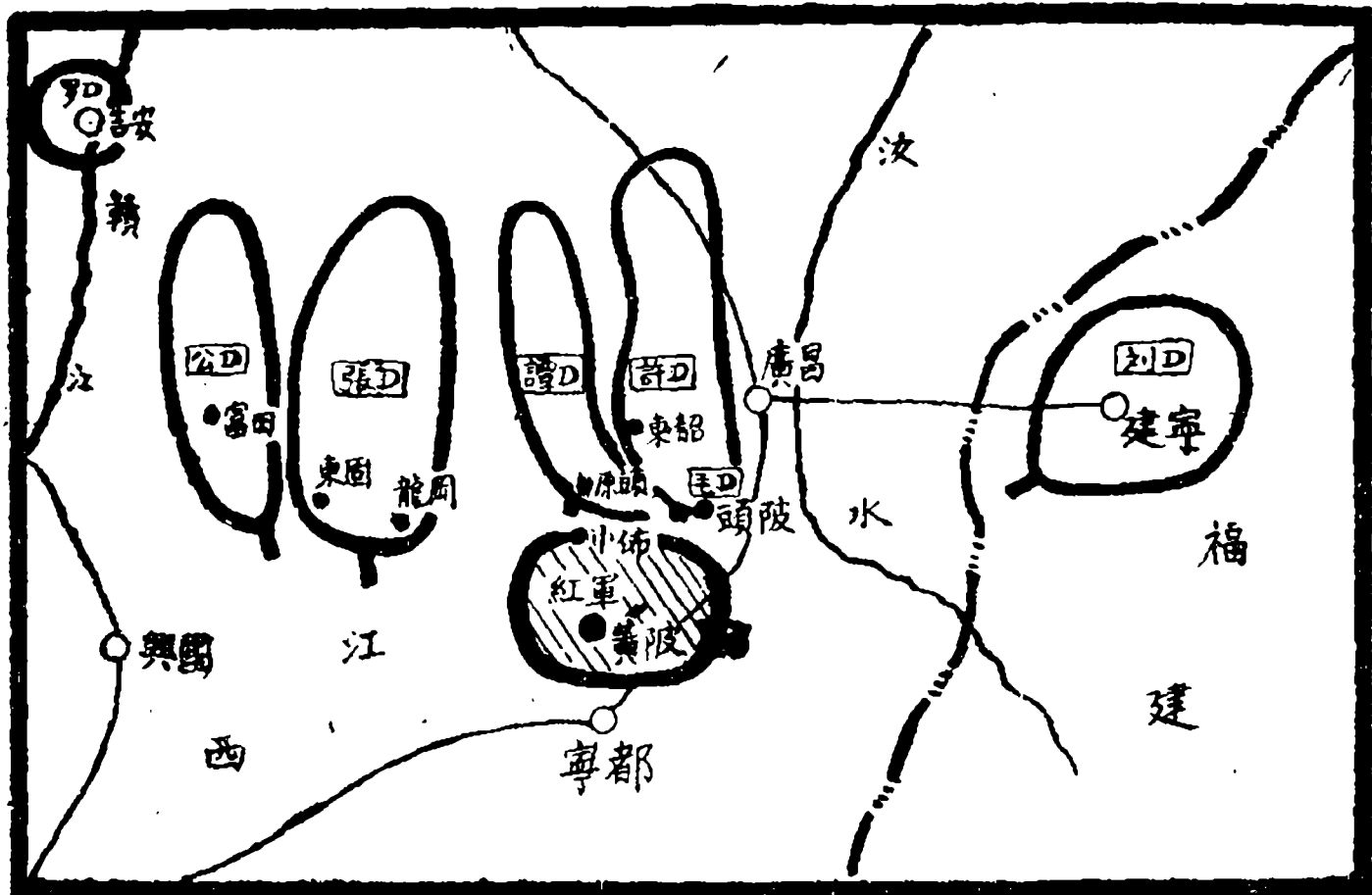
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對於反攻說來，或對於進攻說來，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在本性質上，這些問題的原則，應用於反攻或進攻，都是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反攻就是進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進攻。反攻原則，是在敵人進攻時應用的。進攻原則，是在敵人防禦時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又都有若干的區別了。

爲此理由，我雖然把作戰的許多問題統統說在戰略防禦的反攻部門中，而在戰略進攻部門中只說些另外的問題，我們應用時，却不可忽略其相同點，也不可忽略其差異點。爲避重複，這裏說了的，

在戰略進攻部門就不去說它了。

第一圖：四萬人集中於黃陂、小佈地區



許	D	—	許	克	祥	D
毛	D	—	毛	炳	文	D
劉	D	—	劉	和	鼎	D

羅霖
公秉
張輝
譚道

羅公張譚


五 反攻開始問題

反攻開始問題，即所謂『初戰』或『序戰』問題。

許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不論在戰略防禦或戰略進攻皆然，而以防禦爲尤甚。我們過去，曾經嚴重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區的一至五次圍剿給了我們以豐富的經驗，研究一下這些經驗不是沒有益處的。

第一次圍剿是敵人以約十萬人之衆，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之綫，分八個縱隊向蘇區進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於黃陂、小佈地區，如第一圖。

對立。(三)建寧遠在福建，地屬白區，劉師不一定越入江西。(四)頭陂是白區，東韶有A B團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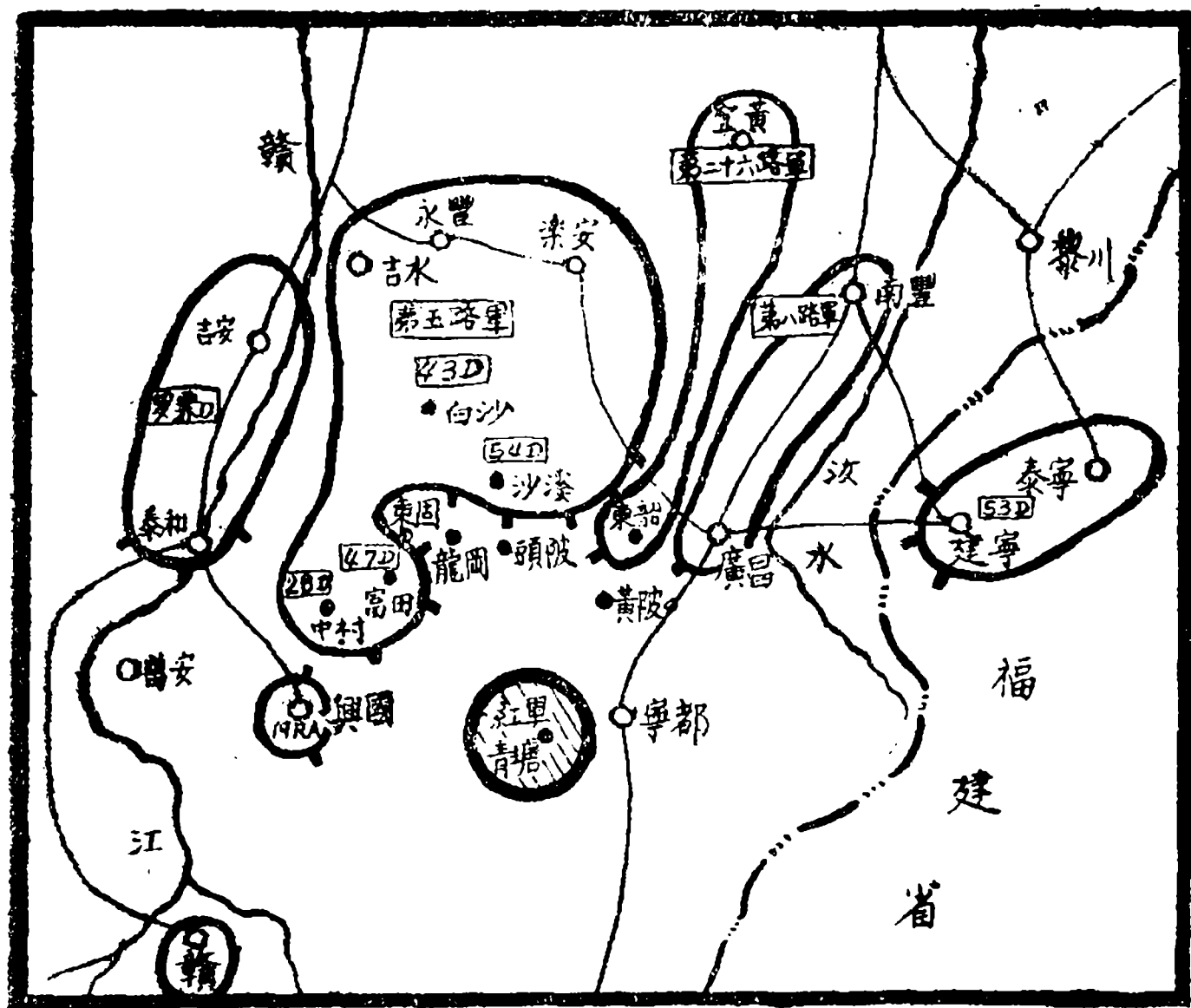
羅公張譚

當時的情況是：(一)吉安隔在贛江之西，羅師是防衛吉安的。(二)富田、東固一帶人民受A B團欺騙一時不信任紅軍，並與紅軍相

題，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許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譚公三師集中，不易決勝，不能最後解決問題。

(五) 張譚兩師是圍剿軍主力，圍剿軍總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張又是前敵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

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我一次打一個師是絕對優勢，張師又分置兩處。(六) 整個進剿軍不過十萬人，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七) 龍岡源頭一帶人民條件好，又能蔭蔽接近。(八) 龍岡有利於我之陣地，源頭不好打，如敵攻小佈就我，則陣地亦好。(九) 張譚接近我之集中地。(十) 中間突破打一缺口後，敵之東西諸縱隊便被分離為遠距之兩群。(十一) 我在龍岡西南數十里之興國有一個千餘人之獨立師，可迂迴於敵後，能集中



第二圖：第二次圍剿，敵之進攻與我之集中圖

附註

第5路軍 (王金鈺)

34 D — 郭華宗

54 D — 郝夢齡

28 D — 公秉藩

47 D — 王金鈺

第26路軍 (孫連仲)

25 D —

24 D —

第8路軍 (朱紹良)

8 D — 毛炳文

24 D — 許克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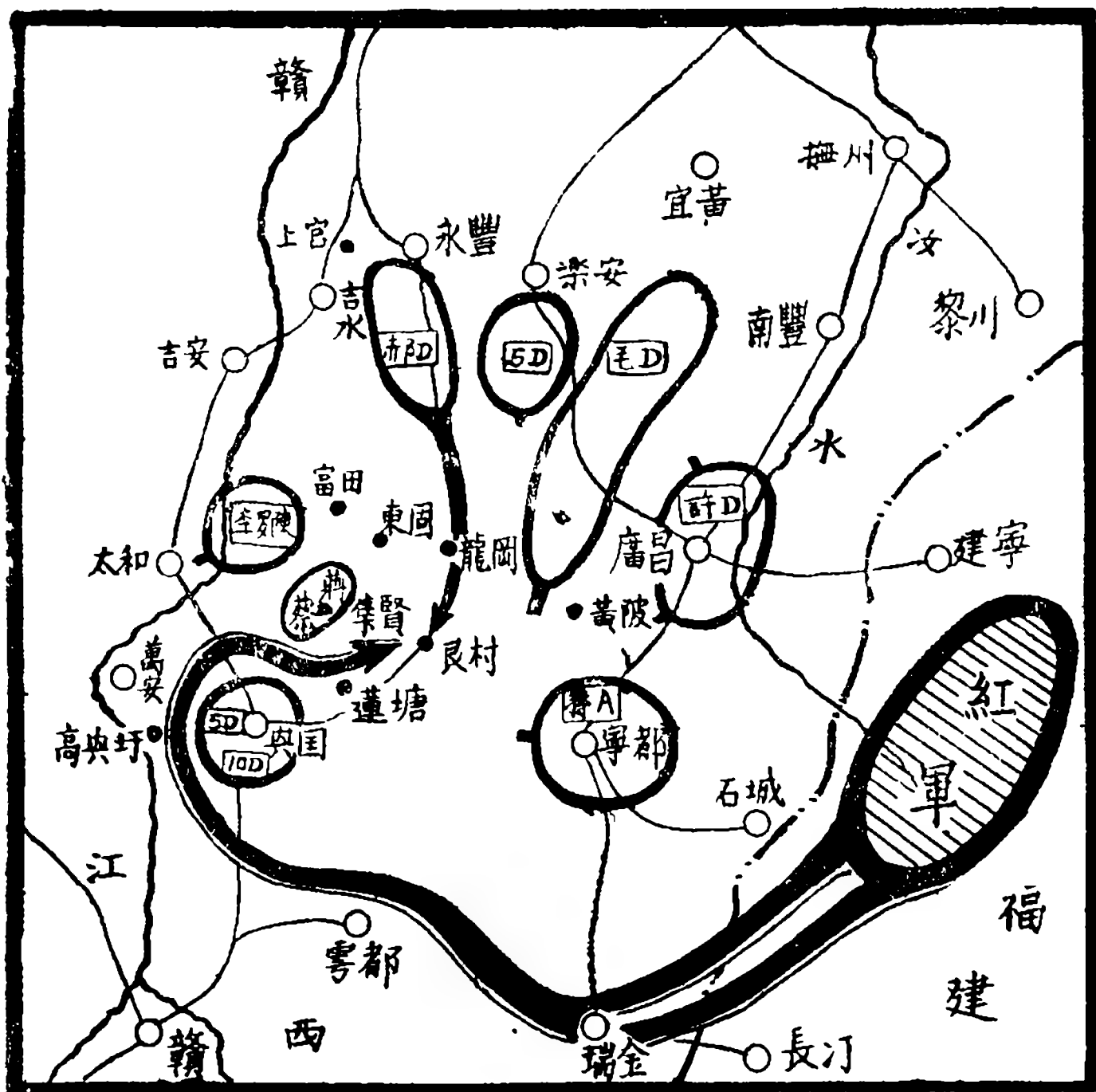
最大兵力。基上理由，我們的第一仗就決定了而且打着了張輝瓚主力，連師長在內全部九千人一齊俘獲不漏一人一馬。一戰勝利，譚師向東韶跑，許師向頭陂跑，我軍又追及譚師消滅他一半。五天內打兩個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七日至翌年一月一日），於是富田、東固、頭陂諸敵畏打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就結束了。

第二次圍剿，敵之進攻與我之集中如第二圖：當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二十萬人，何應欽爲總司令駐南昌。（二）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十九路軍，孫連仲軍，朱紹良軍爲最強，其餘較弱。（三）A B團肅清，蘇區人民擁護紅軍。（四）王金鈺北方新到，表示恐懼，其左翼郭郝兩路，大體略同。（五）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之建黎泰地區擴大蘇區，徵集資材，便於打破下一次圍剿。若由東向西打去，則限於贛江，戰局結束後無發展餘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廢時。（六）我軍人數雖略減（三萬餘），然有四個月的養精蓄銳。基上理由，乃決找王金鈺公秉藩（共十一個團）打第一仗，勝利後打郭，打孫，打朱，打劉，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卅日），走七百里，打五個仗，繳槍二萬餘，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當打王時，處於蔡郭兩敵之間，距郭十餘里，距蔡四十餘里，人謂我們爲『鑽牛角』，但終究鑽通了，主要因爲蘇區條件，再加敵軍各部之不統一。郭師敗後，郝師星夜逃回永豐，得免於難。

第三次圍剿的敵我形勢，如第三圖。

當時的情況是：（一）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個總司令。中何應欽，與蔣同駐南昌，右陳銘樞，駐吉安，左朱紹良，駐南豐。（二）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五師，師九團，約十萬人。次是蔣光鼐、蔡廷楷、韓德勤三師，四萬人。次是孫連仲軍，二萬人。餘均非蔣嫡系，較弱。（三）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於第二

第三圖：第三次圍剿良村戰役時的敵我形勢圖



場及其附近地區容我集中了一天，乃決計向蓮塘、良村、黃陂方向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與蔣蔡韓軍間之四十里空隙地，轉到蓮塘。第二天與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本師及郝師）前哨接觸。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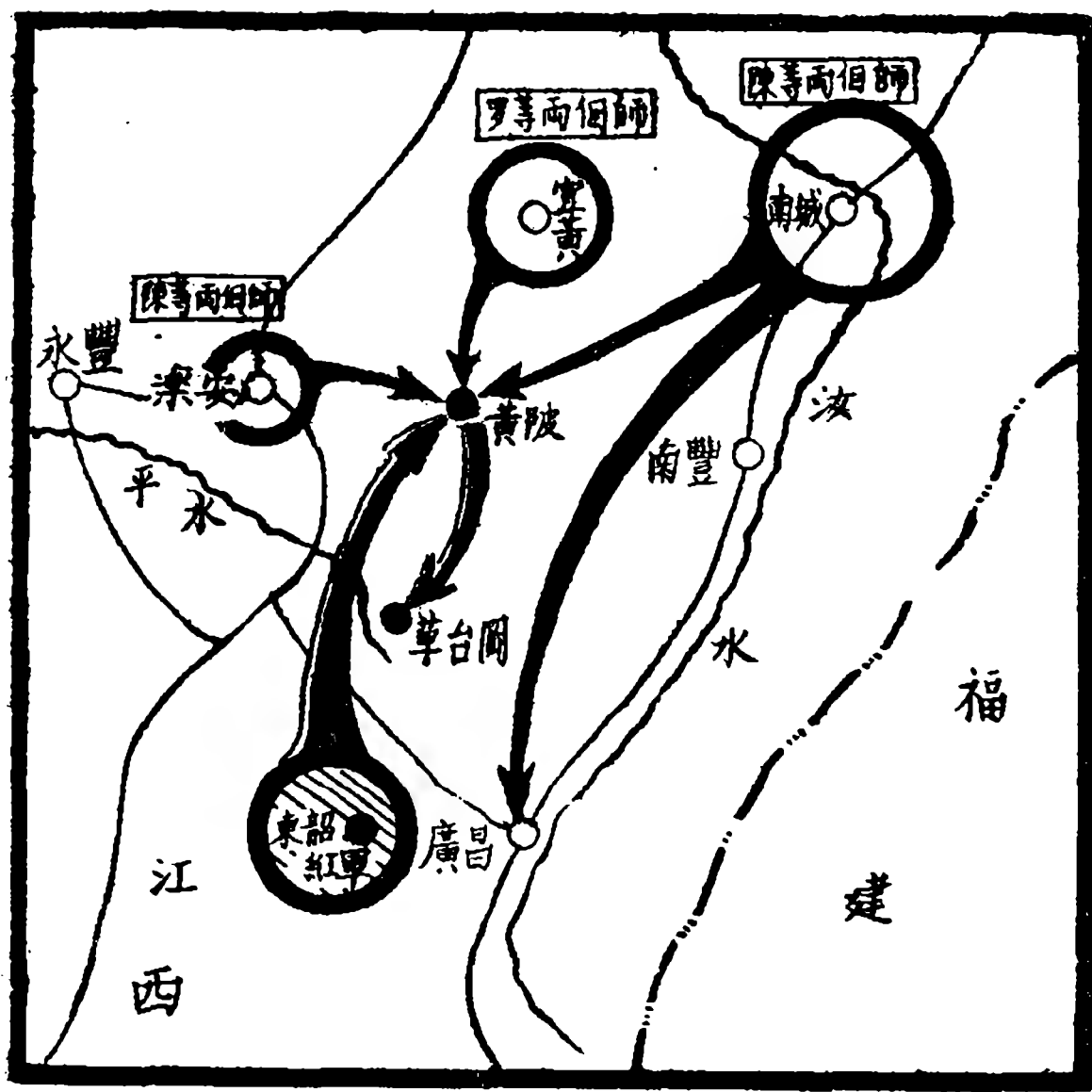
次圍剿之『步步為營』，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四）第二次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圍剿開始，為時僅一個月，紅軍苦戰後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回到蘇區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連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蘇區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部隊向富田開進之際，被敵發覺，陳羅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

三天打上官師爲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麟師爲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爲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轉旗向東，集中視線於黃陂，猛烈並進，找我求戰，取密集的陣地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乃於蔣蔡韓軍與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回到西面之興國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再向西進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飢疲沮喪，無能爲力，下決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蔣光鼐、蔡廷楷、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蔣光鼐、蔡廷楷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

第四次圍剿敵我形勢，如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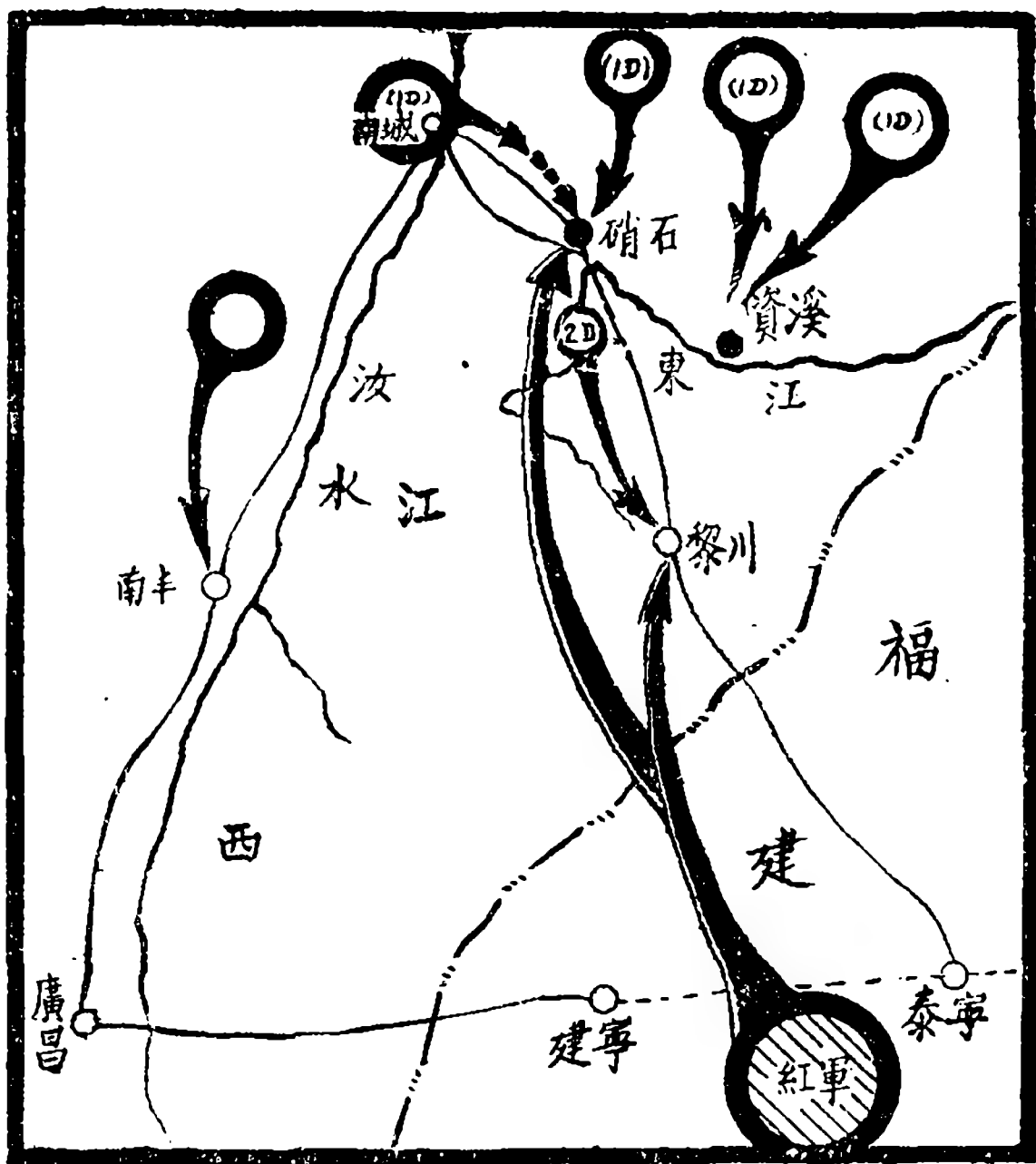
當時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兩師暴露於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於東黃陂以西，一舉消滅李明陳時驥兩個師。敵從左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得消滅其一個師於草苔岡。兩役繳槍萬餘，這個圍剿就基本打破了。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却企圖恢復黎川，禦敵於蘇區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北之資溪



第四圖：第四次圍剿敵我形勢圖

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第一次圍剿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却兩度按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第二次圍剿，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之建議，迫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於達到了要求。第三次圍剿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師，又被敵人發覺了我們迂迴其側後的計劃，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於在蓮塘打着第一個好仗。第四次圍剿攻



第五圖：第五次圍剿中初期的敵我形勢圖

橋，也是鞏固陣地與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與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五次圍剿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不退出蘇區。當時初戰的形勢如第五圖。

上述一至五次圍剿的經驗，證明處在防禦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強大的進剿軍，反攻的第一個戰鬪，關係非常之大。第一個戰鬪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於全局，乃至貫徹到最後的一個戰鬪。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後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

南豐不克，毅然採取了退却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東黃陂大勝仗。只有五次圍剿全不知初戰關係之大，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得失，從企圖挽救的觀點出發，於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之後（消滅敵一師），却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及其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脚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第二，慎重初戰的再一個理由，在於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說，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於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勝也只算敗了（如五次圍剿的洵口戰役）。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後一仗的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部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後，或萬一反攻失敗後，下文如何做，依然未盡得戰略指導者的責任。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後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階段。儘管往後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於政治是不利的，對於戰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的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衝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略要求，陷自己於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最高指揮，是具有遠大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五次圍剿及張國燾路線的戰略指導之所以錯誤，主要的就在於這一點。因此，退却階段時必

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須計算到退却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於眼前的利害，對於戰爭是十分不利的。

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忘記的三個原則。

六 集中兵力問題

這個問題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缺乏戰略頭腦，為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支配於環境，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

無論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的頭腦，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與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在於迅速恢復主動的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必然的失敗。

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保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防禦戰本來容易陷入被動地位，防禦戰大不如進攻戰之能够充分地發揮主動權。然而防禦戰是能够從被動的形式納入主動的內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動階段轉入形式上內容上的主動階段的。完全有計劃的戰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內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是誘敵深入準備反攻。只有不肯退却，倉卒應戰（例如硝石戰役），表面上似在力爭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戰略反攻，則不但內容是主動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却的被動姿勢。對於敵人，反攻是我軍強迫它放棄主動

權，同時即授與以被動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達到這種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消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與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爲了改變敵我形勢。第一，是爲了改變進退形勢。過去是敵進我退，現在是企圖達到我進敵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戰而勝，這個目的在本戰鬪就達到了，也給與影響於全戰役。

第二，是爲了改變攻守形勢。退却到退却終點，在防禦戰中基本上屬於消極階段，即『守』的階段。反攻則屬於積極階段，即『攻』的階段。雖然在整個戰略防禦中並沒有脫離防禦性質，然而反攻與退却相較，不但形式上，而且本質上，是起了變化的東西。反攻是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之間的過渡的東西，帶着戰略進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爲達此目的。

第三，是爲了改變內外線形勢。處於戰略上內線作戰的軍隊，特別是中國紅軍的被圍剿環境，蒙受着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鬪上，把它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爲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爲我軍對敵軍戰役或戰鬪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戰略上的優勢，改爲我軍對敵軍戰役或戰鬪上的優勢。將戰略上處於強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鬪上處於弱者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爲戰役上或戰鬪上的強者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禦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從戰略防禦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蘇維埃戰史中，這個問題常常成爲重要的爭論問題。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

完全集中就實行開進與攻擊，幸而敵人（鄧英師）自己逃走了，我們的攻擊本身並沒有奏效。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有所謂『全線出擊』的口號，要求蘇區東西南北四面出擊，這不但在戰略防禦時不對，就是戰略進攻時也是不對的。無論什麼時候，也無論戰略或戰術，都有防禦與進攻，箝制與突擊的兩方面，事實上絕少所謂『全線出擊』。全線出擊的口號，是伴着軍事冒險主義而來的軍事平均主義。在革命前進時，當作一個政治口號是對的，但當作軍事口號就不對了。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的說法，把紅軍主力分割爲二，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那時的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當時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照我的意見，不論一萬兵一百萬兵或一千萬兵，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二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二個或二個以上，但主要方向、在同一時間內，只應有一個。歐戰時強大的德軍，同一時間的主要作戰方向始終只有一個。軍事評論家對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間因東普魯士危急抽調西戰場少數兵力東援，還有認爲錯誤的。假如西戰場的不得手，這個抽調是其主要原因或原因之一的话，那末，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原因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那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是如此。不是對戰役與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能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寧都東韶打譚道源戰役，一九三一年八月的興國高興圩打十九路軍戰役，一九三二年七月南雄水口圩打陳濟棠戰役，一九三四年三月黎川團村打陳誠戰役，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圩與團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後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他們是

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個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法則之一。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五次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線抵禦』，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於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箝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一二三四次圍剿都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在三次圍剿時蘇區幾於全失，然而結果不但都恢復了，而且擴大了土地。

由於看不見蘇區人民的力量，發生懼怕紅軍遠離蘇區的錯誤心理。這種心理在一九三二年紅軍打漳州時，一九三三年四次圍剿勝利後紅軍轉向福建進攻時，都曾發生過。前者懼怕整個蘇區被佔，後者懼怕蘇區一部被佔，而主張分兵把守，結果都證明不對了。在敵人看來，一方面蘇區是畏進，一方面打到白區去的紅軍是他們主要的危險物，所以敵軍的注意力總是向着主力紅軍的所在地，拋開主力紅軍而專向蘇區，是很少這種事情的。在防禦時，紅軍也是主要的吸引力。縮小蘇區的計劃是敵人整個計劃的一部份；但如果紅軍集中主力消滅其一路，敵人就不不得不把注意力與軍力更大的向着紅軍。所以敵人縮小蘇區的計劃，也是能够被破壞的。

『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不能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禦從事短促突擊』的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三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不小的成份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禦促成的。如果在內線放棄節節抗禦的戰法，再則必要時轉向敵人的內線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戰勝堡壘主義的工具。

立三主義主張廢棄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早已證明是不對的。

了。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在蘇維埃戰爭看來，是和主力紅軍同爲一個人的兩隻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僅僅是一個獨臂將軍。蘇區的人民條件，具體說來，特別對於作戰說來，就是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爲畏途，主要的也在這一點。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並不包括放棄人民武裝與小的游擊戰爭在內。

置紅軍的支隊於次要的作戰方向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係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兵力臨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集中四萬人打張輝瓚的九千人。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圍剿的最後一戰——向建寧打七千人的劉和鼎，紅軍只以一萬多人去打他。

也不是說每次都要優勢兵力，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相對劣勢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於戰場。前者例如某一區域僅僅有一枝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當某一優勢敵人進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條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時，以游擊隊或小支隊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擊其另一翼之一部份，當然也是必要的，並且是可以勝利的。當我襲擊其一翼之一部份時，兵力的對比仍適用以優勢對劣勢，以多勝少的原則。後者（絕對劣勢）例如游擊隊襲擊白軍大隊伍，僅僅是襲擊其一小部份，同樣適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於一戰場作戰，受限制於地形、道路、給養、居處等的說法，也應該分別的去看。這些限制，對於紅軍與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因爲紅軍較之白軍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難。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敵人這樣說。這件事情已經不是秘密，敵人一般都摸熟了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

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這樣打他們，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

七 運動戰

運動戰還是陣地戰？我們的答覆是：運動戰。在沒有優勢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蘇區中打來打去僅只一個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於我們是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於我們，不但防禦時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

由於敵人強大與紅軍技術貧弱所發生的紅軍作戰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戰線。

紅軍的作戰線，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線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後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

革命的內戰時期，作戰線不能固定，就在蘇聯也有過這種情形。它們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在於不固定程度不如我們之甚。一切戰爭也不能有絕對固定的作戰線，勝負進退的變化不許可如此。但相對固定的作戰線往往見之於一般的戰爭。惟獨敵我強弱懸殊像處在目前階段的中國紅軍這樣的軍隊，則是例外。

作戰線的不固定，影響到蘇區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蘇區領土的流動性，完全來源於戰爭的流動性。

戰爭與蘇區領土的流動性，影響到蘇維埃建設也發生流動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劃是不能設想

的，計劃改變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

承認這種特點，對於我們是有利益的。從這個特點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進無退的戰爭，不要震驚於蘇區領土與軍事政治後方的暫時流動，不要企圖建立長時期的具體計劃。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於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乾糧袋洒掉了。只有從現在的流動生活中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不流動，才能爭取最後的固定。

統治於五次圍剿時期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當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長征。

我們是一個國家，但今天我們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今天我們還處在內戰的第一時期，距離完全國家還很遠，我們軍隊的數量與技術較之敵人還差得遠，我們的領土還很小，我們的敵人時時刻刻想要消滅我們才快活。從這個上面建設我們的方針，不是一般的反對游擊主義，而是老老實實的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在這裏怕羞是沒有用的，相反，游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我們應該準備拋棄游擊性，但今天還不能拋棄。游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與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今天却是寶貴的與必須堅持的東西。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天下也沒有只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得這麼利害罷了。對於我們，走路的时间通常多於作戰，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好的。一切的『走』都爲着『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敵人雖不多，但與其隣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佔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

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的，紅軍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裏。

基本的是運動戰，並不是拒絕一切陣地戰。戰略防禦時，箝制方面某些支點的固守，戰略進攻時孤立無援之敵，都是應該承認用陣地戰去對付的。採取這樣的陣地戰制勝敵人的經驗，我們過去已經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壘、寨子，被我們打開，某種程度的敵人野戰陣地被我們突破。以後還要增加這一方面的努力，補足我們這一方面的弱點。我們完全應該提倡那種在情況需要而且許可下的陣地攻擊與陣地防禦。我們反對的，僅僅是在今天採取一般的陣地戰，或把陣地戰與運動戰平等看待，這些才是不能許可的。

紅軍的游擊性，沒有固定作戰線，蘇區的流動性，蘇維埃建設的流動性，十年戰爭中一點也沒有變化嗎？是有變化的。從井岡山到一次圍剿爲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與流動性是很大的，紅軍還在幼年時代，蘇區還是游擊區。從一次圍剿到三次圍剿爲第二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與流動性就縮小了许多，方面軍已經建立，蘇區根據地也已經建立。從三次圍剿至五次圍剿爲第三階段，游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個階段，由於否認小游擊與小流動，就來了一個大游擊與大流動。目前是第五個階段，由於沒有戰勝五次圍剿與大流動的結果，紅軍與蘇區均相對的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建立了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爲前此所未有。

依戰略的性質說，也可以說井岡山至第四次圍剿爲第一階段，五次圍剿爲又一階段，長征至今爲第三階段。五次圍剿時否認了以前的方針，我們今天又否認了五次圍剿的方針，復活了從前的方針。然而不是否認五次圍剿時的一切，也不是復活從前的一切，復活的是從前優良的東西，否認的是五次

圍剿時錯誤的東西。

游擊主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缺乏紀律，簡單現象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高級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丟掉它，使之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更複雜化些，就是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階段所不必要的游擊性。在這一方面拒絕前進，固執地停頓於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大規模作戰的。

另一方面是運動戰，是現在還需要的戰略與戰役作戰的游擊性，是無法阻止的蘇區流動性，是蘇維埃建設計劃的靈活變更性，是紅軍建設不要不適時宜的正規化。在這一方面拒絕歷史，反對保留有用東西，貿然地脫離現階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當前沒有現實意義的、所謂『新階段』，同樣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當前作戰的。

我們現在是處在紅軍技術與組織的下一新階段的前夜，我們應該準備轉變到新階段去。不作這種準備是不對的，是不利於將來的戰爭的。在將來，紅軍的技術與組織條件改變了，紅軍建設提到了新階段，紅軍的作戰方向與作戰線之比較固定就出現了，陣地戰增加了，戰爭的流動性、蘇維埃領土與建設的流動性、大大減少了。到最後，也就會消滅了。現在所受的限制，如像優勢的敵人，鞏固的陣地等等，就有法子克服了。

我們現在一方面反對五次圍剿時的錯誤的與過早的辦法，另一方面也反對復活五次圍剿以前紅軍幼年時代的一切非正規性。但是我們堅決地恢復紅軍一路來用以打勝仗的許多可寶貴的戰略戰術的原則。同時也吸收五次圍剿戰爭中關於紅軍建設方面與作戰方面某些優良的與有益的經驗。並且把所有一切過去優良的東西都總結起來，成為有系統的更發展的更豐富的軍事路線或戰略路線，爭取在今天

戰勝我們的敵人，並且準備着轉變到新階段去。

運動戰的實行方面，問題是很多的，如偵察、判斷、決心、戰鬪部署、指揮、蔭蔽、迅速、集中、開進、展開、攻擊、追擊、襲擊、陣地攻擊、陣地防禦、遭遇戰、退却、夜戰、特種戰鬪、避強打弱、圍城打援、佯攻、防空、處在幾個敵人之間、超越敵人作戰、連續作戰、無後方作戰、養精蓄銳之必要等等，這些問題在紅軍作戰史中都表現許多的特點，戰役學中將有條理的敘述及之，應給以很好的總結，我在這裏不贅述了。

八 速決戰

戰爭的持久戰，戰役與戰鬪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中國蘇維埃戰爭的兩個同時並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

因為統治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生長的，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上面性急是要吃虧的，在這上面提倡『速決』是不正確的。幹了十年的蘇維埃戰爭，對於別的國家也許是值得驚奇的，對於我們却好似八股文章還只作了破題、承題、與起講，許多熱鬧文章都還在後面。往後的發展，在一切內外條件的影響下，無疑比較過去有大大增高速度之可能，因為國際與國內環境已經起了變化，而且會有更大的變化在後面，可以說我們已經脫離了過去的那種慢慢發展孤軍作戰的景況。然而不應該打算明天就會成功。『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統治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加上國內反革命，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直接大量援助中國革命以前，我們的革命同戰爭依然是持久的。從

這一點出發，規定我們長期作戰的戰略方針，是戰略指導的重要原則之一。

戰役與戰鬪的原則與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決。在這個上面爭取速決，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戰爭問題，古今中外都無不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為不利的。惟獨中國的戰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線時譏笑我們的『打拳戰術』（說的是打過來打過去才能奪取大城市），譏笑我們要待白髮才能看見革命的勝利，這種表現革命急性病的情緒，早已證明是不對了。但這些意見如果放在戰役與戰鬪上面去說，則是非常之對的。原因在於：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彈藥沒有來源；第二，白軍有多個，紅軍只一個，打破一次圍剿要準備迅速的連續戰；第三，白軍各個雖分進，然多是比較的密集，打它一個，如不能迅速解決戰鬪，其餘各個就都來了。爲了這些理由，不能不採取速決戰。對於我們，幾小時、一天、或兩天解決一個戰鬪是經常的。只有在『圍城打援』的方針下，目的不在打圍敵，而在打援敵，對圍敵是準備着相當地持久的，但對援敵仍然是速決。戰略防禦時固守箝制方面的據點，戰略進攻時打孤立無援之敵，消滅蘇區中的白色據點，這些時候也常常給與戰役或戰鬪的持久方針。然而這些持久戰，只有幫助而並不妨礙主力紅軍的速決戰。

速決戰不但是心裏想要如此就成功的（心裏想要當然是首先重要的），還須加上許多具體的條件，主要的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包圍迂迴戰術，良好陣地，打運動中之敵或駐止中而陣地不鞏固之敵。不解決這些條件，而求戰役或戰鬪速決，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圍剿屬於一個大戰役，依然適用速決原則，而不是持久原則，因爲蘇區的人力財力軍力條件都不許可持久。

但在一般速決原則之下，反對不正當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個蘇區的最高軍事政治領導機關，估

計到蘇區的這些條件，估計到敵方情況，不爲敵之其勢汹汹所嚇倒，不爲尙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爲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與持久，是完全必要的。中央蘇區打破第一次圍剿，從初戰到結束只有一星期，第二次圍剿只有半個月，第三次圍剿就熬上三個月，第四次是三星期，惟獨第五次熬了整整的一年。第五次圍剿最後突圍還表現了倉卒，依情況還可熬上二三個月用以休息訓練紅軍，假如這樣，又假如突圍後的領導稍爲聰明一點，情況便將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如此，仍不破壞力爭縮短全戰役時間的原則。除了戰役戰鬪計劃力爭集中兵力與運動戰等等條件、務期在內線（在蘇區）消滅敵之有生力量、迅速解決圍剿以外，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爲經常的作戰手段。五次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來之時，紅軍主力無疑應該轉到以浙江爲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聘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爲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進攻蘇區之敵不得不回援其根本重地，用這種方法粉碎其向蘇區的進攻，並用這種方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且確定地援助了它。此計不用、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當着打了一年之時，此時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株州長沙與常德，包括湖南的部份在內，作爲自己的戰略活動地帶，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用此以打破圍剿，保衛蘇區。此計又不用，打破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九 殲滅戰

『拚消耗』的主張，對於紅軍是不識時宜的。『比寶』的玩藝兒，不是龍王向龍王，而是乞丐向龍王，未免有點滑稽。對於自己一無所有一切取給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才能解決圍剿與發展蘇區。給敵以殺傷，是作為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採取的，否則便沒有多大意義。因給敵以殺傷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敵以殲滅而給我以補充，這是市場交易法則應用於戰爭。擊潰戰對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決定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團不如殲滅其一個團。

對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殲滅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於全敵不過一部份，然而圍剿是打破了。五次圍剿，我們的方針反其道而行之，實際上幫助敵人達到了目的。

高興圩，水口圩一類的戰役是不足為法的，歷來都認為是失本生意。我們的經典是必須有所繳獲。

殲滅戰與集中優勢兵力及採取包圍迂迴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便不能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戰不可少的。整團整師之敵被殲滅的事，事實上當然是不常見的，但一有可能，我們的計劃就應向着它。爭取大部殲滅，是我們經常計劃的出發點。

擊潰有意義，乃至讓敵逃去有意義，是對於全戰團或全戰役中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舉行殲滅戰而發生的，否則便沒有什麼意義。這又是一種有所失對有所得而有意義的場合。

蘇區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應該依賴帝國主義與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與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而送來。這是真理，不是笑話。某處地方紅軍曾經不知此真理，那裏的兵工廠（雖然不大）出品最優，那裏的紅軍最少打勝仗。

全世界又將有一場大消耗戰要到來，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已曾大拚其消耗，然而這不足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革命暴動與革命戰爭所取法。這樣的暴動與戰爭，主要的依靠進攻與消滅對手而解決自己的問題。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九三八年五月——

一 爲什麼提起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抗日戰爭中，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這一點，我們已經正確地解決了。那末，游擊戰爭就只有戰術問題，爲什麼提起戰略問題呢？

如果我們是一個小國，游擊戰爭只在正規軍的戰役作戰上起些近距離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當然只有戰術問題，沒有什麼戰略問題。又如果中國也像蘇聯那樣強大，敵人進來，很快就能被趕出，或雖時間較久，但被佔地區不廣，游擊戰爭也只是一種戰役的配合作用，當然也只有戰術問題，沒有什麼戰略問題。

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發生的：中國既不是小國，又不像蘇聯；是一個大而弱

的國家。這一個大而弱的國家被另一個小而強的國家所攻擊，但這個大而弱的國家却處於進步的時代，全部問題就從這裏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佔地甚廣的現象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佔地甚廣，但它是小國，兵力不足，留了很多空虛的地方，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的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且由於中國的進步，它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等等一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於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於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中，都是頗為新鮮的事情，這件事是與時代進步到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開的，這乃是問題的焦點所在。我們的敵人大概還在那裏做元朝滅宋，清朝滅明，英佔北美與東印度，拉丁佔中南美等等的好夢，這等夢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現實的價值，因為今天的中國比之上述歷史多了一些東西，頗為新鮮的游擊戰爭就是其中的一點，假如我們的敵人少估計了這一點，它就一定要在這一點上面觸一個很大的霉頭。

這就是抗日游擊戰爭雖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仍處於輔助的地位，但必須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二 那末爲什麼不將抗日戰爭的一般戰略問題中的東西用之於游擊戰爭呢？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本來是密切聯系於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許多東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擊戰爭又區別於正規戰爭，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頗有許多特殊的東西，抗日戰爭的一般戰略問題中的東西，決不能照樣用之於特殊情形的游擊戰爭。

三 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在具體的說到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先，還要說一說，戰爭的基本問題。

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於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盡可能的保存自己力量，消滅敵人力量。這個原則在革命戰爭中是直接與基本的政治原則聯系的。例如中國抗日戰爭的基本政治原則（即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在軍事上實行起來，就是以軍事力量保衛祖國驅逐日寇。爲達到這個目的，在軍隊本身的行動上，就表現爲：一方面盡可能地保存自己力量，另一方面盡可能地消滅敵人力量。何以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每一戰爭都須支付代價，有時是極大的代價，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正確點說，是相反相成的，因爲這種犧牲，不但爲了消滅敵人的必要，也爲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份的暫時的『不保存』（犧牲或支付），是爲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須的。在這個基本的原則上，發生了指導整個軍事行動的一系列的所謂原則，從射擊原則（隱蔽身體，發揚火力，前者爲了保存自己，後者爲了消滅敵人）起，到戰略原則止，都貫徹這個基本原則的精神。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則，都是執行這個基本原則時的條件。只有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才是一切軍事原則的根據。

四 抗日游擊戰爭的具體戰略問題共有六個

現在我們來看抗日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應該採取些什麼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呢？因為抗日戰爭（乃至一切革命戰爭）的游擊隊一般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還須加上一個發展自己。所以問題是：應該採取些什麼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或發展自己與消滅敵人的目的呢？

總的說來，主要的方針有下列各項：（一）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與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二）與正規戰爭相配合；（三）建立根據地；（四）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五）向運動戰發展；（六）正確的指揮關係。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與發展自己，消滅與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途徑。

五 第一個問題——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這裏又可分為四點來說：（一）防禦與進攻，持久與速決，內線與外線的關係；（二）一切行動立於主動地位；（三）靈活的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動的計劃性。先說第一點。

整個的抗日戰爭，由於日寇是強國，是進攻的，我們是弱國，是防禦的，因而決定了我們是戰略上的防禦戰與持久戰，拿作戰線說來，敵人是外線作戰，我們是內線作戰，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在又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敵軍雖強（武器與人員的某些素質某些條件），但數量不多，我軍雖弱（同樣，僅是武器與人員的某些素質某些條件），但數量甚多，加上敵人是異民族侵入我國，我是同民族反抗異族這個條件，這樣就決定了下列的戰略方針：能夠而且必須在戰略的防禦戰之中採取戰役與戰鬪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採取戰役與戰鬪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採取戰役與戰鬪的外線作戰。這是整個抗日戰爭應該採取的戰略方針。正規戰爭如此，游擊戰爭也是如此。游擊戰爭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現形式上的問題。游擊戰爭是一般用襲擊的形式表現其進攻的，正規戰爭雖也應該而且能夠採用襲擊戰，但其出敵不意的程度比較小一些。在游擊戰，速決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戰役與戰鬪中包圍敵人的外線圈則很小，這些都是和正規軍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擊隊的作戰，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採取秘密與神速的行動，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很快地解決戰鬪；而要力戒消極防禦，力戒拖延，並力戒臨戰分散兵力。當然，游擊戰爭中不但戰略上有防禦，戰術上也是有防禦的，戰鬪時的箝制與警戒方面，隘路、險地、河川或村落等處爲着消耗敵人與疲憊敵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時的掩護部隊等等，都是游擊戰爭中戰術上的防禦部份。然而游擊戰爭的基本方針必須是進攻的，和正規戰爭比較起來，其進攻性更加大些。而且這種進攻必須是奇襲，大搖大擺大吹大擂的暴露自己，是較之正規戰更加不能許可的。游擊戰爭雖也有堅持數天的戰鬪場合，例如攻擊某個孤立無援的小敵，但一般的作戰較之正規戰更加要求迅速解決戰鬪，這是被敵強我弱的情況規定了的。游擊戰爭本來是分散的，所以成其爲普遍的游擊戰，且在許多任務，例如：擾亂、箝制、破壞及做群眾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爲原則。然而就一個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當着執

行消滅敵人的任務，尤其是爲着打破敵人的進攻而努力時，就仍須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敵小部』，仍然是游擊戰爭戰場作戰的原則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從整個的抗日戰爭看來，祇有將正規戰與游擊戰的戰役與戰鬪的進攻戰集合了很多，即從進攻戰中打了很多的勝仗，才能達到戰略防禦之目的，最後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祇有戰役與戰鬪的速決戰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戰役與戰鬪的進攻戰都能因迅速解決戰鬪之故而取得了勝利，才能達到戰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爭取時間加強抗戰力量，同時促進與等候國際形勢的變動與敵人的內潰，以便舉行戰略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也祇有每戰集中優勢兵力，不論在戰略防禦時期也好，在戰略反攻時期也好，一律採取戰役與戰鬪中的外線作戰，包圍敵人而消滅之，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消滅所包圍之全部，也消滅所包圍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虜所包圍之敵，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敵，集合很多這樣的殲滅戰，才能轉變敵我形勢，將敵之戰略包圍，即敵之外線作戰方針根本擊破，最後配合國際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戰爭，共同圍剿日本帝國主義而一舉推翻之。這些結果，主要的依靠正規戰取得，游擊戰祇有次一等的成績，但集合許多小勝化爲大勝，則是正規戰游擊戰相同的，游擊戰爭在抗日過程中起着偉大的戰略作用，就是說的這一點。

現在來說游擊戰爭的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的問題。游擊戰爭的主動性是什麼呢？

一切戰爭的敵我雙方，都力爭在戰場、戰地、戰區以至整個戰爭的主動權，因爲這種主動權即是軍隊的自由權，軍隊失掉了主動權，被逼處於被動地位，這個軍隊就不自由，就有被消滅或被打敗的危險。本來戰略的防禦戰與內線作戰，爭取主動較爲困難些，而進攻的外線作戰，爭取主動較爲容易些。但日本帝國主義有兩個基本的弱點，即是兵力不足與異民族戰爭；並且由其對中國力量的估計不足與日本軍閥的內部矛盾，產生了許多錯誤的指揮，例如逐漸增加兵力，缺乏戰略的協同，某種時期

沒有主力方向，某些作戰失去時機，及有包圍無殲滅等等，可以說是他的第三個弱點。這樣，兵力不足（包括小國、寡民、資源不足及它是封建的帝國主義等等），異民族戰爭（包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及其野蠻政策等等），指揮笨拙，使得日本軍閥雖處進攻戰與外線作戰的有利地位，却使其主動權日益減弱下去。日本目前還不願也不能結束戰爭，它的戰略進攻也還沒有停止，但大勢所趨，它的進攻是有一定限度的，這是三個弱點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無限止的吞滅全中國是不可能的。會有一天日本要處於完全的被動地位，這種情況現在就可以開始看出來。中國方面，第一期戰爭頗處於被動，第二期因有了經驗，改取了新的運動戰，即戰役與戰鬪的進攻戰、速決戰與外線作戰的方針，加上普遍發展游擊戰的方針，中國的主動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來。

游擊戰爭的主動權問題，是更加嚴重的問題，因為游擊隊大多處於嚴重的環境，這就是無後方作戰的狀態，敵強我弱的狀態，缺乏經驗的狀態（那些新成立的游擊隊）與不統一的狀態等等。但游擊戰爭是能够建立其主動權的，主要的條件就是抓住上述敵人的三個弱點。欺它兵力不足（從整個戰爭看來），就給了游擊隊以廣大的活動地區；欺它是異民族，且執行極端的野蠻政策，就給了游擊隊以千百萬人民的擁護；欺它指揮笨拙，就把游擊隊的指揮客觀上顯得聰明了許多。一切敵人的這些弱點，正規軍也應捉住，作為自己戰勝敵人的資本，但游擊隊尤其要注意捉住它。游擊隊自己的弱點，可以從鬪爭中逐漸減少。且其弱點有時正成為爭取主動地位的條件，例如正因為游擊隊弱小，才利於在敵人後方神出鬼沒的活動，敵人無奈它何，這樣大的自由是龐大的正規軍所不能得到的。

游擊隊的主動權，在敵人舉行數路圍攻的場合是難於掌握與容易喪失的，在這種場合，如果估計與處置得不正確，就容易處於被動，因而打不破敵人的圍攻。在敵取守勢我取攻勢時，也有這種情形。所以主動權是從正確的情況估計（敵我雙方的情況）與正確的軍事政治處置產生的。不合客觀情

況的悲觀的估計，與隨之而來的消極的處置，無疑將喪失主動權，把自己拋入被動地位。但同樣，不合客觀情況的過於樂觀的估計，與隨之而來的冒險（不必要的那種冒險）的處置，也將喪失主動權，而最後歸入悲觀者一路。主動權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聰明的領導者從虛心研究與正確估計客觀情況，正確處置軍事政治行動所產生的東西。因此，是要意識地去爭取的東西，不是現成的東西。

已經因估計與處置錯誤，或因不可抗的壓力，被迫處於被動地位了的時候，這時的任務就是努力脫出這種被動。如何脫出法須依情況而定。許多情況下『走』是必須的，游擊隊的會走正是其特點，走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的主要方法。但不限於這一方法，往往正當敵人十分起勁自己十分困難的時候，正是敵人開始不利，自己開始有利的時候。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與主動的恢復，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現在來說靈活性。

靈活性就是具體表現主動性的東西，靈活的使用兵力，是游擊戰爭比較正規戰爭更加需要的。

必須使游擊戰爭的指導者明白，靈活的使用兵力，是轉變敵我形勢爭取主動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據游擊戰爭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須按照任務及敵情、地形、居民等條件作靈活的變動，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與轉移兵力。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對於使用游擊隊，好像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要收得攏。當散開時，要看清水的深淺，流的速度，及那裏有無障礙，如同游擊隊分散使用時，須注意不要因情況不明，行動錯誤而受損失。爲了收得攏，就要握住網的繩頭，如同使用部隊要保持通信聯絡並保持相當主力在自己手中一樣。打魚要時常變換地點，游擊隊也要時常變換位置。分散、集中及變換，是游擊戰爭靈活使用兵力的三個方法。

一般說來，游擊隊當分散使用，即所謂『化整爲零』時，大體上是依下述幾種情況實施的：（一）敵取守勢，暫時無集中打仗可能，採取對敵行寬大正面的威脅時；（二）在敵兵力薄弱地區，進行普遍的騷擾和破壞時；（三）無法打破敵之圍攻，爲着減小目標以求脫離敵人時；（四）地形或給養受限制時；（五）在廣大地區內進行民衆運動時。但不論何種情況，當分散行動時須注意：（一）保持較大一部於適當的機動地區，不要絕對的平均分散，一則便於應付可能的事變，一則使分散執行的任務有一個重心。（二）給各分散部隊以明確的任務，行動的地區，行動的時期，集合的地點及聯絡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謂『化零爲整』的辦法，多半是在敵人進攻之時爲了消滅敵人而採取的；也有在敵人取守勢時，爲了消滅某些駐止之敵而採取的。集中兵力並不是說絕對的集中，集中兵力使用於某一重要方面，對其他方面則留置或派出部份兵力，爲箝制、擾亂、破壞等用，或作民衆運動。

按照情況，靈活的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擊戰爭主要的方法，但還須懂得靈活的轉移（變換）兵力。當敵人感到游擊隊對它有了大的危害時，就會派兵鎮壓或舉行進攻。因此，游擊隊要考慮情況，如果可以打時，就在當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時，就應不失時機，迅速的轉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時爲着各個擊破敵人，有剛才在這裏消滅了敵人，又立即轉移到另一方向去消滅敵人的；也有在這裏不利於戰鬥，要立即脫離此敵轉移到另一方向去進行戰鬥的。如果敵情特別嚴重，游擊部隊不應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風一樣，迅速的移動其位置。兵力轉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經常要採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騙引誘與迷惑敵人，例如聲東擊西，忽南忽北，即打即離，夜間行動等。

分散、集中與轉移的靈活性，都是游擊戰爭具體表現主動性的東西；死板、呆滯，必至陷入被動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損害。但領導的聰明不在懂得靈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體情況善於及時

的實行分散集中與轉移兵力。這種善觀風色與善擇時機的聰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虛心研究，勤於考查與思索的人們可以獲得。爲使靈活不變爲妄動，慎重的考慮情況是必要的。

最後說到計劃性問題。

游擊戰爭要取得勝利，是不能離開它的計劃性的。亂幹一場的想法，只是玩弄游擊戰爭，或者是游擊戰爭的外行。不論是整個游擊區的行動或是單個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的行動，事先都應有盡可能的嚴密的計劃，這就是一切行動的預先準備工作。情況的了解，任務的確定，兵力的部署，軍事政治教育的實施，給養的籌劃，裝備的整理，民衆條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領導者們的過細考慮，切實執行，與檢查執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沒有這個條件，什麼主動、靈活、進攻等事，都是不能實現的。固然正規戰爭的計劃性更大些，游擊戰爭的條件不容許很大的計劃性，如果企圖在游擊戰爭中實行高度嚴密的計劃工作，是錯誤的；但依照客觀條件允許的程度，採取盡可能嚴密的計劃，則是必要的，須知同敵人鬭爭是一件不能開玩笑的事情。

總括上面所說的各點，說明了游擊戰爭戰略原則的第一個問題——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中的進攻戰，持久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這是游擊戰爭戰略原則的最中心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游擊戰爭的勝利就有了軍事指導上的重要的保證。

這裏雖說了許多的東西，但一切都環繞於戰役與戰團的進攻。主動地位只有在進攻勝利之後，才能最後的取得。一切進攻戰也都要主動地組織之，不要被追地採取進攻。靈活的使用兵力，環繞於爲着進攻戰這個中心；計劃性的必要，主要的也是爲了進攻的勝利。戰術上的防禦手段，離開直接或間接協助進攻，則毫無意義。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外線是說的進攻的範圍。進攻是消滅敵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單純的防禦與退却，對於保存自己只有暫時的部份的作用，對

於消滅敵人則完全無用。

這個原則，正規戰爭與游擊戰爭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現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游擊戰爭注意這點不同是重要的與必要的。正因為這個不同的表現形式，所以使游擊戰爭的作戰方法區別於正規戰爭的作戰方法，混淆了這個不同的表現形式，游擊戰爭是不能勝利的。

六 第二個問題——與正規戰爭相配合

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二個問題，是與正規戰爭相配合的問題。這是依據游擊戰爭具體行動的性質，說明它在作戰上與正規戰爭的關係。認識這種關係，對於有效地戰勝敵人，是有重要意義的。

游擊戰爭與正規戰爭的配合有三種：戰略的、戰役的與戰鬪的。

整個游擊戰爭，在敵人後方所起的削弱敵人，箝制敵人，妨礙敵人運輸的作用，與給予全國正規軍及全國人民精神上的鼓勵等等，都是戰略上配合了正規戰爭。例如東三省的游擊戰爭，在抗戰未起以前當然不發生配合問題，但在抗戰起來以後，配合的意義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那裏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箝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良影響，給予整個我軍與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平綏、平漢、津浦、同蒲、正太、滬杭諸鐵路線兩旁的游擊戰爭，所起戰略的配合作用，更屬容易看到。它們不但在現時敵人舉行戰略進攻時配合正規軍起了戰略防禦的作用；又不但在敵人結束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時，將配合正規軍妨礙敵之保守；而且將於正規軍舉行戰略反攻

時，配合正規軍擊退敵軍恢復整個的失地。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的偉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游擊隊與正規軍的領導者們，都應明確的認識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擊戰爭還有其戰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戰役時，雁門關南北的游擊戰爭破壞同蒲鐵路，平型關汽車路，楊方口汽車路，所起的戰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敵佔風陵渡後，普遍山西各地的游擊戰爭（主要由於正規軍執行的），對於配合陝西、河南兩省沿黃河西南兩岸的防禦戰，所起的戰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敵攻魯南時，整個華北五省的游擊戰爭，對於配合魯南我軍的戰役作戰，也盡了相當的力量。在這個任務上，一切存於敵後的游擊根據地的指導者們，或臨時被派出的游擊兵團的領袖們，必須在各個戰區司令官的統一指揮之下，好好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當時當地的情況，採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敵人最感危害之點和弱點上積極行動起來，達到削弱敵人，箝制敵人，妨礙敵人運輸和精神上振奮內線上各個戰役作戰軍之目的，盡其戰役配合的責任。如果各游擊區或各游擊隊只是各幹各的，不顧戰役作戰的配合，雖在總的戰略作戰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於沒有戰役作戰的配合，也就減少了它們的戰略配合的意義，這一點是一切游擊戰爭的指導者應該深切注意的。爲達此目的，無線電通訊之普遍設置於一切較大的游擊部隊與游擊兵團，實有完全的必要。

最後，戰鬪的配合，即戰場作戰的配合，是一切內線戰場附近的游擊隊之任務，這一項當然只限於靠近正規軍的游擊隊，或臨時從正規軍派出的游擊隊。在這種場合，游擊隊應該依正規軍首長之指示，擔負其所指定之任務，往往是擔負箝制部份的敵人，妨礙敵之運輸，偵察敵情，充當嚮導等。沒有正規軍首長的指示時，游擊隊也應自動的做這些事，坐視不理，不游不擊，或游而不擊的態度，無論何時都是要不得的。

七 第三個問題——建立根據地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三個問題，是建立根據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必要與重要性，是隨着戰爭的長期性與殘酷性而來的。因為失地的恢復須待舉行全國的戰略反攻之時，在這以前，敵人的前線將深入與縱斷我國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國土被控制於敵手，成了敵人的後方。在這樣廣大被敵佔領地區發動普遍的游擊戰爭，將敵人的後方也變成它的前線，使敵人在其整個佔領地上不能停止戰爭。我們的戰略反攻一日未能舉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復，敵後游擊戰爭就應堅持一日，這種時間雖不能確切斷定，然而無疑是相當地長，這就是戰爭的長期性。同時敵人爲了確保佔領地的利益，必將日益加緊地對付游擊戰爭，特別在其戰略進攻停止之後，必將殘酷地鎮壓游擊隊。這樣長期性加上殘酷性，處於敵後的游擊戰爭，沒有根據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麼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與發展自己，消滅與驅逐敵人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與戰爭目的就失掉了執行的依託。無後方作戰，本來是敵後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的總後方脫離的。然而，游擊戰爭不是沒有根據地能够長期地生存與發展的，這種根據地也就是游擊戰爭的後方。

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但都不能成功，在交通與技術進步的今日而企圖用流寇主義獲得勝利，更是毫無根據的幻想。然而流寇主義是在破產農民中存在的，他們的意識反映到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視根據地的思想，因此從游擊戰爭領導者們的頭腦中驅除流寇主

義，是確定建立根據地的方針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據地，重視或不重視根據地的問題，換句話說：根據地思想與流寇主義思想的鬭爭的問題，是任何游擊戰爭中發生着的。抗日游擊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也將不能例外。因此，同流寇主義作思想鬭爭，將是一個不可少的過程，只有澈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提出並實行了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才能有利於長期支持的游擊戰爭。

在說明了『根據地的必要與重要性』之後，下面的問題是實行建立根據地時必須認識與解決的。這些問題是：幾種根據地，游擊區與根據地，建立根據地的條件，根據地之鞏固與發展，敵我之間的幾種包圍。

一 幾種根據地

抗日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大體不外三種：山地、平地與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據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經建立或正在建立或準備建立之長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據地都是。這些根據地將是抗日游擊戰爭最能長期支持的場所，是抗日戰爭的重要堡壘，一切處於敵後的山岳地帶，必須全部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起根據地來。

平地較之山地當然差些，然而決不是不能發展游擊戰爭，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據地。河北平原與山東北部及西北部平原，已經發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是平地能够發展游擊戰爭的證據。至於能否在平原地區建立長期支持的根據地，這一點現在誰也不能證明；但建立臨時的根據地與小部隊的或季候的根據地，則前者現在已經證明，後者也應該說是可能的。因為一方面，敵人兵力不够分配，又執行着前無古人的野蠻政策；另一方面，中國有廣大的土地，又有衆多的抗日人民；都提供了平原能

够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臨時根據地的客觀條件；如能加上指揮適當一條，則小部隊的非固定的長期根據地之建立，當然應該說是可能的。大抵當敵人結束了它的戰略進攻，轉到了保守佔領地的階段時，對於一切游擊戰爭根據地的殘酷進攻的到來，是沒有疑義的，平原的游擊戰爭自將首當其衝。那時在平地帶活動的大的游擊兵團將不能在原地長期支持作戰，而須按照情況，逐漸轉移到山地裏去，例如從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及太行山轉移，從山東平原向泰山及膠東半島轉移。但保持許多小的游擊部隊，分處於廣大平原的各縣，採取流動作戰，即根據地搬家，一時在此一時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戰爭條件下，不能說沒有這種可能。至於利用夏季的青紗幘與冬季的河川結冰之季候的游擊戰爭，那是斷然可能的。在現時敵人無力顧及及將來顧及也難周到的條件下，確定在現時廣泛地發展平原的游擊戰爭，並建立臨時根據地的方針，在將來準備堅持小部隊的游擊戰爭，至少堅持季候游擊戰爭，並建立非固定的根據地的方針，是完全必要的。

依據河湖港汊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的可能性，客觀上說來是較之平原地帶為大，僅次於山岳地帶一等。歷史上『海盜』與『水寇』曾演過無數的活劇，紅軍時代的洪湖游擊戰爭支持了數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能够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根據地的證據。不過現在各個抗日黨派及抗日人民，至今尙少注意這一方面，主觀條件還不具備，然而無疑地是應該注意與應該進行的。江北的洪澤湖地帶，江南的太湖地帶，與沿江沿海一切敵人佔領的港汊地帶，都應該好好地組織游擊戰爭，並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據地，作為發展全國游擊戰爭之一個方面。缺少了這一方面，無異供給敵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戰爭戰略計劃的一個缺陷，應該及時的補足之。

二 游擊區與根據地

在處於敵人後方作戰的游擊戰爭面前，游擊區與根據地是有區別的。在四圍已被敵佔但中間未被敵佔或雖佔而已經恢復之地區，例如五台山地區之某些縣，太行山地區及泰山地區也有這種情形，這些都是現成的根據地，游擊隊據之以發展游擊戰爭是很方便的。但在這些根據地的其他地方則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區（即晉冀察邊區）的東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份及保定以東滄州以西的許多地方，在那裏，游擊戰爭在開始時期還不能完全佔領該地，只能經常去游擊，游擊隊到時屬於游擊隊，游擊隊走了又屬於偽政權，這樣的地區就還不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而是所謂游擊區。這種游擊區，經過游擊戰爭的必要過程，消滅或打敗了許多敵人，摧毀了偽政權，發動了民衆的積極性，組織了民衆的抗日團體，發展了民衆武裝，建立了抗日政權，游擊區就轉化成了根據地，增加到原有根據地上面去，叫做發展了根據地。

有些地方的游擊戰爭，全部活動地區開始都是游擊區，例如冀東的游擊戰爭。那裏已有長期的偽政權，當地起義的民衆武裝及從五台山派去的游擊支隊，整個活動地區開始都是游擊區。他們在開始時，只能在此區中選擇好的地點作為臨時的後方，或叫做臨時根據地。要待消滅敵人發動民衆的工作進步之後，才能把游擊區狀態消滅，變為比較穩固的根據地。

由此可知，從游擊區到根據地，是一個艱難締造的過程，依消滅敵人與發動民衆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從游擊區過渡到了根據地的階段。

有許多地區，將是長期處於游擊區狀態的。在那裏，敵人極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穩固的偽政權，

游擊戰爭也極力發展，但無法達到建立抗日政權之目的，例如敵人佔領的鐵路線及大城市的附近地區及某些平原地區。

至於敵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車站與某些平原地帶，游擊戰爭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裏面，那裏有比較穩固的偽政權，這又是一種情形。

由於我之領導錯誤或敵之強大壓力的結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發生相反的變化，即根據地化爲游擊區，游擊區化爲敵之比較穩固的佔領地。這種情形是可能發生的，值得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特別警戒。

所以在整個敵佔地區，經過游擊戰爭與敵人雙方鬭爭的結果，變爲三種情況的地方：第一種是被游擊戰爭與中國政權掌握着的抗日根據地；第二種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與偽政權掌握着的被佔領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中間地帶，即所謂游擊區。游擊戰爭指導者的責任在於極力擴大第一第三兩種地區，而極力縮小第二種地區，這是游擊戰爭的戰略任務。

三 建立根據地的條件

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是要有一個抗日的武裝部隊，並使用這個部隊去戰勝敵人，發動民衆。所以建立根據地問題，首先就是武裝部隊問題。從事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枝以至多枝的游擊部隊，並使之從鬭爭中逐漸發展爲游擊兵團，以至發展成爲正規部隊與正規兵團。建立武裝部隊是建立根據地的最基本一環，沒有這個東西或有了而無力量，一切問題都無從說起。這是第一個條件。

與建立根據地不能分離的第二個條件，就是使用武裝部隊並配合民衆去戰勝敵人。凡是被敵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敵人的根據地，不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要把敵人的根據地變爲游擊戰爭的根據地，非戰勝敵人無從實現，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擊戰爭控制的地方，如果有敵人進攻的話（無論如何也應該說敵人是不要進攻的），不戰勝敵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變成敵人控制的地方，也無從建立根據地。

同樣，與建立根據地不可分離的第三個條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裝部隊的力量在內，去發動民衆的抗日鬭爭。從這種鬭爭中，去武裝人民，組織自衛軍與游擊隊。從這種鬭爭中去組織民衆團體，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兒童的，商人的，自由職業者的，依據民衆的政治覺悟與鬭爭情緒提高的程度，將其組織在一切必要的抗日團體之內，並逐漸發展之。民衆如沒有組織性，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從這種鬭爭中去肅清公開的或隱藏的漢奸勢力，要做到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衆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從這種鬭爭中去發動民衆，鞏固或建立當地的抗日政權。原來有中國政權未被敵人破壞的，則在廣大民衆擁護的基礎上去鞏固它；原來的中國政權已被敵人破壞了的，則在廣大民衆努力的基礎上去恢復它。這個政權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它應該團結一切力量，向唯一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作鬭爭。

一切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只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裝部隊，戰勝了敵人，發動了民衆，這三個基本的條件逐漸具備之後，才能真正的建立起來。

此外還須指出的是地理與經濟的條件。地理條件的問題，在說『幾種根據地』時已經指出了三種不同的情形，這裏只說主要的要求，是地區的廣大。處在四面或三面被包圍的中間，要建立長期支持的根據地，山地當然是最好的條件，但主要是須有游擊隊回旋的餘地，即廣大地區。有了廣大地區這

個條件，就在平原也是能够發展及支持游擊戰爭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說。這個條件已在中國領土廣大與敵人兵力不足的矛盾現象之下，一般地提供於中國的游擊戰爭了。故在游擊戰爭的可能性說來，它是一個重要的甚至是第一個條件，在小國如比利時等，因沒有這個條件，游擊戰爭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沒有。但在中國，這個條件已自然具備，它不是什麼待爭取的條件與待解決的問題，它是自然具備只待人去利用的東西。

經濟條件的性質，從其自然性一方面看來，也與地理條件相同。因為現在並不討論在沙漠裏建立根據地，沙漠裏也沒有什麼敵人，討論的是在敵人後方建立根據地，一切敵人能到之處，當然早就有了中國人，也早就有了吃飯的經濟基礎。故在建立根據地問題上，不發生選擇經濟條件的問題。一切有中國人又有敵人的地方，不問其經濟條件如何，都應盡可能地發展游擊戰爭，並建立永久的或臨時的根據地。但從其政治性一方面看來則不然，這裏的問題是存在的，這就是經濟政策的問題，這一點對於建立根據地是帶着嚴重性的。游擊戰爭根據地的經濟政策，必須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即合理負擔與保護商業，當地政權及游擊隊決不能破壞這種原則，否則將影響於根據地的建立與游擊戰爭的支持。合理負擔即實行『有錢者出錢』，但農民亦須供給一定限度的糧食與游擊隊。保護商業應表現於游擊隊的嚴格的紀律上面，除了真憑實據的漢奸之外，決不准亂沒收一家商店。這是困難的事，但是必須執行的確定的政策。

四 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

爲了把侵入中國的敵人，圍困在少數的據點，即大城市與交通幹線之內，各個根據地上的游擊戰

爭必須極力向其根據地的四周發展，迫近一切敵人的據點威脅其生存，動搖其軍心，同時即發展了游擊戰爭的根據地，這是十分必要的。這裏，要反對游擊戰爭的保守主義，不論是由於貪圖安逸而發生的，或由於對敵人力量過分估計而發生的，均將給與抗日戰爭以損失，對於游擊戰爭及其根據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記根據地的鞏固，主要的工作是發動與組織民衆，游擊部隊及地方武裝的訓練也包括在內。這種鞏固，是支持長期戰爭的必需，也是向前發展所必需的，不鞏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發展。只知道發展忘記了鞏固的游擊戰爭，經不起敵人的進攻，結果不但喪失了發展，且有危及根據地本身之慮。正確的方針是『鞏固地向前發展』，這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辦法。只要是長期戰爭，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的問題，是每個游擊隊經常發生的問題。具體解決時應依照情況去決定。某一時期，把重心放在發展方面，這就是推廣游擊區，擴大游擊隊的工作。另一時期，則把重心放在鞏固方面，這就是組織民衆，訓練部隊的工作。因爲二者的性質不同，軍事部署與工作執行隨之而不同，必須依情況分時候有所側重，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五 敵我之間的幾種包圍

從整個抗日戰爭看來，由於敵之戰略進攻與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禦與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於我的第一種包圍。由於我以數量上優勢的兵力，對於從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採取戰役與戰鬪的進攻及外線作戰的方針，就把各個分進之敵的每一個處於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於敵的第一種包圍。再從敵後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包圍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區，後者例如晉西北地區，這是敵對於我的第二種包圍。但若將

各個根據地聯系起來看，並將各個游擊戰爭根據地與正規軍的戰線聯系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在河北山東等省，亦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是我對於敵的第二種包圍。由是敵我各有加於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與戰鬥的作戰好似吃子，敵之據點與我之游擊根據地則好似做眼。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後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之重大性。這個問題，提在抗日戰爭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國軍事當局，一方面在各地的游擊戰爭指導者，均須把在敵後發展游擊戰爭與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把它作為戰略任務執行起來。如果我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我們就比敵人多了一個包圍，形成了一個太平洋的外線作戰，可以實行圍剿法西斯日本。這一點在今天當然還沒有實際意義，但不是沒有這種前途的，世界在變動着，日本人民正在準備着偉大的鬭爭呢！

八 第四個問題——游擊戰爭的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

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四個問題，是游擊戰爭的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裏所述的進攻戰方針在抗日游擊戰爭處於防禦姿勢與處於進攻姿勢中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

在全國的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正確點說，戰略反攻）中間，每一游擊戰爭的根據地上面及其周圍，也有其小規模的戰略防禦與戰略進攻，前者是敵取攻勢我取守勢時候的戰略形勢與戰略方針。後

者是敵取守勢我取攻勢時候的戰略形勢與戰略方針。

一 游擊戰爭的戰略防禦

在游擊戰爭已經起來並有相當發展之後，特別在敵停止了對我全國的戰略進攻採取保守其佔領地的方針的時候，對於游擊戰爭根據地的進攻是必然的。對於這種必然性的認識是必要的，否則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全無準備，一旦遇敵嚴重進攻的形勢，必至驚惶失措，被敵擊破。

敵以消滅游擊戰爭及其根據地之目的，常會採取圍攻的辦法，例如五台山地區就已有四五次的所謂『討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至於六、七路的兵力，同時有計劃的前進。游擊戰爭發展的規模越大，其根據地所處的位置越重要，威脅敵人的戰略基地及交通要道越大，敵人對於游擊戰爭及其根據地的進攻也將會越厲害。所以凡屬敵人進攻游擊戰爭越厲害之處，就證明了那裏的游擊戰爭越有成績，對於正規戰爭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敵人數路圍攻的情況之下，游擊戰爭的方針是打破這種圍攻，採取反圍攻的形態。在敵數路前進，但每路只有一個或大或小的部隊，沒有後續部隊，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構築堡壘，修築汽車路的情況之下，這種圍攻是容易打破的。這時敵是進攻與外線作戰，我是防禦與內線作戰。我之部署應是以次要兵力箝制敵之數路，而以主要兵力對付敵之一路採取戰役與戰鬪的襲擊戰法（主要的是埋伏戰），於敵行動中打擊之。敵人雖強，經過多次的襲擊也就削弱下來，往往中途撤退，此時游擊隊又可於追擊敵人時繼續襲擊，再行削弱它。當敵還沒有停止進攻或實行退却之時，總是佔據根據地內之縣城或市鎮，我便應包圍這種縣城或市鎮，斷絕其糧食來源與交通連絡，等到敵人無法支持向後退走

時，我便乘機追擊之。一路打破之後，又轉移兵力去打破敵之另一路，這樣各個擊破敵之圍攻。

在一個大的根據地內，例如五台山地區，是在一個『軍區』之內分爲四五個『軍分區』的，每一軍分區都有獨立作戰的武裝部隊，在上述作戰方法之下，往往同時或先後打破了敵人的進攻。

在反圍攻的作戰計劃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於內線的，但在兵力優裕的條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縣與區的游擊隊，以至從主力中分出一部份）於外線，在那裏破壞敵之交通，箝制敵之增援部隊，是必要的。如果敵在根據地內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據地內圍困該敵，而用主力進攻敵所從來之一帶地方，在那裏大肆活動，可以引致久踞之敵撤退出去打我主力，這就是『圍魏救趙』的辦法。

在反圍攻的作戰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衛軍及一切民衆組織，應全體動員起來參加戰爭，用各種方法幫助我軍，反對敵人。在反對敵人的工作中，地方戒嚴與堅壁清野兩事是重要的，前者爲了鎮壓漢奸，並使敵人得不到消息；後者爲了協助作戰（堅壁），並使敵人得不到糧食（清野）。

敵人退却時往往將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及所經道路上的村莊放火燒毀，目的在給予游擊戰爭根據地以破壞，但同時就使得敵人第二次進攻時沒有房子住和沒有飯吃，害了它自己，這就是所謂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兩種互相矛盾的意義的具體例證之一。

不是在幾經圍攻之後，業已證明在那裏無法打破嚴重的圍攻時，游擊戰爭的領導者不應企圖放棄根據地而跑到別的根據地去。在這裏，應注意防止悲觀情緒的發生。只要領導上不犯原則錯誤，一般的山岳地帶，總是能够打破圍攻與堅持根據地的。只有平原地帶，如果在嚴重的圍攻之下，就應根據具體情勢，考慮下面的問題：留置許多小的游擊部隊在當地分散活動，而將大的游擊兵團暫時轉移到山地裏去，等到敵人主力移動他去，我又再往那裏活動。

由於中國地區廣大敵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況，敵人是一般不能採取用中國內戰時的堡壘主義的。但我們應該估計到在某些特別威脅敵人要害的游擊根據地中，敵人有可能採取相當程度的堡壘主義，要準備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仍然堅持那裏的游擊戰爭。毫無疑義的，根據在內戰時還能堅持游擊戰爭的經驗，在民族戰爭中當然更加能夠堅持。因為即使在兵力對比上，在某些根據地中，敵能使用不但在質量上而且在數量上極端優勢的兵力，但敵我民族矛盾無法解決，敵之指揮弱點無可避免，我之勝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衆工作與靈活的作戰方法之上。

二 游擊戰爭的戰略進攻

在已將敵之進攻打破，敵之新的進攻尚未到來的時候，是敵取戰略守勢我取戰略攻勢的時候。

這種時候，我之作戰方針，不在攻擊不可必勝的，固守着防禦陣地的敵人；而在有計劃的在一定地區內消滅與驅逐爲游擊隊力能勝任的小敵與漢奸武裝，擴大佔領地區，發動民衆的抗日鬭爭，補充並訓練部隊，組織新的游擊隊。在這些任務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後，如果敵人還在守勢之中，就可進一步擴大新的佔領地區，攻擊那些敵力薄弱的城市與交通線，依其情況而長久的或暫時的佔領之。所有這些，都是戰略進攻的任務，目的在於乘着敵取守勢之時，有效地發展自己軍事的與民衆的力量，有效地縮小敵人的力量，並準備敵人再度向我進攻時又能有計劃地與有力地打破之。

部隊的休息與訓練是必要的，敵取守勢時是我最好休息訓練的時機。不是一事不做專門關起門來休息訓練，即在擴大佔領地，消滅小敵，發動民衆的工作之中，爭取時間達到休息訓練的目的。解決給養被服等困難問題，也往往在此時。

大規模的破壞敵之交通線。妨礙敵之運輸，直接幫助正規軍的戰役作戰，也在這個時候。

這時整個的游擊根據地、游擊區與游擊部隊，都是興高彩烈的時候，被敵摧殘的地區也逐漸整理，恢復元氣。敵佔地區內的民衆亦十分高興，到處都傳播游擊隊的聲威。敵人及其走狗漢奸的內部，則一方面發展着恐慌情緒，生長着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對於游擊隊與根據地的仇恨，正在加緊準備對付游擊戰爭。因此，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不可在自己的戰略進攻中得意忘形，輕視敵人，忘記了團結內部，鞏固根據地與鞏固部隊的工作。在這種時候，須善於觀看敵人的風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進攻的徵兆，以便一遇進攻，就能適當地結束我之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再從戰略防禦中粉碎敵人的進攻。

九 第五個問題——向運動戰發展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五個問題，是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其必要與可能，也是由於戰爭的長期性與殘酷性而來的。如果中國能迅速戰勝日寇，並迅速收復失地，沒有什麼持久戰，也不是什麼殘酷的戰爭，那末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戰爭是長期而且殘酷，游擊戰只有向運動戰發展才能適應這樣的戰爭。戰爭既是長期的與殘酷的。就能夠使游擊隊受到必要的鍛鍊，逐漸變成正規的部隊，因而其作戰方式也逐漸正規化，游擊戰就變成運動戰了。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明確地認識這種必要性與可能性，才能堅持向運動戰發展的方針，並有計劃的執行之。

現在許多地方的游擊戰爭，例如五台山等處，是由正規軍派出強大的支隊去發展的，那裏的作戰雖一般是游擊戰，但開始即包含了運動戰的成份，隨着戰爭的持久，這種成份將逐漸增加。這是今天抗日游擊戰爭的長處，不但使游擊戰爭迅速地發展，並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較之東三省的游擊戰爭，條件優越得多了。

由執行游擊戰的游擊部隊化爲執行運動戰的正規部隊，須具備數量擴大與質量提高兩個條件。前者除直接動員人民加入部隊外，可採取集中小部隊的辦法，後者則依靠戰爭中的鍛鍊與提高武器的質量。

集中小部隊，一方面須防止妨礙集中的地方主義，另一方面也須防止不顧地方的單純軍事主義。地方主義是存在於地方游擊隊與地方政府中間的，他們往往只顧地方利益，忘記全局的利益，或貪圖分散活動，不慣集團生活。主力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的領導者們，必須注意到這種情形，採取逐漸與部份集中的辦法，使地方能够繼續發展游擊戰爭；採取首先協同行動然後實行合編及不破壞其建制不撤換其幹部的辦法，使小集團能够融洽於大集團。

單純軍事主義與地方主義相反，乃主力部隊裏頭的人們只圖擴充自己不顧扶助人民的一種錯誤觀點。他們不知道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並非廢除游擊戰，而是在廣泛發展的游擊戰之中逐漸形成一個能够執行運動戰的主力，環繞這個主力的仍應有廣大的游擊部隊與游擊戰爭。這種廣大的游擊部隊與游擊戰爭，造成這個主力的豐富的羽翼，又是這個主力繼續擴大的不斷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隊的領導者們之間，如果犯了不顧地方民衆與地方政府的單純軍事主義的錯誤，必須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擴大與地方武裝的繁殖各得着適宜的位置。

提高質量，須在政治、組織、裝備、技術、戰術、紀律等各方面有所改進，逐漸仿照正規軍的規

模，減少游擊隊的作風。政治上須使指揮員戰團員認識從游擊隊到正規軍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勵大家爲此而努力，並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組織上須逐漸建立爲一個正規兵團所必需的軍事政治的工作機關，軍事政治的工作人員，軍事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給衛生等的經常制度。裝備方面，須提高武器的質量與種類，增加必要的通訊器材。技術戰術方面，從游擊部隊的技術與戰術提高到爲一個正規兵團所必需的技術與戰術。紀律方面，提高到整齊劃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滅自由散漫的現象。所有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個長的努力過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須向這個方向去，只有這樣，一個游擊戰爭根據地上面的主力兵團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擊敵人的運動戰方式才能出現。這種目的，在有正規軍派遣支隊或派遣幹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較順利地達到的，因此一切正規軍均有扶助游擊隊進步的責任。

十 第六個問題——指揮關係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指揮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是游擊戰爭順利發展的條件之一。

游擊戰爭的指揮方法，由於游擊部隊是低級的武裝組織與分散行動的特性，不容許高度的集中主義，如同正規戰爭的指揮方法那樣。如果企圖拿正規戰爭的指揮方法施之於游擊戰爭，必然束縛游擊戰爭的高度活潑性，而使游擊戰爭毫無生氣。所以高度的集中指揮與游擊戰爭的高度活潑性是正相反對的東西，對於這種高度活潑的游擊戰爭，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揮制度，不但不應該，而且不可

能。

然而游擊戰爭，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揮能够順利地發展的。在有廣大的正規戰爭，同時又有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的情況下，使二者適當地配合行動是必要的，這裏就需要對於正規戰爭與游擊戰爭配合行動的指揮，這就是國家參謀部與戰區司令官關於戰略作戰的統一指揮。在一個游擊區或游擊根據地裏面，那裏存在着多數的游擊隊，其中往往有一個至數個作為主力的游擊兵團（有時還有正規兵團）與許多作為輔助力量的大小游擊部隊，還有不脫離生產的廣大的人民武裝，那裏的敵人也往往成為一個局面統一地對付游擊戰爭，因此，就在這種游擊區或根據地裏面，發生了統一指揮，即集中指揮的問題。

由此，游擊戰爭的指揮原則，一方面反對絕對的集中主義，同時又反對絕對的分散主義，應該是戰略的集中指揮與戰役戰鬪的分散指揮。

戰略的集中指揮，包括國家對於整個游擊戰爭的部署，各個戰區裏面游擊戰爭與正規戰爭的配合行動，與每個游擊區或根據地裏面對於全區抗日武裝的統一指導。在這些上面的不協調，不統一，不集中，是有害的，應該盡可能地求得其協調，統一與集中。凡關於一般事項，即戰略性質的事項，下級必須報告於上級，並接受上級的指導，以收協同動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為止，過此限度，干涉到下級的具體事項，例如戰役戰鬪的具體部署等等，同樣是有害的，因為這些具體事項，必須按照隨時變化隨地不同的具體情況去做，而這些具體情況，是離得很遠的上級機關無從知道的，這就是戰役戰鬪的分散指揮原則。這個原則也一般地通用於正規戰爭的作戰，特別在通訊工具不完備的情況下。一句話，就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

在游擊根據地組成一個軍區，其下分為幾個軍分區，軍分區之下分為幾個縣，縣之下分為幾個區

的情況，軍區司令部、軍分區司令部、縣政府、區政府的系統是隸屬關係，武裝部隊依其性質分別隸屬之。它們之間的指揮關係，根據上述的原則，一般的方針集中於上級，具體的行動按照具體情況實施之，下級有獨立自主（或曰獨斷專行）之權。上級對下級某些具體行動有意見，可以而且應該作為『訓令』提出，但決不應作為不可改變的『命令』。越是地區廣大，情況複雜，上下級距離得遠，這種具體行動的獨立自主權限就越應加大，越應使之多帶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況的要求，方能培養下級與地方人員的獨立工作能力，應付複雜的環境，發展勝利的游擊戰爭。如果是一個集中行動的部隊或兵團，其內部指揮關係，適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因為情況是明瞭的；但如果該部隊或該兵團一旦分散行動，便又適用一般集中具體分散的原則，因為具體情況無從明瞭。

應該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職，在下者叫做專擅，這是任何上下級關係特別軍事關係不許可的。應該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辦，在下者叫做無自動性，這也是任何上下級關係特別游擊戰爭不許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則，才是正確解決問題的方針。

論持久戰

——一九三八年五月廿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講演——

問題的提起

(一) 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向着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爲着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奮鬥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麼樣？能够勝利還是不能夠勝利？能够速勝還是不能夠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爲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後勝利，但是爲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於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民說：中國會亡，最後勝利不是中

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乎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共產黨人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未為全國大多數人民所完全了解。一半因為宣傳解釋的普及性不够，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未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未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民群眾之前，使人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與前途，無從決定其整套的做法與努力。現在好了，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儘够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儘够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尤其對持久戰，有亡國論與速勝論的反對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了解。『蘆溝橋事變以來，四萬萬人一齊努力，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樣一種公式，在廣大人們中流行着。這個公式是對的，但有加以充實的必要。抗日戰爭與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够堅持，是由於許多的因素，全國黨派，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全國人民，從資本家到工人，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游擊隊，國際方面，從各民主國家到社會主義國家，敵國方面，從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都在我們的抗戰中盡了他們各種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與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這種努力，過去與現在都是一貫的。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爲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今後抗戰中能够盡其更善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作爲送給這兩個偉大紀念日的禮物。與持久戰有關的許多問題，我都準備說到，但不能一切說到，因爲一切的東西，不是在一個講演中完全說得的了。

（二）抗戰十個月以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後者產生輕敵傾向。它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與片面的，一句話，

非科學的。

(三) 抗戰以前，存在着許多亡國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抗戰以後，公開的亡國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協的空氣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據就是『再戰必亡』。有個學生從湖南寫信來說：『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做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好在他們還不去宣傳，不然真糟。農民對他們的信仰當然要大些啊！』這類中國必亡論者，是妥協傾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中國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恐怕終戰爭之局也不會消滅的。當此徐州失守武漢緊張的時候，給這種亡國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四) 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種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的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份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上海戰爭時，許多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拿抗戰的前途主要寄託在外國援助的上面。台兒莊勝利之後，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應是『準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麼『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我們勝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平型關一個勝仗，衝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衝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於是敵人是否進攻武

漢，成爲疑問了。許多人以爲：『不一定』；許多人以爲『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爲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應增加力量幹什麼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爲統一戰線的現時狀態已够打退敵人，還要什麼鞏固與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與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衆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托派，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與猛烈發展敵後游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爲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後，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他們的話，講起來好像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於執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五) 於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够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 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蘆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爲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

國內人民及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的興起。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及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的中國自己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與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與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與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條條件一時沒有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都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要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思想只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我們確切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的海軍還想佔領菲律賓、暹羅、安南、馬來半島與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佔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它，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佔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的大部，取得佔有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剩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禦戰。

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失，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時所受損失的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

北、西南及西部，它也是無法封鎖的。

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的團結起來，動員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並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的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的前進與迅速的後退，迅速的集中與迅速的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幾個譯本都譯作『游擊戰』，是錯了的），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

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補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

在地理上，戰場這樣的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並且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與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了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與戰鬥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多數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份。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與指揮得當，能使日本人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本軍要完全的被敵對的中國人民包圍，日本軍要被迫運來他們一切的軍需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要用重兵去保護他所有的交通線，時時謹防游擊隊的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

部力量駐紮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機械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而能够在戰爭的後期從事於陣地戰，對於日本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廢。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的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衆不斷的傾注到前線去，爲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够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的侵略軍出中國。

我們所俘虜的日本士兵和官佐，要受到歡迎和很好的待遇，不但不殺害他們，並且愛護他們和兄弟一樣。要採取種種方法，使日本軍隊士兵起來反抗他們的法西斯官長，我們的口號是：『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的壓迫者。』（『西北印象記』第一〇——二四頁）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七）還在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在它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上，清楚的指出：

蘆溝橋的挑戰與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整個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軍事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進攻的烟幕彈。

七月七日的蘆溝橋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中國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爲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的與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平津的喪失，就是東四省喪失後最嚴重的教訓。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爲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解放』第十五期，第六頁）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證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八）戰爭問題中的觀念論與機械論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方法論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與片面的，或是毫無根據的純主觀的說一頓，或是只根據問題的一現象、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誇大起來，當作全體看，說得像煞有介事，這就是錯誤觀點的論理的來源。但觀點錯誤的人可分爲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於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於糾正的。但既同爲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觀念論與機械論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與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九）抗日戰爭爲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爲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與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裏。分別說來，戰爭的雙方是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一〇) 日本方面是——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之不可避免與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於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與野蠻的。時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日本帝國主義，不但由於日本的內外矛盾逼使日本不得不舉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戰爭，又使得日本帝國主義已臨到最後崩潰的前夜，從社會行程說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日本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着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之特殊野蠻性，這樣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國內的階級對立、中國的民族對立（中國全民族與日本統治者的對立）與世界大多數的國家與人民的對立。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與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還不止此，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的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最後，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却又不得不得到

一個超過其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後一種力量將逐漸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掉，並將施其壓力於日本自身之上，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而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點。

(二) 中國方面是——第一，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戰爭的大革命，一切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運動，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與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然而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雖因各種內外反對力量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然而却鍛鍊了中國人。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却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與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號召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後，第四，由於日本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的結果，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與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一二) 這樣看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與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與人民是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與規定着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與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與規定着戰爭的持久性與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裏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於雙方一切大小問題與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經過必將證明它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據這些特點來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駁亡國論

(一三) 亡國論者看到了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戰必亡』。如果我們僅僅說：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滅宋，清朝滅明的歷史證據，證明小而強的國家能够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而且是落後的滅亡進步的。如果我們說，這是古代，不足爲據，他們又可搬出英滅印度的證據，證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够滅亡大而弱的落後國家。所以，要答覆這個問題，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據才能把一切亡國論

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據去說服還不明白與還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

(一四) 這應該提出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與寡助，中國的進步與多助。

(一五) 我們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中日兩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進行的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於退步時代，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歐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戰爭發動於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敵人也正是爲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帶最後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再則，當日本舉行戰爭的時候，正是世界各國或已經遭遇戰爭或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着爲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地方又是和世界多數國家與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並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與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一六) 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爲弱國。但同時，它又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所謂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進步，不是說阿比西尼亞抗意戰爭的那種進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的那種進步，而是說今天中國的進步。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國民黨與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十五年以來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敵的基礎。如果

說，在俄國，沒有一九〇五的經驗就不會有一九一七的勝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五年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這是國內的條件。

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不是孤立的戰爭，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與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於中國的援助。俄國一九一七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他們因此勝利了，但其規模還沒有今天廣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與空前的深刻性發展着。同時，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地以極大熱忱援助中國，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些，造成了與造成着爲中國最後勝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雖還沒有，尙有待於來日，但中國有進步與大國的條件，能够拖延戰爭的時間，促進並等候國際的援助。

(二七) 加上日本是比較的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互不相同的條件，於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成爲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之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國有一定時期與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的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與大國、進步、多助這三個相反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後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後的勝利。

(二八) 阿比西尼亞爲什麼滅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國，而且是小國。第二，它不如中國進步，它是一個古老的奴隸制到農奴制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也沒有資產階級政黨，更沒有共產黨，沒有中國這樣進步的軍隊，沒有如同中央軍的軍隊，更沒有如同八路軍的軍隊。第三，它不能等候國

際的援助，它的戰爭是孤立的。第四，這是主要的，抗意戰爭領導方面的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滅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還有相當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如能堅持下去，是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變動中據以恢復其祖國的。

（一九）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證明『抗戰必亡』與『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覆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日本比過去更强了，中國的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地位依然未變，力量依然頗弱，這一點是嚴重的情形。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這一點現在還不是事實，但將來必然要成為事實的。這一點，亡國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國呢？不但現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與新的抗日政策，和十餘年以前很大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雖然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屢次的挫折，使中國不能積蓄更大的力量用於今日的抗日戰爭，這是非常可痛惜的歷史教訓，從今以後，再也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礎上，加以廣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進，加強抗戰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種努力的總方向。國際援助一方面，眼前雖還看不見大量的與直接的，但國際局面根本已和過去兩樣，大量與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與主觀的原因，但單單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在今天，雖然存在着許多困難條件，規定了抗日戰爭是艱難的戰爭，例如敵人之強，我們之弱，敵人的困難還剛在開始，我們的進步還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只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與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二〇) 亡國論之沒有根據，具如上述。但另有許多人，並非亡國論者，他們是愛國志士，但對時局懷抱甚深的憂慮。他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懼怕對日妥協，一是懷疑政治不能進步。這兩個可憂慮的問題在廣大的人們中議論着，找不到解決的基點。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二一) 前頭說過，妥協的問題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社會根源存在，妥協問題就不會不發生。但妥協是不成功的，證明這一點，仍不外向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找根據。第一是日本方面。還在抗戰初起時，我們就估計有一種醞釀妥協空氣的時機會要到來，那就是在敵人佔領華北與江浙之後，可能出以勸降手段。後來果然來了這一手，但危機隨即過去，原因之一是敵人採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中國降了，任何人依然是做亡國奴。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亡國的政策，分爲物質的與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施之於中國人的，不但是對下層民衆，而且是對上層成份，當然對後者稍爲客氣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別，並無原則之分。大體上，它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於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飢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資本歸於毀滅與奴役化。在精神上，掠奪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於深入的內地。它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一月十六日敵人內閣宣言的方針，至今堅決執行，也不能不執行。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在劫難逃』，於是形成了絕對的對立。估計到某種

時機，敵之勸降手段又將出現，某些亡國論者又將蠕蠕而動，而且難免勾結某些國際成份（英、美、法內部都有這種人，特別是英國的上層份子）狼狽爲奸。但大勢所趨，是降不了的，日本戰爭的堅決性與特殊野蠻性，規定了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國方面。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國民黨，按其歷史、其領袖、其黨員大多數，都是可能堅持下去的。又其一，共產黨，就是敵人也不懷疑其抗戰的堅定性。又其一，別的黨派與全國人民，因爲妥協就是做亡國奴，絕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又互相監督，誰要妥協就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願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於成功。

（二三）第三是國際方面。除日本盟友與各國內部上層份子中某些成份外，其餘都不利於中國妥協而利於中國抗戰。這一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希望，今天全國大家有一種希望，認爲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特別是蘇聯的存在，鼓舞了中國的抗戰。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和中國是歷來休戚相關的。而且按照列寧主義，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上層成份之唯利是從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與革命戰爭爲其職志的。中國戰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個國際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蘇聯的援助上。中蘇兩國是地理接近的，這一點加重了日本的危機，便利了中國的抗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這一點和美國獨立戰爭之對於英國不同。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却大大優於美國的獨立戰爭，這一點我們不要忽略過去。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協的危機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爲敵人政策即使可作某種程度的改變，但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有妥協的社會根源，但反對妥協的佔大多數。國際力量也

有一部份贊助妥協，但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戰。這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就能克服妥協危機，堅持抗戰到底。

(二五) 現在來答覆第二個問題。國內政治的改進，是與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基本上倚賴於堅持抗戰。黨、政、軍、民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着，這是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與煩悶。但抗戰的經驗已經證明，十個月的進步抵得過去多少年的進步，並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很嚴重地阻礙着抗戰力量增加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中國、日本與世界的大局，不容許我們不進步。由於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使得這種進步是緩慢的。進步與緩慢是目前時局的兩個特點，與戰爭的迫切要求不相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戰爭中，戰爭必能克服腐敗現象。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排除敵人的毒蝕，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戰爭的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一切東西。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與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與戰爭後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與建國聯系起來看，是正當的。說日本也能獲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戰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時。這和中國的抗戰密切聯系着，這一個前途是應該看到的。重複一句：戰爭改變一切，大家對此應有堅決的相信，並從這種相信發出堅決的努力。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

(二六) 我們已把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幾個敵我之間矛盾着的基本特點，作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國論，答覆了爲什麼不易妥協與爲什麼政治可能進步的問題。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爲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那些並非亡國論，也不是一貫的悲觀主義，僅爲一時候與一局部的敵我強弱情況或國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時發生悲觀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觀點的來源也是片面性與主觀性的傾向。但他們的改正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會明白，因爲他們是愛國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時的。

(二七) 然而速勝論也是不對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對於中國的長處，也離開了真實情況，往往誇大起來，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爲是。總之，他們沒有勇氣承認敵強我弱這點事實，他們常常抹殺這一點，因此抹殺了真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度性，而夾雜以吹牛精神和客氣，因而抹殺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來，這裏也是主觀性與片面性作怪。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估計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爲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

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 我們是否否認亡國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着解放與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鬭爭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與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的，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與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佔居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並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與片面地只承認亡國一個可能，否認解放的可能，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與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於妥協傾向與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我們還看到其他傾向與其他現象，並指出二者之中，後者對於前者佔居優勢，二者在猛烈的鬭爭着，指出二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與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並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與此相反。

(二九) 我們也不是 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於主觀之中，客觀現實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與假道理。因此客觀地並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着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為什麼是持久戰？

(三〇) 現在我們來把持久戰問題研究一下。『為什麼是持久戰』這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

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例如單說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因為單純的以強擊弱，無論在理論上、實際上，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進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樣。大併小、小併大的事都是常有的。進步的國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強，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國家或事物所滅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天助自助者』這句話是科學的真理。因此，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敵強我弱，我有滅亡之道。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後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後失敗，而難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

（三二）既然敵之優點只有一個，餘皆缺點，我之缺點只有一個，餘皆優點，為什麼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敵之優勢我之劣勢呢？很明顯的，不能這樣形式的看。事情是現時敵我強弱的程度懸殊太大，敵之缺點一時還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滅殺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程度，我之優點一時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三）敵強我弱，敵是優勢而我是劣勢，這種情況，雖因我之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而有所變化，但還沒有變化其基本情況。所以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受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敵我都只限於這一定階段上一定程度的勝或敗，不能超過而進到全勝或全敗，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一則敵強我弱之原來狀況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則由於我之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造成這種相對的形勢。拿原來狀況來說，敵雖強，但已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優勢的必要程度。我雖弱，但已為其他有利的因素

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程度。於是形成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優勢，我是相對的劣勢。雙方都不是絕對的，因而各限於一定階段上一定程度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加以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優劣的形勢，造成了與造成着相對的強弱優劣，因而敵我只限於一定階段上一定程度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局面。

(三三) 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利用正確的軍事政治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克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與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影響着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着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與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走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三四) 目前則敵之強的因素尚能勉強利用，我之抗戰尚未給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兵力、財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進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進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激起本國階級對立與中國民族對立的因素，即戰爭之退步性與野蠻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礙其進攻的情況。國際孤立的因素也方在變化發展之中，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孤立，許多助我國家之軍火與軍火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需要，其政府亦尚不願與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制裁日本。因此我之抗戰不能速勝，而規定了持久戰。中國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雖在十個月抗戰中有了某種程度的進步，但離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程度，還不够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種有利因素，雖然都在起積極作用，但達到足以停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於廣大的努力。在國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進步速度，在國外，克服助日勢力，增加抗日勢力，尚非目前的現實。因此，又使戰爭不能速勝，而

規定了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三五) 中日戰爭的持久戰，將具體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却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與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却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儘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為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 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佔廣州、武漢、蘭州三點，並把三點聯系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元以上。敵人如此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後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佔領粵漢路、西蘭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未必盡能達其企圖。但我們的作戰計劃，應把敵人可能佔領三點甚至三點以外之某些部份地區並可能聯系起來作為一種基礎，部署持久戰，即令敵如此做，我也有應付之方。這一階段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游擊戰與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於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合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敵雖已經採用過並且還將採用卑鄙無恥的勸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實現其速

決計劃，整個地征服中國，但過去的已經失敗，今後的也難成功。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同時却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此階段中，國際的援助雖還沒有大量的與直接的，但是已經開始了這種援助，特別是蘇聯。敵人方面，士氣已開始表現頹靡，敵人陸軍進攻的銳氣，此階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敵之財政經濟已開始表現其竭蹶，人民與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生長，戰爭指導集團的內部已開始表現其『戰爭的煩悶』，生長着對於戰爭前途的悲觀。

（三七） 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於敵之兵力不足與我之堅強抵抗，將逼令敵人不得不採取一定限度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佔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表面形態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但在它面前又遇着頑強的游擊戰爭。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着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佔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不過雙方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在其佔領的大城市與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技術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防禦部隊外，將大量的轉入敵後，比較地分散配置，依託一切敵人未佔區域，配合民衆武裝，向敵人佔領地作廣泛猛烈的游擊戰爭，並盡可能調動敵人於運動戰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游擊戰爭能够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佔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佔領地將分為三種地區：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第二種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這個階段中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

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與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事件。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佔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與戰爭的困難，動搖份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增長。此時任務，在於動員全國民衆，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與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與妥協論，提倡艱苦鬥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此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紛歧與分裂，有計劃的增強技術，改造軍隊，動員全民，準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於日本不利，雖可能有張伯倫一類的『現實主義』遷就所謂『既成事實』的調頭出現，但主要的國際勢力將變到進一步援助中國。日本威脅南洋與威脅西伯利亞，將較之過去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戰爭。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廣大的游擊戰爭與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一面大量的消耗之，一面進一步增長其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日本資本缺乏，又困於游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它在東三省的經營就是證據。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爲獨立國，還是淪爲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中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爲强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於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的演出來。

（三八）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主要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着的及在本階段中繼續生長着的力量。然而單靠自己力量還不够，還須依靠國際力量與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

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與外交工作。這些任務之澈底完成，也將不是短時間，因為廣大被佔領區的收復，必須經過血戰。這個階段，已不是戰略防禦，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並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將逐漸的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整個戰爭。如果朝鮮等地的革命戰爭起來需要中國援助的話，那將屬於另一個戰爭了。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後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的戰爭形式仍將主要的是運動戰，但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禦，由於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於條件的改變與任務的需要，將變到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游擊戰，仍屬輔助運動戰與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吞併中國，但能相當長期的佔領中國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驅逐日本，但大部份土地依然是中國的。最後是敵敗我勝，但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四〇）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與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鍊。參加戰爭的各政黨也受到了鍛鍊，只應合作，不應對立，因為對立就是滅亡之道。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後勝利。果然這樣，一切困難也能够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後，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個階段中，敵我力量的變化將循着下述的道路前進。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減弱，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軍事與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在這點上面，就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

與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與質，主要的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與質，主要的表現在質上。在這第二種變化方面，就給了我們以持久戰與最後勝利的根據。

(四二) 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表現在：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在這點上面，又給予我們以持久戰與最後勝利的根據。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它擴大了領土、人口與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的根據，同時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為亡國論與妥協論的根據。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敵人這種向上變化的暫時性與局部性。它是行將崩潰的帝國主義，它在中國的佔領是暫時的。中國主力軍的頑強抵抗與游擊戰爭的猛烈發展，將使它的佔領實際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從這點上面，產生了與加深了日本同外國的對立。再則，根據東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當長的時間，一般只能是支出資本時期，不能是收穫時期。所有這些，又是我們擊破亡國論與妥協論而建立持久戰及最後勝利的根據。

(四三) 第二階段，上述雙方的變化將繼續發展，具體情形不能預斷，但大體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例如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消耗於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與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游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與廣大農業而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這個第二階段，也許將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地位，再走到

優劣相反的地位。到此時，中國大體上將完成了戰略反攻的準備而走到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應該重複指出：所謂變劣勢爲優勢與完成反攻準備，是包括中國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難的增長與國際援助的增長在內的，總合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國的優勢，完成反攻的準備。

(四四) 根據中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的狀態，第三階段的戰略反攻，在其前一時期將不是全國整齊劃一的姿態，而是帶地域性的及此起彼落的姿態。敵人採用各種分化手段企圖破裂中國的統一戰線，此階段中並不會減弱，因此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時期中，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於中國。中國的任務，就在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幫助了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

(四五) 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禦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却——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四六) 於是問題與結論是：中國會亡嗎？答覆：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够速勝嗎？答覆：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我以爲是正確的。

(四七) 講到這裏，亡國論與妥協論者又將跑出來說：中國由劣勢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與經濟力，由平衡到優勢，需要有超過日本的軍力與經濟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確的。

(四八) 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與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與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與人心的對比。武力與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

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着的軍力與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與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沒有疑義，只要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軍力與經濟力是能够逐漸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在其長期戰爭與內外矛盾的削弱下，其軍力經濟力的現狀，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優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與經濟力大量的公開的算作自己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只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任何一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與經濟力公開地防禦或攻擊日本，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根據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與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與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優劣的形勢難道不能確定地發生變化嗎？

（四九）速勝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於碰壁。或者只能空談快意，並不準備真正的做。最後則是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證明他們實際是一種貪便宜，想少費氣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義。這種空談主義過去與現在已經存在，但還不算很多，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及反攻階段時，空談主義會要多起來。但同時，如果第一階段中國損失較大，第二階段時間拖得很長，亡國論與妥協論更將大大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應該主要的向着亡國論與妥協論方面，次要的火力，用以反對空談主義的速勝論。

（五〇）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戰爭究將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於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具體的說，惟有努力於作戰多打勝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於發展游擊戰爭，使敵之佔領

地限制於最小的範圍，努力於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於建設新軍與發達新的軍事工業，努力於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的進步，努力於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於瓦解敵軍與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於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於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被壓迫民族取得其援助，做了這一切，才能縮短戰爭的時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 我們可以斷言，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其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於日本的野蠻與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與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俄國十月革命後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種情形。但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與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記錄的東西。這種犬牙交錯的形態，表現在下述的幾種情況上。

(五二) 內線與外線——抗日戰爭是整個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主力軍與游擊隊的關係，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游擊區的關係亦然，各個游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戰略上內線作戰的正規軍是後退的，但戰略上外線作戰的游擊戰爭則廣泛地向着敵人後方大踏步前進，第二階段將更加猛烈前進，形成了後退與前進的奇異形態。

(五三) 有後方與無後方——利用國家的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人佔領地之最後限界的，是

主力軍。脫離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後的，是游擊隊。但每一游擊區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後方，並在其上面建立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這個區別的，是每一游擊區派遣出去向該區敵後臨時活動的游擊隊，他們仍然沒有後方，也沒有作戰線。『無後方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與先進軍隊情況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不應懷疑而應提倡，沒有可怕而有大利。

(五四) 包圍與反包圍——從整個戰爭看來，由於敵之戰略進攻與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禦與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一種包圍。由於我以數量上優勢的兵力，對於從戰略上的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採取戰役與戰團上的外線作戰方針，就可以把各個分進之敵的每一個放在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於敵的第一種反包圍。再從敵後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後者例如晉西北，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二種包圍。但若將各個游擊根據地聯系起來看，並將各個游擊根據地與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系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東等省也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又是我對於敵之第二種反包圍。這樣，敵我各有加於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與戰團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據點（例如太原）與我之游擊根據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不過圍棋之『眼』是不能破壞的，這是圍棋的機械論，戰爭之『眼』是可以破壞的，這是戰爭的辯證法。如果把世界性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係。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後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亘宇宙的須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

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爲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佈成之時，這將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必然的趨勢。

（五五）大塊與小塊——一種可能是敵佔地區將佔中國本部之大半，而中國本部完整的區域只佔一小半，這是一種情形。但敵佔大半中，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佔領大城市、大道與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說可能只是敵佔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建立的游擊區，反居其大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範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進來，則在面積上中國未失地區仍然是大半，而敵佔地區內包括東三省在內，也只是小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完整區域是國家的總後方，指導中樞所在，固然是重要的，應集大力去經營，不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緊。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爲文化落後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爲文化中心。同時，敵後廣大游擊區的經營也是非常要緊的，也應把他們的各方面發展起來，也應發展文化工作。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爲進步與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佔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的變爲落後與黑暗的地區。

（五六）這樣看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的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形態。

爲永久和平而戰

（五七）

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與爭取中國及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永久和平的。幾十萬年的人類生活已經過去了兩個時代——人類的和平生活時代與人類的戰爭生活時代。頭一個時代佔了歷史的最長時期，那時人類的生產極爲貧乏，唯一的是向着自然作戰，不需要也不能有人類集團間的戰爭。第二個時代大概從氏族制社會的末期到今日，由於生產發展與社會分化的原故，人類戰爭生活時代就降臨了。雖然這個時代總共不過幾千年，但每一民族都不知打了幾多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打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時期，仗就打的特別廣大與特別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全歷史上的空前戰爭，更不是絕後的戰爭。只有目前開始了的戰爭，帶着歷史的空前性，並且接近於最後戰爭，就是說，接近於人類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了戰爭。你們看，一個意大利，又一個日本；一個阿比西尼亞，又一個西班牙，再一個中國。參加戰爭的這些國家共有差不多六萬萬人口，足足佔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戰爭的特點是無間斷與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爲什麼無間斷？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後，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着誰呢？無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國打，『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一點也不錯。雖然不能說反法西斯戰爭與法西斯戰爭決勝以後再無戰爭，並且一定是接着打，然而目前的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爲什麼這次

戰爭接近於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發生的，由於這種總危機，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於戰爭的冒險。也由於這種總危機，使得我們可以預見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的捲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將是一切老賬的總結算，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由於蘇聯的存在與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干涉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着爲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即使爾後尚有一個戰爭時期，但已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不遠了。人類一經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機，也不要毒氣。從此以後，將出現人類生活的第三時代——永無戰爭的和平生活時代，我們的子孫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已經開始了的革命的戰爭，是這個爲永久和平的戰爭之一部份。佔着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佔着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出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與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是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着爲了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

（五八）歷史上的戰爭分爲兩類，一類是革命的，一類是反革命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革命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反革命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反革命的戰爭，但是單單不反對進步的革命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爲着帝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共產黨堅決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反革命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開始反對。我們中國，則從政府到人民，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主力軍到游擊隊，一律

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着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永久和平與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設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與永久光明的新中國與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與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爲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佔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齊努力，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於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 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爲什麼是持久戰與爲什麼最後勝利是中國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麼』與『不是什麼』。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做』與『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與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就是以下要答覆的問題。爲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爭中，戰爭與政治，抗戰的政治動員，戰爭的目的，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殲滅戰，消耗戰，乘敵之隙之可能性，抗日戰

爭的決戰問題，兵民是勝利之本，最後說到結論。我們現在就從能動性問題說起罷。

(六〇) 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與不符合於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與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思想，有道理，有意見，有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與方能做得好。思想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一切根據與符合於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於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與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趕走一個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着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後勝利。

(六一) 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更是人類在戰爭中的特點。人類在任何的行動中表現的能動性，沒有比在戰爭中更加强烈的。戰爭的勝負，一方面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如此，僅有這些，還只是包含着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與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的自覺的能動性。

(六二) 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台，却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裏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主觀指導

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

戰爭與政治

（六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也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與瓦解敵軍等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與敵國人民的援助，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那是錯誤的，應加改正。

（六四）但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同於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用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東西。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

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再現，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乾盡，戰爭仍須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種原故妥協了，但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 基於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種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戰略戰術從事攻擊或防禦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於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

抗戰的政治動員

(六六) 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與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戰以前，沒有抗戰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着。抗戰以後，政治動員也非常的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與飛機炸彈那裏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自己做的。偏遠聽不到炮聲的，至今還是靜悄悄。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決不可再輸敵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發揮這一着去制勝敵人。這一着是關係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尙在其次，這一着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

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六七) 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拿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與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戰的熱潮，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够，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與政策，就是說，要一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戰建國綱領』，應把它普及於軍隊與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與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戰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佈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衆團體，靠幹部人員。現在有的一些，滄海一粟，且方法不合民衆口味，神氣與民衆發生隔膜，必須切實的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够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系於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系於士兵與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靠了它取得勝利。

戰爭的目的

(六八) 這裏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

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裏說的，是作爲人類流血的政治之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麼。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消滅其肉體）。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爲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爲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爲一的有力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禦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爲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爲了保存自己，因爲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禦，是直接爲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退却，屬於防禦一類，是防禦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爲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爲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爲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與作爲保存自己之一種手段的防禦，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禦爲主，而在其餘時候以進攻爲主，然而通戰爭的全體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正確點說，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份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爲了全體的永久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爲着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裏。防禦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防禦，也是這個道理。

（七〇）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成爲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隱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麼意思

呢？前者爲了保存自己，後者爲了消滅敵人。因爲前者，於是利用地形地物，採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爲後者，於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箝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爲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爲了保存自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於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爲追擊隊，都是爲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箝制隊，或者作爲掩護隊，都是爲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於戰爭的全體，貫徹於戰爭的始終。

（七一）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要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於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爲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鬭爭。我們的戰爭，在於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於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份武裝，損傷敵人一部份人馬器物，把這些部份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爲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後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之政治目的。

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體戰略方針。我們已說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怎樣具體的進行持久戰？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覆是：在第一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與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與戰鬪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與戰鬪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與戰鬪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

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 由於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採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於戰略防禦地位。日本是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的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鬥力頗強的幾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並其一部份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與封鎖中國，空軍則轟炸中國，目前陸軍已佔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綫，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範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於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於敵強我弱這個特點而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 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裏就發生了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佔領一部份大城市大道與某些平地。由是，在其佔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佔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在全國，即使它能佔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地區是難於佔領的，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與爭取最後勝利的總後方與中樞根據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於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禦，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利用地廣與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採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它一個師，幾萬人對它一萬人，幾路對它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於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與進攻，在戰役與戰鬥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與防禦。我的戰略作戰上的內線與防禦，在戰役與戰鬥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與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還有第三，則是由於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及人員之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及人員之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與戰鬥的

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爲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於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它一個措手不及，使其部隊不及展開，重武器不及使用，高武器不及調動，大體上在半天，一天，或再加一個晚上，就要解決戰鬪。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滅它；打不好，也給它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說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台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的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與戰鬪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爲持久戰。

（七五） 上述這樣的戰役與戰鬪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對於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恰是完成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與戰鬪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例如抗戰初起時期之所爲，那就完全不適合敵大我小敵強我弱這兩種相反的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爲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數量針對着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數量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採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於廣大戰場之上。南京失守以後，得了第一期作戰的教訓，開始採用了上述的作戰方針與上述的兵團組成方法，只是使用的還不純熟。然而魯南戰役與晉南戰役，業已收得了顯著的成效，證明了這個方針是唯一正確的方針。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的，游擊戰爭也一般切合，也用得着它，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於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強弱相反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採取速決的進攻戰，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

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更加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採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着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變化着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禦；我是多兵從外線，敵是少兵從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它作主；於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後，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勝利以後，就逐漸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於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着我們自己的其他條件，再配合着敵人內部的變動與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機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形態。在這裏，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着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與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說過的戰役與戰鬪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於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但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靈活與計劃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

三個問題。

(七九) 前面已說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爲什麼又說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動與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這種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於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說過了。這裏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的行動自由權，是用以區別於被逼處於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就是軍隊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逼處於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是一樣。爲此原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爲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說都是爲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於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與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此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與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與逼敵處於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幾點。

(八〇) 主動是與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與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爲較能掌握與發揮，然而貫徹始終與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有用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鬪，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幾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幾倍，又沒有民衆與外國的對立，又不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的對立，那它便能保持一種絕對的優勢，它便有一種貫徹始終與普及各地的絕對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優勢的事情，在戰爭與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與戰役的開頭則少見。例如歐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優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勝，這是戰爭結局存在着絕對的優勢與劣勢之例。又如台兒莊勝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

立的日軍經過苦戰之後，已處於絕對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優勢，結果敵敗我勝，這是戰役結局存在着絕對的優勢與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優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抗。但一般是以絕對的優劣而分勝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開頭。中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目前，則雙方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於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成了優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多，又有其他許多不利因素，它的優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與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優勢再為之減殺。於是在總的方面，它就變成一種相對的優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與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在地理、人口與兵員的數量上，並且又在人民與軍隊的敵愾心與士氣上，却處於優勢，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於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執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與發動敵後的游擊戰爭，這就是在戰役的運動戰與游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與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與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造成戰略的優勢與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與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或被動與優勢或劣勢之間的關係。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與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與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够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的許多局部優勢與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與局部主動地位，把它拋入劣勢與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

我們的戰略優勢與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與戰略被動。但是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爲什麼呢？我要優勢與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部隊的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與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所謂更帶『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在多數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與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與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與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與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正確指導』的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爲優勢，變被動爲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與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係。

(八二) 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與主動被動之變化，觀於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楚、漢成皋之戰，韓信破趙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肥水之戰等等；外國如拿破崙的多數戰爭，興登堡的東普魯士戰役，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衆，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與主動，向着敵人局部的劣勢與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餘，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優勢與主動之敵反是，由於其主觀錯誤與內部矛盾，可以把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與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爲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之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

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鬭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鬭爭中，由於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爲優勢，化被動爲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爲劣勢，化主動爲被動。牛魔王打不贏孫悟空，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後勝利。主動與勝利，是可以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而由劣勢與被動者從優勢與主動者手裏奪取過來的。

（八三）錯覺與不意，可以喪失優勢與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與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麼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衆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採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與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與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麼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擊，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說的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錯覺，出以不意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與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衆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去攻擊它，造成它的錯覺與不意之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內戰時代的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與武裝起來了的民衆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內戰更能獲得廣大民衆的援助，可是因爲歷史的錯誤，民衆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爲我用，且時爲敵人所利用。只有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下，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衆，就一定能够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

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與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與耳朵盡可能的封住，使它變成瞎子與聾子，要把它指揮員的心盡可能的弄得混亂些，使它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與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問題；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些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與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與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於主動地位的。但這種主動，已隨其本身帶着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後），與乎我方具備着許多有利因素及我之某些（僅是某些）主觀錯誤已開始改正，而開始了部份的減弱，敵之台兒莊失敗與山西困處，就是顯證。我在敵後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佔領地之守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它的主動將隨其戰略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它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後的游擊戰爭及其他條件，這是它不能不停止進攻於一定限度與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他國際變化，是第二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壞的。我在戰爭初期頗處於被動，民衆未發動與不適當的陣地戰，是重要的主觀原因。但第二期開始改取了運動戰方針，便有了些進步，但可惜民衆還只是極少部份的發動。往後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持主力軍的戰役與戰團的進攻戰，猛烈發展敵後的游擊戰爭，並從政治上大大的發動民衆，我之戰略主動地位自能日益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說靈活性，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的使用兵力。靈活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與教育軍隊，組織與教育人民等等之外，就是使用軍隊於戰團，而一切都是爲了戰團的勝利。組

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則更加困難，特別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與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與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與集中，分進與合擊，攻擊與防禦，突擊與箝制，包圍與迂迴，前進與後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這些戰術，並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裏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於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防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於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禦，防禦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後退，後退變為前進，箝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箝制隊，以及包圍迂迴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况，及時的恰當的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鬥指揮如此，戰役與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存乎一心』的『運用之妙』，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况，『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而採取及時的與恰當的處置方法之一種性質，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內線的速決的進攻戰於以較多的取得勝利，於以轉變敵我優劣形勢，於以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於以壓倒敵人而擊破之，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

(八八) 現在來說計劃性。由於戰爭特點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與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確實的。敵之一方最不確實，但也有徵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後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由於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於戰爭只有程度頗低與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少完全與固定，它隨戰爭之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範圍之大小而有程度之不同。戰術計劃，例如小兵團與小部隊的攻擊或防禦計劃，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劃，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劃，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份地改變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劃，是基於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增加了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着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劃便須改變。戰術、戰役與戰略計劃之各依其範圍與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戰爭的勝利是離不開它的。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 有些人，基於戰爭之流動性，就根本否認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說這樣的計劃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於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與戰爭是迅速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與戰爭之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於戰爭的情況與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

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與它。例如，由於華北戰爭的情況與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與相對的固定性於八路軍的『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着手，成爲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與另一方針的採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於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之範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之根本性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這就是我們對於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〇）在說過了戰略上之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與戰役戰鬪上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與計劃性之後，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爲優勢，化被動爲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之於戰役與戰鬪上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之於戰略上之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之中。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爲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禦中的戰役與戰鬪上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

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與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與戰鬪上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於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着的所謂『運動防禦』包括在內，並且也把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與陣地防禦也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與戰鬪的優勢兵力，進攻性與流動性。

（九二）由於中國版圖之廣，兵員之多，但軍隊的技術與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術與教養比較優長；在此種情形下，無疑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裏，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

（九三）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然而，這與韓復榘式的逃跑主義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復榘一類人所藉口，只有向後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之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結果，中國雖有『堪察加』也沒有用。因為雖有堪察加，還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種東西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與戰鬪上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防禦』與退却，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的執行。然而拚命主義却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他們不知道運動戰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於不利而利於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在運動中，並就有利於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之

地形、好打之敵情、能封鎖消息之居民、敵之疲勞與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之前進，雖暫時的喪失部份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的部份的喪失土地，是全部的永久的保存土地與恢復土地之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之保存時，應該勇敢的退却，保存軍力，以便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之得失，結果不但城與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實在是戰略防禦中弱軍對強軍作戰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 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第二種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之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之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於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於就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與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我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裏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與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與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助之以陣地戰與游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將由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份，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

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爲此原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佔地區，發動與配合民衆武裝，從事於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的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爲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游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與顯赫的名聲，但『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與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並且正規軍分散作游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敵佔臨汾後，軍事當局下令在晉全軍一律『以旅爲單位作游擊戰』，這是具有戰略眼光的處置。

（九六）防禦的與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迴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採用爲重要手段，更不說用之爲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於運動戰範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與必要的。爲着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與爭取餘裕時間之目的，而採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防禦』，更是屬於運動戰的必要部份。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够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提高了陣地戰的地位，因爲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爲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爲戰爭的領導藝術與人的活躍性，臨到像歐戰中期以後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這是近代技術的不良結果。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着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

從壕溝裏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够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沒有基本的陣地戰，主要與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與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與人的活躍性能够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之幸事呵！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這是戰爭本質上的問題。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之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之不同，因而一般有所謂消耗戰與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爲什麼？敵之強的因素尙在發揮，戰略上之優勢與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與戰鬪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加速地滅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與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與被動還未脫離，爲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與戰鬪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殲滅戰是達到戰略消耗之目的，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够是持久戰，用殲滅達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

戰不同於消耗戰。戰役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二〇〇) 理論上與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禦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份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與游擊戰之部份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之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與運動戰的殲滅性與消耗性，再行大量的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爲了使戰局持久，逐漸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後地驅逐敵人。

(二〇一) 但事實上，十個月經驗，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游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種情況，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消耗了敵人，對於持久作戰與最後勝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敵我技術與兵員教養程度之不同。然而理論上，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游擊隊雖在許多具體任務上，例如破壞與擾亂等，不能不是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須提倡並努力實行：在戰役與戰鬪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二〇二) 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鬪形式上，主要的就是採用包圍與迂迴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爲達殲滅敵人之目的。

(二〇三) 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教養——其組織性，其過去沒有打過敗仗的自信心，其對天皇與對鬼神的迷信，其驕邁的自尊心，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都是日本軍閥多

年的武斷教養與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後耐心的有計劃的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的向着這一點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裏，悲觀主義者可以據之引向亡國論，消極的軍事家又可據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種長處是可以破壞的，並且已在開始破壞中。破壞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不是侮辱其驕邁性的自尊心，而是了解與順導他們這種自尊心，從優待俘虜、國民外交等等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與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與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證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台兒莊等等戰役就是明證。日本軍心已在開始動搖，士兵了解戰爭目的，陷於中國軍隊與中國人民的包圍中，衝鋒的勇氣遠弱於中國兵等等，都是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並將隨着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這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與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二〇四）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術與兵員教養的程度，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在平原地戰團中，是困難的。速勝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於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於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係上，對於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

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之可能性

(二〇五) 關於敵之可勝，就在敵人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之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與戰役上說來，敵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於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它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得了便宜之後，加之以冀東、察北之佔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劃，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與這樣大的抵抗力，它是沒有料到的，它把中國已處於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着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與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它要再進，非再增加不可。但由於同蘇聯對立，又其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我們說它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後的進攻點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力方向，台兒莊以前，華中、華北大體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佔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台兒莊敗仗後，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的改了一改。三是沒有戰略協同。華中、華北兩集團中，每一集團內部是大體協同的，但兩集團間最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莊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觸了霉頭之後，於是

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來指揮了，算是暫時的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及軍閥內部存在着頗爲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向前發展着，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機，這點顯著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佔領後之停頓，主要因兵力不足，它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台兒莊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戰略協同，沒有主力方向，失去時機，包圍多殲滅少，是台兒莊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台兒莊以後，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據其兵力不足與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於此者，又失之於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之類。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尙可有意地製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衆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前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都說明：戰爭勝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存在着某種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爲我之戰略計劃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劃寧可放在敵少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並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製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不是一切不行），但其戰鬪指揮，即部隊戰術與小集團戰術，却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之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〇六)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爲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與戰鬪應堅決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與戰鬪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於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與戰鬪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台兒莊以及許多的其他戰鬪。而避免不利條件下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採之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則根本不幹，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劃，不得不跟了我們幹持久戰。這種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後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則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所慮是國家主力由決戰而犧牲，上了敵人的當。如果避免了戰略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促進並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與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勝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勝，一到形勢稍爲好轉，就騰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幹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爲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最不好的『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的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却，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崙。一九一四年八月下旬，法國避免在法比邊境的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却，戰勝了雄

視歐洲的德軍。中國現在也應該這樣幹。部份領土的喪失是全國解放的條件，一時痛苦是永久幸福的條件，真正愛國的人們應知此理。

(二〇七) 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國家主力喪於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民族的生存與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的近視眼，結果一定與亡國論走到一夥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後引向亡國的危險。

(二〇八) 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鬪的與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與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的去做。為此目的，部份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與恐日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復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與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劃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和持久戰與最後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劃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二〇九) 英勇戰鬪於前，又放棄土地於後，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鬪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不是白吃了嗎？睡覺於前，又起床於後，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鬪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戰爭問題的機械論與形式邏輯，人間事物上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與準備反攻而流血戰鬪，某些土地雖仍不免於放棄，時間却爭取了，給敵以殲滅與給敵以

消耗的目的却達到了，自己的戰團經驗却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却起來了，國際地位却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土地放棄爲了保存軍力，也正爲了保存土地，因爲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份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後，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麼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後，就不算什麼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〇) 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於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不爲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後任何階段應都是主動。我們是持久戰與最後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 日本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鬆其進攻與鎮壓的，日本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全佔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着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

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爲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先打中國。那些認爲日本將在佔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後適可而止的，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逼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數與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爲了還要進攻並防禦別的敵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與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也不能佔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餘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機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種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已判兩道爲鴻溝：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種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與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一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後，那時，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在歐洲戰爭起來之後，它就會幹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於蘇聯的更加強大，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迫使它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劃，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出現了這種情形之時，不是進攻中國的放鬆，反是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爲那時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怠。『雷公打豆腐，揀了軟的欺』，這是自然界與階級社會的規律。

(一一二)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與各方面較之過去更加千百

倍的進步。中國已處於進步的時代，並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佔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於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於中國之弱，而這種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年各種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裏只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與人民的進步。

(一二三) 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到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與士兵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潮，一切技術與戰術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他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術條件雖優，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與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着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與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這和內戰時期根本不同。在這個上面，就建設了一切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與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鬥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二四)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在於中國民衆的無組織狀態。克服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之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之人民之前，好像一匹野牛衝入火陣，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幹的『捉兵法』、『買兵法』，亟須禁止，改爲廣泛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戰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衆，則幾十幾百萬萬也不成問

題，豈有如此廣土衆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與民衆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衆眼睛中看成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 很多人對於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弄不好，以爲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與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爭取敵軍。這些原則的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與尊重敵軍俘虜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爲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 當此保衛武漢等地成爲緊急任務之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用之於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衛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的提出與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確定地保衛不失，不決定於主觀的願望，而決定於具體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鬥，是最重要的具體條件之一。不努力於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之覆轍。中國的瑪德里在什麼地方，看什麼地方具備瑪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瑪德里的，今後應該爭取幾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的最基本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上動員。

(一一七) 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爲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普遍的深入的改良官兵關係、軍民關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爲保衛一切未失地區，恢復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後勝利。

(一一八) 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不惜反反覆覆地說到它，實在是沒有它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之最基本的條件。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黨部與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 論

(一一九) 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人民革命的興起。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及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都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要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的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外，還要在農民中從政治軍事上組織多數的游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機械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而能够在戰爭的後期從事於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衆不斷的傾注到前線去，爲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够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一九三六年六月與斯諾談話)『中國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的最中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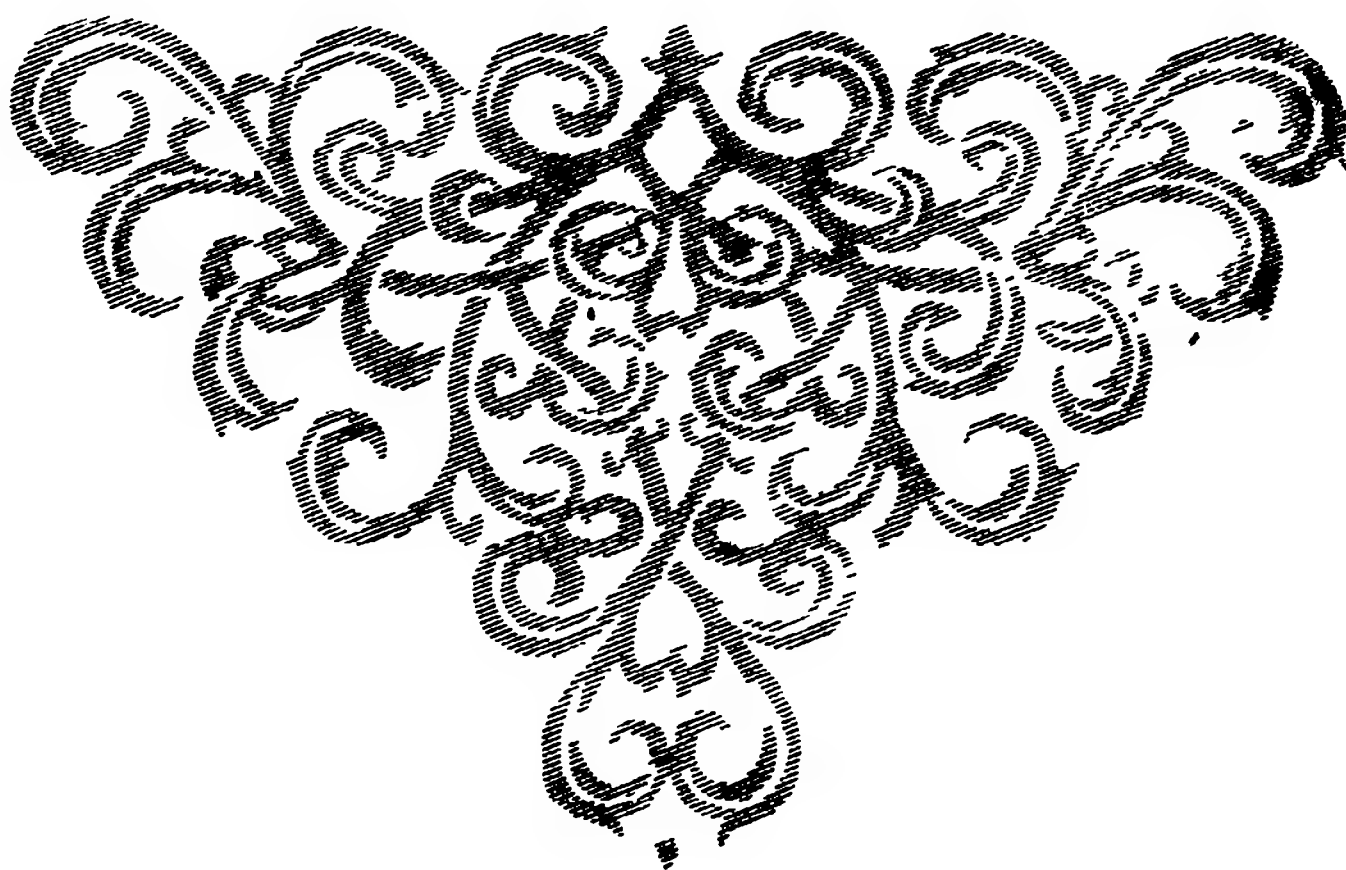
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的與部份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全中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中共八月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二二〇）我的講演至此為止。偉大的抗戰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說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罷。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與討論，我所說的只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註：此是最後校正，與『解放』報發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著者，

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

五 卷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陝甘寧邊區高幹會上的報告——

一 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但有許多同志，看重了財政，不懂得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這是一種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作怪的原故。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足影響經濟，但決定財政的却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我們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與工作人員的生活費與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這些經費，都是由人民的租稅及幾萬軍隊與工作人員自己的生產來解決的。不發展民營經濟及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

決；忘記經濟發展，忘記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一九四〇年及一九四一年，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窩。國民黨用停發經費與封鎖經濟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政府辦了許多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我們就用這些辦法戰勝了困難。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障供給這一原則，不是被明白無疑的歷史事實給我們證明了嗎？到了現在，我們雖則還有很多的困難，但我們的公營經濟的基礎，已經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來一年，我們的基礎就更穩固了。

發展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但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有些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嚷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採用的。黨的路線是正確的發展路線，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這就是黨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的兩條戰線上的鬭爭。

我們要發展公營經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民給我們幫助的重要性。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萬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萬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萬担，保證了軍隊與工作人員的食糧。截至一九四一年，我們公營農業中的糧食生產一項，還是很微弱的，我們在糧食方面還是依靠老百姓。今後雖然一定要加重軍隊的糧食生產，但暫時也還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邊區地廣人稀，只有

一百四十萬人口，供給這樣多的糧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爲我們運公鹽及出公鹽代金，一九四一年還買了五百萬元公債，也是不小的負擔。爲了抗戰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但是我們一方面取之於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生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及商業，採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戰。

有些同志不顧抗戰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這是錯誤的觀點。因爲抗戰如不勝利，所謂『仁政』不過是施在日本帝國主義身上，於人民是不相干的。反過來，人民負擔雖一時加重，但是渡過了政府與軍隊的困難，支持了抗戰，打敗了敵人，人民就有好日子過，這個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錯誤觀點，就是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與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能承襲。我們一時候加了人民以重負，但是我們立即動手建設了公營經濟。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兩年中，軍隊與機關學校因自己動手而獲解決的部份，佔了整個需要的大部份。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蹟，這是我們不可被征服的物質基礎。我們的自給經濟愈發展，我們加在人民身上的租稅就可以愈減輕。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個階段上，我們取之於民是很少的，在這一階段內，大大地休養了民力。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爲第二階段，民負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後，可以走上第三階段。如果我們的公營經濟在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兩年內是繼續發展的，如果我們的軍隊在這兩年內獲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機會，那末，在兩年以後，民負又可減輕了，民力又可從事休養了。這個趨勢是可能的，我們應該準備這樣做。

我們要批駁這樣那樣的偏見，而提出我們黨的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

公私關係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的發展公營與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租稅的限度，使負擔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民負，藉以休息民力。

國民黨的頑固份子覺得邊區的建設是無希望的，邊區的困難是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每天都在等待着邊區自己『塌台』。對於這種人，我們是用不着和他們辯論的，他們是永遠也看不到我們『塌台』的日子的，我們只會興盛起來。他們不知道在共產黨與邊區政府領導下，人民群眾總是擁護黨與政府的。黨與政府在經濟與財政方面也一定有辦法，足以渡過任何嚴重的困難。我們現在的困難，有的已經渡過，有的快要渡過。我們曾經歷過比現在還要困難到多少倍的時候，那樣的困難我們也渡過了。現在華北華中各根據地的困難，比我們陝甘寧邊區還要大得多，那裏天天有嚴重的戰爭，那裏已經支持了五年半，那裏也一定能够繼續支持，直到勝利。在我們面前是沒有悲觀的，我們能够戰勝任何困難。

高幹會後，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澈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或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與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這五項，對於我們的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關係極大。精簡之後，減少了消費性的支出，增加了生產的收入，不但直接給予財政以好影響，而且可以減少人民的負擔，影響人民的經濟。經濟與財政工作機構中的不統一、鬧獨立性、各自為政等惡劣現象，必須克服，而建立統一的、指揮如意的、使政策與制度能貫徹到底的工作系統。這種統一系統建立後，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節約是一切工作機關都要注意的，經濟與財政工作機關尤其要注意。實行節約的結果，可以節省一大批不必要的與浪費性的支出，其數目可以達到幾千萬。從事經濟與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還必須克服存在着

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污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五項要求在黨部、政府、軍隊各個系統中完全實行起來，那我們的這次精兵簡政，就算達到了目的，我們的困難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們會要『場台』的人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們封住了。

下面，我們就來分述經濟與財政的各項工作，具體地總結過去各項工作的經驗，並提出一九四三年應該實施的工作方針。

二 關於發展農業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既是邊區經濟與財政的總方針，那末，在經濟方面過去是如何做的，有些什麼成績，有些什麼缺點，今後應取什麼方針，就是首先重要的問題了。

邊區的經濟，分爲民營公營兩大方面。民營經濟，就是一切私人的農工商業。公營經濟，就是政府、軍隊與機關學校所經營的農工商業。這兩方面的作用與關係：民營經濟是爲了解決邊區一百四十萬人民的生活，同時以租稅的形式援助政府與軍隊，支持抗戰建國的神聖事業。公營經濟是爲了解決數萬黨政軍的生活費與事業費的主要部份，以便減少取之於民，休養民力，便於將來緊急需要時的取給。在這裏適用的原則，就是『公私兼顧』，或『軍民兼顧』。

如果我們的黨與政府不注意動員人民並幫助人民發展農工商業，則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戰需要亦不能供給，其結果就是軍民交困。軍心民心如不能鞏固，一切也就無從說起了。所以黨與政府用極大力量注意人民經濟的建設，乃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

但是單靠人民交納租稅，還是不能解決抗戰建國的需要；特別是在邊區地廣人稀的條件下，人民的租稅與政府的支出之間，長期地存在着一個大矛盾。所以，我們又必須用極大注意力去經營公營經濟，這是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軍隊與我們的一切機關學校在自己肩上擔負着的一個極大的任務。數年來在這方面我們有了很大的成績，一九四三年我們還要造出更大的成績，以便直接解決抗戰建國的需
要。公營經濟愈發展，則人民負擔就可愈減少，這又是培養民力的一個方法。而聯合與通融民營與公營經濟這兩方面的工具，則是金融。

民營經濟有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合作事業、鹽業與商業。這裏先說農業。

邊區的農業，在土地革命時期是下降的。那時的延安、安塞、保安、甘泉、華池以及東三縣等，均有許多荒地。華池、保安兩縣交界地方有個長約二百餘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戶人家。保安的烏鴉寺、張家岔，在同治年間已無人烟。甘泉的傅村川，延安的金盆灣及馬市川一大半，皆成荒地。邊區棉花完全停止了種植。牲口破壞更大：羊子只剩四、五十萬頭，牛、驢只剩十餘萬頭。紡織、馱鹽等副業，亦同樣被破壞了，尤其紡織幾乎完全停頓了。食鹽的輸出，到一九三八年才有七萬馱。由此可見，邊區的農業在那個時期是衰落的時期。只在中央紅軍來到邊區，內戰停止，土匪肅清，使農民得以安居樂業；『左』的經濟政策被糾正；休養生息的稅收政策被提出；以及黨政號召發展農業的影響，使農民的生產情緒大大的提高：才使農業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來。

下面是近四年來開荒、植棉與牲畜發展的統計：

年 別	開 荒 畝 數	植 棉 畝 數	牲 畜		
			牛	驢	羊
一九三九	一、〇〇二、七七四	三、七六七	一五〇、八九二	一二四、九三五	一、一七一、三六六

一九四〇	六九八、九八九	一五、一七七	一九三、二三八	一三五、〇五四	一、七二三、〇三七
一九四一	三九〇、〇八七	三九、〇八七	二〇二、九一四	一三七、〇〇一	一、七二四、二〇三
一九四二	二八一、四二三	九四、四〇五			
合計	二、三三三、二六三				

(說明：1、牲口的統計，葭、米二縣未計入；一九三九年的牲口數，清澗等七縣是將一九四〇年的數目加在裏面的。2、開荒是逐年所開數目。植棉與牲口是逐年統計之全邊區所有數)。

這個統計指明：邊區的耕地是逐年擴大，植棉畝數是逐年加多，牲畜是逐年發展，並且實際有的數目比統計表上的數目還要多些。因此，從前許多荒地，現在變成了熟地。如二家川現有一百餘戶居民，全川荒地都變成了熟地。烏鴉寺、張家岔現在也住滿了。延安縣過去十一個區均有荒地，現在只有金盆、柳林兩個區，中區半個區，姚店區一個鄉有荒地。延安在一九三九年還只有耕地三十萬畝左右，一九四二年就有耕地六十九萬九千五百三十六畝。安塞、安定、延川、延長等縣過去均有許多荒地，現在很少了。一九四〇年以前，邊區還從洛川及河東買糧。現在則不但不要從外邊買糧，且有部份餘糧向榆林一帶輸出。一部份人口從外地移來，牲畜也增加了，並不感到糧缺。從這種事實看來，邊區糧食已能自給，是無疑問的了。

植棉不但恢復了革命前的最盛時期，而且發展了。例如：延川的永坪、永勝、禹居等區，從前是不種棉的，現在均種起來了。延安從前不種棉，現在也種起來了。因為種棉比種糧利大，一畝地的棉花，平均收成可值七百元以上，如種糧食則只值二百餘元，是三與一之比。一九三九年種棉面積還僅

三千七百餘畝，至一九四二年就有九萬四千餘畝，產量已達一百四十萬斤，這個成績是很大的。但全邊區需要量是三百萬斤，這就是今後的任務。

牲畜的發展也很快。例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八千多，現有六萬以上。華池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七萬左右，現有十二萬多。延川東陽區三鄉張家河，在土地革命前只有羊五群（那裏沒有牧場，每群只能有三、五十頭），現有十三群。牛驢的發展比內戰時差不多增加了三分之二。因此，一九四〇及一九四一兩年能輸出食鹽五十萬馱。假如沒有牛驢的增加，這項食鹽是很難運出的。

但農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發展較普遍、成績較多的要算直屬各縣及隴東，特別是延安、安塞、甘泉、華池、曲子和東三縣。因為這裏土地多，人口少，氣候也不錯。以運鹽為副業也是這些縣分多。同時，公家消費最多的也在這一帶。沒有發展的要算警備區，因為那裏人口多、土地少，擴大耕地不可能。那裏多少有些成績的，是逐漸恢復了家庭紡織業；並向延安一帶有些移民，相當地調劑了人口與土地的配備。

另一方面，發展的速度也不同。在一九四〇年以前，發展是快些，特別是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有很大發展。例如：開荒在這兩年有一百七十萬畝。一九四〇年，羊增加近六十萬，牛驢增加五萬多。但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的開荒，只有六十餘萬畝，僅及前兩年的三分之一強。一九四一年的羊比一九四〇年還減少了，牛驢只增加一萬餘頭（實際是減少了）。但在這兩年，棉花和紡織又往前發展了。

以上是邊區農業發展的概況。下面講一講邊區農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在國內和平未建立前，農業是衰落的，以後是發展的。這種發展是怎樣得來的呢？除了中央紅軍到達，土匪肅清，和平實現，農民能安居樂業外，還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是糾正了經濟政策上的『左』的錯誤，實行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因為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因經濟政策的『左』，怕發展生產。另一方面，因為農業經過革命前後的破壞，基礎很弱，妨礙發展。中央實行糾正『左』的政策，打破了農民怕發展生產的傾向，農民願意增加耕具，富農敢於安夥子，僱長工。休養生息政策恢復了元氣，便利了農民的再生產；同時糧價高，副業利大，也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熱忱，使農業迅速發展，並打下了一九四一年徵收公糧二十萬担與公草二千六百萬斤的基礎。

第二是發展生產的號召。例如：一九三九年中央召開的幹部生產動員大會，第二次邊區黨代表大會，第一次參議會，第一次農展會，均有發展生產的號召，這些號召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為首先推動了幹部，經過幹部深入了群眾，動員了男、女、老、幼以及二流子均參加生產，增加了勞動力，最後地打破了農民怕發展生產的心理。因此一九三九年的開荒數達到一百萬畝以上；真正向外邊買進牲口來，也是那一年為最多。

第三是移民政策。最近四年中耕地擴大二百三十七萬畝，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於土地多的區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增加了人口。例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人口三萬四千，現有人口七萬左右（延市在內）。因此該縣的耕地，由三十萬畝左右，增至七十萬畝左右。安塞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人口二萬左右，現有人口四萬以上。甘泉原只有八千餘人，現有一萬四千餘人。延長在一九三九年只有人口二萬五千，現有三萬二千餘。延川荒地最少，但從一九三八年到現在，也增加人口一萬餘。華池在一九三八年只有三萬五千人，現有四萬餘人。其他如保安、安定、靖邊、隴東、關中各縣的人口均有增加。這些增來的人口，以橫山、榆林、神木、府谷為多，其次是警備區，均是自動移來的，不是由政府組織來的。他們之所以自願來，是因為有土地，有優待；各縣又組織老戶在糧食、工具、窯洞上的幫助。

等；同時又有富農接納安夥子，也便利了移民。移民增加，不但耕地面積擴大了，也發展了牲畜，繁榮了商業。所以移民是發展農業的條件之一。

第四是獎勵政策。移民三年不收公糧，並減少其他義務負擔。棉農中有種棉利益不及種糧利益的，由政府賠償。從邊區外面買進來的牲口，第一年減少一定數量的公糧。還有兩次農展會對於勞動英雄的獎勵，也發生了很大效果。例如：延安的吳滿有、卯克呼，甘泉的杜發福，都是經過第一次農展會獎勵過的，他們現在都成了很好的富農，繳公糧均在五担以上（邊區一担三百斤），並在農村中推動了其他農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均推動了農業的發展，尤其是糧食與棉花的發展。

第五是減少勞動力的浪費與調劑勞動力。內戰時，因忙於戰爭，不暇生產，土地荒蕪。和平實現後，又有自衛軍經常的訓練與放哨，還有各種會議，故每個壯丁一個月至少要耽誤三個工。後來將這種誤工減少了。同時，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公糧收的少，義務運輸公糧也不多，誤工較少。最近幾年中農村中的札工（有工頭，集體為人家做臨時工）、變工（群眾互助性質，也是集體做工）發展了，調劑了勞動力。又動員了『二流子』參加生產，婦女參加生產的也多了。所有這些，就幫助了邊區農業的發展。

第六是農貸政策。以前沒有農貸，但有休養生息政策的幫助。現在公糧加重了，特別是百分之八十的農戶都要交公糧，一部份（大致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農具和食糧的農戶，必須有貸款的幫助。並且為了在某種必須發展的農業（如植棉）、農村副業（如紡織）與某些必須更多發展的地區，給以農貸尤為必要。一九四二年農貸雖然只放出四百餘萬，其中耕牛貸款只有一百五十餘萬，但在此項貸款幫助下，買了耕牛二千六百餘頭，又買了近五千個農具，又發展了植棉，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幫助。但因財力有限，只能按照政府的財力來貸款，還不能按照農戶的需要來貸款，但少有比沒有總

要好些，總有些調劑的作用。

上面講的是農業發展的幾個主要原因。下面再講到我們工作中的幾個主要教訓。

第一、要因地因時制宜。農業的地區與時間不同，發展的方法也不同。例如警備區沒有荒地（除清澗有少數），耕地不能擴大；羊子爲牧地限制，發展有限；運鹽又缺乏馱牲；減租政策又未徹底；因此，那裏的糧食沒有增產，副業除紡織外亦未發展。但是多鋤草、多施肥、多犁地的深耕（改良作法）辦法，雖在那裏早已實行，也還應該根據現狀作進一步的研究，以期盡可能的增產。但是這種辦法，若拿在土地多、人口少、作法粗的區域去用，便少實效。因爲這些辦法都要增加勞動力。在後一種地區的農民看來，深耕不如多種地，多施肥不如多開荒；尤其在雨水少的區域，多種地是較強的。所以改良農作法的口號，現時在後一種區域一般是少實效的。在這些區域，目前真正增加產量，最主要的還是靠開荒。如果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六年間，增加的耕地約有三百萬畝，則一九四二年的收穫量比一九三六年至少增加了粗糧五十萬担，合細糧二十五萬担（每担三百斤）。如果一九四二年邊區的糧食產量估計爲一百五十萬担細糧，則六年來因耕地增加而增產的糧食，就佔了總數的六分之一。此項增加的耕地，部份屬於移民的開荒，部份屬於老戶擴大的耕地。由此可知，我們指導農業，要依各種不同地區而採取不同方法，一種地區以深耕爲主，另一種地區以擴大耕地面積爲主。在時間上也要有分別：在有荒可開時，以獎勵開荒爲主；在荒地開盡時，就要轉爲以獎勵深耕爲主了。不但在大的區域之間要有分別，就是在一縣、一區、有時甚至在一鄉之內，也要有這種分別。例如一鄉之中，某幾村荒地多，就應鼓勵開荒，某幾村荒地少或無荒地，就應鼓勵深耕。在時間上，尚有荒地時，該鄉就應鼓勵開荒，荒地開完，該鄉就應鼓勵深耕。但是我們在過去幾年的工作中，雖然一方面是有成績的；但在另一方面，確又有許多工作是空洞的，一般化的。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知道周

密研究客觀情況，根據不同地方與不同時間，提出確定的要求，解決增產的條件。過去曾一般地提出深耕、開荒、修水利及增產四十萬担或二十萬担的口號，實際則包含着許多的主觀主義，許多農民對於這些口號是沒有興趣與影響的。從此得出結論：今後工作要實事求是的深入調查研究，按照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解決問題。

第二，很大一部份地區的農民至今還是重租重息，減租減息的政策沒有徹底執行。農民一面要向地主負擔租息，一面要向政府負擔公糧公款，自己所得太少，提不起生產的積極性，也就不可能增加生產量。從此得出結論：我們要認真執行減租減息的法令。

第三，公糧增加與新收公草、羊子稅及運公鹽的影響，使農民生產情緒降低。例如：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兩年農民所出公糧公草公鹽甚大，而兩年農民所擴大的耕地就只有六十餘萬畝，僅佔一九三九年的十分之六。牲口在一九四一年實際上沒有增加，羊子反而減少了（當然瘟疫有關係）。移民也減少了，一九四二年移民只有四、八四三戶，並有三、五二七戶老戶發生遷徙，原因主要是怕負擔。還有一個原因：在公糧徵收方法上，是按實物收穫而不是按地畝多寡累進，這種辦法，在平均負擔上來說是合理的，但對促進農業投資是有妨礙的。因為同樣的土地，收成多，要多出，收成少，可少出，甚至不出，這樣就會降低農民在土地上投資的積極性。如按地畝徵收，這點便可糾正，中、富農的積極性更會提高，對於貧農也無妨害。從此得出結論：公糧公草要有限度，同時要改善徵稅標準，方能促進農業生產。

第四，政策應貫徹執行。例如：移民與植棉，規定三年免收公糧，但實際又向移民『歡迎』公糧，棉地也徵收公糧一半；從外地買進的牲口，原規定第一年減少一定數目的公糧，也未實行；還有獎勵生產條例也未完全實行。所有這些，不但影響政府威信，而且會降低農民的積極性。從此得出結

論：今後凡屬政府頒佈的法令，必須堅決實行。

第五，調劑勞動力及其他許多幫助農民的辦法，如變工、札工等，關係增進農業甚大，但是除一部地方如延安等縣外，我們還沒有去加以組織和發揚。各縣幹部，固然有許多同志是在那裏積極努力地替人民打主意，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發展生產的好辦法，造出了許多的模範例子；但在另外許多同志却不是這樣，他們缺乏實事求是與積極努力的精神，他們缺乏創造性，他們覺得農業上沒有什麼工作可做，或者不知從何着手，於是只提出『春耕』、『秋收』等空洞口號，自己採取消極態度，讓農民自流地去幹，政府只是事後登記一下。但實際上要做的事很多，很多好辦法都可以想出來。例如：延安縣在一九四二年春耕時，一部份農民情緒很低，發生了移走、或者分家、或者賣牲口準備縮小生產的現象。這些現象，在缺乏積極精神與缺乏創造性的同志看來，是沒有辦法的，只好聽天由命，讓其壞下去。但延安縣的同志們却不是這樣，他們沒有消極態度，也沒有官僚主義。他們能夠抓住問題的要點，採取積極的辦法，克服了困難。當時黨與政府做了在宣傳上、在糧食調劑上、在窖洞和農具調劑上的許多工作。後來，不但生產沒有縮小，反而增加了八萬餘畝耕地。這一實例證明：我們的地方黨與地方政府在農業上有很多的工作可做與應做，而且只要扼要、得法，一做就會生效。從此得出結論：幹部要有克服困難的積極精神，要同群眾聯系一起，根據群眾的需要，創造生動的辦法，解決群眾的問題，決不可有消極態度與官僚主義。

爲了使我們的同志對於這一個密切聯系群眾、認真解決群眾困難的極重要問題上獲得一個明確的觀點，特將延安縣同志關於他們如何解決開荒問題、如何解決難民問題與如何解決二流子問題的報告，揭載於此，以供衆覽。

下面就是報告的原文：

延安縣一九四二年八萬畝的開荒計劃是怎樣完成的？

(一) 依靠移來難民的勞動力來開荒。

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的難民有二五、四二八人。五個人一個勞動力，有五、〇八六個勞動力。一個勞動力一年開一〇畝荒，計五〇、八六〇畝（開一〇畝是三年來難民開荒的平均數。一九四二年每個勞動力開的比這還多）。

(二) 依靠老戶的勞動力、畜力來開荒，計二九、三九九畝。

老戶的勞動力有一〇、六一六個，平均一個勞動力開不上三分地就可以完成。

(三) 但組織勞動力是一件大工作，本年採取集體工方式進行集體勞動，如札工、變工。又組織婦女、二流子參加生產。

共組織札工四八七個。另外吸收四、九三九個好勞動力參加集體勞動（變工），幾佔總勞動力三分之一（今春統計全縣勞動力一五、七〇二個），即三個人中有一人參加集體勞動。

札工就是由農村中好勞動力八至十個一組，設工頭一人，開荒時給人家或自己開荒，鋤地時給人家或自己鋤地。工頭有時參加勞動，就拿兩個勞動日的工資；不勞動，拿一個勞動日的工資。參加札工的有全爲本村人，也有外來人或外村人與本村農民共同組織的。

組織二流子參加生產，農民十分高興，可以鼓勵農民勞動熱忱的提高。

婦女參加生產，一年比一年多。特別是難民婦女，開荒有她們，鋤草的更多。柳林區本年有三九人。川口區三鄉難民婦女沒有鋤頭，跑到山裏等別人累了休息的時候，拿了鋤頭開荒，人家休息過了把鋤頭還回，又等着。

(四) 依靠於每個農戶的生產計劃。一九四二年本縣着重每一農戶生產計劃的製訂，由本人家中商量好，本人同意訂出的。政府印了統一的表格，裏面包括開荒鋤草等。計劃訂好，貼在每戶的牆裏，以後政府

檢查每戶的生產計劃時，即按此表進行。農戶計劃的製定，應按：（1）去年生產情形；（2）今年可能擴大生產的條件及（3）勞動力（人力牛力）多少來訂；（4）得本人同意；（5）要有經常的檢查督促工作。

（五）農貸的結果，特別是對難民十萬元的農具貸款。難民來時什麼沒有，開荒却先要用『梢鏟』刨去『梢』，才能用鋤頭開荒。農具貸款發給後解決了農具，難民開荒的熱忱很高，六天可以開一垧。一九四二年農具貸款放遲了一個時期，早一天早開多少荒地（注意：勿違農時）。

（六）春耕時，動員工作應盡量減少，讓農民有時間去開荒，去生產。

（七）政府對開荒工作抓得緊。開荒時間僅三個月，以一百天計，一天要開八〇〇畝，需要一、六〇〇個勞動力，佔去全縣勞動力十分之一。在四月十九日前還只開了一五、〇〇〇畝，距完成任務尚短得多，而時間已去了三分之二，所以下雨後從四月二十日起突擊開荒二十天，在二十天中完成總任務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三月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前：開荒一五、〇〇〇畝，佔總任務的一八·七%；突擊二十天：開荒四六、四四二畝，佔總任務的五八%。

在突擊中最好的爲下列各區：

柳林區，突擊時與十九日前開荒數之比，爲一、二九四·四：一〇〇。

姚店區，突擊時與十九日前開荒數之比，爲一、一八四·四：一〇〇。

川口區，突擊時與十九日前開荒數之比，爲四三二·一：一〇〇。

縣府對於開荒工作，前後開區長會二次檢查，發了三次指示信，縣府幹部下區鄉達三次之多。

區對鄉工作的檢查有的達七八次，至少有三、四次。鄉對村的檢查次數也不少。

領導上的抓得緊，檢查嚴，對於完成任務是有決定作用的。

如何解決難民參加生產問題

（一）歷年來延安難民增加統計表（數目字是每年增加的，延安市不在內）：

年	分	戶	數	人	口
一九三八			二四九		一、二〇〇
一九三九			五三三		一、九七六
一九四〇			一、一三七		六、〇九〇
一九四一			五、〇四〇		一四、二〇七
一九四二			一、〇五〇		六、二三一
共	計		八、〇〇九		二九、七〇四

與一九三七年人口比較：

	戶	數	人	口
一九三七年		七、七〇三		三三、七〇五
五年增		八、〇〇九		二九、七〇四
百分比		一〇三・九%		九〇・八%

換句話說，戶數增一倍以上，人數將增一倍。

移來難民主要住在川口區、柳林區、金盆區、姚店區，這些地方荒地很多。

(二) 難民來後，政府替他們解決生產困難的統計：

年 分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共 計
調劑土地 (畝)	一〇、二二〇	三、四五一	六、三三五	二〇、〇〇六
糧 食 (担)	六六九·九	四九五	四五八·四八	一、六二三·三八
子 種 (担)	四〇·一八	八·二	四七·三七	九五·七五
農 具 (件)	四二四	二、一三三	四二七	三、四八四
耕 牛 (頭)	九七九	八二	二二二	一、二七三

註：1、一九四二年還給難民調劑洋芋一三、五五五斤，調劑牛工二七三個。

2、農具是鐮、鋤、鋤三種。

(三) 解決難民生產困難的辦法：

第一，土地是很多的，我們提出公荒誰開歸誰，私荒本人不開，讓難民開。三年不出租子，以資鼓勵。

第二，住窖的問題：開始是住舊窖破窖。以後再有人來，因為多是找親戚朋友、社會關係來的，來時住在親友窖中，住下就打窖。還有是頭一年先來一人，把窖打下，第二年搬家眷來住。

第三，吃糧在農民中進行調劑。今年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後還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鼓勵老戶借糧，政府保證歸還。另一辦法是：發動老戶與難民調分子、安莊稼、攬工，條件由雙方自願訂定，讓老戶主家剝削一些沒有什麼問題，因為難民初來什麼也沒有，雖然被剝削，但不會使他們餓肚子。

本年統計：

調分子	三五九戶
安莊稼	四六六戶
攪工	一八四戶
共計	一、〇〇九戶

這些戶的吃糧，依靠主家解決。但調分子只能解決自己吃糧。安莊稼的、攪工的，則除自己外，還可解決家人吃糧，這樣的有六五〇戶，一戶以三人計，共一、九五〇人。加上調分子三五九人，共二、三〇九人，都是依靠主家解決吃糧的。假如要政府救濟的話，一人一年五斗，需糧一、一五四·五担，是多大的數目！所以安莊稼、調分子、攪工，條件由主夥雙方自由決定，可以解決多大的問題。不但吃糧問題解決，擴大生產增加了糧食，每戶以一個勞動力計，共有一、〇〇九個勞動力，一個勞動力打二担糧，可以增糧二、〇一八担之巨，除消費外，尚可餘八六三·五担，到第二年，這些人就可以自己從事生產了。

第四，籽種、土地，都是發動農民給難民調劑。籽種秋後歸還，土地出租子，政府保證。

第五，舉辦難民農具貸款，解決開荒工具，收效很大。假使各方面問題（吃糧、農具等）配合不好，會就誤開荒。所以抓緊時間，迅速解決各種問題是必要的，遲一天少開多少荒地。

第六，對難民的負擔問題，堅決執行邊府優待難民的決定，三年中沒有負擔，相反的，政府還給解決各種困難。今年縣、區、鄉政府幹部節省糧十担，用以撥給難民。中區三鄉解決難民吃糧，各種動員工作儘可能少負擔。

（四）難民爲什麼要來延安？

1、我們真正解決了難民的困難。特別是一九四〇年解決難民的吃糧，把影響擴大了。單是川口一區，就給難民調劑了三百担糧，這樣難民在一九四一年就來得多了。

2、政府的號召力固然大，但是難民自己將所得實惠告訴自己親友及其他社會關係，來得更大大。我們在

來的難民中找拿有綏德分區所發難民證的很少，原因是怕在那裏拿了安家錢，證明書，下來不自由，或變成公家人，寧願自己找關係找錢來。

(五) 對今後移來難民的意見：

- 1、發動難民利用社會關係去找人來。
- 2、縣、區政府認真替他們解決困難。
- 3、邊區政府撥一部份糧款幫助他們，秋後歸還。
- 4、堅決執行優待難民決定。

如何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

(一) 統計表：

年 分	原有二流子數	參加生產人數	未參加生產人數
一九三七	一、六二九	二九九	一、三三〇
一九三八	一、二四六	五七八	六六五
一九三九	五四三	一二〇	四二三
一九四〇	三五九	一七五	一八四
一九四一	一八四	一二六	五八

說明：

1、盤龍區某巫神，將三山刀打成鏹頭，向群眾說：再不騙人，從此努力下苦。

2、川口區三鄉李家渠惠三、高武二人，今春每人分配開荒六畝，完成，而且超過二畝。四鄉田家圪塆楊應成，分配開荒六畝，完成九畝。

3、柳林區今年糾正七人參加生產。烏羊區查出十二人，鬭爭後，有九人參加生產。豐富區八人。姚店區甘谷驛八人組成兩個組，到張家溝開荒。

4、豐富區三鄉南義溝白粉玉，一九三六年前是神官，一九四一年有一頭牛，僱一人，有羊二〇〇隻，當村長，出公糧一〇·二担，公鹽二〇〇斤，公草五〇〇斤，今年增加一頭牛，一個調分子，擴大生產，現在光景好了。

5、盤龍區二流子，因政府動員他們參加生產，他們說：今年事情不對，公家將咱這批人抓得太緊了。如四鄉李家砭李德金，過去吃洋煙，今年開荒六畝，煙也丟掉。全區有二十七個二流子，寫保條好好生產，結果有二十個很好。

6、牡丹區劉家坪某（忘記名字），政府動員他參加生產後，光景過好了。以後遇見工作人員去，他就好好招待，說：政府叫咱好好生產是對的。該區曹玉成，過去是個二流子，不種地，也不砍柴，不管冬夏，披着個捉襟見肘的爛棉襖，捲縮在冷炕上，每天吃上二錢洋煙，婆姨娃在飢寒交迫中啼哭着。革命後，在政府的教育下，現在他是四鄉的生產主任，人人稱讚他工作有辦法，勞動英雄。並且他對二流子抓得很緊，逼着他們做生產計劃，五天上山檢查一次。劉拐、閻鳳和在他督促下，今年每人種了八垧多地。

（註：一九四二年二流子增加的原因，是一九四一年金盆灣從固臨縣劃歸本縣管理，該區統計有四十三個二流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

(二) 我們動員的辦法：

第一，是宣傳教育說服，叫他們好好生產，糧食打下，光景好。

第二，由政府給以一定的生產任務，如開荒（上面的例子），按時檢查，並在農村中指定專人監督他們生產。

第三，發動群眾向他們作鬭爭，迫得他們參加生產。今年盤龍三鄉金盆河與雲山寺兩莊，發動生產競賽。在這個情形下，金盆河莊的二流子常德功，被全莊人鬭爭的上山開荒，開了三畝荒地，正準備種地十五畝。

第四，組織在集體勞動中。將二流子集中區上，組成開荒組，煙戒掉了回去。開的荒、種的地，誰的歸誰。

第五，政府給二流子解決了生產方面的一些困難。

(三) 結果：

群眾是非常歡迎政府叫二流子生產。因為二流子成天不勞動，不出公糧，每逢有動員工作還說怪話，群眾死反對。在二流子本身來說，在生產有實際成效後，他們知道政府是爲了他們好的，上面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個別頑固不改的，也有政府動員時跑走了，又回來，仍然參加一些輕便的生產。本縣沒有二流子變成土匪的。

我們引了延安縣黨政領導同志們的這個報告，不是偶然的。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在他們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完全不怕困難，他們像生龍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難。我們看，延安同志們對於工作是怎樣充滿了負責精神的：『一九四二年農具貸款放遲了一個時期，早一天早開多少荒地！』『抓緊時間，迅速解決各種問

題是必要的，遲一天少開多少荒地！』『製訂每個農戶的生產計劃。』『領導上抓得緊，檢查嚴，對於完成任務是有決定作用的。』這種精神，對於那些一遇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的人們，對於那些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人們，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在這種精神下，延安同志們沒有一件事不是實事求是的。他們對於他們所領導的延安全縣人民群眾的情緒、要求及各種具體情況是充分了解的，他們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他們就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群眾的藝術，他們完全沒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種情形，對於那些處理問題不根據群眾要求而根據主觀想像的主觀主義者，對於那些完全不作調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載、下情一點不知的官僚主義者，又是怎麼樣呢？豈不又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麼！我們希望全邊區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這樣的精神，這樣的工作態度，這樣的和群眾打成一片，這樣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學會領導群眾克服困難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使我們的工作無往而不勝利。邊區各縣同志中像延安同志這樣或差不多這樣的人是不不少的，我們希望這些同志的模範經驗，能够很快地推廣到一切縣區鄉裏去。

以上是過去邊區農業的總結，以下來說一九四三年的任務。

農業方面的主要要求是增產糧食和棉花（副業另說）。按照目前糧食與棉花的需要，並為爭取部份糧食棉花出口，還要求我們動員農民群眾增產二十萬担細糧及增產一百六十萬斤棉花。這個要求究竟有無希望呢？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六年之間，估計約開荒三百萬畝，增產粗糧五十萬担，那末，可否在今後數年內，再從開荒及其他方法上增產粗糧四十萬担或細糧二十萬担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之間，棉地已達九萬餘畝，棉花已達一百四十萬斤，那末，可否於今後數年內增加棉地十餘萬畝，增產棉花一百六十萬斤呢？

我們認為是完全可能的。

農民如能增產細糧二十萬担，那末，即使如一九四一年那樣交出二十萬担公糧，農民還是只以增產部份交給公家，自己可保有相等於原來的全部收穫量。至於棉花，即使將來要酌量收稅，農民也可保有絕大部份的收穫量，解決邊區的紗布問題。

應該實行一些什麼切實有效、而不是空洞誇張的政策才可達到上述要求呢？根據過去經驗，下列八項政策是必須執行的：（一）減租減息；（二）增開荒地；（三）推廣植棉；（四）不違農時；（五）調劑勞動力；（六）增加農貸；（七）提高技術；（八）實行累進稅。下面我們就來逐項加以申述。

我們的第一項農業政策就是減租減息。邊區一百四十萬人口中，約有一半是分過土地的，其餘一半則未分過，如綏米警備區、隴東、鄜縣及三邊的許多地方都是。在這些地區，應依政府法令實行減租減息，這是增加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極其重要的方針。在減租減息後，農民對地主負擔減輕，自己的保有量增加，生產積極性就會大大增加，生產量也可增加了。關於這一項，西北局與邊府已有具體決定，這裏就不多說。

我們的第二項農業政策就是增開荒地。根據荒地多的地方農民認為深耕不如開荒的要求，我們應在一切有荒地的縣、區、鄉組織農民多開荒地，以期增產糧食。開荒除老戶拋熟墾新所開者外，主要靠招集移民來開，移民條件現在是有的，各縣應做很大的組織工作。各縣應根據可能條件分別新戶老戶，規定具體任務。照延安縣的辦法，訂立每家耕種計劃。這種計劃，應將開荒地、種熟地一概包括在內。一九四三年全邊區增產糧食數目擬定為細糧八萬担，從人民與軍隊、開荒與改良農作法各方面來完成它。

我們的第三項農業政策就是推廣植棉。全邊區需棉三百萬斤，如果平均每畝能收淨花二十斤，只需棉地十五萬畝。如果每畝只能收淨花十五斤，或者還要少，便需棉地二十萬畝。我們可照後一種估計準備棉地。但因新棉戶缺乏經驗與信心，縱然擴大植棉面積，收成必不見佳，故不宜在一九四三年一年內完成全部需棉數目，而以一九四三年增闢棉地五萬六千畝，連前九萬四千畝，共計十五萬畝，以期產花二百二十五萬斤為適宜。種植此項面積的棉籽、棉地均無問題，但軋花設備很不够。以每架軋花機平均每日軋花六十斤計，需軋花機三百架，方能在半年內將三百萬斤花軋出來。一九四三年有二百二十五萬斤花要軋，需機二百餘架。但現只有破舊軋花機約一百架，每日能用的還不過五十架。如以五十架軋二百萬斤，需要兩個整年。故解決軋花問題，是推廣植棉政策中包含着的一個必不可少部份。再則，目前邊區農民尚不會榨棉油。二百萬斤棉花便有四百萬斤棉籽，每百斤可榨油十二斤。如榨油能解決，則棉農收益增加，植棉積極性亦可增加了。根據如上要求，一九四三年政府關於推廣植棉應做的工作有如下列：（一）實地分配有棉地的農戶種足十五萬畝棉地，並幫助棉戶準備棉種、肥料及種棉經驗，有耕牛農具困難的給予貸款。（二）製造軋花機及軋花機零件，供給棉農，並幫助棉農修理舊機。同時組織棉農向外地購買軋花機，政府酌予貸款幫助。用這些辦法解決軋花問題。（三）研究棉油榨法，使棉農能將四百萬斤棉籽榨出四十八萬斤油來（每斤十五元，值一千零八十萬元）。（四）組織公私合辦的棉業合作社，經營軋花、打包、銷售及榨油等事業。（五）獎勵優秀棉農，介紹種棉、軋花等優良經驗，藉以增進棉農的積極性，提高棉產的數量與質量。

我們的第四項農業政策就是不違農時，即在農忙時允許農民停止一切無關農業的開會與動員。在陝甘寧邊區環境內，農忙時期應該停止農民群眾除農業以外的任何開會與動員，藉以節省人力畜力，使之全部用到農業生產上去。必要的開會與動員，應當利用農隙。過去那種開會太多與動員太多的錯

誤是應該糾正的。

我們的第五項農業政策是調劑勞動力。這裏有獎勵移民、勞動互助、動員婦女、動員二流子、着重優抗、生產給假、軍隊幫助等項辦法，都是有助於勞動力的調劑的。

關於獎勵移民，要靠政府和人民配合來做。其辦法是：（一）由綏米警備區黨政負責組織五千個勞動力的移民向直屬各縣開荒；但須在自願原則下，並進行各方面的宣傳組織工作。（二）政府準備部份糧食借給必須幫助的移民，另外酌予農具貸款，並切實實行免徵三年公糧的優待辦法。（三）發動老戶幫助新戶，如借糧、讓熟地、借窖洞等；但此項借助應允許出借人享受利息，利率由雙方自由決定。（四）組織基礎好的農戶吸收最窮苦的移民夥種。租率亦不應過於低抑，使老戶樂於接納。（五）對外地移民，應經過和外地有關係的老戶去號召。邊境各縣應有專人負責接待，替他們介紹至有荒地的地區去安插。例如近日有河南災民六百至隴東，即應好生接待他們。

關於勞動互助。這就是說，在一村之內，或幾村之間，不但每一農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種土地，而且於農忙時實行相互幫助。例如以自願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為一組，有勞動力的出勞動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輪流地並集體地替本組各家耕種、鋤草、收割，秋後結賬，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農村工價補給工錢。這個辦法叫做勞動互助，從前江西蘇區普遍實行的勞動互助社或耕田隊，就是用這個辦法組織起來的。人口密集的鄉村，還可集合多少互助組為一互助社，組有組長副組長，社有社長副社長，組與組之間還可互相調劑。在必要與可能時，社與社之間亦可有些調劑。這就是農民群眾的勞動合作社，效力極大，不但可使勞動力缺乏的農家能够及時下種、及時鋤草與及時收割，就是那些勞動力不缺的農家，也可因集體勞動而使耕種、鋤草、收割更為有利。此種辦法是完全有益無害的，我們應大大提倡。邊區有些地方已經實行的變

工，就是這種辦法。各縣應以大力組織勞動互助社，大大地發展農民的集體勞動。此外還有一種札工，也爲邊區農民所歡迎，其法不是勞動互助，而是一種趕農忙的僱工組織，也是幾個人或更多人爲一組，向需要的人家受僱而集體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調劑勞動力。各地對外來札工應予以幫助，例如幫助找工做等。

關於動員婦女參加生產。邊區婦女雖多小脚，但仍然是僅次於男子的廣大的勞動力，她們可以參加各種輔助的農業勞動，如種菜、播種、鋤草、喂牲、送飯、挑水、收割等，有些還能做主要勞動。她們過去已經相當普遍地參加了，今後還應廣爲宣傳、勸告，發動她們的勞動熱忱，藉以增加農產。邊區黨的與群眾的婦女組織領導機關的同志們，至今沒有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感覺無事可做。其實她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應是研究與幫助邊區婦女群眾廣大地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使一切多少可以從事勞動的婦女都走上生產戰線，和男子一同解決增加生產的大問題。邊區還有很大一部份婦女沒有放脚，大大妨礙勞動生產，應用宣傳與強制兩種辦法，在數年之內，使她們放脚。今後無論何人，不許再爲幼女包脚。

關於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此事在過去數年已有顯著成績，各縣在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後，二流子人數大大減少了。但是一切尚有二流子的地方，必須在一九四三年用說服與強制兩種方法全部動員他們加入生產戰線。延安縣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的經驗，是布爾塞維克的好經驗。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不但增加了勞動力，而且消滅了壞人壞事，取得人民的擁護，鞏固社會的安寧。

關於着重優抗。過去事實上是優工第一，優抗第二，這是很不正確的現象。現應倒過來，優抗變爲第一，把人民的代耕制，首先認真地替那些缺乏勞動力的抗日軍人家屬（不分我友）耕種土地，其次才是替那些真正缺乏勞動力的黨政工作人員的家屬耕種土地。在勞動互助社（變工）組織成功的地

方，可以委託互助社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生產放假。這就是說，當農忙時，邊區某些家境困難的黨政工作人員，應每年允許他們回家二次，每次若干天，從事家庭生產。邊區的小學、中學，農忙時必須停課，讓學生及本地教員回家幫助生產，這也是調劑勞動力之一法。

關於軍隊幫助。當農忙時，邊區軍隊一律就駐地附近替農民耕種若干天，鋤草若干天，收割若干天，而不收受任何的報酬（吃自己飯），一則可以調劑勞動力，二則可以藉此密切軍民關係。軍隊的政治工作部門，應當計劃這一工作。

所有上述七項調劑勞動力的辦法，如果實行得好，對邊區的農業生產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其中特別是勞動互助社的辦法最爲重要，應在全邊區普遍實行起來。

我們的第六項農業政策，就是增加農貸。一九四二年政府放了耕牛、植棉、水利等幾種貸款，受到農民的極大歡迎，幫助一部份農民解決了困難。邊區農民中，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農具，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要使農業獲得發展，幫助這個極大數量的農民群眾解決他們的困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這裏的一個辦法就是增加農貸。一九四二年由邊區銀行主持在延安、甘泉、鄜縣、安塞、子長、固臨、志丹等七縣共計八千零二十五戶農家中，放了一百五十八萬元關於耕牛與農具的貸款，加上農民自己集合的資金一百零三萬餘元，共買耕牛二千六百七十二頭，農具四千九百八十件，增開荒地十萬餘畝，估計可增產粗糧二萬六千餘担。另外在延長、延川、固臨三縣，放了植棉及棉花青苗貸款一百五十三萬元，擴大了植棉面積五萬一千餘畝，估計可增產棉花八十七萬斤。根據一九四二年農貸的成績，除本年已放收回的三百一十一萬元應繼續貸與農民外，一九四三年還應增加一千七百萬元，連前共計二千零十一萬元。其中以一千四百萬元辦理農具耕牛貸款，以三百萬元辦理植棉貸款。根據

一九四二年放款的經驗，一九四三年的農貸實施，應注意下列各項：（一）貸款應放給荒地多的區域內有勞動力而缺乏耕牛農具或缺乏糧食接濟的新舊移民及老戶貧農以及土地種的多而無錢僱人鋤草的農家。（二）經過物資局試辦從外地買部份耕牛及適用的鋤、鏟，或幫助農民自己去買，舉行實物借貸。這樣才是真正增加了邊區的耕牛農具；否則，農民拿了邊鈔只能從邊區富農地主手中購買耕牛農具，還只是從邊區內部起了調劑耕牛農具的作用，沒有起增加耕牛農具的作用。（三）明年農貸既已增加，應相當地改變今年集中延安周圍數縣放款的方針，而以適當部份發到綏米、隴東、三邊、關中各地去。但亦不應取平均主義，而要有計劃地放在荒地多、需款迫切、而又能生產獲利的那些縣區與農家。（四）放款的組織要改善，即應經過當地區鄉政府及在群眾中有信仰的合作社去放款。因此，要使區鄉幹部認識農貸對於發展農業的重大意義，不要將農貸看作賑災救濟，不可採取平均分配政策及不負責任的態度。（五）放款的手續要簡單，要用當地農民已經習慣的借貸辦法，不用『借款申請書』等手續。（六）在農貸的總數二千零十一萬元中，劃出三百萬元，專作棉花與麥子的青苗貸款，借戶在棉麥收穫後以實物還款。這種貸款雖指定為棉麥青苗貸款，但農民可自由使用。這種貸款公私兩利，政府可以收回實物，農民可以減少高利貸的剝削。（七）放款要不違農時。財廳及銀行應即速籌劃，以便在今年陰曆年底以前發放貸款總數之半，即一千萬元。

我們的第七項農業政策就是提高農業技術。這裏說的提高技術，是說從邊區現有的農業技術與農民生產知識出發，依可能辦到的事項從事研究，以便幫助農民對於糧棉各項主要生產事業有所改良，達到增產目的。某些改良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已有了相當的經驗，對這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熱情是不對的。但誇大改良可能性，以為邊區可以實行現代化的大規模農業技術，則是沒有根據的。

在這方面有些什麼東西是我們應該做的呢？我們認為下列各項是應該做的：（一）興修有效的水

利。舉靖邊為例。靖邊只長城區楊橋畔一地即有二萬五千畝地可以修成水地，他們已修五千畝，一九四三年還要再修。據靖邊同志說：旱地一畝只能收一斗細糧。但水地一畝年種莊稼三次：先種春麥，收八斗，合細糧四斗；次種黑豆，收四斗，合細糧二斗；次種蘿蔔，收二千斤，每斤價三毛，值六百元，按每斗細糧價一百五十元計，合細糧四斗。三項共合細糧一担，正當旱地收穫的十倍。故靖邊農民常常自豪地說：『先種麥子插黑豆，黑豆林裏帶蘿蔔』。修水地的重要問題是地權分配問題，動員民力問題，組織領導問題與壕壩工程問題，四者有一不當，即不能成功。一九四二年靖邊同志領導農民在把兔灣、楊橋畔等地方打了六個壩，依壩作壕，引水灌地。他們事先替地主與農民按三七分地、四六分地或對半分地解決了地權問題，發動了群眾的積極性。據靖邊同志說：『只要解決地權問題，農民是容易號召的。如我們修十處水地，除原有農民二百餘戶外，新號召來的有百餘戶，其中有從友區來的三十多戶。』又說：『修水地，政府貸款固然重要，但主要地要靠組織民力，吸收游資。靖邊一九四二年興修五千畝水地，共用工二八、五六〇個，平均每畝地用工五·七個；共收款八五八、〇〇〇元，其中公家貸款二一〇、〇〇〇元，吸收游資六四八、〇〇〇元。當然這個游資絕大部份是老百姓以工代款的。』關於組織領導，靖邊同志說：『我們對興修水地的領導，採取下列兩種辦法：一種是就地物色好的農民三人至五人組織水利委員會，負責調劑勞動力與調劑勞動工具等。但其中常因地權問題、水利使用問題等難解決，障礙水利工程之進行，故尚須有第二種辦法，即政府派幹部協助領導，解決群眾中的爭執問題。縣府除水利局外，另外派了三個幹部分管十處工程的領導。』靖邊同志們還決定於一九四三年繼續在楊橋畔修四千畝水地。但因該地原來只有居民六十戶，一九四二年移來四十餘戶，共計百餘戶，勞動力還成大問題。故決定於一九四三年招來移民一百戶，現已開始打窖洞，準備住的地方。『對於處理這一百戶移民是一個大工作，因為他們多是從橫山來的，多是

難民，故還需相當的代價，才可完成。若移民到達，加上當地人力，一九四三年再修四千畝是不成問題的。此外，靖邊同志還修了一種水漫地。所謂水漫地，『就是處在三面高山一面天溝之間的大塊平地，有的二三千畝，有的二三百畝。此種土地，土質很好，但上面堆着砂礫，妨礙禾苗，並使土質變壞』。修這種水漫地的辦法，『就是沿天溝一面畔上打起很堅固的壩，栽上沙柳與寧條子（冬天可供羊吃），使常年從山上流下來的山水，不叫從天溝流去，全漫在地上，泥質既厚，肥料又多，又富水分，極宜莊稼；並使地面年年擴大，把山溝都漫成平灘，生產面積也擴大了。』這種水漫地比旱地收成多到一倍以上，『如旱地一垧（邊區延安一帶每垧三畝，靖邊一帶每垧五畝）打粗糧一担，水漫地就可打二担或三担。』這種水漫地的修築，是靖邊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春耕動員時才發現的，故還只在兩處地方試修，修了一千畝。他們準備於一九四三年在好幾處地方同時修築，共計面積一萬三千餘畝。據說『全縣共可修築水漫地五萬至六萬畝』。我們詳舉靖邊這一實例，證明興修水利並不是沒有希望，在有些地方是有修水利的條件的，特別是靖邊同志這種認真努力實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縣效法。各縣水利情況雖不會與靖邊相同，但依靠黨和政府的領導與人民的努力，在真正有利的條件下，也可開發若干水利事業。政府於一九四三年應撥出二百萬元，在靖邊之楊橋畔、腳縣之葫蘆河等處進行水利貸款。（二）推廣優良品種。有了優良品種，即不增加勞動力、肥料，也可獲得較多的收成。例如光華農場已經試驗成功了的狼尾穀，產量高，不怕蟲蝕，鳥啄，隨地可種，他們的洋芋產量也較普通為高，應向農民提倡種植。先在每縣各擇一二個區令一部份農民試種，如覺土壤、氣候適宜，即可普遍推廣，以期增產。（三）鼓勵從事秋開荒、秋翻地。因為秋開荒、秋翻地，可以減少蟲害，可以促使土壤風化，又可保持水分，增加來年的收成。（四）在勞動互助社組織推廣之後，鼓勵農民多鋤一二次草。鋤草的作用不但在於去草助苗，而且在於蓄水耐旱。如多鋤一二次，即使施肥不多，亦

可增加收穫量。(五) 由建廳及五個專署籌劃，在一九四三年夏冬兩季，五區分別舉行五個展覽會。根據邊區兩次農展經驗，改善農展佈置，介紹與獎勵農民模範成績，推廣吳滿有式的勤勞與得法的農業生產運動。一九四三年各區農展，要有軍隊及機關學校農業生產成績的參加，藉以鼓勵軍隊及機關學校的農業生產，並達軍民聯合之目的。(六)『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一九四三年應大大提倡吳滿有式的生產運動，使在五個區域內產生很多的吳滿有。(七) 邊區的小學及中學應設農業常識課，並應編製包含邊區實際農業常識的冬學課本，以達改良農業增加農產的目的。(八) 建廳應召集專家，着手研究從梢山流出的柳根水，加以科學的處理，以免人民吃了成『拐子』。這個問題如能解決，則靠近梢山的許多沃野可以誘人耕種，變成大量的良田。

我們的第八項農業政策是實行農業累進稅。過去的農業稅是採取救國公糧的形式，雖然也是按累進原則徵收的，但是每年徵收總數多少不一，每年每家徵糧數自然也就多少不一。一九四一年發生攤派現象。一九四二年雖改取評議制較為公平，但不公平的現象還是有的。主要缺點是稅率不確定，損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議政府於一九四三年進行人民土地的調查與登記，依此製定一種簡明的農業累進稅則，依一定土地量按質分等計算稅率，使農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與質計算交稅數目。農民有了這個計算，就可計算他全年全家收支的比例，就可放手進行生產，而增加生產積極性，保證糧食的增產；政府徵稅時也就不發生不公平的問題了。一九四三年這個準備工作完成後，一九四四年就可實行徵收累進稅。有些準備工作完成得早的縣，可於一九四三年先行試辦。

減租減息，增開荒地，推廣植棉，不違農時，調劑勞動力，增加農貸，提高技術與準備實行累進稅——這八項，就是我們在一九四三年可以做、必須做、並會切實有效的農業政策。除累進稅一項一九四三年是做準備工作或只在幾縣試辦外，其餘七項，應即全部實施。其中有許多在一九四二年冬季

就要動手做，否則時間誤過，就會變成空話。

上面這些，就是我們對於過去民營農業工作的總結與一九四三年的農業工作方針。下面再說與農業密切聯系着的農村副業，如畜牧業、手工業等。

三 關於發展畜牧業

畜牧、運鹽、紡織是邊區農民的三宗主要副業。而牛與驢的繁殖，對農業與運鹽業有決定的作用，這是大家知道的。羊的繁殖，對被服有很大關係；去年一年邊區農民收入羊毛羊絨一百餘萬斤，加上羊的出口，估計約值二千餘萬元，就是明證。牲畜的最大敵人是病多與草缺，不解決這兩個問題，發展是不可能的。首先，疾病的破壞力很大。例如一九四一年春靖邊因羊瘟而死的羊就有二萬餘頭，一九四二年定邊羊瘟死羊一萬六千餘頭；一九四一年夏，延安牛瘟死牛五百餘頭；一九四二年志丹夏秋牛瘟死牛五百七十四頭；可見疾病是邊區牲畜的大敵。再則，牧草不足，又極大地阻礙牲畜的繁殖。一九四一年春靖邊死大羊二萬餘頭，羔羊三萬頭也大部死去，除上述羊瘟關係外，缺草是一個重要原因：靖邊同時還餓死牛馬二千餘頭。因鹽運道上缺乏積草，大大妨礙鹽運，這又是近年極感困難的事。

我們的任務是保護牲畜與增殖牲畜。而要達此目的，就須實行如下各項辦法：

(一) 防疫。這裏主要是由縣區政府召集本地獸醫及老農，研究防止獸瘟與醫治獸瘟的簡單辦法，向牲畜較多的農家勸導實行，這是普遍易行的。其次，建廳應令農場增加獸醫設備，研究邊區獸

瘟、製造大量的血清與疫苗，倡導並實行有效的防瘟與治療辦法。

(二)推廣牧草種植。邊區牲畜大多數是放牧，牧草不佳，容易生病。因此應該普遍推廣苜蓿的種植。特別在鹽運路上及其附近多種，不但便利鹽運，且可發展牲畜。一九四二年政府原計劃推廣苜蓿種植三萬畝，結果只得二萬三千餘畝，因為種子不足。一九四三年各縣政府應從關中多運種子，發給計劃種植區域的農民，並鼓勵農民自購。此外應動員農民，秋季大量割野草，儲備冬用，不但可免牲畜因吃冷草生病，而且可免農民因無冬草賣掉牲口。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看靖邊的經驗。靖邊同志鑒於一九四一年春季牲口大批死亡，在兩年中做了許多工作，他們是用種苜蓿、修草園、割秋草、栽柳樹、挖草根五種辦法號召農民解決牧草的。第一，他們在一九四二年叫農民種了二千多畝苜蓿，大部份種子由政府發給，農民情緒很高。一九四三年，他們準備再辦一部份種子貸給農民，特別號召農民自備種子，對成績優良的給以獎勵，激勵他們大量種苜蓿。第二，他們在一九四二年修了四千餘畝草園。這種草園裏的草都是蘆葦，在靠蒙古邊界沙漠中的海子與大草灘上長得很茂盛，每畝能割五百餘斤。革命前原有草園，後來破壞了，牛羊隨便踐踏。現在發動群眾修復，不費多少人工，秋後割草，以備冬用。第三，靖邊山地有蘆葦、白草、兵草、沙竹、沙蓬等野草很多，秋季收割，大有助於牲畜。一九四一年發動群眾割了五百萬斤，一九四二年又動員每人割一百斤，現還未作總結。第四，是發動群眾種柳樹、沙柳、寧條，其枝葉可供駱駝及羊子吃，亦是解決牧草一法。同時可供燃料，群眾是歡迎的。政府的任務是調劑樹種，勸令種植。第五，靖邊的白草、兵草，牲口不但吃其草葉，而且吃其草根。靖邊春耕時，壯年上午耕地，下午挖草根，晚上喂牲口，女子兒童則整天去挖，每人可挖百餘斤，對畜草起很大作用。但因挖的人多，發生地權爭執，災民難民無地者更加不利，故政府須予以調劑。據靖邊同志說：『我們在這幾種辦法下給人民解決了不少的問題。一九四二年固

然因爲雨水多，草長得好，但也因上述五種解決牧草的辦法，使畜牧發展了。如一九四二年全縣下的六萬餘羔羊都活了，死的很少。大羊與牛驢馬等，除個別地方病死一部份外，一般的死亡率減少很大，全靖邊牲口除羊外，每年要用三千萬斤草，而用上述五種辦法，至少可補助一千萬斤草。『牧草是牲畜的生死問題，我們希望各縣同志都做出一個一九四三年的牧草計劃來。』

(三) 禁殺母牲，並禁母牲出口，牛則一律禁殺，老牛可殺者須經檢驗。

(四) 改良畜種。研究已有『輸種站』的經驗，選擇好的驢種、羊種，勸令民間推行。先從甘泉、延安二縣做起，再及他縣。此外應由政府從鹽池買一批『灘羊』發給羊多農家配種，每一頭公灘羊可配二十隻母羊。這種羊毛很細軟，且能每半年產二斤。

我們如能認真實行以上各項辦法，邊區的牲畜會有更大的發展，希望建設廳及各縣同志加以注意。

四 關於發展手工業

手工業在邊區是作爲大量家庭副業與一部份獨立手工業而存在的，其中以婦女的紡土紗織土布爲大宗。但是多年以來，這種土紗土布的大部份已被洋紗洋布打敗了，最近幾年由於我們的提倡，才又有些恢復。但是邊區農民還是要拿了自己的剩餘農產品、皮毛及運鹽業去外邊交換大量的洋紗洋布進來，自己的紡織業還遠不够供給自己的需要。這裏論述的民間手工業，也就以紡織業爲主，兼及蠶絲與棉油，其他暫不論及。

一 紡織業

老百姓及軍隊與公務人員，年需布二十五萬疋（每疋寬二尺四寸長十丈的大布），其中軍隊及公務人員約佔五萬疋；老百姓約佔二十萬疋。現在的供給量呢？七個公營紡織廠年產布約一萬一千餘疋，大小七個民間紡織合作社，年產布約一萬八千疋，民間婦女織土布無統計，估計約有三萬疋，公私合計年產量已有十萬疋，距需要量尚差十五萬疋。即是說，我們已可供給百分之四十，這是很大成績。但尚差百分之六十，這是我們今後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很大的，須要幾年才能解決；但是依靠現有的公營紡織與民間紡織，加以改良與推廣，是有解決的可能的。我們有了棉花，可以有計劃的發動民間婦女紡紗，織半土半洋布，逐漸減少洋紗的進口，並逐漸做到完全用自己的紗織布，就可解決這個問題。織布的任務：第一，依靠公營工業。一九四二年公營布廠已能產布一萬一千疋，差不多可以供給軍隊及公務人員需要之半數；再過幾年，就可完全自給。第二，提倡民間婦女織布。綏德一帶婦女已能年產三萬餘疋，只是尺寸不一，人民不樂購用，仍然歡迎外布，如能加以改良，增加布產是有希望的。第三，民間合作社已能年產一萬八千疋，還可發展。全邊區的布，必須依靠這三方面協力，才能解決。但首先與最大的問題是紗。二十五萬疋大布如全用土紗織，以每疋十二斤紗計，需三百萬斤紗。如用土紗洋紗各半合織，則需一百五十萬斤土紗，十五萬捆洋紗；目前公營布廠及民間合作社織的就是這種半土半洋布。但土紗還是不夠，還需大量推廣民間紡紗，並改良紗質。因此，逐步發展民間手工紡織業，擴大其數量，改善其質量，就是邊區的極重要任務。

如何逐步去解決這個問題呢？根據過去經驗，我們提出下列辦法：

(一)首先是整理與發展綏德警備區各縣的民間紡織。辦法是：由警區專署主持，聯合物資局及三五九旅大光紗廠協助，發棉花給婦女，令其多紡土紗，供給公營布廠的紗的需要。這個辦法一九四二年行之有效，一九四三年應繼續，並擴大之。警區民間土紗除供給公營布廠之外，還可自己織布，由物資局規定布的尺寸與質量，並保障其銷路，即由物資局收買，或自己用，或轉賣民間。其次，為增產土紗計，應由政府投資一百萬元，根據延安南區合作社組織婦紡八百家的經驗，貸與延安、安塞兩縣三千家，一九四三年在兩縣擴大紡紗機三千架。再在慶陽、曲子一帶組織一千家婦紡，擴大紡紗機一千架。這種貸款由物資局經辦，發給棉花與紡機，而收買其土紗，藉以供給公營布廠的需要。其次，為增加布產，應由政府再出一百萬元，取借貸或合股方式，投入現有的民間織布合作社，推廣民間織布事業。

這裏應舉出延安縣的計劃。據延安同志在其『一九四三年生產建設計劃』中說：『一九四三年發展會紡織婦女四、〇〇〇名，一人一年估計紡紗十八斤（一月一斤半），可紡七二、〇〇〇斤；加上一九四二年度已有會紡婦女一、〇〇〇名，一人年紡二〇斤，可紡二〇、〇〇〇斤；兩共可紡九二、〇〇〇斤紗，可織八、三六三・六疋布。但距需要尚短四、八八六・四疋布，準備在二、三年內解決，達到完全自給。本縣人口六四、〇〇〇（延安市不在內），大人約四二、〇〇〇名，一人年需四分之一疋大布（單衣一套一・一丈，棉衣半套一・四丈，共二・五丈，每疋大布計十丈），共需大布一〇、五〇〇疋。小人二二、〇〇〇名，用布約為大人之半，八人一疋布，計二、七五〇疋。全縣年需一三、二五〇疋。一九四三年紡成的九二、〇〇〇斤紗，織成八、三六三・六疋大布，需要五十六架織布機（一架年織大布一五〇疋）；一九四二年本縣農村及工廠已有布機十二架，一九四三年應在農村中以合作方式發展四十四架。其辦法如下：第一，婦紡推廣獎勵費五〇、〇〇〇元；棉花資本

以五千斤周轉計，每斤一〇〇元，五〇〇、〇〇〇元；紡織工具費，紡車一、〇〇〇架，每架一〇〇元，一〇〇、〇〇〇元；織布機四十四架，每架一、〇〇〇元，四四、〇〇〇元。四項共需資本六九四、〇〇〇元。第二，農村織布機，由農民自己集股建立，政府幫助解決其困難，如訓練技術工人等；或作部份投資，如機子投資等。第三，發花二斤，收紗一斤。農村織的布，農民自己用。高峯紡紗廠應起推動婦紡、訓練工人的領導作用。』延安同志這一計劃是很可注意的，如果素少紡織經驗的延安人民，能由黨政推動於二三年內全部解決紗布自給問題，則其他無經驗各縣當然也可在相同時間或較多時間內解決，我們希望各縣同志都有一個計劃。至於有經驗各縣如警區一帶，當更易解決。根據延安同志的推算方法，大人佔三分之二，小人佔三分之一，大人四人一疋布，小人八人一疋布，則邊區一百四十萬人口，年需布不是二十萬疋，而是三十三萬七千五百疋。即使這樣大的數目，根據延安同志的意見，也可在二、三年內解決。總之，依靠人民動手與黨政領導，是什麼困難也可克服的。

(二) 由建設廳研究民間紡紗經驗，改良土紗質量，準備使邊區布產全用土紗，逐漸減少以至最後停止洋紗的入口。如紗質不能改良，洋紗是無法杜絕的。

(三) 改良公營工廠的毛織物，用毛織物代替一部份軍用棉織被服，藉以減少棉布的消費。

(四) 一九四三年公務人員以身作則，一律着土布。同時勸告人民多用土布，少用洋布。由物資局根據土布發展情況，逐漸限制外布入口。

用了上面這些辦法，就可幫助我們逐步解決紗布自給的大問題。雖則這只能是逐步去做，但是完全可能的，我們要堅決實行各項解決紗布自給的辦法。

二 棉油業

因爲植棉各縣的農民，一九四二年已能收棉子約三百萬斤，可榨油約三十六萬斤；明年擴大植棉，可得棉子五至六百萬斤，又可增加榨油量，我們不應讓其拋置。棉油是可供食用的，但邊區農民還無此習慣，如無政府提倡，他們不會榨油。因此應由邊區政府投資三十萬元，經過植棉各縣政府勸告農民試辦棉子榨油業。試驗成功後，再行推廣。油歸政府收買，這不僅可以解決吃油問題，而且按照現在油價（每斤三十元），如能產油三十六萬斤，農民即可收入一千零八十八萬元。

三 蠶絲業

綏德、清澗、安定、延川、延長、固臨等縣，很多農民養蠶，是一項相當大的副業。如安定一縣一九四二年養蠶的就有三、五八五戶，得繭二三、六六二斤，值洋六〇〇、〇〇〇元。

我們的縫紉工業需要絲綫，我們的毛毯工業需要絲邊，我們還可用絲作緯織布藉以減少洋紗入口，故應發展邊區絲產。其辦法是由政府支出三十萬元，貸給農家，發動養蠶，特別貸給那些養蠶成績好的農民。並由物資局，經過當地合作社，收買農民的絲及向農民定製絲織品，促進絲業的發展。

上述紡織業、棉油業、蠶絲業三項，共計投資二百六十萬元（紡紗一百萬，織布一百萬，榨油三十萬，蠶絲三十萬），款雖不多，却可推動人民發展一步，解決當前的迫切需要。在一九四三年我們

更有經驗之後，應該考慮增加資金。特別是紡織業，非有民間動手，公家幫助，是不能解決全部問題的。

我們只在這裏提到紡織、棉油、蠶絲三項，其他均未提到。各縣可按具體情況，將有關人民經濟又須黨政推動的手工業，加以研究，作出自己的計劃。

五 關於發展合作社

邊區在內戰時期，就有合作社。抗戰以來，邊區政府繼續提倡，又經過五年半的磨鍊，逐漸發展了邊區合作社。

就消費合作社說，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年中，由一百三十社增到一百五十五社，社員由五萬七千八百四十七人增到十四萬零二百一十八人；股金由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五元增到六十九萬三千零七十一元；銷貨額由二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九元增到六百萬八千餘元；紅利由四千八百元增到一百零二萬餘元；公積金由三千五百餘元增到十七萬三千餘元。

一九四二年十月底止，十九個縣市的統計，與一九四一年比較，社員由九萬七千二百九十七人增至十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九人，股金則由七十一萬二千九百餘元突增至六百餘萬元，紅利亦由八十五萬八千餘元增至三百三十九萬八千餘元。

消費合作社社員的股金，最高的達到一萬元，最少的每人四元、五元不等。

消費合作社的分佈：到一九四一年底，計延安二十八個，安塞十二個，延長八個，固臨八個，定

邊八個，慶陽、華池、曲子、延川各七個，安定、酈縣、吳起各六個，甘泉、靖邊、合水各五個，延市、米脂各四個，綏德二個，其餘各縣尙無統計。

就生產合作社說，一九三九年，經過政府的提倡與中國工業合作社西北辦事處的幫助，建立了十個生產合作社。繼而有一些資本較大的消費合作社也兼營生產合作社業務。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止，由十個生產合作社增至五十個；從事生產的員工，由一百九十九人增至五百六十三人；股金由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元增至二百四十九萬一千六百元；每月生產總值，由六萬元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元。

生產合作社的分佈：據今年統計，綏德十六個，延安七個，固臨五個，延長五個，延川五個，甘泉三個，安塞三個，靖邊二個，慶陽一個，葭縣一個，米脂一個，安定一個。

五十個生產合作社中，有紡織合作社大小二十七個。計綏德十三個，延安四個，固臨二個，甘泉、酈縣、延長、延川、安塞、安定、葭縣、米脂各一個，共員工四百九十七人，股金一百七十萬元。其中有二十五個員工以上的有六個，其餘十餘人，三、五人不等。此二十七社，如果全部開工，年可產布三萬疋，（十丈一疋）現只產二萬二千疋左右，紡線毯六千條，織毛巾四千一百五十二打，織襪八千四百打。

染色社五個：計延川二個、綏德二個、延長一個，員工共十三人，股金十二萬八千元，年可染布七千餘疋。榨棉花籽油的生產合作社五個：計固臨二個、靖邊二個、延長一個，員工共十九人，股金二十四萬五千元，年可榨棉油一萬斤。粉房九個：計安塞、甘泉、延長、延川各二個，固臨一個，員工共二十四人，股金二十六萬二千元。製毯合作社四個：計延安二個、慶陽一個、綏德一個，員工共四十二名，股金十五萬二千元，年可製毯七千六百條。瓷窯社：延安縣一個，員工七人，股金三千元，年出瓷器六窰。

從上面的統計來看，消費和生產兩種合作社，不論社員、股金、紅利與事業各方面，在數量上都有很大的發展。但發展是不平衡的。這種發展，五年來經過了三個階段；而質的發展，則直到一九四二年才迅速前進。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各地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為基礎，再加上向群眾攤派而得的股金，這時候是帶着公營性質的，多成為縣、區政府的公營商店。合作社的事業不是面向群眾，而主要地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決經費，一切問題由政府解決。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三九年後，提出了『合作社群眾化』的口號；但各地仍多用舊方式在群眾中去擴大攤派的股金，來推行其所謂『群眾化』。因此，合作社仍被群眾認為是攤派負擔，而不被認為是群眾自己的。合作社的人員，仍然是和公務人員一樣，要群眾優工代耕，群眾看不到合作社對自己有多大利益，反而增加了群眾的勞力負擔。由於一九四〇年以後各地政府生產自給任務的增加，於是有許多合作社的大股社員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機關；合作社對群眾利益自然更加無法多去照顧了。這是第二階段。只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建設廳根據延安南區合作社的經驗，提出『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官助』的方針，各地合作社才從實現這一方針中，取消了攤派入股的方式，摸索地創造着和群眾密切聯系，和群眾利害相關的經驗。這樣，僅僅在十個月中，股金即突增五百餘萬，事業也發展了。在組織人民的經濟力量、減免中間剝削與發展人民經濟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是第三階段。只有到了這個階段，邊區合作社事業才一般地開始走上了正軌。

以上是說一般合作社的發展道路，但中間也有例外，例如延安縣南區合作社，就是較早走上正軌的。南區合作社在幾年的鍛鍊中，成了真正被群眾所擁護的合作社的模範。一九四二年，在綏德、安定、安塞、甘泉、延長、吳起等縣的個別合作社，也正在學習這個模範合作社而前進。

南區合作社究竟有那些特點呢？它有下列各項優良特點。

第一、衝破了合作社的教條主義、公式主義，不拘守成規。南區合作社以消費合作社開始；但它的事業，却發展到南區全體人民經濟生活的各方面，不僅經營消費事業，還經營供銷、運輸、生產、借貸等項事業。它組織了紡織、榨油、製毡等六個生產合作社及一個擁有百餘頭牲口的運輸隊，是一個綜合的合作社，他不斤斤於合作社本身的公積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盡量將贏利分給社員；它不限制股份的紅利，不論社員股金多少，一律照股分紅；它不限制社員對股金處理的權利，每個社員都有隨時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員資格，各階層人民都可加入（因為延安是經過土地革命的區域，各階級入股並不妨礙共產黨對合作社的領導），機關社團也可加入。也不一定要用現金入股，當着它還未在群眾中有完全信仰時，它允許人民用公債券、儲蓄票入股，以擴大股金。當它在群眾中已有信仰，而群眾要求入股無錢時，它號召群眾可用一切有價實物入股，如糧食、牲畜、雞蛋、柴草等等。因此，一切人民稱便。

第二、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義，認真貫徹面向群眾、替人民謀利益的方針，因此，它逐漸被群眾所愛戴。如每年春耕時，事先從韓城等地運鏢，以比市價要賤的價格賣給農民。組織各種生產事業，不僅吸收了失業工人，招收了學徒，安置了工作人員的家屬，而且擴大了事業的贏利，保障當地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供給，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比如南區合作社組織八百多婦女紡紗，每月可紡一千四百斤，每月增加收入七萬元。它的消費合作社的營業方針完全為保障老百姓的必需品，不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東西還要便宜。

第三、它以公私兩利的方針，作為溝通政府與人民經濟的橋樑。經過合作社，一方面貫徹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一方面又調劑人民的負擔使其更加合理化，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人民的積極性。比如一九四一年政府動員獻公鹽時，南區合作社要南區人民交納代金給合作社，而由合作社

的運輸隊代替人民馱鹽交政府。比如在政府收公糧以前，合作社動員老百姓先交照上年應交的公糧給合作社，合作社不僅保障替社員代交本年應出的公糧，而且承認所交公糧的數目即作為老百姓所入之股份。因此，一方面，合作社可以向政府交涉，替政府保管公糧，在政府未支用以前，合作社可以將公糧週轉贏利；一方面，老百姓不僅交了公糧，而且入了股。所以有些老百姓家有餘糧的，甚至願交二年的公糧給合作社，不管下年增加公糧多少，由合作社負責代交，南區有四十餘戶農民就是這樣作的。這樣就固定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就提高了。比如縣、區政府要人民出教育經費與自衛軍放哨費，亦由合作社從紅利中替人民支付，既可免政府收費之煩，又可減人民支付之苦。比如政府獎勵移民，救濟難民的政策，合作社亦可實行（它可以給難民、移民以貸款等等）。如此種種，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與私的利益，個體與集體的利益，密切地結合起來。

第四、它根據人民的意見來改善合作社的組織形式。不開社員全體大會，而由社員按村舉代表到會。不採取攤派入股的方式，而是團結社員的積極份子去勸導人民入股。不限制社員入股數量而照股分紅，但在解決合作社的一切問題上，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員都有平等權利。

以上就是南區合作社的特點。這些特點，在消費合作社方面，並未違背消費合作社事業的基本精神，而且正是根據邊區人民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活的特點而產生的。在生產合作社方面，雖不是生產者本身的合作事業，而是合股僱傭企業；但在手工業不發展、手工業工人不多的邊區，為着吸收農村游資發展手工業，現在的生產合作社方式，也就成為適合現地現時條件的產物了。

南區合作社，從一九三六年起，經過六七年的摸索與艱苦奮鬥，到現在，已由一百六十個社員發展到包括南區戶數百分之九十以上，自願入股的一千一百二十二個社員，股本由一百五十九元發展到二百萬元，由一個社發展到十六個社，淨利由數十元發展到一九四二年十個月統計的一百六十二萬元。

它發展了南區人民的農工商業，照顧了南區人民經濟利益的各方面，成為南區人民的經濟中心。

地廣人稀，幾乎全部屬於小農經濟的邊區，要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組織與倡導人民發展經濟，就必須依賴真正群眾化的合作社起紐帶作用。因此南區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邊區合作社事業的道路；發展南區合作社式的合作運動，就是發展邊區人民經濟的重要工作之一。

因此，一九四三年，黨與政府在全邊區合作事業上，應該進行下列工作：

(一) 由建廳負責調查研究南區合作社的經驗，寫成小冊子，作為各縣政府第四科及各合作社工作人員的教材；並利用在延安開會的機會，引導邊區各地工作幹部去參觀南區合作社。

(二) 物資局所屬各地的企業，對於消費與生產合作社之有成績者，必須幫助其供銷；對消費合作社批發貨物，對生產合作社供給其原料與保障其生產產品的銷售。政府應於一九四三年撥出三百萬元交物資局，以為調劑合作社供銷之用。

(三) 政府為着獎勵合作事業，必須明文規定與認真執行減免合作社租稅負擔。

(四) 邊區政府及各縣政府，應徵求高小以上程度的學生，訓練會計人材與經理人材，幫助各地合作社解決會計與經理的困難。

(五) 合作社工作人員，必須實行群眾化，實行薪水制，取消對合作社人員的代耕制；改良合作社的組織，實行精簡，使之企業化，克服機關化；減少工作人員，減少開支。

為了使同志們明瞭南區合作社的發展史，我們特請該社主任劉建章同志寫了一個報告，今載於下：

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號開始對人民宣傳入股，當時蘇維埃票每股三毛，二十天就有社員一百六十名，收了五百三十三股，合蘇票一百五十九元九毛。

當時推選王天金爲主任，劉建章爲會計，李生章爲採買。

三個月爲一期分紅利，第一期長毛利一百九十九元四毛四分。

開支：工作人三個津貼九元，伙食四十五元，紙筆墨費三元五毛，慰勞前方毛襪、手套十三元，優待抗屬十五元，優待小學校八元，公益金十元。除費用外，每股紅利一毛八分，共分洋九十五元九毛四分。

此次分紅，召開了社員大會，所有社員全數到會。在大會上報告了合作社做過的事業，分了紅利，又請社員吃了飯。這次會後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當時社員自己提出：合作社替他們優待了抗屬，幫助了小學校，優待了前方軍人毛襪、手套等，大家應當多入股。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王生明任保管員。我計劃擴大股金。王主任提出不滿意，說擴大股金就要應付的做。我要向縣政府討論，以後就到了縣府國民經濟部長劉世昌那裏，劉部長允許擴大股金。那時王天金和大家弄的意見不投，因此縣府就將王天金調換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推選劉建章爲主任，王生明爲會計，李生章仍爲採買，又成了三人。我們一方面營業，一方面擴大股金。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初二日爲第二期分紅日期，結算新增二千六百九十七股，新舊股共三千二百三十股，合洋九百六十九元，仍是三毛一股，三個月營業過流水三千六百五十七元，長毛利二百七十六元。又幫助小學校六元，優待抗屬十二元，募捐幫助前方軍人二十元，公益金十元，三個月伙食五十三元，津貼十三元五毛，辦公三元五毛，除費用外，每股分紅利五分，共洋一百六十一元五毛。分紅時，照前召集社員大會，到會社員三分之二，報告了合作社所做的事情，那時替軍隊買三十担糧，又凡西北軍委招待處所用的木炭柴火均由合作社代買。這筆生意，那時收的完全是蘇票，老百姓不同意，要合作社要求以貨物

爲憑代購，一方面給些貨物，一方面可收蘇票。在這一個時期，社內幹部非常吃苦耐心地接洽人民和軍隊，從此就建立了軍民兩方面的關係。如果老百姓有的蘇票到別處買不到東西，合作社可以買到。發表了這些情形，社員更對合作社有了認識，自己提出說：合作社是能替他們做事的。

第三期

自一九三七年六月開始，又計劃增加幹部，新提拔來孫生花担任採買，他工作了一個月，每天給軍隊代買東西，使得孫生花嫌麻煩，提出不工作，再三說服教育，死也不願做合作社的事，因此就出去了。又來了李生彩擔任採買，計劃在溝門上開一處柴草店，合作社出資一百元，作爲一個單位，李生彩擔任店內的主任，他的老婆任伙伙，李生彩當槽店，三個月長毛利四百元。

營業部和店過流水七千一百七十五元六毛，長毛利五百三十八元七毛，蘇票買貨三元折白票一元，蘇票變成白票，合算賠洋一百七十五元。社員入股，蘇票一元頂白票一元。捐前方軍人二十五元，幫助小學校十元，區婦女主任被土匪搶了，補充被褥四元五毛，公益金十二元，假票虧損洋八元五毛，津貼費四十五元，伙食九十元，辦公七元五毛。新增加二千一百三十股，新舊共股數五千三百六十股，共洋一千五百九十六元，每股分紅利二分，共分洋一百六十一元二毛。

這一期內，有安塞、保安和本區的長腳戶組織運鹽合作社，佃本合夥，成立運輸隊，共有驢馬騾十二頭，連同私的牲口一百餘頭，經常不斷地到鹽池運鹽，由合作社代賣。尤其拉扯外縣的腳戶向店內加入股金三百二十元。在這一期過程中，所集股的蘇票完全變成白票了。

九月間社員大會作了報告。大家發表意見說，三毛洋的蘇票成了一元白票，更提高社員的信心，提出計劃擴大股金，統計人口，了解人民的經濟狀況。全區三個鄉，共住四百三十二戶，人口一千七百三十三名，有牛具二百二十二具；牛三百二十三頭，驢一百二十五頭，羊二百七十頭，全區人民經濟總共合計二十二萬元，牲畜土地房產一切在內，人民平均每人每年衣服、農具、食鹽、洋火等合計費用四十元，共計六萬九千三百二十元，食糧在外。我們向大會提出：每人加到二十元股金，就可解決人民的日常需用品。社員同意發

展股金，將三個月一期延長爲六個月一期。

第四期

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爲第四期。將原有三毛一股提成五毛一股，共股數五千三百六十股，合洋二千六百八十元，過流水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元，長毛利一千七百三十二元三毛。去公積金一百一十一元，公益金六十八元，慰勞前方毛襪、手套二百四十五元，優待抗屬十八元，優待小學校十二元，社內工作人員及僱工共津貼三百一十元零五毛，伙食九十元，招待費三十八元五毛，辦公費六十一元五毛，獎勵工作人員六十元，去修理費二百八十五元。除開支外，每股分紅利八分，共分紅利四百二十八元八毛。但雖是上期社員大會計劃每人入股二十元，因人民經濟困難，未曾實現，只是完成了一部份。此次社員大會又計劃成立信用社，擴大股金一千元，如人民有婚姻葬埋之事，可來合作社臨時借用，不出利息。這一口號一出，社員即提出保證全數完成入股任務，內容是調劑的性質，並計劃在柳林開一處飯館。

第五期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八月，首先增加了幹部王耀明、茹克業、李生海、黃保中等數人。三個月內將信用股金完成一千零六十元。除信用股外，又擴大了股金一百一十元。新舊股金洋三千八百九十元。六個月營業四萬二千五百元，長毛利三千六百三十三元。慰勞前方軍人毛襪洋一百八十五元，救濟募捐洋二十二元，獎勵金八十元，修理費二百三十元，開會費招待費八十五元六毛，辦公費一百八十九元，津貼工資費（二十四人）八百六十四元，又加伙食九百元。除支使外，每股分紅利一毛，共分洋七百七十八元。在分紅時，召集社員組長大會，計劃集股買鑄五百元，每葉鑄二毛五分，買二千葉犁鑄；擴大油房一處，粉房一處，爲了在延安市建立商人關係成立公益心一處；當時社員組長無不同意的。

第六期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將五毛一股轉變成爲一元一股，又擴大了股金四千五百一十元，新舊共股金八千二百元，六個月營業四萬九千八百六十元，長毛利四千一百一十八元。優待抗屬三十四元，公

積金六百五十四元，公益金一百元，獎勵一百三十一元，招待費一百八十元，雜費一百一十六元，工作人員工資津貼費（三十人）八百六十七元，伙食洋一千一百十六元。在這個時期，將原先計劃完全實現了。到韓城買了二千葉鏹，每葉鏹價洋五毛，市價賣九毛，賣社員每葉鏹六毛，節省三毛，共節省六百元。油粉房完全完成了。這期分紅利仍以半年爲一期。總共有社員八百五十名。

第七期

一九三九年三月至八月。開始計劃與私人合夥做生意。當地有些人要做生意，恐怕政府多要負擔，將洋入到合作社，半公半私地做人作份股（以人身入股）。首先到三十里鋪，與私人合夥成立了一處營業部帶店掛麵部飯館，合作社入本二百元，人民入洋八百元，共一千元。在這個合夥生意中，給人民解決了許多困難。定出章程，股本入社或出社自由。做到年底，政府爲了把握合作社原則，指出合作社發展了私人經濟，不允許私人發展，就將這個生意打折了。

同年擴大股金八百六十元，新舊股金九千零一十六元。社員九百六十名。

總共營業五萬七千六百元，長毛利四千七百七十八元六毛。

除公積公益及其他支費，淨利每股分一毛，共分洋九百零一元六毛。

在這次分紅利中間，產生了許多的困難。一方面發展股金慢，各貨高漲，使合作社無法營業；一方面看到人民的意見爲沒有個人發展的利益，不願多入股。再三宣傳說服，他們總是不多加的。我個人估計，不與私人合夥，合作社無法開展。未經過政府同意，就與私人合夥做生意。在理事會上提出和大家商討，理事會的人同意合夥做。

第八期

一九三九年九月，又在三十里鋪與私人合夥成立興華分社，溝門上成立民合社，柳林開民生公店藥鋪，南莊河立和合社，都以半公半私的名目發展了私人入股十萬餘元，在分社內工作的人打股份資本，寫了合同，仍是自由入退，合作社不限制的。嗣後縣政府知道了，要看合同，看了合同，也同意我們合夥做。將原

有的合作社作爲區總社，各鄉建立分社。除分社外，總社又擴大股金二千六百二十九元，新舊共合股洋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元。總分社共營業過流水十五萬八千三百五十元，長毛利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元，費用八千八百九十五元一毛三分，淨利九千三百五十四元七分。每股分紅利一毛，分社在內。有了分社合作，總社就有了力量成立生產事業。一九四〇年與光華商店合夥買驢子，成立運輸隊，利用私人合作。運輸隊原有資本五千元，到年底發展到一百六十頭驢子，經常運鹽運貨。又成立一處紡紗織布工廠，皮房，西區合作社，杜甫川新民社，七里鋪集成過載棧一處，毡房兩處。從前入股以個人爲單位，比如一個家裏的人有幾個社員。後來嫌麻煩，合併了，以戶爲單位，一家只有一個社員，共有社員八百五十三名。

這個時期社員合併後，每戶人有入三、五百元至一千元的。同時有外縣的小商人腳戶也加到各分社，股金一萬元。特別洛川、鄜縣、安塞、保安、三邊等處的腳戶，來往最多，向合作社入股。到了九個月分紅利時，召開社員代表大會，報告了合作社的開展原因。經過檢討，又提出以後工作方針：一、擴股三萬元，要代表保證完成。二、收土產品，代替人民出售；供給人民一切需用品，由合作社負責向外購買貨品。三、全區人民食鹽、洋火、犁鏵、不向外買，完全由合作社供給。計算全區人民七千一百三十五名，每人每天食鹽二錢，全年食四斤半，共合鹽三萬二千一百零七斤半，每斤鹽比市價低一元，共節省洋三萬二千一百餘元。洋火每年每戶用五包，共用八千六百七十五包，每包比市價低五元，共節省洋四萬三千三百七十五元。全區用犁鏵一千五百葉，每葉比市價低十五元，節省洋二萬二千五百元。三宗共節省洋九萬八千零五十元。全區人民一年穿衣用老布七千疋，每疋棉花二斤半，共棉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五斤，值價三百五十萬元，給人民紡成紗，賺一半，計一百七十五萬元。在這個大會上給社員報告了工作計劃，經過社員同意，就發展了農村婦女紡紗織布機子。

第九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進行擴大股金，以救國公債入股。政府動員人民買救國公債票，將人民所出的公債數加成股金，股金所分之紅利付於公債三萬三千元。由這種人民困難情形之下，幫助了人民解決了負擔，使人

民更相信合作社是能解決困難的。

新增股三萬三千零七十元。新舊股金四萬四千七百一十五元，是總社的。各分社股金十二萬。運輸隊八萬元。總共股金二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五元，社員一千零八十八名，總分社營業流水一百一十六萬一千八百四十元七毛。長毛利二十八萬四千三百一十七元四毛。開支費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九元三毛，淨利十四萬五千四百六十九元，每股一元分紅利七毛。在分紅利時提出：紅利七毛作爲一元入股，提高社員的信心，將分到的紅利大數的加成股金。人民餘外入股，以土產物品草料糧食作錢，比市價高，如每一斤草比市價高二毛。凡人民入股給物品，總比市價高，又提高人民的信心。

第十期

一九四二年成立織機工廠一處，開始宣傳入股，二十元爲一股，送社員襪子一雙。此後棉花高漲，乃增至四十元一股，共入股洋三萬元，開辦了織機工廠，現有機機六架。延安市開運合過載棧一處，集股四十二萬元。松樹林成立分社一處，擴股三十四萬元。運輸隊所長的盈餘，擴大成本爲七十五萬元。總分社擴股一百二十三萬二千元。新舊股本二百五十二萬元，社員一千一百十二名（每名代表一戶），其中最多入股金五千元。在本區境內合作社共有十九個單位（生產、運輸、消費均在內），除合作社外再沒有私人商業。南區面積長六十里，闊四十里，內有住戶一千五百四十四戶，七千一百二十八人，共有牛一、四六九頭，驢六三五頭，馬六〇匹，騾子二十二頭，羊四、四四五隻。種地一八、一三六垧，收麥子八七二担五斗，收穫粗糧九、〇八四·一六担，折細糧五、六六二担四斗三升，副業進益折細糧三三、四二五担（十八桶斗），共合米六千八百六十九担一斗八升。一九四二年出公糧二千四百八十担，除出下剩米四千三百八十九担一斗八升，每人平均佔六斗米，牲口料一千五百担。

今春政府動員教育經費自衛軍放哨費三萬四千元。高峽灣生產股金八千元，銀行儲蓄券三萬元，共六萬二千元，分三次來的。每次每戶開會收集，要誤工一個，三次誤工三個，共計誤工一千五百個，每個民工三十元，工資合計要誤十三萬五千元，又加上六萬二千元，總共負擔十九萬七千元。所以合作社替人民交納了

六萬二千元，節省了人民的誤工十三萬五千元。尤其在農忙時間，幫助了人民的生產。又替人民代交公鹽一千零五十駄，每駄二百四十元，共交二十五萬二千元。減少人民的誤工，影響了人民對合作社的認識，又發展了股金四十二萬元。計劃代交下年的公鹽。

組織農村婦紡六百個，每人每天紡紗二兩，每天共紡七十五斤棉花，人民應賺一半。每斤紗以一百五十元計算，一天得利五千二百五十元，全年進利一百八十九萬元。今年紡了五千斤棉花，前半年棉花價小，前後合起每斤以七十元計，人民賺花二千五百斤，合洋十七萬五千元。合作社做車子墊辦二萬元，除二萬元外，人民實賺到十五萬五千元。現正在發展婦紡中。過去南區沒有婦紡，現在大批地增加婦紡，就是原料資本困難。其次，今年代人民代賣木炭二十萬斤，每斤二元，人民得洋四十萬元。

以上事實是合作社做過的。今年的紅利未分，原因是遭水災，合作社損失房子五十八間，值洋四十萬元，器具三十萬元，貨物四十萬元，復成棧店一處值洋二十萬元，共計損失一百三十萬元。以後政府幫助借貸洋五十萬元，去定邊買貨三次，長利三十萬元。現在又修理費洋二十四萬元，正在發展股金中。

合作社的組織，農村每村選代表一人至二人。合作社務有理事會十一人參加，每月六號召開理事會一次。一切營業及幹部問題，在理事會上解決與佈置。

附註：

(一) 合作社現有房子二百三十五間，石窖五十五孔，按現在折價值洋二百八十九萬元；流動金一百五十萬；器具牲畜值洋一百零二萬；共計洋五百五十萬元（房產、器具、牲口、流動現金一切在內）。

(二) 合作社的經驗教訓，在延安經濟建設材料關於南區合作社一頁內說明。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因上文第八期至第九期時間相距兩年之久，似有脫漏，託人詢問。據覆如下：

關於南區合作社劃分時期的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開始創辦，三個月後開第一次全體社員大會，以後每隔三個月召集一次全體大會，如此，共召集了三次。以後六個月召集一次，也共召集了三次。第六次大會以後過了八個月，就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三九年底）；以後一九四〇年七月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四一年八月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今年七月打算開第四次代表大會，因遭水災，不易結賬，故而延期。一九三九年以前開會的期間距離短，並且是開全體會，因為範圍小，社員少；以後一年才召集一次，而且是代表大會，因為社員太多，事業擴大，結賬不易。

上次報告材料，將一九四〇年七月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寫漏，故而第八期長至兩年。原報告材料，手頭無底稿，此一材料如還有問題，請示知，以便再報告。

王丕年 劉建章

十二月十五日

以下是延安縣委同志關於南區合作社的報告，並列於此，以供研究。

柳林區（即延安南區）合作社的經驗

從柳林區合作社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合作社的業務，不僅限於消費，同時將生產、信用、運輸聯系在一起，成為合作社業務的一個整體。本社及分社共有十六社。

屬於生產的，有紡織工廠一，皮房一，毡房一，油房一，粉房一。

屬於運輸的，有運輸隊百餘頭牲口，合作社投資達五〇〇、〇〇〇元。

因爲柳林合作社將幾種經濟事業合在一起經營，所以營業範圍大，資金多，活動大，發展快，給人民解決日常必需品也多。本縣其他合作社只限於消費的，比兼營生產、運輸的合作社資金少，活動範圍小，發展遲緩。

第二，合作社民辦政策，是採取柳林的經驗而提出的。該社股金擴大，吸收小商人資本，並吸收他們參加工作。舉凡合作社的工作，都由社員來討論，來決定。人民對合作社是非常關心，並不認爲是官辦的，而認爲是自己的。

第三，給群眾解決日常必需品，並比市價低，如布疋、食鹽、火柴、鏵等。單就火柴、食鹽二項，每年就給人民節省下八〇、〇〇〇餘元，人民當然是願意在合作社買東西。該社在布疋、食鹽、火柴、鏵四樣必需品方面，可以供給柳林區人民的全部需要。

第四，給群眾解決緊急的困難。例如有婚喪大事，可以暫時在合作社借款，或拉欠布疋，或抵押東西，約好期限歸還，即是帶着信用合作社的作用，這樣就給人民解決偌大的困難。因爲急事一時錢不湊手，東告西借，無法解決，而合作社給以解決，所以更給人民以信仰，認爲合作社真正解決了他們的困難。

第五，擴大股金的方式，是各種各樣的：

(一) 現金入股。

(二) 實物入股：一隻雞，一雙鞋，幾張羊皮，幾根麻繩頭，都可折價入股。

(三) 吸收小商人資本。

(四) 給群眾解決負擔，即當入股。政府的負擔下來後，合作社即號召入股，負擔由合作社出。例如一九四二年該區人民應繳與政府的公鹽代金二五〇、〇〇〇元，由人民作爲股金交與合作社，而由合作社運繳公鹽給政府，藉以周轉營利，人民還可分紅。用這種方式，如公債、教育經費、哨站經費等，都由合作社一收一繳，這樣政府的負擔出了，合作社的股金擴大了，營業擴大了，人民得了利，少麻煩，又能以社員資格分紅。

(五) 利用人民當時的要求，適時地提出擴大股金的口號。例如要發展紡織，就提出發展紡織股金的口號。該社一九四一年試辦代人民出公糧，每担先年由人民折錢入股，合作社得錢擴大營業，到第二年公糧分配給人民時，由合作社以營利所得代繳。代辦四十來戶，這四十來戶出了公糧差不多等於未出，他們變成合作社的股東，年年可以分紅，他們高興得很，生產熱忱大大提高，糧食打得更多了。

(六) 入股時發給紅利，如入股四十元發給襪子一雙，值二十元，這樣來鼓勵人民入股。

第六，合作社地點的條件很好。因為該社在柳林區，一個靠近延安新市場大商業的地方。柳林區森林多，人民賣木料木炭的多，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因而在農村中的流動資金多，可以吸收入股。同時靠近市場，資金的周轉也迅速。這是客觀條件。

第七，合作社的活動範圍大。該社在邊區銀行、光華商店以及延安各機關，都建立了關係，資金有時可以拉借，可以代各機關做許多工作，互相幫助，合作社也得了發展。

第八，幹部的少調動與注意調查研究。該社劉主任從任合作社主任以來，從未調動工作，能專心一意去想工作，研究工作，想辦法。同時，他對於客觀情況的調查，也很注意，如每個人一年的布疋、食鹽、火柴等要消耗多少，經常研究，以便解決人民生活困難。

在這裏舉一個例子，證明該社和人民的關係。柳林區驢風坡農民白大，一九四一年須交救國公糧六十元，先行交給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屆時向政府代交。以後此六十元分的紅利又加在股本六十元內，變成了二百元。他在合作社買鏢四葉，每葉代他節省十五元（比市價低十五元），共節省六十元。買火柴五包，每包節省五元，共節省二十五元。一九四一年臘月底，他在合作社買貨一千元，當時只付五百元，還有五百元未付，而這些貨物按後來市價，漲了五百五十元。連前面買鏢、買火柴兩項，共替他節省六百三十五元。本來是交公糧六十元，現在變成股金二百元，又加買貨節省六百三十五元，正作到了合作社是人民的，便利人民交換，為人民謀利益的地步。

這樣的例子很多。

全縣合作社情形

第一，社數（一九四二年七月）：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分社	一八	三〇
區社	八	八
合計	二六	三八

第二，股金

	一九四一年（元）	一九四二年（元）（半年的材料）：
區社	二六四、二〇七·五六	三一二、二〇七·五六
分社	一九三、三四〇·〇〇	九七八、五〇七·一四
合計	四五七、五四七·五六	一、二九〇、七一四·七〇
半年中股金擴大	八三三、一六七·一四元。	

股金發展快的是分社。分社是直接由人民組織的，在區合作社協助下成立起來，所以人民入股很踴躍。一百二十九萬元股金，平均全縣每人二十元，不能作什麼事，所以合作社的作用在全縣來說還小。

主要的經驗

第一，堅決執行民辦政策，政府不干涉。本年七月檢查合作社一次，號召擴大股金，要雄厚的資金掌握在合作社手中。

第二，對合作社幹部不輕易調動，使能安於其位，專心工作，生活上給以保障，在合作社採取打身份辦

法，按合作社人員的能力與職務，每人當作若干元入股，例如某人當作五千元入股（打身份），即按五千元的紅利率結賬時按股分得紅利，作為他的薪水，此外不支薪水。

第三，合作社的業務範圍擴大，不應只限於消費，應該同時做生產、運輸、信用等，這是今後合作社業務發展的必然趨勢，即是說，要辦綜合性合作社。

第四，抓緊辦好一二個合作社，取得經驗，逐漸擴大到其他地方，例如我們準備將金盆區松樹林合作社辦成第二柳林區合作社。

這些也就是今後工作的意見。

六 關於發展鹽業

鹽是邊區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穩定金融、調節物價的骨幹，很大一部份人民賴鹽以交換外貨，相當大的一部份軍隊及工作人員賴鹽以維持生活或補助生活，鹽又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故鹽對邊區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抗戰以來，海鹽杜絕，淮鹽晉鹽減少，西南依靠川鹽，西北及中原依靠寧夏、青海鹽，我們邊區的鹽也就佔了一個重要地位，運銷逐年增多。一九三八年，我們出口的鹽還只有七萬馱（每馱一百五十斤，每斤二十四兩）；一九三九年，突增至十九萬馱；一九四〇年，二十三萬馱；一九四一年，又來一個突增，達到二十九萬九千零六十八馱；一九四二年，至九月止，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馱，估計最後三個月還可銷七、八萬馱，共約二十三、四萬馱。這個統計，表示了兩個重要事實：一是外面的需要，二是我們的努力。有些同志看不見外邊的需要是由抗戰

決定的，不超過一定限度的鹽是有銷路的，因而主張聽其自然，黨政無須加以干涉。另外有些同志，則把鹽的逐年增銷僅僅歸因於外面的需要，而不知道黨政的領導干涉是增銷的一個很大的因素。我們之注意鹽業，是從一九四〇年秋季開始的。一九四一年之所以由一九四〇年的二十三萬馱突增至二十九萬九千餘馱，除了因為一九四〇年外邊鹽荒、存鹽拋空，故一九四一年鹽銷特別旺盛這一個客觀因素外，還有我們在這一年實行了督運政策這一個主觀的因素包含在內。一九四二年，忽由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九萬九千餘馱降至二十三、四萬馱，除了外邊的需要不如一九四一年那樣緊急外，也還有我們自己放棄了督運政策（把組織起來了的許多民間運鹽計劃停止）這一原因在內。我們如不從此得出教訓，則對今後工作又將重複過去的錯誤。固然，一九四一年的鹽業工作是有毛病的。原擬運銷六十萬馱的計劃是太大了，邊區在這一年還不可能解決這樣大的運輸力；產鹽有七十萬馱的成績是好的，但鹽質又太壞；督運是正確的，但不應普遍動員到一切地區的一切人；動員的組織與方式也有許多不合實際情況的弊病。所有這些，都是一九四一年我們工作的缺點或錯誤。但是無論如何，對於鹽業採取積極發展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對於這一點的忽視，不了解，甚至妨礙，是完全不對的。

一九四三年應該怎樣呢？首先要確定積極發展的方針。邊區目前情況，對於作為一個極大的因素藉以解決財政困難（公營鹽業及鹽稅）的鹽與作為一個主要的因素藉以平衡出入口、穩定金融與物價的鹽，決不能採取消極態度。因此，必須擴大已經設立的鹽業公司，作為聯結公私鹽業、擴大公私產運銷的主力軍；提高鹽產質量，以利廣銷；恢復督運工作，組織民間一切可能的運輸力，擴大運鹽；吸收外來腳戶多運多銷；修築道路，配置店棧草料，以利鹽運；由鹽業公司逐漸統制外銷，避免公私交病的無政府狀態。這些就是我們在一九四三年內關於積極發展鹽業的總方針。

其次，我們的具體佈置應如下：

(一) 擴大鹽業公司，增加其資本，在物資局指導下，吸收各機關部隊及私人入股，發展鹽的運輸，擴大鹽的銷路，調節鹽的價格。保障在一九四三年內自己運鹽四萬馱，即以這批鹽為基礎，盡可能地收買民鹽，實行部份的對外統銷；然後依據情況，逐漸作到完全統銷，藉以抵制外邊的操縱，保障公家利益與人民利益。

(二) 一九四三年應計劃產鹽四十萬馱，運鹽三十萬至三十六萬馱，並爭取超過。關於產鹽，仍繼續官督民產政策，保障鹽的質量大部至全部為上鹽，不許再產下鹽。關於運鹽，擬定鹽業公司系統運四萬馱，吸引外來腳戶運五萬馱，組織邊區人力畜力運二十一萬至二十六萬馱，共運三十萬至三十六萬馱。

(三) 組織邊區內部運二十一萬至二十六萬馱鹽的人力畜力，是一個很巨大、很艱苦、很細密的組織工作與群眾工作，應由建廳主持，各級政府負責督運，各級黨委則任檢查、幫助之責。運鹽的動員，一面要帶某些強制性，但一定要避免有害的命令主義，主要應取宣傳說服的方針。運鹽的組織，要採運輸合作社及運輸隊的方式，宣傳群眾自願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經費，有些特殊情況的人則許其不出，而以趕過長腳富有經驗的人及必要的牲口組織成運輸隊；縣區鄉各級的黨與政府應積極指導這種運輸隊的合理、公平與健全的組織；順利的出發；在路上要進行必要工作，保障人員與牲口的安全；歸來要注意合作社利益的分配，保障經手人及全體社員的利益。運鹽必須不違農時；必須加強勞動互助社（變工）的組織，使運輸隊出發後一切社員不因缺乏人力畜力而損害農業生產。綏米警備區及東三縣的運鹽組織（運輸合作社及運輸隊），應允許群眾有更大的自由，更少帶強制性。任何地方的運輸合作社與運輸隊，必須使其建築在為社員謀利益的基礎上，黨與政府的任務在於使這種利益日益增大，否則是一定要失敗的。建廳、各分區及各縣，應將民

衆運鹽最有成績的實例教導人民，廣爲宣傳，倣照辦理，務使一九四三年的運鹽事業能完成計劃，而又大大地直接有利於人民。

（四）物資局各地企業及各地人民合作社，要與人民運輸合作社及運輸隊密切配合，盡可能使人民運鹽牲口能駛來回貨，才能使人民運鹽事業獲得發展，整個運鹽計劃才能完成。

（五）發展鹽業的中心環節是運，運的重要條件是交通。一九四三年政府應撥二百萬元，由建廳主持，修通延定、定慶兩條大車路，整理延腳路。並由物資局沿諸運鹽大路開設驛馬店，轉運棧，缺水處開挖貯水窖。由建廳協同物資局在沿途廣植苜蓿，並用其他辦法配備草料。只要有路、有店、有草、有水，運費即可大省，運量即可大增，外來腳戶、本地人民、鹽業公司三項運輸，都會發達起來。爲改良運輸工具計，另由建廳主持，按道路條件製造大車小車，增加鹽運。只要路修得好，公家多用大車，民間推運小車，較之駛運是好得多的。

（六）一九四三年公鹽定爲十萬馱，近運遠代，半運半代。但公鹽與發展鹽業是兩件事，只要確定地能運輸三十至三十六萬馱出口，公鹽或收實鹽，或收代金，隨便那樣都是可以的。

一九四三年我們的植棉計劃與紡織計劃如能完成，我們的棉花、棉紗、棉布入口就可減少。如果我們在一九四三年能運三十至三十六萬馱鹽出口，按平均邊幣十元一斤的鹽價計算（驢馱每馱一百五十斤），就有四萬萬五千萬至五萬萬四千萬元的收入。這樣一減一增，邊區的平衡出入口問題就又完全解決了。

一九四一年人民運鹽經驗，可看下列材料：

魯忠才長征記

——鄆縣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經過，鄆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談話，

王毓賢、孔昭慶補充，高克林筆記，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

(一) 城關區第一次應出馱鹽牲口五十頭，實去二十八頭。未完成計劃的原因是牲口少（最多能動員四十多頭），當時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區政府抓的不緊，因忙於借糧、公債。

(二) 陽曆七月十八日起身，八月十一日回家，往來二十五天，由鄆縣至定邊十二天，至鹽池裝鹽一天，回來十二天。最大的站是九十里。路程、站名及各站概況如下：

1、鄆縣至張村驛五十里，有五條溝，路難走，水草好。2、張村驛至爛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好走，割草喂牲口。3、爛泥坡至李家砭，有二十里山，四十里溝，路難走，草不好。4、李家砭至盧家角，有三十里溝，五里山，最難走，草不好。5、盧家角至亂石頭川，在溝裏走，有兵站，買草（每百斤山草三十元，谷草五十元，麥草四十元）。6、亂石頭川至三里廟八十里，有兵站，乾草每百斤五十元。7、三里廟至梁莊，八十里，有四十里山路，很陡，難走，水難（苦水也沒有喝的），曾見一個鹽腳戶把驢跌死。8、梁莊至定邊九十里，有兵站，草每百斤五十至一百元，沒水。9、定邊至鹽池四十里，往返一天，沙路難走。

(三) 沿途的困難：

1、張村驛至爛泥坡，五站中有一二站有炸蟻咬，最好晚上走，對牲口對人都好。
2、三里廟、梁莊至定邊兩站，沒水，人與牲口容易受渴。
3、定邊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錢、衣服、用具偷去的。
4、亂石頭川以上，因各縣馱鹽牲口容易會合，常有數千百牲口一起走，因之店、草、水——尤其放牲口——有困難，容易走失弄亂子。

(四) 一路生活情形：

聊縣城關區共去牲口二十八個，人十四個，沿路自做自吃，每頓共需米七升，約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覺「出了門吃的多」。給店裏柴錢多則八元，少則三元，全看你和店掌櫃的關係弄得好或弄不好來決定。走路時唱戲，說古今——說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興，滿不覺苦痛。牲口的草是輪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眾都很好，寄糧寄草沒問題——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會罵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莊稼。只有一個地方的店掌櫃把寄的小米換成壞的。

(五) 路上所發生的問題：

好的例子：

- 1、牲口沒有出毛病。一鄉和三鄉的牲口去時瘦，回來肥了，原因腳戶負責，當心餵。
- 2、腳夫也還有出毛病的，大家身體很好，情緒高，沒有一個瘦了，就是曬黑了些。
- 3、沿途沒有遺東西，牲口也沒有吃人莊稼。主要的是魯副區長是個老腳戶，有經驗，又負責，又細心，人也靈活，所以成績很好。

壞的例子：

- 1、第三鄉第一行政村村會長杜海，賣了好驢，買條壞驢去，結果驢乏了，沒有馱鹽，白費了一百六十五元的路費。另外第三鄉派去了一個壞驢子（腰壞了），四鄉監軍台村去了一個壞腿驢，都沒有馱鹽，都白費了一百六十五元路費。另外該村一個驢被着爛鞍子，結果壓壞了脊梁。第二鄉鄉長有兩個驢，去了一個壞驢，鞍架都不好，在路上搗麻煩。這些事事先區級政府沒有細檢查，有些像已知道，也未糾正，結果二十八條驢子，只有二十五條馱鹽，其餘三條空走一趟，鹽價分文無着，白賠了五百到六百元路費，裏外損失共在一千五百元以上，此事很值得區鄉幹部警惕。

- 2、四鄉監軍台村村會長不聽魯副區長指示，不給牲口帶好料（玉麥、蠶豆），而將高粱等壞料充數，結果該鄉牲口因沒好料吃，在路上發生以下的事。準備向該村會長作鬭爭，處罰他。

3、四鄉脚戶楊萬保，在路上『耍死狗』，裝病，偷跑回來，亂造謠言說：『死了兩個人，魯副區長和一個姓王的。路上沒飯吃，驢脊梁都壓爛了，店裏不能寄糧……』使得城內好多人不安心。區長對這件事注意不夠，以後要警惕。

4、有幾家去壞驢，結果馱的少，每驢只馱百一十多斤。還有四鄉監軍台村，一家打發驢走時，把籠頭都換成壞的，準備驢死，率性一切都不要了。二鄉鄉長的驢子，這次回來，離家只有十多里就臥下了，他也不肯派好驢去接，打爛賬，以為驢一定會死，一定不會回來的，所以不接。

5、有一二個驢子馱的太多，分給另一空驢子馱了四、五十斤，到孫克要險稅局檢查，因無票，被沒收鹽五十斤，口袋一條（值洋二十元）。

（六）用費和賠賺問題：

1、每一個驢平均的用費——料二斗，共洋六十元；糧每人一斗五，一人趕兩驢，每驢攤七升五，價洋三十五元；路費七十元；合共一百六十五元。外加鹽本二十元。平均每驢費洋一百八十五元。

2、平均一鄉每驢馱一百三十斤，二、三、四鄉每驢馱一百十斤，按現在交道鎮鹽價，每百斤二百元，每馱可賣鹽價二百二十元至二百六十元。

3、就現有每馱鹽價，扣去用費，最少可賺三十五至七十五元。

附註：

一、若每驢能馱一百五十斤鹽，按現在鹽價每驢保證賺一百元以上。

二、說二、三、四鄉每驢只馱一百十斤，一鄉驢馱一百三十斤，是脚夫說的，一定『打埋伏』，——因這裏一般驢子可馱一百五十斤。

三、同時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好驢，才能更多的賺錢，驢愈壞愈少賺，以至虧本。

（七）經驗教訓：

經驗：

1、酈縣城關區這次馱鹽勝利回來，證明黨和政府的運鹽計劃、估計、辦法，是完全正確的。個別同志的懷疑，沒有信心，認為是負擔……都是不正確的膚淺的看法。

2、打破部份幹部及群眾對於去三邊馱鹽的恐怖觀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回來」）。正相反，馱鹽回來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強壯了，就是曬黑了些。

3、證明馱鹽可以賺錢，打破那些「一定賠本」，「每驢要賠本百元」，「是邊區最大的一次負擔」一類不合事實的瞎說。

4、證明區鄉級特別是鄉級某些幹部，工作不負責（沒有細心檢查），包庇（村會長、鄉長可以去壞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壞高粱充好料），成為落後群眾的尾巴。

5、幹部的決定作用。城區因副區長魯忠才有經驗、靈活、負責，每到一地，遇一事，即開腳戶大會討論——連每個驢應馱多少鹽都討論過。結果，人與牲口不但沒有損失，反而比去時強壯了，情緒高了。

教訓：

1、四鄉楊萬保「要死狗」，偷跑回來，造謠，我們區鄉同志沒有及時注意檢查，沒有和他談話，也不向上級報告，以致城區人民傳說死了兩個人——魯副區長和王某，死了三個驢，弄的人心惶惶不安。

2、路上困難是有（有幾站路難走，有一兩站蚱蜢多，兩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壞路多小心，有蚱蜢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時多喝，帶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難就都可以克服了。

3、驢子越多賺錢越多。例如這次馱了百三十斤的可賺七十五元，若馱百五十斤則可賺百十五元。驢子愈壞賺錢愈少，甚至賠本。例如城關區去了三條壞驢子（一條壞腰，一條壞腿，一條乏驢），結果沒馱鹽，每一驢白費路費一百六十五元，每人往返共損失一千元以上。同時也說明工作要細心，不能馬虎。這次去的驢若區鄉幹部細心檢查，認真的去做，不講情面，也不至發生這種損失，因為壞驢大家都是曉得的。

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買草，則每頭驢可省五十元以上，節省下的就是賺的。

5、對國家法律要多多注意。這次因不小心被稅局沒收了一條口袋，這是不該有的損失。（此文曾發表

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五日『解放日報』。

七 關於發展自給工業

前面所說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合作社與鹽業，都是人民的經濟事業，黨與政府就其可能與必需的範圍內給以指導與幫助，使其有所發展，解決人民的需要；同時，即由人民以租稅的形式交出一部份給政府，保障一部份政府的需要（如公糧、公鹽及其他稅收）；又以買賣的形式交出一部份給政府，保障又一部份政府的需要（如棉花、棉紗、棉布、羊毛等）；其基本性質是屬於人民經營的。只有鹽業一項，因有政府鹽業公司經營的四萬馱鹽的運銷及直接解決公用食鹽約五千馱，故有一部份（約當全部鹽業七分之一）是屬於公營的。

全部公營經濟事業包括下列三部份：（一）政府經營的鹽業、工業及商業；（二）軍隊經營的農工商業；（三）黨政機關經營的農工商業；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黨政軍人員的生活資料及其事業經費的供給的。這一部份的供給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計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預算看來，超過了人民以租稅形式交納政府的供給量（包括公糧在內）。故公營經濟事業成爲我們保障財政供給兩大來源的一個主要的基礎，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之注意公營經濟建設事業，有其歷史的與現時的原因。還在內戰時，中共中央曾經爲了戰爭需要而在江西蘇區建立了一部份公營工商業。那時，爲了補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經發動過各機關學校種菜養豬的事。那時，只有軍隊還無生產的經驗。那時，因爲江西農民比較富庶的條件，還不需要我

們自己動手解決糧食。這是歷史的原因。抗戰以來，我們是處在一種非常特殊的地位。國民黨政府對於我們的軍隊，初則只給很少一點餉，繼則完全斷絕，邊區也被封鎖，迫得我們不得不從事生產自給，維持抗戰的需要。這是現時的原因。

抗戰以來，我們之注意公營經濟建設事業，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那時，在軍隊方面，由於經費不足，開始了生產運動。但在那時，我們還只是令一部份部隊試作種菜、養豬、打柴、做鞋等生產，其目的只是藉以改良戰士們的生活，還沒有企圖藉以解決一般的財政供給。後來看見試辦的戰士們在做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們果然能於教育之暇做出許多生產工作來了，他們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們因生活改良，逃亡現象也減少了；由於看見這些成效，我們就把這個經驗普遍地應用到那時留守邊區的部隊，由留守處下令叫各部隊都學着這樣做。但也還是爲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爲着解決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時政府方面，開始注意建立了幾個小的工廠；但對機關學校，則連種菜、養豬我們也還沒有叫他們做。一九三九年國民黨頒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國共間的關係不如從前了；邊區的機關學校也增多，雖有外來的一點經費補助，已經分配不過來，我們處在財政供給問題的嚴重威脅下。由於這個原因，迫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全體動員從事經濟自給的運動。那時，我們在幹部動員大會上曾經這樣提出問題：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我們曾經指出這樣簡單的道理：從古以來的人類究竟是怎樣生活着的呢？還不是自己動手活下去的麼？爲什麼我們這些人類子孫連這點聰明都沒有呢？那時我們又指出：一個處在封建社會裏的被剝削的農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十口、八口，只靠一個勞動力生產的事是很普遍的，這樣的一家，不但要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稅給他人，爲什麼我們反不如這樣的農家呢？我們的軍隊全部都是勞動

力，沒有女人，沒有老人小人，又沒有租稅重負，爲什麼還會發生餓飯的事？我們有政府這樣的權力機關，爲什麼還不能解決自己的衣食住用問題？我們考察一下從古代的人類到今天的貧農，他們之所以能够活下去，並且活得同野獸不同的原因，無非就是他們有兩隻手，並且將手接長起來——拿着工具。我們再來考察一下我們自己，原來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兩隻手，我們也可以將手接長起來——拿着工具。這個考察很重要，這樣一來，我們的問題就立即解決了。總之，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够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於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這時，我們提出的任務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僅僅爲了改良生活，而是解決一般需要的一部份。動員的範圍也不限於軍隊，而是所有部隊、機關、學校一律進行生產，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生產運動的號召。『開荒歌』是那時唱出來的，『生產大合唱』也是那時產生的。這一號召，不僅動員了幾萬黨政軍學人員，也動員了邊區的老百姓，這年老百姓開荒達一百萬畝之多。這一號召又傳播到了華北，在戰場上作戰的八路軍也有許多在戰鬪間隙中從事生產的。這是我們的生產自給運動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三個整年。在這一階段中，政府的工業建設發展了一步，軍隊與機關學校發展了農業生產。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幹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爲第二階段，生產自給的基礎已經堅固地打下了。在這兩年中，人員增多了，許多人因外邊頓不住來到邊區要吃飯，爲了增強河防三五九旅也來了，軍隊增加了，而外援全斷，一切公用的生活資料與事業經費，只能完全從取之於民與取之於己這兩方面來解決，而在取之於己這一方面，兩年努力的結果，從總量上說來，是超過了取之於民那一方面的。這一階段的經驗，使我們發生要感謝那些封鎖我們的人們的感覺。因爲封鎖這件事，除了它的消極的壞處一方面之外，還產生了一個積極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而其結果則居

然達到了克服困難的目的，學得了經營經濟事業的經驗。『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古話，對於我們，是完全自覺地被理解的。

已經過去了的兩個階段中，第一階段，部隊、機關、學校着重於農業，政府則發展了工業。第二階段則着重了商業，爲了解決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份部隊與機關學校堅持了農業爲主的方針外，其餘都講究做生意，沒有像在第一階段那樣的重視農業了；但政府、部隊與機關學校都發展了工業與手工業。此次高幹會後將進到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的階段上，我們的經濟基礎已較鞏固，我們的經驗也較多了，應確定以農業爲第一位，工業、手工業、運輸業與畜牧業爲第二位，商業則放在第三位；因爲商業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礎於商業之上，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

關於政府、軍隊與機關學校三部份公營經濟的分類，僅就主管經營一點而言，不是指經濟性質而言；故我們在下面講到自給工業時，準備將政府、軍隊與機關學校所經營的工業統一地講在一起；而在論述軍隊與機關學校的自給經濟時，再將個別的工業生產加以說明。但因全部公營工業中，政府經營的佔着主要部份（政府紡織廠佔全部公營紡織年產二萬二千餘疋布的百分之五十六，政府紙廠出品佔全部公營紙產量的百分之七十，政府肥皂廠出品則佔全部邊區肥皂產量的百分之七十），故將自給工業歸入政府部份來講，也是合理的。

同一自給工業，爲什麼要這樣地分散經營呢？這主要地是因爲勞動力分散在黨政軍各部門，如若集中起來，則將破壞其積極性的原故。例如：我們獎勵三五九旅開辦大光紡織廠，而不令其合併於政府的紡織廠，就是因爲大光廠的數百職工大部份都是從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爲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勞動，積極性很大，如若集中起來，則反而破壞了這種積極性。又原料分散，交通不便，也是分散經營的重要原因。例如被服工業，爲解決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各地黨政軍人員的被服需

要，自以就地產布（或買布）就地縫製爲有利，決不應集中在延安一處縫製。由於這些原故，我們利用各部門爲着解決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積極性，採取『分散經營』的方針是正確的，企圖什麼也集中的意見是錯誤的。但在同一地域內的同一性質的企業，應該盡可能地集中起來，無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這種集中，目前也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例如：中央管理局的團結紡織廠，後勤的交通紡織廠，已經撥交政府管理，就是一例。這種先分散後集中的過程，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分散所以利用各部門的積極性使之建立起來，集中所以使各部門得到更好的供給。但尤其重要的，是分散經營不應該忘記集中領導，這就是使計劃統一，供銷銜接，經營合理與分配恰當之必不可少的步驟，我們過去在這一方面還存在着很大的缺點，今後必須加以調整。總起來說，我們的方針就是『集中領導，分散經營』。不但工業是這樣，農業商業也是這樣的。

在這裏，對於所有的公營農工商業，都要區別兩種形式：一種是大的，一種是小的，大的應該集中，小的應該分散。例如：由各伙食單位，或幾個伙食單位聯合，爲着解決自己日常伙食費、被服費、辦公費之不足，而進行種菜、喂豬、打柴、燒炭等農作事業，做鞋、打毛線衣、開小磨坊等手工業；與爲着消費目的及爲着賺點小利解決公費之目的而進行的合作社事業及小販商業；所有這些，都是應該獎勵其分散經營的。這些都必須分散，到處進行，到處發展。這些都是不可能集中、因此也就不應該集中的。這是一種形式。但是還有另一種形式。例如：爲着解決軍隊全旅全團一定數額的糧食而進行的大農業計劃，即屯田計劃；爲着解決多數機關的糧菜需要而經營的大農場；爲着解決全旅全團或多數機關的被服需要與日用品需要而經營的大作坊、大工廠；爲着解決全旅全團或多數機關的事業經費而經營的大商業，所有這些，就必須有統一的計劃，集中的管理，嚴格的節制，不能聽憑他們各自爲政，毫無拘束地去幹。在應該集中領導的那些農工商業裏，也不是全邊區都集中一個唯一的

機關手裏，而是由這樣的一個機關（現在是邊區財政經濟委員會及其辦事處），根據全體及各部份的需要與經營的可能條件，作出統一的計劃，交由黨政軍各系統去分別地經營。在黨政軍的每一大系統裏，又有統一計劃與分別經營的事。所有這些，就是邊區公營經濟中的『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全貌。

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過去五年的公營經濟事業，有了非常鉅大的成績，這個成績，對於我們，對於我們的民族，都是值得寶貴的，這就是說，我們建立了一個新式的國家經濟的模型。這種模型之所以爲新式，就是說，它不是俾士麥式的舊型的國家經濟，也不是蘇聯式的最新型的國家經濟，而是新民主主義的或三民主義的國家經濟。

又我們所謂公營自給工業，在目前還未達到自給的全部需要量，還談不到以其餘力解決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還只能由黨政予以組織推動，由人民自己動手去解決。目前我們的一切努力，只是爭取在二三年內完全滿足自給的需要，特別是布疋的需要，不要妄想在目前條件下可以有什麼了不起的發展，這樣想是要害事的。

下面，我們就來分別論述五年來我們的公營經濟事業，先說自給工業。

我們之注意公營工業的建設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在這一年，邊區政府先後建立了難民紡織工廠、造紙工廠、被服工廠、農具工廠及八路軍製藥廠。這些工廠到後來，大部份都起了很大的倡導作用。這時，有工業家沈鴻先生自願以其私有的十部機器遷來邊區，爲八路軍服務，沈先生本人亦來邊區工作。從這時起，又有許多科學技術人員先後來邊區工作，使得邊區聚集了一批科學技術人材，作爲建立工業的指導力量。

一九三九年邊區經濟開始被封鎖，工業品的輸入受到限制，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動手』『自力更

生』的號召。邊區政府於是年一月舉行了農業展覽會之後，又於五一勞動節舉行了工業展覽會，激起了發展工業的熱忱。政府與後勤部先後派人到西安採買機器材料。又在延安、安塞兩處組織紡織合作社及榨油、瓷窯等生產合作社。從西安買來的機器材料雖不充足，但已成了數年來發展邊區工業的主要物質力量之一。這一年又設立了新華化學工廠、光華製藥廠、在延安十里舖開始採採厚層煤礦。

一九四〇年的工業發展是在生產上達到『半自給』的政策下進行的，確定以發展輕工業為主。一月間舉行了第二次工業展覽會，檢閱了我們工廠的力量。銀行借款一百萬元擴大工廠資金，建立正規廠址，繼續購買材料。二月間，中央提出了『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九月間，朱總司令提倡紡毛運動，發展了一部份毛紡織事業。許多大的機關學校部隊都積極籌設工廠，派人到原有工廠學習技術，研究管理辦法，奠定了一九四一年猛進發展工業的基礎。

一九四一年中央提出『由半自給過渡到全自給』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下，銀行增借三百萬元，政府亦投資五十萬元於各公營工廠；許多機關、部隊亦均籌款設廠。三八節曾舉行生產展覽。十二月銀行大樓落成，由銀行主持又辦了一次工業展覽。茲列舉中央直屬機關學校在一九四二年所設各廠，以見此時各單位對於發展工業之努力，雖則這些工業都是規模不大的手工工廠及規模很小的手工業：

1、中央直屬財政經濟處開辦新中國紡織廠、實驗工廠、木器製造廠、木工廠、第一炭廠、第二炭廠、瓷窯、被服廠，資金總數二十餘萬元，人員二百二十餘人；

2、中央組織部開辦勝利毛廠，勝利木工廠；

3、中央宣傳部開辦七一磨房；

4、馬列學院開辦團結紡織廠；

5、中央黨校開辦中山紡織廠；

6、自然科學院開辦毡房、磨房、酒精廠、玻璃廠、機械廠；

7、魯藝、陝公、青幹、女大均辦有工廠；

8、中央出版發行部辦有新華木工廠、被服廠；

9、教導大隊辦有延園紙廠。

上述中央直屬系統即辦有工廠二十七處，全部人員四百七十七人，資金總額四十餘萬元，大都是爲着經濟自給的目的而進行的。

此外，經建部、留守處、保安司令部、邊區財政經濟處、三八五旅、各專署，均辦有若干單位的小工廠。三五九旅所辦大光紡織廠產量較大。三五九旅各團，亦均自行辦有棉或毛的小型紡織廠。

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工業建設，是在發展着；特別是一九四一年的發展是蓬蓬勃勃的，給一九四二年的鞏固工作打下了基礎。但是這一整個時期的建設是帶着盲目性的，在許多人員的頭腦中缺乏清醒的了解，只知道現在，不知道將來，只知道分散經營，不知道統一領導，充分的表現了一種無政府狀態。由於這種情況，致使各工廠有的只建築了房屋便完事，有的開工不久便告結束，有的合併於其他工廠，繼續保存下來的只有一部份。至一九四二年，就延安附近的紡織業來說，只有難民、交通、團結三大廠及興華、公益兩小廠保存下來。這一段『之』字路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大家只能從自己走過的路上得到經驗。但在有了這一段經驗之後，從新從事工業建設的，就應避免再走這一類『之』字路才好。

一九四二年，建設廳確定『鞏固現有公營工廠，發展農村手工業』的方針；政府對工業的投資達一百七十萬元。農村民間手工業至本年已很發達，如綏德手拉織布機達六、七百架；其他地區如製毡、硝皮、打鐵等也有發展。特別是公私紡織業發展得快，其困難也特別多。爲了保護紡織業的發

展，減低棉花、洋紗進口稅至百分之一，增加布疋進口稅至百分之十五。銀行在綏德組織『永昌土布產銷公司』，投資二百萬元，發棉花，收紗布，獎勵農婦紡紗織布。由於民間家庭織布有了發展，私營的小型資本主義式的紡織生產合作社的布多無銷路，土紗供給也感困難，這些紡織生產合作社遂不得不縮小經營範圍；或化整爲零，將機件分散民間，改爲家庭副業。公營紡織廠因主要是供給公用，自能維持；但棉花與紗的供給亦感困難。公營造紙業振華總分兩廠，本年完成了供給出版局三千令馬蘭紙的任務。利華第一第二廠，原定二千五百令，計劃未完成，本年產量不超過五百令。其他公營紙廠，則因紙無銷路，頗感困難。公營毛織廠出品如毛毡，爲了解決財政問題，政府自己不用，部份輸出，部份賣給部隊；其精製毛線特別受人歡迎，且有厚利。自九月起，交通、興華、團結三紡織廠，利華一二紙廠，都由中央及後勤系統移交邊區政府管理。爲保證一九四三年紡織原料，本年已開始向東三縣收買棉花，計劃收買量爲七十五萬斤。爲保證造紙原料，向甘泉、延安、安塞、安定等縣徵收馬蘭草七十三萬斤。各廠人員補充，須待精簡工作實行時才能解決。

一九四二年，特別是此次高幹會，是邊區一切公營經濟，就中也是公營工業，開始清除盲目性，清除無政府狀態，而增加自覺性，實行統一的有計劃的經營之重要時期。雖然中央還在一九四〇年二月間就已指出『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但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引起同志們的注意，直到此次高幹會才得到全體一致的承認。五年的實踐經驗，使我們大進一步了。高幹會後，各種公營經濟均將加以調整，使之達到比較健全的發展，工業也是如此。

以上，我們將邊區五年工業歷史作了一個簡略的說明。截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們已有紡織、被服、造紙、印刷、化學、工具、石炭等七類工業。其中，紡織工廠十八個，資金二六、九〇〇、〇〇〇元，職工一、四二七人；被服及製鞋工廠八個，資金一、〇〇一、一〇〇元，職工四〇五人；造紙

工廠十二個，資金四、一〇〇、〇〇〇元，職工四三七人；印刷工廠三個，資金五、二〇〇、〇〇〇元，職工三七九人；化學工廠（製藥、肥皂、皮革、陶瓷、石油等）十二個，資金一七、〇三〇、〇〇〇元，職工六七四人；工具製造工廠九個，資金三、六六二、七九二元，職工二三七人；煤炭廠十二個，資金一、七七七、〇七〇元，職工四三二人；以上七類共計工廠六十二個，資金五九、六七〇、九六二元，職工三、九九一人。我們的這一點工業雖然還是小小的，大部份又還是手工工場業，機器工業只佔着一個小部份；但已費了整個五年的努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起了保障供給、調節物價的作用。從這個基礎上往前發展，是一定可以起更大作用的。

我們的最主要的自給工業是紡織工業與被服工業，這是幾萬軍隊與機關學校人員每年布疋被服賴以自給的地方，否則我們就要受凍。我們的紡織廠一九四二年已能產布二萬二千餘疋，但我們的需要量是四萬至五萬疋，尚須作極大努力才能達到自給目的。但要發展紡織工業，必須實行如下的政策：

（一）提高布疋進口稅，保護土布；同時，部隊及機關學校要一律採用邊區出產的土布。（二）普遍倡導民間婦女紡紗或紡毛，保證工廠紗線原料的供給，同時即增加群眾的收入。（三）解決供銷問題。無論公營、私營或家庭副業之能否發展，主要繫於供銷問題能否得到解決。在原料方面，目前棉花棉紗還不能自給，來源不經常；又因交通不便，分配上有困難；須要解決到使紡紗生產者隨時可以買得棉花，使布疋生產者隨時可以買得棉紗。成品方面：布疋和毛織品銷路不經常，需要使生產者能在適當市價下隨時推銷其成品。這個問題必須集合財政機關、商業機關與人民合作社的協同力量，才能解決。（四）關於被服供給問題，須照財政廳在一九四二年所實行的辦法，既能節省經費，又能及時有衣穿。

我們的造紙工業現在已能年產五千多令馬蘭紙，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七千令，已够全部印刷之用。

但須（一）統一紙的生產與供給。馬蘭紙除供印刷外，尚不適於普遍使用，印刷部門若不要，即售不出。目下即有這種現象：印廠紙不夠用，紙廠則成品堆積售不出，資金週轉不靈，影響生產。一九四三年應統一收買與供給，由固定機關與紙廠發生經濟關係，以解決此種供求不協調的矛盾。（二）提高紙的質量。依據現有的生產設備與技術條件，紙的質量還可提高，但要多費人工與原料，就其作用與意義上說，費用略大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應研究改進造紙工具，以提高生產效能。

我們的印刷工業是現代化的文化工具，大量書報賴其供給。一九四二年，中央、八路、西北三廠生產五千一百六十萬字，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五千三百六十萬字。但須添置器材，保障紙的供給。

我們的化學工業就是藥品、肥皂、皮革、陶瓷、玻璃、酒精、火柴、石油等業。藥品有八路軍製藥廠及光華製藥廠，能供軍用及公用中西兩類藥品之一部份，尚不能完全自給。一九四三年應研究邊區出產之藥材，並設法購買原料，以期增產必需藥品。肥皂有新華、大光兩廠，出品日增，質量亦好，除自用外，還可外銷。新華一廠，一九四三年可產價值七百萬元之肥皂四十二萬條，有發展前途。製革廠規模不大，材料昂貴，不能多發展。如能採取邊區出產之植物材料製造軍用皮革，便有發展前途。陶瓷有三個小窯，製造日用與工業用之瓷器。玻璃已試驗成功，決定設廠製造。酒精已能自造，供工業及醫務之用。火柴尚未能解決燐的問題，正在研究從獸骨取燐。此外，尚有延長石油，亦能年產少許，以供軍用，其中白蠟油可供日用。總之，化學工業須擇其可供急需或有利可圖者擴充之或興辦之，其他則不必辦。

我們的工具製造業是爲着製造紡紗機、織布機、彈花機、軋花機、造紙機件、大車、木工工具及農具等而設的，多屬手工工具，但是十分需要，應研究改良，予以發展。

我們的石炭業集中於延安、關中等處，多爲日用目的，規模雖小，但屬必需。

邊區缺鐵，妨礙工具及農具之製造與改良。近在關中試驗，有成功希望，如能製鐵，則解決邊區一大問題。

邊區全部公營自給工業略如上述。不論紡織、造紙、被服、印刷、化學、工具、煤業均有相當的發展前途，先求完全解決軍需公需，進求供給一部份民需。爲此目的，我們在一九四三年應有如下的改革計劃：

(一) 增加資本（數目另定），由各有關機關擬具具體計劃，經財經辦事處審定，分別投放於紡織業、造紙業、印刷業、工具業、煤鐵業、石油業、某些部份化學工業及某些調查研究事項，有計劃地促進自給工業的發展。

(二) 建立全部自給工業的統一領導，克服嚴重存在着的無政府狀態。過去提出的『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是正確的，但因沒有切實執行，致使建廳管的財廳管的軍隊管的機關管的各部份工業之間，缺乏計劃性，生產過於分散，又缺乏工作檢查，浪費人力物力。一九四三年應由財經辦事處建立統一的領導，首先要使所有公營工業，不論是屬於那一部門管理的，均須有一個統一的計劃。在這個統一計劃上，統一地籌劃原料與糧草的供給，產量的定數，銷路的銜接。在原料供給上，要解決由於地區分散、原料不集中和有些原料仰給外來，而使許多工廠隨時都鬧原料恐慌的現象。在糧草供給上，應由財廳經過一定的核算辦法，供給各廠以所需的食糧及草料，以免各廠負責人分散其管理生產的注意力。在產量與銷路問題上，應由財廳及各有關機關，在財經辦事處統一計劃下，給予各廠以一定數額的生產任務，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成品有一定機關按時接收，解決產銷之間的矛盾現象。在這個統一的計劃性上，要實行各業間的互相協助，消滅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礙的本位主義。在這個統一的計劃上，要實行統一的檢查，對各業各廠有獎勵，有批評，使工作差的

趕上好的。總之，統一領導問題，爲一九四三年改進公營工業的中心問題，必須澈底地努力地解決之。

(三) 建立經濟核算制，克服各企業內部的混亂狀態。爲此必須：第一，每一工廠單位應有相當獨立的資金（流動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轉，而不致經常因資金困難，妨礙生產。第二，每一工廠單位的收入和支出，應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續，結束收支不清、手續不備的糊塗現象。第三，依照各廠具體情況，使有些採取成本會計制，有些則暫不採取，但一切工廠必須有成本的計算。第四，每一工廠的生產，應有按年按月生產計劃完成程度的檢查制度，不得聽其自流，很久不去檢查。第五，每一工廠應有節省原料與保護工具的制度，養成節省原料與愛護工具的習慣。所有這些就是經濟核算制的主要內容。有了嚴格的核算制度之後，才能澈底考查一個企業的經營是否是有利的。

(四) 改善工廠的組織與管理，克服工廠機關化與紀律鬆懈狀態。首先應該改革的是工廠機關化的不合理現象。目前我們有許多工廠在組織上非常不合理，人員衆多，組織龐大，管理人員和直接生產人員的分配不適當，以及將管理大工廠的制度應用到我們的小工廠上面，這些現象必須迅速改變，使一切工廠實行企業化。一切工廠，應依自己經濟的盈虧以爲事業的消長。一切從業員的薪給，應由工廠自己的盈利解決，而不支領公糧公衣與公家的津貼費。其次是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及計件累進工資制，藉以提高勞動熱忱，增加生產。八小時工作制，是將來大工業發展時應該實行的，目前則應一律實行十小時制，應使職工們了解這是抗戰的需要。平均主義的薪給制抹殺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也抹殺了勤惰之間的差別，因而降低勞動積極性，必須代以計件累進工資制，方能鼓勵勞動積極性，增加生產的數量與質量。軍工生產暫時不能實行計件工資制，亦應有計件獎勵制度。再其次，應改善職工會的工作，發展趙占魁運動於各工廠。職工會工作有不適合於提高勞動紀律與勞動積

極性的，必須加以改造。一個工廠內，行政工作、黨支部工作與職工會工作，必須統一於共同目標之下，這個共同目標，就是以盡可能節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開支），製造盡可能多與盡可能好的產品，並在盡可能快與盡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推銷出去。這個成本少、產品好、推銷快的任務是行政、支部、工會三方面三位一體的共同任務，各顧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來的作法，是完全錯誤的。三方面要組織統一的委員會，首先使行政人員、行政工作、生產計劃走上正軌，而黨與工會的任務就是保障生產計劃的完成。再其次，工廠應獎勵最有成績的工人與職員，批評或處罰犯錯誤的工人與職員。沒有適當的獎懲制度，是不能保證勞動紀律與勞動積極性的提高的。

（五）充實與擴大紡織廠，增加布疋產量，爭取在一九四四年公用布疋的完全自給。改善毛織品，除供軍用外，擴大出口量。制定關於被服的布疋與縫製的標準，保證棉衣與被褥能用二年。

（六）整理造紙廠，改善紙質，使能完全適用於印刷與辦公，做到在一九四四年印刷與辦公紙張的完全自給。

（七）增加煤油出產，保障煤油自給，並爭取一部份出口。設法造燐或買燐，使火柴廠有一部份開工。其他工業，擇急需者或有利可圖者繼續進行，或予擴充。凡不適合保障供給原則及無利可圖的企業，實行合併或關閉。

八 關於發展軍隊的生產事業

政府、軍隊、機關三部份公營經濟中，從直接解決需要的最迅速與最大量說來，究竟那一部份是

最主要的呢？依幾年的經驗看來，軍隊是最主要的。因為軍隊是比較更有組織性與比較具有更多勞動力的集團，他們只要沒有直接的作戰任務，就可以將他們除教育時間以外的一切時間從事勞動；而在我們目前技術落後的條件下，勞動力是經濟事業中的決定的條件；所以軍隊的生產事業，成了三部份公營經濟中的最主要的部份。

陝甘寧邊區留守部隊的生產運動，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比之機關學校要早一年。一九三九年，軍隊與機關學校一同進行了生產運動。一九四〇年，三五九旅擔任河防，參加了這個生產運動。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兩年，軍隊與機關學校一樣，增加了生產自給的任務，而軍隊擔負的責任是更大的，在生產自給的總量中，佔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這幾年軍隊的生活資料及事業經費主要地不是由他們自己解決，而要仰給政府，那是不能設想的。他們在黨中央及西北局的『生產自給』的號召之下，在戰鬥、警戒與訓練的緊張任務之中，完成了他們的生產自給任務。雖然各部份軍隊所處的客觀條件有好有壞，擔負的勤務有多有少，努力的程度有高有低，從事生產的方法有優有劣，因之所得的成績也有大有小；但是一般地說來，都是完成了任務的。他們都以極少的資本，落後的技術條件，發展了農業、手工業、運輸業與商業，有些還開設了規模較大的紡織及造紙工廠。在這兩年中，政府同軍隊的生產事業上的投資，一共不過六、七百萬元；但是他們在兩年中，不但保障了價值三萬萬元以上的供給，還在他們所經營的農工商業中積蓄了約八千萬元的資本，開闢了幾萬畝的土地，提供了在整個生產建設中的豐富的經驗。他們不僅起了保衛邊區的政治上與軍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直接解決大數量的財政供給與幫助着發展邊區經濟的作用。

讓我們來看一看某團一個連的生產自給情形。這個連在一九四一年的收入與支出如下表：

一九四一年的收入(元)

馱石炭	六九八・二〇
馱鹽	七七二・四五
鋸木板	三、二五六・四〇
砍木椽	六三〇・〇〇
販猪	七三八・〇〇
驛馬店	二、二五六・〇〇
販玉米	九九八・二〇
出口生意	九三五・六〇
雜貨生意	四八一・二五
油(八四〇斤)	一六、八〇〇・〇〇
肉(一六一〇斤)	一六、一〇〇・〇〇
菜(四六九〇斤)	四、六九九・〇〇
木炭(五〇〇〇斤)	五〇〇・〇〇
柴(二五五五〇斤)	二、五五五・〇〇
領生產資本	七五〇・〇〇
領辦公雜支	三六〇・〇〇
領生產補助費	二、八五五・〇〇
領伙食補助費	三、七七一・〇〇

一九四一年的支出(元)

雜支	一、三一二・〇〇
驛二頭	二、八五〇・〇〇
驢一頭	五七四・〇〇
汗衣六百套	六〇〇・〇〇
鞋面每人二雙	四〇五・五〇
毛巾八十七條	一二八・〇〇
旱烟	一七九・〇〇
盆	九〇・〇〇
生產工具	一八一・〇〇
油	一六、八八〇・〇〇
肉	一六、五〇〇・〇〇
菜	四、六九〇・〇〇
木炭	五〇〇・〇〇
柴	二、五五五・〇〇
伙食補助	三、七七一・〇〇
五個月津貼	五六七・五〇
擦槍費	二二・〇〇
繳單衣費	一〇〇・〇〇
發過年費	一四六・〇〇
辦公	三五九・〇〇

總計		馬	乾
總	五九、一五六・一〇		一二・〇〇〇
收支相抵淨存	六、六二六・一〇		五二、五三〇・〇〇

上表支出數五二、五三〇元中，除去上級所發生產資本七五〇元，辦公雜支三六〇元，生產補助費二、八五五元，團供給處補助伙食三、七七一元，共七、七三六元，該連自己由生產解決之數達四四、〇四四元，而所存資金可繼續為下年生產之用者尚未計算在內。

依此計算，每團以十個連計，即自給經費四四〇、四四〇元。

尚有團部、團直屬隊及三個營部所經營之生產自給，如下表：

團部	一九七、四二五
團直屬	二七、一四九
一營	一八、六二九
二營	一二、七七七
三營	七、四〇八
合計	二六三、三八八元

上述連、營、團生產自給合計七〇三、八二八元，該團全年總支出（糧食及一部份被服在外）為八九六、八三八元，尚差一八五、五一〇元，由上級補足，故該團自給數佔百分之七十九，上級補足數只佔百分之二十一。若加上旅部的很大數量的生產自給，則全旅自給數當超過百分之八十遠甚。

下列材料是留守處對於留守兵團的五年生產總結，可以看出軍隊生產自給的一般情形。

留守兵團五年生產總結

(一) 五年生產自給概況

留守兵團，由於抗戰以來的新的困難環境，在毛主席生產號召之下，從一九三八年秋季開始進行生產運動。這時候生產還不是担任自給的任務，僅僅是補助生活必需上的不夠。當時我們只能給部隊每人每天發菜錢五分，糧食一斤半，以當時市價每元能買蔬菜三、四十斤，清油二斤，柴火一百斤計算，如以每連一百人計，每天共只有五元菜錢，買到蔬菜就買不到油鹽柴火，買到油鹽柴火就買不到蔬菜，豬肉更加吃不上了。在衣服方面，當時很少見到一個衣裳不打補釘的戰士。子彈袋破爛得不能裝子彈，裝在掛包裏。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褲。有的雪地打赤脚下操，有的連破爛的皮帶裹腿也找不到。這些就是當時軍隊的物質生活情形。

這時生產運動的辦法是：(一)開合作社；(二)大量種菜；(三)開磨坊，喂豬，養羊，做豆腐，生豆芽；(四)發動各個戰士學會做鞋；(五)打毛衣、毛襪、毛鞋、手套；(六)提倡節約，防止浪費。一九三八年半年生產結果，超過了計劃，戰士生活大加改善。例如保證了蔬菜的自給；每週可吃兩餐豬肉；部份的解決了毛衣、毛襪、手套、鞋子；補充了掛包、子彈袋、皮帶、裹腿等。

由於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所得到的很有意義的生產成績，提高了部隊的生產熱忱和信心，故能於一九三九年提出更大的生產自給任務，減輕邊區人民的負擔。一九三九年規定部隊在農業上，除種菜外，還要種糧食，要完成四千七百石糧食生產的任務。一九三九年的生產主要是農業，全年開墾了二萬五千一百三十六畝荒地。起初估計一畝能收二斗細糧，共可收四千九百八十六石細糧。但由於荒地初墾，農具不足，領導的經驗不一致，部份地方又遭受天災，結果只收到二千五百九十石細糧，此時部隊尚無大的資金，商業還未開始。

一九四〇年，規定部隊的生產任務是要各部解決一個半月的糧食，計三千四百石，是年部隊開地二萬零

六百七十九畝七分，應得細糧四千一百三十六担。由於收成不佳，只收二千四百石。各部爲完成任務計，加上打鹽、挖甘草、伐樹（關中），並經營商業。從這些輔助生產中，全留守兵團獲利共二百二十三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元一角六分，加上農業的收穫，仍然解決了一個半月糧食的任務，並且還解決了部份的裝備補充。

一九四一年，全體部隊經費預算爲四百四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元四角，規定負擔生產任務四十萬元。但結果完全與此不同，經費需要是增多了，生產自給任務更超過遠甚。是年生產，主要在朱總司令號召下抽出六個營打鹽，共打了五萬六千九百六十六畝，值二十三萬六千四百零八元九角。農業生產：開地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四畝六分，收穫雜糧一千一百七十担。商業生產：合計贏利一千二百零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二元七毛二分。由於物價高漲，紙幣跌落，全年所有經常費與被服費，共支出七百八十八萬一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一團和關中部隊的收支均未列入）。全年伙食費，平均以每人每天五角計，除公家發給一角外，自行解決四角，共計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元。以上經常費被服費和伙食費三項，合計一千零四十七萬三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較原定預算超過五百六十七萬三千八百零四元三角五分。除以生產所得支給外，尚有盈餘。

一九四二年，經費預算（糧食、被服在外）爲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元，担任幫助中央經費二百五十萬元。本年生產計劃爲一千二百四十萬元。到八月止（八月以後尚未統計），商業獲利三千八百九十六萬九千二百三十元二角，工業獲利四十三萬一千七百七十三元四角，總共獲利三千九百四十萬零一千零零四元六角。

到六月止，領到經常費一百四十四萬零五十八元六角，領第一套單衣補助費二十萬零六千八百二十五元。實際開支：經常費七百七十五萬零五百九十八元八角五分，被服補助費三百零六萬七千七百三十元六角，伙食補助費（公家每人每日發七角，實支三元）半年九百一十八萬元。下半年冬季被服，各旅團大部份由自己解決，計有第二套單衣，半數棉衣，百分之四十的棉被及綁帶、子彈袋、炸彈包、棉鞋、單鞋等八項，共計一千二百六十四萬一千二百元。其他如冬季烤火木炭，均由各單位自行解決。牲口草料，一九四一

年度自己解決馬乾費兩月，一九四二年財廳發馬草平均八個月，放青兩月，一般地自己割馬草兩月，約可節省一百二十萬元。又如一九四二年馬料預算是一萬一千担，按財廳規定一斗細糧作二斗馬料計算，不夠，全年須添補二千七百五十担，按每担五百元計，須一百三十七萬五千元。

五年中從事生產的結果，除解決每年的經常費、被服費與伙食費外，現在所存的財產計有：商業基金二千四百萬元；運輸牲口五百五十六頭（耕牛在外，警一團五團亦未統計）值一千七百二十三萬二千元；工廠資本七十一萬二千元；總計三千五百九十四萬四千元。

（註：以上總結，未包括三五九旅及保安部隊在內。）

（二）幾點經驗教訓

（一）幾年來邊區部隊之所以能够實行生產自給，解決很大的問題，是由於部隊的龐大的勞動力和更好的組織力，以及邊區內具有豐富的物力可資開發的原故。這一經驗，證明了部隊充分可能做到自給自足。又由於幾年來部隊自給問題的解決，生產信心的提高，使部隊認識了生產自給為建軍的重要任務之一，認識了生產自給是克服困難渡過難關的最好辦法。

（二）部隊的生產建設，就是邊區整個經濟建設之一部份。過去部隊雖在生產事業上努力的完成了任務，這是很好的，但在思想上沒有強調與建設邊區的聯系，因此對於發展農工業經濟基礎還很薄弱，建家立業的精神還差；統一建設的思想也就模糊；甚至各自為政，破壞法令紀律的現象嚴重地發生了。這些缺點，今後必須堅決地毫不留情地加以糾正。

（三）在生產方法落後的條件下，生產基礎主要應建立在各個單位的勞動力和各個單位的經濟基礎上。因此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應當是保護這些單位的生產事業，在政府的統一政策之下，准其充分發展，並有利可圖。因為這樣，才對於生產事業的發展更有組織，更有力量，更能團結和合理，更能統一的和封鎖作鬥爭。我們部隊在生產上的重大缺點是注重了商業而忽視了農業，今後應該提高和獎勵農業方面的生產。

（四）在部隊生產事業中，應抓緊思想領導，建立和健全生產中的各項制度及領導機關，糾正並防止幹

部各自爲政，貪污腐化，大吃大用，鋪張揚厲，不講節省，不求實效等等極壞的弊病。

以上就是我們的意見。

邊區留守兵團各部隊中，以三五九旅的生產自給工作做得比較更好些。首先，三五九旅的領導同志掌握了以農業爲第一位、工業與運輸業爲第二位、商業爲第三位的方針，利用了勤務較少的條件，又利用了南泥窪適合農業、綏德警備區適合輕工業的環境，動員了廣大的人力，在三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很大的經濟自給任務，建立了農業、工業、運輸業與商業的一系列的比較完備的企業，打下了一個能夠達到完全自給的經濟基礎；特別是他們掌握了農業爲主這一點，使得他們的經濟基礎建設在穩固的地盤之上。其次，三五九旅進行了如下各項具體的經濟建設活動：（一）他們在一九四〇年經營的糧食生產是失敗了，但他們並不灰心，一九四一年繼續經營，就獲得很大成績，一九四二年就有基礎了。他們開闢了二萬五千畝的土地，在這些土地上種糧食、種菜、種麻、種旱烟，解決了部隊的蔬菜、燈油、打草鞋的麻，戰士們吃的旱烟，又補足了糧食、菜油、馬料、馬草之一部份。這樣，只要兩年工夫，就可打下全旅所有各連隊的農業經濟的基礎。而且官兵全體進行勞作的時間，一年中不過兩個月，尚有十個月時間進行部隊的訓練，並不妨礙操課。如果照該旅現在想出的新辦法，即每連建立一個六至七人的專門的農業勞動小組，戰士大眾只在農忙期間突擊幫助，則訓練時間更多。（二）利用農場發展畜牧事業。一九四二年全旅經常養豬約二千頭，可以解決部隊食用的肉與油。因戰士們肉食較多，又節省了糧食。另外，組織一批人去採柴、燒炭、鋸木板，不但解決了自用的燃料及建築材料，且可以其剩餘出賣。（三）他們又建設了工業及手工業。一九四一年，他們從部隊中抽出一批戰士及勤務員建立了大光紡織廠、大光肥皂廠，供自用外，還有『大光』出品在市場上出售。

他們又在綏德及南泥窪等地開創了鹽井十個，炭井一個，木廠二個，鐵廠三個，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榨油房一所。又利用戰士們操餘課後的時間動員他們紡毛線，用柳條榆條編織各種用具，用樺樹皮作寫字板，作菜盒，作點燈器。這些戰士們的勞作，不但是爲着全體的，而且也是於他們個人有利的。該旅規定：凡動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勞動，以其結果的五分之四歸公，五分之一歸私；凡不動用公家工具的，則以三分之二歸公，三分之一歸私。這種辦法，一方面解決了公用物品的需要，一方面不啻增加了戰士們的津貼。（四）他們又建立了有力的運輸業。現在他們有一個擁有六百頭馱騾的運輸隊，完全從事運鹽運貨。在綏德、三邊、延安之間沿途建立了十個騾馬店，安置了一批老弱人員。（五）他們的商業機關是大光商店，本店外有十個分店，一九四二年九個月獲利六百餘萬元。但這種商業在該旅總生產量六千萬元（延安市價）中只佔百分之十強的數目。（六）該旅實行了統一的生產計劃、生產制度與供給制度。全旅的生產計劃由旅部製定。有的由旅部直接經營，例如較大規模的工業、運輸業與商業；有的由各團直至連隊經營，例如農業、畜牧業、小的工商業。由旅至連，按級檢查。生產制度亦由旅部規定，上述戰士紡毛線的辦法，即是一例。供給制度亦保持統一，農工運商各業雖由各部份分別經營，但凡屬一定數目以上的開支，必須呈報上級批准，下級不得自由支用，這樣就免除了因自由支用生產結果而發生的苦樂不均的現象與浪費現象，保障全旅的團結。（七）他們不但發展了大量的生產，而且厲行了節約政策。例如：規定兩年發三套單衣，三年發兩套棉衣，一切被服，發新的交舊的，不交不發。又發針線給戰士，衣服破了，自己縫補。這樣一來，被服大爲耐用，戰士們更加愛惜自己的被服，大大地節省了被服費。又如前面說的令戰士用樺樹皮做寫字板、做菜盒、做點燈器，發羊毛給戰士打毛襪、手套等事，不但增加了日用品，同時即節省了關於這些物品的購買費。全旅一切房屋建築及器具修理，均由部隊中人自己動手，不向外面請工。所有這些，不但

節省了大批經費的開支，而且在全體官兵中養成一種愛惜公物、注意實效、反對浪費、不講鋪張的樸素的作風。

下列材料，是三五九旅領導同志對於該旅的三年生產總結，可以看出該旅在農工商業各方面的具體情形。

三五九旅三年以來在生產建設方面的總結

自本旅回防邊區以來，三年中所執行的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是我們建軍上的新創造。在這個政策的執行中，除向政府領食糧外，做到了其他一切經費百分之八十二的自給，由此克服了物質資材的困難，改善了部隊的給養，鞏固了部隊，增進了軍人體質的強健，鞏固了軍隊的紀律，密切了軍民關係。現將三年以來我們在農工商業生產經營方面的經驗，概述於後。

農業方面

在生產運動的號召之下，本旅從一九四〇年開始了農業生產，計劃耕種土地，自給兩個月糧食；從夏季起，自給全部蔬菜；喂豬，解決年節的肉食。但因綏、米、吳駐地人稠地少，須要跑到百餘里以外的地方（九里山、清湖）開荒種地，來往耗費工夫，雖積極苦心進行，然未曾細心調查研究，籌劃不當，故收穫所得，不敷購買工具和種籽資金。但在駐地附近所種的蔬菜，到夏季後，足夠自給了。各個伙食單位每人每日發一毛錢伙食費，只勉強夠買油鹽之用。部隊須到百餘里路以外去揀炭出賣，賺了炭燒，並獲得餘錢買豬來喂。從這些生產活動中，奠下了連隊生產改善給養的基礎。除在駐防之綏、米、葭、吳、清各城鎮及河防駐地所有公共荒地（公墳地、廟宇附近，城周圍碎塊土地，廢弛不通行的片斷公路，舊的軍事防禦建築等）都被開墾外，並向當地居民租地種菜。軍中指戰員們這種艱苦勞動的精神，獲得了各階層人民的廣大同情。租佃的菜地，有的佃主（如義合鎮的地主富農）謝絕我們支付租價，貧苦農民有些自願讓給暫時的租佃權，這

是出於人民對軍隊的衷心的同情與愛護。在駐紮於農產不豐的地區，特別是在氣候只宜夏秋作物的地區，農業生產不但是爲解決經費困難所必需，且在維持和人民的正確關係上更有必要。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〇年春，部隊伙食費不夠，冬春蔬菜缺乏，出外採買人員有強買及發價不公平的嚴重行爲。部隊在進行農業生產中，除縣城極少幾家專靠種菜爲生的人有感這個窮軍隊駐防無利可圖而生怨言者外，在廣大人民中間，我們是保有良好的政治影響的。

一九四〇年從生產中解決的問題：（1）自夏五月起，蔬菜自給了。（2）由蔬菜自給，增加了喂豬，下半年改善了伙食，每人每月能吃一斤肉。（3）各個伙食單位，自製了部份農具，每伙食單位都有大小豬十餘個。（4）證明了俗話說的：『有菜半年糧，無菜半年荒』，部隊糧食吃的飽了。（5）種糧食是開荒地，頭一年不長糧食，且離駐地過遠，鋤草不及時，往返費工太多，由於這種種原因，本年糧食收穫計劃流產了。

一九四一年部隊找到可以屯田的地點，執行總司令親身指導的屯田政策，每人平均約種六畝地。每一畝地從開荒、播種、鋤草到收割，須費工七天；六畝地計費工四十二天，約得細糧小米三斗（下中收成），穀草合價亦能值細糧三斗，糧草兩宗約可換棉衣一套。如能獲得上中收成，則可增加四分之一。各種副作物如包穀、花麻、油麻之類，亦與種小米收穫相等。在這六畝地的邊沿，可種許多附帶作物，如大麻子、南瓜、豆角等，收穫很多。除此而外，每人再各種菜地半畝，則可有足供一年吃用的蔬菜。調和——辣椒、大蒜、葱，以及燈油、旱烟、打草鞋用的繩索等等都有了。因爲有了田園產物，故飼養家畜豬、牛、羊、雞、鴨、兔等副業，大爲方便有利，其中喂豬的利益最大，這應該是主要的副業。如平均以五人養一個豬計算，每百人可養二十個豬。外加三個母豬，每一母豬每年產二次，平均最少每次不少於四個小豬，在不鬧豬瘟，不發生意外的正常狀態下，每年共生小豬二十四個。如每月殺二個豬，則每年須殺二十四個豬，豬的繁殖率與供給肉食的屠宰率相抵。還有多餘小豬，自離奶到宰殺，平均每日可長肉五兩。實際則每年平均經常保持五人養一個豬。由於有了農業生產，就有許多剩餘蔬菜，及因磨麵、碾米而得的糠渣頭子，因造豆腐而得的豆

腐渣等等，可以養豬，實爲廢物利用，利益極大。現在本旅已完全照此做到，每一伙食單位由農產、牲畜所得財富是在增加着。這些財富均由黨支部領導，全體軍人監督和依據上級規定的制度，合理的享用。一九四二年尚未作總結，但一切收穫，大體上不會比去年減少。

檢討過去農業生產運動，總結其優缺點如下：

優點是：

(一) 部隊進行了執行這個任務的政治動員，使全體人員認識了毛主席提出的生產自給口號有堅持團結抗戰、渡過經濟難關的重大意義；總司令回邊區後親身指導，更加鼓勵了軍人的積極性和刻苦耐勞的精神。

(二) 在實際生活中，感到生產運動的好處，改善了生活。

(三) 旅與團都訂定了每年度的整個的生產計劃，規定了連隊的生產任務的負擔，認真地督促了團對連隊生產的指導與督促。

(四) 連隊組織生產委員會，討論佈置生產任務的執行，監督與審查經濟（連隊經濟完全公開）並保障供給制度的執行。

(五) 現在各連隊均因有農產品而享受了自給自足的富裕的農家生活。

缺點是：

(一) 沒有充分注意生產工具，沒有組織與使用耕牛，沒有選定幾個戰士（伙夫）專門（撐犁手）長年累月地從事耕作，經常採取全體動員，浪費了時間，妨害了部隊的操課。

(二) 一部份幹部對農業耕作還採取消極態度，不力求增加耕地的收穫量。

(三) 肥料收集沒有更認真。

(四) 沒有專門指導生產的幹部。

根據過去經驗，用牛耕地和利用牛上糞與收割（牛車搬送），置備足夠的農具，配備專門負責的指導幹部（生產副營長和連的特務長），配備長年成日從事農作生產勞動的戰士（伙夫抽出），在播種、鋤耘、收

劃時動員全體官兵參加，規定生產日，花費一定數量的工夫，這樣，每人每年種六畝地，並砍伐全年柴火，共計只不過費工兩個月，不但有了糧食，所有日常菜蔬、肉食及草鞋、柴火、鞋襪概可完全自給。單這後面幾項，即佔全部經費三分之一，怎麼可說是小問題呢？至於糧食收穫，則可養活二千人。

以上就是本旅農業生產的簡單總結。

下面的附表是指出一個百人的伙食單位，如不自己種菜，而去六十里以外的地點買菜所費人工及時間（還不去說金錢的耗費）：

每月蔬菜消費量（每人每日以一斤計）：	三、〇〇〇斤
每月採買次數（每次以採買百斤為標準）：	三〇次
每次採買所耗人工（每次以二人為標準）：	四工
每次採買所耗時間（每次以往返二日計）：	二天
每月採買所耗人工：	一二〇工
每月採買所耗時間：	六〇天
每年採買所耗人工：	一、四四〇工
每年採買所耗時間：	七二〇天

僅僅依據此表，就可以駁倒所謂『農業生產無利，妨礙訓練』的謬論。

工業方面

——大光紡織廠建立與發展的經驗及其他各手工業的總結——

（一）動機和打算：

部隊衣服年年穿，被毯每年需要補充；被服原料的購置是供給工作上的首要問題。一九三九年冬，部隊回防邊區後，被服原料採買困難，又無錢買。在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克服困難、建設邊區的號召之下，作長久之計，辦紡織廠。

(二) 從試辦中搞起來

一九四〇年九月間，即已想辦紡織廠。這時供給部開的短期訓練班中，有一個河北人會織布，於是搞了一個小木機子，買了一塊洋紗，試試看，十天內紗織完，織出的布還好，一天能織十丈。成本計算比買布便宜三分之一。

因部隊裏有織布工人就決定建廠，進行了下列事項：(1)買木料由自己的修械所造小木機十九架，又從山西買了四架鐵機；(2)紗是向當地商人賒來的；(3)從部隊中抽調河北高陽等地的技術工人二十餘名。

布廠便這樣初步的搞起來，不僅有利、方便，且解決了採買布疋的困難。

爲了做到全旅布疋自給，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決定把布廠擴大。

一九四一年初，取消全旅各級勤務員，集中了一百多青年做學徒，學習織布。

又從晉西北買了兩架鐵機，由自己修械所添做了十一架大木機。二三月間，又自造了十六架大木機。三月下旬，又自造了十四架大木機。這時大小木機鐵機共有六十六架。同時，添做了紡車等等必要的零星工具。

原料問題：一九四一年政府發給我旅生產基金四十萬元，其中二十五萬元分給了各團；餘十五萬元中，以十萬元買紗三百多塊（七斤十四兩一塊，每塊二百八、九十元）及一些必須購買的用品（如織機上的鋼絲，不能自製，須購外貨）。

工人由供給部會計員管理，分爲漿紗、織布、絡線、打線四組，一組二三十人，十多個熟練工人當師傅，並負責漿紗、輪紗等技術工作，聰明的青年學織布，笨些和年小些的青年打線、絡線。

織機動作起來之後，馬上感到勞動力不夠。於是用大光紡織廠名義在綏德一帶招收青年男女學徒五十名，並從軍法處調出犯錯誤的犯人和俘獲的土匪，集中勞動。這時工人共有二百餘人。由供給部軍實科負責管理，分爲四個排，十二個組（其中有一女工排；一排分三組，每組十餘人）。

工廠粗具規模了。這時有兩個困難問題須要解決：第一，資金與原料的供給問題；第二，工人的管理、教育與訓練問題。

1、資金與原料的供給問題

一九四一年五月間，借邊區銀行二十萬元，仍不能長期支持。以後只好交朋友，拉攏關係，連絡富商大賈，採取賒借原料，定期付款辦法。

一九四一年五月以前，洋紗多從山西買來，後因來源斷絕，只得從西安、延安購置（申新和黃鶴牌）棉花也是從西安、延安購買的。

土紗的供給，由政府發動當地婦女紡紗。最初，紡一斤紗，工資三元到七元（棉花價每斤四元），分上中下三等。到七八月間，改爲紡一斤紗給熟花一斤半。到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間，又改爲紡一斤紗給熟花二斤二兩或二斤。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間，因民衆紡紗供應不及，且質量不良，自辦紡紗廠，有彈花機四架，紡紗機四十餘架。到一九四二年七月，因無熟練工人，又因彈出來的花不能完全在機子上使用（棉花不好），現在只留四架機子繼續彈花，紡紗機已停。

2、對工人的管理、教育與訓練問題

工人數量增多了，但分子複雜，管理不易。特別是青年勤務員，過去自由慣了，在家時也未勞動過，所以初來時，每天打的打，罵的罵，鬧個不停，張口就說：『大官見過，小官也見過』，不受管理。

從農村來的婦女多是因婚姻不滿出來的，經婦救會或政府介紹來工廠，相互談到婚姻問題時，有的哭，有的笑，並常要求組織替她們解決婚姻問題。

俘虜來的土匪，讓他做工，對他是件苦事情。

犯錯誤受處罰的人，許多是部隊中的連排幹部，擺老資格，不願做工，調皮搗蛋。

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三月間，供給部長用了大力來整頓，立見成效。

這時期中，由那二十多名熟練工人當師傅，教織布組的青年，先登小機（用力小，容易織），由師傅把一切手續辦好，告訴他們如何登機子；斷線時，如何穿線接頭；如何手牽梭子，手脚相應。開始每天只織兩三個鐘頭。經過一兩個月的時間，這一批學會了，轉到大木機上去，再來一批。這樣一批一批地訓練，一九四一年三月輪訓完畢。

打線絡線工作容易學，只要細心耐煩，會接線頭就行。但也需要熟練；不熟練時，打出來的「夫子」和絡出來的線，織布不好使用。

開始做工，青年學徒坐在機子上，或打夫子絡線，時間稍久，屁股痛，紗易斷，脾氣燥，不耐煩，浪費了許多線子，損壞了一些器具。所以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前，從產品方面計算，是沒有收到成績的。

當時的出路是：除了加強技術教育，提高技術之外，主要地是要政治鼓動，並給以革命勞動紀律的教育，使工人們自覺地認識從事生產的重要意義，安心工作。提高他們對於生產的熱情和勞動紀律。

教育的方法：採取個別教育，實行軍事紀律。供給部部长何維忠同志和軍實科長、分支書記，每天親身指導，說明前方打仗，在後方生產等於打仗，要服從組織，做工是光榮的，是工人階級。提出競賽，學徒與學徒比賽，女工和男工比賽。實行獎懲制度，建立請假制度。同時，每人每月發一些紙筆墨文具，並買了些娛樂器具。

從此工人們都感到做工是光榮的；並願工餘學習文化政治，過軍事生活，生活軍隊化。這樣，逐漸建立了兵工制度，工廠走上了正軌。早飯前早操跑步，早飯後上工，冬春季每天十小時。

這時又遇到了新的困難。

廠址原是租借的民房，因工作不便，自開了十幾個窩洞，供工人居住。不料新窩洞潮濕，工人發生疥瘡，數十人不能工作。遂將新窩改爲儲存室，工人移住民房。從六月間開始另打五眼石窩，安放織機，到十月底才落成。這期間，機子沒有屋子安放，只好放在院內露天之下，搭起帳棚工作。五六月間早晨有露，且時時下雨，線打濕，不好織。到七月間，天氣熱，太陽大，線子晒乾，也不好織。當時，只好把軍毯以水浸

濕，蓋在機子上，地下潑水。但這辦法，只能保持兩三個鐘頭，其麻煩困難，可想而知。

經過六、七、八、九四個月，到十月間新窯洞落成，並蓋平房二十七間，供工人住宿，才消除了這個困難。

在工人技術提高方面，從六月以後，青年學徒逐漸成了熟練工人，有的甚至超過了師傅。

在學徒期間，一般地在最初一個星期內，一天只做二三個鐘頭的工，織四五尺布。兩三個星期以後，一天做七八個鐘頭的工，織布一丈到四丈。四個月之後，一天可織四五丈。到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間，每天可織六七丈。六月以後，都成了熟練工人，最好的每天可織十二三丈，在這當中，質量上也不斷提高。

可以說，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後，工廠從種種困難的克服中，建立與發展起來了。

（三）確立了兵工制度

工廠擴大，需要正規化，軍實科管理諸多不便。遂在供給部之下，專設廠長政委負責領導，訂定紡織廠行政草案。

在廠長政委領導下，分工務、業務、會計、總務四股，分工合作，各有專責。規定了各種制度——會議、會報、報告、檢查、生活、津貼（按技術高低，規定最高的十元）與懲罰制度，具體分配了工作、學習、休息、娛樂的時間，訂立了民主生活的範圍和各種原則——工室、寢室、飯廳、請假、外出等。

到一九四一年十月間，一切走上正規了。

十月以後，感到木機不如鐵機好——鐵機織出的布，質量好而且省工。計劃把木機逐漸完全改成鐵機。從一九四二年一月到十月間，自造鐵機四十一架，但因織鐵機，須身強力壯，技術稍高，這樣的工人不夠，不能全部改用鐵機，遂不再添造。計鐵機四十五架，木機六十二架；此外，連買得龍灣工廠織毛毯毛織品的木機十三架（一九四二年春），自造木機十三架；共計織機一百三十三架，平均月出寬面大布千疋左右，毛巾約五百打，毛毯約百床。

從一九四二年五月後，把津貼制改為按件給資制，最高每月七八十元（這相當於私營工廠工資十分之

一、最低的二三十元，更加提高了工人們的生產情緒，當時有些工人，午睡不睡，到下工時不下工，埋頭工作。經過說服教育，才克服了這些過度積極的現象。

我們是堅持兵工制度的經營。工廠亦自種蔬菜，喂豬，供給蔬菜肉食。

一九四二年冬，因製棉衣，停工一月。

一九四一年，該廠除一切開支外，實得紅利三百九十萬元。一九四二年十個月，實得紅利八百萬元，現廠址工具及所存紗花，可值五百萬元（紗花約值一百萬元）。擬再投資數百萬元，堅持再生產。

總結我們從事工業的經驗教訓，有如下列各端：

1、各工業利潤的比例，以紡織業的兵工即旅供領導的大光廠，利潤最大。計該廠全體人員，一九四一年爲二百五十人，一九四二年爲二百二十五人；除工廠一切開支外，一九四一年獲利三百九十萬元，等於該年底四千担小米價（每担三百斤）。一九四二年十個月獲利八百萬元，以綏德現時小米價，八百萬元也是折合小米四千担，廠中每人平均純利約十八担。

根據兩年來的經驗及現時的環境，大光廠二百二十五人，一九四三年，除廠址工具外，向該廠投入資本按每人二萬五千元計，共計五百二十六萬五千元，軍服所需布，用款向該廠購買，如此，則一九四三年的生產，每人可獲純利小米二十担（因物價高漲，只好以米作標準）。

各團均有織布廠，可整理爲一百人的織布生產。

其他，除製鞋、縫衣、皮革，純爲製造部隊的裝具服裝外，本旅尚有鐵匠、木匠等約二百人，根據二、三年的經驗及邊區經濟繼續發展的情況，這種鐵木工人平均有一千元資本，每人每年獲利率約合六担小米。

尚有紙廠、榨油房，可利用部隊從農業所得麻子及稻草以及兵工割馬蘭草，廉價收買，作爲原料。此項工業約六十人，每人每年平均純利可得六担糧。

2、除農業外，興辦兵工制度，實爲解決自給之本，它是同時解決物資與財政兩方面的。商業決不如農工兩業之可靠，商業不是靠己而是靠人，故不宜多做。

3、缺點方面是：大工廠經營，成本消耗繁重，沒有固定資本，影響再生產，因此今後必須竭力籌得固定資本。

4、我們過去既沒有對於邊區全盤經濟的打算，對於部隊農業與工業的生產也沒有統一的計劃，不能使農業、工業、運輸業、商業四項互相統籌配合起來幹，這是很大的缺點，今後應有統一的計劃，配合的經營。以上就是我們的總結意見。

商業方面

我們的商業是從合作社開始的，從合作社到大商業，經過了六個年頭。

還在一九三七年，本旅改編東渡，開赴崞縣一帶與敵作戰。時值太原失守，商人驚散，城市貨物不能運往鄉村，老百姓亦不敢外出買販，致使日用品甚為缺乏，即油鹽也都一時斷絕，軍隊鄉民，多有淡食者。在這樣的環境下，由於老百姓的請求，我們便辦了合作社，抽調牲口到寧武等地馱運食鹽。供給部拿出白洋三百元，在崞縣一帶收買商人寄存在鄉下的貨品，聘請陽武商人李茂林任經理，在陽武開張營業，定名為『三五九旅軍民合作社』。當時目的，只是為了解決食鹽油類等的困難，並販運一些其他必需品。那時候票子還未跌價，所以資金雖然不多，而生意著實興旺。一九三七年十月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四月部隊東移，短短的半年得到了崞縣人民很大的好處，成千的老百姓都在傳頌着：假如不是合作社，不被敵人殺死，也會要困死的。因為當時的宗旨，不是為了賺錢謀利，所以生意雖好，沒有賺到錢。四月結束時，本利共合白洋四百九十元，交給部隊用掉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合作社人員隨同部隊轉移晉察冀，到了靈邱，又是缺乏日用品，軍民都苦。欲繼續辦合作社，沒有本錢，無法可想。到八月間，合作社人員去涞源縣城找商人拉關係，用交朋友的辦法，賒到了三千零四十二元貨物，主要是布疋、文具、紙張、香皂等，共計十一馱子，運回靈邱東河南鎮，設店銷售，貨主也同來。五天的時間，將這批貨物全銷盡，除本錢外，實得利潤八百元。這次現付貨主二千零四十二元，送了一千元給前方接濟伙食錢，餘八百元，又隨貨主去涞源再辦貨。這樣販運數次，到十二月底，才把

貨主的賬交清。合作社營業由八月至十二月，便利了靈邱一帶人民所需油鹽布疋的供給，並在數次販運中賺了二千八百元，彌補了部隊的經費，還剩餘一千五百元的貨。

一九三九年一月，將一千五百元貨移駐下關鎮，主要是販運油鹽，一方供給部隊的吃油，同時便利老百姓的需要。這時因部隊時刻和敵人作戰，傷兵一千多，西藥營養品等採買不易，合作社遂與各方商人建立了友好關係，經過他們從天津北平保定等處收買西藥、牛奶、藕粉等物，保證了傷兵的需用。同年九月本旅接到担負晉陝河防的命令，合作社即行結束，九個月營業實得利九千四百元，當時部隊出發無錢，即以五千四百元現金開支經費，餘下了四千元的貨，計五個馱子，隨同部隊西行。十月到了綏德五里灣，即以這四千元貨開張營業，因邊區貨價高，賣了一萬元。又派人到婁煩、文水、交城等處，販來一些文具布疋。年底總結，現金帶貨共值三萬一千元。

一九四〇年一月，合作社移到綏德南關營業。這時部隊經濟陷於極端困難中，不得不靠合作社賺一部份錢補助開支，所以『軍民合作社』的名字，便覺有些不合用，改名爲『大光商店』，轉變爲以營利爲宗旨。一年中又交了一些商人朋友，或以現款買貨，或作暫時賒欠，購進了文具、布疋、紙張、鞋襪、毛巾等貨，並在市上倒貨。一年努力，年終總結，共賺十九萬一千七百元，抽調十萬一千七百元補助部隊開支，確定一九四一年的生產基金爲九萬元。

一九四一年，爲解決部隊的迫切需要，本旅除以農業工業運輸業爲主體外，決定擴大經營商業，以爲輔助。除原有九萬元資金外，又從財廳發給本旅的四十萬生產基金中提出二十五萬元，又將各團所有的零星小商店取消，集得資金六萬元，共有資金四十萬元。從一九四一年一月起，設了十個分店，經營一年，實得利潤二百九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元，抽調九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元補助部隊開支，實餘二百萬元作爲商店的資金。

一九四二年，本店及十個分店在春夏秋三季的經營中，共得利潤六百七十二萬零零八十元，補充部隊經費二百萬元，尚餘四百七十二萬零零八十元繼續營業。

經驗教訓：

- 1、便利了老百姓購買布疋、紙張、油、鹽等日用品，密切了軍民關係。
- 2、便利了軍隊購買日用品，在經濟困難的八路軍，能够使一元津貼買到香皂、毛巾、牙刷、牙膏等東西。另一方面，戰士們把錢都正當的買了日用品，可以減少部隊中不正當的浪費行爲。
- 3、交朋友的重要性，假如我們不同來源商人拉好關係，便無法買進貨物。
- 4、收入盈餘，補助了部隊經費的開支。
- 5、推銷土產，抵制外貨。可是有一部份商店因爲我們檢查不嚴與領導不夠，尙不能有計劃地聯合一致進行抵制外貨推銷土產的工作，只顧到狹隘的本位主義，忽視了整個的經濟建設。
- 6、一九四〇年以前，不知道建立商業情報，只曉得苦幹硬幹。結果，因行情漲跌，吃了不少的虧。一九四一年建立了商業情報網，各地行情，隨時報導，並和大商家取得了聯系，貨價漲跌，能及時知道。故將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一年比較，就沒有吃到行情不明的虧了。
- 7、與當地有經驗而且能在邊區外區活動的商人聯絡和營業，遇有紡織原料困難的時候，得到了很多的幫助。但也遇到了一些流氓商人，他們利用我們做了他們自己的事業，使我們的營業受到損失。
- 8、商店裏有的人數過多，吃閒飯，增加了商店的開支。
- 9、經常與外區商人往來，彼此了解政策與態度，減少誤會，成爲朋友。
- 10、也考驗了幹部的黨性，思想與能力。
- 11、商店中管理嚴密，制度健全，才能減少消耗。
- 12、幫助穩定金融。大光商店在一九四〇年兌換光華票。
- 13、週密籌備，正確地靈活地運用貿易政策，在非禁止品的範圍內，使土產運出，兌進必需品，一面是解決軍需品的困難，又可獲得利潤。
- 14、爲了賺錢起見，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將所有旅團的合作社一律改名爲大光商店。商店組織是以綏德爲

中心，在綏、米、葭、吳、清、安定、延川、延長均設有分店。旅爲大光商店，團爲分店。

15、各商店人員大多是軍人，按職別發津貼，但僱請者則按能力與工作之強弱發薪資。

16、貨物來源，一九四一年大部是從晉西北一帶買回來的。後因敵人『掃蕩』，封鎖經濟（降低法幣，使用偽票），物價昂貴，又因我們資金困難，拿錢買貨亦不能多；因此我們就在抵制仇貨，推廣土貨的口號下，推銷自己織的布疋，賣了自己製的皮鞋、毛巾、布鞋，更大量地推銷了大光肥皂。在防止奸商抬高市價，與推行邊幣的原則下，兌換光華票，抑抵高漲着的市價，例如我們自己熬的鹽，市上每元一斤四兩，我們則賣二斤四兩，這樣使老百姓每元中便宜一斤，所以說我們在某一時期，主要目的不是爲了賺錢，而在平衡物價，安定民生。

17、『早知三天事，富貴幾千年。』似乎做生意是瞎碰的，碰的機會好，就可賺到錢。其實不然，作生意完全靠估計正確，了解當地及各地之情況，進出口的對比，方能預計貨價之漲跌，確定某個時期的注意方針。

18、穩定幣制，鞏固金融，是生意發達的先決條件。三年來由於邊區的幣制忽漲忽跌，金融紊亂，影響了買賣貨物，感到諸多不便。另一方面，却使投機商人販運票幣，賺了很多的錢，影響了邊區的經濟。

19、各團商店，對集中領導，實際上沒有澈底的執行，表現了互相競爭，各自爲政的不良傾向。

20、各團都建立了會計制度，由專人負責，登記賬目。但因經手者大多是過去商人，沒有用新式簿記，仍用舊式簿記。（本總結完）

三五九旅還有一個關於一九四三年該旅在農業方面的具體生產計劃，切實明確，可供各部參考。原文如下：

三五九旅一九四三年的農業生產計劃

駐屯邊區軍隊的屯田制度，乃是我軍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基本任務之一。這個任務的堅決執行，使我們能够從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中，減輕人民負擔，提高軍隊質量，並求得與人民的親密團結。因此，本旅根據三年來在執行上級生產號召中所得的成績與經驗，爲着加強與貫徹這一政策的執行，擴大一九四三年的生產率，特擬定如下計劃。

(一) 怎樣組織部隊的農業生產？

1、本旅各團各部隊駐防區域，均有可耕土地，因此，規定每個伙食單位，按勞動力與土地情況，經營農業生產。

2、每個伙食單位，在駐軍環境中，百人上下的只須三個炊事員，故每個伙食單位能從炊事員中抽出六至七個身強力壯、兼有農作經驗的同志，來專門從事耕種勞作。

3、各營生產副營長，各連特務長，旅團生產副官，負責劃監督之責，在春耕、夏耘、秋收之際，組織與指導全體人員參加。

4、每一個戰鬪連隊的伙食單位，規定除解決自己全部蔬菜外，應種糧地六百畝。
今按各部能担任生產任務的，規定如下表：

隊數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計
生產單位別	五	二	一	一七	一六	一三	六	五	六五
應種地畝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	一〇〇〇〇	九六〇〇	九〇〇〇	三六〇〇	三〇〇〇	三六六〇〇

炊事員中額抽專門從事農業生產人數	三〇	二三	六	一〇三	九	七	三	四〇	三二〇
------------------	----	----	---	-----	---	---	---	----	-----

(二) 一年之計在於春，今冬就要準備來春事。

1、每一個伙食單位，種那些土地，山地多少，川地多少，熟地多少，荒地多少，要登記清楚。並要調查研究種什麼東西，下種、鋤草、收割時間需多少工，多少種子等。

2、種地需要牛、犁；還需要其他農具，如鋤、鐮、筐、鏟等等，冬季要完全準備好。其具體要求如下：每一個伙食生產單位，必須準備耕牛三頭，耕犁三根，其他農具（如鋤、鏟等）共六十件。

3、不上糞，莊稼長不好，各單位務必收集糞。所有大糞、牲畜屎尿、柴灰、草灰都要收集，要注意廁所、豬圈、羊圈、牛馬厩之管理。要求每畝地至少要上四担肥料。許多地方有水冲草根、樹葉，均可搬至耕地燒灰。

以上所提應準備的東西，各部需要多少，全旅共需多少，可看下表：

隊別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計
生產單位數	五	一	一	一七	一六	一三	六	五	六四
需備耕牛數	一五	六	三	五一	四八	三九	一八	一五	一九五
須備耕犁數	一五	六	三	五一	四八	三九	一八	一五	一九五
須備其他農具數	三〇〇	一一〇	六〇	一〇一〇	九六〇	七八〇	三六〇	三〇〇	三、九〇〇
須備肥料担數	一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二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一六六、〇〇〇

(三) 要多少錢？要多少工作日？

1、牛、犁和其他農具都要花錢買，或者花錢去做，這就是本錢。此外還有肥料、種子，六百畝地至少得用八百元錢，總計六百畝地得用本錢多少，全旅全部耕地得用本錢多少，請看下列二表：

表一——六百畝地需用本錢概算表：

耕牛費	耕犁費	其他農具費	肥料種籽費	耕牛飼料費	合計
一二,〇〇〇	六〇〇	六,〇〇〇	八〇〇	二,七〇〇	二二,一〇〇

附註：(一) 耕牛每頭係按四、〇〇〇元計算；(二) 耕犁每根按二〇〇元計算；(三) 其他農具平均每件按一〇〇元計算；(四) 耕牛飼料費按每頭年九〇〇元計算。

表二——全旅全部耕地需要本錢總值概算表：

項 別	甲 部	乙 部	丙 部	丁 部	戊 部	己 部	庚 部	辛 部	合 計
耕 牛	六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二〇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耕 犁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	一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	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其他農具	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一三三,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五九一,〇〇〇
肥料種籽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三,〇〇〇
耕牛飼料費	一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	一七二,〇〇〇
合 計	一三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三六六,〇〇〇	二四一,〇〇〇	二二六,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一,五〇二,〇〇〇

2、從開荒播種，到收打完畢，種六百畝地，得用多少工作日？估計開荒播種需工五百個，製肥及施肥需工八百個，鋤草三次需工一千八百個，收打需工四百五十個，那末，總計起來，共需三千五百五十個工作日。請看下表：

耕地播種	製肥及施肥	鋤草三次	收打	合計
五〇〇	八〇〇	一、八〇〇	四五〇	三、五五〇

附註：種六百畝地，六個炊事員專門從事生產一年，至少可以做一、〇〇〇個工；三、五五〇個工除去一、〇〇〇個經常工，還有二、五五〇個工。每個伙食生產單位，按一〇〇人計算，那末每個人在一年中，須支付二十五個工作日，從事農業生產。

(四) 耕作物的種類，各類的收穫量；

1、按土地狀況，研究那裏適合種什麼糧食。一般應種穀、粟、高粱、包穀、豆類、稻子等。此外還必須估計到部隊本身的需要，種大小麻，可解決打草鞋，做鞋的麻及燈油、食油。但在某些部隊可種棉花——

甲、七團可植棉二百畝，估計每畝收花三十斤，總計可收花六千斤。按每斤五十元折價，總可折款三十萬元。

乙、特務營每個連除種六百畝糧食外，還須種八十畝棉花，估計可收花二千四百斤，折款十二萬元。營部種棉二十畝，可收花六百斤，折款三萬元。

2、按每畝地（三畝）平均產細糧四斗計算，六百畝地可種細糧八十石，全旅三萬九千畝地可產細糧五千二百石，每石細糧按一千二百五十元折價，則六百畝地產糧折款為十萬元，全旅三萬九千畝地產糧折款為六百五十萬元。

3、在六百畝地當中，估計半數（三百畝）是種穀子，每畝地產草按三百斤計算，則總可產草九萬斤。每斤草按一元折價，則六百畝地產草折款為九萬元；全旅耕地產草折款為五百八十五萬元。請看下面兩個收成概算表：

表一——六百畝地收入概算表：

可收細糧	糧價每担	糧價合計	可收穀草	草價百斤	草價合計	糧草總值
八担	一二、三〇元	一〇〇、〇〇元	九〇、〇〇斤	一〇〇元	九〇、〇〇元	一九〇、〇〇元

表二——全旅耕地收入概算表：

項 別	甲 部	乙 部	丙 部	丁 部	戊 部	己 部	庚 部	辛 部	合 計
耕地畝數	三、〇〇〇	一、二〇〇	六〇〇	一〇、二〇〇	九、六〇〇	七、八〇〇	三、六〇〇	三、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畝
可收細糧 (担)	四〇〇	一六	八〇	一、五八〇	一、二八〇	一、〇四〇	四八〇	四〇〇	五、二五担
可收穀草 (萬斤)	四五	一八	九	一五三	一四四	一一九	五四	四五	五、八五〇、〇〇〇斤
產糧折款 (萬元)	五〇	二〇	一〇	一七〇	一六〇	一三〇	六〇	五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元
產草折款 (萬元)	四五	一八	九	一五三	一四四	一一九	五四	四五	五、八五〇、〇〇〇元
折款合計 (萬元)	九五	三八	一九	三二三	三〇四	二四九	一一四	九五	一二、三五〇、〇〇〇元

各團各部接此計劃後，立即召開生產幹部會議，討論執行辦法，將團或部的總計劃及各個伙食單位的計劃（根據三年自給菜蔬以及吃油、燈油、做草鞋用的麻等等材料，加在自己的計劃中）作出，限十一月底呈報上來，望遵照執行爲要！

（本計劃完）

從上列種種材料看來，即可知道我們軍隊的生產自給，毫無疑義地是有鉅大成績的。這種成績是依靠了什麼才達到的呢？是依靠了幹部們的積極領導與戰士們的勞動熱忱才達到的。幹部們是自覺地爲了克服革命過程中的困難而去積極地指導生產運動的。戰士們也是自覺地爲了克服革命過程中的困難而去參加生產勞動的。沒有這兩種人的自覺性，沒有他們感覺到他們的工作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自己，不是爲了什麼無聊的事業，而是爲了神聖的革命需要，假如他們沒有這種感覺，那末，是無法完成這種艱苦的生產任務的。假如他們感覺自己是被僱傭的一份子，假如他們感覺從事生產是與他們自己的利益無關的，是與共同的革命事業無關的，那末，這種生產任務是無法完成的。

以上講過了我們軍隊在生產自給方面的極好的經驗與極大的成績。以下再講到我們工作中的缺點。

我們的工作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不但是軍隊的，也是機關學校的。這些缺點中，有些在過去時期是難於避免的，但在有了五年經驗之後，就應該有所改變了。有些則已成了嚴重的弊病，如不改變，則將轉過來妨礙黨與革命的利益。

這些缺點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個缺點，就是一部份軍隊及一部份機關學校，爲了要迅速解決迫切的自給問題，比較地或特別地重視了商業，輕視了農業與工業。他們不知道只有農業與工業是產生價值的，商業不過是流通過程，它本身不能產生任何的價值。鑒於過去的教訓，一九四三年的生產任務，一切部隊一切機關學校都要將重點逐漸轉到農業、工業與運輸業上去；而在我們的條件下，特別重要的是農業。因爲我們在目前條件下，大部份需要的東西是農產品（正糧、雜糧、蔬菜、蔬、肉食、植物油、動物油、棉花、馬草、木料、柴火等）；農產品又可以出口換取工業品。如果我們再從事一部份可能與必要的手工業

（紡紗、紡毛、做鞋、織毛線衣、挖炭、鋸木頭、榨油等）及較大的輕工業（紡織業、造紙業等），則可以很大部份地解決我們的日常需要，並可爭取出賣。

第二個缺點，就是缺乏統一的計劃與統一的檢查。下面多少單位各自為政，上面沒有或缺少在政策原則上與工作內容上的統一的指導、統一的計劃與統一的檢查，致使各部份不知道什麼事是不應該做的，或者明知故犯。於是各自為政，鬧獨立性的事也發生了；破壞政策原則，破壞政府法令的事也發生了；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也發生了；各個經濟單位之間，不但沒有協助，反而互相鬭爭，互相妨礙的事也發生了；瞞上不瞞下，瞞上又瞞下，打埋伏，說謊話的現象也發生了；極端浪費，一擲千金，但求鋪張，不求實效的現象也發生了。尤其嚴重的，是在一部份幹部之間發生了貪污賭博等極端惡劣的現象。有個別的幹部是被物質所誘惑，因而不願忠實於共產主義的神聖事業，完全腐化了；另有若干幹部則起了霉，要在太陽底下曬一曬才能恢復健康。所有這些壞事，所有這些弊端，在一部份軍隊與一部份機關學校的幹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發生過的。今後所有軍隊與機關學校的一切上級領導機關，必須着重於照顧全局，掌握政策，對所屬各單位的生產活動一定要有統一的計劃，統一的檢查，絕對不容許再有各自為政，鬧獨立性，破壞政策，破壞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單位互相鬭爭，互相妨礙，以及幹部中貪污浪費賭博等現象再行發生。如再有這類現象發生，必須嚴申紀律，輕者批評，重者處罰，決不可對他們縱容，反而美其名曰『寬大政策』。這就是經濟工作中的整頓三風，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執行。

第三個缺點，就是有許多部隊、機關、學校，在他們的生產活動中，負行政指揮責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或有少數人完全不聞不問，而僅僅委託於供給機關或總務處去管，這是由於還沒有懂得經濟工作的重要性原故。其所以還不懂得，或則中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還沒有去掉得乾淨；或則以爲政治黨務軍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經濟工作雖然也重要，但不會重要到那種程度，覺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要多分心去管它。但是這些想法全是不對的。在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下，大多數人做工作，講革命，除了經濟與教育（理論教育，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業務教育，國民教育均在內）兩件工作以外，究竟還有什麼工作值得稱爲中心工作，或所謂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還有什麼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錯，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還有許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邊區條件說來，就大多數同志說來，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着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義。我們如果認真地做好了這兩項工作，我們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戰爭，我們也就算很好地協助了大後方的人民。兩項工作中，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着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餘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着的。由於我們有許多負領導責任的同志至今還採取輕視或不很重視經濟工作的態度，以至其他許多同志都學樣，願意做黨政軍學工作，願意做文學藝術，而不願意做經濟工作。有的女同志不願嫁經濟工作者，似乎認爲他們是不大名譽的人，認爲與其嫁一個騾馬隊長，不如嫁一個政治幹事，才算不辱沒了她。所有這些觀點，實在都是錯得很的，不適合我們此時此地的條件的。我們必須重新分工。我們要有一批脫離生產事務的革命職業家，我們也要有一批醫生、文學藝術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這些方面的人決不能過多，過多就會發生危險。食之者衆，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爲之者舒，是要場台的。因此，大批的幹部必須從現在的工作或學習的崗位上轉到經濟工作的崗位上去。而各級黨部、政府、軍隊、學校的主要負責同志必須同時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要

調查研究經濟工作的內容，負責製訂經濟工作的計劃，配備經濟工作的幹部，檢查經濟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將此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僅僅委託供給部門或總務部門就算完事。

第四個缺點，就是過去有些部隊或機關在生產任務的分配上，沒有上下級的分工，從旅部到連隊，從上級機關到下級機關，都允許經營商業，毫無限制，因而發生許多毛病。今後一般的商業、工業與運輸業應集中在旅部、獨立工作區域的團部及上級機關，並按正確原則去做，對外貿易還必須統一於物資局的指導之下。集中工作區域的團以下，任何部隊的營以下，以及一般的下級機關，應指定他們從事農業，戰士們與雜務工作人員們可做的手工業，以及消費合作性質的生意或小販生意，其餘均不許他們做。

根據五年來成績與缺點的總結，一九四三年軍隊各部應執行如下各項的具體任務：

(一) 除大部份糧食與一部份被服由政府供給以外，大多數部隊應完成一切供給的百分之八十，一部份軍隊（如三五九旅）則應完成百分之百，只有某些特殊情況的部隊（如騎兵部隊）才允許他們只擔負較輕一點的生產任務，但也要想辦法在一九四四年能夠完成較大的任務。一切部隊應準備於一九四四年更多地增加糧食與被服的自給額，以便減輕民負，休養民力。

(二) 除三五九旅已經全部從事屯田及騎兵部隊因特殊條件難於立即實行屯田外，其餘各部，除負擔守備任務外，均應以一個至幾個相當數目的部隊實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農業生產。

(三) 各部由上至下應是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從事生產，從旅到連按級建立生產委員會，按級舉行生產與供給的集體計議與集體檢查，並研究生產技術的改進，以期增進生產，改善供給，糾正一切不正常的現象。

(四) 選擇政治上與工作能力上比較更强的幹部去管理各部門的生產與供給工作。現有的經濟幹

部須加以審查，不稱職的及犯貪污腐化錯誤的人必須調動工作，有些特別嚴重的並須予以應得的處罰。各部一律增設生產副營長，及連的生產管理員，專門管理全營全連的生產與分配事務。旅部團部設生產副官，管理本單位的生產工作。各級主官必須親自計劃與檢查經濟工作。

(五) 各分區黨部、政府與軍隊的一切經濟與財政工作，在分區財經分會的領導下實行統籌統支。爲着鼓勵各部份生產人員與工作人員的積極性起見，應允許從他們的生產結果中支出相當部份去改善他們的生活，除此以外，一律應做到統籌分配，免除苦樂不均的弊病。統籌分配，有在全邊區範圍內統籌的，有在各分區範圍內統籌的，有在各系統範圍內統籌的，有在一單位內統籌的，依生產性質及經營情況來決定。

(六) 厲行『軍民兼顧』的原則，軍隊、黨部、政府的經濟活動應與人民的經濟活動取得協調，一切損害人民利益引起人民不滿的事均不許作。

(七) 生產與教育不可偏廢，各部必須精密地計劃二者的工作及其相互間的配合，恰當地分配二者的時間，使一九四三年的生產與教育均多於與好於一九四二年的生產與教育。我們有了五年的經驗，一九四三年達到這個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八) 部隊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就是保障部隊生產計劃與教育計劃的完成及在實施這兩項計劃時保障自己部隊與黨政民發生正確的關係，保障自己部隊上下級的正確關係，保障經濟幹部的純潔。政治工作如果在這些方面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那末，這種政治工作就是失敗的。

九 關於發展機關學校的生產事業

三部份公營經濟中，軍隊及機關學校的生產，是直接爲着自己解決生活資料與事業經費的，政府機關經營的也在內。例如邊區政府各廳處的工作人員，有農業、手工業及商業的經營，這是直接爲着補充自己機關辦公費被服費之不足及工作人員伙食費之不足的。但政府經營的鹽業、工業及商業，則不是直接爲着自己機關，而是爲着黨政軍全體的。

延安及邊區的黨部機關、政府機關、民衆團體的領導機關，以及許多學校，他們在整個『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的號召下，從事農工商業的經營，是一個廣大的群衆性的運動，解決了財政供給上的很大問題，僅僅次於軍隊，值得我們慎重地總結其經驗，指出其成績及缺點，並規定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方針。

軍隊的生產運動從一九三八年開始，有了經驗，一九三九年我們就將這種經驗推行於一切機關學校。一九三九年二月，開了生產動員大會，組織生產委員會爲生產運動的指導機關，按各機關學校的工作或學習的不同情形，人員勞動力的強弱，規定不同的生產任務。例如：那時規定區鄉工作人員的糧食須完全自給；其他機關，從中央至縣，則按勞動力多少強弱，多的強的自給糧食二分之一，少的弱的自給三分之一；共要他們開荒十萬零二百畝，冀收細糧一萬三千担。此外，規定一切機關學校的蔬菜全部自給，喂豬解決肉食，種糧有草又可解決一部份馬草。當時全邊區機關學校共約二萬人，平均每人發生產費二元六角，共四萬九千餘元，作爲購買耕牛農具的資金。在他們找得了土地、買到了

耕牛農具之後，即全體動員從事春耕。這些人中，大部份是從來沒有勞動過的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連同工農出身的幹部及勤務員、伙伕、馬伕一起，組織在生產小組中，從事開荒種地。那時延安附近一切有荒地的山頭，布滿了開荒的男女，他們自動地宣佈勞動紀律，提出開荒競賽，體力強的都拿起鋤頭開荒，體力弱的則種菜養豬，或送飯送水。

這次生產運動的收穫是：（一）全邊區機關學校，共計開荒十一萬三千四百十四畝，收穫粗糧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五石六斗三升（合細糧五千八百三十石零一斗七升）；收穫菜蔬約一百二十萬斤，兩項照當時市價值洋三十六萬八千餘元（一九四二年市價則值一千零十七萬九千餘元）。解決了二萬人所需糧食的四分之一，馬草的二分之一及一部份蔬菜與肉食。（二）使一萬多個知識份子與青年學生第一次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懂得了什麼是勞動，鍛鍊了他們。（三）邊區老百姓看見或聽見所有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及青年學生——從共產黨中央委員至小勤務員，一律上山種地，感動了他們，大家熱心開荒，成爲歷年開荒之冠。

另一方面，這年並沒有完成糧食生產的規定任務，由於勞作缺乏經驗，施肥、播種、鋤草有的不及時以及有些地區遇着旱災等原因，致使開荒雖多，收穫不大，只完成原定一萬三千担細糧的百分之四十五。再則這時在領導上與組織上犯了平均主義的毛病，沒有考慮到各工作機關各學校的不同性質。有的是給予任務太大，例如要區鄉工作幹部完全自給糧食，結果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有的是因爲從事生產延誤了工作和學習，反而不經濟。有的是某些體弱的男女同志本來不能做重勞動的，也勉強勞動，身體吃虧。有的是原可從事工商業的，但當時沒有指出，只單純地全體一致地注意了農業。

一九四〇年，改正了這些缺點，首先將農業的生產任務減少了，除菜蔬肉食自給外，糧食生產則按各機關學校的不同情況，只規定自給七分之一、六分之一與四分之一。體弱的男同志及一切女同

志，不要他們參加重勞動，五十歲以上的老人與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則完全不參加生產，允許僱有經驗的農民參加生產並作生產的指導者。此外，由財政廳發五萬元給各機關學校作資金，允許各機關學校進行工商業，並發展畜牧生產，喂豬養羊。因此一九四〇年的農業生產，除原耕地外，沒有增加。有的因勞動力不夠，採取與老百姓夥種的辦法，有的將一部份糧地分給別人，自己着重於種菜、喂豬；又加有些學校已遷往華北；故一九四〇年糧食收穫只有細糧三千担，菜蔬九十餘萬斤，照當時市價估計約值三百萬元。

我們的經營商業是從合作社開始的。一九三九年各機關學校就有消費合作社，並有開飲食店的。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共有三十個合作社及食堂，資金共約六萬餘元。其中大的一萬元，小的不過數百元，目的在於供給本機關學校的日用品，同時賣給外面謀些微之利，藉以改善生活，還未担負藉商業解決一般需要的任務。但是它却初步地鍛鍊了從事商業的幹部，積累了一些經商的經驗與小量的資金。

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兩年中，機關學校還沒有一般從事工業生產，只建立了一些爲着自己磨麵粉的磨坊，還有後勤的交通商店附設了一個打馬掌的鐵店，可算是機關學校手工業生產的開端。

以上算是機關學校生產自給的第一時期。以下是第二時期。

一九四〇年冬，由於邊區經濟被封鎖，外援斷絕，財政困難達於極點，整個財政供給不能不從半自給急速地轉到完全自給，因此機關學校的生產任務也迅速地起了變化。

這時黨政軍民各機關及各學校的人員（部隊在外）既不能全部從事農業，而生產自給的任務又是極端艱巨的，一方面要靠發展生產保障每天每月的供給，同時又要積累資金，建立將來自給的基礎。

爲着渡過這一嚴重的難關，黨與政府採取了必要的步驟。首先是刷新領導生產業務的組織，先後成立了中央直屬財政經濟處，後勤經濟建設處，邊區一級的財經處，各分區各縣亦令其成立生產委員會。其次，從一九四〇年冬到一九四一年春，先後由政府支付七十萬元，銀行借出三百萬元作爲各部門增加的生產資金，交給各生產自給的領導機關轉發下去，加上第一時期各機關自己所積累的資金，於是大家從新佈置，紛紛抽調人員，選擇業務，決定以工商業爲主要經營方向，農業則放在輔助地位。

下面，我們就來將這一時期內各機關學校從事工業、商業及農業的經驗加以論述。

各機關學校的工業是從紡織業開始。初因邊區有羊毛，一九四〇年冬，各機關學校人員在其工作或學習之餘，就有手搖紡毛，一時成了運動，大家紡起來。但因原料不夠；紡毛技術又不熟練，毛綫不勻，費工太多；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後，就逐漸停止，而着手於建立手工紡織廠。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各個大的機關學校，均紛紛抽出勤務員通訊員到政府的難民紡織工廠學習紡紗織布，一時如雨後春筍，辦了十多個紡織工廠。缺點在沒有計劃性；到了下半年，這些工廠，或因原料供給與紗布銷售無保障，或因流動資金不夠，或因管理不善，有的停工，有的合併，有的時開時歇。例如：中央直屬財經處的新中國紡織廠，先與中央組織部的勝利紡織廠合併，後與馬列學院的團結紡織廠合併，仍名團結紡織廠，使經營集中起來，更有些，魯藝及女大的紡毛廠則實行停工，將資金移作別的事業。中財的團結紡織廠，後勤的交通紡織廠，均因種種困難，不能充分運用自己的生產力，而時開時歇，直到後來才走上軌道。這樣看來，由成千成萬人的手搖紡毛到建立手工工廠，由建立十多個很小的紡織廠紡毛廠到最後合併爲交通、團結兩廠，中間經過不斷地摸索研究、改善技術與改善管理方法，這是一個從盲目性到自覺性的過程。這一過程，一方面說明了各機關學校的苦幹精神，另方面也說明了

當時我們對於工業經營的毫無經驗。到一九四二年，交通產布三、三三六疋，團結產布二、七三六疋，成了邊區的大工廠，就是這一苦幹與摸索過程的寶貴的產物。

紡織廠以外，中央直屬各機關學校，又陸續開辦了被服廠、製鞋廠、煤炭廠、木工廠、造紙廠、陶瓷廠、磨粉廠、榨油廠、絲織廠及鐵器店等許多手工工廠，求達自給目的。這些工廠的資金，或是從商業資金中抽出來的，或是從銀行借來的，或是從停閉自己的紡毛廠移來的。並鑒於紡織業的經驗，不是那樣毫無組織地幹了，而是或由幾個機關學校合辦，或與老百姓合辦，或與銀行合辦的，比較地有了一點秩序。但也並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大都經過開始虧本，繼能維持，最後才能獲利的曲折過程，才立定了自己的基礎。

一九四一年與一九四二年兩年中，中財系統共計建立了大小手工工廠二十七個，共有資金四十餘萬元，員工四百七十七人。其中計有紡織與紡毛廠八個，資金二十一萬七千元，員工一百六十一人；煤炭廠三個，資金七萬元，員工六十八人；磨坊三個，資金一萬五千元，員工二十一人；被服廠二個，員工四十八人（資金不詳）；木廠三個，資金三萬五千元，員工七十六人；製鞋廠一個，資金一萬元，員工三十八人；造紙廠一個，資金二萬元，員工二十九人；此外還有小的機器廠、玻璃廠、酒精廠、陶瓷廠、油燈廠、製毯廠各一個（此六廠資金人員無統計，前三廠附屬在自然科學院，是實驗性質）。所有上述各廠，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直屬機關學校實行第一次精兵簡政時，重新作了調整，統歸中央管理局直接管理（中央直屬財政經濟處取消，設立中央管理局，隸屬於中央辦公廳），由二十七廠裁減合併為十九廠。特別是將八個紡織廠併為團結、實驗兩廠，使經營集中，業務改善，就由八廠分立時或虧本或僅能維持的狀態，過渡到了在一九四二年十個月中獲利一百六十萬元的好現象。

後勤系統下的自給工業，也是和中財系統一樣，從一九四〇年冬季開始的。經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兩年的經營，計有紡織廠一個，紙廠二個，炭廠三個，木工廠二個，絲織廠二個，石炭廠、精鹽廠、陶瓷廠、被服廠、毛筆廠、鐵廠、麵粉廠、鞋廠、麻織廠各一個，共十九個。這些工廠的資金員工及產量尚無統計。這些工廠雖贏利不多（一九四二年十個月贏利二十萬元），但有其極好的優點，即是：（一）他們是由後勤集中經營的，不是由各機關學校自由分散經營的，因此領導與檢查都較深入，缺點改進也快。（二）經營的部門廣，不像中財系統在開始時集中注意於紡織工業，建立了紡織廠八個之多，後勤則始終只辦一個交通紡織廠，因此有餘力多做別事。（三）完全是保證供給的性質，雖不賺錢，却解決了許多必需品的供給。

一九四二年十月，實行澈底的精兵簡政，中管後勤兩系統合併爲一，工業亦統一管理，並作新的調整，交通、團結兩廠及被服廠，撥歸財政廳；製藥廠、酒精廠、製鐵廠、玻璃廠、撥歸留守處；自然科學院亦隨該院一起撥交政府。其餘各廠則實行裁減合併，統歸中央管理局管理。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計有木工廠三個，紙廠二個，炭廠五個，鞋廠一個，油廠一個，粉廠一個，磨坊三個，大車製造廠一個，製酒廠一個，趕毡作坊三個，共大小手工業工廠作坊二十一個，可以保證中管系統全部石炭、鞋子、麵粉的供給，全部木器洋鐵器具的製造與修理，保障紙張與食油的一部份，被服則由政府負責供給。這就是中管（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前是中財）後勤兩系統兩年來在工業生產方面的積極結果。

上述經驗指明：在目前條件下，機關學校經營手工業是必要的，其目的不在賺錢，而在保障必需品的供給。但工廠不是任何機關任何學校都可樣樣去辦的，應是有計劃地按工業的性質與機關學校的情況分別地擇要地去辦，減少盲目摸索的毛病。已有工廠須按地區按機關系統，採取裁減合併及轉移

等步驟，藉免浪費，並使其能够發揚更大的供給作用。

前面說了，我們的同志對於商業，也是同工業一樣，沒有經驗的，只辦過一些合作社。現在要轉到依靠商業獲利來解決一個很大部份的供給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辦才好呢？在這個問題上，也是一個由盲目到自覺的過程。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兩年中的經營商業，是從要迅速解決困難的目的出發的，因此就不能不以各機關學校所有資金的大部份去做能圖速利的生意。

一九四〇年秋到一九四一年秋這一年中，主要的是經營百貨商業。有些機關學校利用他們原有的本小利微的合作社、小商店或小貨攤，加以擴大，增加資金，補充人員，加入商會，正式經營商業。例如兵站的交通商店，最初只是在延安七里舖兵站門口附設的一個小紙烟店。一九三九年八月，移到延安新市場，販賣百貨外，還附設了一個中藥房，一個馬掌店，資金由數百元增至二萬元。又如合作商店，是由抗大合作社改變的，一九四〇年六月搬到新市場，並在抗大三分校附設支店，資金由八十元增到一萬九千元。後勤的百貨商店，開始不過是一個資金三十元的小貨攤，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予以擴充，資金增至二萬元，除做百貨生意外，附設了一個染坊。許多機關學校原來沒有商店的，此時亦集資調人，或獨立經營，或與人合股，做起生意來了。這時各公營商店的營業主要是從綏德、定邊、鄜縣販賣百貨，特別是機關學校部隊自己需要的布疋、紙張、文具及老百姓需要的火柴、棉花等。這一時期內，延安、綏德、定邊一帶，我們機關學校設立的大小商店共有六十餘家之多，軍隊的還不在內。另有許多不設門面，靠着一二個人帶二三個四五個牲口販運貨物，沿途流動出賣，叫做『走水生意』。據一九四一年十月統計，後勤商店管理委員會所轄，就有西北商店、西北菜社、興華、合作、交通、新新、興民、民興、百貨、軍民及販賣部等大小十四個商店，中管系統則有二十個。

這一年的商業，確實靠了它渡過了嚴重難關，解決了很大的供給問題。例如中央直屬財經處與各機關學校，在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商業中，依靠一百十三個員工所開共有資金二十九萬六千八百元的大小二十個商店，獲得了二十五萬六千元的利錢，供給了各機關學校日常經費的百分之四十八。後勤系統以七十萬六千元資金在同一時期得了八十一萬元的利錢，供給了他們日常經費的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這一時期的商業有一個很大的弊病。這就是由於過份分散，沒有集中領導，又差不多都是做的百貨生意，急於要解決每一機關學校的經費困難，因而產生出來的弊病：各自為政，互相競爭，甚至違反黨的政策，影響物價與金融。同時，物價高漲，邊鈔跌落，外邊封鎖加緊，經營出入口的百貨生意，頓然顯出不景氣，各機關學校靠此維持經費亦發生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急需將機關學校的商業與軍隊的商業加以改造，一九四一年下半年，這個改造就已開始。一九四二年春，邊區初步地實行了精兵簡政，遂決定將商業完全企業化；各系統一方面整理原有商店，組織公營商店聯合會，統一對於公營商店的領導，嚴格地貫徹法令政策；另方面擴大商業範圍，進行多樣營業，例如鹽店、騾馬店、過載行、客棧、屠宰等。經營的方式亦有改變，或幾個商店合併經營；或向私人商業及合作社投資，而自己不做生意；或向政府的鹽業公司、光華商店入股。這樣一來，商店林立，互相競爭的弊病既可免除，維持機關學校經費的作用亦可恢復。例如：中管與後勤兩系統照此方針整理的結果，從原有商店三十八個，員工一九六人，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只存商店二十五個，員工一〇五人。十個月中，兩系統以八百萬元資金，獲得一千六百四十四萬元的利錢，佔了全部生產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八。又如邊區政府各廳處的生產委員會，一九四二年農商兩業的收入為六十萬元，其中商業三十五萬元，亦佔百分之五十八。又如分區及縣級機關原是以農業為主的，但至一九四二年商業亦佔了重要部份。

一九四三年財政經濟的領導實行一元化，對於貿易統一於物資局，各機關學校要澈底實行精簡，因此，各機關學校的商業必須在物資局的調節之下，分工經營土產與鹽的運輸，並以一部份資金與物資局合作，使公營商業更加合理化。

各機關學校的農業生產，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兩年亦有進步。兩年中，在糧食、蔬菜、牲畜、木炭及業餘勞動等方面都有大的成績。

在糧食生產方面，一九四一年，各機關學校有些還是完全自營，有些已改爲和老百姓夥種，有些則經營了農場（其中亦有自營、夥種兩種）。自營的方式也有所改變，不是全部工作人員上山種地了，而是以雜務人員爲基礎，配合一部份身強力壯的工作人員組織生產隊。例如後勤系統各機關的生產隊，一九四一年共種了五千二百畝糧食，中央黨校則種了八百畝。和老百姓夥種的，如中組夥種二百四十畝，二八分糧，公二私八，三七分草，公七私三，經營農場的，有邊府秘書處的兩個農場，是採夥種辦法；又有由機關學校抽出雜務人員，配備耕牛耕具，在南泥窪自己建立農場的，計後勤二，中財、中組、青幹各一。各分區及各縣的機關，則採取了自種、夥種並用的辦法。

一九四二年，精簡實施，延安許多機關學校實行合併，因此，除菜蔬自給外，糧食只取農場與夥種兩法。

夥種雖帶剝削性質，但老百姓特別是移民難民十分願意，因爲公家供給了種子、耕牛、農具，租率又不算重。這種辦法對於獎勵移民，調劑勞動力，是有作用的。舉黨校爲例。『黨校總務處與四個移民合夥種一百垧地，老百姓四個勞動力都很強，黨校出一人負領導檢查之責。其辦法是由黨校供給農具，每人一鋤一鏟一鐮，借牛二頭，並給種子。另借食糧，每垧細糧四升，百垧四担，言明秋後歸還。收穫糧草，規定穀子二八分，公二私八；糜子三七分，公三私七；雜糧四六分，公四私六；草則

全歸黨校。是年黨校計收草一萬零五百斤，穀子八担三斗七升，糜子十担一斗七升，黑豆六斗九升，小麻子四斗二升，老麻子一斗，小豆二斗。共合邊鈔三萬一千九百二十五元。四個老百姓則收穀子三十三担四斗八升，糜子二十二担四斗，黑豆七斗五升五，小麻子六斗三，老麻子一斗五，小豆三斗，共合四萬六千八百零五元。這是公私兼顧的好辦法。』

建立農場亦有新經驗。因為機關學校抽出的人員勞動力不强，工作時間有限制，農業技術又不熟練，如專事種地，反而虧本。一九四二年採取下列兩法：一是自營，除種糧外，兼營副業，如養牲畜、製木板等，正和三五九旅所採辦法相同。一是夥種，將已有基礎的農場和老百姓夥種，自己另闢新場。新場第一年無利得，第二年就有了基礎，又可和人夥種。舉邊府秘書處為例。據邊府秘書處同志稱：『我們有東南兩農場，地畝、經營法、收穫量都大致相同。一九四二年南場種川地九十六垧，熟山地一百零八垧，新開荒一百三十六垧。共收粗糧二百四十四担，因是豆子玉米居多，折成細糧一百四十六担四斗，每担以一千三百元計，折鈔十九萬零三百二十元。又收乾草一萬四千斤，值一萬四千元。又收菜二萬斤，值二萬元。三項共計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元。原有羊一百二十八隻，一九四二年新下羔羊長成八十一隻，值一萬元。喂豬賣了三千四百八十二元，還有十三個豬，每個以四百元計，值五千二百元。以上各項共計二十四萬三千零二元。支出方面：我們是採取安夥子辦法，所以一切開支，均從收穫量分配，連我們派去的四個人的一切開支也包括在內。安夥子十二戶，共四十五人，內全勞動力十九，半勞動力十三，無勞動力的小孩十三。共分去粗糧六十八担，折細糧四十担零八斗，每担一千三百元，共五萬三千零四十元。又分去草七千斤，計七千元，二項共計六萬零四十四元。自己五個人（一個是殘廢管總，兩個做飯、種菜、帶種莊稼，兩個攪羊、打雜），四個牛，一個驢，五個狗，共支食用糧三十担，折細糧十八担，計二萬三千四百元。食用油五十斤，每斤二十六

元，計一千三百元。此外，農具修理、犁、服裝、津貼等計二萬元。以上共計十萬四千七百四十元。南場共收二十四萬三千零二元，共支十萬四千七百四十元，兩抵餘十三萬八千二百六十二元。加上東場約十一萬餘元，兩場共收約二十五萬元。這兩個農場，名義上是秘書處與民、財、教、建四廳合辦的，實際上只拿出十個人，其中兩個是僱工，一個是殘廢，七個是編餘人員。政府有個生產委員會，管理兩農場，實際也只有二人經常辦事。本年因遇水災、風災，少收糧食約一百五十担，值十一萬七千元。還有買來的蘿蔔，白菜種子受了騙，是假的，損失約三萬元。二項共計十四萬七千元，兩場合計損失約二十萬元。這就是說，如果不遭天災，不買假菜種，還可多得二十萬元。民、財、教、建、秘五機關工作人員共四百，對於二十五萬元收入，平均每人有六百二十五元。若以秘書處一百人來說，則平均每人有二千五百元。農場今年收成雖差，但打下了明年的基礎，又解決了十二戶移民的生活。同時依靠這個基礎，明年準備在南場擴大耕地三百垧，藉以安插編餘人員。原兩農場仍取安夥子辦法。』

各縣機關糧食生產的方法，也是自種夥種兩種。例如延安縣一級機關共種地二百一十垧，其中九十餘垧招了兩戶安夥子的，有五個勞動力，縣委只拿出二人在農場工作。其餘百餘垧地，則由犯人耕種。一九四二年除安夥子分出者外，共收粗糧七十五担，合細糧四十五担，值五萬八千五百元，加上草值三千元，共計六萬一千五百元。

以上各例證明，自營、夥種二法兼用是正確的，一九四三年的糧食生產任務，應注意此項經驗。農業經營中，極大一項任務是種菜，因為食糧還有公糧可領，菜如不種，則二萬餘人將處於半飢餓狀態；『無菜半年荒』，是確確實實的。

過去兩年的菜蔬生產方式，是配備專門種菜人員，再配合機關學校中一部份輔助勞動。過去每年

平均自給了三個月到半年的菜蔬。據後勤統計，他們各機關學校，在一九四一年共種菜地一千八百零一畝，計洋芋地一千零三十畝，白菜豆角蘿蔔雜菜地七百七十一畝，此七百七十一畝地到秋天又種秋白菜、秋蘿蔔，全年收穫各種菜蔬八十七萬九千斤，平均約供給全年菜蔬的三分之一。據中管統計，一九四二年中央直屬各機關學校配備了種菜人員四十名，所種菜地，計有川地三百八十八畝，山地一千九百四十一畝，共收各種菜蔬七十四萬五千斤，平均自給了五個月的菜。其中管理局本身自給了九個月，延大及自然科學院均自給了八個月，中央研究院及文抗均自給了七個月。各個機關人員的菜蔬生產，各有不同情況。如關中因氣候關係種得很少，平均只能自給菜蔬三個月。警備區因土地缺乏，也只能自給二、三個月。有些則因有地，且可和人夥種，如華池、志丹等縣，則可做到自給半年以上。全邊區機關學校的菜蔬自給，估計當在六百萬元左右。

這裏的問題是：機關學校在編制之外，另外配備生產人員種菜的辦法究竟是否合算呢？根據中央直屬各處的經驗，證明是合算的。種菜最好是川地，各種青菜均可種，山地只能種洋芋豆角。川地一畝種菜，可供五個人全年食用，即每人只須年種菜地二分。山地却需一畝半，才能供一人一年之用。而一個專門種菜的人，只要施肥時有些輔助勞動，可種川地六畝。這就是說，一個專門種菜的人，配合一部份輔助勞動，可供三十個人的全年菜蔬。以每人每天需菜十二兩計，每年需三百斤，三十人需九千斤，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延安市價每斤三元，共值二萬七千元，而一個專門種菜的人年支約六千元，可餘二萬一千元。加上必要的獎勵費，至少可獲二萬元。因此今後各機關學校在澈底精簡後，應注意調劑川地種菜，配備種菜人員，加上輔助勞動，保證自給蔬菜一半以上，乃至完全自給。

農業方面，除糧、菜外，飼養豬羊，解決肉食，也是很要緊的。

有些人以為喂豬浪費糧食，但是我們的經驗證明，不是喂豬浪費糧食，而是不喂豬浪費糧食。一

則無猪必拋棄剩飯剩菜，而這項剩飯剩菜，在大的機關及連隊裏是相當多的。二則吃肉少則吃飯多，吃肉多則吃飯少。故喂猪增加肉食，不但爲保持健康所必需，且在經濟上亦是合算的。各機關學校過去創造了許多喂猪辦法，例如中央黨校指定殺猪房每天派專人到廚房來收集淘米水及菜屑喂猪；中央總務處指定專人收集碾米留下來的米屑，收集菜園收菜時拋棄下來的菜葉菜根以供猪食等。據後勤統計，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後勤各機關喂猪得肉五萬六千八百十四斤，照當時市價值十七萬零四百四十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一斤猪肉。加上下半年，全年約值三十五萬餘元。據中管統計，中央直屬各機關學校，一九四二年至十月止，平均每月養猪二百六十五頭，十個月共賺二萬三千三百三十餘斤大稱的猪肉，合邊鈔七十萬元。又如延安縣一級機關，一九四二年十個月喂猪，賺了一萬元。全邊區機關學校飼養牲畜一項生產，照此計算，總值當在四百萬元以上。

喂猪之外，如有牧地，養羊也是有利的。

一九四三年澈底精簡後，可酌採三五九旅每四十人配備一個伙伕及節減勤務員的辦法，將編餘伙伕勤務配備到生產戰線上去，可做種糧、種菜、養猪、養羊等許多事情。辦大牧場從事大的畜牧事業，應於一九四三年提到重要地位。

糧、菜、畜三項之外，還有燒炭與業餘勞動二項，也是值得注意的經驗。例如一九四二年冬用木炭，在延安各機關學校中，完全是從本機關本學校抽出人員組織燒炭隊上山燒炭來解決的，如用錢買，則所費又是一個很大數目。如中央總務處，九月間即抽勤務員、伙伕、馬伕四十二人，組成燒炭隊，上山伐木燒炭三個月，共燒木炭一百四十五窰，完成了十四萬斤木炭的任務，每斤以一元二角計，值十六萬八千元。如以全邊區機關學校三萬人，冬春四個月，平均每日每人燒木炭一斤計，共需木炭三百六十萬斤，值三百六十萬元，如不自己燒炭，那裏去找這一大筆經費？

還有各大機關學校雜務人員的業餘勞動，也很值得注意。例如中央總務處，今年動員雜務人員修理房屋、建造圍牆、架橋、修路、割馬草等，共替公家節省了十一萬餘元。中央黨校雜務人員的業餘勞動，替公家節省了十三萬九千餘元。三五九旅一切修造都不請工，各機關學校亦應盡可能照辦。一切本機關本學校的人能做的，均應動員他們去做，單以雜務人員從事業餘勞動一項來說，若全邊區機關學校都實行起來，就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對一切生產有成績的人都應給予獎勵，對業餘勞動者也是如此。

以上就是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四個年頭邊區各機關學校生產自給經驗的總結。

據從事經濟工作的同志稱：中管後勤兩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兩年中，從事農工商各業的資金由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七十七元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九萬元（此數中包括由貨幣跌值的增加數很大，非盡由於生產增值）。一九四二年一年的生產盈餘共計二千三百八十一萬元，此數除以二百三十三萬元擴大一九四三年生產資金外，其餘二千一百四十八萬元完全用之於彌補各機關學校的伙食費、被服費與辦公費。就企業分別說，農業佔百分之十七，工業佔百分之八，鹽業佔百分之七，商業佔百分之六十九。就機關分別說，後勤直轄各業所得八百四十萬元，中管直轄各業所得三百五十萬元，後勤與中管合併後所得八十萬元，各機關學校自己生產所得一千一百一十萬元。若將生產自給數與人民供給數相比，則前者佔百分之五十七·五，後者佔百分之四十二·五。又據邊區縣級同志稱：縣級黨政經費每月約一萬元，自己生產自給約九千元，上級只發約一千元，前者佔百分之九十，後者只佔百分之十，則是更大的成績。

總之，所有延安及全邊區各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們不但供給了日常經費的大半，解決了迫切的財政困難，而且奠定了公營經濟的基礎，使我們能够依據這個基礎繼續發展生產，

解決今後的問題。

特別重要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我們學得了經營經濟事業的經驗，這是不能拿數目字來計算的無價之寶。我們不但應該會辦政治，會辦軍事，會辦黨務，會辦文化，我們也應該會辦經濟。如果我們樣樣能幹，惟獨對於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

根據五年來特別是最近兩年的經驗，今後機關學校的生產必須加以改進，發揚其成績，克服其弱點，向着健全的道路上發展，完成更大的生產自給任務。一九四三年應採取如下各項方針：

(一) 實行以農業為主。

(甲) 按照各系統各機關學校的具體情形，採取下列辦法，經營農業：(1) 無農場基礎的，應馬上動手置備耕牛、農具，或自種，或與人民夥種，收取糧食與蔬菜。(2) 有農場基礎的，除繼續農場生產外，應擴大經營範圍，安置編餘人員，多營副業，如養豬羊、喂雞鴨、鋸木板等。並同老百姓合夥，增闢新的農場。在這種種辦法之下，務使一九四三年的糧食生產比之上年又多又好，不得以爲農業迂緩採取忽視態度。

(乙) 一切大小機關學校均應配備必要的專門從事種菜的人員，輔以工作人員及學生的輕勞動，按不同地區，不同氣候，自給蔬菜六個月以上，並極力爭取完全自給，這是改善生活的重要步驟之一。

(二) 調整與發展各種手工業。按地區，按系統，按精簡原則，將各部份已有相同的手工業，改爲合股經營。同時根據各地區各系統的需要，建立新的手工作坊，如榨油房、醬園、炭窯等。經營這些手工業的原則：第一必須工場本身能自給；第二必須能獲利。

(三) 發展畜牧業。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都應養豬，盡可能做到按三五九旅平均每五人養一個豬的

辦法，增加肉食，要把增加肉食、改善生活、增進健康看成是極重要的事。此外，各大的機關學校，尤其是軍隊，應抽出資金，在三邊、隴東、金盆灣等地，選擇不妨礙人民利益的地點，經營牧場，大批地畜養牛羊驢馬，準備於抗戰勝利邊區鹽業衰落時以牲畜出口代替之。

(四) 發展運輸業。徹底精簡後，只留少數牲口保障各機關學校自己所需糧草的運輸，一切多餘牲口，加上可能置備的牲口，一律組織運輸隊，從事運鹽運貨。此項運輸業，以能按地區按系統統籌辦理，藉以減少浪費為最好。

(五) 整理商業。在商業為輔的方針下，按照不違反貿易政策、不做投機生意的原則，按照各系統各單位精簡後的情形，實行商店的合股經營和疏散經營，取締違反政策的商業，關閉無利可圖的商店。各系統應從商業資金中抽出必要部份轉入農業、畜牧業、手工業與運輸業諸方面，着實打下從農工畜運各業解決自給任務的基礎，不得猶豫。

(六) 應將改善機關學校工作人員、雜務人員及學生們的生活看作重要的事情，各機關學校負責人為此應想種種辦法。應提倡與指導雜務人員、工作人員、有孩子的母親，在不妨礙工作、學習及身體條件下，在自願原則下，進行某些手工及農作的生產勞動，但不得從事商業。此項生產勞作方式，依其自願，或組織大的生產合作社進行之，或組織生產小組進行之，或個別地進行之；公家應酌予貸款作資金，其收穫均歸參加勞作的人所有。凡對此事辦理最好、成績最優的負責人，均應得到獎勵。凡對本機關本學校經理不善，因而使本機關本學校的工作人員、雜務人員、學生、母親、孩子、病員、休養員生活太苦的那些負責人；或雖改善了生活，而其方法不正當，妨礙了工作學習，破壞了政策法令的那些負責人，均應受到批評與責備。

(七) 實行統一領導。切實執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所有中央一級，邊區一級，專區一

級，縣署一級，均應建立關於統一一切生產事業的强有力的領導機關，按系統按級統一企業經營方針，統一調整各企業相互間的關係，統一檢查各企業的經營方法，並在允許以相當收益歸各生產單位所有的條件下，在各相當範圍內，按照生產性質與經營情形，統一支配生產贏利，務必免除各自為政，盈虧不一，苦樂不均的弊病。

(八) 一切農工畜運商業實行企業化，建立經濟核算制度（見本書第八二二頁），各企業工作人員及僱員的伙食被服薪津由各企業自給，不得再由公家担負。

(九) 一切生產機關（工廠商店等），不論是政府的、軍隊的、或機關學校的，均應實行群眾化。除生產任務的分配，生產的管理與檢查，生產結果的處理等以外，一切均受地方黨政領導，連支部生活在內，一切生產機關的人員，要執行政策，守法納稅，脫掉軍衣，穿上便服，參加地方群眾活動，做邊區的模範公民。

(一〇) 由財經辦事處及分區財經委，按各縣系統下各機關學校的具體情況，給各系統下各機關學校以一九四三年的具體生產任務，審核與檢查其生產計劃，將所有各系統下各生產單位一切列在計劃內責其完成的生產結果，列入財政收支，計劃以外的多餘生產則歸各生產單位所有，作為改善生活之用。對於生產不足的單位上級應予補給。一九四二年有虧空的，應速審查予以填補。

(一一) 本書第八章『關於發展軍隊的生產事業』中所指出的四個缺點，均適用於機關學校，一切犯有相同弊病的機關學校，必須注意糾正。

(一二) 要向一切在農業、工業、畜牧業、運輸業、商業以及業餘勞動中的勞作人員（包括僱工及夥種的老百姓）說明：他們的勞動都是為着革命的，他們做了十分光榮的事業。從他們勞動所得中分出一部份來交給公家，完全是幫助我們自己的光榮的神聖的革命事業。並不是為着任何個人增殖私

產。凡在公營經濟中做事的公務人員，如果他爲他自己個人圖謀特殊利得，在我們隊伍中就叫做喪失道德的行爲，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貪污罪。而一切不貪污、不浪費、忠心耿耿、爲黨爲國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應受到黨與政府的稱讚及獎勵。在軍隊中，應將這點向戰士說明。

(二三) 一切做經濟工作、財政工作、供給工作、總務工作的人，只要他們是不貪污，不浪費，忠心耿耿，爲黨爲國的，均應受到尊敬。而一切對於他們的工作採取輕視或鄙視態度的人，應當受到批評與責備。

一〇 關於糧食工作

我們已將我們的經濟工作論述完畢了。我們的經濟分爲民營公營兩大部門，民營經濟包括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合作社事業與鹽業，公營經濟包括政府的、軍隊的、機關學校的三類，所有這些，我們都已經講過了。沒有講到民營經濟的商業方面，這是因爲這一方面目前還缺乏必要的材料根據，只好暫時不去講它。現在要講的是財政問題。我們也不準備講有關財政的一切問題，只講其中的三個問題，這就是：(一)糧食問題；(二)稅收問題；(三)節約問題。

我們的財政供給是從取之於民與取之於已這兩方面來解決的。取之於已這一方面的財政工作，就是三部分公營經濟在其生產過程完畢之後轉到分配過程時的分配工作即供給工作。我們的公營經濟既是我們的財政供給的第一個基礎，它在我們整個財政供給方面，依一九四二年的情形看來佔着五分之一的地位，那末，我們的第一個財政工作就是對於公營經濟生產結果適當地進行分配的工作，這個問

題，我們已在論述公營經濟時附帶地說過許多了，其未詳部份，現在也無暇多說，留待將來再研究。現在要講的是我們財政供給上的第二個基礎——取之於民這一方面，這就是糧食與稅收。還有一個節約問題，則是關係取之於民與取之於己這兩方面的，是關於整個已經取得的生活資料與事業經費如何適當分配與適當使用的問題，故是一個重要的財政問題。這裏講的糧食問題也不是指全部糧食問題，僅是指的糧食稅。它也是稅收的一種，因其關係整個軍需與公需，關係全邊區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與共產黨八路軍邊區政府之間的相互態度，故值得從稅收問題中特別提出來，並且首先來講它。

邊區一百四十萬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民，地主與商人不到百分之十的數目。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約有一半以上是分過土地的，一半則未分過。我們用盡力量使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個目的是使農民富裕起來，改善他們的生活；第二個目的，是使農民有力交付糧食稅，幫助抗戰的需要；還有第三個目的，是使農民在取得減租利益之後，發展農業生產，能够以一部份交給地主作地租，因而便於團結地主和我們一同抗戰。要達到這三個目的，只是作一件事，就是用盡力量使農民發展農業生產。農業生產愈發展，農民每年收穫農產品及其副產品的數量愈增多，則其交給政府的糧食稅的數量在其收穫總量上說來就可愈減少。我們提議從一九四三年起，每年徵收公糧十八萬担。以後若干年內即固定在這個數目上，不僅在目前全邊區糧食總產量約一百五十萬担時是收這個數目，就是由於生產發展，總產量增至更大的數目時（據許多同志估計，就現有勞動力加以調劑，能使邊區糧食總產量達到二百萬担），我們也只收這個數目，這個數目以外的一切增產概歸農民，使農民好放手發展自己的生產，改善自己的生活，豐衣足食，穿暖吃飽。

我們全邊區的同志必須學習延安縣同志們那樣用盡全力替農民謀利益，使農民很快的富足起來。農民愈富足，則其交納一個固定數目的公糧也就愈覺得不在意下，愈覺得共產黨、八路軍、邊區政府

是和他們完全一致，分離不開的，延安縣的農民吳滿有就是明顯的證據。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的『解放日報』載了一篇關於延安縣農民吳滿有的新聞，這篇新聞是這樣講的：

模範農村勞動英雄吳滿有

連年開荒收糧特多影響群眾積極春耕

〔本報特訊〕在春耕運動中，農村勞動英雄不斷出現，他們爲着熱愛邊區、鞏固邊區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表現着高度的勞動精神。其中尤以延安縣柳林區吳滿有，最爲一般農民所欽佩。他每年的收穫量，要超過其他農民六分之一。全家兩個勞動力，種地四十餘畝，今年開荒三十五畝，現已爲該鄉農民公認爲模範的勞動英雄。據昨晚最後獲息，邊區政府建設廳已決定予以嘉獎。

〔本報延安通訊〕延安縣柳林區第二鄉吳家棗園農民吳滿有，連年春耕積極，莊稼得法，人家平常每畝地打糧平均五斗，他種的地每畝却打糧六斗。今年在政府努力春耕的號召下，他說：『我受過革命的好處，我忘不了革命，我真心愛着邊區，同時爲了自己更過好日子。』因此就加倍努力開荒；並且影響了群眾，造成該村熱烈的春耕運動。延安縣的農民誰都知道，今年種的最好的，就是吳滿有的一鄉。吳滿有今年原計劃開荒三十五畝，在沒有下雨之前，已經開完十五畝地，雨後更是積極。他說：『十天之後，就可墾完，如時間來得及，還可超過。』另外百來畝熟地，有的已經下了種，有的已經翻了地。吳家棗園所有居民以及該村村長，該鄉鄉長，該區區長，都一致稱譽他是『模範春耕英雄』。現該區區政府已呈請上級獎勵，邊區政府聞亦擬即切實調查，予以適當的嘉獎，以資鼓勵。

〔本報延安縣訊〕春耕運動期間，勞動英雄出現了很多；但究竟誰做莊稼最好，記者爲明白這個問題，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親至各地農村訪問，現在已找到衆所公認的標準勞動英雄。這位勞動英雄姓吳，名喚滿有，今年四十九歲，生就一個大個子，精強力壯。土地革命前是一個農，那時吃樹葉，吞糠粃，砍柴『受

苦』（給人家做工），把賺來的錢，向當地的豪官富紳繳付捐租，自己却常常餓肚皮。土地革命後，就參加革命，分得山地一架，約四十餘畝，合一百二十餘畝。從此自由種地，連年積極墾荒播種，畜牛哺羊，現在全架山地，都已經變成了熟地；並且還有兩條犍牛，三條母牛，一百多隻羊。光景越過越好，娶媳嫁女，衣暖食飽。去年已由政府鑑定，家庭成份已從貧農上升到中農了。他常常說：『想想當初，再想想現在，我怎能忘記革命的好處，忘記邊區的好處呢？』

〔本報延安縣訊〕模範勞動英雄吳滿有，他和一般農民一樣種莊稼，為什麼收糧比人家要多呢？據他莊子上的農民說：第一，起身比誰都早，睡眠比誰都遲；天還沒有亮，他就喂牛上山；天已黑了，才從地裏回來；真能受苦。第二，冬天沒啥事做的時候，勤於拾糞，自己又會養羊養牛，肥料比人家多，他每畝地平均要上七畝糞。第三，莊稼出了苗的時候，有的農人怕上山，不鋤草，或者最多鋤一次，他却至少鋤兩次，穀子自然就長得旺。第四，地耕得深，別個農戶一般的都是鋤土五寸深，他却至少七寸深。第五，打土的時候，一定打得很碎，不馬虎。第六，耕地下種，都很適時，不早也不晚。因為他有這些優點，所以每畝地最高收穫量老斗一石二斗（市斗等於一石八斗），最低收穫量也有老斗四斗（等於六市斗），平均扯每畝地要打糧老斗六斗（等於九市斗），別個農民每畝地平均只收糧老斗五斗（等於市斗七斗半）。從平均的收穫量看來，他就是比別人多打糧六分之一。

〔本報延安縣訊〕模範勞動英雄吳滿有，不僅是種莊稼的模範，還是一個模範的公民。去年他收小麥十八市担，粗糧二十七市担（合細糧十六担二斗），却繳了公糧十四担三斗，公草一千斤，公債二次一百五十元，公鹽代金六百六十五元。莊上的人對他說：『老吳哥，你出的太重了，減掉些吧！』他却說：『革命時期，八路軍保衛咱們的邊區，人家在前方流血，我們不過只多流些汗，虧你還好說重？』於是大家就佩服他的見識，踴躍向公家送糧了。今年從上面移了些難民在他莊子上住，他借糧借鋤頭給他們，幫助他們找得荒地，並且經常在物質上精神上鼓勵他們開荒種地。平常在莊子上也是最公正的人士，在老百姓中間的威信很高，大家都相信他。去年五月被選做鄉參議員，又被選做鄉上的優抗主任。他有一個兄弟在八路軍裏做戰

士，他原來也是抗屬，但他謝辭了公家的優待。他說：『打仗是中國人的責任，沒啥稀罕。我有的吃，還要什麼優待？』但他對於優待鄉上的其他抗屬，却做得非常週到。同時，他分配的動員任務又很公平。全鄉有抗屬十二家，今年代耕土地就分配了二百一十畝，家家都感激他。全鄉的人沒有一個不說他好。

〔本報延安縣訊〕吳家棗園，一共有十四戶農家，十四戶家長，講到吳滿有是不是稱得起一位模範的勞動英雄的時候，大家一致都撓起了大姆指：『老吳呀，還有啥話說的，受苦第一，他不當英雄誰配當英雄？』

六月二日『解放日報』又有一條新聞：

由於勞動英雄吳滿有所起的影響，吳家棗園原計劃開荒四十九垧，現在已完成七十五垧，吳滿有本人又增開了荒地五垧。全鄉（柳林區第二鄉）在獎勵吳滿有之後，增開荒地一八〇垧。

十月二十九日『解放日報』又有這樣的新聞：

今年糜子最算豐稔，吳滿有村子上一般每垧約打五斗至六斗，但是他却打到八斗（均四十五斤大斗）。一般農民每担粗糧碾成三斗或四斗，他的粗糧却始終保持對折細糧的紀錄。吳滿有也時常學着宣傳的口吻對人說：『你們要想莊稼和我的一樣好，大家就向我學吧——我沒有什麼祕訣，就是肯勞動。』

吳滿有已是一個富裕農民了，他因為得了過去蘇維埃政府與現在邊區政府的利益，他已把他自己的命運與共產黨、八路軍、邊區政府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了。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還有許多同志的頭腦沒有變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他們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爲了革命，爲了抗戰，我們向人民要東西是完全合理的，我們同志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們應做的革命工作，這是很好的。但這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而且還不是第一個方面的工作。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

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的東西。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在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爲着這個，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安家計劃、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並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個在農村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第一位工作。只在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並確實生了成效之後，我們去做第二方面的的工作——向人民要東西的工作時，我們才能取得人民的擁護，他們才會說我們要東西是應該的，是正當的，他們才會懂得他們如不送出糧草等等東西給政府，則他們的生活就不會好，就不會更好。這樣我們的工作才不是勉強的，才會感覺順利，才會感覺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這就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每個同志（軍隊的同志也在內）都要好好去研究。只在我們的同志懂得並且實行了這樣兩方面工作的配合時，我們方能算得上稱爲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否則我們雖也在做革命工作，雖也是一個革命家，却還不是一個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對於某些同志說來，他們還是一個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者，因爲他們只知道向群眾要東西，却不知道或不願意給群眾一點東西，引起群眾討厭他們。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並向全黨宣傳這個道理。

下面，我們就來總結我們過去糧食工作的經驗，並指出一九四三年的方針。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邊區所徵公糧只負一部份的供給任務。每年不足之數，都靠政府撥款採購。四年當中，除了個別地區，或在某一個時間內，糧食上曾有過困難外，整個糧食供給，還沒有感到不可克服的困難。在這四年中，確實休養了民力。那時公糧偏重於富農地主的負擔，中農很

輕，一般貧農則完全無負擔。一九四〇年外援斷絕，政府已無力購糧，必須轉爲全部徵稅。但因當時『量入爲出』的原則未變，一九四〇年公糧任務還只提高到九萬担。徵收政策亦未變。對於下年（一九四一年）的供給則提出了『加強糧食管理，保證糧食自足』政策。因一九四〇年徵糧不多，全部供給實不可能。再加上一九四一年經費自給的關係，各部隊機關爲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都向糧食上打主意。另一方面，又因糧食工作部門的組織機構還不健全，幹部質量差，各種制度未很好建立，亦不可能掌握各地糧食收支。當時浮報冒領現象非常嚴重，人員增減無常，各種臨時額外開支過大。一九四〇年徵的公糧，供給到一九四一年三月。部份地區已無糧吃。不久，各地糧食普遍發生恐慌，先後買糧一次，借糧兩次，才支持到十一月。如要保證一九四二年供給和歸還一九四一年借糧，估計非有二十萬担不能渡過難關。此時糧食問題已成爲財政上的最嚴重問題。經過黨與政府的再三研究，根據當時已轉變的『量出爲入爲主，量入爲出爲輔』的新的收支原則，決定徵糧二十萬担，徵草二千六百萬斤，以保證一九四二年的供給，並還一九四一年的借糧。此時在徵收政策上，爲了保證完成二十萬担公糧的任務，並照顧各階層的利益，擴大了徵收面，中農負擔提高，貧農已開始有了負擔，糾正了過去偏重少數富有者的現象。供給政策，則因過去各縣倉庫糧賤從未清算，一九四一年買糧借糧手續極爲混亂，增加了清算糧賤的困難，糧食局深恐因舊糧不清影響新糧，乃確定以『掌握新糧，保證供給』爲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方針。根據一年來的事實證明，雖然我們在執行中還有些不够，但政策本身是完全正確的。一九四二年的公糧減爲十六萬担，公草減爲一千六百萬斤；徵收政策上亦稍減輕了貧農的負擔；並準備於一九四三年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以代替公糧方式。同時，爲了提高農民生產情緒，一九四二年並借給農民一部份公糧公草，幫助他們解決春耕困難。供給上主要是掌握糧草保證供給。

在徵收工作方面：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每年只徵公糧一萬担，群眾負擔極輕，均踴躍繳納。一九三九年，公糧任務提高到五萬石，政府頒佈了新的徵糧條例，派工作團下鄉進行調查，按條例徵收。但在實際上，五萬担公糧，群眾負擔仍是極輕，幹部又習慣於民主攤派一法，調查工作極其馬虎，所謂按條例徵收，仍是一種形式。一九四〇年，仍復如此。一九四一年公糧任務突然提高到二十萬担，政府才又慎重修改了條例，財廳派了大批工作團去各縣，配合縣區政府，進行比較深入的調查，使群眾負擔合理。此次徵糧，強調了『深入調查』與『執行條例』。在一九四一年徵糧總結中，完全得到證明。調查工作做得好，執行條例便容易。例如甘泉縣對調查工作認真，他們便執行了條例和徵收率。曲子縣進行了三次調查工作，他們便能使負擔公平合理。又如華池縣白馬區二次分配沒有完成任務，後來徵糧工作團團長王同志，親身調查了一個鄉作經驗，結果全區超過幾十石。調查工作不好的，如警備區，便不能按條例執行。一般地說來，各縣幹部對於調查工作仍很輕視。一九四一年徵糧做到深入調查的只少數縣份，大部份仍是採取民主攤派的老方式。一九四二年徵糧又接受了一九四一年經驗，將條例重新加以修改，使它更能切合實際。並以一九四一年的調查材料作根據，進行更深入的調查。財廳指示徵糧幹部必須按條例執行；如果有些地方按條例執行確實不能完成任務時，再配合使用民主攤派方法。同時，在此次徵糧中，從思想上教育幹部，克服了過去粗枝大葉的工作作風和幹部本身要私情、打埋伏等落後行為。根據最近隴東報告，又一次證明深入調查對於執行條例的重要性。慶陽縣有一個區經過深入調查，因本年開荒很多，農產增加，按條例執行可超過幾百担。

其次，歷年徵糧，在徵收數字上都完成了任務，而且都是超過。可是入倉工作做得太馬虎。許多徵糧幹部以為只要數目字完成，不問質量，不查尾欠。因此一則質量太差，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穀皮者；二則造成群眾拖欠公糧的現象，徵收數和入倉數之間有了一個距離。一九四一年徵糧，質量雖

有所提高，但夾帶穀皮之米仍屬不少。又提出了『粒米入倉，根草入窖』的口號來克服拖欠現象，但仍做得不够；再加上一九四一年公糧比過去任何一年爲多，增加了入倉階段的困難；因此一九四一年公糧沒有入倉的還有三千九百餘担，將近於全部徵收數的百分之二。一九四二年徵糧時，特別強調了抓緊入倉的問題。根據最近檢查，本年入倉工作比上年做得好些，但能否全部入倉，還須等將來總結後才能回答。

再其次，歷年徵糧，都由財廳派工作團去幫助縣區政府工作。這種辦法，在縣區幹部太弱的條件之下，是有很大作用的。缺點是容易養成下級政府的倚賴性。而且每次動員工作，都須上面派人，幹部往返，在路途奔跑，亦造成了人力與時間的浪費。一九四二年徵糧，因爲有一九四一年比較好的工作基礎，在派遣工作團方面，財廳採取了少而精的原則，各縣少派幹部，加重了縣區政府的責任。一九四一年派下去一百五十人，調查工作有點基礎。一九四二年所派還不到四分之一。準備由此過渡到不再派人，完全交給縣區政府去徵收。

在供給工作方面：一九四一年的糧食供給，由於沒有掌握總的收支，以致兩次借糧，一次買糧，動員頻繁，近於苛擾，引起群眾不滿，這是一大缺點。一九四二年已能掌握收支，並有一九四一年的二十萬担公糧作保證，本可供給到十二月。但由於精簡不徹底，預決算不能嚴格執行，各種臨時支出連同未收齊的公糧尾欠，共達一萬八千餘担；再加上部隊移動，影響到各地供需關係；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糧食調劑，又未能完成任務；因此，七月以後，延安、南泥窪、臨鎮各地，即已陸續缺糧。後來，一面由財廳撥款二百萬元補助購買，一面採取夏徵的辦法來補救，才避免了一九四二年的糧荒，對群眾尙無不良影響。其次，一九四一年公糧採取整撥分管的辦法，雖然節省了往返運輸的麻煩與浪費，但另方面造成了亂賣糧食的現象，這裏面浪費很大。還有徵收與供給的脫節，亦發生了許多缺點。例如

一九四一年分配給各縣的公糧公草，偏重了收成情況，忽視了供需情況。三邊全年需糧一萬多担，一九四一年只徵糧一千六百担，有九千担糧要從隴東、安塞、子長、志丹等縣轉運補充。一年來不但運糧各縣群眾反映過重，即三邊群眾亦因轉運繁忙，喊出『這樣辦法還不如向我們多徵些好』。現在計算，只隴東運三邊的四千担糧，即需腳費七百萬元，比在三邊買糧花錢還要多。又如延川徵的糧，本應供給延安；可是一九四一年延川東陽區的糧，集中到相反方面的靠近黃河的馬家畔倉庫，使延安運糧要多走三天路。其他各縣類似情形，亦不在少。又如一九四一年徵收公草，沒有周密的研究計劃，決定公草普遍隨糧徵收，沒有注意到供需，因而使得地方存草沒有用處，任其損耗霉爛，引起群眾不滿。另一方面，需草多的地方，却又異常缺草，只供給到八個月。又如一九四一年關中徵糧，不以麥子爲本位，硬要小米，群眾只好到邊區外面糴麥買米交公糧，結果收米太多，部隊吃不慣，常起糾紛；入夏以後，小米又易霉爛，更加麻煩。又如一九四一年的正雜折合率，也因不估計各地產糧情形與供需關係，把它一般化，使得有些地方（如警備區）徵收雜糧很多，發不出去。有些地方（如延安）需要馬料，却又找不到雜糧，各機關不得不降低折合率，用細糧去換，倒轉過來造成了糧食的浪費。以上這些缺點，說明了糧食工作是很具體很細密的實際工作。如離開實際粗枝大葉地去做，不但擾民，而且誤公。一九四二年徵糧工作交給糧食局主辦後，已將徵收與供給統一起來。同時根據各地不同的供需情況，酌收公草代金，以資調劑。至於折合率，亦由過去的一般化，轉變爲根據各地具體情況來決定，克服了以往的缺點。

其次，從一九四一年冬天到現在，糧食供給，在建立與健全制度方面，曾獲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例如在預決算制度上，一九四二年，大部份機關已能按時編造，廢除了大部份浮報多領與吃雙份糧的陋習，糾正了各縣隨便批准預算、亂支公糧的現象。特別是把握『決算不超過預算』，一九四二年一

年認真核減了各種不合理的開支，共節省糧食一萬九千餘担。在支糧制度上，一九四二年，絕大多數部隊機關已經遵守沒有支糧證不能支糧的制度。各縣負責同志也已注意這一制度，不亂批借公糧。同時，一九四二年各縣已能做到統一地使用公斗，這也減少許多糾紛。在倉庫制度和會計制度上：由於幹部條件的限制，倉庫制度只能先從加強中心倉庫做起，由此逐漸普及到各個倉庫。會計制度，則由財廳製定了兩種標準賬簿（一新式較精細，一中式很簡單），由幹部根據自己能力採用。一九四二年大部份倉庫，好歹都有了賬簿，已能逐漸達到倉庫糧食收支、存糧數目和種類隨時得出統計的目的。在糧票制度上：因為一九四一年發行大批糧票，發生很多流弊，一九四二年廢止舊糧票，從新發行三種小型飯票，只供機關人員往來吃飯流通，也是一個進步。

但在糧食供給方面，仍有許多缺點，例如：少數大單位還不能按規定時間編造預決算；各大單位實有人數和所編預算作比，還有不少空額；部份吃雙份糧的現象，仍然存在；牲口比額沒有明確規定，其中浪費亦頗大；個別部隊因為糧食浪費超支，向倉庫強迫借糧的事情，仍不能盡免。又如：倉庫制度，大部份還只做到了糧食收支和管理工作，關於督收、保管、報銷等責任，還作得很差。又如：小型飯票不能在民間流通，使出差人員吃飯困難，這也是一個缺點。最後，在建立與健全制度中，還有一個大的缺點，便是糧食局只強調了本身制度和困難，還不能更全面地具體地照顧各機關困難問題的解決。

再其次，一九四二年糧食機關在清算倉庫舊糧賬上，亦獲得很大成績。數年以來，各縣糧賬向沒有清查結算過，使糧局的賬據失去效用。如一九四一年冬天按糧局賬上算，安塞應存糧二千九百餘担，實際則所存不到一百担。再如療養院向倉庫領糧，五年沒算賬，一九四二年才查出它多領了一百多担糧。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加上一九四一年買糧借糧的混淆，許多縣份無賬可查。因此糧局分別派

遣幹部下去算賬，並採取各種各樣的算賬辦法，經過半年多的努力，才將倉庫舊賬算清。目前糧局已能具體了解倉庫存根，掌握糧食收支。同時過去各縣對糧食管理，亦做得很差，鼠咬、蟲傷、腐爛等損耗，不一而足。而且幹部犯貪污的現象，亦十分嚴重。一九四一年徵糧中，發現此類案件將近十件之多。甚至於個別特務份子亦混入倉庫工作。如酈縣太樂區倉庫主任張秉權，便是特務份子，一九四二年二月間，貪污公糧十幾石，逃出邊區。這件事說明了糧局過去對於倉庫幹部考查不嚴和檢查工作的太少。一九四二年，由於清算倉庫糧賬，並加強縣五科對倉庫的領導，貪污損耗已減少，並發現了其中亦有不少積極苦幹的幹部。

在執行徵收政策方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兩年的徵糧條例，規定起徵點爲一担二斗（即農戶全家每人收穫量在一担二斗以下者免徵公糧），累進最高額爲百分之三十六（即累進至徵收收穫量百分之三十六爲止，以上不再增高稅率）。其缺點是公糧負擔偏重在少數富有者身上。同時，在徵收方法上，又是採取民主攤派辦法，並未按照條例執行，因而發生『抓大戶』『睽目標』等現象，也是徵收政策有些過『左』的影響。一九四一年修改了徵糧條例，規定起徵點爲五斗（例如某家五口全年正糧收穫量在二担五斗以下者免徵），累進最高額爲百分之三十。執行結果，在擴大徵收方面，除環縣因災荒影響外，其他各縣負擔人員數，均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延安縣更擴大到百分之九十五。在照顧各階級各階層利益方面，除延安、延長、安塞外，其他各縣負擔額均未超過收穫量百分之三十。但缺點仍是有的。例如各縣公糧總數字的分配，沒有做到完全合理。警備區降低起徵點爲三斗，同時縮短了累進率的中間距離，使得貧農中農吃虧，富裕中農以上太佔便宜。又如一九四一年徵糧中，我們只注意徵糧，不注意與減租減息配合進行；新來移民不應當負擔公糧的，有些負擔了公糧；抗屬應當受優待的，有些被取消了優待；以及棉花不應徵糧也算在徵收之內等等；這些都是違反政府政策的。

其他如照顧各階層利益與提高農民生產情緒等政策，也只是做到了一般的號召，具體執行還很不够。有了一九四一年的經驗，一九四二年徵糧就有了進步。但在植棉政策上，仍注意不够。例如對東三縣產棉區域的公糧，也和其他各縣一樣分配，到了徵收階段，下面發生問題，不徵棉田公糧任務不能完成，要徵又與政府法令抵觸，最後只得依變通辦法減半徵收，這仍是與政府威信有礙的。

任何工作，於政策之外，就決定於幹部的好壞，糧食工作也是如此。糧食工作中最艱苦的是倉庫幹部，最易犯貪污的亦是倉庫幹部。因此，在這裏特提出幾個比較典型的好的與壞的倉庫幹部來講一講，使每個同志都跟好的去學習，並拿壞的警惕自己。

好的例子：

甲、蟠龍倉庫主任何純高同志，是五十二歲的老漢，不多說話，很細心沉着，積極苦幹。從一九三九年就分配在糧食局真武洞倉庫工作。一九四〇年調任蟠龍倉庫主任，兼負調劑站、運輸站的責任，三個人的工作由他一人兼負。他過去當過區委書記，在邊區黨校受過訓練。當初由邊校一齊派來做糧食工作的還有賈志才、任生彪等七人，堅持到今天的只有他一個。他的文化程度在倉庫主任裏面不算低，能寫簡單的信，記賬也清楚，學習會計上新採用的簿冊很認真，學得快。一九四一年給倉庫分發『每月報告表』，有些倉庫主任費了三天時間還說不清楚，他聽過一次之後就能提問題，提意見：『這一格填什麼？那一格這樣填行不行？』以後他就可以按期填寄『每月報告表』。他在工作上表現出的優點：沉着細心——收公糧時能從容寫收據，每晚上結賬。支糧時，算盤總打兩遍。刻苦負責——對倉庫很關心。有一個窖稍為濕些，他就特別注意，經常翻晒，支糧先支這一窖。後來他在窖後掘一道渠，把窖外地面挖得比窖裏低，倉庫就乾了一些。倉庫小修工程，或者僱不下工人，他自己動手去搯磚、抹泥（在他影響下過斗員也努力幫忙）。兼管運輸站，每次運輸隊來到時，要幫忙鋤草、挑水、燒

飯。待人和氣——支糧時，有些領導機關人員鬧脾氣，他能忍讓委屈地把事辦好，從不與人起衝突。送糧時，群眾送壞糧，他只勸回去。做調劑工作買糧，也會商量，與群眾親近。却又有主見。有一次下雨，集上糧賣不出去，他就乘機收買，價格較低，群眾還高興。因此何站長在蟠龍街上群眾中間，是有威信的。一九四一年收公糧，延川永坪區一個農民向他納賄，他當時反臉，人賊一起送區政府。生活樸素——對個人生活很少提出意見，領保健費他都表現心裏不安。一九四二年他負責收公糧四千担，大家都關心他年紀大，人少，忙不過來。但他每次給糧局來信，總說他是有辦法的。

乙、綏德田莊倉庫主任白合明同志，高小畢業，在舊日聯保處辦過事。他的優點：刻苦負責——收糧時，每晚一定把收據和飛條對照，檢查有無錯誤。他也一定將欠糧戶列出清單，督促區鄉送糧。收糧之前，爲了防濕，他親自動手在倉窖裏鋪石板，墊乾草，草上再鋪蓆。公糧入了倉，不急開支的倉窖，他都自己動手用磚壘住，用泥抹塗，通風洞上找破蓆子擋住。待人和氣——收糧時對糧食質量認真檢查。但對送了壞糧的，他只是勸說：『大家看，這樣的糧送給軍隊，心裏過得去嗎？』從來沒有大聲嚷過。軍隊不按手續領糧的，他總是和藹耐心地向來人解釋。一面借給一些糧食，不使缺糧；一面叫他們補辦手續。日子久了，綏德的駐軍如果到老白倉庫支糧，一定要辦手續，不然老白作難，他們不好意思。生活刻苦——自己拾柴、挑水。經費伙食，開支不馬虎。超支數目，都報五科，不隨便拉公糧賣錢補助。現在白合明同志已被升爲綏德縣政府第五科科长。

壞的例子：

甲、新寧四區倉庫主任胡典長。一九四一年冬收糧期間，私賣公糧三石，馱回家一石三斗，又私下借給親友麥子三石九斗二升。本人與親友胡典功、胡清榮、劉子孝等三家應出公糧七担，顆粒未交，就扯給公糧收據。收糧時不許群眾掃收地下的糧食，却由他掃集，和幫助收糧的人員分用。公糧

寄存民家，支完實短糧二斗，却向五科謊報爲一石。經五科查出，送裁判所究辦，判處徒刑，並追回貪污的糧食。

乙、華池水泛區倉庫，一九三九年九月，賣糧之後，公糧短欠十四担七斗。倉庫主任王文斌，向上級呈報是老鼠吃了十二担七斗，霉壞了二担。一九四一年徵糧工作團去調查，發覺在賣糧期間，王文斌曾到縣上開會，由區書毛羽鵬代替將糧賣完。就在賣糧期內，毛羽鵬生活格外濶綽，買了一群羊，兩件皮襖，又買布，有很大貪污嫌疑，但縣政府當時沒有查究。後來毛羽鵬調到別處工作，這件事也就拖下去了。

上面，我們已總結了過去五年糧食工作的經驗。下面，我們再來指出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方針。

(一) 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我們過去採用徵收救國公糧這一形式，是一種不完善的稅收辦法，做得好，只能達到人民負擔公平合理的目的，對於農民生產情緒，不能予以有利的刺激。因此，我們必須積極準備實行統一的農業累進稅政策。這一準備工作如何進行呢？(1) 在財政廳領導下，設立專門研究組，抽調有政權工作經驗，了解土地財政問題的好的幹部五人至七人，組織研究組，專門搜集、研究、整理有關累進稅的材料，並計劃推進工作。另由邊區政府指定有關機關負責同志，以財政廳長爲首，組織籌備委員會，負責掌握政策，解決較大問題，並經常領導研究組的工作。(2) 進行調查工作。一九四二年徵糧工作的詳細總結，應以供給累進稅研究組以具體材料爲目的。研究組應當首先研究幾個情況不同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徵糧工作較好的縣分，擬定初步的調查計劃。先行試驗調查。然後修正計劃，製定表式，實行普遍調查。根據調查材料，製定條例辦法。成績好完成早的縣分，一九四三年就可先行試辦。(3) 實行土地登記，和調查工作配合進行。(4) 加強鄉政府組織，健全文書，深入調查工作。

(二) 掌握糧草，保障供給。糧草供給是一件複雜細密的工作。糧草分散，掌握不易，如果不能隨時注意，適當地調整供需關係，工作就難做好。要能掌握糧草，保障供給，必須做到下列各點：

(1) 在掌握糧草上，須先保證十六萬担公糧全部入倉，並提高質量到百分之百的米，不許攪糠，同時號召各縣消滅尾欠。在管理糧草上，必須健全各種制度，注意倉庫的管理和檢查，建立中心倉庫，逐漸改善設備，防止糧食霉爛損耗及貪污盜竊等現象發生。嚴格執行預決算制度，澈底廢除浮報冒領及吃雙份糧的現象。按照各地幹部的文化程度，建立糧食會計，不講形式，但求糧草收支存餘，計算分明。其次，支糧制度更加重要，務必堅持執行。但建立制度為的是保障供給，防止貪污浪費；一切不遵守紀律的現象固然應當嚴格糾正，但不顧及具體事實，只強調制度，那種機械的觀點亦須防止。

(2) 保證供給，必先解決糧草供需關係。糧草缺乏地區，應以運輸、調劑各種辦法，籌備補給。一九四三年我們應當組織機關空閒牲口馱運糧草，提高每個運輸隊的工作效能（我們的牲口要比老百姓的牲口平均每頭少馱一斗，老百姓兩天走的路我們要走三天），規定一定的運糧任務，以節省人力畜力，使之用到生產上去。必須依靠人民運輸的糧食，應早計劃，利用農暇或空脚牲口運輸。非特殊情形，不准在農忙時間動員運輸。長距離的運輸，也應當盡量避免。糧食可能調劑的地區，由糧食局統籌計劃，適當地利用時間，把糧食賣出或買回，補助供給，以節省運輸，避免損耗。機關學校過於集中的地區，如延安等地，應當斟酌情形，實行人馬疏散，以便調劑糧草。

(三) 精兵簡政，儲糧備荒。邊區公糧連年透支，毫無準備，倘遇災荒，軍民食糧必成為極嚴重問題，大家皆應以此警惕。為此應當：(1) 堅決執行黨和政府新的整編計劃，貫徹精兵簡政。以精簡節約的精神，保障一九四三年的糧食收支做到平衡。(2) 一九四三年應徵公糧十八萬担，以便我們有可能節餘一部份作為準備糧，以備不虞之需。(3) 一九四三年軍隊與機關學校應以發展農業為

第一位，其中種糧應佔一個相當數目，使一九四四年餘糧更多，有備無患。各部隊機關學校決不可因一九四三年準備徵糧十八萬担，鬆懈自己的糧食生產。

（四）厲行節約，嚴禁浪費糧食。我們機關部隊在糧食方面的浪費現象，非常嚴重，因之號召實行節約運動，應為我們一九四三年的中心工作之一。近來延安有些機關學校檢查浪費，實行節約，已經獲得很大成績。例如：留守兵團供給部工訓班的管理員，勤儉負責，發米發麵，親自過秤，因而他們的伙食相當好，經常能吃饅頭吃麵；中央黨校大灶，近來伙食管理嚴格，伙夫下米，有人監督，保存剩飯，下頓和起來吃。這樣實行以後，他們每天每人只吃小米一斤，不到一月，節餘小米五石之多。又如保育院實行集體吃飯，過去保育院在分散吃飯的時候，全院每頓吃麵一百五十斤。實行集體吃飯後，每頓只吃麵一百斤，省了三分之一。同志們看，這是一個何等驚人的數目！又如中央各部委實行集體飯堂制，亦已收得很好的成績。又如中央黨校上半年全校統計養雞二千隻，每天需要小米三百碗，浪費很大。後來大家發起殺雞，結果只剩六十隻，節省糧食不少。此外，養成使用飯票的習慣，也非常必要，可以少領大批糧食。總之，我們要一方面徵糧產糧，一方面力求節省，來保證糧食的完全無虞。這是領導同志的工作，又是一個群眾運動，務望大家注意，完成黨所給的任務。

本書原計劃的稅收、節約兩章，因高幹會閉會，沒有時間寫了，只好暫付闕如。

——著者

論合作社

——一九四三年十月在邊區高幹會的講話——

今年邊區在發展生產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動了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

在過去，束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係，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後，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係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

但是，如果不從個體勞動轉移到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在以個體經濟為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現在陝甘寧邊區的經驗：一般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二人可抵三人，模範的變工札工勞動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末，現有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這辦法，可以行之於各抗日根據地，將來可以行之於全國，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

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係變化了，這就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

全邊區現有全勞動力三十五萬個，今年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中的變工隊札工隊的已有三萬餘人，佔全勞動力總數十分之一，而臨時性的勞動互助，就延安縣說，有百分之七十，明年還可發展。如果各縣經常的集體勞動組織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可達十萬人左右，再加上臨時性的勞動互助組織能向延安看齊，還有半勞動力也參加組織，這將是一支很大的勞動軍。

我們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也帶着合作社的性質。比如一個連，就是一個小合作社，一個旅就是一個大合作社。在各種部隊機關學校合作生產之中，楊家嶺運輸隊的經驗，是值得注意的。楊家嶺運輸隊在改組前，有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照普通情形，每日最低限度應運輸物品二十七萬斤，但實際運輸的只有十九萬斤。經費開支，則除照一般的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今年在公私兩利的原則下，把運輸隊改為運輸合作社，公家以大車八輛馱騾十六頭（後增為二十頭）及全部用具作為八十股，運輸員二十名以身份股名義作為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數二八分紅；一切人員、牲口、添置等費用開支，概由合作社自行解決；替公家運輸物品依照里程遠近按斤給運費；運輸員的生活，由運輸合作社適當改善。這辦法，經過解釋後，全體運輸員一致贊成。執行結果，運輸量由每個月十九萬斤，增為三十八萬九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過了普通的運輸力百分之三十。同時，大大提高了運輸員對工作的責任心和積極性，節省了許多經費和工具，又更加愛護牲口。比方，過去裝粉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無人管，現在運輸員隨身帶着針線，縫補口袋；過去貪污馬料是公開秘密，現在却沒有這種貪污了；過去車馬用具稍一損壞，就要求公家補充新的，現在只要能湊合着用，就對付着用下去；對牲口，過去是粗心大意的，現在也逐漸喂好了；運費開支，改組後比以前減少三分之一，

過去除照供給標準外，每月還要貼六萬元，現在不用半文津貼，還每月獲利數萬元。

各機關採用這辦法後，也得到很大的效果。管理局運輸營一百頭牲口，二十輛大車，在未組織合作社之前，每月運輸量只有一百二十萬斤，改組為合作社後，每月運輸量提高到一百八十五萬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請大家考慮這種合作辦法，是否可以廣泛運用於我們的公營工廠及公營農場。

這一套辦法，資本主義國家及國民黨是不能做的，只有我們才能做。因為我們不以剝削人民為目的，我們貫徹公私兼顧的方針。

軍隊中如三五九旅戰士的紡毛線，用柳榆樹條編成各種用具，規定：凡動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勞動，以其結果五分之四歸公，五分之一歸私；凡不動用公家工具的，則以三分之二歸公，三分之一歸私。這種辦法，一方面解決了公用品的需要，同時無異增加了戰士的津貼，也含有合作社因素。

合作社性質，就是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而又以群眾為歸宿，那就什麼都能好辦。因此，我們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隊的負責同志要替戰士着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着想，替雜務人員着想。這種群眾觀點的生產學說，打破了過去各種不正確的『學說』，也只有這種為群眾的學說，才能把生產搞得好的。

我願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產。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是一種合作社，農村的集體互助勞動又是一種合作社，此外還有包含各種業務在內的綜合性合作社，被稱為運鹽隊的運輸合作社，工人們集體互助的手工業合作社，把這許多樣式的合作社都發展起來，全體公私群眾就會變為富裕的了。在敵後各根據地的目前困難狀況，也就能夠克服了。

組織起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九日在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會上的講話——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從農民群眾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範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群眾，根據去年冬天西北局所召集的高幹會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爲之一新。已經完全證明：高幹會的方針是正確的。高幹會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人打垮。如果邊區去年以前的成績還不够大，還不够顯著，還不足以完全證明這一點，那末今年的成績，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這是大家親眼看見了的。

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每個戰士做到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窑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需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餘九個月時間均可從事訓練及作戰。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呵！抗戰六年半中，敵人在各抗日根據地上實行燒殺搶的光政策，陝甘寧邊區則遭受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財政上經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我們的軍隊如果只會打仗，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我們邊區的軍隊已經學會了生產，前方的軍隊，一部份也學會了，其他正在開始學習，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佔經費的一小部份，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份；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解決日用品。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份就減少了。老百姓生產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份就增多了，軍民兩方大家都發展生產，大家都做到豐衣足食，大家都歡喜。還有我們的工廠，發展了生產，清查了特務，生產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個邊區，產生了吳滿有一型的農業勞動英雄，趙占魁一型的工業勞動英雄，黃立德一型的機關學校勞動英雄，還有軍隊中出了許多勞動英雄，邊區的生產，可以說是走上了軌道。凡此，都是實行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

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麼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沒有群眾

觀點，缺乏群眾觀點，不依靠群眾，不組織群眾，不注意把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工廠的廣大群眾組織起來，而只注意組織財政機關、供給機關、貿易機關的一小部份人。不把經濟工作看作是一個廣大的運動，一個廣大的戰線，而只看作是一個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這就是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錯誤的方針。陝甘寧邊區過去是存在過這種方針的，經過歷年的指正，特別是經過去年的高幹會和今年的群眾運動，大概現在還作這樣錯誤想法的人是少了。華北華中各個根據地，因為戰爭緊張，也因為領導機關注意不夠，對於群眾的生產運動還沒有廣大的開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號的指示以後，各個地方也都在準備發動明年的生產運動了。前方的條件，比陝甘寧邊區更困難，不但有嚴重的戰爭，有些地方還有嚴重的災荒，但是為了支持戰爭，為了對付敵人的三光政策，為了救濟災荒，就不能不動員全體黨政軍民，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實行生產。前方的生產，過去幾年已經有了一些經驗，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物質準備，明年可能造成廣大的運動，並且必須造成廣大的運動。前方處於戰爭環境，還不能說到『豐衣足食』，但是『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則是完全可以做到，並且必須做到的。

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們部隊機關學校的群眾生產，雖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群眾的這種在集中領導下用互相幫助共同勞動的方法來解決各部門各單位各個人物質需要的生產活動，是帶有合作社性質的。這是一種合作社。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還不是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

我們的合作社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札工隊』、『唐將班子』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蘇區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群眾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幹會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就大為條理化和普遍化。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簡直是百分之二百，群眾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明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與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裏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群眾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上，都應該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三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全部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爲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

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群眾組織生產，幫助群眾總結經驗。以前，我們的許多同志也有孔夫子的缺點，孔夫子的學生問到如何種莊稼如何種蔬菜的事情時，孔夫子就答不上來，我們的同志也答不上來。但是我們的同志現在是學會了，他們答得上來了，他們就比孔夫子高明了。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群眾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群眾的創造力與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人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裏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鬭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鬭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裏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與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與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向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麼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

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我覺得，在無論那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份缺乏群眾觀點因而脫離群眾的工作同志，因此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群眾親密地結合起來。此外，在我們的軍隊工作中，則存在有一種軍閥主義作風，這也是一種國民黨作風，因為國民黨軍隊是脫離群眾的。我們的軍隊必須在軍民關係上、軍政關係上、軍黨關係上、官兵關係上、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關係上、幹部相互關係上，實行正確的原則，決不可犯軍閥主義的毛病。官長必須愛護士兵，不能漠不關心，不能採取肉刑。軍隊必須愛護人民，不能損害人民利益。軍隊必須尊重政府，尊重黨，不能鬧獨立性。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歷來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是全國軍隊中一支最好的軍隊。但是近年確實生長了一種軍閥主義的毛病，一部份軍隊工作的同志養成了一種驕氣，對士兵，對人民，對政府，對黨，橫蠻不講理，只責備地方，不責備自己，只看見成績，不看見缺點，只要聽恭維話，不愛聽批評話。例如陝甘寧邊區，就有這種現象。經過去年的高幹會與軍政幹部會，又經過今年正月的擁政愛民運動與擁軍運動，這個傾向是克服下去了，還有一些殘餘，也可以繼續去克服，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上，這種毛病都是有的，那裏的黨與軍隊必須注意克服這種毛病。無論在地方工作中，在軍隊工作中，無論是官僚主義傾向與軍閥主義傾向，其毛病的性質都是一樣，就是脫離群眾。我們的同志，絕對大多數都是好同志。對於犯了毛病的人，一經展開批評，揭發錯誤，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須開展自我批評，正視錯誤傾向，認真實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評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不批評軍閥主義傾向，那就是願意保存國民黨作風，願意保存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在自己純潔的臉上，那就不是一個好黨員。如果我們在地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去掉軍閥主義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會順利地開展，對於發展生產運動也是這樣。

我們邊區的生產，無論在農民群眾方面、機關學校方面、軍隊方面、工廠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在軍民關係上也有了很大進步，邊區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的同志對於群眾觀點已經加深，對於結合群眾大進一步的表現。但是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儘管我們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傾向，已經根本上克服了，但是這些惡劣傾向又可以生長起來的。我們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反動勢力的層層包圍之中，我們是處在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包圍之中，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與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因此，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判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爲了清潔，爲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各位勞動英雄和模範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群眾，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把群眾都組織到合作社裏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列寧說，我們無產階級沒有旁的力量，唯一的力量就是組織。從前有個歌詞，說是：『狠，狠，狠，團體結得緊』，完全正確，只要我們善於組織，只要我們的團體結得緊，我們是什麼都不怕的，什麼人也不能奈何我們，也不敢欺負我們的。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績。

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在陝甘寧邊區勞模大會上的講話——

各位勞動英雄，各位模範工作者！

你們開了十幾天大會，總結了很多的與很好的經驗，大家歡迎你們，尊敬你們。你們有三種長處，起了三種作用。第一個，帶頭作用。這就是因為你們特別努力，有許多創造，你們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範，提高了工作標準，引起了大家學習你們，你們是生產運動和各項建設工作的帶頭人。第二個，骨幹作用。你們的大多數現在還不是幹部，但是你們已經是群眾中的骨幹，群眾中的核心，有了你們，工作就更好推動了。到了將來，你們可能成為幹部，你們現在是幹部的後備軍。第三個，橋樑作用。你們是上面領導人員與下面廣大群眾之間的橋樑，群眾的意見經過你們傳到上面來，上面的意見經過你們傳下去。

901

你們有許多好處，有很大功勞，但是你們切記不可驕傲。你們被大家尊敬，是應當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驕傲。如果你們驕傲起來，不虛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幹部，不尊重群眾，你們就會當不成英雄與模範了。過去已有一些這樣的人，希望你們不要學他們。

你們的經驗，這次大會做了很好的總結。這個總結文件說得很好，不但這裏適用，各地也可以適用，我就不講這些了。我想講一點我們的經濟工作。

近幾年中，我們開始學會了經濟工作，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但這還只是開始。我們必須在兩三年內，使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解放區，做到糧食及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給，並有盈餘，使農業、工業、貿易三方面都比現在有更大成績。到了那時，才算學得更多，學得更好。如果那一個地方的軍民生活沒有改善，爲着反攻而準備的物質基礎還不穩固，農業、工業、貿易不是一年一年上漲，而是停止不進，甚至下降，便證明那個地方的軍政黨工作人員還是沒有學會經濟工作，那個地方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有一個問題必須再一次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們的思想要適合於目前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是農村，這一點好像並沒有什麼問題，誰不知道我們是處在農村中呢？其實不然。我們有很多同志，雖然天天處在農村中，甚至自以爲瞭解農村，但是他們並沒有瞭解農村，其中有些人至少是瞭解得不深刻。他們不從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在前方）農村環境這一點出發，他們就在處理政治問題上，在處理軍事問題上，在處理經濟問題上，在處理文化問題上，在處理黨務問題上，在處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問題上，常常不適當，或不大適當。他們帶着城市觀點去處理農村，主觀地作出許多不適當的計劃，強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幾年來，由於整風，由於工作中碰了釘子，使我們的同志有了很多進步。但是還須注意，還須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於我們所處的環境，然後才能使我們的工作樣樣見效，並迅速見效。如果我們真正瞭解了我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被敵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如果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看來收效很慢，並不轟轟烈烈，但是在實際上，比較那種不從這一點出發，而從別一點出發，例如說，從城市觀點出發，其工

作效果會怎麼樣呢？那就決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為，如果我們從後一點出發，脫離今天的現實，做起來不是效率快慢的問題，而是老碰釘子，根本沒有效果的問題。

即如我們提倡採取現有樣式的軍民生產運動，發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如果我們要從農村根據地上打退強大的日本侵略者，並且要準備攻入城市，收復一切失地，這就不是短期的事情，需要準備長期戰爭。抗戰已有八年了，農村的財富，被敵人摧殘，我方消耗，都是很大的。但是我們還要堅持戰爭，並且還要積蓄力量準備反攻，然後才能把日本人打出去。在這種堅持戰爭與準備反攻的工作中，除了軍事、政治、文化等項以外，物質力量的準備，就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了。沒有這個條件，現在的堅持與將來的反攻，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是處在個體經濟的被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中，怎樣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同盟國出力，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外國人幫助。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那末，有些什麼辦法呢？我們就用軍民兩方同時發動大規模生產運動這一種辦法。

由於是農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們的生產和供給就採取『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由於是農村，農民都是分散的個體生產者，使用着落後的生產工具，受着封建的地租剝削。爲了提高生產興趣與生產力，我們就採取減租減息與組織互助兩個方針。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互助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我已得了華北華中各地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說：減租之後，農民興趣大增，願意組織如同我們這裏的變工隊一樣的互助團體，三個人當成了四個人。如果是這樣，九千萬人就當成了一萬萬二千萬人。還有兩個人當成三個人的。如果不採取『強迫命令，欲速不達』的方針，而採取『耐心說服，典型示範』的方針，那末，幾年之內，就可能使大多數或全體農民都組織在農業生產

的與手工業生產的互助團體裏面。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爲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提高，文化也會進步，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不要很久，生產工具也會改良，到了那時，我們的農村社會，就會建立在新的生產力上面了。

如果我們的工作人員用心地研究這項工作，用極大精力幫助農村人民展開生產運動，幾年之內，農村就會有豐富的糧食及日用品，不但可以堅持戰鬪，不但可以對付荒年，而且可以貯藏大批糧食及日用品，以爲反攻敵人之用。

不但要組織農民生產，而且要組織部隊機關一齊生產。

由於是農村，由於是經常被敵人摧殘的農村，由於是長期戰爭的農村，部隊機關就必須生產。由於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部隊機關也可能生產。在我們陝甘寧邊區，則更由於部隊機關的人數和邊區人口比較，所佔比例數太大，如果不自己生產，則勢將餓飯。如果取之於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因此，我們決定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拿我們邊區說，部隊機關每年需細糧（米）二十六萬担（每担三百斤），取之於民的佔十六萬担，自己生產的佔十萬担，如果不自己生產，則軍民兩方，勢必有一方要餓飯。由於展開了生產運動，現在我們不但不餓飯，而且軍民兩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們邊區的機關，除糧食被服兩項之外，其他用費，大部自給，有些單位則全部自給。另有許多單位，並且自給一部份糧食，一部份被服。

邊區部隊的功勞更大。許多部隊，糧食被服其他一切，全部自給，即自給百分之一百，不領政府一點東西。這是最高的標準，這是第一個標準，是從幾年之內逐漸達到的。

前方要作戰，不能採取這個標準。前方可以設立第二、第三兩個標準。第二個標準是除糧食、被

服兩項由政府供給之外，其他如油（每日五錢）、鹽（五錢）、菜（一斤至一斤半）、肉（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費、辦公費、雜支費、教育費、保健費、擦槍費、旱煙、鞋子、襪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產自給，約佔全部用費百分之五十，可在兩年至三年內逐漸做到。現在已有做到了的。這個標準，在鞏固區內可以實行。

第三個標準，是在邊沿區及游擊區內實行的，他們不可能自給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這樣，也就很好。

總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隊、機關，於戰鬪、訓練與工作的間隙，一律參加生產。部隊及機關，除利用戰鬪，訓練及工作的間隙，集體參加生產之外，應組織專門從事生產的人員，創辦農場、菜園、牧場、作坊、小工廠、運輸隊、合作社，或與農民夥種糧、菜。任何機關、部隊，都應建立起自己的家務。不願建立家務的二流子習氣，那是可恥的。但須規定按質分等的個人分紅制度，使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員能够分得紅利，藉以刺激生產的發展。又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方能有效地推進生產工作。

有人說：部隊生產，就不能作戰與訓練了，機關生產，就不能工作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最近幾年，我們邊區部隊從事大量的生產，衣食豐足，同時又進行大練兵，又有政治與文化學習，均比從前有更大的成績，軍隊內部的團結與軍民之間的團結，也比從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進行了大規模生產運動，可是去年一年作戰方面有很大的成績，並且普遍的開始了練兵運動。機關因為生產，生活改善了，使得工作人員更安心，更有工作效率，邊區和前方都是這樣。

由此可見，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的機關、部隊，如果有了生產自給運動，他們的戰鬪、訓練與工作，就更有勁，更加活躍了。他們的紀律，他們的內部團結和外部團結，也就更好了。這是我們

中國長期戰爭的產物，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學會了這一條，我們就對一切困難都不怕了，我們將一年一年更有生氣，更有精力，愈戰愈強，只有我們去壓倒敵人，決不怕敵人來壓倒我們。

但是，有一點還須引起我們前方同志的注意。我們有些地方開闢不久，還頗富足，但是那裏的工作人員自恃富足，不肯節省，也不肯生產。這樣就很不好，他們在將來一定會吃虧的。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計算到長期堅持戰爭，計算到反攻，計算到敵人走了之後的建設。一面決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過去有些地方缺少長期打算，既未注意節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發展生產，吃了大虧。得了這個教訓，現在必須引起注意。

關於工業品，陝甘寧邊區決定於兩年內，做到花、紗、布、鐵、紙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給。原來根本沒有，或出產很少的，現在一概自種自造自給，完全不靠外面。所有這些，由公營、私營與合作社經營三方面完成任務。一切產品，不但求數量多，而且求質量好，耐穿耐用。邊區政府、聯防司令部、西北局，對於這些抓得很緊，這是非常之對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這樣做。有許多地方，他們已是這樣做了，希望他們得到成功。

我們邊區及整個解放區，還要有兩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完全學會全部經濟工作。我們到了糧食與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種自造自給，並有盈餘的日子，就是我們完全學會在農村中如何做經濟工作的日子。將來從城市趕跑日本人，我們也會做新的經濟工作了。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